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十二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说　明

根据政治课教学改革的精神，和我院及军队院校中国现代史、革命史、党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课的教学以及研究生班的需要，我们对本室一九七九年编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11册）作了增补，将近年来党史研究中发掘和收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史料，续编七册（序号12—18）：党的创立时期一册（12）；一战时期一册（13）；二战时期二册（14、15）；抗战时期二册（16、17）；三战时期一册（18）。同时，编印社会主义时期资料十四册（19—32）。

所收文件资料，有的公开发表，有的内部发表使用过，只供内部教学和研究参考，不得翻印。为保持文件原貌，所有资料均未作改动，如需引用，请查对原文。

本书编辑委员会由段浩然、曲延绩、张天荣、肖甡、胡庆云、林蕴晖、何礼、李兴仁、丛进、王年一、郭占波、李浚组成，负责整个资料的编选。由赵更群、魏政、李浚负责印制出版。刘星星参加了资料的汇集、整理工作。

第12册由肖甡、胡庆云同志选编，林蕴晖、李浚同志统编。

一九八五年六月

目　　录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况与特点

樊 百 川

二十世纪最初十来年间，中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比较全面的初步发展。这不仅使中国资本主义摆脱掉它在十九世纪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洋务派活动的依附状况，迅速成长为中国社会经济中比重虽低但却最为先进的独立的经济成分，而且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为辛亥革命的发生，造成经济的条件和基础。现在根据作者所接触到的资料，将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况和一些基本特点整理如下，就教于专家、学者和读者。①

一

中国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遭受打击之后，从一九〇一年起即开始出现回复现象，到一九〇四——一九〇八年间形成一个约五年时间的兴办近代实业的高潮，然后在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间转向萧条，到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因外国侵略者设置橡胶公司、拐逃大批资金，造成空前的全国性金融大恐慌，而形成全面的衰敝。十来年间，呈现一个拱状的形势。其所以出现这种局势，主要是由下面一些原因促成

第一，中国资本主义取得了合法存在和能够比较自由地生长的权利和地位。

在十九世纪，清政府一直未曾取消华商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禁令。想要投资近代工矿交通运输业的华商，只有按照不同情况，或者用各种方式托庇于外国侵略势力，或者依附于洋务派的活动及其他封建势力。戊戌变法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者，曾想取消这种禁令，但因变法失败而未果。所以，从整体来说，中国的资本主义直到十九世纪末，始终未被封建统治者承认为合法的生产方式。华商依然没有自由兴办近代实业的权利。

义和团运动发生以后，清政府为了恢复统治而被迫实行新政。其主要意向，首先是对外求得帝国主义的谅解，但同时它也不能不对内作些让步，换取新兴资产级阶分子的支持。它把资产阶级在戊戌变法时期求之不得，和某些当时还不敢提出的要求（如设议院等)，或者直接付诸实行，或者许愿将来实行。其中一九〇三年设立商部（后合并工部等成为农工商部)，先后制定商律、公司注册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及有关矿务、铁路、银行、商标和奖励投资新式企业的章程等等，是清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存在，准许资产阶级享有按一定的法律规定自由兴办新式企业的权利，并给以某些鼓励。这不仅消除了华商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禁令，使资本主义成为合法的生产方式、能够摆脱托庇外国侵略者和依附洋务派活动的尴尬和困难处境，并且使资产阶级在兴办近代实业和改造旧式手工业的过

① 本文所述各项事实和统计数字，皆系作者根据多种资料交互参订、综合整理作出。因为所用资料来源过于繁多零碎，无法在文中详细注明，所以除直接引用的单项资料分别注明出处外，其余只好俟诸异日，敬希原谅。

程中，有了较能排除各种封建势力（包括手工业行会在内）阻挠的武器和根据。这些法律和章程的颁布，实际上宣告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解放，为中国资本主义出现比较全面的初步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第二，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外货斗争，大大推动了国内兴办近代实业的热潮。

收回利权运动从一九〇三年开始迅速在有外国侵略者霸占路矿利权的省份展开。在运动中，收回路矿利权与自办路矿相结合，迅速在全国兴起一个自筹资金筑路建矿的热潮。

正当收回利权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又发生美国虐待华工和逼迫清政府签订承允虐待华工合约的事件。全国人民为了反对美国的暴虐和霸道行径，在一九〇五年掀起了广泛的抵制美货斗争。在斗争中，群情激奋，由相约不买用、贩售美货，进而提倡设厂仿制，直接推动了织布、面粉、卷烟等近代工业的发展。此后又发生一九〇八年广州、香港等地抵制日货的斗争，一九〇九年奉天省反对日本强行改筑安奉铁路的斗争等。

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外货斗争，直接起着动员人民发展本国资本主义、抵制外国经济侵略和压迫的作用。其影响所及，不只是某些具体路矿的自我兴办和一些工业部门的发展，它实际上成了在各地普遍兴办各种近代实业，全面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推动力。

第三，封建自给经济和旧有城乡手工业的进一步破坏，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样化，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事业准备了比较适宜的经济条件。

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外国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中国原有的封建自给经济和城乡手工业被破坏的进程日益加快。外国输入货物总值从十九世纪末的两亿多海关两，增到一九一〇年的四亿多海关两，使中国旧有的社会经济更加趋于瓦解，原有的手工业也更加难以保存。以手工棉纺织业为例，旧日耕织结合的生产方式，这时不仅在江南和其它主要通商口岸附近地区已经几乎绝迹，在全国大部分内地区域也难于保持原状。停纺停织，或参用洋纱织布，在全国开始成为普遍现象，不少地方且已出现全用洋纱织布的事情。这不仅迫使农民更多地出售棉花、购用洋布，或购纱织布售卖，扩大了城乡的商品交换，为大机器棉纺织工厂拓展了销售和原料市场，并为产生专业的机器织布工厂，和在手工业中建立资本主义的手工织布工场，进而把农村手织业变为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准备了条件。其它许多原来受行会控制的手工业，也因为大批手工业者的破产，削弱了行会控制的力量，为创设近代工业或改造旧式手工业，提供了可能。如旧式丝织业衰落，开始出现手工丝织工场，碾米业、榨油业采用或参用机器等。

同时，伴随封建自给经济和旧有城乡手工业破坏的日益深化，以及大批机器工厂和新式手工工场代之兴起，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连锁反应也跟着发生了。旧日供应简单生产工具的制造业，需要代之以供应新的生产设备的机器修造工业。原来简陋的房屋经不起机器的震动，需要建筑合用的坚固厂房。生产需用的原料和材料也变化了。原来生产过程中不需要的动能燃料，如今需要了。旧有的交通工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巨大运输量，需要建立和发展新的水陆交通。随着新的生产事业的发展，人们要求建立和发展新的经济、文化事业。一种生产部门的建立，要求多种生产部门配合，由生产部门连及于交换、金融部门等等，从而为资本主义各个行业的出现和建立，准备下社会需要和可能的客观条件。这样，中国的资本主义既得到合法存在和生长的权利，又具备了获得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而在二十世纪初期开始有了比较全面的初步发展。

二

中国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初期比较全面的初步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内容是，原有各个行业大多有显著的增长，又出现和开始建立了许多新的行业，在地域分布上有很大扩展，并由于大机器工业的带动，第一次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产生和形成了一个改造旧有手工业与设立新式手工工场的浪潮，使中国的手工业开始进入以大机器工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

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最为突出，也最有代表性。这时期，不仅十九世纪已有的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大纺织厂有新的巨大增长，而且产生一大批专业的机器织布工厂和手工织布工场。此外还出现和开始建立了机器针织业和手工工场针织业。这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棉纺织业开始步向配套生产的境地。

大机器纺织业是中国棉纺织业资本主义化的核心。由于上述各条件的作用，从一九〇四年起，便迅速出现一个增设新厂的高潮。在这年创办的，计有江苏崇明的大生第二纱厂、昭文的裕泰纱厂、太仓的济泰纱厂、河南安阳的广益纱厂。一九〇五年创办的有，上海的公益纱厂和振华纱厂，无锡的振新纱厂、宁波的和丰纱厂。一九〇六年创办的有，上海同昌纱厂，直隶宝坻庆祥（后改组为利生）纱厂。一九〇七年江苏江阴创办了利用纱厂。在四年之间，连续新设了十一家纱厂，共有资本六百六十三万余元，装置纱锭十八万一千六百二十四枚。加上十九世纪所设仍归华资经营的十二家纱厂及其在二十世纪增加的资本和设备，到一九一一年，全国共有华资及以华资为主的纱厂二十三家，资本二千一百三十五万余元，纱锭五十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二枚，布机二千四百一十六台。

拥有五十二万余锭的华资纱厂，加上外资八家纱厂的三十万余锭，合计共有八十三万二千余枚纱锭，比一九〇〇年的五十二万三千余枚纱锭，增加约百分之六十。以每枚纱锭平均日产十四支纱一英磅、即年产约二担二十五斤计算，则在二十世纪初期历年可产纱约一百余万担至二百万担。加上进口的二百数十万担棉纱，每年可有三百余万担至四百余万担机制棉纱投入市场。这比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单由进口机制棉纱投入市场的数额，增加约三、四倍。如此猛增的大量机制棉纱，不仅日益强烈地冲击着耕织结合的自给经济，加速其瓦解，更为经营各种专业的棉织工厂（场）准备下大量原料。所以，到二十世纪初期，便有各种专业的机器棉织工厂和手织工场大量涌现出来。

在专业的织布工业方面，已知使用机器动力者有十二家，共有资本不满一百万元。较大者资本一二十万元，织机数十台至一百台；小者资本一二万元，织机一二十台。其中广州有四家，上海有二家，其余在浙江杭州、广东香山、澄海、直隶丰润、山西平遥、奉天辽阳等地，各有一家。但手工织布工场则有二百数十家，数目较多，分布也更广。据可查知者，计江苏有七八十家(其中在江南者五十家)，顺天、直隶合有四五十家，湖北、广东各有二十来家，浙江、安徽、四川、山西各有十家或十余家，江西、湖南、福建、山东、河南、奉天、吉林等省各有一、二家至数家。这种手工织布工场，资本多在数千元至一、二万元之间，有数万元者，亦有一、二千元及不足千元者。所备织机，多数为进口和国内仿制的足踏铁轮木机，也有使用旧式木织机的，但已集中在一起，实行工场制生产。织机数一般约为数十台，有一、二百台者，亦有十余台、数台者，估计全部共有一万余台。此外各省县官办的工艺厂、

习艺所等，其数近千，也多有织布一科。综合各种织布工厂（场）计之，已遍布于二十余省区。

针织工业主要在这个时期兴起。除了一家设于十九世纪末以外，新设了六七家机器针织工厂和约五十家手工针织工场，分布于江苏、浙江、广东、湖北及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直隶、山东各省，估计资本共约六、七十万元，生产袜子和毛巾，机器针织工厂则兼制汗衫。

缫丝工业继十九世纪末年衰敝之后，也在一九〇四年前后逐渐恢复并加速增长起来，又出现了新的缫丝工业基地。上海的缫丝工厂，到一九一一年已有四十八家，丝车一三七三八部，比一九〇〇年的十八家，丝车五九二〇部，增加一倍多。无锡从一九〇一年创办裕昌丝厂起，到一九一一年有缫丝厂五家，丝车一三〇六部。加上苏州、镇江、杭州、萧山原有的丝厂，和绍兴、吴兴新设的丝厂，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共有缫丝厂六十二家，丝车一七一二〇部。广东的缫丝工业仍以顺德县为中心，但南海县境也已有三十余家，新会、番禺、三水各有数家，合计机器缫丝厂当在二百家以上，丝车约七、八万部。另外还有大批使用改良足踏缫丝车的人力缫丝厂。四川是这时期出现的新的缫丝工业基地。一九〇四年开始由劝工局从日本引进改良缫丝机，一九〇六年三台出现第一家改良缫丝厂，一九〇八年在重庆出现第一家仿照上海式样的蒸汽机缫丝厂，到一九一一年，共有机器缫丝厂四家，丝车四百余部，改良缫丝厂约十家，亦有丝车数百部。烟台的柞蚕缫丝业也在这个时期迅速发展起来，到一九一一年已有四十余家缫丝厂，其中有三家使用蒸汽机，其余则为足踏机，共有丝车一万四千六百余部。合计全国共有机器缫丝厂约二百七、八十家，丝车九万数千部，足踏缫丝厂五十余家，丝车一万四、五千部（广东足踏缫丝厂更多，但其数不详，故未包括在内），共计雇佣工人约在十四万人上下，日益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大行业。

近代丝织工业是这时期才出现的一个新行业，先后设立了十来家手工丝织工场，资本多者一、二十万元，少者数万元，购置进口的足踏铁轮木织机数十台，或仍用中国旧式木织机，而设场集中生产。

毛、麻机器纺织业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才真正开始发展的行业。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间新创办四家毛纺织厂，各有资本数十万元。连同十九世纪设立后毁而重建及久停重开的两家毛纺织厂，共有资本约二百六、七十万元，纺锭一万枚左右，织机一百四五十台。麻纺织业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九年间设立了四家工厂，共有资本八十六万元。至此，当时世界上所有的纺织行业，在中国都已不同程度地建立起来了。

面粉工业在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向大行业发展。这个时期新建立了三十六家面粉厂，加上在十九世纪创办、到一九一一年仍能继续营业的六家工厂，共有四十二家面粉厂，资本约六百八十万元，每日能产面粉近五万袋。其中十八家每日能产千袋以上，最大的华兴面粉公司则能日产四五千袋，规模也较十九世纪的面粉厂为大。上海和江苏仍是最大的面粉工业集中地。上海一地有八家面粉厂，资本二百三十余万元，可日产近二万袋。江苏其它各地共有九家，资本一百七十万元，可日产一万六千余袋。但新设的面粉工厂则向更广的地域扩展，设有面粉工厂的省区包括安徽、湖北、四川、云南、直隶、北京、吉林、黑龙江等。其中汉口有四家面粉厂，资本共一百二十九万元，日产面粉四千八百袋，京津地区有面粉厂七家，资本三十五万元，日产面粉二千二百五十袋，东北哈尔滨、宁古塔、齐齐哈尔一线有面粉厂九家，

资本六十二万九千元，日产面粉约六千袋，陆续开始形成新的面粉工业基地。

近代榨油工业也开始向大行业发展。这时期由于油类和油渣饼的出口大量增长，一批机器榨油工厂先后在各地设立，并促使手工榨油工场改用或参用机器。许多地方的手工榨油工场也随之增加，由农村副业转向专业化。到一九一一年，可查知的机器榨油工厂（包括只在个别工序参用蒸汽动力者），约达一百家以上。其中半数在营口和大连两地，约有五、六十家，每日能产豆油七十万斤，豆饼十四万余枚。其余上海和江苏各地有十四、五家，约有资本一百八十万元；武汉有十二、三家，资本约四百万元，能日产豆饼二万二千枚，烟台和山东各地有十四家。此外则分散于浙江、安徽、直隶、河南、广东等省。

卷烟工业也是这时期兴起的新行业，大部分在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抵制美货运动中设立。其在一九〇五年中创办者，就有十九家。综计一九〇一——一九〇七年间共设立了三十余家卷烟工厂，资本约一百六、七十万元。可惜资力微小分散，无法同英美在华垄断资本竞争，大部分在一九〇八年以后倒闭。但仍有个别工厂，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终于坚持下来，成为此后发展民族卷烟工业的骨干力量。

此外，机器碾米工厂已设立二十余家，规模大者有资本四十万元，备有碾米机十数部，小者资本数万元，各有碾米机二、三台。罐头食品工业设立了一、二十家小厂，资本略大者有七万元，小者数千元或一、二万元。新式制糖企业有三家，共有六个制糖厂，每年可产糖二万五千担至三万担。蛋厂、砖茶厂、酿酒厂、汽水厂、制冰厂等，也各有数家，分散在各省。食品工业至此已拥有多种行业。

日用化学轻工业也在逐步向多方面发展。

火柴工业是中国资本主义较早出现的行业之一，这时期则迅速在广大地域上扩展。到一九一一年，全国实存火柴厂五十一家，资本约二百一十万元。除了甘肃、新疆、吉林、黑龙江及其它少数民族地区尚未设立过火柴厂，福建、广西二省的火柴厂停闭以外，其余十六个省区，至少都各有一家火柴厂。

造纸工业在这时期新设了十家机器造纸厂，各有资本十余万元至六、七十万元。清政府度支部在汉口设立的造纸厂则有资本二百万两，规模最大。除其中一家倒闭以外，加上十九世纪设立的三家造纸厂，在一九一一年实存十二家造纸厂，资本共约六百万元。另外还有各地所设的改良造纸工场，其中最大的有资本八万两。

机器制革厂和重要的改良制革场新设了八、九家，分布于上海、武汉、成都、广州、奉天以及伊犁等处，多数都有一定规模，资本大者可至五、六十万元。加上十九世纪设立的天津硝皮公司，十家制革厂共约有资本三百数十万元。

肥皂洋烛工业是另一个设立中小厂家较多、分布地域较广的日用轻化工业行业。截至一九一一年，全国约有七、八十家中小型皂烛制造厂，资本约在一百万元以上，分布于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和华北等十二个省区，甚至甘肃的兰州也设有一家小厂。其中规模略大的有资本数万至十万元，主要分设于上海、杭州、宁波、天津等处。其余小厂仅有资本数千元，甚至不及千元。

此外，也开始有人设立小规模工厂试制镪水、漂白粉、化学肥料、进口油漆、橡胶等，不过都还未形成行业。

在建筑材料工业和窑业方面，最著名的是这时期在华北、华南和华中先后设立的三家水

泥厂。这就是唐山的启新洋灰公司，资本二百八十五万元，日产水泥约二千桶；广州的广东士敏土厂，用款一百四十二万元，设计日产水泥五百桶；湖北大冶的湖北水泥公司，投资一百五十万元，设计日产水泥一千三百桶。

砖瓦工业新设了一批机器制砖厂和大批新式手工制砖场。机器制砖厂可查者约有二十余家，资本一般约一、二万元至四、五万元，个别大厂有十万元以至三十二万元。

玻璃制造业有六、七十家。其中江苏宿迁的耀徐玻璃公司、武昌的耀华玻璃公司、北京的京师玻璃公司、山东博山的博山玻璃公司和重庆的盛源记等，能造平板玻璃。耀徐、耀华、京师、博山四厂各有资本或投资五十余万元至八十余万元，规模最大。其余各厂则只造煤油灯及灯罩、玻璃杯等各种器皿，除少数工厂有资本数万元至四十万元以外，一般规模都很小，分散在南北各省。

陶瓷工业则在各著名陶瓷产地出现了十来家参用机器或新式机具、改良旧式手工生产的瓷业公司。资本大者二十余万元，小者一、二万元，合共约九十万元左右。

此外，在一些大城市设有机器锯木工厂。

出版印刷业约有一、二百家。其中铅印书籍印刷业约六十余家，石印约数十家，新闻报纸印刷业约数十家。商务印书馆规模最大，有资本一百万元，几乎垄断了教科书的供应。惜其股份的三分之一为日人所有。同它相对抗的有中国图书公司（资本一百万元）、集成图书公司（资本六十万元）、文明书局（资本二十万元）等，也各有一定规模。铅印书籍印刷业约近一半集中于上海，其余分散设于各通商口岸及北京和各省省会。

有些地方设立了一些仿制新式教育用品和其它杂项物品的工厂。

水电工业也是主要在这时期兴起的行业。已建成和正在兴建中的发电厂和水、电兼营企业有三十七家，资本共约一千一百余万元，发电容量约一万四千余千瓦。除了西北地区、贵州及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各省省会或主要城市都有发电厂。这些电厂大部分还只能供应照明，个别大厂已开始供应电力。另外上海、南京、北京、广州、汕头等处各设有单独经营的自来水工厂，资本共七百四十五万元。

机器修造翻砂工业可查者，大小合计，全国已有约一百五十家左右，估计资本约四百三十余万元。江南船坞已从江南制造局中分出，改为商坞，单独经营一般轮船修造业务，到一九一一年，累计资金已达二百万元以上。其余拥有资本十万元以上的机器修造厂有上海的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汉口的扬子机器制造公司、香港的广协隆公司、天津的北洋劝业铁工厂、大连的顺兴铁工厂等五家，资本共约一百五十余万元；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者约二十余家，资本约共六十万元。该业大部分规模都很狭小，多数尚属于手工生产。然而由于各种工矿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这种机器修造工业已开始摆脱十九世纪单纯修造小轮船和为外国在华工厂修理加工的局面，进而仿造进口的各种机器，如轧花车、弹花车、铁木织布机、针织机、缫丝机、碾米机、榨油机、印刷机、蒸汽引擎、内燃机，以及钢桥、铁路客货车和各种机件等。有的工厂已经逐渐专业化，开始形成专造某种或某几种机器的专业。在轮船修造方面，除了江南船坞能造数千吨级的轮船以外，求新、扬子、广协隆各厂都能制造数百吨级的轮船。各种修理技术也有所提高。实际上这时期的机器修造业已开始能为各种近代工矿交通运输业提供技术不太复杂的各类设备了。

一些专业的金属加工业也出现了。著名的如一九〇七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的湖北铁钉厂，

有资本三十万元，日产铁钉一百桶（合一万磅）。

矿业方面以向各种机器工业提供燃料的煤矿工业发展最快。一九一一年全年共有使用机器的煤矿三十六家，资本约一千五百万元。其中的萍乡煤矿（投资约二千万元，未计算在总数内）、滦州煤矿、中兴煤矿、保晋煤矿、六河沟煤矿，都已能年产十余万吨至数十万吨。至于常年开采的人力、畜力煤矿、亦不下一、二百家。锑矿的采冶始于十九世纪末，其发展则在这个时期。一九一一年有冶炼厂十二家，资本约二百万元。只是采矿仍然完全依靠人力，仅在湖南省即有一百一十余家。锡矿的新式采炼则完全在这时期兴起，计有七家，资本约二百六十万元。铅锌银矿已改为采炼铅锌为主，有十一家，资本约二百万元。铜矿采冶业新建了五家，资本约一百五十万元。金矿也有新建，但多沿用旧法，采用新法者少。钢铁冶炼和铁矿开采业仍以汉阳铁厂、大冶铁矿为主，一九〇八年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有资本一千三百八十万元，备有一百吨高炉二座，二百五十吨高炉一座，三十吨平炉六座，大冶铁矿日产铁矿石一千八百吨，萍乡煤矿日产煤二千四百吨，实际耗资约共五千七百余万元。此外，新设有三家铁矿公司，资本约共六十万元。合计以上各种新式采矿冶炼工业，以企业计算，一九一一年约共有八十家，资本三千八百余万元。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这时期尤其突出，特别是大批商办铁路公司的创办，更是这时期独有的现象。自从一九〇三年收回利权运动兴起以后，到一九〇七年，以省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干线铁路总公司和支路总公司，共有十六起，预筹股本一亿九千二百六十六万元。到一九一一年，实收六千六百五十二万元。其中川路公司实收一千八百六十万元，粤路公司实收一千九百七十二万元，浙路公司实收九百二十五万元，湘路公司实收六百五十二万元，数目都不算小。加上单独兴建的潮汕铁路和新宁铁路股本，全国商办铁路公司共有实收股本七千二百八十二万元。已经动工兴筑的铁路共约一千公里，到一九一一年建成六百三十八公里。加上京绥路的丰台至阳高段、萍株路和广三路，共计由华资掌握的已成铁路有一千一百二十八公里。①

华商轮船航运的解禁，虽然始自一八九八年英国逼迫清政府对外国开放全国内港，但华商能够按照一定法律规定比较自由地经营轮船事业，则在一九〇三年设立商部和颁布商律、公司注册章程以后。从此，才有经营较大轮船的华商企业出现。象著名的大达轮埠公司、同记轮船公司、中国商业轮船公司、川江轮船公司、宁绍商轮公司、西江航业公司、肇兴轮船公司、图长航业公司、北海轮船公司及政记轮船公司等，都在这个时期以华商名义创办或由洋商名义改作华商注册。除了川江、图长二公司是官商合办，曾经借助官力以外，其余皆无官方凭靠，而由华商自行经营，所用轮船自数百吨以至二、三千吨。这是前此所没有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截至一九一一年，包括十九世纪创办而仍在经营的轮船企业在内，不论悬挂何国旗帜，也不论为公司、商号或个人所经营，所有全国大小华资轮船企业约近六百家，资本二千一百万元，大小轮船近一千一百只，合计约十四万余吨。其中使用百吨以上轮船、轮船总吨数在五百吨以上的大中型轮船企业有三十五家，资本一千三百八十余万元，轮船一百一十四只，合计十一万八、九千吨。其中，两家万吨以上的大型轮船企业属于官僚资本，一家附属于官僚资本企业，一家为官办企业，合计资本约七百万元，拥有轮船五十七只，约近七万吨。其余皆属

① 见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一一四九——一一五〇、一二五三——一二五四、一二四五——一二四八、一〇〇八——一〇〇九、一〇五五页，另据《交通史路政编》及其它资料补正。

华商经营或以华商为主。至于小型轮船企业，更是遍布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河流与沿海各内港。北方松花江及海河也开始有小轮船航行。凡是自然条件允许自由通航轮船的河流和内港，这时期大部分已有轮船航行。

此外，有一家往来于张家口和库伦间的蒙古汽车公司设立，资本十万元。还有一些城市开设了电话公司。

在近代金融业方面，第一家银行在一八九六年创办，但银行业的开始发展，则在二十世纪初期。自从一九〇三年天津创办官商合办的志成银行，一九〇四年北京创办户部银行，一九〇五年上海创办信成银行，先后共建立了二十五家官、商银行，除去中途停闭者，到一九一一年，包括一八九六年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尚存二十四家官、商银行。其中属于官僚资本者十二家，资本三千一百八十余万元；属于民族资本者亦有十二家，资本七百五六十万元。另外还有所谓仿照银行通例设立的各省官、商银钱局二十四家，资本约六百万元。其中各省官银钱局二十一家，资本约五百四、五十万元，主要职能在于发行银钱钞票。

水火灾害及人寿保险公司设立了二十余家，查知资本数者十余家，其中十二家实收资本七百三十万元。

中国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经过二十世纪初期十年间旧有行业的巨大增长，新行业的不断出现与兴起，及各种实业在地域分布上的逐渐推广，获得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初步发展。

三

以上所据以表述中国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初期比较全面的初步发展概况的是，各种近代工、矿、交通运输和金融企业的出现与增多。这些近代企业具有和封建社会各项事业不同的下列全部或数种特点。这就是：第一，使用机器或新式改良机具；第二，采用新式组织方式，如工厂制生产、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等等；第三，自由经营各项新产品或改良旧产品，或其它资本主义合法新业务；第四，资本家和工人、职员间基本上处于自由雇佣关系，资本家可以自由雇佣工人、职员，工人和职员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

综合上述各种近代企业的增长，这时期中国资本主义比较全面的初步发展，具有以下一些重要特点。

第一，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在数量上迅速增长。根据各种资料粗略估计，一九一一年全国约有各种华资近代企业二千三、四百个，资本约在三亿一、二千万元左右。这比之一九〇〇年华资掌握的约五百七十家近代企业，资本合计约六千九百余万元，约当四倍半，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四至十五。增长速度已算很高。如果再把这时期所达到的一些重要指标，同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个比较，便可看出，机器棉纺纱锭数约与德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相当；机器煤矿年产煤量达到约一百三十万吨至一百五十万吨，大致相当于美国在一八三四——一八三五年间、法国在一八二四——一八二五年间、德国在一八三〇年的水平；机器炼铁炉生产的生铁达十二万吨，相当于英国在一七九二年、美国在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年间、法国在一八二二年、德国在一八三〇年的水平；华资掌握的已成铁路里数，约与美国在一八三四年、英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法国、德国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相当；轮船总吨数约与美国在一八三六年、英国在一八四一年相当。① 这就是说，当时中国资本主

① 各国情况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

义发展的水平，大致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相等。这自然是落后了八、九十年到一百一、二十年，但就中国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速度和已达到的水平来说，却开始显示出它已成为能够自身存在和生长的社会经济力量。

第二，中国资本主义已向全国广大地域扩展。这时期新增设的近代企业，有的行业仍然集中于上海及其附近的江浙地区和广州等处，但较多的行业已逐渐向广大内地以至东北、西南、西北等地区伸展。除了青海地区尚未设有近代企业，外蒙古、西藏地区只有个别近代企业以外，其余省区无不或多或少地有近代企业出现和兴起。尤以织布工场手工业、火柴工业分布为最广，遍及大部分省区。其余针织工业、榨油工业、肥皂工业、玻璃工业、印刷工业、矿业、电灯工业、轮船航运、铁路、新式金融业等，也都展布于十多个省区。缫丝工业和面粉工业则是兼跨数省的大行业。尽管各地区、各行业之间的发展仍不平衡，但已使中国资本主义开始摆脱局促于沿海、沿江丁字形线条地带各个通商口岸孤点的狭窄地域，逐渐向全国伸展开来，成为全国性的新兴经济成分。

第三，中国资本主义开始摆脱托庇于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的依附地位，逐步变为以华商自主经营为主的独立的经济成分。在十九世纪限制华商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禁令尚未解除之时，托庇于外国侵略势力者，或挂洋旗、或在租界设厂，实皆寄人篱下，冒名洋商，所经营者也多系便利外国侵略势力的企业。其托庇于特殊封建势力之下者，或以官督商办的名义纳入洋务活动的轨道，或将所有权归于他人（如广东的缫丝厂皆归各族祠堂所有，由资本家长期纳租经营）。总之，都没有独立存在的能力，而需仰俯依人。自从商部设立，颁布了商律和公司注册章程以后，华商创办近代企业既然有法可循，自然无须仰靠大官僚势力的特别准许和奏请。而长达数年之久的收回利权运动和多次抵制外货的斗争，更以振兴民族实业、华商自主兴办相号召。许多公司创办时以在章程中标示华商商办来显示民族气概和尊荣，章程公开规定只收中国人股份、不收外国人股份，也不准将股票卖与外国人。还有不少官商合股的企业申明，不作官商合办，所有官股一切按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办理，和商股同样享受权利与承担责任。而一家公司的兴办，能在短时间招收数十万、上百万、数百万、以至千万元以上的实收股金，尤其显示了华商自办实业的热潮和号召能力。所以，这时期虽然仍有一些企业以洋商名义悬挂洋旗，或托庇于租界，或仍冠以官督商办的名目，但就大部分企业而言，已是以华商商办的方式遍设于广大省区了。华商商办企业终于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经营方式和主体，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成长为中国社会经济中独立的经济成分。

第四，中国资本主义各个行业的普遍增长和大批新行业的不断出现与兴起，逐渐改变着它与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关系，开始起着推动社会经济前进的作用。

当中国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最初出现时，因为需要托庇于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特殊封建势力的缘故，只能一方面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副产物和附属物，服务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活动，另一方面则在洋务派的控制下，服从和局限于推行洋务活动的需要。这既使它处于附庸地位，自然也使它难同国民经济生活发生直接作用。八、九十年代虽然在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就地吸取原料、销售产品的近代工业，但企业数目既少，在行业上也残缺孤单，不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显现重要作用。它们当时只是刚刚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扎根。经过二十世纪初的比较全面的初步发展，情势显著改变，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在多方面推动社会经济前进。

以棉纺织工业为例。在十九世纪，中国只有刚出现的大机器棉纺织工厂，主要从事纺纱，个别兼营织布。同它并存的则是日趋解体或参用洋纱但仍以耕织结合为方式的农村家庭手织业。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事业，自然无法构成配套的关系。毋宁说前者只是起着和进口洋纱布同样的作用，对后者进行破坏，俘虏产品销售和原料供应的对象，从未使后者一同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二十世纪初期，三百余家近代棉织工业的兴起，和上千家官办工艺厂织布科的普遍设立，则因为能够大量和集中地消受大机器棉纺织厂产出的棉纱，不但使纺纱、织布开始在同一的资本主义方式下进行生产，构成配套的关系，反过来保证和促进大机器棉纺织厂的生产与发展，而且能够对农村家庭手织业直接进行资本主义的改造，将其引入工场手工业的范围之内。象直隶高阳、宝坻等处出现的农村家庭手织业向手工染织工场领纱织布、领取工资，和上海附近地区农民向针织工场领纱织袜、织造毛巾等情形，就是这种资本主义的改造。这已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家庭劳动。从此开始形成一种以大机器棉纺织厂为中心，以工场手工业为中间环节，直接渗进农村的资本主义近代棉纺织业生产体系的雏形。

其它火柴、卷烟、印刷等行业大量使用家庭劳动的形式，没有棉纺织业那样复杂，但也遍及于各地。其起始虽或在十九世纪，却在二十世纪初期因近代工业的巨大增长而显著扩大和发展。

再就大部分行业的兴起和发展来说，其多数已经不再是为了外国资本主义从中国掠夺原料的需要，也不再是为了适应封建官僚某种政治活动的特殊需要，而是在振兴民族实业的热潮中，为谋求国家经济的独立，采用就地吸收原料或进口部分原料、就地仿造、就地销售的方式兴办起来的。这就密切了中国资本主义同本国国民经济生活的联系，使其真正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同时也开始改变着本国农产品原料和工业半成品材料的销售路线，由过去的单纯供应出口，开始转向在国内加工。各种纺织工业、面粉工业、水泥工业等的出现和发展，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着这种作用。而更多的行业则从各方面供应和丰富着本国人民在生产与生活上的需要，开始改变过去完全仰赖进口货物和外国在华工厂产品的现象。这又使中国的近代社会经济走向独立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成长为一个具有自我生长能力、并能推动社会经济前进的全国性的独立经济成分。这为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基础与经济力量。

然而中国资本主义从它产生的最初时期起，就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控制、压迫与束缚，生长极为困难。而当它获得初步发展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普遍建立垄断已成了时代的基本特征。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以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为主，转为大量输入资本，在中国建立各种垄断性的企业，及掠夺大批利权，在中国社会经济的许多领域造成垄断势力，以更大的力量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比如在工矿业方面，外国在华八家纱厂有纱锭三十万余枚，约当华资二十三家纱厂纺锭总数的五分之三，每年所产的棉纱，加上进口的洋纱，合占中国机制棉纱市场的十分之七。丝厂的产品销售自始即为洋商所操纵。新兴的榨油业的产品销售也主要为外商所控制。英美烟草公司一家的资本即有五百五十万元，等于这时期所有新设的华资卷烟厂资本总数的三倍多。日本东亚烟草公司的资本一百万元，也等于华资烟厂资本总数的十分之六。外资电厂三

十三家，发电容量近三万千瓦，超过华资电厂一倍多，控制了上海、香港、大连、天津、抚顺、哈尔滨、营口、长春、青岛、澳门等一、二十个大中小城市的电灯、电力供应。外资机器修造厂二十七家，资本一千五百万元、比华厂资本多二倍多。其中耶松、瑞镕、万隆、香港黄埔、太古五家合计即占一千三、四百万元，垄断了大中型轮船的修造业务。外资占据了开平、福公司、抚顺、本溪湖、山东华德、井陉、临城等大小一、二十家煤矿。仅此七家即共投资五千余万元，年产煤四百三十余万吨，约当华资全部机器煤矿产量的三倍多。开平、抚顺二矿更是中国仅有的年产超过百万吨的大煤矿。中国唯一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则通过贷款被日人所控制。其它许多华资企业也因贷款和其他资金关系为外商所操纵。大部分华资近代工业的产品，无论量或值，都远远不能同进口货相比较。所以国内近代工业产品的市场仍为外国侵略势力所掌握。

在交通运输业方面，外国侵略者通过强占自筑和借款代筑，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已成铁路六，六七三公里，约为华资所有已成铁路的六倍。此外还强占有更多的铁路兴筑权。江海和远洋航运早已被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从一八九八年起，内港航运也被迫全部向外国船只开放。到一九一一年，外国有十余个国家的七十家公司在中国国内和远洋航线上往来，共有轮船八百余只，合约二百五十万吨左右。其中专在中国内河和沿海航行的轮船有四百只，约计四十万吨，航行远洋的轮船四百余只，约二百余万吨。不少轮船公司，如英国的大英轮船公司、蓝烟囱航线，日本的日本邮船公司，德国的北德意志公司、亨宝公司，法国的法国邮船公司等，都是国际上著名的大垄断企业。主要在中国国内航行的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一家即有六十余只轮船，共约十三万吨，比华资全部大中型轮船企业所拥有的轮船吨数还多。它同怡和轮船公司（亦有四十余只轮船，约九万余吨）一起，仍然垄断着中国的江海航运。在长江还有日资日清汽船公司加入争夺。俄国的轮船公司则非法独占着黑龙江的航运。

在金融业方面，外国银行通过对中国钱庄发放拆息借款，发行纸币，早已逐步操纵着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市场。到这个时期，这种拆息借款在上海已从数百万两增加到一千数百万两，在天津、汉口等处亦各有数百万两。由于这种拆息借款随时皆可收回；数额又大，随时皆可用以掀起金融风潮，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命脉。他们对清政府的贷款也日益增长，成为掠夺中国主权的重要手段。特别是镇压义和团运动以后，又以所谓庚子赔款借款的名义，掌握了海关和部分常关税收款项的存拨大权，进而直接控制中国的财政。这些银行及各国银行，互相结成国家财团和国际银行团，在中国形成庞大的国际金融财政垄断势力，扮演了代表国际垄断势力共同统治中国的角色。

总之，到二十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已在中国造成了多方面的垄断势力。不仅约近二十亿元的企业投资①，以数倍资力的绝对优势对中国近代企业形成压力，大量的进口货物与在华外资工厂产品霸占着中国的市场，窒滞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而且通过庞大的企业投资和约十一亿元的政府贷款②，把旧式金融资本和早期官僚资本完全俘虏过去，变成它们垄断中国经济的助手和工具。所以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到这时已从原来还有某种刺激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作用，进而完全成了只能障碍中国资本主义生长的桎梏。

---

①② 据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九年版，第五〇、九〇、九一页，以一九一四年与一九〇三年两数之差的每年平均数合算作出。折合通用银元数比例，据一九一一年海关报告：1美元＝1.39海关两，1海关两＝1.52元。

同时，清政府虽然被迫解除了华商兴办近代企业的禁令，但是整个封建制度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仍然严重障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清政府已经完全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断出卖利权，更成为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阻力。

以上种种情势，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过程必然是艰难、坎坷的。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中国资本主义在有了几年明显的生长之后，从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间起，便逐渐趋于萧条。特别是到一九一〇年，由于英国商人利用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的保护，骗设橡胶公司，诱拐华商大批资金卷逃之后，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爆发前所未有的名曰橡胶风潮的巨大金融危机。外国在华银行借机煽风助浪，勒收拆息借款，拒收钱庄票据，清政府也严厉指索放出的官款，遂致危机愈演愈烈，不可收拾。各地大批著名钱庄、商号纷纷倒闭。牵累所及，不仅大小商号停业者不可数计，许多已设和正在设立的近代企业，也因此或者停业倒闭、中途停顿，或者改组易手，有的且参进外资，以至归洋商所有。此外，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为名，重新大肆出卖利权。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遂猛遭挫折，迅速陷于困境。

事实再次充分证明，中国资本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的强大垄断势力的压迫下，在已经完全堕落成为帝国主义工具的清政府腐败统治下，是不可能得到顺利生长的机会的。这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形势陡然高涨，终致爆发辛亥革命的首要原因和物质力量。

（原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北洋政府农商部注册各工商企业分年统计表

年份 类别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6月止	总数	备注
棉、丝纺织染	2	1	10	9	11	14	13	4	21	17	102	
面粉		4	8	9	10	6	4	5	6	7	59	
电业		2	8	8	9	13	11	13	14	5	83	另有53个电灯公司在交通部立案，农商部未注册。
矿业		2		3	5	2	4	9	10	5	40	
火柴	1	5	14	6	5	3	3	5	9	5	59	
印刷 文具	1		5	3	1		1	1	2	2	16	
铁工 机械	1		4	2	1			2	2		12	
建筑 砖瓦				1	1	1		3	3	1	10	
石灰 水泥			1							1	2	
玻璃				1	1				2		4	
造纸	1			1		1		1	2	1	7	
蜡烛 肥皂	1	1		3	2	3		4	5		19	
石棉		1			1						2	
制革			2	1			1			1	5	
制碱					1			1	1		3	
化工						1		2	1	1	5	
制漆									2	1	3	
染料							1		3		4	
樟脑								2	1		3	
硝酸 漂白粉							2				2	
麻袋			1								1	
罐头食品		1	3	1	1	2	1		1	1	11	
碾米					1	1	1	1		2	6	
榨油			1	1	3			3		1	9	
卷烟				4		2	1	2			9	
酿酒		1	1						3		5	
制糖					1						1	
炼精盐				1					1	1	3	
制蛋粉						1		2			3	
豆制酱品				1					1		2	

续 表

类别 \ 年份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6月止	总数	备 注
制 冰								1	1		2	
制 茶				1			1				2	
制 帽				1			1				2	
搪 磁								1	1		2	
交 通	3	6	17	9	7	9	12	6	3	3	75	
医 药				2	3	2	1	1	3		12	
自来水					2		1		1		4	
钟 表								1			1	
缝纫服装			1		1				1		3	
制 旗									1		1	
制 伞								1			1	
眼 镜			1	1					1		3	
藤轿车舆			1	3	3		2			1	10	
银 行				1	3	3	6	5	8	4	30	
实业 信托			1	5	6		5	3	7	2	29	
保 险	2		3		2	2	1		3		13	
房 产				1	2			2	1		6	
仓库 堆栈					1		1		2		4	
农田水利				2	2	1	1	2	1		9	
木 材			1	4	2	1	1	2	1	1	13	
垦殖 畜牧	1	1	3	7	3	5	1	7	11	6	45	
养 蜂				2			1				3	
渔 业	1			1	1	2		2	2	1	10	
旅馆 饭店									2		2	
典 当				1	1						2	
蚕 桑								2			2	
运销花纱布杂货			3	4	1			6	2		16	
织 包								2			2	
总 数	14	25	89	102	95	75	78	104	142	70	794	

① 本表资料选自北洋政府农商部档案与《农商公报》第四卷五册，第五卷十册、十一册、十二册，第六卷十二册，第七卷一册、三册，第八卷三册、四册、五册。

② 本表所列时间，一律按农商部注册日期。

③ 本表所列工商企业，在第一次注册后，因增资改组，续报注册者，不再统计。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北洋政府农商部注册各工商企业数与资本额分期比较表

类别	欧战前（1912年—1914年7月）公司	资本	欧战期间（1914年8月—1918年）公司	资本	欧战后（1919年—1921年6月）公司	资本	总数 公司	资本
棉、丝纺织染	10	3,215,000元	50	25,231,120元	42	31,449,560元	102	59,895,680元
面粉	9	654,250元	32	3,886,360元	18	8,325,000元	59	12,865,610元
电业	6	1,068,600元	45	8,392,850元	32	3,502,000元	83	12,963,450元
矿业	2	700,000元	14	5,373,885元	24	16,502,000元	40	22,575,885元
火柴	16	630,200元	24	3,438,500元	19	2,562,550元	59	6,631,250元
印刷文具	4	3,110,000元	8	170,000元	4	2,248,500元	16	5,528,500元
铁工机械	4	102,00元	4	1,477,350元	4	432,520元	12	2,011,870元
建筑砖瓦			3	723,000元	7	897,400元	10	1,620,400元
石灰水泥	1	5,000元			1	1,200,000元	2	1,205,000元
玻璃			2	274.000元	2	124,000元	4	398,000元
造纸	1	8,220元	2	386,600元	4	6,516,000元	7	6,910,820元
蜡烛肥皂	2	20,000元	8	185,900元	9	1,321,670元	19	1,527,570元
石棉	1	37,000元	1	30,000元			2	67,000元
制革	1	30,000元	3	1,032,000元	1	5,000,000元	5	6,062,000元
制碱			1	200,000元	2	402,000元	3	602,000元
化工			1	200,000元	4	1,605,000元	5	1,805,000元
制漆					3	228,500元	3	228,500元
染料			1	10,000元	3	120,000元	4	130,000元
樟脑					3	10,300元	3	10,300元
硝酸漂白粉			2	7,000元			2	7,000元
麻袋	1	300,000元					1	300,000元
罐头食品	4	335,000元	5	350,090元	2	120,000元	11	805,090元
碾米			3	294,700元	3	80,000元	6	374,700元

续表

类别 \ 数目 \ 年代	欧战前 (1912年—1914年7月)		欧战期间 (1914年8月—1918年)		欧战后 (1919年—1921年6月)		总数	
	公司	资本	公司	资本	公司	资本	公司	资本
榨油	1	100,000元	4	440,100元	4	1,020,000元	9	1,560,100元
卷烟			6	6,106,000元	3	13,660,000元	9	19,766,000元
酿酒	2	2,110,000元			3	360,000元	5	2,470,000元
制糖			1	200,000元			1	200,000元
炼精盐			1	50,000元	2	1,000,000元	3	1,050,000元
制蛋粉			1	80,000元	2	160,000元	3	240,000元
豆制酱品			1	50,000元	1	10,000元	2	60,000元
制冰					2	28,000元	2	28,000元
制茶			2	307,000元			2	307,000元
制帽			2	50,000元			2	50,000元
搪磁					2	100,000元	2	100,000元
交通	20	2,569,100元	42	6,904,530元	13	20,616,140元	75	30,089,770元
医药			8	557,800元	4	260,000元	12	817,800元
自来水			2	1,645,000元	2	1,503,000元	4	3,148,000元
钟表					1	50,000元	1	50,000元
缝纫服装	1	40,000元	1	3,000元	1	10,000元	3	53,000元
制旗					1	5,000元	1	5,000元
制伞					1	30,000元	1	30,000元
眼镜	1	100,000元	1	22,000元	1	2,000元	3	124,000元
藤轿车舆			9	26,499元	1	10,000元	10	36,499元
银行			13	21,375,700元	17	15,051,000元	30	36,426,700元
实业信托	1	5,000,000元	16	13,445,100元	12	15,100,000元	29	38,545,100元
保险	3	4,110,000元	7	5,870,000元	3	8,335,800元	13	18,315,800元
房产			3	85,000元	3	900,000元	6	985,000元
仓库堆栈			2	200,000元	2	650,000元	4	850,000元
农田水利			6	851,560元	3	189,000元	9	1,040,560元
木材			9	1,299,430元	4	6,383,735元	13	7,683,165元
垦殖畜牧	4	166,600元	17	1,348,540元	24	7,114,351元	45	8,629,491元

续 表

类别 \ 数目 \ 年代	欧战前（1912年—1914年7月）		欧战期间（1914年8月—1918年）		欧战后（1919年—1921年6月）		总数	
	公司	资本	公司	资本	公司	资本	公司	资本
养蜂			3	6,400元			3	6,400元
渔业	1	100,000元	4	3,300元	5	1,150,000元	10	1,253,300元
旅馆饭店					2	530,000元	2	530,000元
典当			2	600,000元			2	600,000元
蚕桑					2	7,000元	2	7,000元
经销花纱杂货	3	36,000元	5	127,850元	8	2,080,000元	16	2,243,850元
织包					2	缺	2	缺
总数	99	24,546,970元	377	118,318,164元	318	178,962,026元	794	321,827,160元

① 本表资料选自北洋政府农商部档案与《农商公报》第四卷五册，第五卷十册、十一册、十二册，第六卷十二册，第七卷一册、三册，第八卷三册、四册、五册。

② 本表所到时间，一律按农商部注册日期。

③ 民国五年、六年原缺资本数者，计：纺织业九家，面粉、火柴各四家，矿业、交通、农田水利、实业信托各三家，渔业、织包各二家，电业、玻璃、肥皂、卷烟、银行、木材、染料、碾米、保险各一家，垦殖畜牧七家，共四十九家。

④ 资本凡以银两为单位者，悉按《上海钱庄史料》1912年—1921年6月洋厘银拆平均数七钱三分折合银元一元，以铜钱、铜元为单位者，亦按当地当时换兑价格折成银元。

⑤ 工商企业资本数包括第一次注册后增加数。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北洋政府财政部检送欧战期间中央及各省订借日款详表函稿

（一九一九年三月五日）

致外交部函　八年财字第四百九十九号

迳复者：准贵部函开：准本部陆总长自巴黎电称：外报载欧战期内中国借日款二万七千余万，确否？究竟已用若干，未收到者若干，某项借款以某项为抵押，请详细开一清单电复。等因。函请查照从速开单函复等因到部。查欧战期内，中国所借日本债款，就本部有案可稽者：由中央订借之款三十起，计日金二万一千六百九十八万七千一百六十四元十五钱、规元二十八万两、银元三十六万二千五百元。各省订借之款二十五起，计日金二千八百四十万元、银元二百万元、小洋四百十万元、港币四十万元。兹特分开详表二份，所有债款名称、债额、用途以及订借年月、担保品各项，均经详细填列，其有已经还清及已付过一部分各款，亦均依据最近报告，分别说明。相应检同原表二份，函送贵部查照办理可也。此致

外交部

附欧战期内中央及各省订借日本债款详表二份

欧战期内中央订借日本债款详表

债权者	债款名称	债　额	订借年月	担保品	用途说明
正金银行	教育部借款	日金10万元	民国5年4月	无	此款系作接济留日学生经费之用
三菱公司	外交部借款	日金8万元	民国5年　月	无	此款系拨充使馆经费已还清
兴亚公司	借　款	日金500万元	民国5年9月	无	此款系由本部收用
中日实业公司	财政部造纸厂借款	日金200万元	民国5年11月	造纸厂一切机器房屋	此款系由本部收用
三菱公司	财政部借款	日金100万元	民国6年7月	滦矿公司股票等	此款系拨充天津总司令部饷项已还清
日银团	第一次垫款	日金1,000万元	民国6年9月	国库证券	此款系由本部收用已还500万元
正金银行	水灾借款	规元10万两	民国6年10月	盐税余款	此款系作救济灾区之用原共70万两由七银团承借内有正金银行名下一部分计10万两该款已还清
正金银行	教育部借款	日金10万元	民国6年11月	无	此款系作接济留日学生经费之用

续 表

债权考	债款名称	债　　额	订借年月	担 保 品	用 途 说 明
日银团	水灾借款	日金500万元	民国6年11月	临清、多伦厅、杀虎口三处常关收入年额约90万元	此款系作救济直隶灾区之用
泰平公司	第一次军械欠款	日金17,186,461元92钱	民国6年11月	国库证券	此款系陆军部订购军械延期交价
三菱银行	教育部借款	日金10万元	民国7年1月	无	此款系作接济留日学生经费之用已还清
三井洋行	财政部印刷局借款	日金200万元	民国7年1月	印刷局所有一切财产	此款内有100万元由本部收用其余100万元印刷局偿还旧债
三井洋行	订购棉纱欠款	日金100万元	民国7年1月	国库证券	此系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订购棉纱欠价已还清
日银团	第二次垫款	日金1,000万元	民国7年1月	国库证券	此款系本部收用
正金银行	防疫借款	规元18万两	民国7年1月	盐税余款	此款系拨充防疫经费原共72万两由四银团承借内有正金银行名下一部分计18万两该款业已还清
日银团	电信借款	日金2,000万元	民国7年4月	全国有线电报之一切财产及其收入	此款由本部挪用1,500万元其余500万元由交通部收用
汇业银行	财政部借款	日金50万元	民国7年6月	国库证券	此款系由本部收用已还清
日银团	吉会铁路垫款	日金1,000万元	民国7年6月	国库证券	此款系由本部收用
朝鲜银行	教育部借款	日金15万元	民国7年7月	无	此款系作接济留日学生经费之用
日银团	第三次垫款	日金1,000万元	民国7年7月	国库证券	此款系由本部收用
泰平公司	第二次军械欠款	日金22,420,702元23钱	民国7年7月	国库证券	此系陆军部订购军械延期交价
日银团	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	日金3,000万元	民国7年8月	吉黑两省金矿森林及其收入	此款系由本部收用
朝鲜银行	教育部借款	日金15万元	民国7年9月	无	此款系作接济留日学生经费之用
日银团	济顺高徐二铁路垫款	日金2,000万元	民国7年9月	国库证券	此款系由本部收用
日银团	满蒙四铁路垫款	日金2,000万元	民国7年9月	国库证券	此款系由本部收用

续表

债权者	债款名称	债额	订借年月	担保品	用途说明
日银团	参战借款	日金2,000万元	民国7年9月	国库证券	此款系拨充参战经费先交一部分数目未详
中日实业公司	电话借款	日金1,000万元	民国7年10月	电话产业又国库证券日金500万元	此款系由交通部收用
朝鲜银行	教育部借款	日金20万元	民国7年12月	无	此款系作接济留日学生经费之用
久原洋行	垫款	银元30万元	民国7年12月	无	此款系由本部收用
正金银行	遣送敌侨借款	银元62,500元	民国8年1月	盐税余款	此款系拨充遣送敌侨经费原共50万元由八银团承借内有正金银行名下一部分计62,500元

以上共三十款计　日金216,987,164元15钱　规元28万两　银元362,500元

欧战期内各省订借日本债款详表

省份	债款名称	债额	用途	订借年月	担保品
直隶	朝鲜银行借款	日金100万元	维持金融	民国7年5月	滦矿股息暨滦矿应缴直隶省兴办实业款项直豫京直火车货捐
直隶	朝鲜银行借款	日金150万元	维持金融	民国7年11月	滦矿公司股份10万1千股
奉天	兴业银行借款	小洋160万元（已还清）	补助政费	民国3年9月	省城新民辽阳安东四税局税款
奉天	大仓洋行借款	日金150万元	补助政费	民国3年10月	安东采木公司本溪煤铁公司中股抚顺煤矿税及报效金本溪煤矿税
奉天	兴业银行借款	小洋250万元（已还一部分）	补助政费	民国4年8月	省城辽阳安东新民海龙五税局税款
奉天	朝鲜银行借款	日金100万元	救济官银号	民国5年6月	本省电灯厂电话局全部资产又开埠地之土地全部及设施道路并其他建筑物品
奉天	朝鲜银行借款	日金200万元	救济官银号	民国5年8月	本省契税酒税
吉林	濛江林业借款（日商森恪经理）	日金200万元	筹办濛江森林	民国7年　月	濛江县境内足供采伐之树木

省 份	债款名称	债 额	用 途	订借年月	担 保 品
陕 西	实业借款（大仓洋行经理）	日金300万元	办理铜元局纺纱局	民国7年6月	铜元局纺纱局及该两局所得之红利
山 东	中日实业公司借款	日金150万元（已还清）	调查实业资金	民国6年8月	本省货物税牲畜税屠宰税牙税契纸价及注册费
山 东	中日实业公司借款	日金350万元	偿还旧债余数用充调查实业之资金	民国7年9月	本省货物税牲畜税屠宰税牙税契纸价注册费及财政厅发行之金库证券
湖 北	古河公司借款	银元50万元	铸造铜币购买材料	民国7年1月	本省糖捐及铸造铜币余利
湖 北	正金银行借款	日金50万元 银元50万元	振兴官办事业	民国7年3月	本省竹木捐及茶厘收入全数
江 西	台湾银行借款	日金100万元	补助地方金融	民国7年3月	江西币制公债票150万元
江 西	台湾银行借款	日金50万元	兴修实业水利之补助	民国7年6月	江西币制公债票75万元
江 西	台湾银行借款	日金30万元	补助地方金融	民国7年8月	江西币制公债票60万元
广 东	台湾银行借款	日金80万元（已还清）	偿还旧债	民国3年8月	小押税销磺税
广 东	台湾银行借款	港纸40万元（已还清）	发放欠饷	民国4年7月	小押税销磺税
广 东	台湾银行借款	日金60万元	水灾善后	民国4年12月	本省烟草税牛皮捐屠捐
广 东	台湾银行借款	日金80万元（已还清）	发放欠饷	民国5年12月	旧藩署及广府衙门两处官有土地并建筑物
广 东	台湾银行借款	日金300万元	供给士敏土厂资本并扣还旧债	民国6年3月	士敏土厂全部财产旧藩府两署大沙头东堤海关官地
广 东	台湾银行借款	日金150万元	广东中国银行复业	民国6年4月	广东中国银行所有省库债权内指定大洋150万元并由部准月拨盐款5万元作为付还本息之用
广 东	中华汇业银行借款	日金40万元	军事费用	民国7年5月	民国元年6厘内国公债120万元
福 建	台湾银行借款	银元100万元	军事费用	民国6年12月	无
福 建	中华汇业银行借款	日金200万元	实业资金	民国7年12月	本省契税及屠宰税又其他之杂捐杂税收入

以上共二十五款计 小洋410万元 银元200万元 日金2,840万元 港纸40万元

〔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附〕驻日公使馆关于日本对中国担保不确实借款报告书[1]

（一九二五年）

日本对中国之担保不确实借款共计二亿六千万元。大藏省调查中国之担保不确实内外债总计约十亿元。日本占担保不确实借款总额之四成强。

据最近大藏省之调查，中国之担保不确实内外债约有九亿元，再加遗漏未查得者约一亿元，总计约达十亿元之数。其中外债约占六成，而日本之对华借款中担保不确实，应于此次关税会议中要求整理者总计二亿六千万元，竟占中国担保不确实内外债总额之四成三分三厘强。是列国之对华借款中日本之债权占第一位也。试分别表列于下：

甲、政府所有

一、参战借款（西原借款之内）二千万元

二、交通银行第二次借款（西原借款之内）二千万元

三、兵器借款三千万元

四、九六公债三百万元

小计七千三百万元

乙、民间所有

五、有线电信借款（西原借款之内）二千万元

六、吉会铁道借款前垫（西原借款之内）一千万元

七、满蒙四铁道借款前垫（西原借款之内）二千万元

八、山东二铁道借款前垫（西原借款之内）二千万元

九、吉黑两省林矿借款（西原借款之内）三千万元

十、利息借款（西原借款关系）三千万元

十一、九六公债　二千七百万元

十二、邮电部公债　二千万元

十三、售出品代金等　一千万元

小计一亿八千七百万元

总计二亿六千万元

〔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

[1] 此件系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馆向关税会议所提出之报告。原标题为“驻日本使馆向关税会议报告之十六——《日本对中国之担保不确实借款共计二亿六千万元》”。

上海对各国别贸易状况[①]

陈耀西译

大正六年，上海对外贸易额，输入二亿〔一〕千百〔八〕万五千九百九十两，输出一亿九千七百二〔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五十九两，总额四亿七百四十四万六百四十九两。贸易国中占第一位者为美国，日本占第二位，英国、香港、印度、法国、加拿大、俄国等次之。

大正三年，贸易位置之顺序，为英、日、美。翌四年，则为英、美、日。五年则对于美国因供给军用材料品多，英国输入减退，故英、美之地位颠倒，而为美、英、日。六年则日本跃进，不特夺英国之第二位，且较美国仅差二百万两。七年或超美国而上之，未可知也。

就上海对主要国贸易额而言之：大正六年之计数，比战前大正二年，其增加率最大者，加拿大二十八成，美国九成，日本八成。如左表：

国名	输入	输出	总额
美国	增五·六四成	增一〇·九五成	增 九·〇三成
日本	增五·九八	增 六·九八	增 八·二三
英国	減五·二〇	增 六·五三	減 三·八六
香港	增〇·七一	增 〇·八九	增 〇·七九
印度	減四·七九	增 一·七〇	減 四·〇七
法国	減五·三五	減 二·九〇	減 三·一四
加拿大	增二·六一	增三五·三六	增二八·六六

再将大正六年，各国输出入贸易额，与前年对比表示如左：

上海对各国别贸易额前年比较表

（单位海关两）

大正五年

国别	输入	输出	计
美国	三一，五三五，二二三	六七，八一六，四六四	九九，三五一，六七八
日本	五二，九五四，九四六	三四，二三〇，九〇八	八七，一八五，八五四
英国	六一，四五六，九〇六	二五，七九四，二〇一	八七，二五一，一〇七
香港	二一，〇七七，六七七	一六，〇八三，四七三	三七，一六一，一五〇
英属印度	二五，一〇五，六三九	五，七六二，五九三	三〇，八六八，二三二
法国	一，九八六，〇八五	二六，一九六，三〇四	二八，一八二，三八九
加拿大	一，三六〇，八二〇	一，四四四，八〇四	二，八〇五，六二四
…………			
合计	二〇七，〇三四，七四〇	二一三，九三五，八一〇	四二〇，九七〇，五五〇

① 此件系陈耀西所译《民国六年日本对于上海贸易报告》中之“上海对各国别贸易状况”一节。

大正六年

国别	输入	输出	计
美国	三二，〇八七，六一八	七五，八七一，〇四二	一〇七，九五八，六六〇
日本	七二，七二四，四〇八	三三，一一九，七四七	一〇五，八四四，一五五
英国	四六，七三三，二五二	二〇，七一一，六四一	六七，四四四，八九三
香港	一九，〇八八，一八三	一五，七二三，〇〇七	三四，八一一，一九〇
英属印度	二一，二一八，五六四	五，九七六，七六九	二七，一九五，三三三
法国	一，七一六，六六二	二五，〇六二，五三九	二六，七七九，二〇一
加拿大	六，〇四〇，一三七	二，六六七，四四七	八，七一七，五八四
…………			
合计	二一〇，〇八五，九九〇	一九七，三五四，六五九	四〇七，四四〇，六四九

上海对外贸易之各国大势，如前表所陈。然欲知上海对外贸易总额之各国贸易额之成数，试观左表：

美国	二·六五成
日本	二·六〇成
英国	一·六五成
香港	〇·八五成
英属印度	〇·六七成
法国	〇·六六成
其他	〇·九二成

据右表观之：英国不过一成六分五厘而已，此为其本国之贸易率也。合属地、殖民地等而计之，则为一亿三千九百七万余，占上海对外贸易总额之三成五分九厘。

再就输出入关系观之：输入超过者，为日本、英国、香港、英属印度、加拿大、英属、荷属南洋群岛、非律宾、澳洲、新西兰、瑞典、法属印度支那、挪威、荷兰等。输出超过者，为美国、法国、俄国、意国、土耳其、波斯、埃及、朝鲜、丹马等。比前年输出入额显有增加者，为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属南洋群岛、土耳其、波斯、埃及、非律宾、澳洲、新西兰、丹马等。其显有减少者，为英国、香港、英属印度、法国、俄国、意国、荷属南洋群岛、朝鲜、瑞典、法属印度支那等。以下就主要贸易国，概说上海贸易之状况。

美国 （含檀香山，除非律宾）上海对美贸易总额，逾一亿七百万两，输出占输入一倍以上，比前年输出入皆增加，总额增八百八十一万两，与前年皆占第一位。以此计数，与战前大正二年对比，则输出入中，输出殊见激增，总额约倍加，此因战乱，军需品材料多输出于美国也。上海对美主要贸易之输入品，为煤油、烟卷、未制烟叶、棉花、怕拉芬油等。输出为安质母尼、蛋白、蛋黄、植物油、生丝、山羊毛、羊毛、茶、绢细等。

日本 （含台湾、除朝鲜）上海日本贸易，总额一亿五百八十余万元〔两〕，比前年增加千八百六十五万两。其输入额占上海外国输入额之三成以上。比战前大正二年，则输入九成九分八厘，输出六成八分九厘，总额有八成二分三厘之增加率。前年次于美、英两国而居第三位。大正六年，则不特夺英国而进于第二位，且较诸首位之美国，仅有二百十一万两之差。不两年间，可占第一位，当无容疑。由日本至上海之主要输入品，为绵布类（细洋布、粗洋

布、细织花布、棉法兰绒、棉花布、织花棉布、棉织羽绫等）、砂糖、煤炭、绵织丝、烟卷、木材、火柴，及其他诸杂货。由上海输出之主要者，为棉花、麻、安质母尼、植物种子、铁类、兽皮、杂谷等。

英国 上海对英本国贸易，输入四千六百七十三万两，输出二千七十一万两，总额六千七百四十四万两。比前年输出入，皆甚减退，以前年之第二位，让于日本，而降至第三位。以此大正六年之计数，与战前大正二年分对比，输入纵仅减五成二分，而输出则增加六成五分三厘，总额有三成八分六厘之减退。由英国输入上海之主要者，为绵织物类（细洋布、意大利毛羽绸、威尼司羽缎、羽绫、绵䌷）、烟卷、胰皂及其材料类。主要输出品，为刚毛、生丝、绢䌷、茶等。

香港 上海对香港贸易，比前年输出入皆减少，总额减二百三十五万两。然比战前大正二年，则输入七分一厘，输出八分九厘，总额七分九厘。由香港输入上海之主要者，为皮革、砂糖等。由上海输出者，为植物油、绢织物、茶等。

英属印度 上海对印度贸易，欧洲开战后，渐次衰退。以大正六年输出入总额，比于前年，则减少三万〔百〕六十七万两。然输出则有少许增加。比于战前大正二年，则输出增加一成七分，但输入减四成七分九厘，总额减四成余。英领印度之主要输入品，为绵花、绵丝等。由上海输出之主要者，为生丝、茶等。

法国 上海对法贸易，渐次衰退，比前年输出入皆减退，总额减百四十一万两。比战前大正二年，输出入减五成三分五厘及二成九分，总额减少四成七厘。输入品之主要者，为绢织物、染料、洋酒类。由上海之输出品，为生丝、茶等。

〔北洋政府农商部档案〕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欧战四年间中美商务之比较

屠汝涑①

此篇系译自英文原作登载纽约商报（The New York Commercial）者。该报主笔热心中美间之商务，嘱予为文，以之提倡，故草此以答其盛意。按文内所述各项统计，以及两国间四年未〔来〕贸易之情形，或能有益于我国商界、实业界，足资参考。

著者识

世界各国，因欧战而获商务上之大利者，指不胜屈。其最著者，为日本及美国。是二国者，于实业上既有完全之准备，机会一至，固无患不能攫夺此千载一时之利益。中国之富源及实业，虽尚未发达，亦曾乘此时机，稍增其海外贸易焉。欧战四年中，我国海外贸易总数，增额计达一万一千五百余万两之多，若以之折合美金，其数当更巨也。观下表即可知之。

年份	海关银两	平均汇价	美金
民国7年	1,040,776,113	1.26	1,311,377,902
民国6年	1,012,450,404	1.03	1,042,823,916
民国5年	998,204,361	0.79	788,581,445
民国4年	873,336,883	0.63	541,498,867
民国3年	925,468,011	0.67	620,063,567

查欧战四年间，我国与各国之贸易，其有增进者，只中日及中美间之贸易而已。其与他国者，均见减焉。我国与日本之贸易，居我国海外贸易之首者，历有年所。我国与英国之贸易，向居第二。惟至民国五年，一降而为第三，而使中美之贸易占其位焉。在民国三年（欧战初年），中英间之贸易为数计一万二千七百万两，中美之贸易计八千一百余万两。两载以次，后者竟增至一万二千五百万两之多，而前者减至一万零五百万两。又阅二载(欧战末年)，前者减至七千五百万两，而后者竟增至一万三千五百万两，其差数达六千万两之谱。总计四年间，中美贸易之超过中英贸易之数，在一万万两以上焉。下列之表，计算中日、中美、中英间四年中之贸易，与我国每年海外贸易总数，以百分法比较之，即可知其进退之别矣。

年份	中美	中英	中日
民国7年	13.0%	7.2%	38.9%
民国6年	15.3	7.2	32.3
民国5年	12.6	10.5	37.4
民国4年	11.1	11.8	22.6
民国3年	8.8	13.8	20.7

① 屠汝涑时任驻纽约领事馆主事。

观上表，即可知中日间之贸易，超过中美、中英间者甚巨。惟此不足怪也，日本乘欧战之机会，得地理上之便利，其能占我国海外贸易之魁首者，势所当然也。所奇者，中美间贸易之增进焉。欧战之影响及于中美间之贸易者甚多，如太平洋船只之缺乏，中美间兑汇之奇变，商务上受损，不知凡几。乃中美间贸易之总数，在民国六年反增至一万五千五百万两，较民国三年（欧战初年）增百分之九十三，为中美通商以来所未有。民国七年（欧战末年），中美贸易本极有再增之希望，旋因美国厉行限制进出口货之故，以致较上年减百分之十三也。是四年间，美国钢铁之运往中国者，计大增焉。美国纸烟、烟叶在我国之销路，亦见推广。其中除棉货、油类两项，其出口至中国之数稍见减落外，其余美国货物，颇多在中国发展其市场焉。兹将美国货物运销中国者，择要列表如左，并具欧战初年及末年两年间入口中国之总数，以资比较焉。

货物名称	民国3年	民国7年
纸烟	405,014	银两 11,413,453
棉花	1,188,243	407,616
咖啡	28,686	579,605
电器材料及装置品	134,733	873,545
铁条	33,732	1,217,296
铁钉铁铰	273,424	1,001,576
铁管	31,917	1,849,219
铁片铁板	18,931	1,601,303
钢柱铁条等类	5,314	1,513,207
马口铁片	621,880	1,889,010
棉货	3,245,443	438,590
各种机器	625,918	1,722,261
煤油	19,000,537	10,189,225
滑物油	546,257	1,155,136
纸	158,852	1,223,505
鞋靴	51,400	1,931,771
烟叶	1,314,084	2,741,213
铁路货车及客车	86,279	986,798
汽车	163,290	641,346

我国运销美国之货物，大都为原料及食品。欧战四年间，我国之油类、生丝、羊毛，其运销美国者，均大见增加。蛋粉、生皮、草帽辫之市场，亦颇形发达。惟茶叶则有减无增，是盖近年我国茶叶收成不佳之故也。自民国三年以来，新货物之来自我国者，颇有所闻。甘草一物，在民国四年前，美国市场未闻之也，而在民国七年，其进口数在三十万两以上。中国之植物油，四年前未尝销美国也，而民国七年入美之数竟达二十二万两，观下表即可知其梗概矣。

货物名称	民国3年	民国7年
锑	267,663	银两 964,463
猪鬃	1,370,940	1,571,299
樟脑	43,355	189,915
棉花	1,726,802	1,682,849
蛋白蛋黄	673,866	1,646,116
鸡鸭等毛	29,558	201,188
苎麻	21,472	345,562
他种植物油	0	221,394
生丝	10,711,772	14,598,574
乱丝头	310,098	1,940,411
茧绸	307,226	619,425
生皮	5,227,769	6,258,731
草帽辫	245,882	1,480,987
马鬃	31,568	148,720
肠	58,720	219,870
甘草	0	302,841
五倍子	267,794	546,548
豆油	734,799	23,477,322
棉子油	690,768	1,175,758
桐油	2,216,242	3,013,350
牛油	293	158,507
柏油	256,681	884,978
茶叶	5,918,211	3,234,969
烟叶	32	333,832
骆驼毛	42,614	138,649
羊毛	2,235	4,682,408

就上表观之，四年间牛油自我国来美者增至五百倍，羊毛增至二千倍，烟叶增至一万倍，亦可谓闻所未闻矣。惟以中国之富源观之，凡一种物产之适用于美国者，一旦利用之，便可推广其产值，以供给其要求，不足为怪也。由是言之，中美两国间将来于商务上之发展，可不卜而知矣。自欧洲停战以来，两国间之贸易，业已大见扩张，其扩张之速度，为前昔所未闻。是盖受世界战后特别状况之影响也。有此特别状况，则战后中美间之商务，当较战时为更有希望，而其发展之程度，将为有史以来所未见也。

…………

〔北洋政府农商部《农商公报》1920年第7卷第2册〕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中日实业公司第二次至第六次营业报告书

（一九一四——一九一九年）

中日实业公司第二次营业报告书

（1914年4月1日—1915年3月31日）

本公司自改组迄今，行及一年，所有营业事项，例当为约举之报告。按两国共同营业，必持两国国民之感情和洽水乳，而后可以发达。去岁初夏，涩泽男爵来京，谈论营业方针，磋议数条，归宗于中日两国共同利益，尤为洞见底蕴。不意曾无几时，欧战陡起，将谋东亚和平方法，转以维持扩展公司营业，而日本又有攻击青岛，假道山东之举。近日交涉纷生，影响更钜，中国舆论哗然，若任公司逆水行舟，几无回旋周转之地。然篙橹所得，犹堪列举。如财政部售铜合同、江西鸣山煤矿、安徽大凸山煤矿、裕繁铁矿售砂合同，及江西乌港邻近矿区，是此皆大利所在，他公司所欣慕艳羡而不可得之事。虽手续尚有未尽完全者，苟两国国民之感情得以早日回复，而公司对于以上各项切实经营，无所阻滞，已足征发达之境。兹再分别缕述之。其谈判中止与谈判方始之营业，不赘焉。

中国各造币厂应用铜斤，向由日美两国输入，每年约数计值贰百余万元。近以各厂自购，办法不一，移归财政部经理，本公司遂得于财政部承受此项特权。去年十二月订立合同，双方签字，虽目前暂无购铜之处，而合同二年期限之内，所需必多。倘遇币制改革，为额尤钜，承转获利，亦自不在少数也。

江西鸣山煤矿，日本技师调查报告误为明山。先与他处共请探矿，农商部以区域太广，批令减少，遂由孙董事出名请领四区，部中方准备案。而矿务监督署初为鸣、明之辨，继又查得有谢商大锡请领四千余亩给照在先，拟予驳回。谢商原系森董事所派，代本公司办事，支过旅费，乃擅自为谋，几经磋商，迄少效果。不得已告之于部，部为调停，饬监督署通知本公司，除谢商原领外，余归孙董事具领。现先照部意，为注册领照之预备，而谢商出尔反尔，当由森董事续与交涉。

安徽大凸山煤矿，于上年七月，由本公司请采五千亩。商人顾镍先此禀采四十余亩，监督署批令扩充，农商部因派人会同划分，准顾镍扩充至贰百柒拾亩，余归本公司承领。九月禀请开采。本年一月禀请增区叁千余亩，但顾商不服部饬，上诉至平政院。本公司现奉院命，参加诉讼，延请律师，一再声辨〔辩〕，理由充足，必可达胜利之目的。待讼事解决，当再收买顾商矿业权产，以期统一。

裕繁铁矿公司售砂草约，为森董事与该公司代表霍守华所订。当时铁矿国有之说甚行，合同虽归本公司，几遭驳斥，犹幸裕繁得照在先，免于取消。增区一层，则已无望。中经多少波折，合同方得承认。而安徽绅士反对陡起，声言专拍霍商，决不侵害本公司之利益，本公司自不能不稍作观望，以期于我无伤。森董事因手订原约，迳付定砂银贰拾万元，此举系

履行条约，或尚不至为所借口。

江西乌港官矿，煤质最佳，前闻有招商承揽之意，而顺济公司谋之至急，本公司虽已落后，仍竭力图之。因该矿一部分本为江西政府所有，不宜正式请领探采。内部、外省商议再四，极费唇舌，始经农商部定出办法，划分六区，官家、本公司与顺济各得二区，尚未见诸公牍。不意中日间交涉日亟，江西绅士遂得以维持官矿，拒绝外款为言，一律反对。本公司素采和平二字为营业之媒介，至此亦难以置辨〔辩〕。

总之，本公司之营业，非寻常贸易之比，其不能咄嗟立办，不待言喻。对于应行之手续，应派之人员，尤宜审择时机，辨别良窳，否则未得其益，先受其害。此当注意者一也。公司既由两国资本家合资设立，任事者自应于营业事项，择其确有把握者，方与商量，不应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一朝蹉跌，损及股本。此当注意者二也。办事须有统系，否则责任不清，或多隔阂之弊，或滋差误之生。本公司营业多在中国，总行设于北京，在华事项一经各方定妥，当然由驻在总行专务董事执行之，事理事势未能或外。此当注意者三也。商业由和平而兴盛，两国共同营业，由两国国民感情融洽而进行，乃能无阻。本公司对于乌港矿务，裕繁合同，苟无外界风潮，逆料不至有反对之举，即反对，亦必有以处之。此为本公司计，而深望夫国民感情之早日回复者又其一也。兹因报告营业，遂并推论及此，尚乞股东诸君公鉴。

中日实业有限公司

中日实业公司第三次营业报告书

（1915年4月1日—1916年3月31日）

第一、业务之概况

自大正四年四月一日至大正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三营业期间内，关于业务上之磋商事件，计共二十八起。其内关于借款者十起，计日金二千四百七十万元、银元九十三万元。关于事业上者十八起，计达日金数千万元以上。自前期以来继续中之各事项，与应进行或有磋商之必要者，简略报告之如左：

一，矿山事业

矿山事业，本期中有应磋商须交涉者计九件。矿之种类，为金、银、铁、满俺、亚铅、石炭各种，业已一一派遣技师实地调查，目下正在诠议之中。其外，如安徽繁昌县之桃冲铁矿，本社曩与矿主双方缔结铁矿贩卖契约，此次业已接到中国政府农部认可之批令。又前期中，本社请愿试掘之江西乐平县之明山炭矿（矿区面积四百余万坪），大正四年十二月已得有试掘许可证书，目下正为试锥机械之准备，试锥之期，当在不远。又安徽怀宁县之炭矿，不久亦可得试掘之许可，渐次可以着手试锥。至其他安徽、江西各地与本社有关系之诸矿山，正施以适当之措置也。

二，电气事业

本期中关于电气事业之借款，磋商交涉之件四起，在日金一千二百五十万元、银元十三

万元以上。客年九月，本社参加中国政府所设之武昌汉口电话局诸般设备之投标（日金百万元），与各国投标者竞争之结果，本社获中，目下正从事于诸般施设中也。

三，其他之事业

除上所述之外，本期中本社磋商以待进行进〔进字衍〕者，为铁道、土木、银行、与其他各种事业。其中关系于借款者六件，日金一千二百二十万元、银元八十万元。关于事业者八件，既经调查者有之，正在调查中者亦有之，目下均在诠考中，尚不能为具体之报告也。

…………

中日实业有限公司

中日实业公司第四次营业报告书

（1916年4月1日—1917年3月31日）

第一、业务之概况

自大正五年四月一日至大正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次营业期间内磋商事件共计四十二起，其金额达金六百余万元、银七千七百余万元，又银二百十万余两以上。关于是等状况，报告如左：

一，矿山事业

关于本期矿山借款商酌事件，共计有五，其他则已派遣技师，从事调查。各省之矿山，以石炭山为最多。又采掘呈请中之安徽怀宁县大凸山炭矿（矿区面积一百六十余万坪），于大正五年四月六日，得采掘许可之命令，业已试锥。至大正五年十二月下旬，已达到无烟炭层。目下炭层，计五尺二寸有余。又大正五年十一月中，与奉天省复兴煤矿公司，缔结资金供给之契约。至于河南省豫昌炭矿，业已试锥矣。

本社曩与裕繁公司缔结铁矿卖买条约之桃冲铁山，对于采掘种种事务，正在进行。由桃冲山下至荻港堆货场之距离，约英六哩，其间矿石运搬轻便铁道，虽为裕繁公司所敷设，而其材料，均为本社所供给，业经运送该场。又关于采掘设备，矿石运搬及堆货埠头建设资金，亦由本社所措筹，其金额约七十五万元。

二，电气事业

本期中关于电气事业磋商进行之件，共十四起，其金额为金叁百万余元、银一千四百五十万余元、银六十五万余两。前年九月，本社承办武昌汉口电话局（金额约一百万元）之工事，以次进行，竣工者已达七分。

去年四月，北京电话局扩充工事之投标，本社获中，其材料购入之数，约日金二十二万元。又七月，北京及其他地方电话材料之投标，本社亦告成功，其金额为金四万五千元。

本期内借款契约之成立者，为大正五年八月交通部之第一次借款（金一百万元），与大正五年九月之第二次、第三次借款（各金一百万元）。在契约期限之内，对于中国全国电信、电话材料之供给，我社有优先特权。又河南省彰德电灯公司与江苏省南翔电灯公司，亦有本社供给资金。

三，其他之事业

关于银行、铁道、地方整理借款，及其他之制造事业者，计二十三件，其金额为日金三百万余元、银元六千百余万元、银两壹百五十余万两。

…………

中日实业有限公司

中日实业公司第五次营业报告书

（1917年4月1日—1918年3月31日）

第一、业务概况

一，继续事业

继续事业中，以裕繁运矿铁路之工程最为主要。本营业年度内，对于此项工程之筹划，力祛障碍，而策进行，决计于七年七月间完成一切设备，并于同时开始输售矿砂。此外，安徽省大凸煤矿试锥，已于一、二处所试见煤层。次则武汉电话工程，已于本营业年度内，以最好之成绩而告全部之竣工。次则基于电话借款上之电料承办优先权，对于交通部所需电料，前后六次，均经本公司投标承购，约共计值日金六十万元，均获有相当之经手费。次则上营业年度内，所供给江苏省南翔电灯公司之资金，亦于本营业年度内，斟酌情势，收回本利而解除契约矣。

二，新事业

甲、矿山事业　现于设法取得矿业权，正在着着进行中者，计有三处，均属极有希望，可作为下营业期内之矿山事业。

乙、电气事业　本公司自上年度以来，对于中国电气事业，即经从事注意研究，入本年度后，愈益求其进行，并先从中国中部之各地为入手之调查。就中已成事实者，如湖南省衡州电灯借款，计日金八万元。浙江省嘉善、镇海、嘉兴及平湖各处电灯借款，共计日金二十五万元。湖南省湘潭电灯借款，计日金十五万元。所有一切开办工事，均经本公司代为承办，并推荐技师为指导。此外尚有十数处，亦均正在磋商进行中。由是观之，下期电气营业之发达，将于是乎卜之也。

丙、其他借款及各种事业　本营业年度内之主要借款，为京畿水灾借款，计日金五百万元。又山东省实业借款，计日金一百五十万元。惟前项水灾借款，经交涉结果，系用本公司之名义，以代表银行团者。又直接关于事业上之借款，就中纺织业借款，计日金一百五十万元，而金属精炼业借款，计银五万两。此外，关于自来水、森林、油房、轮船各种事业，亦均正在磋商调查中，将来可望成功者，为数正复不鲜。本公司于本营业年度内，对于投资事业，如东洋制铁公司、东洋盐业公司及中华汇业银行，均附有相当之股额，并下期急待成立之东洋运矿公司，亦拟一并创办经营之。查盐业、运矿两公司，均系经本公司所提倡发起者，计本公司所投入于该两公司之资金，各约占其总资金额之三分之一之数。

…………

中日实业有限公司

中日实业公司第六次营业报告书

（1918年4月1日—1919年3月31日）

第一、业务之报告

一，桃冲铁山及卖矿事业

本社多年对于裕繁公司与以援助，苦心经营之桃冲铁山，迄至本期，关于采矿运矿之诸种设备，业已完成。兹将开始卖矿之各种概况，述之于左：

关于桃冲铁山诸设备，就中ユンドレス〔循环链〕、インクテイン〔倾斜面索车〕及运矿铁道，前者已有本社供给多额之资金，排除障碍，极图工事之进行，至大正七年九月间，铁道建筑已经完竣，十月十五日，已开始运矿矣。

本社关于铁矿石之买卖，与日本各制铁业者交涉之结果，大正七年三月缔结第一次之卖矿契约，其总额为四十五万四千顿。然桃冲附近，自去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大降霖雨，于矿石采掘及铁道运输上，大与以障碍，不能如预定之额数，以供给卖矿各会社，此本社深引为遗憾者。入本年一月以来，俟天气回复，为工事之修复，图设备之完整，现正从事讲求出矿运输力之增加也。

又自荻港至内地各港，为矿石运搬便利起见，本社与东洋制铁株式会社、裕繁公司，共同组织东洋运矿株式会社，自同年十月起，已开始营业矣。

二，矿山及精炼事业

本营业期间内，关于矿山及精炼事业，借款之主要者，为湖南、湖北之石炭及金属矿山二者，计四件，合计日金八十五万元。该同方面关系于本社之事业，今后益形发展。大正七年十一月，设分派所于长沙，且拟新设化学分析所，目下正在准备之中。

又本社对于ユークス（炭）制造，最为适宜，正注意于有名之直隶省井陉炭，与该地正丰、民兴两公司，缔结石炭归日本一手贩卖之契约，并获得同地ユークス制造权。关于制造所之设立，目下正在协议进行中也。

此外，关夫矿山权利之取得，或在极力运动中，或担任借款，或组织合办。已缔有临时契约，及在试掘中者，计共八起，均有成功之希望，而尚未达报告之时期，兹略之。

三，电灯事业

对于中国之电灯事业，本社于数年前，从事调查，复加以研究，前期中即得有相当之成绩。至本期借款之成立者，计八件，金百九万七千元。合前累期计之，共十五件，达金百六十三万九千元以上。现在关于借款正在交涉中者五件，今后本社益图发展，以期中国电灯事业之统一。客年来，与支那兴业株式会社互相商议，于本年一月，以资本金三百万元，创立中华电业株式会社，本社受股份之半额。

四，其他之借款及事业

交通部借款金一千万元，山东省借款金三百五十万元，在本期中为本社经手借款成立之最主要者。两者均为偿还旧债或供新事业之用者，而交通部借款，则更注重于电话扩张之用。本社根据该契约之附带条件，与日本有力制造业者相结合，为电话材料之供给，已与该部为具体之交涉，已达所期之目的矣。

又本社调查研究之结果，正在计划交涉中者，为铁道、水道、森林及铁道材料、铜、硝石、棉花等诸事业，或已结得临时契约，有成功之望者不尠。此下期本社事业之重要者也。

至于投资之方面，以前记中华电业株式会社为最昭。又对于东洋盐业株式会社、东洋运矿株式会社，及在上海兴发荣裕记铁厂，亦有相当之投资，其股款总额达日金五十六万九千七百五十元。

…………

中日实业有限公司

〔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日本强占青岛胶济铁路、二十一条和关于山东问题换文

（一九一四——一九一九年）

日本强占青岛胶济路经过[①]

（1919年）

一、欧战初起，中国即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六日，以大总统命令宣告中立。两星期后，日使通知中国政府称：日本曾于八月十五日以最后通牒递交德国，劝将该国军舰及一切武装船只，立即退出中日两国之领海，并于九月十五日以前，将胶澳租借地全境移交日本，以备日后交还中国。且要求于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正午以前，对于此项劝告，为无条件之承认。按该最后通牒所称，此举之用意，乃在除去远东和局扰乱之根，且为保卫英日同盟之公共利益计。中国政府虽未见商于前，然对于所拟关于胶澳租借地之办法，亦曾表示愿为同袍之意。旋以未见嘉纳，始不坚持。嗣日本以最后通牒未见答复，乃于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向德国宣战。

二、日军首队二万余人，本系派往攻击青岛，不意竟择龙口为登陆之处。龙口处山东北部海滨，南距青岛一百五十英里。日军于九月三日登陆，横穿山东半岛，以达胶州。沿途占据城镇，收管中国邮电机关，征取人工物料，困苦居民，皆视为必要之举。其先锋队于九月十四日始抵该处，而会攻青岛之英军，则于九月二十三日在德国租借地以内之劳山湾登陆。劳山湾距青岛较近，沿途所遇之障碍，自亦较日军前进时为少，故与德军交绥之第一役，犹及与焉。

三、龙口既有日军行动，中国政府为较易保障中立起见，不获已于九月三日宣告，参照日俄战争先例，所有在龙口、莱州及接近胶州湾附近地方，交战国军队行用，本政府不负责任，此外各处，仍严守中立。同日将此项宣告，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见附件四)。是时复与日本政府约定该特别行军区域，系从至胶济铁路之潍县车站以东为限，约距青岛一百英里，日军应遵守界限，不得侵越而西。

四、讵于九月二十六日有日军四百名，突至潍县占据车站，十月三日，复迫中国军队退出铁路附近地方。三日后，即十月六日，又不顾中国政府之抗议（见附件五、六、七、八），进至济南，将车站三处悉行占据。于是胶济全线皆为所占。沿路分驻日军，路员亦渐易日人，铁路附近之矿产，亦于是时均被占据，赓续开采。时围攻青岛之举，方在进行，迨十一月七日，德人以青岛降于英日联军，是月十六日联军入城。次年一月一日，复开港贸易。

① 此件为北洋政府外交部1919年5月1日致司法部函所附之中国全权代表在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说帖（乙）项。本件系印件，附件原未刊。

五、中国政府以德人既以青岛完全投降，战争已毕，交战两方之军事设备业已解除，遂请将山东内地之日军，撤回青岛，并卸除龙口至张店之轻便铁道以及附挂于中国电杆之电线，而日本政府无可理喻。中国政府以昔日不得已而宣告划定特别行军区域之理由，今既不复存在，遂取销当日之宣告。复于一九一五年一月七日，将取销之举照会驻京英日公使（见附件九），旋于一月九日据日使照复（见附件十、十一），谓奉本国训令，此项取销之举，实属独断处置，轻视国际信义，不顾邦交，措置诚有未当。并谓日本政府决不使山东帝国军队之设施行动，受此等取销之影响及拘束。云云。

六、日本占据青岛及胶澳之后，要求自派日本人约四十名，充当海关人员之权。所谓海关乃指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中德青岛设关条约所订设，复经一九〇五年修订者而言，中国政府觉此等提议无可允许，盖一从其请，恐海关组织将因之而纷乱，且在德人管理之日，青岛海关人员，亦全由中国自派也。此事磋议未毕，而日本神尾总司令已奉命将青岛海关之文件财产遽行押收矣。

七、…………

八、日本政府复以一九一七年之第一百七十五号上谕，设民政署于青岛，复设分署于坊子、张店、济南。此三处者，皆沿胶济铁路而在百里环界之外者也。三处中以坊子距青岛为最近，然亦九十英里之谱。坊子民政分署竟有擅理华人词讼，征收华人赋税之举。而胶济铁路与各矿则置诸民政署铁路股管理之下。

九、山东铁路，深入腹地，讵沿路日军，逗留不去，而民政各署之设，在中国人民视之，似有久踞山东之意。山东本中国人民所深爱，于是举国惶恐，而山东为尤甚。政府迫于众议，不得不思所以安人心，以俟战事告终，和会召集，以解决一切关于世界将来和局之问题也。乃与日本开始磋商，一九一八年与日本订立草合同（见附件十七）借款筑铁路二道。此二路者即一自胶济线至徐州连接津浦沪宁铁路，一连接京汉铁路者也。日本政府以此合同之故，乃于同日即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换文中（见附件十八）允将胶济沿路日军除济南留一支队外，余均撤回青岛，并裁撤山东省内之日本民政各署，借款已垫交日金二千万元，惟正合同尚未画押。

〔北洋政府司法部档案〕

京师警察厅关于海军部军官组织中华国民救亡团致内务总长呈

（1914年8月）

总长钧鉴：敬陈者：自政体改革以来，京师地面紧要，凡有通告传单等件，均限令送警察厅检阅盖章后，始准散布，所以防患未然也。乃本月二十八日下午，于外右二、内左一两区地面，查有布散中华国民救亡团传单。单内宗旨谓日人实行其野心，本团同人愿以死对待。其他词语，尤属不经。当将持散传单人带厅讯问。据供称：一为郑独造，名友益，福建人，现充海军部军械司机器科科长，并系中校实官。一为陈灿，福建人，现充海军部科员。承认邀集同志，散布此项传单不讳。当将单内提倡人姓名、职业，一一详加诘问，多系海军部有

职人员。诘其因何布散此项传单，语多激烈，大致与单内词旨略同。查现值人心不靖，正在极力维持地面之时，乃竟有此项传单发现，而发起提倡又多半系海军实任职官，实出人意料之外。倘有无知之徒，闻风附和，诚恐以个人激烈之行为对待外人，致酿成意外之交涉。否则此项传单为外人所闻见，亦难免不贻口实，所关殊为非细。除将郑友益、陈灿先行送回，并饬令不准开会外，理合开具提倡人职业、住址清单，谨呈

总长鉴核

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谨呈

附上传单一纸

八月二十一日大阪朝日新闻登载，日本欲乘欧洲战事之际，逞其吞并中国野心，先以保障中国为词。彼之所谓保障者，即我国受其保护，为其属国也。既为日本属国，即我无国。无国之民，则种种惨辱，不堪设想，朝鲜、安南、印度、南非洲亡国惨史，尽人皆知。设使不幸事成其实，我国若以武力对待，难占优胜。我同胞力量既不足生，死总可自由。为国而死，即死犹生，生为亡国奴，虽生不如死，况惨辱之下，难以为生乎！同一死也，与其苟延残喘，受人鱼肉，何如决然一死，为最后之报酬，尚不失为中国男儿，即相见先烈于九泉之下，亦可以告无憾矣。愿我同胞急起直追，一息尚存，万不容外人欺侮我也。良知未丧当赞同焉。兹拟组织斯团，凡确具有敢死热肠者，请签名决死，提倡人临书洒泪，不胜待命之至！

本团定名　中华国民救亡团。

本团唯一宗旨　设日人实行其野心，本团同人愿以死对待。

本团纯净国民为国热诚发起，毫无牵涉国际政治问题，特此声明。

凡有畏缩与本团宗旨不赞同者，请勿签名。

陈慎藩　邓宗淦　林如澜　高视青　刘莲清　刘肖颖　林葆臣　严伯勋　高又堪　陈洵迈　严家井　郑独造

提倡人

李砥中　刘文卿　蒋安庄　周为桢　赵崇如　林如筹　杨梦熊　严以礼

本月三十日（即星期日），假石大人胡同门牌五十八号一和行会议。凡赞同者，请准早晨九句钟，齐集该处签名，并商一切。

提倡人职业住址清单〔略〕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林志钧等关于调查日军在山东暴行致司法部详

（1914年12月）

详为报告事：窃志钧、敬棠前奉部派前往山东检查日本军队经过地面发生人命各案，当即会同外交部特派委员王鸿年，于本年十月二十六日驰赴该省。因日军经过地方，区域颇广，先从潍县着手调查，由潍而高密、胶县、即墨、平度、黄县、掖县、招远、昌邑、安邱、昌乐、益都、临淄、历城等县。每至一处，均亲自下乡，前赴被害地点，勘视一切，并传集案中人证，详加询问。其未经报案得自风闻者，亦皆详细访查，务期翔实。计所经地

方，凡一十四县，所查案件，有三十五起，就中以人命案件最居多数。大约人民被害，可分数端：一、关于杀伤事件：此次日军经过地方，往往以筹备粮食车辆，自赴附近村落，沿途征集。兵队既散人乡间，种种横暴，自所不免。揆厥原因，或由调戏妇女，男人以羞辱难忍，出而阻拦；或由强取零物，贫户以顾惜资本，偶与计较；或因言语不通，彼此互相猜疑，致生误会。起衅之因，大率不过细故，而日兵辄即开枪，伤害人命。既伤人命，或弃而不顾，或挖土掩埋。又有以数十金给与尸主，捏立字据，强令具结了事，危词恫吓，不令报官。以上各种缘因，大率衅自彼开，曲固在彼，即有因彼此误会而生冲突，其衅端之肇，亦皆由彼强暴所致。综计人民被杀毙命者，有二十余人。而日兵逐入人家，横施暴行，老弱因惊吓致死者，尚有数人，其致重伤轻伤者，不下四五十人。往往数口之家，仰事俯蓄，悉借一人，一被杀害，举族无依，悲惨之状，目不忍睹。究之，无论发生之原因如何，而被害事迹，则固显然在人耳目也。一、关于奸淫事件：此次就日兵所过地方，访问乡董、庄长人等，据其所述，奸淫之事，所在多有。然被害妇女，以名节重大，忍气吞声，即其家人乡党，亦以狎亵之事，不便宣扬，故调查所及，强奸轮奸案件，不过数起。又有妇女被奸而本夫自外回来，即被日兵开枪伤害者，此种情形，更属暴横之尤，毫无人理。一、关于财产事件：此次所经各县，财产损失，几于无处无之。就中如强取鸡只、柴草等物，人民都以为物甚微，不来禀报。损失稍巨者，或经庄长按户调查，或由人民自行呈报。志钧、敬棠到各县后，即检查原有禀册，抄录备核。亦有未经呈报有案者，当令其陆续就近报县，由该省巡按使转送外交部，以免遗漏。一、关于掳捕放火事件：日兵与人民既生冲突之后，往往回队捏报，动率多人，辄行掳捕，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十数人不等。日人在我境内掳我人民，事前既不知照地方官，擅行逮捕，事后又必地方官委曲请求，始允释放。间有将掳去人民，惨刑拷打，勒令供招，无非迫取供词，为将来抵赖之地。甚且因要求不遂，迁怒全庄，燃火引油，烧毁房屋，如即墨毛家岭一处，被毁房屋至百余间之多，虽乡间草屋为值无多，而家具粮食，悉兆焚如，忍饥露宿，惨状何堪。以上发生事件，固多由日兵直接到庄滋扰所致。间亦有中国奸民，略通日语，充当通事，或借势复仇，或乘机图利，多方撩拨，甘作虎伥。日兵到乡，敢于欺侮乡民，肆行需索者，由于此等人之教唆，亦居其半。至若各案发生日期，或在日军通过之时，或在青岛陷落之后。缘日军自龙口登岸后，虽即开赴前敌，而曾经通过之地，每隔数十里，辄派兵驻扎，或三、四十人，七、八十人不等。此种兵队，分驻各处，近在乡间，不免与人民有冲突之事。故军队通过以后，虽发生事件较前为少，而人民被害，终所不免。即如历城、昌邑等案，即系新近发生者也。总之，日兵一日不撤，即人民一日不得安堵。此次东省甫经水灾之后，又遭日兵蹂躏，加以乡僻地方，辄有胡匪出没。此种匪类，均由大连而来。其是否日人勾引，虽无实据，而因军队通过，该匪思乘机抢掠，则属至显之理。志钧、敬棠行经各地，亲睹该处人民，罹此灾患，流离颠沛，惨目伤心。该省善后之图，似不宜缓。又查日军在青岛陷落之后，复由高密至龙口一带，安设电线，其居心叵测，不问可知。铁路经过地方，又有数处如张店、潍县等地，均从事建筑高大房屋，大有久居之意。胶济铁路全线，从前德人时代，沿路警权，尚为我有。自日兵到后，始则尚有高密一处，华警得入车站，近则全路各处，一概不准警察到站。喧宾夺主，几欲以胶路为南满之续。至铁路附近各矿山，日人亦皆极力措理。其对于山东半岛，诚有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之势。此关于外交问题，固未敢妄参末议。然现在欧洲战事既未敉平，青岛问题未能即日解

决，先事预防之计如龙口开埠及建筑烟潍铁路等事，若不急速筹办，诚恐半岛要区，隐入彼国势力范围之内。愚虑所及，用敢附陈。除将每案报告统缮一册，调查记录，分叠成卷，并财产损失表册，另行具送外，理合缮具详报。陈请鉴核！

林志钧　翁敬棠谨详

〔北洋政府司法部档案〕

权量等报告日军在济南使用军票文电

（1914年10—11月）

1．权量等电①（10月）

交通部总、次长钧鉴：甲。日军用手票兑换现银一事，今日已由该军铁路警备队长张贴布告于该站。其布告计四条：一、日本政府军用手票一元，可以兑换元银一元。二、元银交换所设在济南府西站内。三、交换日时，订于大日本大正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早十点钟起至下午三钟止施行交换，嗣后交换日期，仍应再行出示。四、倘有所持日本政府军用手票意欲兑换者，则于前项所开日时，宜报明济南府西站内交换所，务各遵照该委员指示妥换。等语。查该军已由本国铸到大宗银元开始兑换，以为在济南推行军票张本。现在军票多由该国商人收存，市面尚未流用。今日询据商会总理，推究利弊。据云：该国铸到银元，已经由炉房细加分析，其成色尚优于本国银元云云。惟搅乱币制，关系甚巨，此间人多未计及我国现金抵制之实力。量等本非职权所当过问，连日暗中促其设兑换机关，实行兑现，幸能办到，已觉智尽能索。路电两局进款，尚未栏入前项手票元银。谨此电陈。量、华、风、含。

2．吕本端致财政部呈（11月）

总长钧鉴：前肃芜缄，计呈签典。济南自胶济铁路通行，日人往来者日见增多。科员前奉钧饬调查东省军用票情形。兹将日人近在济南布置各手续，暗中探悉，逐一开摺，呈请垂察。其军用票虽分数等，但商埠发现者，一元居多，特购备一张，附呈备考。肃此。敬请钧绥。

山东财政厅科员　吕本端谨呈

附呈清摺一扣、日人一元军用票一张〔军用票略〕。

清摺

谨将调查日人近在济南发行军用票情形缮摺呈电。

计陈：

一、日本汤浅洋行在济南商埠张贴广告，兑换军用手票，并派人赴各商家收买，如有换者，每元按一元一角付给中国湖北各种银元。

一、胶济车站卖票，非军用票不可，如无军用票者，票价一元收中国洋一元二角，以此类推。

① 权量时任交通部参事。

一、军用票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元、十元等数，现在商埠发现者，以价额一元者为多。

一、商埠各商家，暗中联络，遇有行用此票者，群相抵制，是以该票并不畅行。所虑日人多方引诱强制，日久不免灌输。近闻商埠纬四路广源成钱铺已经收买。

3．山东财政厅复财政部密函（11月）

敬密复者：顷奉函开：准交通部转送数电，历叙日军由本国铸到大宗银元开始兑换，以为在济南推行军票之张本，并预定收胶济车费限用兑换军票之银元等情。查该项军票银元，行使市面，漫无限制，势必搅乱币制，应即酌量设法，以资抵制。至胶济车价，应兼收各种钞票银元，不得以日币为限，仰由该厅赶速商承巡按使，与日人磋商办理。除电饬外，合行函达遵照等因。附钞电三件到厅。奉此。查此案前奉钧部税密俭电，当经曲厅长卓新将暗筹抵制方法，并胶济车价暂缓提议各节，密复在案。近据潍县、博山、章邱等处报告，日军到境，需用物品，由商会代办，照市价给值，所给为军用票及老头票两种，定期兑换日元。商人熔化，银色纯净，尚无亏损各等语。兹奉前因，遵即商承蔡巡按使，继续筹备抵制方法。惟战线暨胶济附近各县，凡公款收入，无论日洋、日票，皆可禁止不用。若商民交易，止能暗中劝阻，难于明示拒绝。其他各县，绝不行使，当可办到。至胶济车价一层，当德人管理时际，即专用德华票及钢币两种。若搭用中国银币，则须贴水，且多挑剔。行旅但求往来便利，凡乘车者，无不遵照该路章程，而我政府亦从未过问。此时若与日人提议兼收各种钞票银元，万一彼援德华票币为先例，且并要求津浦各路亦兼收彼国钞票银元，则流弊滋多，益难交涉。兹与蔡巡按使再四熟商，意见相同。是否有当，仍乞训诲频颁，俾有遵循。专此肃复，敬请勋安。

代理山东财政厅厅长吴鸦谨肃

〔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外交部抗议日本在济南等地设立民政署经过公函

（1918年2月16日）

外交部公函　乃字第一六七号

迳启者：准函开：据四川省议会邮呈：日人于济南、坊子、张店等处，设立民政署，请将关于此案办理情形知照过部，以资接洽。等因。查此事本部前准山东督军暨特派员先后报告，当经备文与日使交涉，并电致日本章使，向日外部提出抗议。日政府始则借词推宕，经迭次催询，至本年一月，始准章使寄到日政府答复节略称：改设民政，不外缓和行政之作用。设立地点，在胶济铁路用地以内，该地既为日本占领，则此次行政组织之变更，尤无何等关系。等语。本部以日政府所称各节，毫无充分理由，且胶济铁路，按照合同，亦无所谓铁路用地之名称，难以承认。已电章使继续向日外部交涉，仍要求将前项设置取消。准函前因，相应抄录日外部节略暨本部致章使电，函达贵部，即希查照为荷。此致

内务总长

附件

中华民国七年二月十六日

照译日外部面交章使节略

关于报载日本在山东省坊子及济南设置民政署事，前准贵公使节略声明中国政府之所见，业已阅悉。帝国政府深信，中国政府之声明，乃基于不正确之推断及报告，兹直率申叙其事实之真相。

前者，帝国军队驱逐德军于山东省，攻略德军，因军事行动之目的，所占据地域之时，即于新占领地内施行军政，以青岛守备司令官统理之，历有年所。兹鉴于占领地域内之秩序，渐行确定，帝国政府认为，此时撤消军政，施行民政，以从来武官所执行之行政，移归文官掌管为妥。是以变更青岛守备军司令部之组织，于军司令官之下设民政长官，以当占领地行政之任。不外缓和行政之作用，去严就宽，别无他意。

中国政府以坊子为中国内地，日本不应在该地设民政署。然此次设立民政署之地点，在胶济铁路用地以内。该铁路及其用地，乃日德开战时为德军所占据，以供军事行动之目的，其事实勿庸赘述。尔后，德军撤退，该地域归帝国军占领。照此情形，则此次行政组织之变更，并无何等关系。至于可为今日议论问题者，系胶济铁路最后处分为何如耳。然而此乃应由日德两国另行解决之问题，自不待言。因为解决此种问题，所有帝国政府与德国政府所协定之一切事项，按照大正四年中日条约，中国政府业已先为承认者也。

或谓日本在济南已设民政署，或谓行将设置，均为不确，帝国政府目下并无此种计划。

总之，军政民政均系在军事占领地内之暂定行政制度，胶济线路及其用地，既归帝国之军事占领，于该地域内施行暂定的行政，乃属普通之国际事例。今仅为军政移归民政，而招中国政府之异议，实出帝国政府之意外。

照录致驻日本章公使电　一月十五日

山东设民政事，十二日电悉。虽经日政府斟酌答复，惟政府殊难据以告谕人民，深为可惜。查胶济铁路与青岛性质不同。从前日军以武力占领该路时，曾经迭次抗议，其设立军政，我国亦始终并未承认。此次由军政改为民政，自亦难允认。仍希亲访日外部继续交涉，请其将青岛环界以外设立之民政署，实行撤消。交涉情形，盼随时电复。外。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关于“二十一条”的历次修正案[①]

第一号第一款[②]原案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之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

① 此件系印件，无作者，上注有墨笔“密件”字样。

② 此件有时用款：有时用条，均按原文，未加改动。

第一次提出修正案

第一款　中国政府声明，日后日德两国政府，彼此协定关于德国在山东省内依据条约及成案办法对于中国政府享有之一切利益等项处分，届时概行承认。

日本国政府声明，中国政府承认前项利益时，日本应将胶澳交还中国，并承认日后日德两政府上项协商之时，中国政府有权加入会议。

第二款　此次日本用兵胶澳所生各项损失之赔偿，日本政府概允担任。胶澳内之关税、电报、邮政等各事，在胶澳交还中国以前，应暂照向来办法办理，其因用兵添设之军用铁路、电线等，即行撤废。胶澳旧有租界以外留余日本军队，先行撤回。胶澳交还中国时，所有租界内留兵，一律撤回。

第一号第二款原案

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一次提出修正案改换文

中国政府声明，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外国。

第一号第三款原案

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第一次提出修正案

中国政府允准，自行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如须借用外款，德国愿抛弃烟潍路借款权之时，可先尽日本资本家商议。

第一号第三款原案

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线之铁路。

日本提出第一次修正案

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协商后合办建造由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线之铁路。

第一号第四款原案

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一次修正案

中国政府允诺，为外人通商起见，将山东省内自择合宜地方开作商埠，所有开埠章程，应由中国自定。

第二次修正案

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合宜地方一、二处为商埠，另附换文如左，所有应开地点及章程，由中国自定，预先与日本公使接洽。

第二号第一款原案

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第一次提出修正案

中国政府允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展至九十九年，至民国八十六年，即西历一九九七年为满期。南满铁路全路退还中国期限，再展至九十九年，至民国九十年，即西历二千零一

年为满期，余均照中日原约办理。

第二款　中国政府允将日本经管安奉铁路期满时，可商议展限办法，其余各节，仍照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附约之第六款，继续实行。

第二次提出修正案

中国政府允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展至九十九年，至民国八十六年，即西历一九九七年为满期。南满铁路收买期限，展至七十二年，至民国六十三年，即西历一九七四年为满期，归还期限展至九十九年，至民国九十年，即西历二千零一年为满期。余均照各该原约办理。

第二款　中国政府允将日本经管安奉铁路期限，展至七十二年，至民国六十五年，即西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为满期。其余各节，仍照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附约之第六款，继续实行。

第三次照日本原案同意另加附注如左：

旅顺、大连租借期，至民国八十六年，即西历一千九百九十七年为满期。南满铁路交还期，至民国九十一年，即西历二千零二年为满期。其原合同第十二款所载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可给价收回一节，勿庸置议。安奉铁路交还期，至民国九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四年为满期。

第二号第二第三款原案

第二款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须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第三款　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第一次提出修正案

中国政府允于现在东三省已开商埠外，再行酌定地点，自行开埠通商，划定界线，准日本及各国商民，任便居住贸易，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并准日本及各国商民，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向业主公平商租地基，惟须一律完纳各项税捐。

第二次提出修正案

凡在东三省南部内地居住贸易之外国臣民，须先觅妥实商保，声明赴何处，作何项职业，呈请该省巡按使或道尹查核，果系正当营业，发给居留执照，以便居留。惟此项在内地居住之外国臣民，遇有民刑诉讼，应由中国官吏处理。所有中国法令、警察条规、税课章程，均应一律遵守。其因盖造商工业应用房厂之地基，应向业主公平商租。

又中国政府允许设一中日垦务公司，择南满洲荒旷地方，划定界址，由公司备价，租领开垦，其一切章程，应按照中日合办采木公司章程，与奉天地方长官另行商订。

第三次提出修正案

中国政府约定，所有日本国臣民，在东三省南部地方内地拟欲居住或经营各项生业，如有日本国领事官或确实保人证明从事正当营业者，中国地方官即准其注册，非有正当理由，勿得借词阻止并约业。在前开地方居住或经营各项生业之日本国臣民，亦不加何等之阻止。但前项日本国臣民，均应服从中国警察法令，完纳一切赋税，与中国人民一律。如有民事刑事一切诉讼，由中国法官秉公审判。日本国领事官或由领事官委派官吏，可任便到堂听审。日本国领事官对于此项重大案件，如能指出不按法律判断之处，可请中国另派官员复审，以昭信谳。又前项日本国臣民，盖造商工营业房屋需用地亩，得与业主公平商租。

第四次提出修正案

中国政府约定，所有日本国臣民，在东三省南部地方内地，拟欲居住或经营各项生业，如有日本国领事官或确实保人证明从事正当营业者，中国地方官即准其注册，非有正当理由，勿得借词阻止并约业。在前开地方居住或经营各项生业之日本国臣民，亦不加何等之阻止，但前项日本国臣民，均应服从中国警察法令，完纳一切赋税，与中国人民一律。至日本人与中国人之民事诉讼及日本人与日本人之诉讼关于土地之争执及牵涉中国人者，均归中国官审判。其日本人犯有刑事罪案，可由日本领事会同中国官员审判。俟该省司法制度完全改良之时，所有日本国臣民之民刑诉讼，完全由中国法庭审判。又前项日本国臣民盖造商工营业房屋需用地亩，得与业主公平商租。在东三省南部，无论商埠与否，可许日本国臣民与中国人民合办公司，或商租地亩，经营开垦事业，所有关于租地开垦各项章程，由中国另行规定。

第五次提出修正案

日本国臣民在东三省南部，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向业主商租需用之地亩，其耕作租地章程，由中国另行规定。

日本国臣民可在东三省南部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前二款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将照例所领护照向地方官注册外，应服从中国警察法令，完纳一切赋税，与中国人一律。至日本人与中国人之民事诉讼及日本人与日本人之诉讼关于土地或租契之争执及牵涉中国人者，均归中国官审判。其刑事诉讼，各归被告之本国官审判，彼此均得派员听审。俟该省司法制度完全改良之时，所有日本国臣民之民刑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理。

第六次提出修正案

日本国臣民在东三省南部，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农业，可向业主商租须用之地亩，其农业租地章程，由中国另行规定。

日本国臣民可在东三省南部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前二项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将照例所领护照向地方官注册外，应服从中国警察法令，完纳一切赋税，与中国人一律。至民刑诉讼，各归被告之本国官审判，彼此均得派员听审。但日本人与日本人之诉讼及日本人与中国人之诉讼关于土地或租契之争执，均归中国官审判。俟该省司法制度完全改良之时，所有日本国臣民之民刑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理。

第七次提出修正案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农业，可向业主商租须用之地亩。

日本国臣民可在南满洲，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前二项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将照例所领护照向地方官注册外，应服从中国违警律及违警章程，完纳一切赋税，与中国人一律。至民刑诉讼，各归被告之本国官审判，彼此均得派员傍听。但日本人与日本人之诉讼及日本人与中国人之诉讼关于土地或租契之争执，均归中国官审判，日本领事亦得派员傍听。俟将来该省司法制度完全改良之时，所有日本国臣民之民刑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理。

日本提出第二号第二、三款原案

第二款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须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第三款　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

意。

日本第一次提出之修正案

如日本人欲往南满洲或东部内蒙古为正当之营业，由日本领事官令觅妥实商保后，地方官无正当之理由，不得禁阻。又已在南满洲或东部内蒙古居住之日本人民，地方官亦不得加以禁阻。遇有诉讼事件，照向来办法办理。其盖造商工业等房厂应用之地基，向业主公平商租，在开埠及未开埠地方，允许日本人民耕作或与中国人民合办，其土地仍向业主公平商租。

日本第二次提出之修正案

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通商起见，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地方，将左开各城市为商埠：郑家屯（辽源县）、热河（承德县）、大疙疸（西安县）、大孤山、安图、锦州、锦县、四平街、本溪湖、额穆索（额穆县）、通化、林西、抚顺、丰安、大赉、小库伦（绥东县）开原、掏鹿（西丰县）、兴京、怀仁（恒仁县）、敦化、盘石（磨盘山）、海龙、醴泉（突泉县）、开鲁、县北、山城子（山城子）、伊通州、朝阳。

中国政府约定，俟将来商务发达，在前开各地方外，再行添开商埠。中国政府约定，所有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地方内地，拟欲居住贸易，如有日本领事官或确实保人证明从事正当营业者，中国地方官非有正当理由，勿得借词阻止并约业。在前开各地方居住贸易之日本国臣民，亦不加何等之阻止。

前项内地居住之日本国民，如有民刑涉讼事件，按照向例处理。又此项居住内地之日本国民，盖造商工营业房屋需用地亩，得与业主公平商议，暂租或永租。所有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地方，无论商埠与否，可得任便单独或与中国人民合办经营农业，其应用地亩，可与业主公平商酌，或暂租，或永租。

日本第三次提出之修正案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农业，可暂租或永租须用之地亩。其农业租地章程，由中国自拟，与日本妥商决定。日本国臣民可在南满洲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前二项所载之日本国臣民，应服从由日本领事承认之中国行政警察。至民刑诉讼，各归被告之本国官审判，彼此可得派员听审。其日本人与中国人关于土地之诉讼，由两国官员共同审判。末尾写明东部内蒙古另议。

日本第四次提出之修正案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经营农业，可得租赁或购买其须用地亩。

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前二款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将照例所领护照，向地方官注册外，应服从由日本国领事官承认之警察法令及课税。至民刑诉讼，其日本人被告者，归日本国领事官，其中国人被告者，归中国官吏各审判，彼此均得派员到堂旁听。但关于土地之日本人与中国人民事诉讼，按照中国法律及地方惯习，由两国派员共同审判。俟将来该地方司法制度完全改良之时，所有关于日本国臣民之民刑一切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理。

第二号第四条原文

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

第一次提出修正案

于本协约签字之日起，一年以内，如日本资本家愿在东三省南部办矿，除业已探勘或开采各矿外，中国政府允许给予该资本团以该处勘矿之特权，以一年为限，所勘之矿，准其选择半数，按照中国矿务条例，实行开采，其余各矿，仍由中国自行处置。

第二次提出修正案

中国政府允许，日本人民在南满洲之左开各矿之中，除业已探勘或开采各矿区外，速行调查，呈请该管官厅遵照中国将来确定之矿业条例办理。

一、奉天省

所在地	县名	矿产
牛心台	本溪	石炭
田什付沟	同上	同上
杉松岗	海龙	同上
铁厂	通化	同上
暖池塘	锦	同上
鞍山站一带（辽阳至本溪）		铁

二、吉林省南部

所在地	县名	矿产
杉松岗	和龙	石炭、铁
缸窑	吉林	石炭
夹皮沟	桦甸	金

第三次定案

中国政府允诺，日本人民在南满洲之左开各矿，除业已探勘或开采各矿区外，速行调查选定，即准其探勘或开采。在矿业条例确定以前，仿照现行办法办理。

一、奉天省

所在地	县名	矿产
牛心台	本溪	石炭
田什付沟	同上	同上
杉松岗	海龙	同上
铁厂	通化	同上
暖池塘	锦	同上
鞍山站一带（辽阳至本溪止）		铁

二、吉林省南部

所在地	县名	矿产
杉松岗	和龙	石炭、铁
缸窑	吉林	石炭
夹皮沟	桦甸	金

第二号第四款原文

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

日本第一次修正案

中国政府允诺，日本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左开各矿之中，速行调查指定之时，将各该矿之开采权，许与日本臣民。

日本臣民依照前项开采各矿之时，除已由外交团提出抗议之各条，暨与日中两国现行各种条约有阻碍之各条外，务须遵照中国矿业条例之宗旨办理。

一、奉天省

所在地	县　名	矿　产
牛心台	本溪	石炭
田什付沟	同上	同上
杉松岗	海龙	同上
铁厂	通化	同上
暖池塘	锦	同上
鞍山站一带（自辽阳接至本溪）		铁

二、吉林省南部

所在地	县　名	矿　产
杉松岗	和龙	石炭、铁
缸窑	吉林	石炭
夹皮沟	桦甸	金

三、东部内蒙古

所在地	旗　县　名	矿　产
五家	（喀喇沁右翼旗）	石炭
石头玟	同上	同上
新　邱	（土默特左翼旗）	同上
三义店	（土默特右翼旗）	同上
花红沟	赤峰	金

日本第二次修正案

中国政府允诺，日本人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左开各矿，除业已探勘或开采之各矿区外，速行调查选定，即准其探勘或开采，在矿业条例确定以前，仿照现行办法办理。

一、奉天省

所在地	县　名	矿　产
牛心台	本溪	石炭
田什付沟	同上	同上
杉松岗	海龙	同上
铁厂	通化	同上
暖池塘	锦	同上
鞍山站一带（辽阳接本溪）		铁

二、吉林省南部

所在地	县名	矿产
杉松岗	和龙	石炭、铁
缸窑	吉林	石炭
夹皮沟	桦甸	金

三、东部内蒙古

所在地	旗县名	矿产
五家	（喀喇沁右翼旗）	石炭
石头坟	同上	同上
新邱	（土默特左翼旗）	同上
三义店	（土默特右翼旗）	同上
花红沟	赤峰	金

第二号第五条原案

中国政府应允，关于左开各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

（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

第一次提出修正案

中国政府声明，嗣后在南满洲需造铁路，由中国自行筹款建造，如需外款，中国政府允许先向日本国资本家商借。

中国政府声明，嗣后东三省地方官，如有以关税、盐税以外之税课作抵商借外款之事，中央政府不能允准。

第二次提出修正案改换文

中国政府声明，嗣后在南满洲需造铁路，由中国自行筹款建造。如需外款，中国政府允诺先向日本国资本家商借。

中国政府声明，嗣后将南满洲之各种税课（惟除业已中央政府借款作押之关税及盐税等类）作抵由外国借款之时，须先向日本资本家商借。

日本提出第二号第五款原案

中国政府应允，关于左开各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

（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

日本第一次提出修正案

中国不以南满洲铁路敷设权允许外国。如欲建造铁路，由中国自造，若需外国资本，先向日本资本家商议。

日本第二次提出修正案

中国政府如在南满洲或东部内蒙古，如以铁路敷设权许与外国，或以各税（除海关税、盐税外）作抵借款之时，须经日本政府之同意。

日本第三次提出修正案

中国政府声明，嗣后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各种税课作抵（惟除业已中央政府借款作押之关税及盐税等类），由外国借款之时，须先向日本资本家商借。

日本提出第二号第六款原案

中国政府允诺，如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

日本提出第一次修正案

中国政府声明，如在南满洲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外国各顾问教官时，聘用日本人。

第二号第六款原案

中国政府允诺，如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

第一次提出修正案

中国政府声明，嗣后如在南满洲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外国各顾问，尽先聘用日本人。

第二次提出修正案

中国政府允诺，如在南满洲聘用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外国各顾问时，尽先聘用日本人。

第三次提出修正案改换文

中国政府声明，嗣后如在南满洲聘用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外国各顾问教官，尽先聘用日本人。

第二号第七款原案

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一次修正案

吉长铁路建筑资本，全数改向日本商借，所有一切条款，仍照中日新奉吉长铁路协约及中日新奉吉长铁路续约暨细目合同办理。

第二号第七款定案

中国政府允诺，以向来中国与各外国资本家所订之铁路借款合同规定事项为标准，速行从根本上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

将来中国政府关于铁路借款附与外国资本家以较现在铁路借款合同事项为有利之条件时，依日本之希望，另行改订前项合同。另附中国提案，关于东三省中日现行各条约，除本协约另有规定外，一概仍旧实行。

日本提出第二号第七款原案

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日本第一次提出之修正案

中国政府允诺，以向来中国与各外国资本家所订之铁路借款合同规定事项为标准，速行从根本上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

将来中国政府关于铁路借款附与外国资本家以较现在铁路借款合同事项为有利之条件

时，依日本之希望，另行改订前项合同。

第三号第一第二款原案

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之各矿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律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一次修正案改换文

查汉冶萍公司系中国商办公司，按照中国法律，原有保全财产营业管理之权，政府未与该公司商定，不便迳自代为处置。惟该公司将来如遇有机会，就现有事业，愿与日本国商人商订合意之办法，与中国法律不相违背，中国政府届时自可允准。

第五号第六条原案

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第一次提出修正案（用函）

中国政府可以声明，并无在福建省沿岸地方，允外国建造船厂、军用蓄煤所、海军根据地及其他一切军务上施设，又无拟借外资建设或施设上开各事。

〔熊希龄档案〕

交通部抄送中日两国交换解决山东问题文件密咨

（1918年10月25日）

咨　第一四六四号

交通部为密咨事：准驻日章使函开：中日两国因解决山东问题，并借款建筑山东铁路，由本使与日本外务大臣交换文件一案，业于本日依照贵部来电，由本使将该项文件交换。除将办理大要另行电达外，相应抄具该项文件，计中日文各一份，备函封送，即希察核密存。其山东问题，并希抄送外交部备案。等因。除分咨外，相应抄录解决山东问题文件计中日文各一分，密咨贵部查照备案。其关于胶济路线设警保护事项，应由贵部与山东长官接洽办理可也。此咨内务总长

附件：中日文各一份。

交通总长曹汝霖

中华民国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中日两国交换解决山东问题文件　中日文各一份〔日文本略〕

敬启者：帝国政府顾念贵我两国间所存善邻之谊，本和衷协调之旨意，将关于山东省诸问题，照左列各项处理，认为妥当。兹将此事，特向贵国政府提议：

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

二、胶济铁路之警备，可由中国政府组成巡警队任之。

三、右列巡警队之经费，由胶济铁路提供相当之金额充之。

四、右列巡警队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国人。

五、胶济铁路从业员中，应采用中国人。

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

贵国政府对于右列之提议，其意响若何？敬希示复为荷。敬具。

大正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日本帝国外务大臣男爵后藤新平印

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阁下

敬启者：接奉贵翰内称，贵国政府顾念贵我两国间所存善邻之谊，本和衷协调之意旨起见，提议关于山东省诸问题，照左记各项处理　等因。业已阅悉。

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

二、胶济铁路之警备，可由中国政府组成巡警队任之。

三、右列巡警队之经费，由胶济铁路提供相当之金额充之。

四、右列巡警队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国人。

五、胶济铁路从业员中，应采用中国人。

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

中国政府对于日本国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谨具。

中华民国七年　　月　　日

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印

外务大臣男爵后藤新平阁下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大总统关于中国对德奥立于战争地位布告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大总统布告

我中华民国政府，前以德国施行潜水艇计划，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议，并声明万一抗议无效，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等语。不意抗议之后，其潜水艇计划，曾不少变。中立国之船只，交战国之商船，横被轰毁，日增其数。我国人民之被害者，亦复甚众。我政府不能不视为抗议之无效。虽欲忍痛偷安，非惟无以对尚义知耻之国人，亦且无以谢当仁不让之与国。中外共愤，询谋佥同。遂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断绝外交关系，并将经过情形宣示中外。我中华民国政府所希冀者和平，所尊重者公法，所保护者我本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初非有仇于德国。设令德政府有悔祸之心，怵于公愤，改其战略，实我政府之所祷企，不忍遽视为公敌者也。乃自绝交以后，历时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我政府责善之深心，至是实已绝望。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我中华民国政府仍遵守海牙和平会条约及其他国际协约关于战时文明行动之条款，罔敢逾越。宣战主旨，在乎阻遏战祸，促进和局，凡我国民，宜喻此意。当兹国变初平，疮痍未复，遭逢不幸，有此衅端，本大总统睠念民生，能无心恻。非当万无苟免之机，决不为是一息争存之举。公法之庄严，不能自我失之。国际之地位，不能自我坠之。世界友邦之平和幸福，更不能自我而迟误之。所愿举国人民，奋发淬厉，同履艰贞，为我中华民国，保此攸久无疆之国命而光大之，以立于国际团体之中，共享其乐利也。布告遐尔，咸使闻知。此布。

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

〔国民党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孔子与宪法

（一九一七年一月三十日）

李大钊

孔子与宪法，渺不相涉者也。吾今以此标题，宁非怪诞之尤。然于怪诞标题之前，久已有怪诞事实之发见。本报之功用，颇重写实。此怪诞之标题，盖因怪诞之事实而生也，岂得已哉？

怪诞之事实者，何也？则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之事是也。云何以此为怪诞？最宜以孔子与宪法为物之性质两相比证，则知以怪诞之名加之者，为不妄矣。

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以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荒陵古墓中之宪法，非光天化日中之宪法也；护持偶象权威之宪法，非保障生民利益之宪法也。此孔子之纪念碑也。此孔子之墓志铭也。宪法云乎哉！宪法云乎哉！

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将为束制民彝之宪法，非为解放人权之宪法也；将为野心家利用之宪法，非为平民百姓日常享用之宪法也。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此乡愿政治之见端也。宪法云乎哉！宪法云乎哉！

孔子者，国民中一部分所谓孔子之徒者之圣人也。宪法者，中华民国国民全体无问其信仰之为佛为耶，无问其种族之为蒙为回，所资以生存乐利之信条也。以一部分人尊崇之圣人，入于全国所托命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一部分人之宪法，非国民全体之宪法也；所谓孔教徒之宪法，非汉、满、蒙、藏、回、释、道、耶诸族诸教共同遵守之宪法也；乃一小社会之宪法，非一国家之宪法也。此挑动教争之呼声也。此离析蒙藏之口令也。宪法云乎哉！宪法云乎哉！

孔子之道者，含混无界之辞也。宪法者，一文一字均有极确之意义，极强之效力者也。今以含混无界之辞，入于辞严力强之宪法，无论实施之效力，不克普及于全国，即此小部分之人，将欲遵此条文，亦苦于无确切之域以资循守。何者为孔子之道？何者为非孔子之道？必如何始为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必如何则否？此质之主张规定此条之议宪诸君，亦将瞠目而莫知所应。须知一部之失效宪法，全体之尊严随之，此宪法之自杀也，此宪法自取消其效力之告白也。然则辛苦经营，绞诸公数月之脑血，耗国家数月之金钱以从事于制定宪法之劳者，不几为无意义乎？

总之宪法与孔子发生关系，为最背于其性质之事实。吾人甚希望于二读会时，删去此项，以全宪法之效力。此一部尊崇孔子之人，尽可听其自由以事传播。国家并无法律以禁止之，社会并可另设方法以奖助之，何必定欲以宪法之权威，为孔子壮其声势，俾他种宗教，他种学派不得其相当之分于宪法而后快于心欤？

（原载《甲寅》日刊，署名守常。选自《李大钊选集》）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

吴　虞

商君、李斯破坏封建之际，吾国本有由宗法社会转成军国社会之机；顾至于今日，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原其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

《钩命决》记孔氏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董仲舒云："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故曰，《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然孔子之修《春秋》，最为后世君主所利用者，不外诛乱臣贼子，黜诸侯，贬大夫，尊王，攘夷，诸大端而已。盖孔氏之志，诚如荀卿《儒效篇》所谓"大儒之用，无过天子三公"，宜其言如此。至其所作《孝经》，多君亲并重，尤为荀卿《三本》之说所从出。《开宗明义章》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唐玄宗注云："言教从孝而生。"其教之最要者曰："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玄宗注云："忠孝道著，乃能扬名荣亲，故曰，终于立身。"《士章》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圣治章》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五刑章》曰："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正义》云："言人不忠于君，不法于圣，不爱于亲，皆为不孝，大乱之道也。"《广扬名章》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详考孔子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所以"教"字从孝。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能事亲，事君，乃可谓之为能立身，然后可以扬名于世。由事父推之事君事长，皆能忠顺，则既可扬名，又可保持禄位。居家能孝，则可由无禄位而为官。然孝敬忠顺之事，皆利于尊贵长上，而不利于卑贱，虽奖之以名誉，诱之以禄位，而对于尊贵长上，终不免有极不平等之感。故舜以孝致天下，获二女，而巢父、许由不屑为之；孔氏不废君臣之义，而荷蓧丈人则讥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视同游民；此又尊贵长上之所深忌畏恶。而专制之学说有时而穷，于是要君非圣者，概目之为不孝，而严重其罪名，以压抑束缚之曰："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自是以后，虽王陵、嵇绍之徒，且见褒于青史矣。"孝乎惟孝，是亦为政"，家与国无分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君与父无异也。推而广之，则如《大戴记》所言："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无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而君主专制所以利用家族制度之故，则又以有子之言为最切实。有子曰："孝弟也者，为人之本。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

上者，鲜；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其于销弭犯上作乱之方法，惟恃孝弟以收其成功。故刘宝楠云：（《论语正义》）“作乱之人，由于好犯上；好犯上，由于不孝不弟。故古者教弟子，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皆令知有孝弟之道。而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又令知有事长上处朋友之礼。故孝弟之人，鲜有犯上。若不好犯上而好作乱，知为必无之事，故曰，未之有也。曾子《立孝篇》云：‘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君子一孝一弟，可谓知终矣。’是言孝弟之人，必为忠臣顺下，而不好犯上，不好作乱，可无疑矣。”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故潘维城云：（《论语古注集笺》）“作乱者，《礼记》云：‘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郑注，‘乱，谓违废事君之礼。’有子此言，盖兼乎《孝经》《春秋》之义。孔子道在《孝经》，取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事，顺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严，守其发肤，保其祭祀，无奔亡弑夺之祸，即有子所云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乱也。使人人不犯上作乱，则天下永治矣。惟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经》之顺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弑父，臣弑君，亡绝奔走，不保宗庙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叛乱，明褒贬。《春秋》论之于已事之后，《孝经》明之于未事之先，其间相通之故，则有子此章实通彻本原之论。”其主张孝弟，专为君亲长上而设。但求君亲长上免奔亡弑夺之祸，而绝不问君亲长上所以致奔亡弑夺之故，及保卫尊重臣子卑幼人格之权。夫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似平等矣；然为人子而不孝，则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于父之不慈者，固无制裁也。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低平等矣；然为人臣而不忠，则人臣无将，将而必诛；于君之无礼者，固无制裁也。是则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掣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

《满清律例》，“十恶”之中，于“大不敬”之下，即列“不孝”，实儒教君父并尊之旨。顾其所列“父母在别籍异财”，“居父母丧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父母丧匿不举哀”诸条，“新刑律”皆一扫而空之。此即立宪国文明法律与专制国野蛮法律绝异之点，亦即军国社会与宗法社会绝异之点；而又国家伦理重于家族伦理之异点也。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当然劣败而归于淘汰。顽固锢蔽之士大夫，虽欲守缺抱残，依据“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之学理。尽其三年无改之孝，而终有所不能。何也？吾国领事裁判权所以不能收回，实由法律不良之故。法律之所以不良，实以偏重尊贵长上，压抑卑贱，责人以孝敬忠顺，而太不平等之故。今年九月，荷兰海牙和平会修改《万国法典》之期，驻荷公使魏宸组电请将民国已颁未颁之法律从速编订，提交该会，加入《万国法典》，以便收回领事裁判权。故使吾国法律不加改正，与立宪国共同之原则违反，则必不能加入，而丧权辱国，独立国所无之领事裁判权，永远不能收回。若欲实行加入，固非儒教之旧义、满清之律例所克奏效，断断然也。

孟德斯鸠曰：“支那立法为政者之所图，有正鹄焉：求其四封宁谧，民物相安而已。然其术无他，必严等衰，必设分位。故其教必辨于最早，而始于最近之家庭。是故支那孝之为义，不自事亲而止；盖资于事亲，而百行作始。彼惟孝敬其所生，而一切有近于所生，如长年、主人、官长、君上者，将皆为孝敬之所存。自支那之礼教言，其相资若甚重者，则莫如谓孝弟为不犯上作乱之本是已。盖其治天下也，所取法者，原无异于一家。向使取父母之权

力势分而微之，抑取所以致敬尽孝之繁文而节之，则其因之起于庭闱者，其果将形于君上。盖君上固作民父母者也。”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

庄子《盗跖篇》，直斥孔丘为“鲁之巧伪人”，谓其“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大揭其借孝弟以保持禄位之隐衷于天下后世，真一针见血之言。故余谓盛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仅一隅，国愿之流毒遍天下。

庄子《天运篇》谓“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盖已深悉儒家标举孝弟之真谛，故意极非之。至《商君书》《去强篇》直谓“国有礼乐孝弟，必削至亡”；《靳令篇》直以礼乐孝弟等于六虱；即宋儒谢上蔡，亦言“孝弟非仁”，合于庄子。此岂皆悉属颛蒙而毫无所见者哉？是故为共和之国民，而不学无术，不求知识于世界，而甘为孔氏一家之孝子顺孙，挟其游猿怒特蠢悍之气，不辨是非；囿于风俗习惯酿成之道德，奋螳臂以与世界共和国不可背畔之原则相抗拒；斯亦徒为蚍蜉蚁子之不自量而已矣！

明李卓吾曰：“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其所以无议论也。二千年以来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而孟轲之辟杨墨，亦曰：“扬氏为我，是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仍以君父并尊，为儒教立教之大本。夫为我何至于无君？兼爱何至于无父？此不合论理之言，学者早已讥之。而今世民主之国，概属无君，岂皆如孟轲所诋为禽兽者乎？使孟轲生今日，当慨禽兽之充塞于世界，抑将爽然自悔其言之无丝毫价值也？

或曰：子既不主张孔氏孝弟之义，当以何说代之？应之曰：老子有言，“六亲不和有孝慈。”然则六亲苟和，孝慈无用，余将以“和”字代之。既无分别之见，尤合平等之规，虽蒙“离经叛道”之讥，所不恤矣。

（选自《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又参照《吴虞文录》卷上校订）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节录）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

胡　适

（一）

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狠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狠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什么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选派的文学哪，江西派的诗哪，梦窗派的词哪，聊斋志异派的小说哪，——都没有破坏的价值。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於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

我现在做这篇文章的宗旨，在於贡献我对於建设新文学的意见。我且先把我从前所主张破坏的八事引来做参考的资料：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封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这是我的"八不主义"，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方面着想的。

自从去年归国以后，我在各处演说文学革命，便把这"八不主义"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气，又总括作四条，如下：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变相。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这是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主张。一笔表过，且说正文。

（二）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

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学：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他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邱长春，吴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价值。

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做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换言之：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可以产出《儒林外史》也可以产出《肉蒲团》。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只能做几篇《拟韩退之原道》或《拟陆士衡拟古》，决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这话，可先读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传》，再读《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传》，便可知道死文学和活文学的分别了。

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这都由于文学的性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仲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叠》，《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传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他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他们却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既不能表情，那里还有文学呢？即如那《儒林外史》里的王冕，是一个有感情，有血气，能生动，能谈笑的活人。这都因为做书的人能用活言语活文字来描写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里的王冕，便成了一个没有生气，不能动人的死人。为什么呢？因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来写二千年后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这个活人变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

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选自《新青年》第4卷第4号）

“今”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

李　大　钊

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

为甚么“今”最可宝贵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孙所说的话答这个疑问：“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

为甚么“今”最易丧失呢？因为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时间这个东西，也不因为吾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试问吾人说“今”说“现在”，茫茫百千万劫，究竟那一刹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现在”呢？刚刚说他是“今”是“现在”，他早已风驰电掣的一般，已成“过去”了。吾人若要糊糊涂涂把他丢掉，岂不可惜？

有的哲学家说，时间但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我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有些道理。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换句话说，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故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时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说是由所有“过去”时代的思潮一凑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呼应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一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联的永远性。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此数个复杂事件与明日的数个复杂事件，更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

现时有两种不知爱“今”的人：一种是厌“今”的人，一种是乐“今”的人。

厌“今”的人也有两派：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因起一种回顾“过去”的感想。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风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唯一的希望在复古。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与复古的厌“今”派全同。但是他们不想“过去”，但盼“将来”。盼“将来”的结果，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单是耽溺于虚无缥渺的空玄境界，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

乐“今”的人大概是些无志趣无意识的人，是些对于“现在”一切满足的人，觉得所处

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商进取，再为创造。这种人丧失“今”的好处，阻滞进化的潮流，同厌“今”派毫无区别。

原来厌“今”为人类的通性。大凡一境尚未实现以前，觉得此境有无限的佳趣，有无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觉不过尔尔，随即起一种失望的念，厌“今”的心。又如吾人方处一境，觉得无甚可乐，而一旦其境变易，却又觉得其境可恋，其情可思。前者为企望“将来”的动机，后者为反顾“过去”的动机。但是回想“过去”，毫无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时间。若以企望“将来”的动机，而尽“现在”的势〔努〕力，则厌“今”思想却大足为进化的原动。乐“今”是一种惰性（Inertia），须再进一步，了解“今”所以可爱的道理，全在凭他可以为创造“将来”的努力，决不在得他可以安乐无为。

热心复古的人，开口闭口都是说“现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恶若何深重，祸患若何剧烈。要晓得“现在”的境象倘若真是这样黑暗，这样卑污，罪恶这样深重，祸患这样剧烈，也都是“过去”所遗留的宿孽，断断不是“现在”造的。全归咎于“现在”是断断不能受的。要想改变他，但当努力以创造将来，不当努力以回复“过去”。

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

忆独秀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文中说过，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尝推广其意，也说过人生唯一的蕲向，青年唯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沉滞于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万亿年的“我”都俨然存在于“今我”的身上。然则“今”之“我”，“我”之“今”，岂可不珍重自将，为世间造些功德？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

我请以最简明的一句话写出这篇的意思来：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选自《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又参照《李大钊选集》校订）

劳工神圣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蔡 元 培

诸君！此次世界大战争、协商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袴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乾脩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选自《新青年》第5卷第5号）

六七

随感录二则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玄　同

随感之五〇

王闿运说，耶教的十字架，是墨家"钜子"的变相，巨子就是"矩子"。姑勿论矩的形状和十字架的形状是否一样。就算是一样，请问有什么凭据，知道从中国传出去的呢？就算查到了传出去的凭据，请问又有什么大道理在里头？近来中国人常说："大同是孔夫子发明的，民权议院是孟夫子发明的；共和是二千七百六十年前周公和召公发明的；立宪是管仲发明的；阳历是沈括发明的；大礼帽和燕尾服又是孔子发明的"；（这是康有为说的。）此外如电报，飞行机之类，都是"古已有之"。这种瞎七搭八的附会。不但可笑，并且无耻。请问：就算上列种种新道理，新事物，的确是中国传到西洋去的。然而人家学了去，一天一天的改良进步，到了现在的样子；我们自己不但不会改良进步，连老样子都守不住，还有脸来讲这种话吗？这好比一家人家，祖上略有积蓄，子孙不善守成，被隔壁人家盘了去；隔壁人家善于经理，数十年之后，变成了大富翁；这家人家的子弟已经流为乞丐，隔壁人家看了不善，给他钱用，给他饭吃，他还要翘起大拇指以告人曰："这隔壁人家的钱，是用了我们祖宗的本钱去孳生的；我们祖宗原是大富翁哩！"你们听了这话，可要不要骂他无耻？——何况隔壁人家的本钱是自己的，并不是盘了这位乞丐的祖宗的钱呢？

随感之五一

有一位中国派的医生说："外国医生动辄讲微生虫。其实那里有什么微生虫呢？就算有微生虫，也不要紧。这微虫我们既看不见，想必比虾子鱼子还要小。我们天天吃虾子鱼子还吃不死，难到吃了比他小的什么微生虫，倒会死吗？"我想这位医生的话讲得还不好。我代他再来说一句："那么大的牛，吃了还不会死，难道这么小的微生虫，吃了倒还死吗？"——闲话少讲。那位医生自己爱拿微生虫当虾子鱼子吃，我们原可不必去管他。独是中国这样医生，恐怕着实不少。病人受了他的教训，去放量吃那些小的虾子鱼子，吃死的人大概也就不少。我想中国人给"青天老爷"和"丘八太爷"弄死了还不够，还有这班"功同良相"的"大夫"来帮忙，也未免太可怜了。但是"大夫"医死了人，人家不但死而无怨，还要敬送"仁心仁术，""三折之良"，"卢扁再世"的招牌给他，也未免太奇怪了。

中国人自己说自己身体构造，很有些特别：心在正中，一面一个肝，一面一个肺，这三样东西的位置，和香炉蜡台的摆法一样；这已经很奇怪了。此外还有什么"三焦"，什么"丹田"，什么"泥丸宫"，什么"气"。身体里还有等于金木水火土的五样东西，连络得异常巧妙。所生的病，有什么"惊风"，什样"伤寒"，什么"春温"，"冬温"，还有什么"痰裹火"，"火裹食"。这样的怪身体，这样的怪病，自然不能请讲生理学的医生来医了。

（选自《新青年》第6卷第2号）

青年与农村

李 大 钊

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

俄国今日的情形，纵然纷乱到什么地步，他们这回革命，总算是一个彻底的改革，总算是为新世纪开一新纪元。我们要晓得，这种新机的酝酿，不是一时半刻的功夫，也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他们有许多文人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弃了，不惮跋涉艰难的辛苦，都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有时乘着他们休息的时间和他们谈话，有时和他们在一处工作，一滴血一滴汗的作他们同情的伴侣。有时在农村里聚集老幼妇孺，和他们灯前话语，说出他们的苦痛，增进他们的知识。一经政府侦知他们，或者逃走天涯，或者陷入罗网。在那阴霾障天的俄罗斯，居然有他们青年志士活动的新天地，那是什么？就是俄罗斯的农村。

我们中国今日的情况，虽然与当年的俄罗斯大不相同，可是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除去我们几个青年，举国昏昏，还有那个？

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那些老百姓，都是愚暗的人，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他们里边，有的是刚能自给的有土农夫，有的是厚拥田畴的地主，有的是专作农工的佃户，有的是专待雇佣的工人。他们不但不知道结合起来，抗那些官绅，拒那些役棍，他们自己中间也是按着等级互相凌虐，去结那些官绅棍役的欢心。地主总是苛待佃户与工人，佃户与工人不但不知互助、没有同情，有时也作自己同行的奸细，去结那地主的欢心。农村的教育机关，不完不备，虽有成立一二初等小学的地方，也不过刚有一个形式。小学教师的知识，不晓得去现代延迟到几世纪呢！至于那阅书报的机关，更是绝无仅有。他们一天到晚，只是到田园里去，象牛马一般作他们的工；就是在吹风落雨，灯前月下的时候，有点闲暇，也没有他们开展知识修养精神的机会。从前的村落都有个寺院庙堂，他们也不会利用这些东西，作他们大家聚合的会堂，白白的看着他颓零在荒烟蔓草的田里。村落中也有比较开明一点，大家立个青苗会，在庙堂中觅个会所，也不过听那些会头们、绅董们一手处理，有了费用，就向老百姓们要；用去以后，全没什么报销。世界潮流已竟到了这般地步，

他们在那里，还只是向人家要什么真主，还只是听官绅们宰割蹂躏，作人家的良民，你说可怜不可怜呢？推究这个缘故，都是因为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没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那个的责任？

民主政治的精神进展的结果，扩张选举的声音逐渐增高起来。战后各立宪国，苟想把民主主义做到比前更加充实的地步，至少也要施行普通选举。我们中国将来的选举法，也不能漠视这种趋势，无论所行的是限制选举，抑是普通选举，那选民的生活本据，大多数都在农村。若想扩清选举，使这种新制度不作高等流氓们藏污纳垢的巢穴，发财作官的捷径，非开发农村不可，非使一般农民有自由判别的知能不可。入民国，名义上也算行过几次选举，可是弄得污七八糟，几乎把这个制度糟蹋的没有一点本来面目了。根本的原因，就在农村中没有真是农民伴侣的青年，告知他们那选举的道理，备他们选出的人物。那些运动选举的人都是来自都市，不是在都市中当过几天流氓，就是在都市中作过几天强盗，练习了许多的诡诈手段，积下了许多的罪孽金钱，却来骗他乡里的父老。这些人都靠着选举入了议院。立宪政治、民主政治，那有丝毫的希望？那些老百姓的生活上的疾苦，那能改善？生活上的幸福，那能获享？立宪的青年呵！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只要农村里有了现代青年的足迹，作现代文明的导线，那些农民们，自然不会放弃他们的选举权，不会滥用他们的选举权，不会受那都市中流氓的欺、地方上绅董的骗，每人投的清清楚楚的一票，必能集中到一个勤苦工作、满腹和劳工阶级表同情的人身上。他来到议院，才能替老百姓说话，也就是老百姓说话，他的话才能有无限的权威；万一有种非礼的压迫无端相加，老百姓才能作他们的后援。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底，有了泉源。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在这一方面活动的青年才算是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

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那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那晓得官僚的地位有限，预备作官僚的源源而来，皇皇数年，弄不到一个饭碗。这时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都市上塞满了青年，却没有青年活动的道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到底是都市误了青年，还是青年自误？到底是青年辜负了农村，还是农村辜负了青年？只要我们青年自己去想。

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呵！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你们在都市上天天向那虚伪凉薄的社会求点恩惠，万一那点恩惠天幸到手，究竟是幸福，还是痛苦，尚有一个疑问。曾何如早早回到乡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活，那其余的工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

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识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

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1919年2月20—23日《晨报》

署名：李大钊

（选自《李大钊选集》）

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

（工人不如骡马）

李 大 钊

前天遇见一位由唐山煤厂来的朋友，我就向他询问那里工人的生活状况，这位朋友就略略的把他们的状况述说一点。我今将他的话写出来，供关心劳动问题的参考。

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千人。这样多数工人聚合的地方，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听说有过一次同盟罢工的事情，原因却为着工厂对于一个工人罚了几角钱，一时动了公愤，才联合起来，以罢工为抵抗的手段。但是他们平日既没有什么团结，这回举动，又靡有正大的要求，罢工的时候，系由工头持刀斧在门前堵守，不许进去作工，象这种没有结合的罢工，无意识的罢工，强迫的罢工，自然是没有效果了。

他们终日在炭坑里作工，面目都成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有时炭坑颓塌，他们不幸就活活压死，也是常有的事情。

他们每日工作八小时，工银才有二角，饮膳还要自备。他们有个恶习惯，常常把两星期的工，并在一星期来作。在这一星期中，无昼无夜，不停工作，不睡眠，不休息，不盥漱，不沐浴，把两星期的工在一星期作完，其余一星期，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也靡有供他们别样娱乐的设备。因为他们的工银太低，所以他们必须把数日的工夫，无昼无夜的象牛马一般劳动，才能积得一元半元钱，好去嫖赌。

在唐山的地方，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要五角，万一劳动过度，死了一匹骡马，平均价值在百元上下，故资主的损失，也就是百元之谱。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有二角，尚不用供给饮食，若是死了，资主所出的抚恤费，不过三四十元。这样看来，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了。

唐山煤厂，是取包工制。资本家对于工人不生直接的关系，那包工的人对于工人，就算立在资本家的地位。也有许多幼年人，在那里作很苦很重不该令他们作的工，那种情景，更是可怜。

1919年3月9日《每周评论》第12号

署名：明明

（选自《李大钊选集》）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节录）

蔡 元 培

四十六岁（民国元年），我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两项，却完全不同。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学部旧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改教育部后，我为提倡成人教育、补习教育起见，主张增设社会教育司。

我与次长范静生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那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那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我那时候，鉴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毕业生进大学时，甚感困难，改为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又鉴于高等师范学校的科学程度太低，规定逐渐停办；而中学师资，以大学毕业生再修教育学的充之。又以国立大学太少，规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见一种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这个缺点，直到后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

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俟所研究的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此仿德国大学制）。但是各大学未能实行。

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

我认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迄未实行。而我于任北大校长时，又觉得文理二科之划分，甚为勉强；一则科学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则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所以北大的编制，但分十四系，废止文理法等科别。

我五十一岁至五十八岁（民国六年至十二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民国五年，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要我回国，任北大校长。我遂于冬间回来。到上海后，多数友人均劝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我从少数友人的劝，往北京。

北京大学所以著名腐败的缘故，因初办时（称京师大学堂）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此师生关系，毕业后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竟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我于第一次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云云。于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并提倡进德会（此会为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汪精卫诸君发起，有不赌、不嫖、不娶妾的三条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的五条选认戒），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以渐充实。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腐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而那时教员中能授比较法的，止有王亮畴、罗钧任二君。二君均服务司法部，止能任讲师，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盘改革，甚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鲠生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见，引起求学的兴会。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

那时候，受过中等教育的女生，有愿进大学的；各大学不敢提议于教育部。我说：一提议，必通不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

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默许了。

我于民国十二年离北大，但尚居校长名义，由蒋君梦麐代理。直到十五年自欧洲归来，始完全脱离。

（原载《宇宙风》第五十五、五十六期，1937年12月—1938年1月。选自《蔡元培选集》）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

德国在山东所获权利应直接归还中国①

（一九一九年）

（丙）中国何以要求归还

一、胶州租借地，包括胶澳及其岛屿而言之，素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拆之一部分，其地之属于何国，从未发生问题。且胶澳租借条约中，本有主权仍归中国之明文。一八九八年之租与德国，实肇始于德国侵略之行为，中国劫于威力，不得已而允之，其情形已详本说帖之甲段。德国在战事前，所有在山东省内之路矿权利，亦即此次让与之一部分。此项权利及租借地之归还中国，实不过依据公认之领土完整原则为公道之一举。若仍举以畀德，或转给他国，是不予中国以公道矣。

二、胶州租借地为山东省之一部分，昔日德人所造、今为日本所据之铁路，自青岛入内地，绵亘二百五十四英里有余者，亦在该省。该省人口三千八百万，皆志节高尚热心爱国之民，为纯粹中华人种，其语言文字及尊奉孔教，与他省人民咸无以异，不特于国籍之原则毫无欠缺，抑亦为备具此项原则之模范，而其志愿殷切，欲其桑梓之得免于德国或他国之凌迫，尤无疑焉。

三、以历史言之，山东为中国两大圣贤孔子孟子所诞生，中国文化所肇始，实人民之圣域。中国崇奉孔教之文儒，每岁跋涉至此，省谒圣迹于曲阜者，数以千计。全国人民之目光，胥集于此。盖中国之发展，此省之力为多，今犹然也。

四、山东省人民稠密，致经济竞争颇为剧烈，以三千八百二十四万七千之人口，聚集于三万五千九百七十六方英里之地面，衣食之源，不外农业，谋生自非易事。盖人口之多，几与法国相埒，而地面之广不过四分之一，其不能容纳他国羡余人民，亦已明甚。此地而创立他国特殊势力范围或特别利益关系，则除居民横被朘削外，无他结果也。

五、不宁惟是，山东一省，备具中国北部经济集权之要则。其人民之众，可增外货之畅销，矿产之饶，亦利于实业之发展。抑尤有重于此者，则将来胶州一湾，必成为中国北部外货输入土货输出之第一要路是也。数百年来，胶州久为山东省之重要商港，该省货物取道于十二世纪所辟之运河而至此处，与内地最重要之商场曰潍县者相联络。虽胶澳北部为积淤所塞，胶州今不复为海市之城，然青岛今为山东省之海口，其所坐落之沿岸地位，正与胶州相同，复为新辟商务孔道如青胶潍济铁路者所挹注，而此路又与京津宁沪铁路会于济南，且处于胶澳之边。胶澳地势屏蔽，为寒风所不及，经年不冻，非天津之北河可比。故此新立商场，实足以邀截中国北部全境之商务。职是之故，植立外国势力范围，足以危害国际商务及实业

① 此件摘自中国全权代表在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的（丙）、（丁）部分，该说帖系外交部1919年5月1日函送司法部的印件。

者，莫甚于山东，维持门户开放主义以普益各国者，亦莫利于山东，而最能维持之者，则莫过于中国也。

六、以形势言之，胶澳为中国北部门户之一，胶济铁路至济南而接津浦，可以直达北京，实足以扼自海至京最捷之一途。尚有一途，即自旅顺大连至奉天而达北京之铁路是也。中国政府为巩固国防计，益以他项理由，久欲杜绝德人之盘踞青岛，今幸得英日联军驱而出之，中国深愿留此重地于自己掌握也。

七、就各方面审察之，胶澳租借地以及附属权利之问题，止有一法可以满意解决。苟平和会议以此地及铁路等权归还中国，则不特德国肆意横行之罪恶借以矫正，且各国在远东之公共利益亦借以维护。山东人民感觉灵敏，其于外人之侵入桑梓，以图政治经济之集权，乃所厌恶，且不惮表示其厌恶之意。德人之盘踞胶澳，侵入山东，固其所痛恶，即今日共战之友邦，暂时占据该租借地与铁路，亦其所不喜。观省议会商会之抗议可知也。他省人民，亦同此感。政府防范人民使其表示反对止于抗议，不进而为更剧烈之行动，颇非易事，可见其于此问题感情之深矣。设不归还，则不特中国与将来掌握该租借地及铁路暨他项德国权利之国，必生龃龉，而山东人民与该国人民之间，必且尤甚。既与攻击青岛时宣言巩固东亚长久稳固和局之用意，难以相容，亦与英日同盟之宗旨所谓保中国之独立完整，守各国在华商工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以全各国在华之公共利益者，亦不相符合矣。

（丁）何以应直接归还

中国政府陈说各项理由，以明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及附属权利应完全归还中国，既不含有日本向德国索得租借权及铁路权之后将不肯交还中国之意，尤无疑虑之心，中国对于日本保证之声明，固深信不疑，所以注重于完全归还中国一节者，不过欲引人注意于此举之为根本上之公道而已。

一、抑归还之法，厥有二途：即直接归还中国与间接由日本归还是也。于此二途，中国愿择其直接者。其理由之一，即取其程序简单，不致滋生枝节。盖一步所可达者，自较分作两步为易也。且中国从诸联盟国与共战国之后，得与于克捷之光荣，若向德国迳直收回青岛及山东权利，则足以增我国家之威信，而联盟国与共战国敌忾同仇，以维持之正义与公道之原则，亦从此而益彰矣。

二、中国之请求直接归还，非不知日本将德人驱出青岛时所受之牺牲与其所损失之生命帑款，中国政府、人民于日本海陆军队英勇慷慨以助邻国之举，实深铭感。而英国于欧洲战事危急之时，仍能力助此举，亦所深荷。即其他联盟国与共战国之军队，与敌人相持，使不得分兵以援远东，而延长是处之战事，中国政府、人民亦不能忘其惠。中国鉴于山东人民当攻陷青岛时，因联军之行动，受种种苦楚牺牲，愈觉此等援助举动之可感。然感激虽深，中国终不能承认其领土之权利可因他国之战争，彼时身处局外而辄受影响也。且日本固宣言战争之目的在使远东和局不为德人所危害，目的既完全达到，则其虽有所牺牲，而食报之丰已无以加矣。

三、中国政府亦非不了然于日本四年以来对于此项租借地及铁路等项权利处于军事占领者之地位，然徒因战事期内之占领，不能遂获得所占土地或产业之主权。总之，不过暂时办法，必须经平和会议，综计诸联盟国与共战国之普通利益而追认或取销之。此次日本军事占领租借地与铁路，自中国对德奥宣战之日起，即为反对共战国权利之举，而其占据铁路，则

自最初之时，即已不顾中国之抗议矣。

四、中国固曾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与日本订立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其第一条云：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然应忆此约与此外关于满洲东内蒙之一约暨多数之换文，皆发生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无故向中国提出之二十一款要求。中国政府本所不愿，经日本送递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以内为满意之答复，始勉强允之。无论当时订约情形，在中国极为痛苦。总之中国政府视之至多不过为暂时之办法，必须经平和会议为最后之修正。因其所涉首要问题，本为战事所发生，故舍最后之平和会议外，不能为满意之解决也。即较近所订关于胶济铁路暨昔日让与德国他项路权之合同，中国对之，亦同一看法。

不特此也。就以上所引条文而细审之，可见日本并未获得关于山东租借地与铁路暨他项德国权利，不过得有保证，谓所有关于德国权利利益让与之处分，倘经日本与德国协定，中国即从而承认之耳。此项保证，自系设想中国始终中立，不能参与最后之平和会议而言。若加以他项解释，则势必指日本为另有用意，与其所明白宣告，如英日同盟条约，所谓愿保中国之独立等事者，不能无悖。盖苟不认中国有宣战及列席平和会议之权，即不啻不认其政治独立所发生最要权利之一也。中国既入战局，则该约所设想之情形，即已根本改变。故依据事变境迁之法理，此约已不复有效。

五、进而言之，中国既于宣战布告中，显然声明所有中德两国从前所订一切条约合同协约，皆因两国立于战争地位，一律废止，则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之约，德国因之而得拥有租借地暨铁路，以及他项权利者，当然在废止之列。而德人所享之租借权利，按法律言之，即业已回复于领土之主权国，即出租该地之主权国。易言之，即德人业已丧失其租借地等各项权利，故已不复享有所谓关于山东省之权利，可以让与他国者也。即谓租借之约，不因战事而废绝，然该约中本有不准转租之明文，亦未见德国能转租其他〔地〕与他国也。至铁路一节，则按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一日之中德胶济铁路章程，本有中国国家可以收回之规定，即含有不准转让与他国之意。

中国鉴于上列各理由，深信平和会议对于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关于山东省之他项德国权利之直接归还，必能认为合于法律公道之举。苟完全承认此项要求，则中国政府、人民对于诸国秉公好义之精神，必永永感激无涯。而对于日本，必且尤甚。此一举也，不特日本与诸友邦所愿维持之中国政治之独立与领土之完整，借以巩固，而远东之长久和局，亦借此新保证而益坚矣。

〔北洋政府司法部档案〕

陆征祥报告山东保留案遭拒电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收法京陆专使电　六月廿五发，第四十二号，七月一日到，第二三九一号。

四十二其二分函各国，谅贵见亦以为然。吕云：此层似贵代表团欲于签字时，在全案上

实行一番不满意之表示，自不如先将各函送会，当代为分送。并云：条约签字，即敌人亦有抗议及保留之意，彼迫于众议，已允完全签字。顾使云：此系对待敌人之办法。吕云：此不过论其事实，顷所谈各节当为报告会长。本日午后六钟，吕秘书长又招顾使往晤。吕云：我素与中国抱关爱之怀，惟今日有不得已之事，会长嘱告贵使，保留一层实不能，无论何国均无此举。此项约内只有签字与否两层办法。顾使云：会长之言是否专指译文在约中保留者而言。吕云：系指各种保留，现将接见南美洲某国代表，亦即以此言同样声明。并谓：迫于事实，致贵使之所请，未能给予美备之答复，殊为抱歉。顾使云：可否请将仍照贵秘书长所告之辞备函通知。吕云：当即代恳函达。以上情形各使闻之，均极失望。即晚八钟余，顾使又面谒美总统，略陈政府苦衷，并告以国内人民对于山东问题，主张绝对不能签字，异常愤激。本使等因与协约国对敌一致之关系，所以退而作签字保留之情，并请日间见和会秘书长所谈，略述一过。美总统云：此事中国人民不能满意，予所深悉。至于约上保留办法，予亦不主张。然于必不得已之中，似可另筹一转圜之法。中国可备一正式通告或宣言，即声明中国在和约中关系山东问题，将来于相当之时间、适宜之机会，有请求继续讨论之权。但予非公法家，究系手续如何，请贵使于明晨晤兰辛外部一商。且本日高等会议时，予亦曾以山东问题中国不满意一层，当众说明，并嘱法外部与贵使接洽，另筹一办法协议，瞬息间，法外部即可电招贵使。又云：予曾向兰外部将三国会议中，日人所承允之言，备一节略，请日本代表签字证明。惟此事兰外部现在办到如何地步，尚未来复。顾使称谢而散。余续电。祥。二十五日晚。四十二。

〔北洋政府督办边防事务处档案〕

在巴黎会议对于胶澳问题中国提出辩论之详情[①]

（一九一九年七月）

…………

我国此次以参战关系参与和会，政府、人民均以中德条约既以参战之结果全行解除，而交还胶澳条件之规定，又系出自日本武力之胁迫，是以主张请求各国公决，胶澳应由德国直接交还中国。本年一月廿七日，日本专使在会要求将胶济铁路及其他利益为无条件之让与，至交还中国一层绝不提及。经顾使在会提出辩论，说明胶澳租借地及其附属一切权利，应由德国直接归还中国各理由，各国颇表同情。此后，因法总理被刺，会议稍有停顿。日本乘机活动，并将中日协定以及日英、日法、日义之密约提出。经各专使竭尽心力，向英、法、美、义各当局分别接洽并分送说帖，说明中国要求之理由。各国均以此项问题，中国方面理由虽极充足，无如中日既有协定于前，而英、法、义三国于战事紧急时期，对于日本亦有承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之密约，对于中国请求，遂不能有完全主张公道之表示，而为有力之协助矣。

自此项问题发生以来，政府与各专使，始终一力坚持，以期达到最初期望之目的。而日政府态度亦极为强硬，日本公使屡有日本不能受他国支配之表示。此后，巴黎方面虽无正式会

① 此件系北洋政府外交部所编《巴黎会议于关胶澳问题交涉纪要》之第一部分，沿用原标题。

议机会，而各专使又向各国当局竭力陈说利害，告以山东为我腹地，青岛海口与胶济铁路，均为国际商务利器，若不完全交还中国，不特有碍我国前途，即各国在华利益，亦不免同受影响。英、法、义虽表同情，终以彼与日本订有密约之嫌，不能明示赞助，美国遂有孤掌难鸣之势。至四月十六日五国会议，美代表提出折衷办法，即由德声明抛弃权利，交五国公同暂收。日本专使仍未同意。

嗣日本专使要求将胶州问题在草约内专列一条，经会中以四领袖名义来邀我国专使出席，由英总理提出两层办法：一、按照中日协定条件；一、使日本继承德国权利。我国专使表示反对。政府亦以草约内如有此项专条，不得签字，电知专使在案。旋据专使报告：四月二十四日提出说帖，分送美总统及英、法总理，告以所提两层办法，于中国均有危险，并讽以英日、法日所定密约，与现时会中情形实有不同之点。时义国代表以与会中意见相持，相率离会，日本方面态度益为强硬，颇有追踪义国脱离和会以为要挟之势。本月七日，接专使来电：四月三十日三国会议已决定调停办法如下：德国前在胶州及山东所有各项权利，一概放弃，交与日本。日本自愿担任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仅将前允德国之经济特权暨在青岛设立特别居留地权保存之。各铁路为保护营业安宁起见，可用特别警队，以华人充之；各路所选日本教练人员，由中国政府委派，日本军队应于一定期间撤退。并称国际联盟对于领土完全及政治独立已设保障，此后中日两国关系，即全归此项保障范围。等语。

嗣又续据专使五月一日电称：我国对于议决情形声明不能满意之外，应否另有表示，不能不加以熟审。而表示之法不外三端：一、照义国办法，全体离会回国；二、不签字；三、签字，而将该条款声明不能承认。第一法，我国情势与义种种不同，自难仿办。第二法，胶州事虽不满意，然而有对德他项关系，如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辛丑赔款、保留关税自由及赔偿损失等类。和约一日不签，则对敌永立于战争地位，日后中、德直接订约，是否较有把握，殊属疑问。第三法，签字，而声明该条款不能承认。查本约多为对德问题，若列强恐中国声明办法为敌国利用，不能允照，亦为意中之事。且三国决议办法中，如交还山东半岛句上声明连同完全主权，又日本军队撤退及一再声明日本所得权利，专为德人前得之经济权利，足见其政治权利一方业已当然不能再有侵犯，较之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一八年中、日各约文条款，究尚稍有修正加以限制。倘我于和约中声明不认，则我国两次与彼所签之约是否可以认为作废？否则舍彼留此，孰为有利。且三领袖居中周旋商榷数日，究亦不无善意，我仍不认，于国际感情能否无碍，均不可不加审慎。等语。同日又电称：英外部电邀中国全权前往，经施、顾两使往见。英外部称：三领袖特嘱与贵国全权接洽山东问题议决之大致办法：政治权交还中国，经济权给与日本。经两使告以议决详情，未准会中通知，若照所闻，中国实为失望。未知究竟详情如何，并询交还一层及军队撤退有无期限。彼称：山东半岛，日本向三国会议切实声明，交还中国，并担保不侵损开放门户主义，不过日本得设居留地。至期限一层，似乎未定，但日本之声明极为切实云云。嗣两使要求将会中记录及关于本问题之条文通知，彼称：此为会内所记之件，未审能否通知等语。二日又电称：会中迄未将记录及草约条文通知，当先将失望情形，向报界发表，并拟俟大会宣布草约时，先行正式抗议，预留日后签字或不签字之余地等语。三日又电称：探得和约草案所拟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第一条，凡德国所与中国订立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之约暨此中关于山东省之一切文件，其尤著者，如胶州土地之权，名义或特权以及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皆由德国让与日本。关于胶济铁路及以

东支线暨一切种种附属物品，以及车站、该路不动产、物产、矿产、建筑与开矿所需之物料，凡德人所有权利，暨连属之一切权利、特权，现为日本所得，继续为日本所有。德国国家所有之青岛至上海及青岛至烟台海底电缆，及连属之一切权利、特权，现亦为日本所得者，继续为日本所有。一切负担概行蠲免。第二条，德国国家在胶济土地内所有之动产及不动产之权利，因德国直接或间接出资举办工程或发展之故而有价值，现为日本所得者，并继续为日本所有。一切负责〔担〕概行蠲免。等因。以上各情，比连日所闻情形更为偏苛。对于中国方面，除英外部面告外，屡索会议记录，迄未交到。据闻草案内何以于交还中国一层不提只字，因日本以信用问题全力争持，一若三国必欲加入此层，即对于日本为无信用，此层于国际关系自更重大，因竟照日本之愿。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现除再尽力设法外，详加讨论，当然不能签字。惟有三端关系，亦不能不加熟审。等语。并胪述不签字之弊三端，与一日电略同。四日又电称：连日迭向各方面接洽，直接间接设法，务请将条文内添加交还中国一层，仍难如愿。并探闻日本于三国会议迭次坚持之后，竟向美、法两总理致一最后通牒，其措词之严重，至有英、法应遵守一九一七年密约，维持关于山东各项条款，即使因此与美总统决裂，亦所应为等语。现和约草案，提交德人以前，协商各国有须先自签字之说，为期甚迫。各方意见，不签字或签字而提出条款声明不认等法，均属难行。请将对于签字与否，如何决定情形迅速电示。等语。同日又电称：经往晤法外交总长，该总长当将条文概略交阅。并称：日本现在三国会议声明，将来三国政府自可保障。经告以无论如何，亦须使中国稍有文据，否则，英外部虽有是言，日本仍可不认。务必于条文内加入交还中国一层，并将抗议书钞稿交彼一份。彼称：英外部之言，极有力量，日本断难不认。至追加条文一节，实难办到，但我必为转达克总理云云。等语。六日又电称：中国代表已向三国会议提出抗议，大致先将英外部五月一日谈话所称议决办法，并日本代表向三国会议确切声明行使此项权利时，必恪守开放门户主义，并从速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各节略叙。次述中国代表及全国人民对此深切失望，不能不提起抗议。次又述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一八年条约不能作为根据各理由。并云此次所拟解决办法，既云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归还中国，则归还之事，何必先移交日本，而俟其自愿担任归还，此中情形实不明了。最后并称，中国此次列席和会所倚仗者为威大总统一九一九年一月八日宣示国会之十四原则，及嗣后历次宣示之各原则。此等原则，固尝为共同敌德之各国所正式承认者，中国亦倚仗各国以彼此顾全荣誉之精神，辟世界之新时代，以创设万国和会，而中国尤所倚仗者，则以所争之事，无不平允公道，今结果如此，实为痛切失望，中国代表职务所在，不能不正式抗议云云。等语。

五月六日为通知对德和约草案召集协约各国大会，我国方面，由陆、王二专使出席。对德和约草案共分十五章，关于中国山东问题条文，如陆使三日电，竟无增损。陆使因宣言：中国代表团对于三国会议所拟关于胶州及山东问题之办法，不得不表示其深切失望之情，深信中国全国人民，必为同一之失望。所拟规定，似未顾及法律公道及中国之安宁。现中国代表团，业已向三国会议提有正式之抗议，反对其所拟之办法，深望得以修正。倘竟不能如愿，自今以往，本代表团对于上述条款实有不能不保留之义务，并请将声明列入记录。会长允为照列。二十日准驻日本庄代办电称：内田外相对于还附青岛问题有半公式之声明。略谓：帝国对支方针，本以公正共助为义，前期议定既已声明，此次山东问题，当然恪守公法，将山

东半岛及完全主权还附中国。等语。二十一日又准陆使电称：得英外交总长复函，于日本将胶澳租地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一层，语均切实。并有深盼中、日两国有识之人，均以此为然。等语。

此后迭准专使来电，在会仍坚持保留，并于五月二十六日正式致函会长。各等语。

附和约内关于山东之条款

第一百五十六款　德国允将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六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德条约所规定胶澳租界暨铁路、矿山及水底电线等项与其他中、德迭次所订关于山东之各案，先后所规定德国享受之种种权利及所有权或特权，完全让与日本。尤以一八九八年中、德胶澳条约所规定者为最要。至德国对于胶济铁路及其支路，所有一切权利，连同附属各该路之种种财产，如车站、机厂、工场及车辆，并矿山矿场与兴办各矿之一切材料，及附属于各该项财产之权利及特权，现已为日本所取得者，仍归日本继续享有。至德国之国有胶沪、胶烟等水底电线及所有附属于各该电线之权利及特权暨财产，亦一律归日本所得，无庸付费，并无附带条件。

第一百五十七款　所有胶澳租界内德国之国有动产暨不动产以及关于该租界德国或因自行兴办各业，与因直接或间接曾支出经费所应得之权利，现已为日本取得者，仍归日本继续享有，无庸付费，亦并无附带条件。

第一百五十八款　自本约将来施行之日起，限三个月期内，德国须将关于胶澳之民事、军事、财政、司法及其他行政之档案、簿册、契据暨各种详图及公文，均移交日本。至上开之一切文件，无论现存何处，务须如期交出。至关于以上两款所开德国之权利及所有权或特权之各条约或合同及所订各办法，所有其中要点，德国亦须于该期限内，详细通告日本。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北京国民外交协会为青岛问题定五七召开国民大会电

（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

分送各省商会、省议会、教育会、商会、暨各团体、各报馆，上海、汉口商会、各报馆、各团体共鉴：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消息极紧。查日本所借口之民国四年五月廿一日〔款〕之约，系以威力胁迫。又民国七年九月关系胶济铁路之换文，顺济、高徐铁路之草约，并非正式订定。我国民决不认为有效。本会定于本月七日之廿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并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并希鉴示。北京国民外交协会。江。印。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公署档案〕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北京学生界宣言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所发）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险，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已有由五国公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黯天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望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上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公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独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讲，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上〕）

〔附〕 教育部严禁学生游行集会咨

（一九一九年五月五日）

咨 第八五七号

教育部为咨行事：昨日午后一时，突有本京公私立专门以上学校十三处，学生约二千人，齐集天安门外，对于青岛外交问题，开会演说。继复游行街市，麇聚赵家楼曹宅地方，纷扰滋事，实属狂热过度。当经本部严切通行直辖各校及私立专门以上各学校训令内开：查学生在校修业期间，一切行为言论，自当束身法则之中，不得轶出规范以外，乃本日午后一时，因外交问题，本京各校学生聚集一二千人游行开会，竟至酿成事端，殊堪惊骇。本部为维持秩序，严整学风起见，用特切实通令各校，对于学生，当严尽管理之责。其有不遵约束者，应即立予开除，不得姑宽，以敦士习而重校规，仰即遵照。等因在案。相应咨行贵部，请烦查照，一体令行部辖各校可也。此咨

内务总长

教育总长 傅增湘

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五日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两个和会都无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

陈 独 秀

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那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那法、意、日本三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因为不称他们侵略土地的野心，动辄还要大发脾气，退出和会。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选自《每周评论》第二十号，署名：只眼）

上海学生联合会宣言

（一九一九年五月）

上海学生联合会宣言（一）

（5月9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时所发）

上海男女各学校学生，谨以最恳挚最悲痛之声宣告于中外曰：天祸吾国，外迫于强邻，内残于国贼，数年之中，外交迭挫，内政日纷；荏苒侵寻，至于今日，而山东问题，遂以完全失败见告矣。呜呼痛哉！青岛乃海滨要塞，山东为文化渊源，此而不保，国于何有。国人奔走呼号，声嘶力竭，以及今日，而终于不能挽回。既痛吾民能力之薄弱，而追原祸始，尤不能不切齿于奸逆之无良。北京同学蒿目惊心，是用慷慨奋发，而有示威之举。对内对外，皆所以表示真正之公意。凡我国民，固心同此理也。而凶焰方张，横加拘系，甚至蓄意破坏教育机关，倒行逆施，至于此极。默观大局，既愤且悲。呜呼！执政诸公暨全国同胞，听兹一语。人之所乐，为其有生，生命之价值，在光荣与幸福。今中国将沦于异族，政府与吾民亦同为含羞忍垢万劫不复之亡国奴耳。吾曹纵不惜生，自侪于牛马狗彘，即死亦何以对先烈之神灵。政府诚独何心，必欲代中华民国之逆子泄愤以为快。吾民又诚独何心，当此一发千钧之际，犹不奋臂速起万众一心，以求争回此万一之光荣与幸福。学生等读圣贤书，颇闻大义，誓与中华民国同生死。谨以是日共组学生联合会，期合全国青年学生之能力，唤起国民之爱国心。用切实方法，挽救危亡。远近各地，请即日响应。互通声援，以为全国学生自动的卫国之永久组合。自由与公理，为吾人同赴之目标，死生以之，谊无返顾。敬告中外，共鉴存之。

上海学生联合会言宣（二）

（5月15日发）

上海学生联合会谨宣告政府暨全国同胞曰：溯自外交失败之耗传来，国本震摇，群情骇愤。北京学生目击奸人卖国之行为，慷慨奋发，而有列队诘责曹章之举。政府鉴于清议之激昂，宜知所以自省。乃始则坐学生以纵火伤人之罪，横加拘辱；继则徇奸人之私忿，假政治之恶势，力抗教育之新潮流。观八日明令，而政府略无悔祸之心，已跃然如见。奸人恣肆，私党纵横，竟欲破坏最高教育机关，摧残士气，遏绝舆论，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蔡先生被迫，因而出走。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方今国中恶劣之空气充满四隅，惟赖青年学者除旧布新，发聋振聩，以期进与世界之新文明携手。蔡先生文章道德，中外推崇，自长大学，全国学界，始有发皇振厉之气。乃一二顽冥奸佞之徒，竟不容思想界有一线生机，竟不容世界潮流有一分输入。夫蔡先生去则大学虽存犹死，大学死则从此中国之学术思想，尽入一二有威权者掌

握之中，而学界前途遂坠于万劫不复之境。岂惟蔡先生一人，北京大学一校之关系，中华将来之文明，实将于此决其运命。学生等一息尚存，不能坐视学术之日即沦亡而不救。今与政府约，请自今日始，于一星期内，作正当明确之表示，维持蔡校长之地位，与大学之尊严。政府同为国民，丁兹危难，所愿洗心涤虑，改弦更张，以慰吾人之望。若满一星期，犹无满意之表示，则誓筹最后之对付。惟政府实图利之。民国八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宣言。

上海学生联合会罢课宣言（三）

（5月26日发）

呜呼！事变纷乘，外侮日亟，正国民同心戮力之时。而事与愿违，吾人日夕之所呼吁终于无毫发之效。前途瞻望，实用痛心。本会同人谨再披肝沥胆，以危苦之词，求国人之听：自外交警讯传来，北京学生实当先觉之任，士气一振，奸党寒心；义声所播，咸知奋发。而政府横加罪戾，是已失吾人之望。乃以此咎及教育负责之人，致傅蔡诸公纷纷引去。夫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迭与日本借债订约，辱国丧权，凭假外援，营植私利，劣迹昭著，中外共瞻，全国国民皆有欲得甘心之意。政府于人民之所恶，则必百计保全；于人民之所欲，则一网打尽。更屡颁文告，严儆学生，并集会、演说、刊布文字公民所有之自由，亦加剥削。是政府不欲国民有一分觉悟，国势有一分进步也。爱国者获罪，而卖国者称功，诚不知公理良心之安在！争乱频年，民亦劳止，政府犹不从事于根本之改革，肃清武人势力，建设永久和平；反借口于枝叶细故，以求人之见谅，继此纷争，国于何有。此皆最近之事实，足以令人恐惧危疑，不知死所者。政府既受吾民之付托，当使政治与民意相符，若一意孤行，以国家为孤注，吾民何罪，当从为奴隶。呜呼国人！幸垂念共和国家，以人民为主体；国家之事，人民当负其责。方今时机迫切，非独强邻乘机谋我；即素怀亲善之邦，亦无不切齿愤恨。以吾内政之昏乱，我纵甘心，人将不忍，生死存亡，近在眉睫。岂可再蹈故习，常依违容忍慕稳健之虚名，速沦胥之实祸。夫政府之与人民，譬犹兄弟骨肉。兄弟有过，危及一家。固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终不见听，虽奋臂与斗，亦将不辞。何则？切肤之痛在身，有所不暇计也。吾人求学，将以致用。若使吾人明知祸机之迫不及待，而曰姑俟吾学业既毕，徐以远者大者贡献于国家，非独失近世教育之精神，即国家亦何贵有此学子。吾人幸得读书问道，不敢自弃责任，谨自五月二十六日始，一致罢课。期全国之民闻而兴起，以要求政府，惩办国贼，为唯一之职志。政治肃清，然后国基强固，转危为安，庶几在此。同人虽出重大之代价，心实甘之。所冀政府彻底觉悟，幡然改图。全国同胞，亦各奋公诚，同匡危难。中国前途实利赖之。同人不敏，请任前驱，戮力同心，还期继起。民国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学生联合会。

天津学生罢课宣言

（一九一九年五月）

外交失败，国人同愤。北京学生痛国祚之沦亡，悲主权之丧失，是以宣言请愿，内革祸源，外解茧缚；欲挽狂澜于既倒，拯国土于将倾。何敢故事要挟，有意为难。此中苦衷，谅诸同胞早已洞鉴。学生等见中国灭亡无日，于是大声疾呼，愿弃宝贵光阴，稍停学业；讲演撰报，唤醒同胞。周日以来，颇获效果。学生等方幸中国犹可救药，不期二十五日总统命令，二十八日教育厅布告，频来相逼，阻我言论，挫我忠义。我学生既非祸国暴徒，又非奴性国民，是以不得不作二次宣言，以解大总统、教育厅之惑，并诉苦衷于全国父老兄弟之前焉。学生等罢课举动，虽始由青岛问题失败，然其因多矣。学生等欲图永久之策，不得不作根本解决。故游行演说，散布传单，所以警醒国人耳。是以发表言论，理当激切，既无逾越范围之举，复无煽惑之言。盖煽惑者，类皆借假夺真，以非乱是；使地方治安，国家命运，陷于危殆，此皆学生等之所痛恨，朝夕欲得而诛之者也。学生等今日举动，虽涉及地方，然亦国民所乐从，安有违警之可言哉。试问地方之治安为重，抑国家之命运为重？国人明达，谅共鉴诸。况学生等何尝乱及地方耶？且自手无寸铁，欲诛奸而且不得，岂能作乱乎！北京警厅既已拘捕学生，禁止救国。学生等为国家前途计，不胜惶恐之至。夫罢课救国，似与教育相离，然亦有不得已苦衷在也。盖学生等愿与教育作暂时之离，不愿为长日之离；愿于未亡之前，作顷刻之离，不愿于既亡之后；为永久之离。试问亡国之后，尚有所谓教育乎！彼时之所谓教育云者，亡国之教育也，奴隶之教育也。既受亡国奴隶教育，恐国耻国仇犹不知，尚有所谓雪耻复仇之智力乎。此学生等所以不忍作秦越之视，而为哀号之鸣者也。况学生等未尝与教育离也，不过牺牲暂时之光阴，共策救国之方针。教育既不可以烟消而雾灭，国家独可令人鱼肉乎。似此危急存亡之秋，倘国民坐以待毙，国家前途，尚有望哉。试问稍具心肝者，谁能忍之！学生等力弱能薄，无权无兵，虽不敢涉及政务，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此次罢课，原祈政府诸公曲谅苦衷，一致对外。又恐国人之未醒也，作泣泪之演讲，撰哀号之报刊，以壮我民气。在上者自当养我之气，竟我之志，岂忍抑而挫之耶。今政府不察，阻我爱国之举动，禁我集会之自由，拘捕我学生，使亲厚者所痛心，而为见仇者所快也。大丈夫作事，贵乎特立独行。依赖无断者，乃我中国之恶根性也。设良心所发，公义所激，苟不害于同胞，不祸于国家，为之可矣，不必疑也！此北京各校罢课待命之所由来，亦即学生等信而然之，同时罢课无疑者也。然既罢课矣，可宝贵光阴已虚度矣。然学生等以地方人民之付托，家族亲友之期望，不敢即以大总统之严令，教育厅之布告以消我爱国志气，止我爱国举动，使国已被卖而民犹不知，身已奴隶而犹自荣也。呜呼！试绎近世界史弱国之所以亡者何耶？埃及之亡，借款条约亡之也。朝鲜之亡，奸人卖国亡之也。今我中国二者备矣，国已亡矣，所未亡者民气而已。苟复欲横挫民气，则国家复何所望哉。学生等于大总统之命令，教育厅之布告，为国家存亡，故不能完全遵行。而其中苦衷，敬乞大总统、教育厅有以谅之。海内同胞，

亦有以鉴之为幸。总之，学生等所为纯出良心至诚，并不欲求见爱见敬于诸同胞也。本会自成立以来，始终与北京学生取一致行动。现已派代表至沪，组织中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前宣言各项问题，及以后有所提议事项，当均交总会议决施行。以期全国学生行动一致，达我救国目的。至其他光阴学业及发肤之牺牲，皆学生等所不惜也。谨此宣言。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上〕）

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

——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陈　独　秀

国民呵！爱国学生诸君呵！外交协会诸君呵！我们对日外交，差不多十有九分是失败的了！而且我们对日的外交失败，又何止一个“山东问题”！眼前已经是可悲可惨，日后亡国的可悲可惨，更加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无量数倍呵！

是什么没良心的畜生造成我们这样悲惨的境遇！

日本人因为自国的权利欺压我们，这是他们被狭隘的爱国心所驱使的，我们不必怨他。曹、陆、章等亲日派固然有相当的罪恶，但是他们不过是造成罪恶的一种机械，种种罪恶的根本罪恶还不在曹、陆、章诸人，我们也不必专门怨他。

况且曹、陆、章等未必真有卖国的行为，他们如果卖国，政府怎肯让他们都站在重要的地位？

曾记得袁世凯要做皇帝的时候，革命党用炸弹打了薛大可所办的亚细亚报馆，薛大可大叫冤屈。现在曹、陆、章等也受了同样的冤屈。

欺压我国的日本人，为了“山东问题”正在他们国里日比谷公园开国民大会，好几万个人天天闹个不休，他们的政府不曾丝毫干涉，他们是何等高兴？我们被日本欺压的中国人，也为了“山东问题”，想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做政府的后盾，政府却拿武力来驱逐国民，不许集会，满街军警，断绝交通，好象对敌开战一般。日本人看了岂不活活笑死！

若说是恐怕破坏安宁秩序，尽可多派警察监视，也没有事前揣测就要剥夺人民集会自由权的道理。若说恐怕和前回学生一样闹出事来，前回学生集会，被害的只曹、章两人，公共的秩序安宁并没有丝毫扰乱。政府无故禁止国民集会，对于欺压中国的日本，亲善主义固然表示得十足，但是对于被日本欺压的本国的人民怎么样？

曹、陆、章等究竟有没有卖国的事实，姑且不论。但是他们的恶名已经遍传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自己不曾辨明，又不避嫌辞职。政府也不避嫌，仍旧把他们放在重要地位，我真百思不得其解。

汪大燮、林长民都曾经做过政府的阁员，现在也还居政府中有责任的地位，对于卖国党都发过有责任的言论。究竟谁是谁非，政府何以置之不理？

听说司法界因为学生聚众事件，正在搜查证据，预备提起公诉。试问政府官吏有了卖国的评判，检察官有没有搜查证据提起公诉的责任？司法官是否可以在司法独立的美名之下，因私交紊乱国法？

就说二十一条辱国的密约，是日本用兵力迫胁的，试问拿军事协定和济顺高徐的合同，去换军械军费杀南方的百姓，也是日本用兵力迫胁的吗？参战借款和济顺、高徐的垫款，都

不过因为区区日金二千万，便把重要兵权和山东权利轻轻送与日本，这是什么勾当？此外还有许多铁路、矿山、电话、森林，都用贱价卖给日本，到底是何人主持，是何人经手？是不是日本用兵力迫胁的？

甘心把本国重大的权利、财产，向日本换军械军费来杀戮本国人，这是什么罪恶？造成这罪恶的到底是什么人？

国民发挥爱国心做政府的后援，这是国家的最大幸事。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或者可以唤起列国的同情，帮我们说点公道话。人心已死的中国国民向来没有团结一致的爱国心，这是外国人顶看不起中国人的地方，这是中国顶可伤心的现象。现在可怜只有一部分的学生团体，稍微发出一点人心还未死尽的一线生机。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他斩尽杀绝，说他们不应该干涉政治，把他们送交法庭讯办。象这样办法，是要中国人心死尽，是要国民没丝毫爱国心，是要无论外国怎样欺压中国，政府外交无论怎样失败，国民都应当哑口无言。不然便要送交法庭，加上他一个干涉政治扰害公安的罪名。这样办法好极了！好极了！

禁止国民集会，拿办爱国的学生，逼走大学校长，总算对得起日本人了！听说亲日的军阀派还要解散大学、封禁报馆哩！这也未免过于要好了！你们可晓得有许多富于爱国心的国民，现在虽没有象学生这样出头说话，看见你们这样行径，都在那里暗中落泪呵！

曹、陆不过是一种机械，章宗祥更不比曹、陆，他的罪恶，只是他的现职连累了他，此外也没有什么特别积极卖国的大罪恶。国民呵！爱国学生诸君呵！外交协会诸君呵！你们若是当真把这根本大罪恶都加在曹、陆、章诸人身上，实在冤屈了他们呵！

（选自《每周评论》第21号，署名：只眼）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李　大　钊

凡是世界上的土地，只要是世界上知道人的道理的人在那里过人的生活，我们决不把他认作私有物，拒绝他人。但是强盗政府们要根据着秘密外交拿人类正当生活的地方，当作他们私相授受的礼物，或送给那一个强盗国家、强盗政府，作扩张他那强盗势力的根据，无论是山东，是山北，是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承认，都要抗拒的。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

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彩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

威尔逊！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须知这些东西都是将来扰乱世界平和的种子。象这样的平和会议，那有丝毫价值！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

常向我们说和我们有同种同文的情谊的日本人啊！你们把这块山东土地拼命拿在手中究竟于你们民族的生活上有什么好处？添什么幸福？依我看来，也不过多养活几个丑业妇、无赖汉、玛啡客，在人类社会上多造些罪恶，作些冤孽，给日本民族多留些耻辱的痕迹罢了。这话并不是我太刻薄，试一翻日本的移民史，那一处不是这几色人先到？除去这几色人还有什么人？——那背包卖药的还是第一等的——在这等地方的商人、绅士、官吏、军人，也都渐渐丢失了他们的人性，只增长他那残暴、狡诈、嫉妒、贪淫的性质。结果更要巩固国内军阀财阀的势力，来压制一般人民，永远不能翻身。这又何苦呢！

我们历来对外的信条，总是"以夷制夷"；对内的信条，总是"依重特殊势力"。这都是根本的大错。不知道有几多耻辱、哀痛、失败、伤心的陈迹，在这两句话里包藏。而从他一方面，又把民族的弱点、惰性、狡诈、卑鄙，都从这两句话里暴露出来。这回青岛问题，发生在群"夷"相争，一"夷"得手的时候。当时我们若是不甘屈辱，和他反抗，就作了比利也时，也不过一时受些苦痛有些牺牲，到了今日，或者能得点正义人道的援助。那时既低声下气，今日却希望旁人援手，要知这种没骨头没志气的人，就是正义人道昌明的时代，不能自助的人，也不能受人的帮助，况在强盗世界的里面，更应该受点罪孽。我们还在这里天天做梦，希望他人帮助。这种丧失自立性的耻辱，比丧失土地山河的耻辱，更要沉痛万倍！

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班人为卖国贼，恨他们入骨髓，都说政府送掉山东，是我们莫大的耻辱，这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

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政府答应送给他，都还不算我们顶大的耻辱。我们还是没有自立性，没有自决的胆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啊！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

改造强盗世界，

不认秘密外交，

实行民族自决。

1919年5月18日《每周评论》第22号

署名：常

（选自《李大钊选集》）

一封记述"五四"经过的信

编者按：此信是我馆收藏的文物。信的作者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位学生，"五四"运动发生后当年的六月二十一日，他以亲身的经历，生动地向亲属叙述了运动的前后过程，甚有参考价值。〔 〕内文字及标点均为编者所加。

遐山哥英鉴：

久疏问候，抱愧良深。顷接华函，不胜感激。近日京中之事，弟之所以迟迟未报者，恐吾哥悬念耳。近来事已可告一段落，而吾哥由报中已知之，则弟当详细情形据实报告。如家姊未知详情，可勿叙述，以免悬念。而已知者祈详细一说，庶可稍安耳。

民国四年五月七日，日本无理要求二十一条款，俱与中国存亡有关系，政府畏其强硬，不得已承认之。故五月七日为中华民国国耻纪念，于今四年矣。今者欧战告终，已开和平会议。吾国被德国前所夺去之青岛，当然归还中国，而日本欲继承德国之后。夫青岛为山东咽喉，山东又为南北之要道。倘一旦青岛入于日人之手，则南北隔绝，中国必亡。故青岛之存亡，即中国存亡之问题也。欧洲和会既开，吾国专使力争青岛归还中国，不准为日人所夺。而日人以借口密约，必欲得青岛而后已。考密约原因由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银行总裁陆宗舆等朋比为奸，借日款饱私囊，身居显职，置国家于不顾。此等所谓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但彼等势力比大总统大，故虽有爱国之士，俱敢怒而不敢言。弟到京之后，于今两载，心中愤怒不可言状。盖国之不存，家亦不保，国家俱亡，身也焉附？况今之亡国与古不同。古者，一代兴，一代灭，所谓楚得楚失同是一家人；今者，国家若亡，非灭种不止，至于做奴隶牛马尚小事耳。彼卖国贼弱〔辱〕国丧权，只图一己之利，同学等每怀思及，靡不痛心疾首者也。至今年五月，欧洲和会将签押，将青岛为日本所有。加以国耻纪念日（五月七日）亦至，于是同学心中之火一发而不可遏。遂于五月三日与各校联络，谓现在救国非学生不行。夫学生本无势力，但合群为之，所谓群策群力，虽不成亦听天命可也。与其为亡国之奴，不若为民国之鬼。首先提议先将交通总长、驻日公使等卖国贼打死，然后再作外交后援。议决后，即于下午一句钟，会集各校学生（共三千余人）于天安门（都门），往交通总长家。而曹贼知势不好即逃，惟章宗祥（驻日公使）尚在，遂大肆殴打。本欲将他打死，后因不能认明此贼是否章宗祥，故留他一线生命。方群打章宗祥时，忽然屋中火起。少息，而步兵、马队、警察、消防队星罗齐集，学生遂各散去。时被捕者共三十二人。弟见机而作，尚未被捕，而幸免者甚险。自后，各校遂组织学生联合会，一面将三十二人要求释放，一面讨论进行事宜。被捕同学三十二人，吾校之被捕者八人。各校长、教员均与学生联合一气，共同进行。遂上书总统：第一不准签字（青岛）；第二将交通总长等卖国贼惩办。一方面自己发布传单、印刷物等，一方面四出讲演。后京中下令戒严，不准学生讲演发布传单。

而学生不理，仍旧继续进行。第一日被警察捕去者十余人，学生始终不怯；第二日被捕者数百人；第三日数千人。警察所、拘留所最多不过容积数十人，彼等遂异想天开，将大学讲堂为牢狱，然学生终不怕。第四日全北京各校学生四出讲演，警厅没有法子，拘也不能拘了。即拘去之人吃饭须警所出钱，而饭钱每人每日只〔至〕少二角，故警所经费吃也吃穷了。警察总监遂见大总统要求办法，大总统亦无法。遂与教育部商量，并借经费与学生之被捕者吃饭。教育部说：学生再高尚可贵，谁叫你拿人？警察厅没法，遂请被捕学生回校。而被捕学生云：你前既捕，后无故放我们，视学生如儿戏，不肯回校。日后，警察所再三哀求，遂议决须有三事办到后，始肯回校。第一，须政府向学生谢罪；第二，将卖国贼罢免；〔第〕三，青岛不签字。当是时也，各省罢市、罢工、罢课者络绎不绝，电报之来吾校，表示赞成取一致行动者，不可枚计。政府不得已始肯应允，学生等遂欣然回校。目下事虽告一段落，而后患正未已也。弟今年决不回南，暑假期内住在学生团办公处，通信仍高师可也。弟在京一切均自知谨慎小心，请勿锦〔廑〕注。惟今年预算所用经费比去年较多，可暑假期内讲演团等仍继续进行。校中自五月四日以后罢课至今，现校中已放暑假矣！余言后述不一，特此草草即覆。此请

台安　　并祝

合第均吉

弟克　书鞠躬

信到日祈赐回片，以免悬念。盖恐此信落于贼人之手也，又及。仁山哥现在何处得意？便时代为道候。

六月二十一日

（选自《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2期）

工人阶级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的罢工斗争（资料选录）

上海恒丰纱厂工人集会研究抵制日货办法

上海杨树浦恒丰纱厂，特于五月七日大书白纸墨字二大张，贴于厂之大门。左曰："国耻纪念日。"右曰："禁止日本人进厂。"又于八日晚八时，开一全体大会，研究抵制办法。并宣告自今以后，永与日本人断绝工商关系。前与日商某某等洋行所订之一切交易合同，概行废止。旋即议定办法数条：（一）推举黄首民君为代表，与外界联络一致进行；纱厂方面，亦由黄君代表，与华商纱厂联合会磋商办法，积极进行。（二）组织干事会，监督厂员及工人之购办日用器皿，凡为前所买就者，由干事检查识别，如系日货，予以标记，并将物主之姓名件数，一一登记簿中，以免以后误购，及借辞推诿免罚。散会后，闻该厂之学生及职员中之热度高者，立即返至室，将所有之日货，全行毁弃；叮当之声，同时并作云。

——摘自《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0页

永久机器厂职工抵制日货，决定罢工

径启者：外交急迫，爱国者用文明之手段，以不进日货对付。本厂同人具有此心，用特改变方针，所有原料及一切机件，凡国货未有者，悉定西洋货。但西洋现货缺乏，定购颇需时日，谨定于本星期四（五月二十一日）起，一律停工，以表示赞助爱国诸公之热忱。请即登入来函，实纫公谊，无任盼祷。敬请撰安。谨启。

——原载1919年5月21日《时报》。转录自《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2页

山东人民集会商议对付日本办法

山东人民自闻日本国在世界和平会议，所提出关于山东权利之要求，非常激昂。五月二十二日，遂在济南南门外大校场开会，商议对付办法，顷刻集众十有余万。经各团体代表相继演说。最后有一年仅十余岁之泥瓦匠、跃登演台，激昂慷慨，大声疾呼。大意陈述劳动阶级，受日人侮辱情形；并谓青岛未亡，已受此种痛苦，倘确定为日本所有，痛苦必甚；且必不止劳动者，受此侮辱云云。台下听者发指眦裂，号哭之声，远闻数里。幸是日地方长官劝诱有方，秩序未紊。

——摘自《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134页

南京下关码头工人拒卸日货

宁省人民抵制日货之风潮愈推愈广，现已遍及于四乡。而下关商埠之苦力贫民，转运公司之夫役，凡属日货概不起卸。

——摘自《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808页

厦门码头工人拒卸日货

厦门扛夫，不肯为日船卸货。故由香港装往厦门之货物托日船运去者大为减少。

——摘自《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828页

六月五日日商纱厂及商务、中华印刷厂等工人罢工*

（1）日商纱厂工人举行政治罢工

昨日（五日）全体罢市之信流传，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曹家渡日人所设内外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男女工人五六千人亦全体罢工停作；下午一时半，陆家湾日华纱厂、杨树浦上海纱厂男女各工人亦相继停工罢作。该工厂共有工人二万余人，亦可见吾民之爱国心热矣。

——1919年6月6日《申报》

（2）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印刷工人举行政治罢工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男女工人于前日（五日）一律停工。

——1919年6月7日《新闻报》

（3）码头工人支援罢市，准备罢工

迄今为止尚未组织起来的上海工人也罢工了。在码头工人写给总商会的信上说，他们至少要罢工三天，要让北京知道连工人也不答应北京政府的举动。信上要求与总商会合作，并希望他们与工人的领袖在上海举行一次联席会议。

——1919年6月6日《大陆报》

（4）沪宁、杭甬两路路员部分罢工

沪宁、杭甬两路同人鉴于本埠南北市各商店因营救北京被辱学生起见，特于前日(五号)起一律停业，与学界一致行动。人心激愤，可见一斑。

——1919年6月7日《时报》

---

* 此条以下的罢工斗争资料，均转录自上海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一书，为简略起见，除注明原出处外，不再注明转录书的页码。——编者

六月六日电车、机器厂、铁厂、丝厂等工人罢工

（1）华商电车公司工人罢工

南市华商电车公司卖票、开车人等前日（五日）在西门某茶馆集议罢工后，昨日（六日）遂将各路电车一律停开，与各学生各商店取一致行动。

——1919年6月7月《申报》

（2）英美电车公司工人部分罢工

英美电车公司司机人昨（六日）闻华界电车公司卖票司机等人皆已全体罢工，故托故告假者亦有数人，是以行驶各路之车辆较常略减。

——1919年6月7日《申报》

（3）求新机器厂工人全体罢工

昨（六日）接求新厂工匠同人函云："敬启者，吾国外交失败，国势颠危，凡属国民同深愤激，是以学界罢课，奔走呼号，商界罢市，哀求挽救。吾工界中人，同此热血，同此天良，际此时期，奚忍坐视？故自今日（六日）始全体罢工，与商学界一致行动，并捐资建造国耻纪念牌楼一座。惟期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中国幸甚，同胞幸甚。"

——1919年6月7日《新闻报》

（4）锐利机器厂宣告六日起全体罢工

顷接锐利机器厂工人来函云："今日（六日）阅贵报载北京学生被政府严厉压迫，拘拿千余人，上海全埠商界已罢市。我工界亦国民一分子，于良心上放不下，略有觉悟，故于六月六日起锐利机器厂全体罢工，至学生释放日为止，以尽国民之职。特此奉告。"

——1919年6月6日《新闻报》

（5）英商祥生铁厂工人全体罢工

浦东陆家嘴英商祥生铁厂共有工匠四百余人，自昨日（六号）上午七时起一律同盟罢工，以为商学后盾，并要求该厂大班电达我国政府释回被拘学生，惩办曹、陆诸人。

——1919年6月7月《新闻报》

（6）锦华、小烟囱两丝厂工人罢工

四五两区各署所境内商号店铺于五日起一律罢市。……丝厂除锦华、小烟囱两家业已停工外，其余丝纱厂女工照常开车。

——1919年6月7日《民国日报》

（7）海关造册处印刷工人及全体职员罢工

昨日（六日）午后二句钟赫德路海关造册处全体职员及印刷工人等，鉴于此次北政府袒

庇卖国贼，拘辱京津爱国学生事，大起公愤，故已全体罢工，与工商界一致行动云。

——1919年6月7日《民国日报》

（8）英美烟厂工人开会准备罢工

英美香烟厂内有数部分男女工亦于昨日（六日）午后在厂门首聚议，拟同盟罢工，当经驻厂史巡官得悉报告三区，曾警正督同长警前往弹压，劝令照常上工，尚未解决。其他如日商华章造纸厂、日华纱厂等各工人，并沿浦各码头苦力工人正在纷纷集议。

——1919年6月7日《申报》

六月七日铁路总机厂、英国日本工人及手工业工人等罢工

（1）铁路总机厂工人全体罢工

吴淞张华滨沪宁、杭甬铁路总机厂各工匠已于星期六日（七日）午前十一时起一律罢工。当时执事洋员等虽一再劝谕工作，各工匠坚心国事，率不允从，须视沪埠商号全体开市，随而工作。又沪宁、杭甬、淞沪等铁路机车司机工匠以及办公员司等亦已会议数次，有刻日罢工等说。如果实行，交通断绝，其危可知矣。

——1919年6月9日《新闻报》

（2）法商电车工人罢工；一度被帝国主义分子破坏后，再次坚决罢工

昨日（七日）华界电车公司仍旧罢工停驶。又法商电车前日停止之斜桥至北车站五路电车，昨日先行开驶，惟民国路、老西门至小东门之电车，仍旧停驶未开。

法租界电车公司所用华人，如开车、售票、查票人等，因南北市各商店热心罢市挽救学生。故特于前日（六日）西门一带停驶电车，以取一致等情，已志昨报。兹悉各该开车人等百余名，复于昨夜（六日）集众，拟借西门第三区救火会开会议事，旋被该公司西人得悉，前往婉言劝阻，已得多数随之前去，其不去者仅十余人。故昨日（七日）上午法界电车，得以照常行驶，迨至十二时左右，该电车行经西门方滨桥，忽被众多行人阻止，令即停车，并将车中乘客均令下车，一时观客愈聚愈众，人声鼎沸，幸未肇事。当由该处军警及学生向前竭力相劝，始行散去。故英法电车仅驶至方滨桥为止，直至下午四时许始得通行。

——1919年6月8日《时报》

（3）英商别发印书房工人决定全体罢工

别发印书房全体工人函云：“敬启者，敝同人为政府之不良，压制学界，同人等自愿于七号九时全体罢工，一致要求以尽国民之义务。”

——1919年6月8日《新闻报》

（4）别发印书房工人反对西人店主，实行罢工

六月七日外间盛传一种谣言，说工部局受了日本人十五万元的贿赂，因此在上一天对罢

市者采取武力对待的措施。许多散发着的传单就包含这样的内容。大概是这种流言影响了别发印书房的印刷工人。他们实行罢工，显然是对别发主人承印工部局布告的行动提出抗议。

——《工部局公报》第十二卷第六四三期，1919年7月24日

（5）兴发荣机器造船厂工人决定全体罢工

日晖桥兴发荣机器造船厂内中股份以日本人占多数，该厂工人近日因鉴于学商两界先后罢课罢市，不无动心，爰于前日（七日）共决全体罢工，以表一致爱国，并谓自后誓不入某国人工厂作工云。

——1919年6月9日《新闻报》

（6）信通织布厂工人全体罢工

北浙江路之信通织布厂等均一律停工。

——1919年6月8日《新闻报》

（7）闸北手工业工人全体罢工

闸北方面秩序尚称安谧。各丝厂昨日（七日）在恒丰路恒丰丝厂集议，众同业为维持女工生计起见，议决暂不罢工。其余各手艺作场，一律辍业。

——1919年6月8日《新闻报》

（8）轮船业水手决议即行罢工

轮船业水手同人昨（七日）发通告云："启者，外交失败，青岛问题，学界热忱爱国，反累自身被拘。幸国不亡，民心未死，坚持抵制日货，以致全埠闭业罢市，今已数日。然政府与官厅尚未解决，吾业同人不忍坐视，刻已齐集议定，同人尚亦爱国有志，自愿全体齐心，即行罢工，为国家之土地，再为学生被拘速救释放。事关全国命脉，望同胞速起救国！"

——1919年6月8日《新闻报》

六月八日日商纱厂等工人罢工，铜铁机器业工人决定次日总罢工

（1）日商纱厂工人一万五千人展开罢工斗争*

六月八日下午九时澳门路敞社第五工厂突然受到"暴徒"袭击，煽动作业中之工人，逞其"暴行"。当时破坏机械器具，偷出厂内的制品，破坏建筑物，有对人命发生危害之势。

* 本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川村兼三（内外棉厂在沪经理）向日领所写的报告，故诬称罢工为"暴行"，罢工工人为"暴徒"。——编者

幸只有三人负伤，因租界巡捕援助，即告镇定。该“暴徒”等退出之时，第五工厂固然受到破坏，即在同一地区之第七、第八两工厂及食堂、人事课办公室窗户玻璃等亦全被击碎。“暴徒”分为两队，一队袭击宜昌路之第三、第四工厂，将牢固加锁之门户破坏。闯入以后，行将发生大乱，幸西捕头闻警驰赴该处，防止暴行，仅破坏窗户玻璃数十块而已。另一队袭击麦根路①第九工厂，破坏后门闯入，一部分人虽然进入工厂内，但在作业中之工人，因事出意外，急于退出工厂，以致互相发生骚扰。闯入工厂之大部分暴徒，将工厂以及工厂内两所住宅与办公室窗户玻璃加以破坏，多数群众闯入办公室，或打毁器具，或损坏电话机，并有大肆投掷石块等“暴行”。此处亦由租界巡捕之力，渐使“暴徒”退散。由破坏之惨，实不难想像当时“暴行”之情形。各工厂均告平静之时，已过十二时矣。

当夜贵警察署员②亲至现场，想可根据其报告了解当时情况。其次，在戈登路住宅、宿舍，幸仅从外部被投掷石块，破坏玻璃数片。

事实上，当时“暴行”情形颇使人怀疑如何方能保护在业之日本人及其家族数百人之生命以及工厂之财产。各工厂均由于租界巡捕之援助，损害之程度仅如上述，实为不幸中之幸事。此外，周围之状态由于外部“暴徒”等之煽动及强迫，尚不容继续作业。自八日夜至十四日，不得不休业五日半。“暴行”当夜所蒙之损害及休业中之损害，估计如另纸。因“暴行”所蒙之损害，当然归中国政府负其责任，请经由贵馆要求赔偿。特此请愿。此上帝国总领事有吉明。

内外棉株式会社上海支店川村兼三

大正八年六月十五日

——《日本外务省档案》显微胶卷，第650卷，第2107～2109页

（2）同济学校工厂工人罢工

同济学校工厂工人以工界须与商学界一致，因于六月八日罢工。

——1919年6月9日《新闻报》

（3）华界自来水厂工人罢工

昨日（九日）华界宝山路、库伦路等处，于住户多有开放龙头，而自来水并不自来，颇为惊讶。据说华界自来水厂之工人，因前晚（八日）兵警在南市围学校，捕学生，群情愤激，乃相率罢工为之报复云。

——1919年6月10日《时报》

（5）铜铁机器业工人六百余人开会，决定自九日起总罢工③

阴历五月十一日（六月八日）铜铁机器业公所开会，各工匠到者约六百余人，公推张延钟主席。由主席托王晓蒙代表报告开会宗旨，略谓：“今日因各工匠为政府不办国贼，拘押

① 即今淮安路。

② 指日本总领事馆中附设的警察人员。

③ 本条报道有歪曲失实的地方，所决定的四项办法，也只是代表资本家的意见。事实证明，铜铁机器业工人在八日开会后，九日即举行总罢工。

学生，群情愤激，齐集本公所，主张开会讨论办法。我工界亦国民一分子，当此商学界奋起救国，工界岂可落人之后，应如何进行，请到会诸君决定。”仲学准君登台宣告：“今日工人开会，无非救国，各人均须从良心上做去。”次仲学培、仲其美、李兆熊、丁文龙相继演说，词极痛切，鼓掌之声不绝。当经全体决定办法如下：（一）工界为商学界后盾；（二）静候三日；（三）如三日后政府不办国贼，工界设法对付；（四）保持秩序，决勿暴动。至三时散会。

——1919年6月9日《申报》

（6）船厂、纱厂等工人酝酿总罢工

《大陆报》云：闻各界或将有总罢工之举，若然，则工商各业将完全停滞。此乃最后之一着，使政府知亲日派官僚非去不可。……明日（九日）若果总罢工，则各商店、各公司、各工厂，均将受其影响，不独日人而已也。此举或足召外人之反对学生行动。至于总罢工之计划如何，我人并无所知；惟闻各船厂、纱厂及各商店、各公司之工人，将于明（九日）晨一律罢工，或谓自明日午后起云。……

工界分子自昨日（八日）起已纷纷加入此次学生行动，有纱厂及工厂数家被迫停工。闻船厂工人亦将于明日（九日）罢工。会议后并派代表分赴各工人机关请与赞助，遂纷纷开会讨论。外传星期一（九日）晨间或下午总罢工之说，以此益信云。

——1919年6月9日《时事新报》

六月九日铜铁机器业工人及海员等罢工

（1）各业工人罢工更加扩大

（六月九日）除已闲荡了若干天的学生、商人、店主、店伙以外，这时已有产业工人及其他工人约二万四千人参加罢工。其中有汽车司机、木匠、装配工、机器工、造船工、石匠、电话接线员、磨工、印刷工、马夫、洗衣工、铜匠、技工。租界以外地区也有大批工人罢工，其中包括浦东一家香烟厂[①]的工人，闸北一家大型印刷厂[②]的工人，救火员，碇泊本埠船舶上的水手，城区电车公司的司机与售票员和南市一家机器厂的工人。

——《工部局公报》第十二卷，第六四三期（1919年7月24日出版）

（2）英商电车公司机械工人罢工

本埠南北市英美法租界各商号一律罢市后，而工界各团体联络采取一致行动。前日（九日）午后有电机匠李恒林在沪西赫德路英美电车公司车机栈内劝告各工匠同盟罢工，事为车务处西人所见，以其煽动工人罢工，实有扰乱治安之举，当即用电话通知戈登路捕房，立饬包探吴迪生协同西探贝麒驰往，将李拘入捕房管押。昨（十日）晨解送公堂，奉关谳员会同美丁副领事，讯据西捕头上堂禀明前情，并称原告系英美电车公司，要求展期归英领堂期陪审

① 指英美烟草公司。
② 按即商务印书馆。

云云。奉关、丁两君得供，会判李恒林押候礼拜三（即今日）归英领堂期解讯。

——1919年6月11日《时事新报》

（3）英商耶松老船坞和瑞熔机器造船厂工人罢工

昨日（九日），上海耶松公司老船坞与瑞熔机器造船厂工人共约一千人举行罢工。这些工人于星期日（八日）举行大会，会中曾决议劝告工部局电灯厂工人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但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报告，后者目前暂定继续上工。

在瑞熔机器厂，有一艘冷藏轮船正待修理完毕，而参加修理工作的工人，也和其他工人一道举行了罢工。据我们的了解，公司正借重学生联合会为媒介，说服工人做完这项特殊的工作。我们所能了解的情形大概是这样，工人和学联都愿意恢复是项工作，只是需要由公所作最后决定。

——1919年6月10日《字林西报》

（4）江南船坞工人罢工

江南船坞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装配工人首先罢工，然后带动木工工人一同罢工，他们当时正在参加修理停在船坞的两艘日本轮船。

——1919年6月10日《字林西报》

（5）英商祥生铁厂全体工人坚持罢工

浦东陆家嘴英商祥生铁厂昨日(九日)全体工人继续罢工，乃该厂工作极为重要，有罗维芹洋行订造之轮船两艘，适值工竣，近日为试车之期。该厂西人着令工头再三挽劝，各工人坚执如初。

——1919年6月10日《新闻报》

（6）轮船水手全体罢工，各轮船停驶

本埠大小各轮船公司凡走长江班及杭嘉湖等轮船，昨日（九日）因办事人员激于爱国热忱，全体休业，是以各轮船昨日只得停驶。

另函云：浦东各轮船水手昨在均安公所开会，议决同业一律离船，致定班出口之轮船，如“新宁绍”、“新北京”、“大通”、“江新”等各轮船均不果开行。

——1919年6月10日《新闻报》

（7）日商纱厂码头工人罢工

杨树浦上海纱厂昨日(九日)有驳船装载烟煤四船，码头小工均不肯代卸，故停泊码头。又虹口各码头、日本邮船码头已无华工踪迹，日清、王菱等码头栈房亦已较平时减少过半云。

——1919年6月10日《民国日报》

（8）叉袋角日本纱厂工人万余人全体罢工①

叉袋角……附近有日人所开之纱厂数处，男女工人数有万余，已于昨日（九日）起全体罢工，闻前晚（八日）曾与该厂起有小冲突。

——1919年6月10日《申报》

（9）美商慎昌洋行电器工人罢工

慎昌洋行雇用的电器工人停止了工作，他们还去礼查饭店，和那里的电器工人商讨，希望他们也实行罢工。

——1919年6月10日《字林西报》

（10）上海电气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附属印刷厂等工人罢工

上海电气公司的装配工人和工部局的电力处都停了工；□船公司停业，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及附属印刷厂的一千名工人也于昨（九日）晨罢工，铜匠与技师都参加了罢工。

——1919年6月10日《大陆报》

（11）英美烟厂工人五千余人决定九日起罢工

浦东陆家嘴英美香烟厂新老两厂男女工人数达五千余名，自商界罢市，即跃跃欲动。前日星期六放工时，该厂大班亲出劝导，谓“日人欺中国，吾人亦深为不平，惟限于条约，致英美政府爱莫能助，尔等仍照常工作，免遭损失”等语。各工人亦推代表答谢，谓“可怜学生被虐，可恨政府助桀，痛心国难，实无心工作，决定星期一（九日）罢工，以表天良”。昨该厂犹谕令工头四出劝导，不识能挽回否？

——1919年6月9日《新闻报》

（12）浦东美孚和亚细亚两火油栈工人全体罢工

浦东美孚及亚细亚两火油栈房各工人于前日（九日）全体停工。该栈近日适有重要工作，由西人着令工头商请各工人格外通融，昨日（十日）有少数工人入厂工作。

——1919年6月11日《新闻报》

（13）公共租界汽车司机罢工，汽车全部停业

昨天（九日）早晨有许多码头、船坞、铁厂、烟草公司和黄浦江两岸的码头工人都参加了罢工。公共租界的全体司机都拒绝工作，迫使全部汽车行停止营业。所有私人汽车的司机都拒绝开车上街，只同意擦洗和检修汽车。

——1919年6月10日《大陆报》

（14）汽车司机二千余人决议九日起全体罢工

上海全埠开汽车人昨日（八日）会议后发出通告，略谓：“吾人亦国民一分子，当此国

①按即内外棉纱厂。

家存亡危急之秋，商学界爱国表示举动已起于前，吾人何可漠视？爰特议决于九号起，全体罢工，与商学界取一致行动”云云。今日开汽车人约有二千余罢工后将组织一团体，协同商学界维持租界秩序。

——1919年6月9日《申报》

（15）清洁工人声明全体罢工

本埠各清洁夫亦于昨日（八日）齐向各该头目要求：自今日（九日）起一律罢市。先于昨日下午向各商店居户声明，以免临时恐慌。

——1919年6月9日《申报》

（16）邮递员不愿代送总商会的开市通知

邮差本不愿代送总商会开市之通告；后因商之至再，故送达之时，必嘱商店以“开市自有主权，通告未必确实”。

——1919年6月11日《时报》

（17）英法电车工人决定全体罢工

法界电车各司机人，于前日（七日）一律罢工，以致电车停驶等情，已志本报。兹悉当时实因各该管西人竭力婉劝，故不得不稍予敷衍，昨日（八日）仍照常行车。现在各界罢市已经多日，仍无结果，故特邀集英法两界电车中服务人员，于今日（九日）起一律罢工，停驶电车云。

——1919年6月9日《时报》

六月十日铁路工人、海员及英美工厂等工人罢工

（1）沪宁、沪杭铁路工人全体罢工，两路交通断绝

沪宁、沪杭两路火车昨日只开头班车一次，上午九句钟后，车上司机人、车守、火夫人等已一律停业矣。

另函云：昨日南车站上午七点四十五分时由沪开杭之快车仍照常售票，载客开杭。据称只抵嘉兴，乃与杭省开沪之头班车互相掉换，旅客赴杭，即由杭车载回，往沪者则由沪车驶沪。而南站驶杭之二班慢车，向章应于上午九点十分时开行，乃头班快车因未折回，以致站长尚未得悉司机者罢工，因此照常售票行驶，讵至新龙华站时，守候北站赴杭慢车，候久不到。旋即电询北站，始悉司机人议决罢工，声称国家败亡，甘愿待毙，非得政府圆满允可，誓不开驶火车云云。是以南站所开之慢车，仍将搭客货物一并载回。当由站长立将所收票价如数退还，以致沪杭交通亦已断绝。……

另函云：沪宁、杭甬路机师车头工匠等于昨（十日）只做七时五十五分头班车一次，其

他各车概未行驶。闻午后宁车抵埠时即据车务洋总管邀各工头于即晚八时开特别会议，闻系关于明日（十一日）开全部车问题。惟各车头之人均已四散，恐此会难收圆满效果云。

——1919年6月11日《新闻报》

（2）英商瑞熔船厂等工人决定罢工

耶松老船坞已完全停工，瑞熔及其他船厂非形势猝变，亦皆将于十日停工云。

——1919年6月10日《时事新报》

（3）轮船水手罢工扩大，海上交通断绝

浦江各轮船水手于前日（九日）午后相约离船登岸，致新宁绍、新北京、大通、江新各轮不能开行，故昨日（十日）宁波、广东两帮水手一律罢工。原定出口之轮船，如江天、奉天、直隶、天津、温州、联益、东成及日商各轮，均停止行驶，航海交通遂尔停顿。

——1919年6月11日《申报》

（4）轮船水手坚持罢工，追回宝华商轮

各公司商轮水手、伙夫全体，自前日（十日）四明公所开会议决，停止开驶，即分赴各公司报告一律遵守。迨至宝华公司因开往长江之"宝华"商轮，人货已齐，业已结关开行，各火夫水手等深恐破坏议案，当即与该公司一再妥商，始允电吴淞口追回。故"宝华"轮接电后，立时转轮退回，驶抵原码头下椗。全船客人虽值黄昏，亦只得各携行李铺程登岸，各自遄回，所装客货暂留轮中，以待全体开驶，始可鼓轮出发云。

——1919年6月12日《时报》

（5）轮船管事、厨司一致罢工

各轮船水手生火业，已全体登岸，一致进行。讵昨晨（十日）起，所有船主外人雇用之管事、厨师（大餐司）、西崽等亦一致随众停业，纷纷离轮。致在轮外人，亦只有登岸住宿。且若辈起岸后，即分携宣言书，分送各界，文云："青岛问题，学生被捕，政府容奸不戮，以致全国愤激，学界罢课，商界罢市，厂家罢工，水手火夫，均系一致，皆为爱国之心。吾业管事、厨司、西崽等亦要爱国除奸，一体休歇，勿使外人笑吾五分热度，愿我同胞万众一心，共除国贼，以雪国耻"云。

——1919年6月11日《时报》

（6）英美烟公司印刷工人、铜匠工人罢工

浦东英美烟公司印刷处之工人千余以及铜匠工匠均已停业。

——1919年6月11日《新闻报》

（7）英商电车公司及工部局电气处工匠罢工

英界电车公司、工部局电气处之电器修理工匠亦已罢工。

——1919年6月11日《新闻报》

（8）电话工人罢工

上海电话公司约有五百名职工于昨（十日）晨换班时间参加罢工，几乎所有的接线生和工人都参加了。电话公司当局得知此项决定是在前晚作出的，因此曾对他们进行劝说，他们说延到天亮换班时就举行罢工。工人们拒绝回答是谁煽动的，他们说参加罢工只是为了使北京被拘留的学生恢复自由，并无反对公司或公司负责人的意思。

电话接线生参加罢工的约有三百五十人，工人约有一百五十人。昨天下午他们给本报一封信声明他们的立场：

《大陆报》编者先生鉴：

兹谨向你报声明，今晨我们罢工纯粹是为了希望释放在北京被扣押的学生，决不是反对电话公司和公司的大班。为此我们开了会，希望能给北京的学生一些支持，会上并作出了以下一些复工的条件，希转达给电话公司，并请回示：（1）在罢市期间我们不替任何日本人接通电话。（2）要求大班请领事致电北京政府释放一切被捕学生，立即罢免卖国贼。（3）要求不追查罢工发起人，因为我们都是自愿参加的，故请明白保证不予追查，然后我们才按时复工。（4）昨天割断的所有中国用户的电话应全部予以恢复。全体电话工人启。一九一九年六月十日。

——1919年6月11日《大陆报》

（9）美商奇异电灯厂女工罢工

劳伯生路之奇异电灯厂女工七十人，昨日（十日）全体罢工，并与经理开谈判，如允若辈致电总统，愿回厂仍工作云。

——1919年6月11日《时报》

（10）英美烟厂卷烟女工继续罢工

浦东陆家嘴英美香烟厂全体男女工昨日（九日）一律罢工，惟因卷烟间配就之烟必须收束，故由大班谕令女工头商请各该部分女工格外通融入厂工作，俾免损坏，闻今日（十日）一律辍工云。

——1919年6月10日《时报》

（11）荣昌火柴厂、华昌盒片厂、英商和平铁厂等工人全体罢工

浦东烂泥渡鸿升码头因水手罢工，轮船不能开行，昨日（十日）起亦陷于停顿之境。荣昌火柴第一第二两厂各工人不愿工作，于昨日（十日）起全体罢工。华昌盒片厂工人亦继起一致行动。此外，各织布厂亦人心浮动，但厂主顾念女工生计，正在劝慰之中。浦东陆家嘴祥生铁厂、英美香烟厂新老两工场、日华纱厂三家昨仍停工。浦东八埭头英商和平铁厂工人与瑞熔、祥生等厂一致行动，前日（九日）起亦全体停工。

——1919年6月11日《新闻报》

（12）大有榨油厂工人五百余名罢工

叉袋角大有榨油厂工人以湖北人居多，全体约有五百余人，于今日（十日）起一律罢

工。

——1919年6月10日《申报》

（13）日商铃木洋行中国职工全体罢工

铃木洋行内蔡同浩、顾滋梅等人以此次罢市，多数营业即如小工杂役亦不照常操作，际此对内方法，不得不尽此义务，自昨日（十日）为始，本行华人全体停止所有一切手续，一俟各业开市，再行继续理楚。

——1919年6月11日《新闻报》

（14）美商茂生洋行中国职工全体罢工

四川路五十三号美商茂生洋行管理进出口货各华人，于前日（十日）业已一律停止职务罢工，与各华商取共同态度，所有该行建筑部、洋帐房、机器间三处，计共数十人之多。

——1919年6月12日《时报》

（15）外商饭店中国职工酝酿罢工

大马路外滩及虹口两处之西饭店内所用之西崽大司务（俗称烧饭）等名目，系华人为多数。昨（十日）由该业总管事华人自行邀约同业集议，与商学界取一致行动。嗣后被各店总管西人知所，竭力向各西崽劝导，一时尚未解决。

——1919年6月11日《新闻报》

（16）英商伊文思图书公司全体中国职工罢工

伊文思图书公司全体华人，因伤心国事，同向总理请求罢工，暂停营业。因特从六月十号起闭门停业，与学界取一致行动。

——1919年6月10日《时报》

（17）求新厂工人五千人罢工后的坚决表示

求新厂工人五千名有非达到惩办曹、陆、章、段、徐五人不上工之说。

——1919年6月11日《时报》

（18）各马车行工人全体罢工

英美法租界各马车行所佣之马夫，近以汽车罢工，道称吾马车夫亦应取同一行动。爰于前晚集约各行马夫头目，议论决定昨日（十日）起全体停工。昨马路上之马车，只有自备，经过甚稀。

——1919年6月11日《时报》

六月十一日海员等继续坚持罢工

（1）轮船水手声明，须有斥退国贼命令，方肯登船复业

昨（十一日）为轮船水手船员等罢工之第三日，浦江两岸各码头轮船一经进口停泊，即与已经罢工之人表示一致行动，故十号以来，轮船有进无出。定班出口之各轮船，以长此延搁，损失殊巨，故昨午后由买办人等四出劝导，该船员水手等均声明斥退国贼命令，须指明“永不起用”字样，或有确实之保证，方肯登船供职。

浦东杨家渡宝隆码头所泊之“福建丸”轮船，本系闽商合股组织，内有少数日人股份。自发生抵制风潮，该公司即声明将日人股份退出，船名改为“福建号”。班期本定昨日出口，因水手司机等同盟罢工，以致不能开行。

——1919年6月12日《新闻报》

（2）外埠返沪水手坚决罢工

甫由外埠旋沪之水手定于今日（十一日）罢工，当时颇有以命令已下劝之者，该水手等以同为中国人，爱国不能独让他业。

——1919年6月11日《时报》

（3）轮船工人坚持罢工，拒绝帝国主义分子的劝诱

昨日（十一日）沿海及内河轮船仍旧罢工，除了星期一、二两天因工人罢工而停靠在码头上的轮船十几艘外，又有五艘船无法驶出。昨天轮船公司当局化了很大力气企图劝服水手及火夫复工，他们答应只要上海商店复市，他们即行复工。

英国总领事法磊斯、领事菲力浦及管理船务的副领事斯赖，昨天会见了在英国轮船公司工作的职工代表，工人的答复和别的轮船公司一样，一俟商店复市，他们即行复工。

——1919年6月12日《大陆报》

（4）名轮船公司轮船停驶

航业界之情形颇为严重，印度支那轮船公司、太古公司及招商局轮船之不得不停泊港内以待进步者不下十二艘，其在他处者亦有若干艘不能开行云。

——1919年6月12日《时事新报》

海员坚持罢工，一致反对买办虞洽卿的破坏

昨（十日）午后二时商轮公社全体暨各轮船公司主任买办等假四明公所开大会，筹商停驶问题，到会者如三北公司总理虞洽卿等及各公司轮船买办均参预会议。首推某君为临时主席，宣布开会宗旨毕，并请到会诸君决定开与不开之目的。经到会同人一再商议后，因虞君之意以航务紧要，令已装货者照常开出。迨言未毕，反对是议之人即高声大喊：“谁人说开

驶者？打！打！”致秩序稍乱。幸经各买办竭力劝慰，暗令虞君从后门而出（长衫已扯坏），场内始行肃静。继而复由主席一再向众议商多时，遂决定不开，所装货件可搁者搁，不能搁者退回，须视商家全体开市始再开船。并议定各轮上留看守人员若干人。议决后即行散会，各返本公司报告一律停开，与商界取一致行动云。

——1919年6月11日《时报》

沪宁铁路工人不顾劝阻，坚决实行罢工

主笔先生：由于人们时常指责学生，说工人实行罢工，归根到底，是由于学生在背后煽动所致；为了不要冤枉学生，我可以将沪宁铁路司机和工人决定罢工的经过，说个明白。

当火车司机和工人向路局职员声明，他们已经决定要参加全国广泛的运动，并将实行罢工的时候，有人也在怀疑，大概这次罢工也是由学生煽动起来的。路局职员曾竭尽一切努力，劝勉铁路工人不要实行罢工，或者把罢工的举动推迟几日，但是工人拒绝了这种劝告。作为最后一种努力，路局方面才非正式地和学生联合会接触，请求学生给予友谊的协助。学联派来代表面晤铁路工人。这位代表颇善于辞令，他以简洁有力的语言说道，为着各方面的好处，铁路的交通必须予以维持，并且劝告铁路工人，至少应把预定的罢工举动推后两三天。对于学联代表这种请求，工人给予的回答是什么呢？有一个工人走近前来，大声疾呼地对代表说：“诸位学生是爱国的，你们想一想，难道我们工人就不是爱国的吗？诸位学生宣告罢课已经这么久，你们现在还要求我们推迟我们罢工的日期吗？”这位学生代表还在那里试图作进一步的解释，只是大多数的工人已经毫不客气地从他面前走开了。

当时上海各重要的团体正举行一次代表联席会议，讨论罢市是否继续下去的问题。铁路工人方面也有一位职员提出建议，要工人派出代表数人去参加，看看那次会议将产生什么结果，并探听各团体对于铁路工人实行罢工的赞成和反对意见。铁路工人推出了两名代表，但会上决定，代表前往出席，只是去听听，无论如何，铁路工人的罢工明天一定是要宣布的。

今晨，在第一列火车开出上海以后，罢工就宣布了。这些头脑单纯的工人，有的时候非常激烈，有的时候则非常保守。他们不大听人讲些什么道理的，只要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他们马上就会干起来的。这种情形在全世界也都是如此。我们需要具有经验和技巧的人，来对于一些人进行感动并加以控制，但对于适才所提到的人，虽有经验和技巧，也是感动不了和控制不住的。

本人认为，你报一些读者，对于上述事件应该有所认识。对于工人来说，这些年轻的学生，不论要他们来发动一次罢工，或是把罢工的举动停止下来，他们的影响总不会过大的。这些工人一般都具有他们自己单纯而强烈的意见，很难用劝告、威胁或其他方法，使其改变过来的。

——《亲眼目睹的人来函》，1919年6月12日《字林西报》

（选自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

〔附〕 傅嶽棻关于六四大逮捕电

（一九一九年六月六日）

滇督军、省长、教育厅鉴：嶽棻猥以铨材，仰膺简任，于本月六日就任教育次长，代理部务。值此学潮方烈，补救维艰，匡导维持，诸赖大力，无任感跂。京校各生，前于本月四日，结队游行，军警制止无效，乃护送入法科大学。现已由部商洽，停止干涉。并令各校职员，劝谕学生，各归本校，风潮渐平。诚恐外间传闻失实，致疑中央有逮捕学生之嫌，请就近宣示，免学界多所误会。惟时局泯棼，事机多变，仍冀内外相维，俾士气由和缓而徐图恢复。学风由平静而渐就轨范。教育幸甚，大局幸甚。谨贡愚忱，并希谅鉴。傅嶽棻。鱼。印。

〔国民党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附〕 对德和约中国专使拒绝签字之情形[①]

（一九一九年）

自专使来电，对德草约于交还胶澳一层未能列入，全国舆论鼎沸，愤懑达于极点。各界合词请愿政府，对于和约毋得签字。府院两处，接各团体来电日数十起，而尤以学界最为激烈。始而中学以上全体罢课，渐至联合商界，终至津沪各处相继罢市。其详情各报均有登载，兹不赘叙。政府以民意所在，既不敢轻为签字之主张，而国际地位所关，又不敢轻下不签字之断语，左右掣肘，而地位益臻困难矣。会巴黎方面各专使，亦迭接国内数十处去电，对于签字保留，一致呼吁，异常愤激。各使鉴于全国舆情，不敢拂逆众意，对于保留办法，坚持益力，顾会中仍不允认，于是不签字之局遂以实现。本月二日，政府接陆专使来电称：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五月二十六日正式通知大会，依据五月六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在后迭向各方竭力进行，未能达到目的。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在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证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又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固，关系至巨，即征诸外人论调，亦群谓中国决无可以轻于签字之理。详审商榷，只得不往签字。已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前后决定之权云云。等语会，此巴黎会议中国专使对于和约拒绝签字之情形也。

附七月十日　大总统令

巴黎会议对德和约，关系至巨，迭经电饬如〔各〕全权委员审慎从事。顷据全权委员陆征祥等六月二十八日电称：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通知大会宣言维持保留后，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又复完全被拒。不得已，当时不往

①此件为北洋政府所编之《巴黎会议关于胶澳问题交涉纪要》之第三部分，沿用原标题。

签字，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等语。披览之余，良深慨惋。此次胶澳问题，以我国与日德间三国之关系，提出和会。数月以来，乃以种种关系，不克达我最初希望。旷览友邦之大势，返省我国之内情，言之痛心，至为危惧。推据此项问题之由来，诚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今日决定签与不签字即可作为终结。现在对德和约既未签字，而和会折冲势不能诎然中止，此后对外问题益增繁重，尤不能不重视协约各友邦之善意。国家利限所在，如何而谋挽救，国际地位所系，如何而策安全，亟待熟思审处，妥筹解决。凡我国人，须知寰海大同，国交至重，不能遗世而独立，要在因时以制宜，如当秉爱国之诚，率循正轨，持以镇静，勿事嚣张。俾政府与各全权委员等得以悉心筹画，竭力进行，庶几上下一德，共济艰危。我国家前途无穷之望，实系于此。用告有众，咸使周知。此令。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三个半月的"觉悟社"

二　八

我们这个社，自成立到现在已经三个半月了。在这个期间，颇引起社会上许多人的注意，常常有人问我们社中一切情形。我们有时候因为忙，不得详细去答复。现在趁着这第一期小册子的出版，把我们三个半月经过的事情详细写出来；有不知道"觉悟社"的，请看这一篇，就算我们最诚实的"答案"。

五四运动以后，各处的文化运动渐渐由冷静里露出些热动的意思，小册子的出版亦同时"风起云涌"。天津当时只有学生联合会办的《学生联合会报》同女界爱国同志会办的《醒世周刊》，此外不过仅有几种单独一个学校的出版物。大多数的学生在那个时候对于天津文化运动将来的发展都抱着很大的希望，这可算是"觉悟社"的"怀想期"。

后来学潮扩张的范围愈大，现象发生的问题亦愈多，有的时候，男女两个会的会员，会到一起去作事，宗旨同，方法同，"互助"的地方就很多。有的人就想为什么我们不组织一个共同宣传的出版物呢？可还只是一味的怀想。到了八月间，一方有我们几个现在社中的分子，因为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组织赴上海当代表，观察得上海及各处文化运动的猛进，回想天津方面竟若"天壤"，所以当他们回天津的时候，就想组织文化运动宣传的机关；同时一方又有第二次请愿的失败，因之现在的社员在那个时候多数得了"自觉"的反响，认为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非从根本上着手不可。具体的办法，就想在天津发行两种小册子，用不分男女界限的组合，一种为平民看的，一种为稍有知识的人看的。在那时候的意思，本想都用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来组织，这可算是"觉悟社"的"酝酿期"。

等到集合了同志，就于九月十六号那天在学生联合会开学生杂志筹备委员会。全体委员到者有二十人，当时就议决几件事情：

一、我们这个团体，决定不用两会的名义同范围来约束，要做成独立机关。因为小册子的内容是没有限制的，我们几个人的主张不能代表两会。

二、出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第一期定在十月中旬出版。

三、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所以小册子的名称就叫《觉悟》，我们的团体就叫"觉悟社"。

四、内容是：（甲）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乙）对于社会一切应用的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丙）介绍名人言论（著作同演讲）；（丁）灌输世界新思潮。

五、组织是：社内组织采委员制，本着分工合作的精神，将内部分作数类，由全体社员分担。

六、每期主张的集成，于每期出版之前由全社社员选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由社员各就己见用文字发表；再由编辑将各篇的精华聚成一个结晶，作为全体的主张。第一期的问题就是"学生根本的觉悟"。

七、全用白话同新式圈点。

八、第一期的稿件限十月五号以前一律交审查委员。

九、聚会的时候，有一人提议，二人以上的附议，由交际委员通知各社员。

十、新社员问题　因为要预防名实不符的弊病，对于新社员的加入，取严格的主义。手续是须有社员三人以上的介绍，得全体社员的允许方得加入。

这一次的会议，可算是“觉悟社”的“实现期”。

开完了这一次会，二十一号因为李大钊先生来天津，就由交际委员请到本社谈话。李先生对于本社出版不定期小册子的办法同不分男女的组合，都非常赞成，并且还给我们许多的建议。那一天因为到的社员不很多，所以没有讨论事情；但是有一件要紧的提议，就是我们要预备分类研究各种学术，这件事是以后分类研究的动机。

二十三号开全体委员讨论会，讨论了几件关于小册子的事情同研究学术的方法。又有北京来的蒋梦麟、罗家伦、孙几伊三先生到本社谈话（词略），大家得的益处很多。

过几天，有几个社员对于白话文字曾经有一次的研究，这可以说以后分组研究的造因。总起来可以算“觉悟社”的“开始期”。

我们的社员差不多全是女界爱国同志会同学生联合会的职员，所以两会发生事情的时候，对于本社就有直接的影响。第三次全国各处代表向北政府请愿，正是十月一号。天津忙着筹备一切事情，所以社员亦无暇顾及小册子；又有两个社员以充当请愿代表被捕，所以到了十月五号，审查委员收的稿子太少，无法审查，只得延期。加着因为要筹备庆贺双十节，所以也没得着机会开会。双十节军警干涉游行的事情发生，就将这小册子的事情无形中停顿了两个礼拜。这二十多天的“觉悟社”可以叫做“停顿期”。

到了二十一号，又加入两个新社员，就于当日下午在他们的家里开了一个讨论会。议决的事情是：

一、关于小册子内容的主张，取共同会议讨论法。先举定三人预备问题的解析，次经大众的讨论，采出结晶的意思来做论文。

二、举定两位图书委员，社员将各人的书籍杂志都交给委员，以备大家公阅。当时所举的就是新加入的两位社员，我们临时的图书室亦在他们家里。

二十五号开共同研究问题的会，所讨论的就是“学生根本的觉悟”问题。（结果见本期《学生根本觉悟》篇。）

二十六号下午，本社请刘半农先生同社员谈“白话诗”。

二十八号开第一次审查委员会，感想到社员单独所研究的问题缺乏详细的讨论，不完善的地方太多，难让人批评。大多数的意思，就以为以后研究的问题应当经过分组共同研究的手续，然后共同通过发表。

十一月一号有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同本社社员谈话，研究“白话文学”；又有徐季龙同包世杰两先生畅论救国问题。当天的感触是：社员间彼此感情尚不能贯通，彼此思想尚不能了解，所以就感想到个人谈话同分组讨论的必要。

二号有社员邀请社中同人会餐，作一种社交的谈话。从前的聚会除去开会讨论社务同请人演讲外，没有别的事，这次可说本社打破社会积俗，实行社交公开最初的表现。当时又感想到除非共同研究问题，不足引起兴味。

六号有社外关心本社最力的两个人召集本社同人开茶话会。本社社员又拟出问题多种，经大家择出三种问题：一、夫妇新旧不同的互相对待方法；二、家庭改造；三、共同生活。

当时虽未讨论得若何结果，已实开分组共同研究的始端。

八号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先生来社谈“日本新村的精神”。

十号社员两人由北京请愿被释出狱回津，其中又有一位立刻就要赴上海到法国去，所以社员开了一个谈话会，表示一种慰劳送别的意思。这两星期的“觉悟社”，是完全在一种平易的进行中过生活的，但是在这期间，社员的感想总起来说：

一、缺乏充足的学识；

二、社员相互间的感情彼此尚不能十分了解，所以讨论问题时尚难得好结果；

三、社员工具不锐利，宣传的力量太薄弱；

四、近来作文化运动宣传者多属空谈，实行者太少，于事实无补。

大家受了这几种感觉以后，又觉得“觉悟社”的同人实在要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大家就想要开一次特别大会讨论出一个结果来。

经前几次会议的结果，社员脑子里都有了那几种感想，所以到十一月十五号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在会议的时候有包世杰先生来参观，作一个很长的谈话，所说的是“对于新潮流的感想”。我们那一次会感触到讨论时间大不敷用，就延长时间到晚上，以十二点钟为止。那天开会的情形，有各人发表对于“觉悟社”的希望一件事。当日共同讨论所得的感想，大概的结果有几种：

一、“觉悟社”不仅出一本小册子；

二、要本着共同讨论的出产物，去实行作引导社会的先锋；

三、作成一种共同研究学问的团体；

四、作成一个预备“牺牲”、“奋斗”的组织，认他为一个作战的“大本营”。

得了这几种结果以后，社员的精神受了一番很大的鼓动。又复讨论了几件根本的事情：定于每星期六下午开全体社员会一次；寻一固定的会所；共同分组研究。当时就拟定了三个题目：

一、家庭改造；

二、共同生活；

三、工读主义。

分配的法子，是将全社社员分作三组，定期讨论，限一星期内讨论出作一个报告，再由全体社员共同讨论之。

对于加入新社员限定的范围，是用（由）社员的介绍（者）报告被介绍者的优劣点，然后经大家的批评。这种资格必当具有“牺牲”、“奋斗”、批评同受批评的精神。经过这次会后，社员的团结又增进一层，社中的精神又猛进一步。这个时期可谓之“猛进期”。

十七日分组讨论，讨论“共同生活”。大家的精神非常愉快。

二十日有两组分着讨论“工读主义”同“家庭改造”两个问题。

二十二日下午全体社员会议，共同讨论前者分组讨论的三个问题。他们结晶的稿子：“家庭改造”尚不完备，“共同生活”缺少现在实行详细的方法，“工读主义”的实地办法亦不甚完备；所以这三种问题均又交回再加讨论。晚间又继续讨论布置会所问题。开始实行批评社员，并讨论批评的方法。又有社员介绍新社员入社，经他报告毕，全体社员分别批评，然后请介绍人问他个人的观念，再定可否。

自这天以后，分组的讨论天天都有，社员互相渐渐的了解。问题的讨论，可以算进步最

速的时期。

二十九日全体会讨论了几个问题：一、找定固定会所问题；二、社员入社问题；三、读书问题；四、研究"工读主义"讨论的结果；五、实行互相批评；六、通过新社员入社。那一天的互相批评结果是非常之好，颇能引起各人的兴味同奋斗。

十二月一号是我们有固定社址的第一天，社员都将各人所有的书籍存入社内，成为公共的藏书，并布置社中陈设的一切。

二号讨论"工读主义"。各人提出入社公共支出的问题互相研究。

六号开会讨论会务，共决定数事：

一、会员将随时感触写入社中的自由录；

二、小册子准于一月一日出版；

三、傍听公开，每次限二人，须先期介绍；

四、职任的分担问题；

五、因社员皆忙着学生会合组事，所以读书团进行暂停。

九号为"共同生活"问题讨论期。讨论的结果大家认为内容不完全，须再研究。

十三号因为一部分社员遭了火灾，所以得了工夫，大家开了几次会，商量进行的事。

二十一号开全体大会，决定几件事：

一、小册子问题　延期至一月五号出版，并分人担任校对、广告、发行的事；并增加"？"一栏的稿件。

二、介绍社员问题　有两个新同志入社。

三、社员个人发表对于本社的感想　各人结晶的话，把他总起来写在下边：

　（甲）有奋斗的精神。

　（乙）缺乏活泼的气象：

　　（一）没有同一的目标；

　　（二）没有同一的途径；

　　（三）不能有讨论的好出产物——没有知识——并且时间不经济；

　　（四）没有持久的精神；

　　（五）没有实行的能力。

　（丙）没有真正的目标和平坦的道路。

　（丁）以后关于本社的问题都可拿来讨论，渐渐可以打破以上的难题。

　（戊）个人的自觉自决，先得看准自己的目标，然后就可实行。

　（己）本社的人不应受环境的支配，当支配环境。

四、"读物"互助问题　由社员自任购买何种杂志，读毕择要揭出，再置社中轮看，以免漫读，并定购书报若干册。

五、决定下礼拜六（二十七）一点半开会。预定讨论的事情：

　（甲）个人问题如何？

　（乙）个人和本社的精神和目标怎样贯通？

　（丙）社内费用问题；

　（丁）小册子内容等问题。

六、过年问题讨论的结果是：

（甲）为什么要过年？提倡阳历，联络感情，评判过去，希望将来；

（乙）时间在十二月二十七号下午一点至晚间；

（丙）会餐。

七、社员用抽签法，决定代表个人的号数，好替各人对外的姓名。

二十七日下午二点开常会，先讨论了两件事情：

一、社中经费问题　所有“开始”、“经常”等费，全归举定的会计兼庶务员十九君算出来，大家纳人。当时并举定五〇君（为）专理印刷事件的会计员。

二、小册子里面发表的文章，个人姓名全用号数代表。篇幅一层，再加增十篇，定在四十篇以内，所以出版日子又展期几天。至于关于发行的事，通信天津南开大学二八君（现改为天津草场庵学生会联合会转二八君）。关于询问的事，通信天津河北黄纬路工业专门学校五〇君。

现讨论两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人对于“觉悟社”的感想如何？

二、“觉悟社”的精神和目标（共同的）是什么？

由各个人依次发表，精神很团聚，实实在在是很可纪念的一个会。

内中还有一位社员进行了一篇忏悔，在各方面说得都非常精警。以次各位社员按着这种意思都发表了些意思，大半渐渐都认清了目标。

当晚又继续讨论“觉悟社”的大目标，永远的宗旨是：

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于“人”的生活。

头一部实行的手续，当天晚上讨论了两件事情：

一、改造现在中国学生的思想

现行的方法：实行文化运动——文字的、宣传的；
要求教育改革——制度上、思想上；
提倡社交公开——个人的、团体的。

二、改革我们自己

现行的方法：读书；互相研究学理；问题的讨论；常作文字上的出产品；实行批评：
(甲)随时随地、(乙)批评自己，批评别人，受人批评，两个人的谈话。

以上是那天晚上暂定的头一步手续里两件事情（社中大半已经实行了），其余的因为时间晚了，定为下次大会再议。

那天的会议是民国八年最末次的会议，也是三个半月的“觉悟社”的最末次聚会，并且可以说是“觉悟社”成立后最重要的一个会。在试验期中还没有着落的“觉悟社”，经这次会议，共同的大目标才算定妥了。这个时期可以叫做他为“觉悟社”的“寻着方向期”。

总起以上三个半月的情形，我们社中种种的事实大半已“披露无遗”。我们想的怎样？说的怎样？行的怎样？精神如何？能力如何？我们自己的观察决不敢说看得透彻。所以我们自己不去评判。请大家看完了这篇实录，给我们一个深刻的评判，通信来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社员全体所最盼望的。

（《觉悟》第1期，1920年1月20日）　（选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节录）

王光祈

本会在去年六月三十日发起。同人为郑重其事起见，筹备期间预定一年，应于今年七月一日开成立大会。现刻本会同人散居各地，不易聚集。兹特将开成立会时所应报告各事，提前通知，以便选举职员，督促会务进行。

本会同人在本会未发起以前，大半先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出处进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团体规模。去年留东同人归国，首由北京会员王光祈君提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一册，书中历叙同人今后进行，宜为一种有统系的有秩序的，并草拟学会规约大纲数十条。其时东京会员曾琦君等亦正有建设学会之计划，乃先派雷宝菁君归国接洽一切，同人意见遂归一致。曾琦君、张尚龄君亦先后由东京归国，乃有七年六月三十日嶽云别墅之会议。

嶽云别墅者，本会成立史中最可纪念之发祥地也。到会者为：陈君淯、张君尚龄、周君无、曾君琦、雷君宝菁、王君光祈六人。会议结果，公推王君光祈为起草员。遂由王君光祈草拟规约数十条，复在嶽云别墅会议修改数次，并邀同会员李君大钊商榷一切。于是本会规约七十条全体产出。当时列名发起者则为陈淯、张尚龄、曾琦、李大钊、周无、雷宝菁、王光祈七人也。

本会同人何为而发起斯会乎？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

吾人最终目的，即为创造“少年中国”。夫少年中国之形式为何如乎？则应之曰：吾人所欲创造之“少年中国”，即适于二十世纪之少年中国是也。

盖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亦非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于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故十九世纪之“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所造之“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在当时视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视之，则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何则？彼所创造之意大利、德意志，固非适合于二十世纪之思潮也。同人等因个人观察之不同，故有以英美式民主主义之组织为适合于二十世纪者，亦有以俄国式社会主义之组织为适合于二十世纪者，更有以安那其式Anarchism之组织为适合于二十世纪者。要之吾人所欲建造之“少年中国”，为进步的，非保守的；为创造的，非因袭的；在并世国家中为少年的，而非老大的也。

吾人既抱有如斯简切明了之目的，又将遵何道以达吾人之希望耶？欲答此问，请略述本会之宗旨：

（一）振作少年精神　本会既为青年活动团体，故出版书报，多系鼓吹青年之作。盖青年者，吾人所视为创造少年中国之唯一良友也。

（二）研究真实学术　同人等主张凡事皆本于学术，见诸事实。故会中有科会、学术谈话会等之组织，皆所以达研究学术之目的者也。

---

* 指“少年中国学会”。——编者

（三）发展社会事业　本会同人大半皆从事教育实业；亦即同人等所视为建造“少年中国”之唯一良好手段也。

（四）转移末世风气　本会信条，在积极方面，则有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之规定；在消极方面，则有第十四条概括规定之禁约，实欲由少数青年身体力行，以造成一种善良之风气。

以上所述系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发起时之情形。今再就筹备期间一年中之会务详述如下：

当时规约既已拟定，遂组织筹备处，设主任一人，会计文牍各一人，公推王光祈君为筹备处主任兼会计，周无君为文牍。又设临时编译部，公推李大钊君为主任。其余会员皆归人编译部办事，为临时编译员。筹备期中所有会务已见诸实行者：

（一）刊布图书　八年一月刊布《国体与青年》一书，为会员曾琦君著。其余在编译中者尚有数种。

（二）发行杂志　从八年三月一日起，创刊《会务报告》。每月发行一次。近拟于七月一日开成立会时，创刊《少年中国》月刊。原来之《会务报告》，即并人此项月刊内。

（三）举行讲演　本会同人散居各地，不易聚集，故每期《会务报告》皆请名人撰述一篇，以代讲演。

（四）供给材料讨论问题　此事虽有少数会员业已履行，惟尚未如当时预期，此实由于科会进行未臻活泼之故。本会研究学术成绩之有无，全视科会进行活泼与否为断。故此后选举科会主任一事，极宜注意。

（五）学术谈话会　此条在当时规约中并未规定，惟上海会员魏嗣銮、宗之櫆、张尚龄、曾琦、李璜、周无（李、周二君现已赴法）诸君，欲互相交换智识，乃有斯会之组织。所谈均有笔记，成绩极佳。此实为本会筹备期中一极好之现象也。

（六）印刷储金　此事由吴淞会议决定，现刻多数会员业已实行，以养成吾人之储蓄习惯。

（七）会员人数　本会对于会员资格限制极严。凡加入本会者，须有会员五人介绍，经评议部认可。现在筹备期间，评议部尚未成立，须俟七月一日开成立会后，评议部正式成立，再为请求追认，方能取得会员资格。兹就筹备处所收到之入会愿书，其人数如下：

文科十二人：周　无、魏嗣銮、宗之櫆、赵曾俦、易家钺、沈懋德、彭　举、李劼人、袁同礼、左学训、黄日葵、许德珩

工科四人：雷宝华、赵世炯、郑尚廉、葛　沣

经济科四人：陈　淯、李　璜、李大钊、王光祈

政治科四人：曾　琦、张尚龄、刘正江、雷宝菁（已故）

商科一人：涂开舆

（八）联络友会　本会同人曾经决定永远不与其他学会合并，然有宗旨相同之学会，亦可联成友会，互通声气。月前东京、北京、湖南方面皆有宗旨相同之学会愿与本会联成友会，惟未经正式接洽，暂不宣布。

以上所述皆系筹备期中会务进行之状况。将来本会正式成立，如办理得法，必能蒸蒸日上。盖今日全国之青年已渐臻觉悟之境，本会实为应运而生之团体也。　（后略）

（《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1919年5月1日）（选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给少年中国学会的信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日）

张 申 府

吾的根本主张是废国，灭产，绝婚姻。感受资本制度的恶果，痛恨几于不可终日。对于社会的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华，对于共产主义自然要更绝对的信奉。凡对于社会，曾作过一度考虑的人，无不晓得社会主义的对面便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更没有第三者。更进一层的切实言之，现在摆在眼前的，只有共产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条路。今日的问题只是共产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之争。一个人不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党了这边，便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党了那边。无所谓温和派，无所谓超然党。列宁的国有资本主义只能说是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个方法，一个暂时的手段；没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完全谈不到那个。吾绝对相信救治今日的病恶，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吾绝对相信如要把现状改换，只有换改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不过有人说：心以为好而想创造的政治制度"决不是社会主义的"。那必是对于社会主义真意，完全未懂；不然，便更不可说！

吾现在很觉着，对于少年中国学会，有许多地方不能同意。吾不是本科学的精神，吾不是不为社会的活动。自然以生地的关系，吾也很想创造一个少年的地方叫作少年的中国，作为少年的世界的一部分。只是为想创造的少年中国，绝不是泛泛的少年中国，绝不是象少年意大利一类的少年中国。吾想创造的少年中国，乃是无产阶级的少年的中国，乃是有充分的少年精神（进取，切实求是，赤裸裸，随顺自然，活泼泼地无丝毫之束缚）的，以劳农为主的少年中国。不把这些形容词撷要标出来，吾已万分不能忍受。如再说"所谓少年中国……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少年中国"，吾更万万分不能忍受。倘或再进而简直把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抛开，（新近修规约正案在宗旨上加了民治一层，越使我惊异。吾现在只懂得"工人治"Ergatocracy很不晓得什么"民治"Democnacy）而但拿学会的一个学字来遮掩少年中国学会。

张申府　九月二十日

（原载《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1920年9月出版）

（选自《"一大"前后》）

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

（一）宗旨　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

（二）团员　凡志愿入本团者须团员一人之介绍，经全体团员认可，得为本团团员。

（三）服务　团员每日每人必须作工四小时。

若生活费用不能支持，得临时由团员公议加增作工钟点。

厨中事务及打扫院宇，由团员轮流担任。

（四）权利　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

团员所需之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系归团体公有。

（五）工作种类　暂分九种：

一、石印；

二、素菜食堂；

三、洗衣服；

四、制浆糊；

五、印信笺；

六、贩卖商品及书报；

七、装订书报；

八、制墨汁及蓝墨水；

九、其他。

（六）工作所得　归团体公有。

（七）设备　设书报室及音乐室。

（八）组织　由全体团员组织团员会，选举事务员，并讨论团中重要事务及审查新入团员。事务员设总会计一人，管理全团银钱出入事务；会计若干人，分管各组会计事务。设庶务二人，管理全团买卖及一切杂务。事务员每月末日选举一次，得连任一次。组织细则，另行规定。

（九）规约　凡团员有怠于作工情事，由团员会提出警告；经继续三次警告，仍不努力尽职，即令其出团。

（十）出团　团员得自由退出团体，惟须提出理由书。

（十一）附则　凡团员不能入校听讲者，得由本团聘请教员，每日教授二钟；若程度不齐，得适用单级教授制。

本团预算及工作分配方法，另有细章。

本团简章得由团员会随时增改。

报名期限以额满为止，俟经费充足时再为推广。

凡报名愿入本团者，请注明愿在本团何组工作。

通讯处：北京东华门内宗人府东巷蓬庐王光祈。

（《少年中国》一卷七期）（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工 读 互 助 团

王 光 祈

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现在北京方面已成立了，各省亦将次第组织，这真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

自从这个团体发生以后，各处同志来函探询讨论的约有数百封，我因为事忙，不能一一答复，今天我做这篇文章，便是一封敬答各同志的"复信"。

这篇文章分为四段：（甲）工读互助团发起的动机及成立的经过；（乙）工读互助团的组织及其预算；（丙）工读互助团与其他各种组织不同之点；（丁）工读互助团的将来。

(甲)工读互助团发起的动机及成立的经过

自从欧战停后，世界潮流排山倒海直向东方而来，中国青年受此深刻刺激，顿成一种不安之象，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去年二月由沪返京，取道金陵，曾与左舜生君讨论一次。去年夏间又有一封长信论及"小组织"事，颇引起社会上研究"新生活"的兴趣。但是我们中国人向来有一种"只说不做"的习性，前回讨论"小组织"问题，亦犯了这个毛病。我对于"小组织"不能使他在最短时期中实现，是我生平一桩极可耻的事！这回讨论工读互助团问题，我又怕犯这种"只说不做"的毛病，所以我那篇《城市中的新生活》发表以后，立即奔走筹划，不到一个星期，居然有了头绪；不到一个月，居然组织成功。其中最出力的，当首推陈独秀先生，这是我很感谢的！

那篇《城市中的新生活》发表后二三日，便有数十位同志来信愿从事此种生活；一星期后，外省亦有许多同志来信讨论此事，于是渐渐由理想见诸实行。后来我草拟工读互助团的简章，大半根据于《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兹先将此文抄录于后：

城 市 中 的 新 生 活

数月以前我与左舜生君讨论小组织新生活问题，注重乡村间的新生活，今天我所提倡的是城市中的新生活。

昨日我著一篇改造旧家庭的方法，主张组织一种"女子互助社"，今天我所提出的就是把"女子互助社"的范围扩张为男女生活互助社，为苦学生开一个生活途径，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

现在青年男女受家庭种种压迫，欲脱离家庭另谋独立生活，但是一个少年人初离家庭，

四顾茫茫，社会黑暗又胜过家庭百倍，大有穷途之叹。我们若先有一种适当的组织，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胆子大了，便可踊跃前来，与黑暗势力奋斗。这是第一个理由。现在青年男女大概皆倚赖家庭生活，一方面为家庭之累，一方面养成倚赖习惯，终身不能独立生活，为社会之蠹。若是有一个适当组织，可以训练他们的独立生活。这是第二个理由。现在社会制度不良，平民生计日艰，虽有优秀青年，亦为境遇所迫，不能读书。若是有一个互助组织，便可自由读书。这是第三个理由。我们大家的脑筋中都希望将来有一个新社会实现。但是若要新社会实现，必先养成一种互助劳动的习惯。若有了适当组织，便可以养成互助劳动的习惯。这是第四个理由。我们天天在文字上鼓吹改革社会，从未有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这种互助组织，便是我们实际运动的起点。这是第五个理由。有了以上五种理由，我们便应该计划一种实行的方法。

（一）这种团体的名称，可以称为“工读互助团”。因为在这种团体里的团员，必要具备两种资格：

1．作工；

2．读书。

（二）生计方法暂时可以分出两种：

1．手工　如织袜、织手巾、装订书籍之类；

2．贩卖　如贩卖国货及书报之类。

关于置备机械、租赁房屋的资本，我们愿意担任筹募。

（三）团员不限于男女，均在一处共同作工，惟寝室分作两处。

（四）每日作工六小时，读书三小时，其余时间作为娱乐及自修之用。

（五）共同工作所得之收入，为团体共有之财产。

（六）团员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皆由团体供给。

（七）团员所需之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皆由团体供给，惟所购之书籍报纸，均系团体共有。

（八）团体中须置备陶情悦性之音乐数具，随时举行各种游戏，共同娱乐，或结队郊外旅行，强健身体。

（九）团员求学择校，完全听其自由，并可用团体名义请求各校特准旁听，减少学费。

（十）若因工作时间太多，不便在各校听讲，则由团体每日敦请有专门智识的学者教授二钟。

（十一）凡有团员一人之介绍，经本团体评议会认可，便得为团员。

（十二）凡自愿退出团体时，须提出理由书，经评议会通过，得听其自由退出。

（十三）每日工作所得，皆须在册上注明，若有怠于工作情形，由评议会提出警告，若经三次警告仍不努力，即令其退出团体。

（十四）本团评议会由团员全体组织之。

（十五）本团执行部由评议会中选出若干人组织之。

（十六）执行部办理会计庶务等事。

（十七）本团团员须随时佩带本团徽章。

（十八）团员有不道德之行为时，互有规勉之义务；若事情重大有妨团体名誉，即由评

议会令其出团。

以上数条是我随手写出来的，杂乱之弊在所不免，将来正式组织时，再作成有统系之规定。

这种组织比“半工半读学校”好。因为“半工半读学校”的课程是有限制的，不能将各科皆办齐全，以应一般苦学生的需要。而且程度参差不齐，又不能开办若干班次。现在把生活与求学分成两事，较易办理。第十条特请教员教授，是一种补助方法。

这种组织比“成美会”好。因为“成美会”供给苦学生的学费，在供给的方面，便是一种恩惠行为，在受供给的方面，便是倚赖他人生活，故不如这种团体，完全由自己奋斗。

这种组织比“新村”容易办到。因为“新村”须要有土地，而且我们现在生活的根据又在城市，所以这种主张比较切实可行，更为需要。

这种组织除北京先行着手外，将来在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处都要设法推行。我很愿意费些时间专奔走此事。

这种办法已与陈独秀、李守常诸君等商量，我们立刻就要做去。现在请求阅者诸君两事：

（一）代调查手工艺种类，并说明需要资本若干，务请详示；

（二）凡愿为此种生活者请先期见示。

通信处：北京东华门宗人府东巷东口内蓬庐王光祈。①

工读互助团的草案拟定以后，又到各处调查，编制预算。然后由发起人开了一个会议，将预定的开办费一千元，由各发起人签名自愿担任筹募若干，限本月月底缴齐。一面租房子，一面制家具，一面接洽团员，一面向外募捐，不到半月工夫，诸事齐备，所募之款亦已逾额，又开了一次团员大会，工读互助团遂居然产生于“首恶之区”的北京城里了。

（乙）工读互助团的组织及其预算

兹将该团简章、预算及募款启事，抄录于后，便知道他的组织极其简便，容易举行。

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

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这种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这财政紧急的时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这种经济上的重累。同人等因此种种理由，特组织“工读互助团”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倘然试办有效，可以推行全国，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和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照眼前试办的预算，需费不过千元，凡赞成此举者，请量力捐助为荷。

发起人：顾兆熊　李大钊　蔡元培　陈独秀　胡　适　周作人　陶履恭　程演生　王星拱　高一涵　张崧年　李辛白　孟寿椿　徐彦之　陈溥贤　罗家伦　王光祈

关于缴纳捐款等事，请与北京大学新潮社徐彦之君接洽。

---

①《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到此为止，原载1919年12月4日《晨报》。——编者

工读互助团简章

（一）宗旨　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

（二）团员　凡志愿入本团者须团员一人之介绍，经全体团员认可，得为本团团员。

（三）服务　团员每日每人必须作工四小时。

若生活费用不能支持，得临时由团员公议加增作工钟点。厨中事务及打扫院宇，由团员轮流担任。

（四）权利　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

团员所需之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系归团体公有。

（五）工作种类　暂分九种：

一、石印；

二、素菜食堂；

三、洗衣服；

四、制浆糊；

五、印信笺；

六、贩卖商品及书报；

七、装订书报；

八、制墨汁及蓝墨水；

九、其他。

（六）工作所得　归团体公有。

（七）设备　设书报室及音乐室。

（八）组织　由全体团员组织团员会，选举事务员，并讨论团中重要事务及审查新入团员。

事务员设总会计一人，管理全团银钱出入事务；会计若干人，分管各组会计事务。

设庶务二人，管理全团买卖及一切杂务。

事务员每月末日选举一次，得连任一次。

组织细则，另行规定。

（九）规约　凡团员有怠于作工情事，由团员会提出警告：经继续三次警告，仍不努力尽职，即令其出团。

（十）出团　团员得自由退出团体，惟须提出理由书。

（十一）附则　凡团员不能入校听讲者，得由本团聘请教员，每日教授二钟；若程度不齐，得适用单级教授制。

本团预算及工作分配方法，另有细章。

本团简章得由团员会随时增改。

报名期限以额满为止，俟经费充足时再为推广。

凡报名愿入本团者，请注明愿在本团何组工作。

通讯处：北京东华门内宗人府东巷蓬庐王光祈。

本团预算及工作分配方法

本团因便利团员求学起见，暂分为三组，共需费一千元。

第一组　二十七人，地点在北京大学附近。

营业要目：（一）素菜食堂；（二）石印及装订；（三）洗衣。

第二组　十九人，地点在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附近。

营业要目：(一)素菜食堂；(二)洗衣；(三)制造小工艺，如浆糊、墨水等。

第三组　若干人，地点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本组全由女子组织）。

营业要目：（一）编织；（二）小工艺。

第一组　开办费四百元（食堂与石印局系在两处）。

（一）开素菜食堂共需房费设备费等一百元；

（二）石印机器及其附件一百五十元；

（三）石印局房费一百元；

（四）买家具五十元。

每月经常支出		每月经常收入	
两处房金	共五十元	食堂收入	一百元（除去资本）
伙食	共七十元		
教育费	共六十元	石印及装订收入	一百二十元
衣服费	共三十元		
医药、书籍、邮票等	共六十元	洗衣收入	五十元
共支出	二百七十元	共收入	二百七十元

工作分配方法：

（甲）食堂每日十人，其分配方法如下：

四人担任（上午十一钟至下午一钟，下午五钟至七钟）食堂招待、坐柜的工作；

二人担任（上午十一钟至下午一钟，下午五钟至七钟）灶上的工作；

二人分任上午七钟至十一钟食堂招待、坐柜及灶上的工作；

二人分任下午一钟至五钟食堂招待、坐柜及灶上的工作；

下午七钟以后之工作自由担任。

（乙）石印及装订每日十二人。

机器每日八人。每日十六小时分为四班工作，每班二人，每人四小时；

书写及装订四人。

（丙）洗衣每日五人。

收送衣服一人；

洗濯衣服四人。

以上三项工作共占二十七人。

第二组　开办费三百元。

（一）食堂设备及房费共二百元；

（二）购买制造小工艺的原料及工具一百元。

每月经常支出		每月经常收入	
房金	三十元	食堂收入	一百元
伙食	共六十元		
教育费	共四十元	洗衣收入	五十元
衣服费	共二十元		
医药、书籍、邮票等	共四十元	小工艺收入	四十元
共支出	一百九十元	共收入	一百九十元

工作分配方法：

（甲）食堂每日十人。分配方法与第一组相同。

（乙）洗衣每日五人。分配方法与第一组相同。

（丙）制造小工艺四人。

第三组　开办费三百元。

（一）房费一百元；

（二）购买工具及原料等二百元。

每月经常收支及工作分配方法，俟开办时再为精密计算及分配。

上列简章及预算中，须说明者，谨述如下：

（一）团员入团以后，须必工必读，二者不可缺一。至于未入团以前，曾经受过教育与否，在所不问。惟须考察其是否了解这种团体的精神。

（二）工作以时间为标准，不以工作结果为标准。譬如甲只要两点钟便可织一匹布，乙需要四点钟始可织一匹布，但是甲仍然应该作四点钟的工，以尽其所能。至于工作有难易轻重之别，宜随时轮流交换工作，以均劳逸。

〔理由〕譬如有甲乙二人，甲可以举重一百斤，乙可以举重五十斤，若甲故意只拿八十斤，其结果虽比乙多拿三十斤，但是我们心褒乙而贬甲，因为乙系尽其所能，而甲系不尽其所能。我们既主张互助，自应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互助习惯，即简章中所谓"每日每人必须工作四小时"的规定，都应该取消，纯由团员本互助的精神以尽其所能罢了。工读互助团内的工作，关于精深技术的甚少，所以随时交换工作尚不发生困难。

（三）工作所得必须归团员公有。团体的盈虚利害，便是团员的盈虚利害；团员的痛苦幸福，便是团体的痛苦幸福；因为团员是团体的一部分。

（四）团员所必需的生活费用由团体供给。现在团体对于团员所供给的各种费用，尚略有限制。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互助习惯，便可由团员自由取用，以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

（五）现在工作种类，关于“生产的工作”尚少，将来应多添“生产的工作”。我最爱种菜，因为这种工作极有生机。

（六）事务员最好由团员轮流担任，任期不必太长。但是恐团员中有因性情关系，不善办理事务，反有害于团务进行，故一月选举一次。既可以比较的易得相当人员，又可以免把持的毛病。

（七）团员不分男女，均在一处作工。惟按照现在情形而论，有许多女子不敢同男子一处作工，故特为女子专组织一组，其余各组仍是男女共同劳动。

（八）团中预算虽经几人调查始着手编制，但是其中仍必有多少错误。

（丙）工读互助团与其他各种组织不同之点

第一不是慈善事业。慈善事业完全是“蹴尔而与之”的残羹冷炙。工读互助团的基本金虽是捐助得来，但是那些捐助的人或是希望“理想社会”实现，故努力出资，筹办一切；或是恐怕社会革命快来了，赶快把自己的钱贡献一点于工读互助团中，将来或者可以免去一场流血的革命，因为工读互助团是一种“不流血的经济革命”。故就捐助的方面而言，决不是“蹴尔而与之”的慈善事业。而且团员中颇有自由捐款的，更可以证明决非慈善事业。若就提倡的人而言，专为接济几位苦学生，而不惜终日奔走以经营之，亦太值不得。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接济苦学生，是在创造新社会。

第二不是职业学校。职业学校是在养成专门技术人材，为国效用。工读互助团是在养成一般劳动互助习惯，以便将来改革社会。他的目的不在养成专门技术。职业学校招生以学术为标准，工读互助团征求团员以思想道德为标准。

第三不是《解放与改造》所介绍的、所提倡的“合作”。其不同之点有二：

（1）“合作”Co-operation承认资本，所以他们的资本是每年有利息可分的。工读互助团的基本金是没有利息的，亦不是谁的股份。

（2）“合作”所得的余利，或按照股份给以利息，或依各个工人所得的工资的多少，或依各个买客所出钱的多少，记在他们名下，当做他们入社的股本（参观《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八号《近代的合作运动》）。工读互助团营业所得的余利全归团体，团员各取其所需。我觉得工读互助团比“合作”彻底，但是工读互助团所需要的互助道德，更觉紧要。

第四不是半工半读学校。因为半工半读学校的课程是有一定的，而且在本校求学。工读互助团的课程是没有一定的，无论入何种学校，都是可以的。

第五不是“成美学会”。因为团员所用的，都是他们自己血汗得来的。

第六不是其他各种工作的组合。因为工读互助团是工读并重的，他的宗旨不专在作工。

总之工读互助团的理想，便是：

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丁）工读互助团的将来

现在武昌、南京、天津、湖南平江、上海、浙江各处皆将组织，前途很有希望。但是我希

望组织的范围愈小愈好，而组织团体愈多愈好。若有联络的必要时，还是实行我们“小团体大联合”的计划。我们团员随便到甚么地方，皆有工可作，有书可读。

筹款方法，或由发起人担任筹募，或由团员自己集资，或开各种游戏会筹募亦可。

征求团员，务要慎重。选择工作，务求有益、有利、有趣。

陈独秀先生云，此种团体，经济方面、道德方面皆要极端注意。

顾梦渔先生云，照欧洲各种组合的成例，先有消费组合，然后再办生产组合，方不失败。

李守常先生云，照美国“宗教的共产村”的成绩而论，经济方面尚无可虑，精神方面尤为重要。

我以为工读互助团是初次试验，须俟切实做去，始能发现他的毛病。发现毛病立刻医治。若是此次试验成功，吾人理想社会便不难实现；若是失败，至少可以阻滞进化半世纪，我们都是大罪人！

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劳动互助习惯，所有一切简章规约皆可废止。我们以后的生活便是：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

著者按：蔡孑丘先生曾提议将“工读”二字改为“工学”。后来开会讨论，大家以为“工读”名称既已宣布，不必更改。而且“工学”二字与“农学”、“医学”相似，恐他人误认为研究工业学问的团体，所以决定仍用工读互助团名称。

我们为推广工读互助团起见，特在《少年世界》上专辟一栏登载此项消息。

（《少年中国》1卷7期，1920年1月15日）

（选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上海工读互助团简章

一、宗旨　本团以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为宗旨。

二、团员　凡志愿人本团者，须团员三人之介绍，全体团员之认可，得为本团团员。

三、服务　团员每日每人必须工作六小时。若生活费用不能支持，得临时由团员公议，增加工作钟点。

四、权利　团员生活必须之衣食住及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均由团体供给，惟书籍归团体公有。

五、工作种别　暂分下列四项：

a.平民饭店；

b.洗衣店；

c.石印；

d.贩卖商品及书报。

六、工作所得　归团体公有。

七、设备　设书报室及俱乐部

八、组织　本团公选事务员若干人，讨论团中重要事务。

事务员设总会计一人，管理全团银钱出人事务；会计若干人，管理各组银钱出人事务；庶务若干人，管理各组卖买及一切杂务。事务员每月选举一次。

九、规约　凡团员有怠于工作情事，除私人规劝外，得由事务员召集团员会议全体劝告，经三次劝告仍不努力尽职，即请其出团。

十、出团　团员得自由出团，惟须提出理由书。

十一、人数　本团暂以四十人为额，俟经费充足再行推广。

十二、附则　本简章得由团员公决增改。

本团拟在徐家汇开办。工作的分配、组织，俟开办后另订细则。

通信处　上海法界八仙桥永乐里全国各界联合会。

临时会计　彭璜。

《星期评论》第40期，1920年8月7日出版

（选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

王 光 祈

是人的问题

不是经济的问题

近来北京工读互助团进行上颇发生困难，这种困难所以发生的原因，我以为全是人的问题。

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位团员常对我说，团中有许多团员是很了解工读互助主义的，但是不肯实行工作；亦有许多团员是很能实行工作的，但是对于工读互助主义却不十分了解。

前一派的流弊便是发生经济恐慌的原因。因为他们谈到工读互助主义，真是说得天花乱坠，十分彻底；但是实行工作的时候，他们便不能言行一致了。工读互助团的根本要义就是大家作工来维持大家的理想生活。现在既有一小部分人不肯努力作工，经济上当然要生危险了。

后一派的流弊便是丧却工读互助主义的精神。因为他们只知道终日作工，如机械一般，不晓得工读互助团之组织是有深厚远大的意思；他们以为是一种慈善事业。团中既有一小部分人不了解此种组织的精神，久而久之，遂觉得此种生活干燥无味。

故工读互助团若要进行顺利，关于团员方面，必要有八个字的资格，就是：

既能了解，又能实行。

工读互助团发起的时候，报名的有数百人之多。发起人对于团员虽曾经过一番审慎的选择，但是团员中果能具备这八个字的资格，实不多见。这是我对于工读互助团极抱歉的一桩事！因为我既是发起人之一，而且接洽团员之事大半由我担任，今日演出此种现象，完全是我当日急于组织成功的罪恶！

日前接该团来信，言内部感情不洽，比经济恐慌更要危险。更可证明此种组织所以发生困难的原因，完全是人的问题，而非经济的问题。兹将该团来信节录如下：

"感情不融洽的原因，素不相识是其一。又每因一个问题大家的主张不一样，争论下来不特不能互相容纳，反不能互相了解，而互相怀疑。这种精神的涣散，实在比经济还要危险。"

当初规定每月每人消费十元，其分配方法如下：

（一）房金一元五角；

（二）伙食三元；

（三）学费二元；

（四）衣服费一元；

（五）书籍费一元；

（六）医药费及零用一元五角。

后来北京大学特准本团团员旁听，免收学费，大学内图书馆亦可自由阅书，于是预算内之学费书籍费均可减除，每人每月不过消费七元而已。兹将第一组工作收入情形照录如下（系该团第一组最近来信）：

（一）电影股四人，办了一月，工作时间八小时，收入三十元；

（二）印刷股一人，工作时间约五小时，办了一月，得利数元；

（三）英算专修馆二人，时间六小时，前后两月，共收入七十余元，平均每月三十余元；

（四）食堂八人，工作时间五时，每日亏本二元。

据上述（一）、（二）、（三）三项，每月约共收入七十元，以七人平均之，每人可得十元，较之预算每人七元，已绰绰然有余裕了。

至于食堂一项所以亏折的原因，系由于事少人多、入不敷出之故。若减少作工人数，而其他团员在食堂吃饭的亦照例付钱，则食堂自身亦可维持。据一月以前我在北京观察，食堂营业万无折本之理，此次亏折，实出意外。

总之，工作不良，尽可随时设法更换，并非一成不变。

至于工作时间，如（二）、（三）两项，每日工作五六时，本不算多。（一）项工作八小时，我恐系来信抄写之误。因为我在京时，知道电影股工作不过每日三四小时，为各种工作中之最轻松者。

食堂工作时间亦不算多，若减少人数，亦不至于十分忙碌。

有人说，在此种私有财产资本制度之下，这种组织是不能存在的。其实，工读互助团的内部虽是一种共有财产的组织，而对外仍是一种营业竞争，换言之，不过是三五良朋合伙营业而已。

合伙营业之事，在中国社会上随处皆是，岂有别人的皆能存在，而我们的独不能存在吗？

并且他人合伙营业时资本是有利息的，我们的不必要利息；他人合伙营业是希望发大财，我们的营业只希望糊口而已。

这次失败，就是不善经营、不善计算、不善办理，别无他故。所以我认为不是经济问题，是人的问题。

又有人说，实行工读不必挂起新生活新组织的招牌。其实，实行工读互助已经是新生活了，聚集三五良朋为一种工读互助的组织，已经是新组织了。

北京工读互助团虽有不好的消息，但是我对于此种组织，仍是十分信仰，仍有十分希望。

（《新青年》7卷5期，1920年4月1日）

（选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平民主义和普及教育

光　舞

平民主义！平民主义的潮流，浪花灿烂，遍达于中国的四境了。我们按着这主义的精神，来批评现在社会上事事物物，都应得个个人"平等"、"一律"、"平均"为最终的主张；不承认人类间应有什么"阶级"、"差别"、"特殊权利"的存在，——一切都应该打破扫除的，不能让他们有一点儿留存。让我拿"教育"来说罢。

教育是个个人应该受的，不是少数人可以独占独霸的。个个人有受教育之权利和必要："平民主义"的"教育"就是：要个个人都受着教育，再进一层，还要个个人都受着程度相等的教育。若有些人受教育了，有许多人是不受教育的，这完全是"少数人"的"教育"，在平民主义时代当然说不过去。若有的人可以受高等教育，有的人只能略受一点初等教育，其结果各人的知识程度能力不一律，在社会上就会生出许多不平等的弊病来，平民主义的精神，不能算为完全贯彻；将来"平民社会"里面，若有这种情形，都应当排除纠正的。

中国向来行着一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对于"平民教育"谁也不去过问。那时候受教育的人，完全可以说是一班"贵族"、"官僚"、"富翁"、"缙绅先生"们的子弟。一直到了现在民国时代，还有那种样儿。你看，如从前袁世凯的"不赞成学校"，倪嗣冲的"请复科举罢学校"，和现在政府的"想法减少教育经费"，——今年全国教育经费已只二百七十三万多些，不及两师兵一年的开销，呸！——又正当"官满为患"的时候，忽地里举行"文官考试"起来；这种种的措施，种种的用意，不大大有"愚民的作用"在那里么？

再把中国现在的教育情形来看一看。查各国的"国民教育"——义务教育——都是"自由教育"，自国民学校以至高等小学，一律不收学费，且多供给书籍纸笔等等。美国连中学校也是这样的。现今俄国连大学都不收学费，中学以下还由政府供给学生的茶饭。他们的教育所以能够普及，就是这个缘故。我国现在的国民学校还有许多在那里征收学费，——乡间遍地皆是——而且往往费收极重，有每人每年征到二三元的。这就是他们减少教育经费的明效大验啊！至于高等小学全国一律都收学费；中学以上收费之重，更不用说了。哦！生活程度一天高似一天了。小百姓们血汗淋漓的，终年终月在那里劳动，且还有不能过日子的，那里还有余资给他们的子女读书？虽说国民学校花钱不多，——每人每年至少亦须得四五元——然而已阻止许多可忧可怜的小孩儿不得进去了。至于想进高等小学便难了，中学更难了，中学以上更有登天似的难了。由此推想起来，我们可说：现在自高等小学以至高等专门大学的学生，大多数是一班"军阀"、"官僚"、"财主"、"绅士"——他们都在"平民格"以上——的出产，"真正平民"分子在内的，极少极少。唉！这种"少数人"的"教育"、"贵族式"的"教育"、"特殊阶级"的"教育"，是和"平民主义"的精神根本不相容的。

平民主义！我们若想优游于平民主义的天地，踏平这个高高低低的社会，第一步须得打破那些“愚民的政策”，开放这种“独占的教育”，把神圣的教育普及到一般神圣的平民身上；万不可再让我们少数人在这里独独霸住了。若那大伙儿的“真正平民”都既受着教育，而且都既受着程度相等的教育了，平民主义的基础方才稳固，平民主义的社会才能完全实现。倘若不然，那么，本来是军阀、官僚……的子子孙孙，恐怕谁也不肯抛弃其特权，来过平民社会里“一律平等”的生活。难的！做不到的！！简直是“牵牛落井”！！！

哈！我们对于新社会的希望，全在于那些“真正的平民”身上！全在于那些“不能受教育”和“要想受高等教育而不得”的平民身上！！我盼望我们已经醒觉的青年和教育家，对于他们要大大的注意！要十分的努力！！

（《平民教育》第12期，1919年12月27日）

（选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三〕）

发起留俄勤工俭学

吾湘青年，于二年前发起留法勤工俭学，一时风起云涌，不上两年，去者近千。有名之教育家如徐特立君、汤松君，亦先后赴法，可为盛矣。迩来俄难渐平。俄国劳农政府确立于世，世界大国如英、如法、如美，求与通商亲善，惟恐或后。吾国地接俄疆，势不能坐失机会，是以北政府有派员赴俄联络之举，南方军政府前亦派人至海参崴接洽俄人。吾国青年学生，鉴于俄国精神学术之不可不研究，现在北京业有“赴俄团”之组织。至吾湘青年，正值力图向外发展广求知识于世界的时候，前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君等，乃有“留俄勤工俭学团”之发起。记者昨访彭君于商业学校，叩以赴俄利益及准备情形。彭君云：此次得京信，内载数端：（一）赴俄时每人只带路费二百元，衣服费五十元，伙食费五十元，合共三百元。（二）到俄后，俄政府可优待，不致冻馁。（三）通俄语者入俄国大学：铁道工程六年，医科五年，文科四年。不通俄语者，先习俄语，后入大学。审此则比赴法俭学尤为容易。俄国地寒，足以锻炼身体。俄人之深沈的文学及平等思想的哲学，为欧洲各国所不及。现各国新闻记者、学子、商人纷纷入俄，作考察调查之计。吾国诚有大批学生前去，即使俭学不足，继以勤工，终不难达到求学目的。且赴法要四十天，赴俄只要半个月，乃至二十天，旅途难易，又可概见。记者询以动身日期，彭君谓在九月；并谓甚愿得到同志十人以上，作吾湘留俄运动之先锋队云。

（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2日）

（选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

萌　柏

前几天因有一个留学俄国机会的好消息，连带又产生一个俄罗斯研究会的好团体，也足见得湖南的教育界不拘成见提倡新文化的一斑；也足见得湖南的政府，正欲革故鼎新与民更始，虚怀远虑，无不能容纳现世的潮流；也足见得湖南的人民精神活泼，勇于进取，大有要与世界文明族类并驾齐驱的气概。或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东方的瑞士，看看□起于有俄罗斯研究会的湖南，我要替有俄罗斯研究会的新湖南预贺！

但是有些人要说，你们随便邀集些人开了一次会，随便加上个俄罗斯研究会的名义，也有这些个希望、感慨，不真教人家好笑吗？其实这次集会，虽说是一时邀集而成，究竟也有前因后果。不是在今日，不是在今日的湖南，好容易组织这样的团体；有了今日，有了今日的湖南，我只希望各教育家、各有志的青年更发勇往直前，打破一切偶像，服从真理，或者东方的瑞士真要在研究俄罗斯做起。研究俄罗斯的人，莫要忘记了任重道远的责任啊！

我们固然不能说，俄罗斯一定是好的，非俄罗斯一定是坏的；然也再莫想非俄罗斯一定是好的，俄罗斯一定是坏的。顶好是用批评的态度，研究的方法，来对付这个世界的俄罗斯问题。如我是个毫无研究的人，也不知新文化究竟是什么，也不知新俄罗斯究竟是什么；然而俄罗斯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对付内部的反对党，对付强权主义的协约国，风驰电掣，根本改造北冰洋岸的一大块土。到今日内部的现象，日趋和平；劳农的政府，日趋稳固。什么世界的五大强国，力能推翻“如夏日可畏”的德意志，不能屈服“如冬日可爱”的俄罗斯，我因想俄人的群众心理，都保存有不可抵抗的潜势力。

听说俄国的革命，并非世界上偶然发生的一件事。俄人历来宽洪大度，虚心聆教，凡百年前，法兰西有种什么启蒙哲学，德意志有种什么罗蔓哲学，先后输入俄国，俄人总是欢迎接待。近来有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出世，俄国人见了毫不惊奇，大家研究起来，尽吸收其精华。至今俄国的革命，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产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中国人的古训。可爱的俄人，早有了这种谦虚的态度。现在中国人不也应该有这种态度来研究俄罗斯吗？

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状态，其详细的组织方法如何，局外人实在难明真相。但有几个显而易见特点，如：（一）废除土地私有制；（二）各种大企业收归国有；（三）公布劳动义务。即此数端，已足见俄国人权利义务的分配均匀。既无阶级产业上的区别，大有“贵则皆贵”、“富则皆富”的表征。诚使全人类都能秉“创造”与“互助”的本能，努力向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文明上去发展，行见新世界上的人，个个有“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尊荣与快乐，难道又不是新开辟得来的一个“黄金时代”吗？

努力去开辟这个“黄金时代”的责任，固然不应当卸肩在占世界一部分的俄国人身上；然在俄国人自身的眼光看来，好象大多视世界为“大我”，“以天下为己任”。俄国人硬欲争回自已的平等、自由，同时又很尊敬并希望各国人民均能平等、自由。所以劳农政府对外的方针：（一）排斥秘密外交，力与各国人民谋亲善；（二）废弃殖民政策，民族有同等的待遇。他们又并非是能说不能行。何以见得这样呢？不是劳农政府赞成芬兰独立，不是赞成波斯撤兵，不是赞成亚尔美尼亚的自治，最近一个好证例就是波俄战争。现在俄人居然完全战胜波兰了。俄人提出与波兰讲和的条件是如何？一面是声明不侵犯波兰的独立、自由与主权；一面是希望波兰民军组织新政府。我们以冷静的态度来观察，诚不见得俄人对于波兰有什么恶意咧。但这在我们中国人的眼中看来，这都还是些远而且大的事实，到不能于脑海中发生深刻的印象，使我们留了深刻的印象，怀想而且感激。俄国人的一宗事证，就是劳农政府致中国的通牒中，声明退还旧政府所劫夺中国的一切权利：凡俄旧政府在满洲、蒙古及其他省内的一切权利，如森林、矿山、租借地、赔款以及中东铁路等，一并无代价、无条件的退还于中国。难道这也是对于中国有恶意吗？有些人说，劳农政府的通牒带有传播主义的性质。不错，我们在他的通牒中，的确看出他的主义是：反对强权，提倡人道，主张民族自治，不惜牺牲最少数人，以来收回最大多数人固有的幸福；要创造一个大同世界，创造一个永远和平的世界。这就是他们通牒中传播给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主义，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无论如何，俄罗斯总是有研究的价值。研究他的好处，也更要研究他的坏处。我记得前次上海会见一位吴先生，他是很提倡国际主义的。他是很希望用了十分和平十分圆满的手段来达到国际主义的目的。所以他说俄国的革命，不幸在这过渡时代近于多数专制——就是劳农专制，但人民的知识与道德不能站在一水平线上的时候，社会的改造，只有比较的圆满与和平的方法。“无为之治”恐怕是不可能的。所以和平的世界，是俄人革命的目的；劳农政府，是俄人革命不能避免的手段；也恐怕是全世界革命必经过的阶段。

世人要想用一种比较俄人革命更发和平的手段来改造社会，改造国家，顶好也是将俄国的事情加一番确切的考察、研究，以资照鉴。我们中国普通一班官僚式，总喜欢用“掩耳不闻”、“老吏断狱”的办法。对于“时兴”的学说，概斥为邪说，不特自己不肯去研究，还要禁止人家研究他。不知“时兴”的学说，就是当时群众心理的产物，是不假外求的。譬如饥思食，渴思饮，是“人心”通有的作用。一般使用强权的人，不明此理，饥禁觅食，渴禁觅饮，卒至群起反抗。如塞川而水横流，酿为大患。这真是两年来俄罗斯所以经过如许痛苦的原因。

我们中国要想不蹈俄国的复辙，绝对的不是能用一种比俄旧政府更有力量的强权来压制预防社会的革命，所可做得到的。是要中国的官僚、武人，一反俄旧时政府之所为，调查俄国革命的原因与结果，细察群众心理的趋向；不加压制，反加提倡；不加预防，反加培养。移言之，就是要掠夺阶级的平民化。所以无论俄国的革命有好有歹，总是适应二十世纪的潮流才发生的，是不可根本避免的，是应当研究调查的。我们要记得清楚的，就是二十世纪的“新潮”，首先产生了一个“新俄罗斯”，不是“新俄罗斯”产生二十世纪的“新潮”，不要以俄罗斯的革命为偶然发生的一件事。

呀！我们中国的百姓，无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几个不受经济的压迫？几个不受社会的压迫？几个不受政治上特殊势力的压迫？压迫我们过奴隶的生活！压迫我们来过禽兽的生活！压迫我们来过罪恶的生活！我们是老年人的，不能正当的休养；我们是小孩的，不能得

正当的保育；我们年轻的，不能用我们的脑力自由去求些学问；我们年壮的，不能用我们的体力去造就一个真善美的世界，尽枉费在罪恶的生活上面。“谁实为之，孰令听之！”你要觉到现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罪恶，方才知道俄罗斯怎么起了革命，方才知道怎么应当研究俄罗斯，方才会研究俄罗斯到精微处。

（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7—30日）
（选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文化书社缘起

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外省人见了，颇觉得稀奇。有些没有眼睛的人，竟把“了不得”三个字连在“湖南人”三个字的下面。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和他不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根据，试问三千万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甚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见闻过几个新鲜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新文化，尤其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彻底些说罢，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不但中国，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到是我们一种责任呵。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居住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文化书社同人愿于大家公负的责任中，尽出力所能胜的一个小部分，因此设立这个文化书社（此外编辑社印刷社亦急待筹设）。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文化书社由我们一些互相了解完全信得心过的人发起。不论谁投的本，永远不得收回亦永远不要利息。此书社但永远为投本的人所共有。书社发达了，本钱到了几万万元，彼此不因以为利。失败至于不剩一元，彼此无怨。大家公认地球之上长沙城之中有此“共有”的一个书社罢了。

公历千九百二十年八月一日

（1920年8月24日长沙《大公报》）
（选自《新民学会资料》）

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

报告筹备及临时营业期内的情形

依照《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第七条："本社营业公开，每月将营业情形宣告一次"，今将筹备及临时营业期内关于本社经过一切情形，择要报告于次：

(一)发起及筹备之情形

本社发起于本年七月内，发起人鉴于世界新思潮之必须研究，而研究必须有良好材料，则新出版物之介绍机关必不可少，遂相与共谋书社之发起。八月二日，假楚怡学校开成立会，议决组织大纲八条，推定易礼容君、彭璜君、毛泽东君三人为筹备员，其职务为筹备书社成立，起草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关于"筹备成立"一节，可分下列三项：

1.房屋　初拟在长治路及省教育会等适中地点觅定，仓卒不就，始从湘雅医学校赁定潮宗街门牌五十六号湘雅旧址房屋之一部，于八月二十日由发起人赵运文君介绍，订定租约。

2.资本　本社既为公共组织，出资作为公产，亦无利息，则股本收入，事势上只能以同情于本社宗旨并互相了解之人为限。从八月二号成立会起截至十月二十二号第一次议事会止，投资者有姜济寰、左学谦、朱矫、杨绩荪、方维夏、易培基、王邦模、毛泽东、朱剑凡、匡日休、熊梦非、何叔衡、吴毓珍、易礼容、林韵源、周世钊、陶　毅、陈书农、郭开第、彭璜、邹蕴真、赵运文、潘实岑、熊楚雄、刘驭皆等二十七人，共收银五百一十九元。

3.与外埠交涉　除各杂志社外，正式约定与本社为出版物之交易者，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部、新潮社、学术讲演会、晨报社、武昌利群书社等十一处。因经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赵南公、李大钊、恽代英诸君为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而初时交易，多须现款，本社为稳固信用起见，亦不愿向人赊欠，因此本钱太少，周转颇难，往返商定，经时一月之久。至九月九号，书报杂志陆续到社，即于是日开始营业。三筹备员中推易礼容君为临时经理，进行一切，并约定罗宗翰君为本社驻京总代表，毛飞君为本社驻沪总代表。

(二)销售书报杂志之略计

本社营业范围，为书、杂志、日报三类。书计一百六十四种，杂志计四十五种，日报计三种。今略计从九月九号至十月二十号一个月零十二天临时营业期内重要书报杂志之销数开列如下：

新青年　八卷一号……………………………………………百六十五份

　　　　八卷二号……………………………………………百五十五份

新潮　二卷四号………………………………………………二十五份

* 原件藏湖南省博物馆。

改造　三卷一号……………………………………………………………三十份
新教育　三卷一号…………………………………………………………二十份
民铎　二卷一号……………………………………………………………三十五份
少年中国　二卷一号………………………………………………………十份
　　　　　二卷二号………………………………………………………二十份
　　　　　二卷三号………………………………………………………二十份
少年世界　一卷七、八、九号……………………………………………各十五份
劳动界　一号至九号………………………………………………………各百三十份
新生活　三十九号至四十号………………………………………………各百五十份
家庭研究　第一号…………………………………………………………四十份
晨报　最初…………………………………………………………………十二份
　　　现销…………………………………………………………………四十二份
时事新报　最初……………………………………………………………二十八份
　　　　　现销……………………………………………………………六十五份
罗素政治理想………………………………………………………………三十份
女性论………………………………………………………………………二十份
赫克尔一元哲学……………………………………………………………二十份
达尔文物种原始……………………………………………………………十份
罗素社会改造原理…………………………………………………………二十五份
旅俄六周见闻记……………………………………………………………十份
爱的成年……………………………………………………………………五份
杜威五大讲演………………………………………………………………五份
西洋论理学史………………………………………………………………五份
哲学概论……………………………………………………………………八份
论理学之根本问题…………………………………………………………五份
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三十份
新俄国之研究………………………………………………………………三十份
劳农政府与中国……………………………………………………………三十份
新标点水浒…………………………………………………………………三十份
胡适尝试集…………………………………………………………………四十份
胡适短篇小说………………………………………………………………三十份
科学方法论…………………………………………………………………三十份
迷信与心理…………………………………………………………………二十份

(三)消耗及营利之情形

(甲)消耗

开办器具及杂项……………………………………………………………二十四元
房租…………………………………………………………………………八元

伙食……………………………………………………………………………二十二元
邮汇……………………………………………………………………………二十五元
印刷……………………………………………………………………………十三元
纸类……………………………………………………………………………九元

合共……………………………………………………………………………一百〇一元
（乙）赢利……………………………………………………………………一百三十六元
（丙）赢利减消耗实余……………………………………………………三十五元

（注）办事人临时经理一人、营业员一人、送报二人、煮饭及走杂一人，均未支薪。

上系筹备及临时营业期内的大略情形，俟第一次议事会开会推举正式经理以后，即归正式经理负责。此报告系从八月二号成立会起至十月二十号止。

即希　公鉴

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文化书社筹备员　易礼荣
彭　璜
毛泽东

（1920年11月6、10、11日湖南《通俗报》）
（选自《新民学会资料》）

文化书社社务报告

（第二期）*

（一）

我们在去年曾出过一本社务报告，是报告“发起”及“临时营业期内”的情形的。现在这“第二期社务报告”，是报告从去年九月本社开幕至今年三月底“第一个半年”里的情形。长沙文化书社是去年九月初开幕的到今年三月底，有了七个月，与本社组织大纲“六个月一报告”之例，多一个月，这是因为算帐之便多出来的，以后还是按照组织大纲“六个月一报告”。

（二）

我们出这本报告的意思：头一层：与我们社里有直接关系的社员诸君，我们经理社务的人，在职务上应将如何推销书报种种情形，报告给大家，使社员都知道社里的实在情形，才算完了我们的职务。第二层：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讨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甚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布于社员以外。第三层：我们这个社的任务，在我们的“缘起”里曾经说道：“……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在组织大纲里也说：“……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的机会”，象这样极大的任务，是不能由我们几十个社员一肩担负的。我们为达到“人人有阅读机会”的目的，最注重的是各县开设分社，以七十五县每县设一个分社每一个分社有十个社员计，就要有七百五十个社员。所以我们惟有将社务公开，使远近同志的人，明白这个社的益处，分向各地开设分社，并口头或实力帮助我们的传播事业，“广布全省”的目的，庶几可以达到了。第四层：我们社里有的是书报，少的是本钱，为甚么呢？因为书报是外边来的，要几多也有。本钱是社员出的，社员不皆是富翁；社员所做的事又不单只书社这一件，那里有许多钱来做本？并且社的本是“公财”性质，没有退也没有息，我们这些穷社员，从那里出得来许多呢？然而文化书社这件事，的确是一件极可注意的事，试举其益，便有两宗：

（一）经营简便；

（二）不消耗本钱。

大家晓得现时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如果经营得法，一个书社的效，何止抵几个学校的效？因此我们为扩张社务，并推广

---

* 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

各县分社起见，希望有有力的同志，助我们一笔大一点的款子(我们计划于二年内替书社筹足公共资本三千元)。我们不知谁是愿意帮助我们的，自然不好到处去问，惟有将社务公开起来，庶几同情于我们的人，好自动的予以帮助。第五层：我们以前全是贩书，自己没有出版物，现在正计划组织一个“编译社”和一个“印刷局”，以与书社的“发行”连为一贯，然后本社乃有独立出版物。这样社务便更加扩张，非多邀同志和多筹资本（编译社定三千元，印刷局定五千元）不行，因此也得把社务公开起来，才可邀大家的同情和注意。最后还有一层是属于我们社内职员关于营业上的利益的。第六层：就是要社务发达，务必要帐目清楚。我们社内的帐目，有“日算”，“月算”，“半年算”三种，“日算”是每日晚上将营业的帐算出结果，“月算”是每月一号将上月全月内的帐算出结果，“半年算”是将半年的帐算出结果。这本社务报告里面所列的“营业情形”，就是“第一个半年算的”结果。我们有了这一算，手续既到，观念乃明，改正旧的失误，定出新的方案，便容易的求进步了。

(三)

在第一期社务报告里报告了的，此处就不报告了。文化书社自去年八月一日假楚怡小学开会发起，八月二十日订约承租潮宗街湘雅医学校房屋之一部为社址，九月九日营业开幕，并十月二十二日假长沙县署开第一次议事会以后，几个月间社中可纪的事，略如下述：

1.议事会临时会十二月二十九日假长沙县署开议事会临时会，到会者，姜咏洪，贺寿乾，王季范，周惇元，郭涛僧，彭荫柏，熊瑾玎，易礼容，赵运文，刘驭皆，毛润之诸君。姜君咏洪主席，讨论“另觅社址”及“添筹股本”两个问题。首先讨论社址问题，因现社址僻处草潮门一隅，房屋亦觉不够，欲图社务发达，宜于较为适中的地点觅一较为宽大的房屋。决议社址自要迁移，惟须慎重，务期一迁，便可安固，在未觅到相当房屋并布置清楚以前，仍在湘雅原处。因开会之前日船山学社总理仇亦山君允将学社房屋一部分借用于书社，众以此举甚善，惟须明定契约，不背“安固进行”之目的才好。结果决定由本社与船山再切实交涉。次讨论经费问题。以第一次议事会议决尽本年筹足千元，现尚少五百三十元，大家以零募不是办法，姜君咏洪乃愿独力筹措此五百三十元。遂散会。

2.与商务等书局订约　此为本年一月以后的事。本年一月以前，外埠书局如“中华”，“亚东”，“泰东”，“新青年社”，“北大出版部”，“学术讲演会”等，均经订约销书，至本年一月，始由杨君端六介绍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约分销。分销的折扣：七，八，九折不等。二月，与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交涉销书亦成，惟伊文思是一个西书公司，中文书甚少，湘省在现在于西书不甚需要，故不能多销。三月，北京成立了一个新知书社，是和文化书社宗旨大致相同的一个新起的书社，刊印一部“罗素五大讲演”，与本社交涉代销预约，本社已答应代销。有一个在四川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将他在四川未销完的书托本社代销，又有一个在北京的“亚洲文明协会”，托本社代售其新改组出版的“时事月刊”；本社均经答应。此外新起的杂志社与本社交涉代销者，在这个期内尚有多家。

3.书报畅销　本社所销的书百六十余种，杂志四十余种，报三种，在去年开幕至本年三月底，除开寒假时一个月外，余月均很畅销，社里总是供不应求。一面固因为本社资本太少不能向外埠大批买书小批则随到随尽的原故；一面也是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一时感发兴起，尽力购读，实在是一种可

包

喜的现象。买书的人，自然以学界为多，但如“劳动界”等小册子销于劳动者间的也不少。以年龄论，买书的人自然以青年为多，壮年以上的人次之。

4.成立分社　本社既欲各县均有购买新书的机会，就非在七十五县都设立分社不可。本社对于设立分社，并不是本社自己去设，只是帮助各县的同志在各县去设立起来。不知本社内容的人或疑分社设立甚难，其实为事至易。资本只要买第一批书第二批书的钱，少则五十元，多则百元，第三批以后，即将头二批的书价收回转购便得——是一。各县生意多，固无问题，生意少，也不要紧，分社横直是附着公共地方开设，不要独立门面，开销便不要多，僻县陋镇，或一年只能销几十元，乃至几元的书都不要紧——是二。本社对于分社照本退与，不赚分文，所有优价折扣，都归分社，因此分社即因生意少不能多得赢利，亦断不至亏耗本钱——是三。附带经营，不须多的人员——是四。销不完的书，可以退还本社，不至因为滞销至于虚耗——是五。有此五层，所以说开设分社是“至易”的。本社截至今年三月底，已经成立了的分社凡七，即“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七处。分社外尚有“贩卖部”七处。“分社”何以别于“贩卖部”呢？1.分社可以得到全部的优价，就是折扣照原店全部让与：贩卖部要少一点，只能有百分之五的报酬。2.分社在外县，贩卖部在本城的各校或个人。（个人专贩卖小册子于平民及劳动界的，仍让与优价）。

（四）

上述之七分社及七贩卖部，今依成立的次序，将其“成立的月日”，“设立的地点”，“创办人”，“销书额”四项略列于左。至其详细状况，本社已向各分社征集，容后具报。凡下所列，截于三月底止，四月一日以后成立的分社及贩卖部未列。

分　社

平江文化书社　九年十一月三日成立，设在平江县城救贫工厂。创办人：张子谋，李六如，喻寄浑，吴大拙，方维夏等。销书额约六十元。

浏西文化书社　九年十一月十日成立，设在浏阳西乡金江高等小学。创办人：宋先觉，陈章甫等。销书额约六十元。

武冈文化书社　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成立，设在武冈中学校。创办人：邓宗禹，夏大纶，戴华声，夏昌言，戴源漳，欧阳刚中等。销书额约四十元。

宝庆文化书社　十年一月八日成立，设在宝庆城内武庙区立第三国民学校。创办人：匡日休，黄麟，贺民范等。销书额约一百二十元。

衡阳文化书社　十年三月二十日成立，设在第三师范。创办人：屈子健，贺恕等。销书额约八十元。

宁乡文化书社　十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设在劝学所。创办人：萧淑汤，姜肖岩，何叔衡等。销书额约五十元。

溆浦文化书社　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成立，设在劝学所。创办人：邹士桢，蒋竹如，周显槐，官堃，胡剑峰，吴家瑛，舒修序，易克穗，龚伯安等。销书额约七十元。

贩卖部

第一师范学校贩卖部　经理人黄铁和等。

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贩卖部　经理人熊科易，李运鸿等。
楚怡小学贩卖部　经理人谭协吾，刘仲楷，姚家闻等。
修业学校贩卖部　经理人刘驭皆，张自任，李振玉等。
杨世才
何浴秋
蔡增准

(五)略

(六)

营业上经济的情形，既如上述，谅大家都明白了。至于本社推销书报的情形，也应该有一种统计：一来，见某种书在湖南销数若干，便知某种书所及于湖南人的影响；二来，每半年有一次统计，可以比较某种书每半年销数的进退。但要将所有的书报一并列出，其事很烦，今以不甚重要的不列；下列的各种，都是书的内容比较重要些的。凡称“部”，是一书有二册以上的。称“本”，是一书只有一册的。

(一)重要的书：

杜威五大讲演……二百二十部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二百本
社会主义史……一百部
到自由之路……六十本
工团主义……六十本
现代教育之趋势……百六十本
动的新教授……百五十本
社会与教育……百五十本
实验主义……一百本
社会与伦理……五十本
美国民治之发展……七十本
科学与人类进化之关系……八十本
蔡孑民言行录……一百本
迷信与心理……一百本
点滴……八十部
伦理学之根本问题……五十部
西洋伦理学史……四十部
社会改造原理……一百部
晨报小说第一集……二百本
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二百本
新俄国之研究……八十本

劳农政府与中国……八十本
脳盦客座谈语……四十部
托尔斯太传……一百本
教育哲学……百五十本
试验论理学……二百五十本
协力主义政治经济学……四十部
哲学史……一百五十本
中国哲学史大纲……八十本
中国文法通论……六十部
南洋群岛……三十部
南洋……四十本
新标点儒林外史……百四十部
新标点水浒……一百部
白话书信……百八十部
短篇小说……百三十本
尝试集……百四十本
达尔文物种原始……三十部
赫克尔一元哲学……三十五部
罗素政治理想……七十本
女性论……七十本
国语组织法……八十本
社会问题概观……四十部
思维术……四十本
欧洲和议后之经济……六十本
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七十本
哲学问题……二十本

(二)重要的杂志：

新青年（月刊）……二千本
劳动界（周刊）……五千本
新潮（月刊）……二百本
平民教育（周刊）……三百本
新生活（半月刊）……二千四百本
新教育（月刊）……三百本
少年中国（月刊）……六百本
少年世界（月刊）……二百八十本
科学（月刊）……一百本
中华教育界（月刊）……二百本
改造……百八十本

民译…………………………………………………………………………………………二百五十本

（三）重要的报：

时事新报…………………………………………………………………………………每天七十五份

晨报……………………………………………………………………………………每天四十五份

（七）略

（八）

本社职员

易礼容（经理）

毛泽东　特别交涉员

李　庠　（营业员——管书）

唐自光　（营业员——管报兼管书）

王仙梅　（营业员——管报）

黄德安　（烧饭兼走杂）

以上是现在的职员。在这个期内尚有陈君子博任君培道在社各担任营业约两个月。

社设长沙潮宗街五十六号

（选自《新民会资料》）

回忆新民学会

李维汉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统治，使久受专制奴役的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又没有得到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支持，这次革命的首要果实——国家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二八页）。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所豢养和扶植的各派军阀互相争夺，内战不断，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乡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同城乡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愤于中国社会的黑暗，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新民学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新民学会在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部分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革命活动和建党建团的准备工作中，也部分地起着骨干作用。现在，就我的记忆并参考当时的一些文献，将新民学会的情况，作一简要的回忆。事隔六十年，记忆的事情可能有误，尚望了解情况的同志予以补正。

（一）

新民学会从不自我标榜，但由于它的乾乾不息的前进运动，在实际上，成为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影响最大的革命社团之一。它的主要发起人是毛泽东和蔡和森。

我于一九一六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一九一七年暑期毕业后，即在附小教书。那时，毛泽东、张昆弟、邹彝鼎等在第一师范第一部读书。蔡和森于一九一三年考入第一师范，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与毛主席同学，此时已转至高等师范学习。已毕业的同学何叔衡和肖子升在楚怡小学教书，陈绍休等在一师附小教书。他们常在一起讨论个人和社会如何进步的问题，深感有建立一个组织之必要。经过多次酝酿，大约在一九一七年冬，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活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乃有组织学会之议，取名"新民学会"。我因邹彝鼎、张昆弟的联系，也参加在内。

一九一八年四月的一个星期天，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又叫周家台子）蔡和森家中召开了成立会。参加会的有：毛泽东（润之）、蔡林彬（和森）、肖旭东（子升）、肖植蕃（子暲）、陈绍休（赞周）、罗璈阶（章龙）、邹彝鼎（鼎丞）、张昆弟（芝圃）、邹蕴真（泮芹）、周名弟（晓三）、陈书农（启民）、叶瑞龄（兆桢）、何瞻岵（叔衡）、李维汉（和笙）等十四人①。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选举了干事。会章规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会章还规定会员须遵守如下纪律：

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议选举肖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中午，在蔡和森家吃的午饭，饭后继续讨论了会员向外发展的问题，至下午散会。学会成立后，总部一直设在长沙。由于肖子升不久即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至同年八月，罗学瓒（云熙）、周世钊（惇之）、熊楚雄（瑾玎）、熊光楚（焜甫）、陈昌（章甫）、傅昌钰（海涛）、曾以鲁（星煌）、彭道良（则厚）等②相继入会。会员增至二十余人。

从新民学会通过的会章，可以看出学会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会员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都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热烈愿望。但是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确，学会的宗旨由开始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到后来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间有一个发展过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是毛泽东同志平日所主张，而为一九二〇年七月留法会员在蒙达尼集会和一九二一年一月国内会员在长沙集会所一致通过。这个宗旨的变化是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是新民学会大多数会员在五四运动以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动，因而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

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主要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学会成立后在国内首先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学会讨论会员向外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

留法运动始于一九一二年，由蔡元培③、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张继等人发起，吴玉章同志也是发起人之一。留法学生包括官费、俭学和勤工俭学三部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去法的不多。战后，发展甚速。法国巴黎和国内的北京、上海都建立了华法教育会，有的省如四川、广东建立了分会，主持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新民学会成立后，会员深感向外寻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必要。一九一八年六月，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召开的一次会员会上，确定进行留法运动，由肖子升和蔡和森负责进行。在此之前，已有湖南学生罗喜闻等在进行留法的准备，互通一些消息。新民学会的这次会后不久，蔡和森受学会委托赴北京和蔡元培、李石曾联系赴法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则进行号召和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湖南也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分会。是年八月，毛泽东同志同我们准备留法的二十几个人到北京。在北京的会员至此增至十二人，有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肖子暲，陈绍休、熊光楚、张昆弟、曾以鲁、邹彝鼎、李维汉、罗学瓒、罗章龙。同来北京的青年还有李富春、贺果、任理、侯昌国、唐灵运等④。我们二十几个人从汉口乘火车北上，到了河南郾师（今郾城），因郾师以北铁路被大水冲断，在郾师城郊停留一天一夜，第二天步行到许昌，再搭车到北京。在郾师耽搁的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和有些同学三三两两的在附近和老乡们交谈，了解风土人情。到北京后，毛泽东同志开始是住在豆腐池九号杨怀中先生家里，后来搬到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和蔡和森，罗学瓒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过着清苦的生活。杨怀中先生来北大教书前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和高等师范的伦理学教员，思想开明、进步，为人刚正、真诚。新民学会的成立以及我们思想的"向上"，都同他对我们的影响有关。对于留法运动，他也十分赞助，亲自出面联系，帮助筹措费用。

毛泽东同志当时经杨怀中先生介绍在北大图书馆作助理员工作。其他会员除罗章龙在北大学习外，则分别在北京、保定、蠡县布里村的留法预备班学习。肖子升、肖子暲、陈绍

休、熊光楚、邹彝鼎、罗学瓒在北京班；蔡和森在布里村班；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与李富春、贺果、任理等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在保定的同学一面学习法语，一面学习机械学、机械制图。每人学一种工艺（钳工、木工、铸工等）。机械学和制图课的教员是刘仙洲⑤。我在保定留法预备班只学习半年。一九一九年初，邹彝鼎病重，我和张昆弟护送他回湖南，不久，就病故了。他也是学会发起人之一，曾和毛泽东同志一起起草新民学会章程。他和后来留法，于一九二一年病故的陈绍休都是极好的同学。他们的夭折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我和张昆弟送邹返湘后未再回保定。我自己是在为筹措赴法用费和安家奔走。（我们一九一九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备用费。我主要靠第一师范教员朱炎先生⑥帮助一百元。）这时，北京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湖南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情绪异常激昂，纷纷起来响应，声援北京学生斗争。已于四月返湘的毛主席和在长沙的会员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成为运动的骨干力量。长沙各校学生罢课游行，抵制日货，进行爱国宣传，并在斗争中迅速组织起来，改组旧学生联合会，建立以彭璜⑦（后为学会会员）为会长的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后来又由学生联合会发起，建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使学生的爱国运动扩展为包括各阶层的人民爱国运动。这个运动遍及全省。许多学校组织了“救国十人团”、“讲演团”。男校学生在街头，女校学生进入居民住宅进行宣传。有的学生还组织了贩卖国货团，上街卖国货，凡购买者随赠国货物品单一张，告诉市民哪些是日货哪些是国货。在长沙，有一次学生查获培德厚绸布店私运的二十匹日布，非常气愤，便联合各界组织了焚烧日货游行大会，将布匹当众烧毁。

以新民学会会员和非会员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湖南的五四运动中是个最活跃的组织，起着先锋带头作用。毛泽东同志当时主编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这个刊物在湖南以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北京的《每周评论》、《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湖南》月刊，四川的《星期日》，都曾介绍过它或转载过它的文章。它以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姿态，投入了五四运动，宣传了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发人们起来向旧思想旧势力作斗争。它在政治上对湖南地区的五四运动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刊物的许多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和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如肖子暲、陈书农、蒋竹如等所写，毛泽东同志写的尤多。毛泽东同志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提出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实行社会政治改革，对抗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主张，提出由分业“小联合”达到各界“大联合”的步骤和方法，并指出“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辩证关系。这是毛泽东同志早期的一篇代表新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章。这个刊物发刊时，我尚在湖南，和张昆弟一道同毛泽东同志见过两次面，了解当时运动的情况，听取他对勤工俭学的意见。我曾按照第一师范第二部毕业同学录上的地址把《湘江评论》分寄给各同学，并介绍一点我所知道的运动的情况，希望他们在当地发动这个运动。

五四运动浪潮中，新民学会在湖南又吸收了一批会员，其中有：罗宗翰（璋迁）、张国基（颐生）、夏曦（蔓伯）、蒋竹如（集虚）、易克嶷（阅灰）、向警予（俊贤，女）、陶毅（斯咏，女）、彭璜（殷柏）、李振翮（承德）、张怀（伯龄）、唐耀章（文甫）、沈均（均一）、李思安（钦文，女）、周敦祥（純如，女）、魏璧（韫丁，女）、劳君展（启荣，女）、谢南岭（维新）、徐瑛（女）、刘修秩（继庄）、钟国陶（楚生）、张超（泉山）、

姜慧字（竹林）、刘明俨（望成），欧阳泽（玉生，玉山）、杨润余（女）、陈纯粹、肖道五、李云杭、黄胜白等。随后，易礼容（润生）、任培道（振予，女）、吴家瑛（德庄，女）、贺延祜（女）、吴毓珍（女）、郭亮（靖笳）、谢觉哉（焕南）、陈子博、蔡畅（咸熙，女）、熊季光（作莹，女）、熊叔彬（作谦，女）、刘清扬（女）、许文煊（女）、周毓明（女）、戴毓本（女）等[8]，大多在国内，个别在法国，多数在学会中期，个别在学会末期，先后入会。* 在长沙的会员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曾在周南女校开过一次会，对会章略有修改，决议学会设"评议"、"执行"二部。执行部下设"学校"、"编辑"、"女子"、"留学"等部，并选举何叔衡、李思安为正副委员长；陶毅、周世钊、毛泽东、周敦祥、魏璧、陈书农、张昆弟、蒋竹如等为评议员。此次会后，正值驱张高潮，多数会员即离长沙。

湖南地区的五四爱国运动兴起后，军阀张敬尧始则严密控制，继则实行暴力镇压。一九一九年八、九月间，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大会。张敬尧带着马弁前来镇压，胁迫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彭璜不畏强暴，严词拒绝。张敬尧竟悍然解散了湖南学会联合会。张敬尧的暴行激起湖南人民极大的愤慨，一个规模甚大的驱张运动随之兴起。张敬尧是安徽人，是北洋军阀皖系段祺瑞的走狗。他于一九一八年二月湘桂联军战败后，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及接近直系的冯玉祥一起进驻湖南，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十分暴虐。人民对他早就十分痛恨。他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便成为驱张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在驱张运动中，学会开了会，决定联合各界一面进行驱张宣传，一面组织各界的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地活动，争取全国的同情。许多会员都参加了代表团。毛泽东同志和会员李思安、张怀、陈绍休、罗宗翰等联合湖南在京各界，组织了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作驱张机关。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湖南绅界、政界、军界、工商界以及湘籍国会议员，联合的人十分广泛。毛泽东同志等在北京办了一个"平民通讯社"，专门报道驱张的活动。彭璜、易礼容，何叔衡、夏曦等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先后分赴上海、武汉、衡阳活动。彭璜等在上海办了《天问》杂志，驻衡阳学生请愿团办了《湘潮》杂志，宣传驱张。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商专校长汤松，楚怡学校校长陈夙芳，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秘书赵鸿钧、《民治日报》主编张效敏以及北京国会议员陈嘉言，湖南绅界熊希龄、范源濂[9]等对于驱张都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最后，由于群众斗争的压力和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张敬尧于一九二〇年六月被赶出湖南，湘军谭延闿和赵恒惕控制了湖南。驱张运动的消息传到法国，湘籍勤工俭学生莫不称赞。及至传来胜利消息，更是雀跃不已。

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后，进驻长沙的湖南军阀谭延闿、赵恒惕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发出一个宣布实行"湖南自治"的通电，虚伪地表示要"施行地方自治"、"以湘政分之湘省全体人民。"（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一二二页）一九二〇年四月，毛泽东同志为驱张事从北京到上海时，就和彭璜等讨论过驱张之后如何在湖南造就一个比较好的政治环境，促进湖南向较好的方向发展，并曾拟过一个《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文件，提出废除军阀统治，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见《天问》周刊第二一期，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日）。谭、赵通电的发布，带来一个复杂的局面。谭、赵以驱张实力派的身份顺利地取得了湖南全省的统治地位，好象理所当然地也取得了代表三千万湖南人民的发言权，这是一。一九一三年反袁独立失败以来，湖南人民受尽军阀战争和北洋军阀暴虐统治的痛苦，张

* 新民学会会员至此已查明者共计六十六人，以后发现有遗漏或错误者当补充修正。

敬尧赶走后，惟恐北洋军阀再来，于是，“湘人治湘”的呼声四起。谭、赵举起的“湖南自治”的旗帜，正是利用人民的这种愿望，这是二。谭、赵的“以湘政分之湘省全体人民”的口号，本质是欺骗，但是为了装饰“自治”门面，在民众压力下，也将不得不采取某些极为有限的民主措施，这是三。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事情的两重性，新的军阀统治形式的矛盾性。面临这种复杂局面，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方针来对待谭、赵提出的“自治”呢？毛泽东同志不赞成采取笼统的反对态度，也不赞成消极的抵制态度，而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参加到“自治”运动中去，利用矛盾，进行斗争，启发民众，揭露统治者，尽可能地争取扩大民主因素。新民学会会员们发起建立一个“湖南改造促进会”，提倡“湖南人民自决”，自下地发动争取真正“民治”的群众运动，同谭延闿、赵恒惕的“官治”相对立。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〇年九、十月间，曾连续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湖南自治运动”，说明“自治”必须是人民的“自治”，必须以人民为主体，否则“自治”不过是只具外形，其内容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洞的（毛泽东《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见湖南《大公报》，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和在湘会员还联合湖南各界人士发表了一个要求召集“人民宪法会议”，直接平等普遍地选举人民代表的建议书。十月，各界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解散旧的省议会，并发生扯下省议会旗子的事件。事后，谭延闿、赵恒惕就暴露了他们假自治的面目，诬蔑请愿代表“轻信游词、盲从暴动”（谭延闿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二日发的布告，见《湖南省志》第一卷第四一三页）。赵恒惕赶走了谭延闿，独揽湖南政府之后，炮制了一个“省宪法草案”，并于一九二二年一月正式公布施行。赵恒惕统治集团迫于民众自治运动和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把某些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自由权利写进省宪里。因此，这部“省宪法”后来被毛泽东同志和湖南党组织利用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在进行驱张运动的前后，特别是在北京活动期间，广泛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据他后来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说，到一九二〇年夏天，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当毛主席于一九二〇年四月到上海时，准备赴法的会员陈绍休、熊光楚、肖子暲、张怀、魏璧、劳君展、周敦祥、刘明俨、欧阳泽等也先后到上海，加上已在上海的彭璜、李思安，共有十二个会员。他们曾在上海的半淞园开过一次会，为赴法同学送别。实际上，这是一次讨论新民学会会务的会议。这次会议决议学会应有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作风，并主张会员要多组织学术谈话会，使学会养成好学的风气。吸收会员要谨慎严格，会员要有诚恳互助虚心的态度（《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一九二〇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他和在湘会员在参加和领导湖南地区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的同时，以很大的精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他们团结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运动。任弼时、肖劲光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去苏联学习的。在传播新思想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湘江评论》、《天问》、《湘潮》以外，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一九年参加主编过一段时间的《新湖南》周刊，以何叔衡为馆长，谢觉哉、周士钊、邹蕴真为编辑的湖南《通俗报》，龙兼公主编的湖南《大公报》等，都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而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则莫过于创办“文化书社”这件事。

“文化书社”于一九二〇年九月由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办，书社的《发起缘起》和《社务报告》都为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书社经理是易礼容。书社不仅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我们留法会员与国内会员，湖南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与国内其他省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联络站。它的创办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参加发起和投资的除新民学会许多会员外，还包括教育等界许多上层人士。书社销售的书有一百六十余种。营业后的半年中，全国与之发生联系的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就有六十家，书社除在长沙设总社外，还在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等地设分社，在一些学校设贩卖部，负责人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以及和新民学会有联系的进步分子。书社一直办到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被许克祥封闭为止。

一九二〇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在上述一系列活动中都联系着考虑和酝酿建党建团的问题。随后，在新民学会的会议上和国内外会员的通信中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一九二一年，在长沙的会员一连开了三天会，讨论学会的目的、达到目的须采取什么方法以及如何即刻着手进行等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上年五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以及七月我们在法会员召开的蒙达尼会议的情况（蒙达尼会议的情况，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论述）。这次会议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问题上展开了和我们在法国蒙达尼会议相类似的争论。一部分会员如毛泽东、何叔衡、陈子博、彭璜、陈昌、易礼容等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世界。另一些会员则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用温和的教育的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的会员犹疑动摇于二者之间。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论。由于它在学会生活中还是初次出现，矛盾还未展开，故没有影响学会在组织上的统一。这次会议还决定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学会的一项活动。这种思想信仰的分化，随着前进的运动而日益加深，最后引导到学会会员在组织上的分化，以至整个学会（包括留法部分）的消亡。事实上以后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只有一部分会员；而当时由少数会员在实际上形成的共产主义小组，则已成为学会活动的核心。一九二一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代表它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此后，新民学会实际上就停止了活动。

（二）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新民学会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活动，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有重要意义。

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于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形成一个空前的热潮。这两年中，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一千六百余人，以湖南、四川、广东三省最多。湖南就去了三百多人。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蔡和森的提倡，以及熊希龄、章士钊、杨怀中等的赞助；另一方面也是军阀张敬尧摧残湖南文化教育事业，逼得学生走投无路的结果。日后大家开玩笑说：“这是张督军‘恩赐’的机会”。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有十八人，占会员总数三分之一左右。在湖南教育界工作了二十多年，当时已经四十三岁的徐特立；年过半百的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还有贵州教育界的黄齐生（王若飞的舅父）⑩都参加了赴法行列。同学们同他们见面时都称呼徐先生、蔡伯母、黄先生。

我和张昆弟等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到上海，和许多湖南学生一起住在静安寺路民厚里，候

船赴法。位于霞飞路的上海华法教育会人来人往，大都是到这里来办理手续，请购船票，打听消息的准备赴法的学生。报纸的“要闻”栏里刊载许多有关勤工俭学的报道，称赞赴法青年为“探险远征队”。我们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乘法国邮船“宝勒加”号自沪起航。同批赴法的有一百六十二人，内有湖南青年四十二人，张昆弟、李富春、李林⑪、贺果、余增生、任理、张增益等在内。我们坐的号称四等舱，实际是底层无等统舱。在海上航行了近四十天，许多人因船身颠簸、震动，头晕呕吐，食量锐减。尤其臭虫多得吓人，扰得我们夜夜不得安宁。一些人只好把袜子套在手上，把裤角扎紧，用毛巾把脸和脖子包住，只露出鼻子和眼睛，以求睡个安稳觉。随我们一起出国的领队人是勤工俭学发起人之一，上海华法教育会会长以后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张继。他乘的是官舱。十二月七日，我们到达马赛。华法教育会派人接我们到巴黎，把一些准备勤工的学生安置在巴黎西郊哥伦布的华侨协社里住下。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平促进会等几个华侨团体都设在里面。我们住的是一座活动的军用帐篷，据说是大战后美国人留下的。长四丈宽半丈的一块地方，住有三、四十人，都自愿地结成伙食单位，自己弄饭吃。我和李富春、张昆弟、李林、贺果、任理、张增益等人结成一个单位，凑钱买了一个煤油炉子。吃的主要是空心粉、马铃薯、面包，有时炒点卷心白菜或买点熟的肉食吃。

我们一边候工，一边学法文，看书报。华侨协社有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用中文翻译过来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华法教育会的李石曾、吴稚晖都标榜笃信无政府主义。华法教育会办的《旅欧周刊》、《华工旬刊》也宣传这些思想。这些书刊对我们有很大影响。

我们在一九二〇年二月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工学励进会”）。参加成立会的有李富春、张昆弟、任理、李林、贺果、张增益、李维汉等，当时在蒙达尼的罗学瓒随后也加入了。

我们都是只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有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愿望，但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一旦知道可以到法国经过勤工达到升学的目的，便想尽办法奔向这条路上来。我们又是怀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比较先进的青年，亲受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战争和豪绅买办阶级压迫、剥削之苦，痛恨旧的社会制度。我们又多少参加过五四运动或者受过它的影响，向往科学与民主。但是，由于我们在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不象北京大学和接近北大的先进青年那样。他们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夜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此，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在朦昧之中，头脑里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没有能进一步探讨，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工学励进会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下创立的。成立工学励进会的时候，我们订了几条约章，曾寄回国内在《时事新报》上刊登过。宗旨的大概内容是：“在积极方面，想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定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救助，工学交互，为将来别种建画之预备。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等事。”（罗学瓒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四日，见《新民学会

会员通讯集》第二集第五二页）所谓“在积极方面”的几句话，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可是，我们究竟是有进取精神的青年，在以后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中，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

一九二〇年初春，华法教育会介绍我们到施乃德钢铁厂作工。这是个大型军火工厂，设有好几个分厂。李富春、贺果、李林和我在法国西北部的勒哈佛尔分厂，张昆弟、任理、欧阳钦、刘明俨在圣伯尼分厂，罗学瓒在法国南部的克勒佐总厂。我在工厂里做铸工（我曾在长沙湘军工厂艺徒学校学过一年半铸工），他们几个当钳工。当时铸工除吊车外都是手工，劳动强度很大。做了不到半年工，我的身体支持不住。大家劝我离厂。我应邀到张昆弟、欧阳钦他们那里，休息了一段时间。

在勒哈佛尔时，我们仍然住在一个军用帐篷中。早晚工余之暇，大家自学法语，有的勉强看点法共《人道报》和共产主义小册子，有时也共同讨论研究勤工俭学的问题。经过短时间的工人生活，我们都感到经过勤工很难达到俭学，对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管制方法有了初步认识。五一节，看到武装警察对罢工、示威工人的镇压，感到就是在以民主共和著称的国家，工人并无真正的民主自由。我自己自幼过着贫农家庭的生活，对于无钱无权无势的劳动人民受欺压的痛苦境况，有些感性认识。这时又看到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同样的情形，并亲自尝到这种滋味。我在一篇研究勤工俭学的论文中曾写下这样的认识：“现在社会的一切不平等都带着十分或九分的经济压迫的原因”，“布尔塞维克的俄国，凡是封建的遗物，如那些军阀、地主、资本家一概扑灭之，以组织世界经济，这样的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我曾呼吁“中华民族的男女学生打破智识阶级，牺牲着部分时光，做那些农人工人的解放事业。”（李维汉《勤工俭学研究发端》，见《湘潮》杂志，一九二〇年四月）可以说，我们在此短短的实践和自学中前进了一步。这一步有重要意义，但仍然只是一些感性认识，没有深入和展开，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没有悟出工人农民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以暴力战胜暴力，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因而还没有跳出“工学主义”的幻想。新民学会会员中，毛泽东、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最早。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刊。和森在出国前的一年半时间里，学习了法文，也阅读了一些社会主义著作。一九二〇年二月，和森等到了法国，住在蒙达尼公学。他没有上课，“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第一页）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在短时间内收集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择其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译”。当时我和他相隔很远，仅有通信联系。工学励进会的情况就是由我告诉他，他又写信回国告诉毛泽东同志的。和森是学会领导者之一。他到来后，新民学会在法会员的中心很快就移到了蒙达尼。他和在国内的毛泽东同志有密切的通信联系，使国内国外两部分会员联成一个整体。

一九二〇年六月中旬，前后分批抵达法国以及在法入会的新民学会会员已有十六人，有的在克勒佐、勒哈佛尔、圣伯尼等地工厂做工；有的在蒙达尼，枫丹白露等地学校补习法文。刚刚到法国的肖子暲、陈绍休等从国内带来半淞园会议情况的消息。根据半淞园会议关于“巴黎等会员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召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的意见，我们商定在蒙达尼举行一次聚会。七月五日，会员从各地来到蒙达尼。从六日至十日，

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开了五天会。与会者有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肖子暲、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以及肖子升(当时在华侨协社任职)等十三个会员。一些外省的工学励进会会员也参加了这个会，共二十余人。

这次会议最主要的成绩是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会上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的看法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另一种意见是肖子升提出的，主张温和的革命，即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的方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森提出的主张，对于多数与会者，特别是临开会前才到达蒙达尼的人们来得比较骤然，缺乏充分考虑的时间，因此对于两种相对立的主张，在会上没有能展开讨论。会议乃决定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同志，希望听取国内会员的意见。和森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详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他明确地说："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第七——八页)和森是我们留法会员中的先驱者。如前所述，我当时虽已经初步认识到改造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对于改造的道路，还没有跳出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于要以革命暴力战胜反革命暴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还缺乏认识。我在会后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反映了当时对这一根本点缺乏认识。接着又说："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或取法它，说来很长，且待研究，……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李维汉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第二四页》)，表现出思想的可变性。

蒙达尼会议开得很活跃，在辩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和道路之后，还谈论了个人感想、会务进行和求学方法。从人生观到宇宙观，从个人理想到人类的未来，差不多都说遍了。最后一天更进行个性的批评与介绍。大家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自并互相谈了个人的优缺点，思想和个性的极强处和极弱处，以互励互勉，取长补短。对于留在国内的会员，也由相知者向新会员作介绍。毛泽东同志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欣赏。他来信说："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作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第三三页)

会后，有些在其他地方勤工或俭学的会员搬到了蒙达尼。在校会员采取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两个方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我和几个迁来的会友在附近一个胶鞋厂做工，在工余学习。约在八月至九月的时间内，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此外，我同和森做了多次长谈，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

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等内容。通过阅读和谈话，使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同年八月，"工学励进会"改名"工学世界社"，社员发展到三十多人。鉴于"工学主义"是工学世界社社员中带普遍性的倾向，我同和森商定召集全体社员到蒙达尼开会，请他出席并参加讨论。约在九、十月间，工学世界社开了三天会，住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大都参加。经过热烈的辩论，大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记得出席会议的社员有：张昆弟、李富春、罗学瓒、李维汉、贺果、李林、颜昌颐、张增益、任理、肖子暲、唐灵运、陈绍常、傅烈、王人达、侯昌国、郭春涛、欧阳钦、刘明俨、汪泽楷、尹宽、肖拔、薛世伦、郑延谷、成湘等三十多人⑫。此外，李慰农⑬、余增生等个别社友因事未能参加，后来对于会议决议也都表示赞成。至此，工学世界社和新民学会的宗旨已趋一致。它和新民学会一道很快成为勤工俭学生的领导力量之一。和森没有参加工学世界社，他对于工学世界社宗旨的改变起着相当作用。

毛泽东同志得知上述蒙达尼会议的争论后，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写了数千言的长信给我们，对两种意见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无政府主义、德谟克拉西主义在今天行不通；用平和的手段、教育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也做不到，而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第三三页)并在随后给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为吾党的哲学根据"，还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引者)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第四六页)。毛泽东同志不仅希望我们留法会员继续做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而且在一九二一年新年时，与何叔衡一起召集长沙会员聚会三天，进行了郑重而热烈的讨论。毛泽东同志旗帜鲜明的主张和深入浅出的说理，更加坚定了我们大多数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参加蒙达尼会议的十三名新民学会会员为例，后来就有八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肖子升则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最后堕落为反动官僚。

蔡和森接读毛泽东同志来信后，曾和我们商谈，打算联络新民学会会员、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工学世界社社友等开一讨论会，如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两点上取得一致，则准备成立一个共产党。后来因为忙于参加和领导求学运动的斗争，未能实现。

毛泽东同志一向主张新民学会的本身不多作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当他得知工学世界社成立的消息后，寄与关怀。他给罗学瓒写信说："请你将组织、进行、事务等，告我一信。"(毛泽东给罗学瓒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第五五页)工学世界社成立后，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外，还组织了一个"工学世界通信社"，由罗学瓒负责，向国内发稿，报道留法勤工俭学和华工运动的情况。蔡和森、李富春、向警予以及其他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工学世界社社员都曾经往国内报刊投过稿。大部分稿件都经毛泽东同志转递。毛泽东同志很赞扬工学世界社这种形式的活动。他在一九二一年十月的一次欢送留俄学生的会上说："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在法同学组织的工学世界社——革命团体——那办法很好"(见《湘党

载日记》，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以蒙达尼为中心的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两团体，在一九二一年曾经参加了勤工俭学生两次大的群众斗争的领导。一次是二月二十八日的"求学运动"；一次是九月二十日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关于这两次斗争的情况，已有不少同志撰写过文章或回忆录，大体翔实处，我不再重复。这里只就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实做些回忆。

二月二十八日的"求学运动"，习惯称为"二八运动"。先是，二月初，在巴黎近郊（华法教育会附近地区）有数百勤工俭学生在那里候工不得，靠领每日五法郎的救济金生活。我们和他们中的一些活动分子逐渐发生了联系。他们告诉我们华法教育会发出通告，声明与勤工俭学生断绝经济关系，诬蔑勤工俭学生"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拒绝资助，使同学们沦于做工不得、求学不能的困境，并声称要将学生"遣送回国"。他们希望给以援助。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世界社社员一起集会讨论巴黎近郊同学的要求。我们认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谈"勤工"，无异为资本家提供廉价劳动力，而要以"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更为不可能。我们认为应当发起一次求学运动。于是蔡和森、张昆弟、向警予、蔡畅、贺果、李维汉等大部分会员、社员去巴黎参加斗争。我们住在华侨协社不远的一个兼营咖啡馆的旅馆内，连日同近郊四百多同志的代表开会商讨斗争的目的和方法。代表会作出进行求学运动的决定。提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口号，向军阀政府要求生存和求学的权利。斗争的具体目标是要求进入即将开办的里昂大学求学，发给学生每人每月四百法郎的补助，以四年为限。代表会向全体勤工俭学同学发出通告，向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发出请愿书，向旅法上层人物发出请求援助书，向北洋政府和各省政府发出电报。二月二十八日，组织近郊四百多同学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箓请愿，相持大半天，群众被警察驱散，代表十余人被囚禁于警察局两小时左右始释放。"二八运动"没有实现原定目标，但迫使公使馆延长发放三个月每人每日五法郎的救济费，华法教育会答应继续为失工学生找工作。我们的斗争也并未就此停止。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日，由向警予、蔡畅、熊季光、熊叔彬、魏璧、劳君展等新民学会女会员联络其他女生组织"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出致女界的公开信，要求里昂大学招收女生。同年九月，又发展为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

"二八运动"过程中，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对于勤工俭学同学内部的团结工作有缺点。例如以赵世炎、李隆郅（即李立三）为首的"劳动学会"是一个进步团体，但当时仍笃信工学主义，主张坚持勤工俭学到底。王若飞等一部分贵州同学也持相同主张。他们都不赞成请愿，认为请愿是向反动政府乞怜，要求补助是寄生虫。针对求学运动，他们提出"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我们没有采取积极态度去同他们讨论问题，争取共同行动。徐特立、黄齐生两位老教育家也支持他们的主张。蔡和森和我，还有新民学会其他会员，都是徐先生的学生，一向敬爱他，这时也没有去同他讨论商谈。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

"二八运动"教育了我们，迫切希望勤工俭学生内部加强团结。我们请劳动学会派代表到蒙达尼出席工学世界社的会议，相互加强联系和了解。世炎、立三都到过蒙达尼交换意见不只一次。若飞则来蒙达尼和我们一起在胶鞋厂作工。通过交谈，我们双方的观点和认识迅速取得一致，并且共同行动起来。世炎在加强勤工俭学生不同力量的团结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以"劳动学会"为核心，组织了"勤工俭学同盟"，又进而联合"勤工俭学互助团"、"勤工俭学互助组"、"勤工俭学讨论刊社"、"劳人会"、"工学实践团"等勤工俭学生

团体，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会”，提出“互助”、“劳动”、“改造社会”三信条，一边力求自救，一边学习社会主义。他们在克勒佐工厂边劳动边在华工中进行工作，深受欢迎。到九月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之前，勤工俭学生中不同力量的许多部分逐渐趋于联合，以至能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采取统一行动，共同组织“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当时，代表大会决定分别通知各厂各校的勤工俭学生派代表组成一百一十六人的“先发队”，分头赴里昂集合。并决定我和肖子暲、向警予以及巴黎近郊和其它地方的同学代表组成十人代表团留驻巴黎，负责联络和争取声援。“先发队”同学到里昂后，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勾结法国政府将他们囚禁在一个兵营里面。十人代表团分途寻求支援，但都没有发生积极效果。我曾去里昂兵营向同学们报告巴黎活动情况，并提出另派代表去巴黎，我留兵营。后来依和森及同学们的意见，仍回巴黎参加十人代表团的活动。不几天，“先发队”中一百零四人在囚禁了二十八天之后，被法国政府武装押送回国。世炎在同学们协助下机智脱险，跑到法国北方靠近比利时的地方去做苦工，打扫战场。这次被押送回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世界社社员已查明的有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贺果、刘明俨、颜昌颐、唐灵运、肖拔、郭春涛等人。向警予随后也回了国。

这次斗争是从勤工俭学运动内部矛盾发展中爆发出来的。从它的具体目标来说是失败了，但是从它留下的影响和收获的果实来说，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使法国资产阶级亲眼看到中国青年从五四运动以来迸发出来的一派不怕军阀统治，不受洋人欺侮，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气势。它结束了似潮流般的勤工俭学运动。一切好心好意提倡这个运动的人，由此知道此路已经不通。至于那些企图借这个运动捞取政治资本的有野心的人，就只好自己去感受幻灭和悲伤了。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斗争出现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许多人抛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的人后来积极投入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另外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在国外学习科学技术，回国后就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这次运动本身是有缺点的，实际上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冲在第一线的太集中；也不懂利用上层内部的矛盾，对蔡元培、李石曾与陈箓等人没有区别对待，对于敌人的狡猾也认识不清。这次运动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一个严格的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

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二〇年底也到法国勤工俭学。他和勤工俭学生有着广泛的联系。我们当时还不认识他。事后才知道他对这两次斗争甚为关注。他考察了运动的情况，写了很详细的报道寄给天津《益世报》发表。越到后来，报道的倾向性越鲜明，代表了勤工俭学生的呼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他自日本回国，领导了天津的五四运动。他领导的“觉悟社”，已与李大钊同志和北大的先进分子有联系。一九二〇年，他在斗争实践中热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赴法后，曾到英国伦敦一个短时期。一九二一年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初，我收到恩来、世炎托人转来的信，约我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我们商定分头筹备。在筹备期间，我曾反映尹宽、薛世伦等人的意见，提出工学世界社全体社员参加的建议。另有人建议，有关的进步组织可由代表参加。这两种建议都是幼稚性的表现，既与原则不合，也与实际不符。经过酝酿讨论，

双方都放弃了。约在一九二二年六月，我们在巴黎近郊森林里集会，宣告旅欧少年共产党正式成立，世炎任书记，恩来负责宣传，我负责组织。各用一个代号，叫乐生、伍豪、罗迈。党部设在巴黎意大利路哥特伏化街十七号一个旅馆里。经常在那里工作的有赵世炎、李维汉和陈延年，从工厂接受选云母片的工作，维持生活。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原来信仰无政府主义，延年还负责编辑过《工余》杂志。经世炎等的工作，我记得先是乔年后是延年陆续参加了少年共产党。延年参加了少年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编辑机关刊物《少年》。他俩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之后，成了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都反对陈独秀主义，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若飞在蒙达尼胶鞋厂工作时，和我多次在运河岸上散步并畅谈。他告诉我，欧战前信仰过俾斯麦主义，欧战后改信威尔逊主义，最后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曾积极从事华工运动。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他是领导者之一。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他也是领导核心的成员。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在党中央工作的蔡和森来信，要我回国工作。我受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委托，带信给中央，请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路费是恩来和世炎为我筹集的。我于一九二二年底或一九二三年一月初到了北京，向党中央报到。党中央在一次会议上，批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由中央另给指示。我则由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派回湖南工作。回湖南前曾给世炎、恩来去信告知结果，以后就再未同旅法组织发生联系。

当时已回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世界社社员都已加入了党或团的组织，参加了实际工作。留在法国的会员、社员后来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党团组织，在旅欧党、团组织领导下从事学习和工作，并大都经过去莫斯科学习，然后回国。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至此最后也结束了它们的活动。

周恩来、赵世炎是中共旅欧组织的创立者。我回国后不久，恩来和世炎等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分别建立了党的支部，后联合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恩来在一九二四年回国以前，一直领导旅欧总支部的工作。这期间，党员和团员都有不少发展，许多团员加入了党。我们党的老一辈党员中，已经去世或牺牲的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张伯简、林蔚、郭隆真、余立亚、熊雄、熊锐、孙炳文、穆青、欧阳钦、李林、李蔚农、王人达、张增益、任理、肖朴生、袁子贞、马志远、资道焜、陈彭年、李大章、邢西萍、陈微明、谢唯进、何以端、史逸、林修杰、高风、李季达、陈声煜、冉钧、黄士韬、杨志华、帅立木、范一，以及现在还在工作的邓小平、聂荣臻、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江泽民、刘鼎同志等⑭，都是在旅欧支部参加党的（这是一个初步查明的很不完全的名单，还可能有错误，待以后查实改正）。

（三）

新民学会的成立和活动，处于中国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因而在它身上就必然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就革命阵线来说，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五四运动兴起于一九一九年，结束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它具有为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姿态。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出现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织和个人。由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就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五四运动伟大历史意义之所在。

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新的文化革命运动。它是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在文化上的反映。它在一定条件下为"共产主义的新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六五七页）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但是，五四运动的阵营是由不同的政治力量组成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政治战线的分化，也发生思想战线的分化。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八九页）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的"改造"，就是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既是对五四运动历史发展的总结，同时也包括了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经验。新民学会建立于五四运动前，活跃在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中。它的成员们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抱负，研究和探索革命的真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跟随着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锋毛泽东同志不断前进，而成为共产主义的忠贞战士；一些人在这面伟大旗帜的影响下，成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少数人则走向这面旗帜的反面，被革命风暴抛人浪底，成为沉渣。

当时，在我们同辈中有这样一句话："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这种评价，现在看来并不恰切，只看到毛泽东同志当时重视革命的实践，没有看到他同时重视革命的理论。现在回忆起来，毛泽东同志从五四运动起，就表现出他是一个注意认识和实践相一致的先进战士。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历次斗争中，越来越显示出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决果敢，势不可当的气概。对于革命理论（当时我们称为"主义"）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是非常重视的。他指出，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给罗璈阶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第二七页）学会初成立时，我们一班年青人不满现状，要求向上，讲求改造，有爱国思想，但是认识上还很朦胧，很空泛。毛泽东同志引导我们通过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明确学会的共同目标和达到目标的共同方法。我们留法的会员和在国内主要是在长沙的会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把学会的宗旨统一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目标之下，并且在讨论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时，使许多会员抛弃了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倾向，抛弃了小资产阶级工读主义幻想，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我自己在勤工俭学时期，就是从爱国主义经过大约十个月这样的空想和幻想之后，在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的影响下经过学习进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同志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很重视对中国实际的调查研究，重视参加当前的实际斗争。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他凭借和依靠新民学会这个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和领导了

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活动，如五四运动、勤工俭学运动、驱张运动以及省自治运动等，都取得一定的成绩。对于留学运动他是赞成的，因为它有助于开阔眼界，解放思想，从外国汲取革命的经验。但他总是把立足点放在中国，重点又首先放在湖南。他重视“留洋”（留法留苏）求真理，但更重视脚踏实地地在中国这个地盘的工作。对待问题，他既是从全局从长远着眼，又是从局部从当前出发。他曾说过：“吾人如果要在现在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给周士钊的信，一九二〇年三月四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第三四页）进行驱张和自治运动时，有的会员对这类运动曾有怀疑，认为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无需顾及这些当前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以为然，他一方面说明，类似驱张和自治运动，都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都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它只是我们“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它又是我们“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毛泽东为易礼容信加的按语，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第二一页）因此，不能迷恋当前的具体斗争而忘掉斗争的终极目标，也不能空有一个斗争的远大理想而不去参加和争取领导那些有利于人民的当前的实际斗争。事实上，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使湖南人民受到了教育。在实际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注意抓住时机，发动群众。一九一九年底，长沙发生了一个“新娘”赵五贞因反抗旧式婚姻在花轿里用剃刀自杀的事件。从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起，毛泽东同志连续写了十多篇评论，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揭露这个事件的社会背景，从而在长沙社会上掀起了一个反封建的宣传和控诉运动。

对于学会会务，毛泽东同志主张采取“潜在的态度”，注重“打基础”，“不张扬”，“不标榜”，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要“象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毛泽东给欧阳泽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第集十三页）。毛泽东同志的深入社会，深入实际，埋头实干的好作风，对学会很有影响。在会员间形成了“言必及义”，不标榜不浮夸的好风气。毛泽东同志亲自编订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对于团结会员，探求真理，活跃会务起了极好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舆论的作用，注意抓舆论工具，湖南学生联合会一成立，毛泽东同志负责主编学联刊物《湘江评论》。《湘江评论》被封后，又主编第七期以后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刊，并通过学会会员在长沙掌握湖南《通俗报》和“通俗讲演所”。驱张运动时，在北京、上海、衡阳办刊物，办通讯社，并且重视利用如湖南《大公报》这样的社会舆论工具。以后又办了“文化书社”。毛泽东同志通过这些阵地，揭露旧制度，传播新思想，聚集革命力量，打击反动势力，对于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对于一切事物都主张采取分析态度，深恶那些“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以一时概永久”，“以主观概客观”的“论理的错误”（毛泽东给罗学瓒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第五五页）。他在五四时期写的评论文章，都层次鲜明，有说服力。他给我们在法诸会友关于讨论共产主义的信，就是一篇有分析的说理文章，道理说得十分浅明、中肯、透彻。

在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团结多数，包括团结社会上层分子，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减少斗争的阻力。在驱张运动中，通过学生联合会，团结了反对张敬尧暴虐统治的各界人士，

利用了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取得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接近直系的冯玉祥的一定程度的支持，把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张敬尧。

新民学会成立以后，投入了一个又一个斗争，这些斗争之所以取得不同程度的成绩，固然是多数会员努力工作的结果，而上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艰难曲折的路程以后，来回忆毛泽东同志当年的活动和思想，倍加感到亲切，更加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和作风，源远流长，放之四海而皆准。

新民学会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在它存在的三年中，在中国革命动荡转变的年代里，逐渐由民主主义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会员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许多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共产党员，有的成为党的同情者。会员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陈昌、张昆弟、罗学瓒、郭亮、夏曦等，以及相当于新民学会"分支"组织的工学世界社的社员李林、颜昌颐、林蔚、李蔚农等在后来的革命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和所有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烈士一起，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纪念。

〔注　释〕

本文中提及的人物，一部分作了一些注释，因为材料不完备，难免遗漏和错误，尚望了解情况的同志提出补正意见。

①蔡和森，湖南湘乡人。一九二〇年初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因领导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主编。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二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且是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夏牺牲于广州，时年三十六岁。

肖子暲湖南湘乡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任附小英文和音乐教员。一九二〇年五月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四年回国。大革命时，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委员会书记、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及代理书记等职。三十年代为"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主编中文版《国际文学》，并从事写作，宣传中国革命。一九三九年四月回延安。建国前后几年从事国际活动。以后至文化大革命以前长期从事文艺工作。

陈绍休，湖南浏阳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体育教员。一九二〇年五月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在巴黎逝世。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解放后在湖南大学任教，现任湖北财经学院教授。

张昆弟，湖南益阳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北方从事工人运动，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之一。土地革命时期，曾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湘鄂两省总工会党团书记。一九三〇年在洪湖牺牲，时年三十六岁。

邹蕴真，湖南汉寿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曾任修业等学校教员。现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陈书农，湖南长沙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曾在周南女校任教。解放前后任湖南大学教师。已故。

何叔衡，湖南宁乡人。一九二一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党时期和北伐初期，任中共湘区区委委员，后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在瑞金先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检察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和内务部长。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长汀县水口附近被敌人包围，壮烈牺牲，时年六十岁。

②罗学瓒，湖南湘潭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自修大学学生。一九一九年秋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湖南从事工人运动。曾任中共湘区区委委员、湖南省委委员、醴陵县委书记。一九三〇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陈昌，湖南浏阳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自修大学学生。大革命时，曾任水口山工会主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一九三〇年由上海去湘西工作时，途经洋县被捕，牺牲于长沙，时年三十六岁。

曾以鲁，湖南武冈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一九一九年秋赴法勤工俭学。解放后在华东美术学院任教。

③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著名资产阶级教育家。一九〇五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二年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一九一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他主持北京大学期间，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在学生中发起组织各种学会、研究会，并于一九二〇年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大学男女同校之端。五四运动中，他主持的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在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委和中央监委。一九二七年后，曾任

蒋介石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委、代理司法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日抗战，参加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移居香港。一九四〇年在香港病逝。

④侯昌国，解放前在上海法商水电公司任工程师。解放后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贺果，字佩钦，现号培真。湖南宝庆人。解放后任贵阳市政协副主席，第四、五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⑤刘仙洲，字振华。解放前任清华大学教授。解放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已故。

⑥朱炎，字采尧。湖南高等师范毕业，在第一师范教博物课。解放后曾任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已故。

⑦彭璜，湖南湘乡人。长沙商业专科学校学生。五四时期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曾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各界联合会干事。一九二一年逝世。

⑧罗宗翰，湖南安化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中共同情者。新民学会活动和尔后革命工作的积极参加者。一九二七年病故。

张国基，湖南益阳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务处任干事。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长期在雅加达从事华侨教育工作。现任北京文史馆副馆长。

夏曦，湖南益阳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大革命时期，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委书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曾参加南昌起义，以后赴苏联学习。曾被选为第六届中央委员。回国后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六年牺牲于贵州毕节地区。

蒋竹如，湖南湘潭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前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学。已故。

向警予，湖南溆浦人。一九二〇年初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于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曾当选为第二、三、四届中央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牺牲于武汉，时年三十三岁。

李振翩，湖南宁乡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后赴美留学。美籍学者。

李思安，湖南长沙人。湖南蚕业讲习所学生。一九二〇年去新加坡坤成女校任教。一九二五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总工会妇女部长。大革命失败后脱党。长期在印度尼西亚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回国任湖南文史馆馆员。

周敦祥，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后入南京高等师范补习班学习。一九二一年去新加坡南洋女中任教。大革命失败后回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任湖南文史馆馆员。

魏璧，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七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解放后曾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一九六九年病故。

劳君展，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七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数学系主任。一九三五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研究员。一九七六年逝世。

钟国陶，湖南浏阳人。南京高等师范毕业，曾任周南女校教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主事，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已故。

刘明俨，湖南安化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在进占里昂大学斗争中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解放后在湖南文史馆工作。

李云杭，周南女校教员。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解放后任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

易礼容，湖南湘乡人。解放后历任第一至第五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至第九届执行委员。

郭亮，湖南长沙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粤汉铁路新河、岳州站工人俱乐部秘书、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副总干事、总干事。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总工会候补委员。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改为湖南省总工会时，被选为湖南总工会委员长。党内曾任湖南省委委员、工委书记、第五届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八月参加南昌起义，后任湖北省委书记，湘鄂赣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三月，因叛徒苏先骏的出卖被捕，二十九日在长沙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二十七岁。

陈子博，湖南湘乡人。湘乡驻省中学学生。曾参与创办文化书社。后病故。

刘清扬，河北天津人。回族。一九二〇年留学法国后转德国。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以后参加过民主活动。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红十字总会副秘书长等职。一九七七年病故。

戴毓本，湖南衡阳人。周南女校学生。曾在自修大学、上海大学、武昌中大读书，毕业于湘雅产科学校，长期从事医务工作。已故。

张超，湖南湘乡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在一师附小任教，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病故。

⑨朱剑凡，湖南宁乡人。周南女校校长。进步教育家。大革命时期为国民党左派。一九三五年病逝于上海。

汤松，字寿军，湖南长沙人。曾任长沙商业专门学校校长、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陈嘉言，字梅生，湖南衡山人。北洋军阀政府国会议员。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曾任唐绍仪内阁财政总长、北洋政府热河都统、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石油督办等职。一九一七年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一九一八年创办香山慈幼院。一九二二年任中华教育改进会董事长。一九二

九年任全国赈务委员会委员、华北赈灾会纠察组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居香港。一九四二年病死。

陈夙芳，曾任楚怡学校校长、湖南省教育会会长。一九一九年与徐特立等在长沙发起组织“健学会”，研究传播新思潮。但后来很顽固。

赵鸿钧，字运文。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秘书。对于驱张运动和开办文化书社都曾积极赞助。

范源濂，湖南湘阴人，曾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次长、总长。一九二二年任北京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一九二七年病逝于天津。

⑩葛健豪，湖南双峰人，一九一九年底与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赴法勤工俭学，参加了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留法勤工俭学生发动的“二八”运动。一九二四年回国后在长沙湖南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任校长。一九四三年病故，时年七十八岁。

黄齐生，贵州安顺人。一九二一年与王若飞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三一年王若飞同志被捕入狱后，黄三次探视，积极营救。一九四五年赴延安，一九四六年三月代表延安各界赴渝慰问“较场口事件”中被殴打的民主人士。同年四月八日返延时因飞机失事遇难。

⑪李林，湖南宝庆人。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参加中国共产党。回国后长期在北方从事党和工会的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于中央苏区。

⑫颜昌颐，一九二一年在进占里昂大学斗争中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长期参加党的军事工作。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党代表。一九二九年在中央军委工作。因叛徒出卖，与彭湃、杨殷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傅烈，江西临川人。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四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驻南昌时，兼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八七”会议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三月牺牲于重庆，年二十九岁。

王人达，湖南浏阳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苏联工作。一九五七年回国，同年病逝于北京。

郭春涛，湖南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在进占里昂大学斗争中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回国后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加入国民党。抗日时期参加民主运动。全国解放后曾任政务院副秘书长。一九五〇年病故。

⑬李慰农，安徽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回国后在北方从事工人工作，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在青岛被军阀杀害。

⑭赵世炎，四川酉阳人。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俭学，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回国。曾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和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后任江浙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书记，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一九二七年七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二十六岁。

王若飞，贵州安顺人。一九一九年冬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在法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回国。历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等职。在党的第五至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时年五十岁。

陈延年，安徽怀宁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回国，曾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江浙区委和江苏省委书记。“四一二”政变以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五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二七年六月被捕，牺牲于上海。时年二十八岁。

陈乔年，安徽怀宁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一九二四年回国。历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一九二八年六月牺牲于上海。时年二十七岁。

刘伯坚，四川巴中人。曾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一九二三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国后被派往西北军冯玉祥部任总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军政大学学习，出席党的“六大”。一九三〇年回国后被派往江西革命根据地工作，历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五年牺牲于江西，时年三十五岁。

张伯简，云南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后至德国，为中共旅德支部成员。回国后，在上海、京汉铁路进行革命活动，曾任中共两广区委军委书记。于一九二五年病逝广州。

林蔚，字乔生，湖南湘潭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赴苏联学习军事。一九二六年回国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任醴陵县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三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二十七岁。

郭隆真，原名郭淑善。回族、女。河北大名人。五四运动时期，是觉悟社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三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回国，在北京作党的妇女工作，主持缦云女校，编印《妇女钟》、《妇女之友》等。一九二八年任河北省委委员，后任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

记。一九三〇年在青岛进行工人工作。次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济南英勇就义，时年三十八岁。

余立亚，又名王炎夏，湖南长沙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一九二三年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在铁路总工会工作。党内曾任中共上海吴淞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熊雄，江西宜丰人。早年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六年，在湖南郴州任护国湘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俭学，后转至德国，是中共旅德支部成员。一九二三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二七年四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三十五岁。

熊锐，广东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后转至德国，是中共旅德支部成员。回国后曾任黄埔军校教官。一九二七年“四一五”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孙炳文，四川南溪人。武昌起义后参加同盟会。一九二二年赴德留学，同年入党。后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冬回国，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穆青，字树珊，四川合江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四年赴苏联学习，任中共旅莫支部组织委员。回国后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广州暴动。一九二八年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书记。一九三〇年牺牲。

肖朴生，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中共旅法支部组织干事。回国后负责中国济难会的工作。一九二八年病故。

袁子贞，河北霸县人。旅法华工。与赵世炎等交往较多，在华工中作了许多工作。一九二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候补执委。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北方铁路工人中进行工作。大革命失败后牺牲于天津。

马志远，河北高阳人。旅法华工。在法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回国，在北京、天津、沈阳从事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原籍组织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武装。一九三九年被日寇杀害，时年四十六岁。

资道焜，中共旅德支部柏林小组成员。内战时期在东北牺牲。

陈彭年，旅法华工。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牺牲。

陈微明，又名沙可夫，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六年赴法学习音乐，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春赴苏联学习。一九三一年回国后去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和《红色中华》报主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晋察冀文联主任。解放后任全国文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一九六一年病故。

谢维进，早年赴法、德勤工俭学，是中共旅德支部苟根廷小组成员。以后长期在欧洲作国际宣传和组织工作。解放后在空军工作。一九七八年病故。

史逸，安徽桐城人。一九一四年留学日本。一九二二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三年在德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一九二七年调武昌中山大学任教，同年八月随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转回广州，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三十六岁。

林修杰，四川南充人。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国，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秘书、九江地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领导星子县城起义。一九二八年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二十八岁。

高风，湖南华容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一九二三年赴苏联学习。回国后曾任中共保定地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一九二六年被军阀杀害于保定。

李季达，四川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一九二六年牺牲于天津。

陈声煜，四川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五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回国后牺牲于湖北。

冉钧，四川江津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三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回国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一九二七年牺牲于重庆。

黄士韬，广西贺县人。早年赴德勤工俭学。一九二五年在德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国，曾任中共广西特委组织部长。一九二七年牺牲于广西梧州。

杨志华，湖北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任中共浙江省委秘书长。一九二九年牺牲于杭州。

帅立木，四川江津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回国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秘书。牺牲于江津。

范一，四川富顺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牺牲。

（选自《历史研究》1979第8期）

利群书社

（一）

利群书社是一个营业的机关，是一个文化运动的场所，是一个修养会社的结晶体，是一个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的雛形。

何以发生这样个利群书社？

第一个原因：便是有许多修养小会社。这种小会社第一个成立的是互助社。互助社的开始，只有四个会员，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他们因为助人的原故，决定除了欢迎新会员以外，不拘名义、不拘办法的帮助人家成立别种会社。当互助社第二组成立时，取名定章，本没有甚么成见。不过后来不期大家同意，决定完全采第一组一样名义、办法。这样的推行到互助社的第五组。后来进行便似乎有些停滞了。这时候仁静、济川、兴焕便仍本不拘名义、不拘办法的精神，与别的朋友组织了一个辅仁社。毓兰与别的——他黄州同乡——朋友组织了一个黄社。代英与别的朋友组织了一个仁社。大概目的都是一样，不过有说是成己成人，有说是促进三育罢了。这样的过了半年多，治平等看见了互助社开会的情形，便觉得很有益处，因另组织一个会。这样又成立了一个为我社，后来改名日新社。从前组织的仁社渐渐呈消灭情形。毓兰、焕星等为图各校间的联络、又发起了个健学会。现在利群书社的人，有的是互助社的社员，有的是日新社的社员，有的是辅仁社的社员；有的是健学会的会员。这是书社成立的时候，就彼此了解些的朋友，先试验共同生活的意思。所以说书社是各个小会社结晶体。

第二个原因：便是因为如上所说的各种会社，开始都系以助人为号召，或者这种勤劳、牺牲的修养，使大家易于接受新文化。从《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出世后，业裕、以新、毓兰、济川便发起了《新声》半月刊从事新思潮的研究。这个刊物，内容实在浅薄得很，但却是武昌第一个新文化出版物，或者亦是全国响应北大新思潮的先驱者。新声社的社员为了这个刊物，捱了许多的骂。但是便这样的越发助成他们成了新文化的研究者，亦助成所有互助社乃至别的会社的社员都有些趋向于新文化旗帜下面。一直到了现在，利群书社的分子仍勉力本着他们勤劳牺牲的精神，做他们文化运动事业。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代英是个向来最爱看杂志、亦爱投稿事业的人，所以与杂志界有些来往。《新潮》出版的时候，托他代售，后来《新青年》亦托他代售。这个时候，代英正在中华大学任有职务。他因见青年有知道世界最近政潮，思潮大概的必要，屡提倡学生多看杂志。积了一年的力量，又值"五四"以后新文化的花遍地茁发，又值绍文从北京回，在中华大学设书报贩卖部，于是看杂志的风气才渐开了。这个时候，遵芳、光耀亦在校另设书报代售部，把代英所代售的划入该部，又另外邮索了许多书报，营业情形还好。到九年一月，代英辞了中华大学职务，预备到北京去。因为保存代售新书报的场所，且扩张他的销路，所以

决定在学校外面建设一个商店。这便是我们组织书社的步骤。

第四个原因：便是因为互助社的社员，在民国七年上季，社务进行极圆满，社员彼此很相互了解，无形之中似觉成了一个特殊的关系。新声社成立以后，他们渐有共同生活的感想。到周作人先生等鼓吹新村的时候，在《新声》上毓兰便有一篇文，名子叫做《新生活计划》。这才把共同生活形之笔墨。接着代英又就他这文加以商榷。那时的意思，所谓新生活，便只主张从比较了解的人、由轻而易举的办法办起。不过那时候是想在乡间适当地方组织个自给共产的新生活，没有想在城市中怎样做。接着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了，王光祈便写信给家菊、代英，盼望武昌有个同样的事业。在这信未到之前，家菊、代英、光耀便对于这件事有一度商议。起始的时候，想组织一个书店，供给六个工读同志的伙食。那时家菊、代英已有辞学校职务的心思，亦想自己加入。这样个成议，延捱了许久，没有实现。原来那个新生活的精神，又搀了许多进来，结果在九年一月，遂发了《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那一篇宣言。因为事实上的便利，亦决定不用北京工读互助团办法，只注意练习职业生活，练习共同生活。非必不得已的同志，书社不为代任伙食。这样，便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利群书社。

一件事的发生，原因每每极为复杂，详细的、有条理的叙述出来，令自己亦感觉得很有兴味。归总一句话，利群书社或者是我们各方面努力所得的总数么？

（二）

倘若要叙述利群书社最初开办的历史，或者更是极有趣的一件事。

在开办的时候，实在是只有很少的钱。代英从前就职的薪俸，一由贴补家用，一由随事挥霍，向来没有剩余。到与家菊筹划建设书店时，原拟开办费二百元，由发起人分任捐筹。代英此时预定把下月薪金六十串文，全数捐作此用。代英有个伯父，是一个旧式的好人，他很赞成子弟做生利事业。这件事被他知道了，他便力与赞成，答应便是一两百元，他亦可以捐助。这一说自然眼见事在必成了。

因为这个事业，预备在假期中进行，所以定议后许久，没有进行。后来代英下月薪金，又逐渐为必要的事而扯用了。这时候他只恃着他伯父那一句话，除此以外没有把握。

及到要兴办这事的时候，他向他伯父要捐助。他开了个五十元的口，隔了一夜，他伯父却只筹了二十圆给他。这却令他大失所望。但他亦想还聊胜于无，还想勉强努力的试干得看。在书社服务的基本社员，亦决议至少在开办的两个月中，不把伙食费用累书社。所以他究竟还不肯放手。

后来他辞职到北京读书计划决定了。书社的房屋亦因为没有内老板，至于遍觅不得合当的地方。以新、光耀等又怕书社真个办成，营业的麻烦太耽搁了读书的时候。这几种原因，遂令他们决定把这件事停搁不办。

但这个时候，焕星、书渠极热心这个书社的实现，光国、治新、光耀、昌绪都很倾向为这种书社效力，以新亦不愿固执己见。等到代英职务已经辞脱了，因焕星等的大活动，在焕星临回湘的前一天，他仍将房屋商好，把一押一租的房金付了。这样便书社的事在所必办了。

这时有几个钱在手里呢？最初只书报代售部转来钱三十五串文，及代英伯父所捐有二十圆，这便是所有的资本。从这样的资本中，第一二天便付了房租二十六串，桌椅及厨房用具共约三十三串，这便剩余无几了。搬进书社的日子，正是阴历年底。本来明知没有甚么生意

可做，但因怕新年租不好合式房子，只好拼着多担任一点房租，只作为是大家住栈房一样。大家既然搬进来了，亦想着不管有没有生意，横竖开了门做一笔生意总可以贴补一点，于是清理了两天房屋，在一天大雪的日子，把店门便打开了。

我们为节省费用，亦自己练习勤劳。甚么书报书架什物，都自己搬移。穿个长衫，背着一人长的书架子，或抬着桌子，提着几十斤的书包，这都是大家破天荒的劳动生活。我们开始只说以新、光耀两个人住书社内面，自起伙食，代英等每日来服务、读书。第一天以新等自己烧火，半天不燃，食物半天不熟，一闹一天，别的事都几于不能做。这样，看得势头不对，又约了书渠、光国、光楚进来。遂约定以新、光耀、光国、书渠、代英轮流烧火做饭及市面服务。大家都是外行，自然每次做饭耗时很多，然仍每弄得夹生或焦黑。好在炉火油盐任意的用，每次饭如看势不好，便加水与油盐，索性一煮。大家吃这种半干半稀的饭，倒亦格外快活，每顿饭吃到没有余粒为止。菜止规定有两种蔬菜，只是猪油用得多，味亦很可口。这个时候一天固然做功课很少，但大家住得非常快活。他们说：这是老太爷养成所。

还有味的，便是开始没有许多铺板。他们决定楼上便就地开铺，楼板上糊报纸一层，被褥便放在上面。四个人睡的地方都连接在一处。在那寒冷风雪的时候，大家仍然觉得很好。阴历新年的时候，他们唱歌谈话极为畅快。

至于生意呢？第一天卖了八十文，第二天卖了四十文，第三天卖了二十文，第四天卖了五百余文，第五天卖了二串余文。从这以后，大抵每天可以有几串文的生意。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招牌，便由书渠写了个纸条子贴在门上，日久又破了。人家只听说有个利群书社卖这些古怪的书报，许多人找了几多次才找着。我们那时书架亦很矮，书亦很少，房子又破烂不堪。现在回头想起来这把戏，自己亦好笑。但现在因陋就简的地方仍然不少。因为我们总信量力做事比虚张声势的好些。

后来寒假开学了，到书社中服务的人渐次多了，生意亦渐好了，房子亦经房东油漆过了，书架亦加上两层了，但是招牌仍是许多时候才做好。房子又小了，一个楼上由住四个人加到住八个人。天气热了，人既多而物件放置又很凌乱，每天在上面的人，完全被磕睡虫笼罩住了，而且怕害病。那时他们大找其房子。找了几处，仍然因为没有内老板，许多房东不放心租借他们。后来书社后面的房子里，出了新婚夫妇悬梁吞毒的事，于是这个出鬼的房子没有别人租，他们经人家介绍，每月给十五串租过来了。这便是利群书社的一部进化小史。

（三）

现在利群书社已经成立了半年多了。我们那样小的资本，亦那样寻常的生意状况，靠甚么能维持这久，这值得注意研究。

我们自问在开始的时候，确实有些是冒险试验。卖新文化书报的处所，这以前武昌几于没有两处；而他们卖这类书报，又只是附带营业的性质；武昌人购买这类书报的，据我们知道为数不多。这样便生意能否自己维持，是毫无把握的事。所以我们量力开办时，一切从简。预计由书社只任一个人的伙食，再加房租杂用，假令试办两个月，一个钱不卖，亦只亏折得五六十串文。我们在初办一件事时，固然不能计出万全，但假令失败了，我们是否有力量担负这个损失，这不得不预先计划。

我们所有的书报，都是由代英经售、新声社经售、书报代售部经售的转入。此外又函索

了些新书。这些书报，都讲明了卖后交价，亦不预缴证金，只是靠人的信用作担保。自然这样便有些书报图索不来。为营业体面起见，自是不妥，但我们的意思，为前途的安全，宁费力想别种方法进行。若必然不能成功，便暂缺这项货物不办。

我们开办的时候，已完全把书社担任每人伙食的意思打消。每个人仍照他应出的伙食费筹缴，只实在无力筹缴的，由书社代出。起始书社只出一个人的伙食，后因开学了，许多社员白天都要上课，所以另雇了一个童子，每天煮一顿饭，带着送报。这些时候书社的生意逐渐好了，然每月开支总只在三四十串左右，此外稍置了一点什物，结果核算亦不能赚甚么钱。所以假使我们真要顾每个人的伙食，一个月中平添了二三十串以上的开支，早已亏折得站不住了。

我们自己规定的章程，每月底必向发行所清帐，只须售价满一元以上的，通常必不与压积。这样便可免致负债累而可以加增信用。

我们原定的采办书报标准，总以有价值而武昌没有几多代售处的为主。因为我们最注意的，不在营业，在于介绍文化。然而后来因营业便利、经济限制，有许多应办的没有办来，亦间有不应卖的代卖了些。这是我们歉然的事。

我们的营业有许多不象商家的地方：银洋不照市价出入，许多时候都照一串六百交换一元计算。规定凡购价二元以上的九折，但不满二圆的无折扣。二圆以上乃至十圆、百圆，亦无特别通融。有熟识热心同志，为图书馆或其他公益场所办书，有的竟照收入原价加邮费售与他。总之我们不能一心一意只注意在营业，但我们亦不能不有些时候要计较利益，那是自然的事。

我们卖的多系杂志、新书，不卖教科书、仪器。虽然生意总算出乎意料以外的好，但究竟只做得一方面的生意。所以仅仅只能维持现状，没有余力发展，而且以假期生意冷淡，结算下来，怕还不能说入可敷出。不过我们现在靠社员投稿或他项收入，逐渐填充，所幸悬帐未清的地方还少。我们的决心：无论如何，我们宁自己吃亏，不误人帐项；宁另筹款项维持这种事业，决不让这种事业发生危险。因为在营业方面，究竟武昌因有这个书社，多推销了许多书报，而且多成立了许多同类的书报社。再共同生活，我们更觉得有维持他存在的必要。

在营业方面与共同生活方面，社员以这半年的经验，显然觉得有许多益处。我们平素虽能说注意修养，但究竟处事待人有许多言语态度不修饰的地方，而处群修养更有许多不切实不周备之处。有的时候招呼生意，似乎吵架；有的时候记录帐簿，错误不堪；内部的生活，因为关系太密切了，而又有些地方不善相处，有时竟显出来旧家庭同居一样坏毛病。这样些缺点，经了彼此切磋，彼此警惕，已改进了许多，但是一直到现在，仍然看见处处显出不圆满的地方。我们明知道书社外面的人，若不觉得我们太与外面隔绝，便要觉得我们个人或团体有许多地方可訾议，我们自己亦断不承认现在我们配得上做个甚么理想团体，不过我们信结团体过生活便是学习过团体生活的最好方法。我们已经学了许多功课，现在还正在上课呢。

（四）

我们就半年的经验，所以现在关于营业及内部生活改革了许多。这一次开学以来，第一件事便是规定--种约法。现在将实际履行的约法录在下面：

一、凡在社内居住的，必须尊重公共安宁及幸福。

二、凡在社内居住的，必须按定时间作课及服务。

三、社内作课时间：规定为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晚七时至九时；在此时间内，无论何人不得发生喧扰，乱人注意。

四、作课须出声的于十八号楼上作之。

五、店中服务均于十八号楼下作之。

六、会客必须引入会客室内。

七、市面：上午八时至晚九时为开市时间。

八、每日夜九时至十时开会。

九、除书社担任伙食等费的人外，每人月须宿费七百文，膳费用后照算。

十、社员欠款、余款，每月由管伙食与管书社帐的人开单公布。

十一、由书社担任伙食等费的人：

一人　服务五小时，兼来往信札、邮购书籍。

一人　服务四小时，兼送报、誊核帐项、清书。

一人　做饭。

十二、每月出费的，每日服务约以一小时为标准。

十三、用物必须清理归还原处。

十四、不能遵守约法的，退出书社。

我们现在实际社务的支配如下：

书渠　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服务，兼来往信札，邮购书籍。

野青　上午八时至十时、下午三时至四时、晚八时至九时服务，兼送报、誊核帐项、清书。

铭新　下午四时至六时服务。

光国　扫地、抹桌椅。

昌绪　晚六时至八时服务，兼油印。

子俊　做饭。

代英　洗碗、上灯。

春山　折报。

治平　寄报。

焕星、禧理、华梓　送报。

此外，以新司上海交款事；毓兰司北京交款事。

我们每日晚上为店务有半小时的会，又为修养有半小时的会，这些时候总算很有进步。我们亦想于营业有些扩张，但若不得可靠的款，宁不乱动。我们最急的是求团体意识的形式。我们信只要这个团体能把这比较困难的四五年打过去，无论生意定然发达，便靠我们同志别方面的努力，共同生活的前途定然要成为社会服务的有力团体。

我们没有事了，便谈我们将来的事。我们盼望靠现在努力的基础，求各方面的发展，亦盼望我们各方面的发展，一样使我们的共同生活愈益巩固。要知道我们究竟的目标，请看下面经过三版的《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宣言。要知道我们预拟进行的计划，请看下面《未来之梦》。

（《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
（选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未来之梦

代英

这样个题目，在五月间已经做过了文一次，但时移势异，到现在有许多的梦已经醒了，或者不愿再做了。记得五月间，我们几个北京的朋友常常谈这一些梦话。六月底的时候，武昌会员每每开了会后大家亦是畅谈梦话。谈得熏然欲醉，真是想得令人觉得犹有余味。古人说，过屠门而大嚼，虽不饱腹，亦足快意。何况我们只要自信，只要努力，合大家真诚向上的精神、勇猛无前的力量，不见得一定这都是些空话！朋友们！我们今天何妨再来共同的做一个大梦！倘若被后人说几句"理想者，事实之母也。有志者事竟成，岂不信欤！"那便是我们最快意的事了呢。

我这一篇文，自然是叙述我的梦，以及我所知道的些朋友的梦。但是这中间的话，亦许有许多不确不当的地方，亦许有许多不周不备的地方。我们的朋友，还盼望各人仔细阅览，仔细批评。我们要做一点事，不可不先结一个死党，要结一个死党，不可不先有明确的公共的目标。大家谈谈未来之梦，便是我们建设公共目标的方法了。

这一篇未来之梦，要分作几段讲：

(一)利群书社的前途

关于利群书社的前途，我们最近的计划，经了一个大改变。从十月以前，大概我们的活动完全精神集中于书社；到十月的时候，我们觉得书社从开办到现在，经济状况总只出入勉强敷衍，历次社员捐款都只能用以维持现状，这实在是不容满意的一种情形，所以我们对于书社改变了一种态度。

我们因为要有一种组织，以练习且完成共同生活的必要，所以我们定然得有一种生利事业为我们经济的帮助。而且我们盼望，这一种生利的事业将可以生许多利益，将来为同志有学力时企谋他种发展供给资本，这所以令我们十分注意于书社。

就半年的经验，书社大概只好维持现状，甚至还劳同志补助。这样说，他可以帮助别样生利事业的发展，怕不是眼前的事。不过我们究想若没有书社，我们仍盼望有个共同生活。这样，那便书社入款虽不够用，究竟是我们的一个补助。我们便为这一点用处，决定拼着忍受不能免的损失去维持他。好在这种损失社会亦能担负。我们原不为营业而营业，那便亦不能全看营业情形以为维持与否的标准。

不过我们若有方法求营业情形进步，我们自然应加意努力。我们的观察，两种事都可以使我们营业情形进步。一便是加售教科书或文具仪器，一便是将书社地址搬到察院坡。若能各件事同时办起来，那便更好了。因为我们的开支大概是固定的了，便加入服务的人，亦各系自任伙食，于书社不生影响。便令房租稍为加增一点，或营业的方便须加增几个由书社担任伙食的服务的人，至多每月开支不过多到三十串左右。若营业项目扩张，营业地址改变，收

人余利定然不止此数。所以我们的意思，为书社前途，求他个至少自给的方法，必对这两项之一，或同时对这两项求个积极的进行。

我们盼望若能得千元左右的款，定然同时把上说两项一并做到。这样，我们很有把握，按年可以有千余元或数百圆的余利。如此书社不但可以自给，而且可以能成就个生利机关，为我们作别事的帮助。但现在筹千圆左右款子还没有把握，我们亦想等得几百元的款子，先搬到察院坡去，或先扩张营业项目。这样些事，在所必办，不过迟早便无一定。

第一步我们是要求书社可以自给，苟可自给，便令没有余钱，社员在书社外的收人，将来亦可供各种发展之用。但是我们不能不盼望书社不仅是自给，因为我们为团体为社会要做的事太多了，不能安于自给为足。

我们以前以书社为唯一重要根据地，所以无论如何艰窘，我们不愿掺杂一点非我们性质的金钱进来。不但不愿招股，亦不愿募债，不但不愿募任息的债，便不任息的债亦不愿收。我们所欢迎的，只是一种捐款，或存作买书等费的存款。但就我们现在的意思，我们要在书社以外，在乡村中两三年内另立一个根据地。书社我们亦想略取开放主义，招募任息的债款，或名为股本亦可。大概我们的利息，以一分至一分五厘为止。借债的人，总以平素于我们的人格同事业有些了解、信托的为主。内部生活仍然不改现在办法。我们除付息及定期还本外，没有甚么义务。

我们因为想在乡村谋个更可靠的发展，几于有人想索性暂时丢了书社，干干净净为他谋个结束，大家用全力到乡村的事业上去。将来乡村里农业、工业的余利足够大发展时，再来图个卷土重来之计，索兴建设个大规模的商业来干干。大概要一些人到乡村里去图发展，这是大家承认应当的事；谈到丢掉书社，有许多人都不很赞同，而且事实上亦不易做到。因为书社的成立，商品多系靠信用来的，顶替给人家，得不着可靠的人，怕将来生纠葛，贻累我们；一齐退还发行所，有些书报又怕武昌没人再采办。再书社的宗旨、办法，向来为一般同志乃及顾客所注意，若收束了，在我们是另图发展，人家还以为是不能维持，于我们乃至新文化运动的信用、名誉，亦有些不好。所以丢掉书社大概是做不到的事。

就维持书社说，除了金钱的困难外，服务的人时有加入、退出的事，亦于团体事务、生活秩序每感困难；但这种办法，亦可以督促我们找新朋友，加增新分子，究竟亦有好处。苦痛是不能全然避免的，但求能于团体前途有益，决无轻与舍弃理由。

(二)乡村教育与乡村实业

因家菊、启天在长沙第一师范的努力，该校第二部可收鄂生，只出伙食、书籍费用，一年卒业。家菊等做这一件运动，以便利湖北教育革新为主，所以他们盼望去的，必不要仅是中华大学的人。对于书社同志，多未在中学卒业，前曾有人提出脱离学校问题的商榷，所以他们亦提出两层注意点，便是：一须真愿做乡村教育的事，一须暂时不作升学之想，切嘱不可以一时感情，冒昧决定的走这条路。

我们严重的讨论过后，觉得除了一切别的理由以外，为团体谋一个更可靠的发展，很宜于有人研究小学教育。便因这，我们共同生活的前途，多了一层快活的梦。现在我们说别样的发展，每每限于金钱、能力，自己没有把握，不过谈小学教育，在我们能力中，总要算比较最有把握的事。在乡村中，借教育运动得一个站脚的地方，渐次再图实业的运动，这样我们

便多一条发展的路。

比方到长沙一师第二部的同志，明年暑假卒了业，他们要找一个最便于发展的地方去办小学。或者将来我们还可以有更合宜的地方，眼前姑且假定是毓兰那里的濬新小学。这小学从前胡亮寅办得不错，后来亮寅走了，毓兰极力找合当教师，找不到手，因此时停办。我们知道，毓兰同其他与此校有关的人都很关心恢复此校，而且他们的校址便在毓兰家中从前所建的一个庙里，若办了学校，稍为费一点力，庙产还可变为学产。这样，便有田地，有森林，一年亦可收得几百串文的出产，可以供别样发展之用。说少些，我们现在只求有个小学校址。这小学一班，至少必得两个同志去办，因为这样才彼此于教课之余，有余力照顾儿童，有余力自己研究，有余力试验乡村农业或工业。到乡村去的人，只求可供衣、食、住、书报的费用，不望有余钱。果有余钱，只用以增加教育设备，试验各种实业。假如除上说两人外，还容得一二人去，以实业为主，教育为辅，只须可以衣、食、住没有恐慌，这样办法更易求实业方面的成功。因为我们究竟注意的还是在实业界的生利，可以为大发展的预备。

我们此时的实业运动，大概注意养鸡、养鱼、养蚕、畜牧、森林，渐进为纺织之事。起首总从不需多钱的入手。自然将来买山兴业总不免资本，但乡间营业资本可以百元计，不比都市中必以千元计，那便乡村的发展是我们能力可行的事。这种资本还拟由都市中同志筹出。

我们盼望将来都市中的书社、乡村中的学校与其他实业，可以彼此互相帮助他的发展。乡村的实业若能有个成就，不但金钱方面可帮助书社的扩充，亦可为学业有把握的高等专门的同志供给试验学业的资本，亦可养出一班同志趣、可靠的小朋友，为我们各种事业的帮助。

我们亦盼望有了余钱建筑起我们新生活的房子。假定这房子有十间房，此外图书室、工作室、浴室、食堂、游戏室、厨房、储藏室、厕屋等，约共一层楼二十间房。乡间用土砖砌盖，大概要不了两千串文。这两千串文，盼望从都市、乡村两处利息及同志别方面的收入抽出。这是完成共同生活必要的一步，盼望能于最近四五年间实现。

我们开始的计划，总想先有同志进高等专门学校，研究农业、工业，将来再作大规模的企业。但现在却改变了一种想法。因为这些同志，大概非家境不能供给升学，便是与父兄志趣不合，升学极为困难。即令金钱上升学没有困难，亦许中学卒业后，升学考试失败，或考不进他预定愿进的学校。况再进一层，自己没有一点农业、工业经验，便不知功课何处重要，对于现在稗贩来的农、工业知识、亦不知怎样求他个本国化，这样所以亦许学习了专门知识去企业，仍然没有成功把握。这种企业规模既大，资本必多，成功固佳，倘若失败了，或非我们所能忍受。所以还不如此时借小学教育站住脚根，到乡村去，用试验的法子去硬干。起初用老法子，再渐渐自学些科学方法进去。这样，经验亦许一样教我们长进。果然将来觉得有不能自学、有进高等专门学校的必要，而且那时自己实在的程度靠得住，团体的经济实力可以使求学的没有辍学恐慌，那时再说升学的话，比今天盲目的、虚荣的升学好。

(三)怎样多结识新同志

我们既盼望要用共同生活去谋与社会服务，那便将来各方面事业须得有能力的同志，越多越好。但为团体的名誉与安全起见，介绍新同志又不可不十分审慎。我们现在第一盼望旧有的同志，每个人要有善处群众、善理事务的修养。将来假令没有新同志加入，我们的事业一

样能圆满进行。但亦盼望同志在各方面努力，多注意纯洁向上的朋友，用各样方法求彼此了解。我们现在用的法子，大概如下所拟：

一、注意交朋友　这一层是极容易说的话，但可惜我们大概有个共同的惰性，不肯去做。所以精神每嫌过于对内发展了，而且便团体内亦嫌太对亲近些的朋友发展了。这种行为很有害于我们事业前途，须得极力矫正。团体内须从某人对某人相互了解、某数人对某数人相互了解，进到无论何人对无论何人相互了解。团体外我们须极力认定，须多牺牲点精力时光去找朋友、造朋友。我们原来介绍新社员，须得全体旧社员通过，这是力求慎重的原故。但我盼望新社员的加入，一方从新社员的人格上看，一方从介绍人的信用上看。介绍人切不可稍涉大意，但新社员既多不为旧社员所熟悉，那便有些时候不能凭自己的臆断，宁应看介绍人慎重的程度，去作赞成、反对的标准。不过新社员未加入时，宜注意多介绍与旧社员来往，既加入后，宜求每个人对他有个相互的了解，这是很重要的事。

二、多结修养或读书的小团体　这是我们一向做得最有成绩的事。我们仍当本着不拘名义、不拘办法的老法子进行。因为这是找朋友、造朋友的好法子。

三、刊印《互助》　我们若能将书社中每个同志的行为志趣，使每别个同志知道，使大家注意讨论团体的现状与将来，这于团体意识的形成极有关系。说大一点，若能将各友社每个同志的行为志趣，使别个社的别个同志知道，亦使大家注意讨论我们的现状与将来，这于我们大家了解，及介绍共同生活的新分子，亦极有益处。这所以我们以前有《我们的》那种印物，今天咬着牙齿定要把《互助》付印。

四、办小学　我们不仅想在乡村中办小学，亦想在城市中办小学。只是城市中得不着合当的校址，亦还缺少经费与教员。我们此时能力，还不宜多向消费的方面用。然而城市中想能办生利的教育，现在很不容易。所以大概乡村教育总须先办。

五、办理想的寄宿舍　从前拟了个这种寄宿舍的办法及说明，现在写在下面：

（1）这寄宿舍专住多少有点觉悟的同志，住居人数多少非所计较，但无志向上的人不收；收进来了的人，倘若发现他放荡昏惰，无可救治，还请他出去。

（2）寄宿的房屋太小，规定捐款。捐款少于全屋租金，共同财产担任；捐款多于全屋租金，归入共同财产中。

（3）寄宿舍的伙食最好输流自理，否则与公请的厨房直接交涉。

（4）寄宿舍因公共安宁及便于德业进行起见，由我们规定基本规约几条，余均由寄宿的人公同自决。

（5）当办书报室、游戏室。管理的人共同分派。但游戏室非规订时间不得人内。

（6）会客规订一定时间，且在一定的会客室。

（7）每星期设一二次临时演讲或研究班。

为甚么急于要办这件事呢？一则可以为觉悟些的同志预备一个完善的环境，使各人的优点越进步，弱点越改正，一天天比现在更健全。二则觉悟些的人住在一处，便于彼此切磋，以至于互相了解。我们盼望在这中间得些有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事业；即令不然，他们自己能因了解而结合，做他们所信为正当的事业，亦是一样。三则让他们都享受些正当生活的新空气，养成些自动互助的好习惯，他们要觉得共同生活是应该。

朋友不了解，是苦极了的事。而所以不了解，总不出两个原因：一因彼此不接近，一因

品性上各有弱点。若有这寄宿舍，彼此便接近了，而且品性上可以互相砥砺，以底于至善。如此，若能渐进于共同生活，脱离了金钱的离间，自然能彼此如一个人。社会上一定要有这样的朋友，才能够同力协作，分工易事各尽其妙。

许多少年得不着好宿所，许多少年品性学问上得不着好朋友、好指导人。如有这寄宿舍，自然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许多可感的同志，盼望加入我们共同生活的团体，然而我们因为有多少不了解之处，为慎重我们团体不敢轻于答应。有这寄宿舍，我们亦可以由比较不了解而进于了解了。

这寄宿舍仿佛同青年会一样，但有两点不同：一、没有宗教气味。自然我们不管他甚么孔、耶、佛、回，都不能象他们教徒那样迷信他。二、我们不是博施济众的性质。我们很小的力量，只好用在易于收效的地方，所以只好忍心把希望少些的朋友丢了他。

（四）共同生活的实现

我们若不能得一个共同生活，若不能得一个共产自给的共同生活，那便我们还怕不能胜过恶势力的压迫及引诱，将来不但无以服务社会，且为社会之蠹。要求共同生活的实现，第一须解决妻子生活问题。这件事我们在上半年便曾大大努力一番，可惜垂成而败。但我们究竟要认这是急要的事。

不过就现在想，从前的盼望在都市中实现共同生活，实在是错误。都市中生活程度既高，我们拘于都市中发展不易，所以团体内工作不多。同志在团体外既不敢必其有安定的职业，失了职业又不必能有团体事务可做，这样所以同志仍不能免生活的恐慌，因而不敢放手去实行共产的主义。就现在想，共同生活断然要在乡村中实现。那便是说，从办乡村教育起，渐求建筑房屋，从那里把同志的妻子搬在一处。究竟现在同志的妻子多是乡下人，他们在乡中多少亦很要做些工作，这样不如不要他沾染城市习气，仍使他在乡下住的好。我们的乡村事业只须有些成功，妇女工作不致无事可做。便男子若不愿或不能在城市中谋生活，亦不妨下乡去。养蚕、养蜂等事业需本甚少，容人很多，不比仅在城市中有失业的恐慌。

我们谈到共同生活，每每连带有些弟妹等问题须烦本身解决的。若共同生活预备在乡村中实现，这种问题亦易解决。因为果有弟妹，他的教育自有乡村小学担任，他的生活费用尽可团体担负。自然乡村的小学要利用儿童合当的力量，帮助成人做生利的事，如采桑、饲鸡之类。儿童亦不定是全然分利者。假令弟妹是城市中生长的，移到乡村去，环境改变，勤劳朴实的修养易于成功，还可望他人格长进。

这样我们便以乡村的共同生活为我们解决自己问题的重要一步。我们自然不能都在乡村中做隐士，不过那里是我们的家庭，是我们最重要的利源，是我们最后的退步。我们盼望这样便可以全然共产，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但在最近期间，每人规定非有别项收入可以自给的，必须为团体的工厂、商店、农场、学校或其他事业作每日六小时工作。将来盼望量团体力量，可减工作到每日四小时，但不想完全到自由工作的田地。因为自由工作原是极应该的，但我们不可只注意自己得个极乐的生活便满足了。我们宁多做点工，多挣点钱，为社会谋别样的福利。所以工作至少不应少过每日四小时。

衣食住完全由团体供给。但只可布衣，不过二十岁不着羊裘。食则会食（产妇、病人在外），每日三餐。居住则在公有的房屋中，只有各别寝室，读书、作工都规定公共地点。

产妇生产前后两月，可免其作工，调养费由团体供给。病人亦免作工，其期限由医士诊定，医药费亦团体供给。

婴儿生两月后，惟哺乳仍由其母，抚育的事举专人担任，免碍女子工作。但所举的人，以受过保姆教育的为宜。教育费用由团体议决担任。求学须参酌个性长短与团体需要两方决定。

同志或其子弟可以随时脱离共同生活，但不得挪动共同生活的财产。

团体的许多事务须时常会议。在共同生活未成立以前及初成立时，尤须加倍注意讨论一切兴利除弊方法。因为这种理想的生活于实际上究有如何价值，这种生活的改变于实际上究是否可以成功，或者仅会闹出一些笑话，不可不十分注意！

成年乃至幼年男女，苟有需教育的，大家自然有相互教导的责任，有时或需出薪金聘指导的人，亦只看团体担负能力去办。

要求共同生活进行的圆满，第一是要求每个同志对每个同志的充分了解，第二是要求团体内部生产机会的加多。这都靠首先到乡村去的人去经营了。

（五）教育方面的运动

除了办小学外，我们亦还有预定的几种教育运动。在我们从前只想在都市中努力的时候，曾拟有几种办法，现在从前次所做《未来之梦》中录下几节，因这种事现在仍须注意做。

一、自修会　论说办学校自然比办自修会好，然而投入已成的学校中，便被他各种旧势力抵销我们的力量，而且有许多不得不做的些不必做的事，实在糟蹋了许多我们有用的精神时光。若想自创学校，便只就一个中学说，一则没有钱办那粗具规模的房屋、仪器，再则没有那些良善有能力的教师，三则难于与那些官厅及老先生们讲应酬。所以我想若要做切实有效益的事，只有自修会好。

我现在把理想的自修会办法写在下面：

（1）这会以自学辅导为主，最重自力研究。收高等小学卒业程度以上团体内外的少年，亦以多少有些觉悟的（为）主。

（2）这会不立案，亦不给证书。

（3）这会不收费。

（4）国文、史地由指导人指导应参考的书章数、节数，及指导研究方法。英文最初由指导人略加教授，总以引人能自学为主。自然科学由学生实验研究，教师略加辅助。数学由学生自己练习，教师仅做审查辅助的人。总之，教师只能在必须辅助时加以辅助。

（5）参考书及实验仪器由共同生活量财力、量缓急备置，以渐求其完备。

这种事业的好处：一、可以使无力升学的得着他需要的学业；二、可以使他们得着自修的益处同好习惯；三、易于成功，无办事的困难；四、可以帮同志的人读书，亦可以帮来读书的人变成同志。

但是我们这亦不是博施济众的性质，那些仅为想占这便宜的人而想来读书的，我们不能收纳。所以我们这不是甚么学校，是有志青年的互助团体。

关于购置图书仪器，我们不能不盼望靠共同财产。我们亦已经有许多共有的书报，再能逐渐添置，如此的做下去，总有一天大备的日子

指导人最难找，我盼望在高等专门卒业或肄业的同志，看清、选定他将来的事业，加力预备。亦或可于团体外用薪金或不用薪金找着朋友，每星期牺牲二三小时，在几方面给些帮助。我很觉得，才办的时候一定不能教自己满意，不过做得一点便做一点，做不到的地方宁可放着，不须敷衍。有这事业了，我们的些同志亦好有个预备的目标。我总信这是可以有一天进到完备地步的，比一切学校都有希望。

二、工读介绍社　这是一件博施济众的事，亦须靠外力赞助才能成功，所以成功是希望不多的事。不过倘若能够成功，我们总应该于其中加些努力。现在把理想的工读介绍社写在下面：

（1）以代学生乃至一般青年找工作，略补他们求学费用为宗旨。

（2）工作每日不过四小时，收入只求可供他求学费用全部或一部，责任越限于局部越好。

（3）只任介绍，用黜不问，亦不受酬。

（4）工商各界凡需用人为学生所能任的，请其将事务、薪金通知本社，以便介绍。

（5）求业学生亦请其将能力、志愿通知本社，以便代觅工作。

（6）只须一二人招呼来往函件，无须基金。

关于工读的事，我们不能不说工读互助团办法最好。然而集合不了解而生活能力很小的人，组织这样团体，实在是很少成功希望的事。这所拟的办法，只是帮助贫生用劳力换与学费之一法，没有甚么共同生活意味，亦不管他终身工读与否。不过有志以工资读书的穷学生、穷青年，总是值得帮助的人，而且这亦仍然有养成勤劳、俭朴风气，沟通学业、职业的功效，于一般青年学业乃至生活前途有益，间接亦便于他们的品格同志气有益。因为品格、志气的堕落，每以学业不长进、生活太困难为最大的原因。

迟早这件事总是可做的事，姑且说在此地罢。

三、小学教育运动　我们同志的能力虽然薄弱，然而创办或在各处改造乡村小学，这还是做得到的事。不过能办小学的，找不着合式的教师；能充教师的，养不成很充分的能力，乃至总不能成就一件事。

而且乡村小学有三种事情，教热心的同志不愿去，一则学生十余人，每年修金百余串文，只能养一个教师。所以做教师的一天怕到黑，事做不完，便身体亦怕受伤害。再则因此没有时间读书，而且到穷乡僻壤，没有朋友可以在品性或学业上彼此互相切磋。三则那种修金养家都怕不够，自然没有多余为自己买书求学的用，所以自己于将来亦未免绝望。

我们若照前面所说，我们有共同生活实现的希望，自然没有自身或妻子生活的恐慌。我们的同志中，尽多就能力、境况说，宜于暂时做小学教师的。所以我想，最妙莫如采些教会派遣牧师的方法，做一种有系统的教育运动。那办法如下：

（1）团体内若能对于有志小学教育的人设一种研究班，于短时间完成他教育家品性同技能，亦是一法。若长沙一师能为我们常川这样供给个研究小学教育的第二部，那便更可望成效圆满些。

（2）团体内外的同志创办小学，须聘教师的，每班指名一人。由这人再找一个最了

解的人同去。如愿一人独去亦可。

（3）无论一人去或二人同去，学校仍只供给伙食，照原定薪金付给。二人不分正副教员。此款除在共同生活未实现以前，或须以一部分供给同志妻室必要的用费外，余归共同财产。

（4）此项薪金至少不得过每年一百串文。任期预先约定，至少一年。任期满后，须得两方同意才可连任。任期未满即令有故，必仍须由本团体更换派送。但原指名的人自动辞职，不在此例。

（5）若能于教授外营各种生产事业，本利都归共同财产担负享受。

（6）教授中如有为教授进行、或学生或地方的利益应做的事，由共同财产量力担任。

这拟定的办法，有几层可注意之点：第一、教师由聘的人指名一人，由这人另找一个最了解的人，都是取大家相信的意思。若指名的人得不着心性相合的人，或为自身妻室生活问题，须得一个人独去，亦无不可。不过两人同去，于照顾儿童、研究学问、企谋副业有许多便利。非不得已，总以两人同去为好。同志中相互了解程度有深浅不同，这是事实，不必隐讳，但我们宁须趁此时极力求相互了解的增进才好。至于共同生活未完全实现以前，各人有家庭系累亦是无法之事，但只要有余钱，总宜多归些于共同财产，这样才可以促进共同生活的实现。第二、任期有一定年限，期满须两方同意才可连任，这是为两方的便利。至于期限以内不得更换，即更换亦必仍由本团体派送继任的人，这是因有预计教育乃至地方事业乃至所企谋副业成功的便利。自然这种办法有些似乎把持，但在这聘教师的人自己先能信托本团体；而且教师果不称职，可由本团体察知，亦可以由聘请的人告知本团体，由本团体撤回。总之，我们只要于社会有益，决不让不称职的教师贻误人家。而且指名的教师若自动的辞职，我们为聘请的人方面的便利，便牺牲企谋各种活动的成本亦所不惜，决不愿稍为强勉他怎样干。第三、为教授进行、为学生、为地方有许多要做的事，由团体供给金钱，这样免得事业每受学校经费限制。但这自然一须确系学校无力设备，二须团体能力所做得到，三凡团体金钱所购置的为团体公有。

我们从前想借这种小学教育运动帮助同志升学，究竟现在想，若团体没有发展，升学总非易事。所以现在的注意移到帮助团体发展上去。所以规定薪金余钱捐入公共财产，而且随处注意副业的获利。果然团体发展了，升学的费用自然惟团体的能力与利益是视，不须设别的甚么规定。

（六）与资本家决斗

这以上所说的话，自然是太多注意了我们的共同生活，但我们的共同生活原是社会服务性质的，亦原是愿意与社会公共享受的。眼前我们不愿一点扎空架子，利用不能放心的分子，凭借一种不良的势力，所以我说的话都卑之无甚高论。

我们的意思，要改造这个世界，一须做一个共同生活的模型，使世人知道合理、有幸福的生活是可能的事。一须我们大家协力，不但解决自己及家庭生活问题，而且要有力量与资本家决斗。怎样能与资本家决斗呢？固然我们可以组织工会，鼓吹罢工，用阶级战争为推倒资本家的方法；但我想要为世界求一个最后的解决，仅仅靠鼓动争存的单纯天性总还不够。

最好莫如利用经济学的原理，建设个为社会服务的大资本，一方用实力压服资本家，一方用互助共存的道理，启示一般阶级；而且靠这种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①我们信个人主义的新村是错了的，个人主义的工会罢工亦非根本良法。若用一手一足之劳，想逆经济潮流与资本家争胜，这是工读互助团的覆辙，亦决不是法子。

我们盼望组织合理限度劳动的工厂。组织这等工厂既不纯为求利，那便作工时间、工人待遇极力要从理想的方面办。依我们想，这样的工厂，工人男女都作工六时，不给薪资，衣、食、住由团体供给，儿童公育，老年公养，总之纯然与我们共同生活内部一样。其中没有司事、股东的侵蚀，余利都留作工人教育、工厂卫生及他项发展之用。这样似乎资本家必不能势力相敌。我们便靠这长驱直入的打破资本阶级。

最近四五年间，我们的同志大概有能经营工厂的。但我们所能供给的资本，或者只可以四五百元计。那样便只可从小工业做起。但我们信，只要我们品格不变，学力加增，我们理想的工厂定然不久实现。那个时候，有个进行共产主义的资本团体，我想比无论何种运动功效都大。

最后我们有几件事要注意：

一、我们虽然要建设资本团体，但不是盼望我们自己做资本家。我们无论是办学校、办工厂，都是要变那些学生或工人做我们共同生活的分子。我们永不应比人家享受高些的生活。我们只是使自己与自己可以效力的人，大家有个最低度的合理生活，把余剩的金钱同力量用得去改变世界到我们一样的地步。

二、我们虽然是盼望有个好生活，但我们为的只是有了好生活好没有一点牵挂，把金钱同力量尽量散布到社会上。我们是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是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局部的改造乃全部改造的第一步，所以我们总不能自安于局部。我们的力量总要征服环境，我们的目的是在造一个圆满快乐的黄金世界。

三、我们分子的出入，应该是绝对自由。因为这原是企求自由的一个结合，若加入了这结合，却处处受些自己不愿受的限制，未免失了结合初意。我们只应该大家努力，教这种结合实在可以满一般向上同志的意，不致有不愿加入的事。若当真不愿加入，亦用不着甚么勉强。

四、我们这不是博施济众的事。虽然我们盼望团体一天天扩大，有力分子一天天加多，然而我们加入分子，先须经审慎考察，总须多少实在有些觉悟。

朋友们！以为我这些话怎么样呢？我们的团体是不是该走这样的路？你预备在这中间担任那些事情呢？精思、慎择、立志、力行。这是我们帮助自己、帮助朋友、帮助社会人类的一件大事呢。敬祝我们大家大努力！大成功！

（《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

（选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

① 这种避免用革命手段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希望通过“共同生活的扩张”和在乡村发展教育、实业，从而由经济方面压服资产阶级，使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的想法，当时在利群书社大多数社员中是普遍存在的。后来的事实表明，其中不少人都抛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恽代英等以后的革命活动，就是这一转变的有力证明。——编者

文化运动中的新村谭

邰 光 典

(一)

本志《创刊号》，南星君在他那篇《新人的环境创造》文里说："做新人应该从创造新环境做起，……组织新村是创造新环境的试验石。"积石君在他那篇《新人最应该做的事》文里说，他对于组织"新村"还有详细的计划书。这全是最好的消息。我对于组织新村，本来有一肚子要说的话，但没头没脑，很难有统系的讲出，所以只得杂杂拉拉的写来请大家指教。

"新村！""新村！"这种声浪近来叫喊的很高。但是究竟"新村"是什么？谈到这个问题，周作人先生的《日本的新村》有几句很痛快的话，可以写出来给大家看：

"……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我从前在我那篇《组织新村商榷书》里，也有几句话论到这"什么是新村"问题，现在一同写出，请大家参观：

"……我们'新村'的理想，既不是死板的模型，也不是铸定的偶像；那我们理想中的'新村'，一定是由精神和物质改造而成的，灵肉一致的。所以新村的目的，乃积极的，而非消极的。须知道'新村'绝非桃花源，乃另立一新社会之模型，以便世人的仿制；并且是和旧社会宣战的大本营，千万莫要误会是'避世庐'、'隐士窝'。"

还有几句话说道：

"新村是一种新组织，是物心两面改造的，是皮肉一致、表里相应的，是要打破现在智识阶级的，是要加入劳动团体的，是以现在的农村为基础建立的小组织，是以将来的世界为扩充小组织的大联合。"

统观以上的话，我们也就可以明白"新村"之为"新村"，绝不是胡适先生所说的"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二)

我们要组织"新村"，是由于：

第一、不满意于现在旧社会的旧生活，想着解放改造他。

第二、本我们彻底觉悟的精神，作一种革新的运动；按科学的研究，实现我们理想的社会——新村。

总而言之，就是要"改造旧社会的旧生活，另创一种新社会的新生活"。"另创一种新

社会的新生活”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人说许多话去阐发他，也用不着我再来细谈。所以，我们只须讨论讨论“这旧社会的旧生活”何以应该改造呢？

答这个问题，我们有两种理由：

（一）旧社会是适于古代野蛮的生活，而不适于现在文明的生活。旧社会是因袭古代的社会。古代的社会是为古人而设的。但是现在智识方面和物质方面全大进步，人类生活上的活动大与从前不同，现在人类的需要已由简单而进于复杂，这种供应古代简单生活的社会，当然不适应于现在了。

（二）旧社会是注重少数人的利益，而不顾多数人的利益。旧社会既是因袭古代的社会，然而古代的社会是由古代人的思想所凝成，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古代人的思想，充塞的不外“专制”和“贵族”，那由古代遗传现在的旧社会自然要含着“专制”和“贵族”的臭味，注意少数人的利益，不惜把多数人的利益供他的牺牲。现在他没有保存的价值，我们不消说了。

旧社会，我们用活动的眼光来观察他，实在早和石斧铜刀一块儿在历史博物馆里楚囚相对；至我们有“人”味的人，自不能不顺着“人”的生活，创一种“人”的社会。

所以稍稍觉悟一点“强权”和“私产”是使我们物质上衣食住不自由、精神上知情意被束缚、晓得“旧社会里无生路”的人，没有不赞同组织“新村”的。

但是一般人虽是赞同我们“新村”的组织，然而一般人对于“新村”却总有一种误会和一种怀疑，所以我们现在特意将他说明一下子：

（一）一般人多误会“新村”是“模范村”。近来有许多人去做那“理想村”的计划，也有要实行他的计划去建设模范村的，但是他们的注意点多从外表文明上着想。什么学校、公园、图书馆、工厂、住房、街道……，都要设置的整齐完备；至于对那实际上的生活问题，反没有什么主张。因为他们对现在社会的制度不知道有不平等、不合理的地方，所以他们理想中的模范村，只要比现在社会少一腐败恶浊的空气，那便心满意足了。他名为“模范”，实在称得起么？须知道我们要组织的“新村”，却断断不是所谓“模范村”。我们“新村”的理想，是要人努力做一个模范的“人”；他们“模范村”的理想，是要人努力做一个模范的“国民”。这就是根本不同的一个大异点。

（二）一般人对于新村的互助生活，多怀疑以为是不可能的事。说：“现在人类道德观念还很薄弱，利己心重，要推到这样的利他，于事实上恐怕是做不到。”哪知这种怀疑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现在的人所以谋利己，图一己的幸福而不顾他人，都是现在不良的社会制度造出来的。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说过：“现在社会少数的人，在多数人的不幸上筑起幸福来。”这样情形，自然会有不道德、“利己损人”的事发生；并不是人类本来有这种恶性根。即使现在人类确带有这种恶性根，要亦不过一时的蒙蔽罢了。所以我们应当相信人类，信托人类的理性。“新村”实现，社会制度改良，那“损人利己”的恶性根、做的那些不道德的事，自然不会发生。“人人希望这样世界，这样世界便可实现。”这句话至足证明“新村”的“互助生活”定能成立，还不难立刻实现。

（三）

“现在中国青年最丰富、最优美、最有幸福而最有价值的生活，就是新村生活。新村的

生活是谋新社会的建设、新世界的创造，是在自然界中活泼新鲜的创造生活。……”这话极有道理。我们就按着日本的新村说罢，他村的土地并不甚广，只有四十多亩。现在有二十二个人在那里居住，共筑起了三所房子。村里的情形与平常的村子相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只是有一种“和平”、“幸福”的空气，让人在里边觉得非常快活，这为别处所无的。村里“劳动者”物质的困苦及“智识阶级”精神的不安定都已免去，所以新村的生活，可以说一方面是极自由、极辛苦，也可以说一方面是极严格、极舒服。村里的人不要忧虑衣食住与医药，完全能享受生存权和得生命的保障。据周作人先生说：“他们目下只是耕田，但关于他种设备也不怠慢。图书馆、美术馆、音乐会、医院、学校、工场、……都要次第著手，量力设备。”（请参看《新潮》二卷一号，周作人先生的《游日本新村记》）哈！新村的生活实在是“美备绝伦”！宗教家不消要说什么“佛国”、“净土”、“极乐世界”，绝不知这才是合理的正当的“人世间”！

中国近来有少数觉悟的人也发生几种运动，颇和“新村”相象，这原是很可喜的事，但是实际还与“新村”有几个异点，我们要约略说明他：

（一）南京的“启新农工场有限公司”该公司声明是仿美国兰路村。兰路村的组织，《劳働》杂志第一期曾登载，诸君不妨参看。我们就按该公司简章说，什么“股本”、“工值”，什么“每人认股二百分（合一千元），然后有权居住与工作”，这便完全与“新村”的精神有些抵触。“新村”里没有“股本”，更没有“工值”。大家量力做事，各尽所能。所以极苦的劳动——如矿工等——有人情愿担任。这是他为人类而劳动——自愿劳动，是极合人道、极有理由的；我们也不过只是精神上“感谢”、“尊敬”，并没有物质的“报酬”。（即使没人担任这类苦工，慢慢儿自有公平法则解决这问题，总以不损及人的健康为限，此时正不必过虑。）又如“居住”须相当的“资本”，这也不甚妥洽。我们做“人”的资本，只是真实的精神和充实的体力，金钱不能算是第一要件。

（二）北京的“平民组织”这问题的讨论，在北京、上海的报纸上发表过许多，但还未现事实。我们按他们发表的那种计划看，是以改良平民生活为目的。组织人立于指导地位，大致与欧洲十九世纪中间俄国的“往民间去”那种运动相似。然而这样办法，与“新村”的注意先自己实行人的生活，逐渐推广，造成平等互助社会，便有些不同了。

（三）龙华的“新村”这个组织简直就是“模范村”。请看他的简章上说的那些机关，什么行政、司法、警察……，这全是“新村”里所不应当有的。“新村”与“模范村”的区别已见前，兹不重述。

（四）

吴稚晖先生曾论过“物理世界与不可思议”，说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话，又列出一个方式来：

不可思议 物理世界 议思可不

照他那样说法，世界的原始是“不可思议”，世界的极终也是“不可思议”，中间却是一个长期而且庞大的“物理世界”。我们生存其中，只要说物理世界的话，干物理世界的事就行了。所以我们人生观念、做人方针，稍稍有一点定着的，要从本身计算起来，最切近的莫如生活问题。

我们试看一看现在的旧社会，真如同掉在九幽十八重的地狱里，没有一处不是黑暗，在在使人厌烦、悲观、败兴，简直不成人类的社会。所以旧社会里的旧生活，实不外（一）禽兽的生活、（二）强盗的生活、（三）牛马的生活，绝没有“人”的生活。他既然够不上“人”的生活，所以他——

肉体生活（一）受政治的支配；（二）受法律的制裁；（三）受经济的困迫。

精神生活（一）感情不能适当的表现；（二）思想不能充分的自由；（三）本能不能如量的发展，或发展而用于不正当的方面去；（四）意志的动机恒为境遇所迁移或消灭。

可是我们既然晓得旧社会的败象，当然要不安于那种现象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脱离现在的生活，另创一种新社会的新生活——新村的生活。我们主张的新生活——人的生活——是要：

（一）要先尽了自己的所能，然后可取自己的所需。（正当劳动。）

（二）要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人格。（不屈于人，不役于人。）

（三）要精神肉体无束缚。（打破我和人类间的一切阶级，完全自由。）

（四）要只受理性的制裁，不受人为的约束。（刬除一切伪道德和习惯的迷信。）

现在的人无这四条件的生活——人的生活，除了农夫之外，无论什么职业都不可能。而且受那地主之掠夺、支配于旧制度下的农夫也不可能。所以这种生活——人的生活——只有经世界大革命之后，我们的后人才人人得享的。然而我们在今日欲得身受，只有辟“新村”的唯一方法！

“新村”的要求既然是很利，然而我们要适合那四条件的生活——人的生活，何以不在现在的社会里，必要另组织“新村”呢？因为现在的社会是私产制度，是竞争主义；欲求衣食住，非满身罪恶不能适可得到。若是丰足，或且逾于寻常，非是强盗、鼠窃、娼妓不能得到的。“新村”是改良生活环境的试验场，是实验“人的生活”新社会的胎子，是公产制度，是互助主义。只要正当劳动便可得正当需要的衣食住。没有丝毫罪恶。很快活！极自然！我们所以亟要在现在旧社会里实验我们的“新村”，就在于此。

组织“新村”，改良生活的环境，起初虽不免由少数觉悟者、厄难者因一时的机遇，为“减轻”、“逃免”现时社会的束缚，或是为完全“保存”、“发展”个性的本能起见，不得已而出此；但是既行组织“新村”之后，就要把那消费的性质转变成积极的作用。我们的希望、的努力，须全集中于社会的根本改造。换句话说，就是要看“新村”是根本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个意思我从前在第四号《新生命》我那篇《“理想的将来新村”之实现》里说过：

> “组织‘新村’是以根本改造旧社会为目的，并不是以‘新村’为目的来组织‘新村’。我们心目中‘新村’组织的完成，是以创造‘新社会’为归宿，并不是以‘新村’为归宿。所以我们‘新村’的计划和希望是积极的，绝不是消极的。万生君说过：‘新村就是共产村。吾人是以新村来贯彻吾人平素的主张。这新村就是改革旧社会的试验场，也就是创造新社会的基石。’……”

周作人先生说：“新村的运动便在提倡、实行这‘人’的生活，顺了必然的潮流，建立新社会的基础，以免将来的革命，省去一回无用的破坏损失。”这几句话，我们要从事组织“新村”的人应当再三玩读、再三考虑。救自己、救人群、破坏社会、改造社会，这一切工夫

都包含在里面了。

（五）

“组织新村”这话，空说无益，必要实在去运动。所以我们“新村”的第一步，要做两种文化运动：

一个是“精神改造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神髓，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我们“新村”里的人，都要把人的本来面目拿出来，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营私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

一种是“物质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动神圣”的组织，改造现在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生活从这种制度中解放出来。我们“新村”里人，人人都须工作；工作的人才有饭吃。须知“劳动神圣”的话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智识阶级”，在我们“新村”里，应当与那些资本家受同样的排斥。简言之，就是要：

（一）各人应各尽劳动的义务，无代价取得康健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

（二）一切都是一样的人，尽了对于人的义务，却又要发展自己的个性。

“新村！”“组织新村！”从前的学者早已引了端绪，现在时机成熟。已经有人运动成立。我们请将日本日向新村的会则写来给大家看看：

一、赞成本会的精神，自负责任而入会者，为会员。

二、会员有两种，凡亲到村中协力生活于本会精神下的，为第一种会员；真心赞成本会的精神，而因事实不能到村中生活的，为第二种会员。

三、第一种会员的权利、义务与自由，一切同等。

四、第一种会员入村时，应当将自己所有的贳产无条件的交付村里。没有贳产的不交亦可。

五、入村以后即负全部的责任。

六、第一种会员的衣食住的顾虑，由第一种全体会员担任、公同努力，务期不使一人不得到健全的衣食住。

七、会员言行的责任各自担负，但是赞成他言行的人亦得分任其责。

八、对于社会的精神有违背或冷淡的，自然不能成为会员。

九、第一种会员有疾病时，公同看护，竭力调治，其时或得筹集临时费。

十、义务劳动的时期和年限虽有限制，但详细情形须由实际试验在二年至五年中定之。现在暂定大家在相同的时限内共同工作。

十一、志愿为第一种会员者，先将意思告知会员的一人，在依了村的情形许可入村以前，暂时等候。这其间，应用心多与第二种会员相会。会见的第二种会员，应当将关于这人的感想，正直报告本会。

十二、第二种会员应用心为会尽力，利用机会谋划村的利益。每月应捐金合五十钱以上，以忏除自己生活不正当的罪，但以不勉强为限，又或五十钱以下亦可。

其他关于村的详情，可至本部或各支部询问。

社会进化的原理，跑不脱一个“新陈代谢”的作用。新的不来，旧的不去。我们眼见得

现在社会生活的不良，现在的组织是有缺憾，我们想把不良的生活、不完备的组织打破，应得先建设一个新的模型，为这旧的替代。况且因循敷衍是人类一个大毛病，我们想叫他们舍弃他们原有不良的生活、不完备的组织，来归我们理想的新组织，非将理想的计划实现出来，令他们见了相形见绌、自惭形秽，明白旧规模的弊点不可。

组织“新村”，就是拿新的代替旧的，把新组织来反衬出旧组织的弊点来，令在旧组织里生活的人舍弃了不良生活，和我们同享新生活的唯一办法。

觉非君说过：“我们中国人有种最坏的毛病，就是‘空想’。对于这件事有点意思，对于那件事有个主张，但是只能放在口上谈谈、笔上写写，要请他把那种理想拿到社会去试验试验，那他就要敬谢不敏了。”

然而我们要研究这“空想”何由造成，不外两种原因：（一）对于自己的理想没有充分的信仰，不敢冒险；（二）人性恶劳喜逸，说话做文是轻而易举的，实地试验起来那就要困难，人也就不免见难而退了。

要治这“空想”不“实作”的毛病，（一）要有冒险尝试的精神；（二）要有不怕烦难困苦的精神。社会的揶揄、反对者的攻击是要忍受的；“错”、“败”是不能免的；要战胜这一切障碍，才显的出我们的精神来！

“新村！”组织“新村”实在是谈何容易！不是望空得到的。今天活一天，明天活一天，一天一天的过去，不过百年如一日。所以我们理想中的“新村”，要用试验的态度得来；研究讨论须要耐心啊！……

一九八〇，五，二二于天津北、杨村

（《新人》1卷4期《文化运动批评号》上，1920年8月18日）

（选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三〕）

新村运动的我见

郭绍虞

我是很赞成新村之人之一，在《新潮》二卷一号里，亦曾介绍过武者小路的《新村的说明》。因为新村的组织，生活极合人道，而他的改造主义又极和平，所以认定、相信这一种组织亦是进自由途径之一。这正和周作人先生一样，所以赞成的缘故，由于性之相近故。但是我虽喜欢他们改造主张的和平，同时又不能满意于他们的消极的进行。所谓消极的进行是什么？我可以引周作人先生的话来说明：

> "新村的人不满足于现今的社会组织，想从根本上改革他，终极的目的与别派的主张虽是差不多，但在方法有点不同：第一、他们不赞成暴力，希望平和的造成新秩序来；第二、他们相信人类，信托人间的理性，等他醒觉，回到正路上来。譬如一所破屋，大家商量改造，有的主张顺从了几个老辈的意思，略略粉饰便好；有的主张违反了老辈的意思，硬将屋拆去了，再建造起来。新村的人主张先建一间新屋给他们看，将来住在破屋里的人见了新屋的好处，自然都会明白，自然照样改造了。"（《新村的理想与实际》）

新村的人虽也著作书籍、刊行杂志，以发表他们的思想，鼓吹新村事业的进行，但是他们的进行，只此为止；他们这一种组织的小社会，同外边人类的全社会所生的关系，亦只此为止——以后如何虽不知道，现在却是这样。因为他们是站在社会外面来提醒现社会的——是住在新屋子里，使破屋子里的人来效法的。他们以信托现社会的必能觉醒，必能照他们这般同样的做，因此他们于改造社会的进行，只处于旁观者的指导地位，而不是投入社会中间——新村固亦在社会中间，比较的隔离一些——图积极的改革，行热烈的鼓吹，所以我称他为消极的进行。新村的事业，在实现他们的理想，以规定将来的社会，自然并不是与社会丝毫不生关系，不能说是完全的隐遁生活；但是当他们在这种组织内生活的时候，比较地总觉得和外面的全社会关系较浅，因此照胡适之先生的批评，谓为跳出现社会的生活，也并不是过甚之谈。他们虽并没有意志薄弱之心理要隔绝现社会，但他们确是可以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社会之力——指全社会，非指村内的小社会——何有于我哉"。因为住在新屋子的人，确是可以不借破屋子的帮助。他们这种圆满的人的生活，自然有谁不生羡慕，不欲效法！但是单求人家的效法，单是这种进行，我觉得还有几项缺点，即是：一、只在知识阶级上用功夫；二、只见到人性的善的倾向。

上文讲过，新村运动只在书报的传播。书报的传播，我以为只是对于知识阶级的一种运动，而于大多数的贫民——没有机会接触这些书报的人，便无什关系；即有关系，亦是间接的关系，感化当然不深，效力当然不大。我近来有一个感想，觉得现在的文化运动，只是对于知识阶级的运动，不是对于平民的运动。不谋平民的觉悟，不增进平民的地位，这种运动

总是筑在浅薄的基础上面，决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因此，我对于新村事业既有热烈的希望，就更愿中国提倡或实行新村组织的人，兼顾到平民方面，行努力的鼓吹。一方面使新村运动的基础格外巩固，一方面使新村的人对于全社会更有热烈的同情，发生更密切的关系；而不以自己享受圆满的生活为满足，更不以人家的效法为进行。因为照平民的知识，是不曾受过教育的劣等知识，还够不到引起他情感的能力；所以不使他们深切了解，而单希望他们的效法改造，是很不容易的。要是不然，日向村①旁的农人何以不见有什么影响呢？

一辈平民，不单是知识引不起他的情感，并是被经济——生活——压迫他的理性。他们本来晶莹的理性，因被压迫而汩没，所以他们的行为易邻于罪恶。这些罪恶——贫民行为的结果——我人固然不应得责备他，应得原谅他，因为这是社会的罪恶故；但若单是原谅，不更谋补救、改善，以养成他们的美德，那么照优生学的说法，因于遗传的关系，本是后天的恶德会变成先天的恶德；并且贫民的生殖率又是很大，要是不使他们改善——也有同样的善的理性，不特不会效法、自行改造，并且还足阻止新村的进行咧！

因于上述两个理由，而要谋匡救的方法，所以我以为新村运动应得兼采胡适之先生“贫民区域居留地”（Social Settlement）的主张。胡先生所说，我以为并不是反对新村运动，竟可作为新村运动的基础——不单限于新村运动，简直是凡百运动的基础。以中国贫民之多，贫民知识之陋，非于基础上努力栽培，使贫民受过一番训练，无论什么运动、什么主义，总是不能领受的；即使勉强领受，而于这种事业并未深切了解，亦很难发生效力的。因此我抱无限的希望，希望今后组织新村的人——现在中国虽尚无此种组织，将来总须实现——最好选择贫民区域邻近的所在，不必一定在乡间，亦不必一定是农作；这样可使工作余暇再从事于贫民知识的灌输、贫民生活的改善，而于无形之中，得以传播新村的真精神，以与书报的传播互相并行。

以上指出新村消极的进行的两个缺点，可作我的新村运动兼采“贫民区域居留地”主张的消极的理由，现在再述我的积极的理由：

一、从新村方面讲——这个可以分两层说：

（一）对于社会的丑恶之同情；

（二）贫民不为被动的机械。

组织新村的人，每喜欢选择山明水秀的地方；即是游新村的人，亦每喜欢称赞村中自然美的风景。固然，我人对于美的对象容易起一种美感，因这爱美的心理，自然于新村的位置要拣佳山水的所在，这也是极平常的事；但是我依“春秋责备贤者”的说法，更有进一步的见解，以为我人对于美固然要能领受，同时对于丑亦应引起同情，并不起厌弃、退缩、逃避的心理，这才算有浓挚的感情。孟真来信说：“极枯薄的地方也有美的境界。……我觉得中国文人只在良辰美景上用功夫，是由于不知道不良辰的良、不美境的美，还是他感情浅薄处。”这话真指出旧时隐遁生活者的病根。现在的新村组织，虽未是隐遁生活，但他生息在这爱和美结晶的世界中间，无论如何，于社会的痛苦总是隔绝一些，即对于丑恶之同情总是减少一些。我来北京以后，觉得北方的贫民比南方更苦，所以对于贫民的同情亦更深，而希望改造贫民生活之念亦更切，恨不使许多贫民的生活，都能如新村里的生活同样圆满、同样幸福，

① 日向位于日本九州，是日本新村主义的倡导者武者小路实笃试验他的新村计划的地方。1918年他开始在这里建立新村。——编者

并且早日谋他们的改造。新村的进行本是要推到普通一切的人类，主张新村的人亦当然对于贫民表同情，所以我希望于此多加注意，作个巩固的基础，一方面营圆满的生活，一方面仍积极进行谋社会的改革，以贯彻他们的主张。

至于第二层，在中国更有这种需要。中国的贫民，其性质极为驯良，有时受经济的压迫，固难免不道德的举动，但因知识低微，极容易受人家利用。现在要办模范村的人很多，模范村的组织，不即是新村的组织，而组织模范村的人，却极喜剽窃新村的名义。以我一己凭空的揣测，难免将来不有集资雇人开垦而自名为新村的。这并不是我过虑之谈，我已见过几个头脑不清楚的人，要硬扯模范村作新村，主张牺牲一部分人而筑幸福于其上的。所以非急于增进贫民的知识，使许多贫民了解新村的精神，便难免不为人家所利用，成一被动的机械。在过渡时代，组织新村必须有资本，而贫民万无此力量，若要他们加入，自然非使他深切了解不可；若要他们不受人利用，为新村前途的障碍，亦更非使他深切了解不可。近来真觉凡百运动不可不以平民运动为基础。

二、从贫民区域居留地方面讲——这亦可分两层说：

（一）免不卫生的影响；

（二）免经济的恐慌。

贫民区域居留地的主张，虽是一种社会改良事业，并不是社会改造事业，但我以为这一种差不多是基本训练，很足以助改造事业的进行，非和其他社会改良策一样，只以温情主义为归宿的。我在《晨报·五四增刊》上亦竭力提倡这种事业——Social Settlement，在欧美以大学毕业生行之者为多，故亦称University Settlement，我那天的题目，即译为“大学移殖事业”，今改从胡译。但是后来到这些贫民窟穴中去走走，觉得他们生活的简单、种种不卫生的情形，真是出人意外。天气热一些时，竟臭得不能通行，又如何可以居留到这些所在！只有新村组织在这贫民区域的邻近，才可以免此缺憾，才可以不受他们不卫生的影响，而同时增进他们的生活，以使他们亦渐重于卫生。我可以断定——照我便是这样，以贫民现在的生活，恐怕没有人肯居留到这些所在去的。但是贫民岂非同样的人类，一方面受同情心的压迫，又不能弃置不顾，不谋援助他们的生活；所以我希望新村事业兼顾到这些事业，这才是两全其美。只要我人不以社会改良事业为归宿，那么以这些事业为基础，我认为极正当的。

贫民生活居留地的事业，又必须先自己生活的安全。要待人家临时捐助，这是未必可靠。若因经济的压迫，“为德不卒”，岂不是徒费经营！所以使新村中人兼营此事，即可免此弊病。新村运动本是要谋普遍到人类，那么于生活余裕之时，何苦不为此呢！

我于周、胡两先生的意见，并不是要东牵西扯地瞎附会、滥调和。因为这两种主张在我脑中已盘旋了好久，总是不能有所取舍，几经思考的结果，还不过成为这一篇假定的解决；因此不管对与不对，很愿贡献出来，请读者指教批评！

最后，我以热烈的希望，希望新村运动的成熟，希望中国的新村运动早离开空论时代而进到实行时代——实行的研究和提倡时代。写至此，我就译武者小路一首诗，作我的结论：

“我们的火虽小，
我们的薪虽少，

我们不忧不恼。
真心求神，
何处薪来到？
愿供给我们粮草，
使这星星的火永久不消。
神啊！想你也应赞好。”

（《批评》第4期《新村号》，1920年12月8日）
（选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三〕）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缘起及组织大纲（节录）

朱务善

本团由本校同学廖书仓、邓康、罗家伦、康白情诸君发起，成立于民国八年一月，以增进平民智识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达到其目的之方法。初分定期讲演与不定期讲演两种，前者每逢星期日借京内各处讲演所举行之，后者遇有特别事件发生或放假，经本团团员认为必要讲演时举行之。创办不久，颇著成效。轰动一时之"五四"、"六三"运动，本团团员曾尽力奔走呼号，竭力宣传，颇有以促醒社会之自觉而引起同情。至于"乡村讲演"尤为有力，盖此种讲演，能于最短时间内使大多数乡民得受少许常识，并能助长其兴趣。如本年春假曾赴北通州、长辛店及各大村落讲演，其居民皆前拥后随，得以听讲以为快。由此可以知本团与社会之关系的重要矣。至去年寒假，本团开大会时，复议决要求学校仿北京高师办法，建设本团讲演所一处，不日即由本校总务会议许可。但学校因一时经费支绌，允暂为本团细（租）屋一间，即现在马神庙东口之讲演所也。不过高师由学校聘请职员主持，本团讲演所则——事物由本团干事主持，此与高师异点也。讲演所既成，本团每逢星期日在各讲演所之定期讲演，改为在本团所设讲演所之每晚讲演矣。讲演所内并附设阅览处，其中书报，或为他人赠送，或由本团购置。惟草创伊始，陈列无多，尚望本校同学诸君及各教职员热心捐助，力予维持之。以上本团成立以来经历之大略也。兹将本团现行简章附录于后：（略）

十，九，二十七日　灯下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9月29日）

（选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劳动补习学校*（节录）

下乡的学生

1920年4月8日，正是各大学放春假的时候，太阳快要西斜了，从北京开来的一列火车到达了长辛店车站。史文彬、陶善琮等原来长辛店救国十人团的几个积极分子都在站台上翘着头望着。火车"嘘……"的一声吐出最后一口粗气，慢慢停稳。他们看见了从车门口露出的一个青年人的脸，连忙迎上去，抢着去接他手里的旗子。被迎接的人们陆续都下来了。一共十来个人。为首的一个，个儿高高的，脸庞清瘦，双眉浓重，这就使原是温和的面容显得有些严峻。他穿一件蓝布大褂，戴顶荷叶帽。后面跟的一个，手里拿杆旗子，走出站台便把旗子展开。旗子是白布的，上面端端正正写着"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十一个字。

为首的高瘦青年一面走着，一面手指着车站西边高高的老烟筒问："老史！那不就是你们工厂吗？好不好进去？"他说的一口湘南话，语音却满清楚。这就是邓中夏（当时名邓康）。

史文彬说："邓先生！您不是来过吗？"

邓中夏说："那时候是走马看花，没有进过厂啊。"

武明科他们这几个人却抢着说："厂里到处都是油泥，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

邓中夏笑了笑，看看他们，又问史文彬："你们各位，有哪几位是工人？"

大伙儿一边走着，一边都介绍了介绍。前几个月办救国十人团的时候，邓中夏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和长辛店这几个人联系过，却不很熟识。这时候才算弄清了：史文彬、陶善琮、陈励茂是工人，吴宗祥、武明科是学生，还有邓长荣、王金波等是工头。

谈了几句，到了大街上，讲演团就把旗子一插，他们还带了一个留声机，从街上商店里借来一个凳子，把留声机一摇动，就唱起戏来。这里咿咿哇哇地一唱，马上就招来了一大群小孩子和妇女，围着来听。开了两张唱片，讲演团团员们就开口了：

"同胞们！我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今天是来讲演的。头一个题目讲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讲演？》……"

史文彬和陶善琮他们这些人也就站在人群里听。讲了一会儿，看热闹的妇女和孩子慢慢都走了，工厂下班的工人走过这里。这二年他们是听惯了讲演的，有些人就站下来听。讲演团员一个讲完了另一个讲，讲了四五个人。邓中夏也讲了。正讲着，有两个老头路过，站住瞧了瞧，一个说："又是学生讲演啊？"另一个说："是啊。原先学生都是小孩，不知怎么这会儿出来讲演的学生尽是长胡子的。"那一个说："这你还不晓得？这都是大学生，一出学堂门就都要做官的。"这句话却被旁边站的史文彬听见了，他一皱眉说："不知道的别混扯，你见过哪个做官的出一身汗，闹一身土，跑到这乡下地面来跟咱讲话？"倒把老头堵得

* 本篇节自作家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北方的红星》一书第57—69页。这是该书《劳动补习学校》中的一部分。——编者

怪不好意思，也就站下来听。

他们讲了将近两个钟头。有些最热心的听众就一直站着听到末了。等讲完了，连讲的人和听的人腿都站酸了。讲完以后卷起旗子到艺员养成所去休息，谈以后互相联系的办法。邓中夏特别提出来："以后一定常常来讲，就希望有个固定的房子，哪怕是没有桌凳的空屋都可以，那样，使听讲的人也可以固定下来，效果更好些。"武明科一听就连声抢着说："行！"又说："这样我们这里就不愁没有人了！我们这里就没几个有文化有知识能办事的人，要不然，我毕了业该留法的，大家怎就都不放我走呢。说：'你走了，救国工作靠谁呀！'现在有你们，就好了。"两个工头也随声附和。邓中夏又看了他们一眼。史文彬却恳切地说："来吧！再来了，我准带您到工厂去。"后来，算是说妥了：由长辛店这边想办法找固定地方，并且确定了一定的人联系这件事情。

1920年秋天一个晚上，邓中夏和史文彬一起在长辛店到芦沟桥的大路上蹓跶着。这时候，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成立，讲演团隔一个星期来一次，他们也讲女人不要裹脚，也讲反对不平等条约，已经来过好多趟，人也慢慢熟了。除了讲演以外，邓中夏常常和朱务善、杨人杞两个同志一块儿到长辛店来，找长辛店的积极分子谈话。他们把长辛店的几个积极分子分析了一下：几个工头对没名没利的事情根本不热心；武明科那些，看来靠不大住；无论按阶级成分，按觉悟程度，按为人的诚恳忠实说，史文彬都是最可信赖的一个。所以他们就常常找史文彬了。

邓中夏问了这两年工人爱国活动的情形，史文彬就把怎么成立救国十人团，怎么抵制日货、游行、讲演……从头到尾都讲了一遍。邓中夏问："后来怎样啊？"

"后来……"史文彬皱了眉："后来武明科他们说，要用文化救国，只要普及教育就能把国家救了。又说各界救国会一开会一大屋子人，吃饭人不少，用处可不多，要办点实事才行，所以我们就凑钱办了个夜班通俗学校。"

"这学校又怎么样呢？"

"学校就由我们几个认识字的工友教课，来上课的工友也不多，越办越不起劲，又没有钱，现在他们正打算把它关门。"

"这么样办'实事'，也没有救了国啊！"邓中夏笑着说了一句，便把话头转过去，细问工厂里工人的生活情形。

一提这个，史文彬就自然地越说越起劲了。他说了什么叫做"锅伙"，什么叫做长牌和短牌，又说了"三节两寿"怎样送蒲包随份子，挨了刷怎样上门求情，工头怎样剋扣工人，还说了老工人怎样临死下决心不叫孩子上工，结果没饭吃还是得上工；而在上层呢，中国稽查钮孝贤是中国处长沈承俊的女婿，外国厂务总管麻商是外国厂长祚曼的丈人。这真象老工人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工人生来穷手艺，累折了腰板还受穷。"

邓中夏凝神听着，脸色十分严肃。然后他问："老史，工厂里我已经看了一下，你再带我到锅伙里去看看，行吧？"

史文彬说："当然行。"停了一停他忽然问："可是您为什么老要看这些呢？以前来讲演的大学生，从来没提过要看这个。"

邓中夏笑着说："大概我和别人有点不同吧。他们不看，我却一定要看！"

史文彬领着他到工厂里去，那时候工厂的门禁不严，外人进去没人管。史文彬领着他去看了机车大修，正六月天，看了铸工场那烤得人站不住的大火炉，又看了双手抡着大锤的锻工。他还问这些机器和工具的名字，史文彬就指着告诉他，什么是钳子，什么是车床，小工具是干什么用的。他都仔细地记下来。又到锅伙和工人家里去访问工人。一到星期天，别的大学生去逛市场、看戏，他们这几个青年一大早就坐着火车到长辛店来找工人朋友了，这仿佛就是他们的假日旅行。

到1920年冬天，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在长辛店建立一个长期的固定据点。他们研究了一下，原来那个夜班通俗学校是个可以利用的基础。打算就着那个基础来办一个工人的补习学校。他们也考虑到，原来那个通俗学校里有几个工头，将来不能合作。可是，目前在工作刚开辟的时候，这些人在长辛店有点儿地位，利用他们出头，学校倒还比较容易办起来。

把要办学校这个意思跟夜班通俗学校的人一谈，所有的人都很高兴。史文彬说："这两年干了一阵，就怕是瞎干，早就盼望着你们在这儿长住着，我们往下干也放心了。"陶善琮是个热心"文化救国"的，他也很愿意干。武明科高兴地逢人便说："这正是我们早就提倡的平民教育运动。"他一听办学校，就自己跑进城去到处找教员，找到一些正在北京翊教寺办"平民学校"和"平民织布厂"的无政府主义者门上。工头邓长荣一听说这回办学校要在报上登广告，算他是个发起人，名字要登报，也很高兴，答应去往官府呈报，还去找在长辛店最有势力的火车房大总管郭长泰，请他赞助。

呈文递上去了。北京大学学生会和平民教育讲演团捐了一点钱来，做开办费。房子是工人刘彬去租的，在长辛店大街中间当铺口胡同口上，三间平瓦房，两明一暗。外面两间通连一大间，算课堂；里面一小间有个土炕，就算教员宿舍。凭那点儿开办费置桌椅板凳还不够，史文彬、陶善琮他们商量了商量，就出去找工友们捐。有个火车房的司机叫黄义，手头宽裕点，他出了一个桌子和好几条长板凳。几个工人积极分子也都拿了些缺腿儿板凳来，现成的木匠，修了修，就算都齐备了。

开　辟

学校马上要开学，共产主义小组的人们来得更勤了。

邓中夏和杨人杞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一起来到长辛店。学校里已经有了桌凳，工人们已经从家里弄了油瓶和油灯来，点上了灯，炕里也生了点火。共产主义小组常来的几个人弄了一个铺盖搁在里屋炕上，谁来了谁睡。正忙着开学准备工作呢，邓中夏出去了，只剩杨人杞一个人就着摇摇晃晃的油灯坐在板桌旁边，桌上堆了不少各色各样的《平民识字课本》、《国语课本》以及谈平民教育理论的书。他一面翻阅着，一面考虑。油灯十分暗淡，他渐渐觉得疲倦了，眼皮儿直打架，却老不见邓中夏回来。

一直等到十一点多，邓中夏才匆匆忙忙地赶回来了。一进门，解去了绒帽和围巾，拂落了棉袍上的雪花，用口呵着冻红的双手，神色却十分兴奋，动作也轻捷，仿佛还可以再出去跑几趟似的。杨人杞问："你又到工人家里去了？"

他笑着点头，说："就是。"

杨人杞指着桌上的一堆说："快开学了啊。"

邓中夏一面脱衣服爬上炕去，一面说："我这正是为开学作准备啊。"他上炕躺下，头

一着枕，不久，杨人杞就听见他平匀的鼾声。

第二天早晨，他们俩很早起来，杨人杞一面整理被盖，一面说："南方人睡这土炕总是睡不惯，硬得很，我一夜又没大睡好。"

邓中夏顺口说："北方人都是睡这个。"

杨人杞又说："在学校里不觉得，到了这里，就感觉北方老百姓的生活实在是格外痛苦。就象那窝窝头，我家里虽然也不是什么有钱人，这个却从来没有吃过，吃下去，喉咙里实在有些不太舒服。"

邓中夏笑着说："我一顿却能吃三个哩。"

杨人杞也笑了，他说："也怪。你也是南方人，倒是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

邓中夏的脸色忽然变得严肃了，他说："因为啊，……因为我想到我们这一辈子要去干革命，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还在前头等着，现在的这点儿，不过是开端的开端罢了。这么一想，我就觉得这热窝头真是很好的饭食了。"

"你说得对。"杨人杞点点头，脸色也变严肃了。

邓中夏又接着说："我到好多工人家里看过，有整齐的炕和篾席睡，有干净的玉米面窝头吃，能过这样好生活的工人，并不算多啊！"他说着，轻轻叹息了一声，语音沉重起来。

不大一会儿，朱务善也来了。北大的几个青年都赶来了。外间屋没有火，他们都挤在里间小屋的土炕上，喝着白开水，谈论着未来的美景，和这些时工作的感触，越谈越起劲。朱务善说："我觉得工人们真是诚恳忠实，一见面就令人向往。"又有一个说："一到工人中间，就觉得我们能为他们做的事情实在太少。"

"但是将来我们一定能做得很多。"邓中夏的语音是坚定的。

他们谈到了将来的工作，又谈到了课程的内容。

共产主义小组要创办这个学校，当然是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可是，既是办补习学校，文化课是不能缺少的。大伙儿决定：设一课"常识"，把他们要向工人传播的思想都放在这课里讲。另外还设国文、数学两课。邓中夏说："教工人识字读书还是重要的。文化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仙丹，但是它是个必要的工具。不识字没有工具，对接受新思想是一个大阻碍，文化课还应该郑重地安排。"

大家就商量用什么识字课本。有一个北大学生说："吴稚晖才编的有一个平民常用二千字的课本，就采用这个，也还方便。"大家也觉得那个本子字儿似乎也还齐全。

邓中夏却摇头，他说："不！我们不用他的。"他也不同意采用共和国国文课本，主张自己另编。他说："应该把工人的生活，工人日常用的工具、器物都编在这课本里。要叫工人读了书就晓得他用的老虎钳子怎样写、锉刀是哪两个字。课本可以这样编：作工、干活、钳、锤、锉、锯，……都用什么工具，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应当学这些才好。"

就这么着，按邓中夏的主张通过了。指定人编了课本。

接着又宣布了派来两个长驻教员，都是北大学生。一个叫贾祝年，一个叫王铮。别的人，也随时来讲课。学校的招生简章决定发表在上海《劳动周刊》上，还发表一篇文章介绍这个学校的创办经过，同时把简章贴到长辛店的街头巷尾，由史文彬他们去动员学生。

在 学 校 里

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了。学校里除了几条旧木板凳以外，没有别的设备，讲台是用土坯垒的。门口没有木牌，就用一张白纸写着“劳働补习学校”六个大字。按那时革命人物的习尚，把劳动的动字写作“働”，这是一个日本字。——那时候，许多革命书籍都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

学校里白天教工人的孩子，晚上教工人。有将近二十个工人来读书。史文彬、杨宝昆、王俊、陈励茂……都是最早的学生。教员除了长驻的两个以外，邓中夏每星期来讲两次，杨人杞也是每星期来，后来又派了长驻教员吴容沧，还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和团结在小组外围的一群革命青年，大家都经常来讲课。……李大钊这时也曾亲自到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来视察。来过的教员真不少，要说数目，差不多和学生一般多。

课本虽然编了出来，却没有条件印刷。一开始，就由教员用粉笔把课文写在黑板上，学生们照样儿抄下来。过了些日子才有了油印的课本。

晚上八点来钟，学生们来了。土坯讲台上一张板桌，桌上点起一盏煤油灯，那点光亮刚够让学生看见黑板，教员拿起了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作工、劳动”四个大字，这就是一课书。他先教学生把四个字认识了，又讲了字义，接着，就发挥起来。他说做工最光荣，劳动最伟大，这就叫“劳工神圣”。

一个工人说：“穷工人有什么伟大的？伟大还受穷？”

教员等他说完，用询问的眼光看看大伙，不慌不忙地说：“你们想想，铁路是谁修的？火车是谁开的？机器是谁造的？咱们工人不盖房，谁也没地方住。工人不织布，谁也没衣裳穿。世界上哪个人离开工人也不能活。难道作工不伟大吗？”

工人们都点点头。

教员又问：“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受穷吗？”

一个工人随口答了一句：“人家都说是命苦呗！”

教员就又讲起来了。他说明工人受苦是因为受了有钱人的剥削。譬如，我们住的是锅伙，我们盖的楼房却被有钱人住了；我们穿的是面口袋,我们织的绸缎却被有钱人穿了,……享福的，子子孙孙老享福，受罪的，世世代代老受罪。这不因为别的，都因为有“剥削”。

识字课本里念到“铁路”，教员就讲：“咱们现在服务的这条铁路，就好比一条大蟒。各国都拿着刀来了，都要割它的肉。我们国内拿事的大人物们，就专指着铁路向各国借款过日子。这儿借、那儿借，中国的铁路和出矿产的地方都要归人家了，我们大伙就都完了。”他又打个比喻：“这就好比一家子，当家的不干正事，把产业都给别人顶了帐，家里就要归别人管了，家里人不是就要受痛苦了吗？这个就叫‘帝国主义的侵略’。”

包

工人听了，都觉得说得很对。他们也在课堂里发言。这个说：“就拿咱们厂的法国厂长祚曼说吧！这个家伙本来是个屁事不懂的窝囊废，可是他挣的钱顶上咱们五十个工人。”那个说：“罚人的能耐可大，两个黄眼珠一瞪，就罚一块，一还嘴还加倍。”

工人们都把帝国主义走狗欺压自己的事情一件件倾吐出来。

教员等大伙说完，又说道：“咱们受穷受苦，这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我们来想想，应该怎么办？”

他这么一问，把大伙问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不出来。只见教员站起来，由桌子上拿起一张白纸，两手将这张白纸扯平，让靠近他坐着的一个工人用手指向纸上戳，一戳纸就破了。教员又拿起来三张纸，还让他戳，一戳又破了。最后，拿起来一大叠纸，这个工人连戳了几下，手指头都痛了，可这回一张也没有戳破。大伙莫明其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教员将纸放在桌子上，对大伙说："一张纸一戳就破，可是一叠纸用拳头打都打不破，我们工人也是一样，五人团结赛老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象泰山，谁也搬不动，枪炮也没有办法……。"工人们睁大两眼听着，眼睛都亮了。他喘了口气儿，又接着问："你们常到芦沟桥去玩，知道桥墩是什么作的吗？"

"是砂子、石子加洋灰呀！"

"对，砂子和石子，本来是散的东西，经不住风吹水冲，可是要和洋灰掺在一块呢，还是那砂子和石子，它就能经得住上千吨的桥梁，永定河再大，水流得再急，也冲不动它了……。"

"先生说得对，咱们穷哥儿们所以受压迫，就是因为不团结，从今以后，只要大伙心齐，结结实实的抱成团儿，什么事都能办到，就有法子不受压迫了。"教员的话正触着了史文彬自己心里早在想的问题，他早领会了这意思，抢着发表自己的见解。工人们都点头信服，有的还高兴得鼓起掌来。

每一个教员都讲这样的故事，孙臻到现在还清楚的记得吴容沧讲的一个打虎的故事。他说："老虎在山上称王，张牙舞爪断道吃人，谁也不敢惹它。有一次，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联合起来，一下子把牠擒住了，老虎再凶也架不住人多……。"他们讲得特别多的是外国老寓言里边那个老头儿临死叫孩子们折木棒的故事①。有时候他们把木棒改成白纸，有时候又改成秫秸杆儿，反复地讲，为了把"要团结"这个主要的意思牢牢地扎在工人的心底。

真是蜡不点不明，灯不拨不亮，这些简单的革命道理，象一阵春风，渐渐把工人们心中的乌云吹散了。常识课从为什么下雨，为什么打雷，一直讲到政治上，讲到什么是政党。先讲资产阶级的政党，后来讲工人阶级的政党，讲到工人阶级为什么要有政党，讲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阶级斗争理论，讲到为什么要承认苏联，讲到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讲课内容慢慢的深入和系统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劳动周刊》、《劳动音》、《共产党》……也都在这个学校里出现了。不论是北京来的教员还是常驻的教员，下了课以后，都一个劲往工人家里跑，进一步深谈工人阶级要取得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道理。他们把一些革命的理论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带给几个最积极的工人看，这些书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最早的翻译版本。《共产党宣言》的封面上印着一个大大的马克思像，下边还有四个字："马格斯像"。说实在话，这些理论书，当时工人们还不怎么读得懂。可是当他们知道这就是共产党的书以后，都当宝贝似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念。……

年轻的教员们抛掉大学的学业，来挤着住在这间小房里，连点灯的油瓶都是从工人家里现借来的。一月拿七块钱生活费，只吃三块钱饭，还省下几块钱来买茶叶糖果，好招待工人来学校里座谈。他们这份儿精神真把工人的心打动了。谁也不再把教员们当成一般穿长褂儿

---

① 这是个西方的古老故事，故事中说有一个父亲临死时拿一根木棒叫三个儿子折，一下就折断了。又拿一束木棒给他们折，就折不断。父亲就告诫他们，三个人一定要同心协力，就不怕别人欺侮。

的先生看待，常有工人请吴容沧、老贾……上自己家去吃饭、喝酒。先生也不再讲客气，不再分彼此。吴容沧常在工人家里和工人一起就着咸菜喝老酒，一喝就喝上几两。

到四五月间，学校里已经有四十来个学生了。一到星期天，好些不上学的工人也跟着学生们到学校里来玩。后来教员们从城里弄到一架破风琴，好几个教员都会编歌词，吴容沧还会作曲。他就坐在院里弹着风琴，把自己编的歌儿唱给大伙听：

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作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工人大家跟着学唱。每到星期天，悠扬的琴声和这新鲜有力的歌声就从当铺口学校里传出来，压倒了大街上宝局子里赌钱的人们的吆喝。一院子唱唱闹闹满热闹。这学校真是个有意思的好地方，去的人越来越多了。

（选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1]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月）

匏　庵[2]

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且去来查尔而归于马氏，在近世社会党中，其为最有势力者无疑矣。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

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之一八四八年，至刊行《资本论》第一卷之一八六七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其学说亦以此时大成。所谓唯物的史观论，盖由实在一元论而生之历史自然科学的观察，更傅以革命色彩者也。其历史的根源，不在天之创成，而归之地之生产，以技术及经济的因子，为一切政治及精神上之历史原动。生产上之变化，即历史变化所由起，画分历史上之时期者，生产之手段（器具机械）也，演出社会上之阶级者，生产之形态也，而此种阶级之战争，即人类之历史焉。

一国之法律，全视其国之社会经济而定。社会生活之实体，即经济是也。经济犹基础，法律政治犹建筑，若经济的特性有重大变化，则节制此经济之形式，必随之而转移，故社会生活之内，有一种规律，这种规律可以以天然科学的方法探得，盖社会经济的现象，原为一种天然物，其现象之全部，即是社会生活的物质，而其现象之生存毁灭，即物质的运动也。

唯物的历史观，不否认理想的作用，无论过去未来，人之社会理想，皆可以为改变法律及社会秩序之近因，然人于善恶的想象，决非离此物质世界，而为独立存在者也。换言之，人于善恶的想象，决非别有一个因果行列者也；试就历史上之社会变迁察之，一切理想，不为社会变迁之最终的原因，实一种社会经济的影子，以其既有此种社会经济，然后一切理想方能发生也。

唯物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之理想与经济的关系，有二种说，第一，宇宙之内，但有一个单纯的经验；一切事变，皆从一个时间行列演出。世界无两个时间种类，亦无两个不同性质之因果系；理想与物质，乃联结于一个因果系之中。第二，社会经济与其现象，即社会生活之唯一实在；此外所有社会的理想期望，皆以一种不可易之公例，而随社会的经济以为转移。

于是由第二说之理论，生出一个极重要之断案，社会理想既全为社会经济的影子，而非

---

①本文原载广东《新中华报》《世界学说》栏，日期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日、十二月三日、四日，共登十九日次，中间缺四日次。

②此文系李坚同志收集整理。据李坚同志考证，匏庵即杨匏安。

改革社会制度之最终的原因，是故社会制度之改革，必不能持其社会的理想，而必由于阶级之战争，盖阶级战争者，经济现象的结果也。

当马克思之世，哲学的大思想家时代，已属过去。凡研究社会科学及史学者，专探讨单独的事实，注意零碎的考求，此种研究方法，在天然科学固可畅行无碍，至于社会科学，乃不能适用，因社会生活究以何种规则发展，及与天然界的现象有何关系，此两个重大问题，尚未讨论透澈，故单独零碎者，无原则可准，无方法可循。自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既出，其于社会科学之意义，固在于指示社会生活的规则，此其所以为极有用之史学方法，又为空前的社会哲学欤！

近世的经济，已渐变而为社会式的经济矣，易辞以明之，则近世的出产，乃由"大经济单位"通力合作而成。（大经济单位，如工厂田地商业等，用大规模及大计划，聚集群众而组成者）此种大经济单位，其量愈大，其数愈小，是则现在社会经济的实状也。顾现行之法律，仍沿袭古代而来。古者工作所用之器械，乃工人所自有，故当时法律，承认工作所出之产物，宜归之作者。然在近世则不然，此法律的经济基础，既已变更，工作之器械，不为自有，而工作者但受佣于人，所得产物，亦不能自有，故曰近世的经济，乃合力共作，为社会式的经济也。

然而现行法律，犹本于古代独作自享的经济（个人式者）而立。其与近代社会相冲突抑亦明矣。法律与其经济基础既不相称，以唯物的历史观论之，法律终必让步，随经济而转移。而私有财产之制度，又基于古代经济的法律而立，今日尤无存在之理。近世的经济制度，犹有一最重大矛盾，盖一个经济单位之中，则有多数人循大计划而为工作，纪律既明，尤能统一：然社会之内，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彼此不相统属，无计划，亦无秩序。换言之，一个经济单位的本身，固有完全的组织，至于各个经济单位之并立，乃无一个意志以为支配也。

各个经济单位之间，既无所统一，于是各谋其利，不恤耗费多数人工与材料，由经济发展的趋势观之，此等矛盾的生产法，终归废除矣。

唯物的历史观有二要点：其一乃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之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第一说谓人类社会生产机关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此实为社会之基础构造。一切社会里之政治法制及其精神上的构造，皆随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而基础构造，其内部亦有最高动因，以促其□□之进化□此最高动因，即生产力是也。第二说谓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随之而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与布帛□米无异，亦人类依生产力而产出者也。□□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资本家的社会。社会组织即其始亦尝助长生产力的发展，然其发展的力若到社会组织不能适应之程度，则社会组织不独不能为之助长，势必加之以束缚妨碍矣。此时生产力虽受束缚妨碍，然仍发展无已。发展的力愈大，与社会组织之冲突愈迫，其结果非令旧社会组织崩坏不可，是则社会革命也。

自马克思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昔之学者，咸谓人类特长，在有灵性，能驱驾万类；故以为人类文化史实由于人类之精神所成；人类的精神，不随历史而变化，故文化的根本方向亦无变化，于是立一定之法道，作文化之标准，以一时代一地方之形式，而范围各时代各地方的现象，此其弊在消极的固使多数人不能进步，在积

极的仍发生无限痛苦也。然马克思之论文化史，谓不成于人类的精神，而成于物质的境遇。从表面观之，各种文化，似皆出自人类之努力□惟实际上□中物质而决定。人类处自然支配之下，不过能利用自然□遂较万类为高耳。人类之精神的努力，既由物质的境遇而定，故人类的文化史，亦中□□的□□□定。宇宙间物质之性质，及其数量，以物理学言，固无绝对的变更，然在经济学上，未尝无相对的转易。又若律以物质不灭及物质普遍之公例，则物质之性质数量，无古无今，混然一体。然而物质之结合与其位置□苟从新陈代谢周流循环之生理学、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公例规之，仍有生灭流转；是故物□□□合位置一变，则人类之文化亦不得不□□□如唯物的历史哲学所言□□切道德法律政治宗教经济艺术□□□□□□□随顺□宜，常起变更□固□□□适□□□□□□□□

吾人试以唯物的历史观□□□社会的科学，此中殊有兴味，今就道德的历史而言，果详考其沿革，可发见其内容，至少已经四大变动矣。第一时期，人类无多，自然的物质又极充裕，人类但能利用自然的物质，便可生活，不必讲求培养自然物质及结合自然物质之方法也。在此时期之人类，所谓放乎自然，游于天机，故有天然之理法，而无人为之道德。其在第二时期，人类已渐繁殖，自然的物质，亦渐不足用，故讲求培养与结合之方法。然是时人类的智力，殊不发达，其方法弥为幼稚，且无劳动的经验，复无劳动的趣味；而一群之中，有比较聪明而有武力者，遂立为一种绝对服从之人为道德，以强制愚弱之众，为一己戮力，而坐享其物质。故道德始生于是期，其性质则完全屈伏者也。

其后人于第三时期，人类愈益繁庶，物资愈益缺少，欲求足用之生产，不得不用较多之劳力，而生产的方法，又较前此为复杂，欲使人类竭其全力，以复杂的方法而产出物资，非令其自愿劳动，及令其有为自己生活而为劳动之自觉不可。故此时期之道德，以个人人格之独立发展为内容，绝对的强制劳力，已无大效。第四时期，一切文化较前尤为进步，人类死亡之原因，渐行减少，人类的绝对数愈增，生产物资之方法，纵使突过前时，然亦终不能与人类加增为骈进；加以资本家之抑制生产，及人类之消费量日多，而物资愈难足用；欲应人人所求，唯有用统筹全局，合最大的生产力，行最大的分配，之经济方法而已。故第四期之道德，在于合力互助，而有其社会的性质者也。

若以唯物的历史观而研究法律之沿革，则其时代现象，颇与道德的沿革相同。在第一时期，但有自然法，而无人为法之支配。第二期始有人为法，然既役使愚弱，代豪强者而生产，则其所定法律，皆所以保少数人之利益，法制史上所谓严格法时代之法律，是即以保护强权为内容者也。第三期因欲使人类觉悟自己人格，维持独立生活之故，其法律乃以保护人权为内容。所谓自然法平衡法及自由法时代之法律，皆属于此。第四期生产愈缺，须以经济上之协助方法以为补救，故最近法律之内容，于保护人权之外，犹有社会生存权在焉。此最近法律之处罚未遂犯的规定，及刑事事件兼负民事的责任之种种规定，即其例也。其他政治史宗教史艺术史各等之上，皆可以发见随其物质的变化而为转移者，今姑略置不赘。

（此处缺一日）

马克思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因土地共有制度既坏之后，经济的构造，皆建在阶级对立之上。所谓阶级，即经济上利害相反之阶级。其分别则一方为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之手段者，一方肆其压服掠夺，而一方则受压服掠夺者也。此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而表现，若亚细亚者，若欧洲古代者，若封建者，若现代资本家者。是等生产方法出现之次

第，可作经济组织之进化阶段；而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在社会生产方法中，乃采对敌形式之最后者；阶级竞争，亦将随此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矣。至于社会何故呈露阶级对立之现象，在马克思意见，则谓全由一个之社会团体，依生产方法的独占，而掠夺他人之余工余值（详后）而已。

（此处缺一日）

欲物之生活者，第一须备有生产必需之工具（如机器等），第二须备有若干之生活品（供工作时生活所用），然近世社会中，但有少数人能具足此二事，多数之劳动者，惟有劳动力一道而已；劳动若图生存，须卖其劳动力于资本家，而资本家则给以若干之工值。至于为值几何，则按以价值公例，凡一物交换之价值，概等于制造此物之劳动，故劳动力之价值，即等于培养此劳动力之劳动。假如一劳动者，每日所需之生活品值六小时，则每日劳动六小时，已产出其人生活之价值矣。然而劳动者之卖其劳动力于资本家，资本家课其劳动时间，必较六小时为多，此则劳动力之价值与劳动力之利用时间不同，而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之际，正欲得此种价值之差别，如资本家给劳动者以六小时之工值，而收十二小时之劳动效果，此中有六小时之价值差别，是名“赢余价值”，仍是劳动者自己所制作，顾资本家攫为己有，盖坐享其成者也。资本家既掠取赢余价值，积之愈甚，资本愈增，此则资本制生产法之下，所自然发生之结果也。

资本经济行为的动机，但求扩大此赢余价值，然其所投之资本，原分两部。一部用之于工价，即所以产生赢余价值者。犹有一部，则用于生产的工具，异日物品产成，可以取偿，此一部不经生产手续而有所增益，故曰不变的资本。惟产生赢余之一部，则被称为变的资本云。太凡劳动者每日之工作时间愈长，则资本家所攫之赢余价值愈多；故资本家恒欲延长劳动者之作工时间，而劳动者一面，自然要求减短，是即两方冲突之处也。顾资本家占优胜之势力，劳动者恶能对抗，所以向来冲突之结果，劳动者多归失败，劳动时间曾不见其少减，驯至劳动者痛苦至极，合全级势力以奋争，此际国家亦不能坐视，始对于劳力时间，立为一种限制的法律矣。

（此处缺二日）

近世之社会，经济组织，纯以生产工具为私人所有，其生产力遂涣散而无统一。各经济单位互相竞赛，力谋改良其一己之生产法，故生产之范围日大，而市场销路，又弗相称。盖销路之广狭，不因消费人之欲望而定，乃视消费人之购买力而定者。社会上之购买力有限，固不能与竞逐无厌之生产骈进也，生产太骤，货物未能流通，于是有经济恐慌市场停滞之现象。以全社会而论，生产事业既如是纷乱，然就一个经济单位观之（参看上述唯物的历史观一节），其组织日益完全，其计划日益周密，是为近世社会经济的矛盾，此矛盾之原因，即在于一面共同生产，而一面乃任私人攫取生产的结果也。

社会上既历一次经济恐慌，则资本薄弱之企业家必受一次淘汰。资本家欲谋挽救之道，不外开辟市场，或罗掘旧市面；然此种方法，仅足以为更大的经济恐慌之预备而已。盖经济恐慌不特循环不已，且每次愈益加烈。故资本制的生产法昌盛之后，中级之人，如小企业家及手工等，渐就湮灭，结局惟有大企业继续增长，其势益大。顾此等无数之大企业，仍是互相争并，苟遇较烈之经济恐慌，不能并存，其趋势但留下极少数财力最雄厚之资本家，以操纵社会一切之生产，而社会上大多数之人，只可佣赁图活，无自立希望，境遇愈逼，困难愈重，

反抗的意志及反抗的运动愈烈，一旦群起而取得国家之权力，改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脱去资本家之羁绊，恢复各人之经济自由，此为解决社会经济的矛盾之唯一方法，亦即近代社会经济制度所必有之结果，是固循社会演进的程序而自然发生者也（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Bolsheviki之不能以武力扫除矣）。

以上为马克思之经济学说，其大旨不仅指斥资本家之贪婪，而在于揭破资本主义之不公。至其社会主义运动论（即政策论），则见诸《共产党宣言书》中，及前此所述之共产主义，今且从略。

（选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下册）

强盗阶级底成立

汉　俊

“在我们近世社会——换一句话、在现在各文明国中——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强盗阶级底存在。”这句话是英国一个著名文学家萧伯纳说的（参照本志第四十六号强盗阶级）。实在说得不错。社会上所有的不平、所有的罪恶、所有的痛苦、无一桩不是基因于这个强盗阶级底存在。所以强盗阶级底存在、是最重要的事，而于被掠夺阶级、更为重要。

萧伯纳所说的强盗阶级——强盗！到底是甚么东西？是结群劫掠底土匪么？是截路行劫的贼盗么？是破门挖墙的窃贼么？是鼠窃狗偷的扒手么？不是的、都不是的。这都是普通所说的强盗、不是萧伯纳所说的强盗。他所说的强盗、是以国家、法律、道德为堡垒、以智识为武器、以金钱为弹丸、在青天白日之下、万目环视之中、掠夺平民财产、剥削平民血汗的资本家。

萧伯纳何以称他们为强盗？一定是因为他们底行为与普通所说的强盗一样：普通的强盗是吃饭、穿衣、住房子的。他们也是吃饭、穿衣、住房子的。普通的强盗是不种田、不织布、不劳动的。他们也是不种田、不织布、不劳动的。那么他们吃的饭、穿的衣、住的房子是那里来的呢？都是农夫、工人的血汗里面来的。农夫、工人为甚么要给他们的衣食住呢？他们既不作工、他们底衣食住、用什么东西、去换来呢？是农夫、工人送给他们的么？不是的、是他们由农夫、工人手里抢来的。普通的强盗、是由农夫、工人底手里抢来的。资本家也是由农夫、工人底手里抢来的。这两种人的生活的形式有甚么分别呢？不过一个是用制度的势力去抢、一个是用破坏制度的个人腕力去抢罢了。所以说资本家是强盗、资本家阶级是强盗阶级。

有人说：“普通强盗底衣食住、的确是抢来的。但是资本家底衣食住是买来的、是用钱买来的。你们何以硬说他们也与强盗一样是抢来的呢？”不错！资本家底衣食住是钱买来的。但是他们底钱从那里来呢？为甚么不作工的他们、能够有钱？为甚么作工的农夫、工人反而不会有钱呢？究竟钱是甚么东西？何以钱能够买衣食住呢？

钱不是因为可以买东西才有能力的么？如果不能够买东西，钱还有甚么能力呢？上海是很多的、如果上海底码头工人及船车等转运机关的工人罢工罢到了一个礼拜、或者四围地方遭了天灾人祸、货物不能来、本地方的米又没有了、我恐怕上海的一百多万人个个都要饿死到钱堆里面呢！这样想来、钱的本身、是没有能力的了。

今天这一个世界一切财富、是由商品堆积而成的。钱是要有了商品或有商品出现的预期、才能发生能力的。因为他所能代表的、是物品底交换价值、不是物品底使用价值。但是商品是甚么东西呢？又是那里来的呢？商品是人能够作为衣食住底资材的东西。未开垦森林中的树木、如果没有人去用下劳力（如伐木、运搬制板等工作）、是不能为人底衣食住底资料、是没有人要他的。他只能谓之物、不能谓之物品。即使加下劳力去、如果是加劳力的人自己使用、这就只能谓之物品、不能谓之商品。他不能为钱底目的物使钱发生能力。

物品是人能够作为衣食住底资料的、是人将劳力用到自然物上得来的。换一句话说、物品是人以造出衣食住资料底目的、将劳力用到自然物上得来的东西。所以物品是物质与劳力底结合体。物质是属于自然的、是不发生经济上的价值的、但是到人力加上去的时候、他才发出经济的价值来、这个价值、又要到交换的时候、才发生商品的价值、所以商品的价值、不是对于物质的价值、是对于物质量的价值。不是对于物质与劳力相合的价值、完全是对于劳力自身的价值。物质的质是绝对的、所以使用价值是绝对的、物质的量是相对的、所以交换价值是相对的、因为是绝对的、所以能使用、因为是相对的、所以能交换、燃料的使用价值、是燃料特有的、是金银所不能代表的、金银所代表的、只是他的交换价值、就是以交换为目的所加的劳力价值。把森林的树砍倒、搬到都会去求交换、树的价值是不能交换的、能交换的、完全是对于砍树者运搬者所消费底劳力底价值。搬到都会之后、有人把他作为板本或器具。价值又要比从前增加了。总之，无论那一种自然物劳力加得越多、价值就越增加。这些增加底价值、完全是对于劳力一方面而言的。资本家不劳动不用劳力、他们底钱、从那里得来呢？他们底钱、实在是抢来的。他们是用甚么方法抢来的呢？这个话说起来就长了。你们且别忙、等我慢慢地讲。

在物物交换底时代、并没有甚么钱、都是以物换物。譬如甲有一升米、乙有一尺布。甲就以这一升米去换乙底一尺布。乙就以这一尺布去换甲底一升米。并不要甚么钱、所以没有钱。

人类渐渐蕃〔繁〕殖、欲望渐渐增加、社会的关系渐渐复杂、物物交换、不能适应人类需要的时候、才有货币这个东西、发生出来。货币的起原〔源〕是甚么呢？就是社会对于共同等价物底要求。至于货币进化程序、不特是稍为研究过一点经济学底人可以明白、只要稍为晓得一点蒙古西藏的情形、了解一点边地未开民族经济状态的人、都可以明白、现在我也不必多述了。

却是自从货币这一个东西出现以后、在交换经济社会里的人、心理上都生了一种变化、这个变化是甚么呢？就是甚么东西底使用价值、都被人看得很轻，只是作交换媒介作价格中准底货币、被人看得很重。由这个心理状态结晶而成底迷信、就是拜财神。商人是专赖货币而生活的、所以拜财神底迷信也最重、财神老爷就是商业经济底心理的表现。

乡下的农夫是不重视财神的、他们拜土地、因为土地是农夫生产唯一要素。拜龙神、因为水是农业上必不可少底使用价值。拜农神、因为他们以为神农后稷都是农业底发明者。

作工底人、职业不同、所拜底神也不同、他们所重视的是他们底技能、所以他们所拜的是制造底发明者、造酒的拜杜康、做木匠的拜吕〔鲁〕班、造纸的拜蔡伦、染物的拜葛仙。

只有作商的、他们眼睛里所注视、心里所想、晚上做梦梦见、靠他吃饭、靠他闹阔、靠他讨老婆、生儿子的、都只有货币、只有金子银子。所以他们所拜底唯一的神、就是财神。看呵！那位神老爷、身上穿的是金的、头上戴的是金的、坐的是猛虎、左手拿元宝、右手拿金鞭。倘若从他左手里求得元宝、就立刻可以发财。万一被他右手拿的金鞭打了一下、立刻就要化作灰尘。（这里说的是武财神、文财神屁股坐的足踏的都是金元宝）金子底势力大到如此、财神老爷底权力、就大到如此。

“下水思命、上岸思财。”这是两句通俗话、在商人底迷信转化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从前轮船没有出现底时代、走长江的商人、都要拜四将军、因为钱固然可爱、命也是要的、到了要命底时候、就只好弃却财神拜将军了。等到一上了岸、进了栈房、或是到了商店

里、性命的危险没有了、钱的必要又觉着了、于是乎仍旧丢开四将军、依然拜财神。

这是一桩甚么事呢？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拜物教"。考茨基解释他说：

"生产限于在直接保持社会的联络中间、在社会底指挥之下、生产者相互底关系、也明明白白地露现在表面上。但是等到劳动变成了独立的个人劳动、同时生产变成了无秩序、不统一的生产底时候……决定生产者相互关系的、已经不是生产者自身、完全离开了人类底意思来发达。于是社会底势力、便耸出在人类底头上、这个势力、在古代头脑简单底人眼睛里面、便映出一个神力。到后世否〔启〕蒙时代底人脑筋里面、便映出一个自然力。"

大家要了解商品堆积而成底社会里面人与人底关系和人与物底关系、"商品的拜物教"底性质、真非切实了解不可。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找这强盗阶级所经由道路的了。强盗本来也是人、而且也是好好地〔的〕一个人、所以成其为强盗的，一定有许多社会的原因。强盗阶级也是由好好地〔的〕人许许多多年变化出来的，所以他有他历史的经过。

自从"交换"发生了之后、许多以交换为目的底生产品、都带了商品的色彩。这个色彩、到了货币经济完成信用经济出现以后、拿法律家的门面话来说、就是到了物权之债权化以后、财富底商品化、便完成了。这一层后来再说、现在单就商品交换的进程上讲：

商品交换以货币为中介底第一期、是为买而卖的。这一个时期底交换过程是：

商品——货币——商品

打鱼的鱼〔渔〕翁、从河里打得几尾鱼、他是不能吃鱼过生活的。他打得来底鱼拿进城去卖、卖得了钱之后再去买米。他这一个交换底最终目的、是在米。所以把他这一个交换经过、用上面那一个方程式写出来、就是：

鱼——货币——米

倘若打得鱼多、买得米多、他底米不用说是可以存起来明天再吃、或者把多得底钱存起来明天再用、都是可以的。总之、他底目的是在得消费底东西、并不是在得钱。所以他这一种生产、是直接为消费底生产、他底交换行为、是直接为消费的交换行为。

但是自从"交换"底作用、离开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后、就是在社会上、交换行为、成了一种分工之后、再明白点说、就是商业这一种特殊的社会机能成立之后、交换的形态、就完全不同了。上面所举的那一个方程式、便成为：

货币——商品——货币

商人有的只是钱、拿了钱去买货、买了货来再卖钱。他底目的并不是商品、还是在货币。货币越多、买得商品越多、买来商品越多、卖得钱就越多。"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但觉眼前有生意、不知门外是何人。"这些盲目的理想、都是从这一个方程式里面演进出来的。专以商品交换为目的底商人、本来是一种社会的必要机能。他也是随着生产、交换、交通底进步发生出来的。他们这一种商〔业〕行为、就商品交换上看、也是一种必要的社会的行为、也是一种分工。虽说不是直接生产底劳动、也是为联系生产与消费底劳动、既然是社会的必要劳动、就应该由社会得着相当底生活资料。所以这一个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本是有益于社会的。却是他们这个行为、既是操纵供给与需要之间底行为、所以就很容易在人所不看见底地方、做掠夺底事情。于是掠夺阶级底种子、就和商业发生同时种下。

商人是以货币换商品、以商品换货币的。但是他这一个行为、如果只是以同等价值与同

等价值作交换、他自己岂不是得不着一点好处、连自己的生活费也无从出么？所以他这个交换最后的货币总非加上一些利子不可。商业资本底形成、就是在这一点。

货币——商品——（货币＋货币）

如此递加下去、所有货币、岂不是都会加到他身上来了么？他们底商业所得、岂不是要把一切生产者消费者底利益、都掠夺到自己荷包里去了么？所以在中国古代、在欧洲中世、交换经济没有超过国界生产也没有集中底时代、社会上把商人看成最无道德最下贱底人、国家的法律政治、也极力去取缔他。贱视他是为甚么？就是因为他有掠夺底必然性。取缔他是为甚么？就是限制他的掠夺量。何以不能够绝灭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社会的一个必要机能、所以只能够限制他财源茂盛达三江、却不能够禁止他生意兴隆通四海。

在这一个时代里面、以商业行为掠夺货币底商人、在社会上底地位是最低的。所以他的地位最低底缘故、就是由商业行为、只能得到一个“货币加货币”底结果、不能使“商品加商品”。买了来底商品、在商人手里越过得久、只有霉烂、不会加多的。既然社会上底商品、不能因商人而增加、那么商人所得底利益、当然是直接由别人手里掠夺而来的了。强盗底掠夺、既然是社会所不容的、那么商人底掠夺、当然也是社会所不容的。汉高祖不许他们乘马、不许他们穿绫罗、不许他们住高大房子、就是这个缘故。

到了近代、工业的集中发生出来之后、劳动力底商品化完成之后、商人的地位就利害起来了。他们发现一个可以自己长大底商品了、许多商人、便离开了他们掠夺社会财富底地位、成为一个狠能够正当主张权利底资本家了。他们出钱去买来一种货色、这个货色一进了资本家底工场、便自自然然地长大起来、长一倍、长两倍、无限量长大下去、于是乎资本家卖出这个货色底时候、就可以照他长大底价值卖出去、买进来底货是小的、卖出去的货是大的。商品部长大是一件事、照货卖钱是一件事、一点都没有对社会不起。这是商人底进化、这是资本家底神通。这样一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卖茶去”。那一种卑劣习性、都可以脱却。并且还可以取得古代农人“安土重迁”底好习性、又可以把四方流浪底商人习性、转嫁给农夫和工人、使农夫工人、成为无国家无乡土底流浪者。

这一个奇妙不可思议底商品是甚么呢？就是劳动者底“劳动力”。这个商品怎样长大起来呢？就是作工时间内所造底价值、超过所得工银底价值。这一个生产方法发明之后、士农工商种种由分工而形成底社会阶级、完全打破、只剩下两个阶级、互相对立。一个管理全社会财产享用全社会财产底资本家阶级、一个是制造全社会财产底劳动者阶级。前一个阶级、就是萧伯纳所说的强盗阶级。这一个阶级在历史上的发展程序、就是如此。

中国本来是没有这一个阶级的。在欧美日本之经济的帝国主义、侵到中国来、以国家底威力、强迫着和中国人做交换。强迫着中国开放市场、消费他们那一种剩余生产品。强迫着中国人帮助他们制造资本家底特权、从此以后、中国才发生这一种阶级来。当时底政府、恐怕这个阶级不能马上成立、完全把中国市场、被外国商品占了去、于是乎鼓起爱国爱民底精神、想尽方法、奖励从前沉沦在“中国的第四阶级”里面底商人、使他们取得资本家阶级底地位、压迫从前“中国的第二第三阶级”、使他们取得“世界的第四阶级”的地位。

大家都做了中华民国底人民了。满清时候底历史、或许大家都忘记了。我现在且把满清光绪末代奖励商人取得掠夺阶级地位底历史讲一讲。

当时北京讲维新的满清政府、看见中国的商人狠〔很〕可怜、中国没有象外国那样的资本

家阶级——强盗——存在、于是乎发布一个“实业奖励法”来。这个法令的意思、和从前那个捐官章程是绝对不同。不单是不要商人捐钱、还要由政府拿从农人身上掠夺来底钱津贴他们。

奖官等级表

资本额（单位千圆）	工人数	官爵
二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等子爵
一八·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二等子爵
一六·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三等子爵
一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等男爵
一二·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二等男爵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三等男爵
八·〇〇〇	五〇〇	花翎三品卿
七·〇〇〇	五〇〇	三品卿
六·〇〇〇	五〇〇	花翎四品卿
五·〇〇〇	五〇〇	四品卿
四·〇〇〇	五〇〇	花翎五品卿
三·〇〇〇	五〇〇	五品卿
二·〇〇〇		四品卿衔
一·〇〇〇		同
八·〇〇〇		二品衔
五·〇〇〇		三品衔
四·〇〇〇		四品衔
三·〇〇〇		五品衔

从此一来之后，商业便成为社会上最有荣耀的职业、资本家便成了社会上最有荣耀的人了、民国以来、甚么嘉禾章、甚么勋位、资本家都有份了。从前做商人是为赚钱的、现在做商人便不是为赚钱、是为爱国了。国家主义的国家、也就从此形成了。同时强盗阶级之法律的道德的地位、也就形成了。

当革命底时候、这些资本家、也还受着一个大大地胁威。这个胁威是甚么呢？就是“被社会金钱压迫、失了职业、专靠腕力掠夺为生活底流氓土匪、和流氓土匪透过法律的形式、取得正当掠夺地位的兵”。但是他们到了这个时候、也有许多很大的桃花源、有很多靠得住的金库。这是甚么、就是在外国国旗下面底地方和银行。

现在渐渐地这些透过法律形式取得治者地位的流氓土匪头脑、受了好几年官僚和绅士的教育、〔一〕方面又渐渐地由刮削平民、和由商人征收保险费、发了大财、都可以加入资本家阶级做实际爱国者了。强盗阶级的完成、就在不远了。只要平平安安地、没有革命的乱子、中国也就可以快富强了。

（原载《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出版）

（选自《“一大”前后》〔一〕）

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

向警予

女子解放的问题，是新思潮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会改造的一个根本问题，所以，国内外凡带有新的精神，和新的色彩的出版物，没有不注意研究这个问题的。我们是女子，是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所以更应当特别注意各抒所见，常相研究，求得一个最好的结论。职是之故，我虽然学识肤浅，也不得不略陈一二敬求留心研究女子问题诸君的大教！

（一）先决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应朝个怎样的方向走。大凡一种改进运动，开首总苦不易寻个明确适当的方针，每每只得任用一般浑朴的趋向，边做边象。这在民智较低的社会，则一般浑朴的趋向，在改进运动里内，愈支持的久。若是历史上的教训渐多了，过去的经验丰富了，那么虽然不能寻个如日经天的方针，来做我们的指导，却是比较的可以朝一个较为明亮、较为的当的方向走。现在世界上各种试验过的制度与主义，不为不多了，我们覆按一下，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利害。然则我们女子解放，是应从旧家庭解放到新家庭去么？是应从个人苦痛的地位解放到个人快乐的地方去么？是应从家政的窟笼里解放去参猪仔代议政么？是应从附属的经济地位解放到个人的私有的经济独立么？据我看来，新家庭或者比较的是个安乐窟，但是我深信他不能解决女子的问题；至于个人快乐主义和私有财产制的好成绩，弄得世上大多数的平民要变畜牲了；而嫡派的代议制正是他们两的护符，所以现在掀天揭地的世界革命，就是革他们三位先生。虽然一时后说不定替代一种什么主义与制度，最为美善适宜，然而二十世纪的新人生观，是以社会主义的互助协进来替代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这是可以深信无疑的。将来社会的经济能否实行共产？固尚有待于研究，然而总是朝着这方面走，是可以相信的。至于将来政治方面如政权之应否存在？存在之度数若何？以及以何形式而存在？这尚是世界一个重要的问题。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吉尔特社会主义都尚在研究实验中，然而后来居上，比之现行的代议制总算是进步的。我们既挟雷霆万钧的大力，从事改进革新的运动，应当朝个较高的较进步的理想走。二十世纪以前的旧文明已经过去了，残败了，一点不能适用了，大家眼巴巴的一线希望就是二十世纪的新文明，我们女子的改进运动，也要能够与他并驾齐驱才好。然则中国现在的猪仔代议制和寄生的遗产制，我们应当要求他开开门容我们占个位置么？这真是应商榷的问题了。因此我对于广东女界要求参政权与分家权的运动，实在怀疑。在主张者的意思，大概以为欲谋女子解放与改造，须从教育平等与经济独立入手，然非女子自身操有立法权，则终恐难如所期，所以不得不从事参政运动，亦不可谓全无思虑全无计划。但据我看来，代议制本是中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现在又成了无产阶级的障碍，根本业已动摇，而况我国这种样式的猪仔代表制，我们还愿要求加入么？并且我国近来人才之不经济，实因群趋于臭肉的政治之上，男子因此尚不知受了多大的损失，难道我们也应踏他们的覆辙么？费了雷霆万钧之力，仍朝牛角尖里攒，真何苦呢？有的人说，现在政治方面虽卑污龌龊，何不可以改良他？这也是没有思虑，似是而非的说法，其实无论何事，说得上改良，总还有几分可取，现在的政治，你取他那一点来改

良呢？政治的作用及目的，本来是调节整理各部份相互的关系，使人人能得到均齐充量的发展与幸福，女子尽有可以研究参预的价值，可是现实的政治，资格太够不上了，我们有抱负的人还是干我们理想政治的生活罢。至于经济独立，为女子解放的惟一条件，在这时候，这层我是极表同意的。但是经济应该如何样的独立？要研究个适当的方法才是。我以为首先宜注意的，就是财产私有制应当存在不应当存在？财产私有制这位先生，是个人快乐主义孕育出来的，他是万恶之源，资本制度佣工制度都是由他派生的，无产阶级的生活，都被他剥夺尽了，幸福简直没有了。这种制度，在理不应存在，在势不能存在。试问分家权是不是这个制度下的东西？这种寄生生活，罪恶生活，即使我们争得了，有什么意味？我以为女子既是个人，即有销费，即当生产，为销费而生产，为生产而准备技能，组织团体，共同生活，实行互助，一方面为一般女子解决了各个生活的困难问题，他方面为全体社会建筑了共同生活的良好根基，寓经济独立于共同生活之中，这是较为的当妥善的方法，若乃旗旗号号的提倡个人经济的独立，为私有财产制扬波助焰，这不是解放女子，简直可说是替女子造孽障。至于个人快乐主义，在今日的伦理学上社会学上，都可以论证他没大价值。于是我请进而掊击新家庭，因为新家庭仍是女子完成男子的快乐主义啊，何以见得呢？家庭是以女治乎内为原则的，故家庭的中心人物即女子，家庭又是以男子为主体的，但他自己却并不来成，一切的事，概由女子处理，己则服务社会，惟居指挥使命的地位，所以女子在家庭服务，简直可说是受丈夫的委托做他家庭的常驻委员而替他专理衣食住养老育儿诸琐务。小家庭不过范围缩小点儿，实质却仍是一样。故家庭制度一日存在，即女子常驻委员的职任一日不能脱离，又那里能够在社会与男子同样活动呢？现在一般提倡新家庭的人，不啻又把女子送到一个新圈套里内去，这可算得真正解放吗？并且我们啧啧称羡的新家庭，就是欧美的旧家庭，看看欧美女子在社会的成绩，距离男子若是之远，这更是家庭牵累的真凭实据了。有的人说，新家庭是有新思想的男女构成的，他们两的结合一定是双方相互的真挚恋爱，事实上要分也分不开，自然会发生一个家庭的，并且他们既是有新思想的男女，必定富有做人的倾向；由男女两方面组织一个合意的家庭，于感情上的慰藉，学业上的互助，都是大有裨益的，尚有什么牵累可说呢？这种讲法，好象也有片面的理由，但在我是终不敢赞同的。怎么呢？因为一有了家庭，则衣食住育儿养老诸事必须连带发生（我国社会现在并无养老制度，虽是小家庭，当然要负养老的责任），纵令女子神通广大，也免不掉要减少社会方面的活动；并且堕性是人人有的，女子尤其是几千年来寄生惯了的，家庭存在，久而久之，受了男子的驯养，弄得不好，一定又要返本还原的。故我可以赤裸裸的这样说：家庭制度不完全打破，女子是终不会解放的。更进一层，我们可以讨论新家庭到底是与我们理想的社会更为接近些么？就新旧两家庭的内涵观之，旧家庭是拢总的，新家庭是分析的，旧家庭的苦痛和坏处，已不待说！不过他也有点子好处，就是反乎个人主义的共同和联带，而新家庭乃全是建筑于个人主义快乐主义之上。据我看来，那专以个人主义快乐主义为前提而图减轻自己的负担，我敢大胆武断他是堕性，是私心，不是向上的动机，我们的改造，当以社会人群全体的幸福做个目标，然后这个问题，才有研究的价值，故我以为旧家庭的基础固然是已经坍了的，而新家庭在我们的理想上，也无立足之余地了。至于家庭——旧家庭、新家庭——制度，完全破了的时候，养老育儿，以及各个人的衣食住，当然是社会的责任，应由社会全体共同组织，专门人才，协衷办理。比之各个自谋，日力、财力，都要经济些，而各个人所享的幸福，又比从前还要增

进些，这时候的女子才可算是真正解放。

（二）具体计划　我对于先决问题的意见，业已说过了，现在要讨论的，便是应该用些什么方法去做？质而言之，就是要以我们各个人的理想，共同商订一种具体的计划，然后大家按着这个计划，一步一步的进行，一点一滴的改造，才能日起有功，边做边象。这种具体计划，应基于现在一般女子的病症之上，现在女子的病症在那里呢？（一）一般女子，有觉悟的，究竟占极少数。（二）虽然觉悟了，而力能解决自己问题的，更占极少数。要诊第一个病，应从思想的启发入手，故研究宣传的工夫，是极不可少的。要诊第二个病，应从实际的运动入手，故组织团体的工夫，是极不可少的。我们的根本希望，固然是希望一般女子，各个自觉，各个自决，各个自动，然而在各个未能自觉，自决、自动之先，应得有几个发动的机关和实际的组织。于今把他写在下面：

（甲）组织研究与宣传的机关　自北大文化运动发端以来，国内新思潮勃兴，研究女子问题的，也一天天的增多，但可惜没有一处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机关，而与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女子，更是连散见于各报同各杂志的文章也没多发表，说来真正难过！象这种问题，实在应该有个专门研究的机关和出版物。什么缘故呢？因为这个问题，过于重大，内中所包含的个体问题，真是纠纷复杂得很，非设专门机关，集合人才专门研究，不能得其端绪，非有专门持久的出版物，不能见其效率。所以，近年来，女子解放，虽有不断的呼声，而醒来的，总祇限于最少数，就是这个原因。唉！现在世界的改造风潮，已经雷攻火闪地来了，我们大部份酣睡沉沉的女子，应该要催促他快些觉醒！快些准备！女子问题，固然就是人类的问题，但在我们女子的本身，更觉亲切些，故这些事，简单言之，就是少数觉悟女子的责任。所以我很希望这少数觉悟的同志，赶快起来，从事于集合的研究与宣传，组织个发动机关！但此事不在架空，而在求实，只要中间有三五个顶真的分子，也就可以抽出条理系统来。男子中不乏有思想有学识极真挚极诚恳的人，正好欢迎他们入会，藉收攻错之益，万不可存男女的成见，自划畛域。须知我们是诚诚恳恳的求解决人生问题，并不是与谁比长竞胜，我们女子处特别的境遇，进化迟点，能力弱点，这是必然的道理，无容为讳的，我们只有努力的奋进，不要褊隘的自封。

（乙）组织婚姻自决的同盟　婚姻能否自由，是女子能否解放的一个大关键。现在我国一般社会所通行的仍是捏合式的婚姻，腐败人格的婚姻。虽然有一部份人提倡自由恋爱，提倡自由结婚，然而终因旧社会的势力，支配压迫，行不起来，明知这是火坑，偏要一个个的朝那里内投去！但是别人虽送我们进火坑，也要我们自己肯进去，故这个问题，除开我自决外，实在没第二方法。只是个人力量，能不能够与恶社会反抗呢？湖南赵女士，广西李女士，他们两的痛史，就是我们的殷鉴了。因此，我们不能不结合拢来，实行团体的抵抗，所以婚姻自决的同盟，是刻不容缓的。我想这种组织，是我们青年女子切身的问题，谁不愿意呢？只要认清道理，放大胆子，马上就可以实行起来。小组织，大联合，仿照救国十人团的办法最善。有了团体，则个人的主张，可由团体向家庭通报，个人的意外，可由团体向家庭警告，个人至万不得已时，有了团体的帮助，必不至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自杀与投降的事，自然可以不再发生了，这是救人自救的唯一妙法。青年的同志呵，你要解决你自身的问题么？你想从事女子解放运动么？快些组织婚姻自决同盟！

（丙）组织儿童公育　延续人类，是女子的本能，也是女子的义务，故生育的事，是一般女子

所必不可免，而亦必不能免的。但有儿童牵累的女子，绝对不能解放，已解放的女子，绝对没时候去养育儿童，家庭既主张破除，儿童更不能不组织公育。并且儿童公育，确有许多好处：

第一，增加社会生产额　儿童公育则女子脱然一身，无所牵累，在社会工作的时间，自然增加，而社会的生产额，自然也同时增加。

第二，减少社会销费额　养育儿童，于儿童衣食住，游戏诱导各方面，都须有极精审的设备，极恳挚的看护，才能使天真活泼的儿童，日臻荣盛。各人自育，人力财力较之共育实多浪费，因为人力财力也有许多可以公共的地方，分之不能减少，合之不必加多的。例如儿童的看护，一个儿童少不得要一个人看护他，若是十个儿童在一起，这一个人看护也够了。假使把十个儿童分做十起，那岂不是要十个人看护么？其余的事，可以类推。儿童公育，人力财力，确要经济些。所以他第二桩好处就是减少社会的销费额。

第三，增高儿童的幸福　我国的儿童，真可怜极了！生在穷家小户里的，他的母亲自己并没受过教育的洗炼，什么叫做儿童心理？什么叫做儿童教育？什么叫做保育学？他一点也不知道，并且他一天到晚，奔走衣食去了，还有什么时候看顾他的儿童？至于游戏的场所，玩具的设备，不消说是一点没有，儿童不能行走的时候，不是把他丢在囚笼式的轿椅内，便把他捆猪样的绑在背上，儿童能够行走的时候，听他在市井内，打架骂娘，一日到晚。生在富有的人家，他的母亲，不是太太，便是奶奶，太太奶奶的知识，大多数也和穷家小户的女人一样，不过他多几个钱，不要忙生活，却又要忙游玩；打牌啰，看戏啰，修饰头脸啰，诸如此类的事，也把他闹个不了，所以他也没时候养育儿童，只好凭他的臭铜钱，多请些乳母，这乳母又有什么知识呢？至于曾受过教育的高等女子，他于儿童的养育，自然要比较的合法一点，但他又是社会需要的人才，虽然现在我国女子的社会方面，没多的活动，而从事教育事业的却也不少，所以他虽富有养育儿童的能力，而时间上精神上都支配不来，所以大多数也是请乳母的。据此看来，我国儿童都是这些无识无知的妇女保抱长养的，真可怜极了。我们从各方面观察，都觉得有组织儿童公育的必要。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组织儿童公育，必定选择那富于保育学识曾研究儿童心理，儿童教育的女子，来当保姆。对于儿童的衣食住，必力求精美而适合卫生，游戏场所以及一切恩物玩具，必当应有尽有，力求完备，这比较那家庭窟里，各养各的，实有天上人间之别了。所以说组织儿童公育，是增高儿童幸福的。但有一项顶要研究的，就是儿童初出母胎的第一年——哺乳的时候，是否应即送归公育？因为子离母体，其母体血液之一部份，即变化为乳汁，恰供哺儿之用，倘儿甫生出，就送归公育，则母体之乳，未被吮吸，辄变为毒汁，致生乳瘿等剧症，而呱呱之儿，又无乳可哺，乳母吗？那里找得出这多？并且社会进步，乳母的营业，一定会减少以至于零的。牛乳吗？他所含的养分到底和人乳是不是一样？这些都是困难的问题。据我个人的意见，儿童初生的第一年，应以母亲自乳为最宜，这种牵累，是无法解决，义不容辞的啊，然而比较没有儿童公育组织的时候，总要轻松了几倍。所以，儿童公育这件事，为已婚的女子解放起见，不能不从速组织，这也不是难为的事，只要上十个同志就可以倡办的。

（丁）组织女子教育经费借贷银行　男女应有平等的教育，这是中西同认的；中国女子的教育，应当提高，也是识者共许的。为什么呢？因为欲图社会的健全发展，不能不有个人的均齐培养。说到此点，我国现状，实在相差太远了，全国学校的数量，男的占最多数，女的占最少数。至于学生的名额，当然也就是这个比例，即以在法一部份的勤工俭学而言，男子

将近千人，女子仅十许人。这又如何能说教育平等呢？究竟女子中也有不少有志上进的人，但她们的地位，总不能与男子齐，欲求高尚的学问，常受金钱的限制，因此不知道糟蹋了若干英才，这是女子的不幸，也是社会的损失，须得想个方法补救才好。组织女子教育经费借贷的银行，借款助学，使女界中一般有志无力的穷措大，得有继续升学的机会，国内外的女学生必陡增数倍，女子教育的进步，也必陡增数倍，这是提高女子教育的一个最好方法。至于筹款一层，根据男女教育应平等的理由，国库省库县库学田等，都可提拨经费若干，作为常年津贴，余如向富室募捐华侨募捐，都是极有效力的。此外庚子退款，如果退还，我们更有较大的希望，要之这事不患不能成，只恐没人做。近年来，社会人士，对于提倡教育，造就人才这类事，多能尽力赞助。近闻郑毓秀女士回国，有遍游各省，物色女界人才，联袂来法，如系家出寒微，愿为筹款劝捐的意思，热忱卓识，令人钦佩。但愚见所及，与其为暂时的部份的临时募捐，无宁为长期的普遍的永久组织，故女子教育经费借贷银行，实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深愿国内有思想有能力的女子，与其从事于分家权的运动，不如从事这种运动为宜。

（戊）组织工读互助团

（己）组织合作社

（庚）组织新村

以上三种组织，或是国内已经举办的，或是国外已经实行的，他的内容组织在报章杂志内面，常有不断的记载，所以此处不必赘谈了。这种组织本来是一种实际革新的运动，他的本身，即有最大的价值，并不是达到一种什么东西的手段，我们为求理想社会的实现起见，应当从事这种组织。说到此处，我于要求职业解决这件事，也有点意见，要附带说说。职业所包含的范围很广，如政治、教育、工业、农业、商业等一概在内。政治方面已经说过了，教育方面，只问女子的能力如何，这条路是极公开的。至于其余的工业农业商业等职业，并未发达，而且有极强的垄断性，他不满人意的地方，实在多得很。我们与其为这些消极的，被动的，依傍的运动，不如直捷了当，从事一种积极的，自动的，独立的，可大可久，可以立己，可以立人的组织。就创作方面想，我们的光明路，实在多极了，所以职业的解放运动，我是认为不甚成问题的。

现在我对于女子解放改造的意见，业已说完了，另外还有几句话，做我这篇的结论。我以为我们的女子解放改造观并不止专射于一部份中国女子的身上；不过，我们是中国人，应把中国女子的解放改造，做个出发点。如果我国女子已进到解放之域，即当进而谋世界女子的解放，同时为人类的大解放，此即所谓世界改造。当帝政时代宪政时代，没有我们女子活动的影迹，我们也不必悔，不必恨！或者也是我们不幸中的大幸，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世纪的平民时代了，正是我们女子对于人类社会开始贡献的一个好发端，我们应该加倍的努力！我们翘首而望，固然是夜气沉沉，然而苏维也的政治不产生于英美德法，而独产于极端专制极端黑暗的俄罗斯，这不是过度压抑的反应么？我们虽然处于寂寞荒凉，晦盲否塞的境遇里，一面要与现状奋斗，一面又要创造未来，本来不是容易事。然而精神所到，何事不成，后来者居前，居前者落后。只须加倍努力，尽有可以乐观自慰的地方。深愿留心研究女子问题的诸君，将我这篇没思虑的发表，加以讨论。

一九二〇·五·二六巴黎

（《少年中国》1920年第2卷第2期）

论社会主义

恽代英

社会主义的一个名词，向来在中国是干犯法律骇人听闻的。其实许多人还没有明白社会主义是个甚么东西，中间包含几多派别，大家以讹传讹，便硬指一切暗杀革命是社会主义，一切社会主义是暗杀革命，因此一听见社会主义四个字，便联想到许多破坏事业的危险与恐怖起来。其实所谓社会主义这名词，本体便向来没有甚么很精确的界说。高到安那其布尔塞维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称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意义。我在这一篇中，不想把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派别与意义叙述出来，我宁想就我自己的意见，综括以叙社会主义应当的旨趣，供一般所谓社会主义者乃至非社会主义者的讨究。

除了迷信神权的学说以外，论到个人行动社会组织，大概可大分为有三种学说：一个人主义，二国家主义，三社会主义。

个人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以为宇宙间唯一的真实，只有个体的存在。其余一切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等等，都是为个体的利益而生。倘若不能为个体的利益，或反为他的祸害，那便他们都是谬误的组织与法式。总之，这是承认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得以个人为本位的。

国家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以为国家既是因人类的需要而自然产生，那便国家的存在，乃是争存的人类不可不十分珍护的。由这样推衍下去，因之他们主张国家有独立人格，是人类最终义务的对象，是可以违背大多数国民的意思以行他所谓有益国家的事的一个怪物。

社会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以为人类是共存的，社会是联带的。我们要求个人的幸福，必不可不求全人类的幸福。那便是说，只有人群，只有社会，是唯一的自然的实在，亦只有他配得上做宇宙间一切事物的中心。

但是社会主义不是从学理上产生的，是从事实上产生的；不是从知识上产生的，是从感情上产生的。依我的见解，历史本不定要随着物质变迁。但人类通常是浅见的惰性的，非受物质的驱策，不肯自动的有些改进。超物质的一二伟大的心灵，是历史上罕见的事；然而便令有几个非常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亦每不为囿于物质生活的群众所乐承受。因此所以理性的社会主义很不易于产生。现在的社会主义，初不过一般受掠夺者的阶级，因为得了许多不堪忍受的物质的痛苦，遂认识了地主资本家的罪恶，要求一个改善的法子罢了。群众的心理，易受感情的激发，难受理智的启示，这种浅见的感情的社会主义，不但易于提倡，而且易于传布。这样，所以理性的社会主义反得不着适当发展的机会。

依我的大胆，我要说现在的社会主义，仍旧可以分为三派：一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二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三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

先说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便是一般政治家所谓社会政策。他们一切对于社会的设施，全然以国家利益为着眼。所以他这并不是真诚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国家主义。因为他只要欺骗得社会，而无害于国家，他们必无惮于欺骗社会。

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通常不被人承认为社会主义之一种。还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主张利用国家的组织，以谋社会利益的，这便是通常所称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他们所主张，多近似政治家的社会政策，亦为一般自命为纯正社会主义者所唾弃。

但若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不配称为社会主义，那便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亦不配称为社会主义。然就我的偏见，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都几乎是以个人为本位的，都只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又是怎样说法呢？

现在所通行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有两种：一新村运动，一阶级革命运动。新村的运动，虽不纯然起原于寻求个人幸福的动机，但因为利己的本能得了个合宜孳生的场所，利他的本能因为遇不着适当的刺激，遂得不着适当的生长，所以精神每易太趋重了对内的完成，太疏忽了对外的发展。结果一部分的成功，无益于全世界的改造。而这一部分的生机，亦每为别部分恶势力所摧毁挫丧，不能继续存在。

许多反对个人主义的新村运动的人，都是主张个人主义的阶级革命的人。怎样说阶级革命是个人主义的呢？因为现在所通行的阶级革命学说，都只注意唤起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嫌怨，使劳动阶级为他个体的利益，联合，抗拒，奋斗。我信阶级革命的必要，与新村的必要一样真实。但我信这样的福音，只可从社会主义上宣传，不可从个人主义上宣传。我信人类的共存，社会的联带，本是无上真实的事。那便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因为人类只有知道人群的真意义，才能为社会福利去求社会的改进。这才可盼望是社会上长治久安之道。

人群的幸福，自然是要在每个人的努力。但这种努力，须以求社会福利为目标；他不应以求个人福利为目标，与不应以求国家福利为目标一样。因为国家固然不过是在某一种经济状态中人类因他的浅见所建设的一种经济组织，他本没有永久的真实的价值；至于个人，虽然粗忽看来，象是宇宙间唯一的真实，然而就生物学理上说，就经济状况上说，个人只是人群的一个分子，一个细胞。离了人群，个人不能生存，亦似乎没有生存的意义。说简直些，在我们所踪寻得的宇宙大法中，个体是为全类存在的，全类不是为个体存在的。这样，所以人群比个人在宇宙中更有个真实的地位。

若不是人类有了这样的社会自觉，每个人看他个体的利益，总会比人类全体的利益更重要。这样，将总不免于群己的利益上发生些冲突。虽然有些人想得个人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是并行的，是一致的，然而事实上这样的调协，实在有些是没有的事。所以要图世界的长治久安，必须使每个人看清社会福利的重要，每个人能抱着社会主义的精神，去做社会主义的运动。不然，便令资本家打倒了，人类各部分的利益，仍然得不着他的平衡，又要生出别的冲突来。

生物学理上告诉我们甚么呢？从细胞分裂的简单生物，一直到极复杂组织的人类，可以看出凡有生命的东西，都有几种特质。用生物学的名词说，一是化学组织，二是代谢作用，三是内长，四是分殖，五是适应。化学组织是生物躯体所由构成，与无生物一样，姑且不论。其余四桩可约而看出生物的两种特性：一是求生，一是传种。代谢作用，内长，适应，是为求生。分殖与适应，又是为传种。生物为甚么要求生？本是一个奇秘的事。这并不是出于个体的意识，乃是由于宇宙的安排。生物为甚么要传种？更是一个奇秘的事，而且更奇异的，生物的求生，便只是为的传种。昆虫多产卵即死，高等动物生命虽似较长，但亦以其第二代

发育期的长短，发育的难易，以为等差。又动物均天赋有爱第二代的天性。这种天性，在第二代最需帮助时最显现。这些地方，都可看出宇宙的法则，他只注意全类的生存，并不注意个体。个体的生存，说明白些，只是传种的一个必需的方法。由这看来，个人只是人群的一分子，人种绵延的一个阶段。许多人太看重了个人，以为人群的存在，只是为的个体的幸福。这使他错看了他个体在宇宙中真正的地位，把他放到人群上面去了。

我这样蔑视个体的说法，必定有许多人看了不高兴，其实我便是最不高兴这种说法的人。然而无奈这是不可争的事实。我的意思，常想假如真有个以万物为刍狗的上帝，他戏弄我们令我们勤劬一生不过只落得辛苦颠连，替他留下几个第二代开心的人类而死，那我必定要顺着他的安排？何不自杀？何不避孕？亦求他奸计无所施施。我不能信主持这宇宙法则的，定有个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我不能不信这里实在有如此如此的宇宙法则。至于自杀避孕呢，看来似乎极易做到的事；但是证之实地情形，这种与宇宙安排相反的行为，每每为贪生，怕死，遂性欲，爱后代的心理所胜过。总之，我们虽然在理论上没有甚么不应不遵守宇宙法则的理由，却在事实上有不能不遵守宇宙法则的状况，那便宇宙法则究竟是甚么样子，我们不可不注意研究，而且不可不遵循着他的轨道走。

我信生物学上这种法则，正如信一种神意。我以为个人的利己心，是自然的，是宇宙安排的。个人的利他心，亦是自然的，亦是宇宙安排的。宇宙安排，惟一的目的，只在求全人类的幸福。个人的生存，只是全人类生存的一种方法。个人的幸福，只是全人类幸福的一方面表现。凡损害全人类去谋个人利益的，心灵上每不平安，因为这个心灵，是与宇宙合一的。所追求的幸福，亦每得不着，因为宇宙的安排，若能令个人损害全人类而得着他小己的幸福，那便全人类将不能照他预定的轨道进行了。

从经济状况中，亦告诉了我们几件事。便是人类越进化，分工越精密。人类各部分相需为用的关系越密切重要。粗浅些的比方，不妨把人类社会比作一种有机体。譬如人的身体，便是无量细胞所组成。一处有些病痛，别处自然要去护卫。若不护卫，全身体各部分都会感得痛苦，设若每个细胞是每个人，他亦许如我们社会中浅见的人一样，以为别处细胞受了病痛，于我何干？这样将成个甚么景象呢？我们现在政治，教育，农，工，商，贾，各执一业，要求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已眼见是断不可能的事，那便个人主义在经济状况中，已失了他立脚的根据了。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交互错综，其实不但各业彼此之间是这样，一种实业其各部分亦是这样。马格斯派经济学者大呼说，私有制度破产了，因为私有工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这一样理由，我们亦可以大呼说，个人主义破产了，因为独立自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就生物学理说，社会主义是当然的。因为宇宙的大法是注重大群，不注重小己的；就经济状况说，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因为分工的结果，人类生活是互助共存的，不是独立自给的。这样可知所谓社会主义，不仅是劳工的不平之鸣，不仅是被掠夺者的企谋报复的举动。这是在学理上，事实上，有圆满根据的一种人的运动。

一切社会主义的运动，都须从这一点着眼，才可谓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人类若不知宇宙的大法，不知经济的趋势，徒然恃物质的逼迫去盲动，结果成甚么样子，还很难说。私产制所以发生，实系在共产时代以后。个人主义所以发生，实系在群居Horde时代以后。倘若我们说私产与个人主义是谬误，为甚么人类好端端的从共产群居陷于这种谬误的呢？依我的

相信，这无非物质的缺乏，使共产群居有些恐慌，人类因为他是浅见懒惰，不知全盘筹画，遂走人这种歧途。然而历史虽则经了几千万年，人类的浅见懒惰，大致并没有长进。今天凭着阶级战争的激励，资本家固然一定可以推翻，私有制固然一定可以打破，但是这种社会意识未经相当启迪的人类，是不是又会因一点恐慌，一点便宜，堕人几千年前人类祖宗的覆辙，这是谁敢担保的事？

人类若不是受了物质的限制，社会上不得发生这许多事变出来。最小限度的物质恐慌，是食料供给的缺乏。这大概是古代共产社会崩坏的大原因。我们若合全世界的生产同消费一计划，人类只须都有每日三四小时生产的工作，世界固不应有食料缺乏的忧虑；然而这不是全世界有个自治与互助的完密组织，亦不许说是太容易做到的事。以强力资本为根据的政府，不但无益于全人类，反因而加增了人类阶级界域的嫌隙，这固然是不宜存在。但是人类既然为他物质的限制，无论他愿意与否，有不可避免的工作。这工作的时间与方法，非受外界强力的支配，便至少要得他自己因社会的自觉大家契约的立一种规定。这样所以世界的未来，不应归于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乃应归于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

但是这中间并没有说现在社会主义的运动有甚么不应该。军国主义是应该打破的，因为国家是离间人与人的恶魔。资本主义是应该推倒的，因为资本家是以少数人利益荼毒大多数人的劫星。新村运动是应该的，因为这样可以制造出共存互助社会的雏形。工作时间的限制是应该的，因为这样可以于必要工作以外，多留时间使人自由活动，减少因分业愈精，而夷人类于机械的危险。然而总之这都是社会主义的运动，不是个人主义的运动。那便是说，这都是为社会福利而提倡的社会主义，不是为个人福利而提倡的社会主义。

若承认上面所说的话是不错，那便凡说社会主义的人，不可对于未来的世界存太多了无限的幻想，不要以为将来的世界真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人类一天不能超出于物质限制以外，一天少不了必要的工作，亦便一天少不了一个相互裁制的一种契约一种组织。我以为社会主义的旨趣应当如此。

这一篇不是读书的心得，只是由经验思考而得的一些教训。我想或者值得大家考虑。有些地方，我知道这里所说，与我从前所说相矛盾。但这，我信或者是进一步的觉悟。我很觉得谈社会主义是应该，太容易的谈社会主义是不应该。因为人性不是如我们理想的纯善。社会力的关系亦不是如我们理想的简单。要根本的为世界求个长治久安，必须看清社会的真性质，社会主义实际的必要，为社会福利主张，传播，实行社会主义。这是我自信的一点心得。但是请问读者，这里面有几多的可研究的价值呢？

（原载《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15日出版）

唯物史观在
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李 大 钊

“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Karl Marx和Friedrich Engels一八四八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见的。后来有四种名称，在学者间通用，都是指此法则的，即是：（1）“历史之唯物的概念”（“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2）“历史的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rerialism”），（3）“历史之经济的解释”（“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及（4）“经济的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在（1）、（2）两辞，泛称物质，殊与此说的真相不甚相符，因为此说只是历史之经济的解释，若以“物质”或“唯物”称之，则是凡基于物质的原因的变动，均应包括在内，例如历史上生物的考察，乃至因风土、气候、一时一地的动植物的影响所生的社会变动，均应论及了。第（4）一辞，在法兰西颇流行，以有倾于定命论宿命论之嫌，恐怕很有流弊。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一辞妥当些。Scligman曾有此主张，我亦认为合理，只以“唯物史观”一语，年来在论坛上流用较熟，故且仍之不易。

科学界过重分类的结果，几乎忘却他们只是一个全体的部分而轻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这种弊象，呈露已久了。近来思想界才发生一种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现在的事实，亦可以同样应用于过去的纪录。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从前把历史认作只是过去的政治，把政治的内容亦只解作宪法的和外交的关系。这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按着思想界的新倾向去观察，人类的历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政治的历史，不过是这个广大的活动的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社会生活的全体。以政治概括社会生活，乃是以一部分概括全体，陷于很大的误谬了。于此所发生的问题，就是在这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社会生活里，那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理由究竟为何？唯物史观解答这个问题，则谓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在社会的构造组织以内进动而受他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此种学说，发源于德，次及于意、俄、英、法等国。

唯物史观的名称意义，已知上述，现在要论他在史学上的价值了。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恁以为判断的事实。成绩的良否，全靠所据的事实确实与否和那所用的解释法适当与否。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学者，研究历史原因的

问题的人很少。他们多以为历史家的职分，不外叙述些政治上、外交上的史实，那以伟人说或时代天才说解释这些史实的，还算是深一层的研究。Lessing在他的“人类教育论”与Herder在他的“历史哲学概论”里所论述的，都过受神学观念的支配，很与思想界的新运动以阻力。象Herder这样的人，他在德国与Ferguson在苏格兰一样，可以说是近代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他的思想，犹且如此，其他更可知了。康德在他的“通史概论”里，早已窥见关于社会进化的近代学说，是Huxley与许多德国学者所公认的，然亦不能由当时的神学思想完全解放出来，而直为严正的科学的批评。到了Hegel的“历史哲学”，达于历史的唯心的解释的极点，但是Hegel限于“历史精神”观，于一般领会上究嫌过于暖昧，过于空虚。

有些主张宗教是进化的关键的人，用思想感情等名词解释历史的发长，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固然犹太教、儒教、回教、佛教、耶教等五大宗教的教义，曾与于人类进步以很深的影响，亦是不可争的事实，但是这种解释，末曾注意到与其把宗教看作原因，不如把他看作结果的道理，并且未曾研究同一宗教的保存何以常与他的信徒的环境上、性质上急遽的变动相适合的道理。这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就是Benjamin Kidd的修正学说，亦只有很少的信徒。

此外还有历史的政治的解释。其说可以溯源于Aristotle，有些公法学者右之。此派主张通全历史可以看出由君主制到贵族制、由贵族制到民主制的一定的运动，在理想上，在制度上，都有个由专制到自由之不断的进步。但是有许多哲学家，并Aristotle亦包在内，指出民主制有时亦弄到专制的地步，而且政治的变动，不是初级的现象，乃是次级的现象，拿那个本身是一结果的东西当作普遍的原因，仿佛是把车放在马前一样的倒置。

这些唯心的解释的企图，都一一的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

综观以上所举历史的解释方法，新旧之间截然不同。因历史事实的解释方法不同，从而历史的实质亦不同，从而及于读者的影响亦大不同。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史家的职分，就在买此辈权势阶级的欢心，好一点的，亦只在夸耀自国的尊荣。凡他所纪的事实，都是适合此等目的的，否则屏而不载，而解释此类事实，则全用神学的方法。此辈史家把所有表现于历史中特权阶级的全名表，都置于超自然的权力保护之下。所记载于历史的事变，无论是焚杀，是淫掠，是奸谋，是篡窃，都要归之于天命，夸之以神武，使读者认定无论他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艰难，都是命运的关系。只有祈祷天帝，希望将来，是慰藉目前痛苦的唯一方法。

这种历史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就是把个人的道德的势力，全弄到麻木不仁的状态。既已认定自己境遇的苦难，都是天命所确定的，都是超越自己所能辖治的范围以外的势力所左右的，那么以自己的努力企图自救，便是至极愚妄的事，只有出于忍受的一途，对于现存的秩序，不发生疑问，设若发生疑问，不但丧失了他现在的平安，并且丧失了他将来的快乐。他不但要服从，还要祈祷，还要在杀他的人的手上接吻。这个样子，那些永据高位握有权势的人，才能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权利，并且有增加这些权利的机会，而一般人民，将永沉在物质道德的卑屈地位。这种史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用此可使一般人民老老实实的听他们掠夺。

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而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这与特别事变、特别人物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时，亦是全体人民是要紧的，他不过是附随的。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最要紧的，是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

斯时人才看出他所生存的境遇，是基于能时时变动而且时时变动的原因；斯时人才看出那些变动，都是新知识施于实用的结果，就是由象他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新发明新发见的结果，这种观念给了很多的希望与勇气在他的身上；斯时人才看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的生物，他的生活只是一个忍耐的试验品，于什么人亦没有用处。现在他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了，他愿意知道关于生活的事实，什么是生活事实的意义，这些生活事实给进步以什么机会，他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这个观念，可以把他造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人，他才起首在生活中得了满足而能于社会有用。但是一个人生在思想感情都锢桎于古代神学的习惯的时代，要想思得个生活的新了解，那是万万不可能；青年男女，在这种教训之下，全麻痹了他们的意志，万不能发育实成。

这样看来，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一则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一则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一则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一则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这全因为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与变迁全为天意所存，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力所造，这种人类本身具有的动力可以在人类的需要中和那赖以满足需要的方法中认识出来。

有人说社会的进步，是基于人类的感情。此说乍看似与社会的进步是基于生产程序的变动的说相冲突，其实不然。因为除了需要的意识和满足需要的愉快，再没有感情，而生产程序之所以立，那是为满足构成人类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意识与满足感情需要的方法施用，只是在同联环中的不同步数罢了。

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

旧历史的纂著和他的教训的虚伪既是那样荒陋，并且那样明显，而于文化上又那样无力，除了少数在神学校的，几乎没有几多教授再作这种陈腐而且陋劣的事业了。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只有公立学校的初级史学教员，尚未觉察到这样程度的变动，因为在那里的教训，全为成见与习惯所拘束，那些教员又没有那样卓越的天才，足以激励他们文化进步上的自高心，而现今的公立学校又过受政治和教科书事务局的限制。

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紧要，我们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1920年12月1日

（《新青年》第8卷第4号）

署名：李大钊

社会革命底商榷

江　春①

一、时机的问题

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底呼声,在中国大陆一天一天的高了。有许多走狗学者也讲起社会主义来了。可是他们只是口头讲，心里未必赞成，也只是糊乱的讲，却未必十分懂，恐怕这班不久便会连口头赞成都要取消。他们不说中国人要准备知识，学会了社会主义，好行社会革命；便说要助长资本主义的发达好谈社会主义；这类的话，在最近的新闻杂志上，登载得非常的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最易淆惑人心。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不得不说几句话纠正他们，然后把我的主张写了出来，同大家讨论。

法兰西的大革命，在现代人心理中看起来，都说是发源于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可是我试问当时巴黎数十百万参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吗?俄罗斯的大革命,人都说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是我又问圣彼得堡莫斯科那无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吗?他们不过是受了当时绝大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总想打破现社会的压迫，脱离现政府的铁锁,就是他们想求生存求自由方行革命的。所以卢梭马克思的思想，人人头脑中都有的，不过首先被他们两人道破罢了。

社会构成的基础，成立在支持人类生活的物资生产和生产交换之上的。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简单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

“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懂社会主义的人，只说中国无地主无资本家，没有阶级的区别，不能倡社会革命。其实他们不过闭着两只眼说说罢了，中国的社会中何以没有阶级呢?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土无立锥”，这两句话不是说明中国贫富两阶级的悬隔吗?中国的田主佃户两阶级，自古以来就有的了。田主每日毫不劳力，专门掠取佃户劳力所得的结果，度最奢侈的生活。佃户无论如何含辛茹苦的劳动，他们的命运总是铸定的。他们每年劳苦所得的收获，要缴纳一半多给田主，年岁好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穿点仅仅冻不死的衣，吃点仅仅饿不死的饭，住点过风漏雨的屋。倘若年岁不好，他们不是冻死，就是饿死。每居凶荒他们之中冻死的饿死的何止数千百万。所以中国大多数做佃户的农民，从古以来，都在这种朝不保夕生活不安的状态之中，并没有得到丝毫幸福的。他们的苦痛，有眼的人都会看见的，用不着我来描写，可是一般人看惯了，觉得他们之中也还有饿不死冻不死的，殊不知离远一点看起来，就晓得佃户阶级的贫困了。

现在再就工业一方面说：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中国的工业虽不如欧美日本

① 即李达。

那样发达，却是在这产业革命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还要大。中国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对峙，在表面似乎与欧美日本不同，在实际上却无有不同的。

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资本家差不多都是欧洲人美洲人日本人一也有最少数的中国人在内。那些资本家所办的大工厂，都在欧美和日本一中国各大都市中也有几处。在那些工厂中做工的，都是欧美日本人，中国人得不到工做。那些大工厂中造出的商品，输入到中国来，中国的手工制造品，受了打击，不能和他们竞争，于是业手工的人，把自己的手工废了不做，到工厂中去做工，充机械的奴隶去了。还有更甚的，就是想充一个机器的奴隶犹不可得。所以多数的家庭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人，现在受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压迫，都变为失业的人，非饿死非冻死不可的了。这种缺陷在最开通的都市中，尤其容易看得出来的。所以中国是劳动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在这一方面说起来，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

中国田主佃户两阶级的分立，是固有的，现在受了产业革命的影响，又形成了资本劳动两阶级。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对抗越发显明，无产阶级的贫困增大，有产阶级的财富增加，社会革命的机会到了。

最近数年以来，中国的武人强盗，争权夺利连年打仗骚扰不已；川粤的高山踏成了平地；湘鄂的地皮铲出了赤土；直鲁豫晋陕甘的平原，变成了沙漠；无产阶级冻死饿死的何止数千百万，农业的工业的小生产机关，毁破了的何止数千百万；武人强盗助国际资本阶级，驱逐了中国旧有的生产机关，武人强盗掠夺搜括我们的手段，一天一天的恶辣，国际资本阶级的侵夺和压迫，也跟着一步一步的厉害。

中国的无产阶级呵！我们受了武人强盗经济上政治上的掠夺和压迫犹不算数，还要受国际资本阶级经济上政治上掠夺和压迫，我们果能得了丝毫平等和自由没有？民主主义破产了！我们的希望成了一个空，我们求生存求自由吗？我们应该怎样做？

二、生产和分配

现社会推倒之后，新社会中怎样生产怎样分配呢？这是一件最紧要的事情，首先要研究的。

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主张复杂。我趁先提出两个主潮，就是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个主潮，就是在生产和分配的法则上分别的。

先就生产组织说：共产主义的生产组织是集中的，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是分散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主张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归中央管理，有时因生产机关的种类不同，或移归地方管理。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却不然，主张破坏中央的权力，要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在这种地方看起来，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倚赖中央的权力不可。我们可以拿现时的资本制度作比，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是无政府的状态，讲自由竞争，对于生产力绝对不保持平均，供给与需要不能相应，资本家专顾投机，增加生产力，谋生产多量的商品，一时需要减少，生产过剩，其结果资本家别谋妙法填补，而劳动

者却因此受了恐慌的影响，招来失业的苦痛。这就是资本主义产业组织不受政治力支配的恶结果。所以无政府主义派主张的生产组织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差不多，若一地方或一职业的生产力供过于求，他地方或他职业的生产求过于供，就不能使他保持平均了，供给与需要不能相应，岂不是生产组织的混乱状态么？

生产的目的在供给社会全体的消费，并不是生了产就完了的。所以由这种意味说起来，新社会的生产组织，非有中央权力去干涉不可，各地方的各职业的单位非绝对服从中央权力不可。无政府派不主张有集中的权力，那么生产力怎能调剂呢？社会各员的消费生活不是有受侵害的危险吗？所以我是主张共产主义派的生产组织的。

其次研究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自由平等为根据。可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分配制度对于自由平等很有不同的地方。分配制度分收入和消费两项，共产主义主张用一种方法调剂各个人的收入，用货币经济，借助货币的形式，分配生产物。各人消费的物资有一定的限制，不得超过自己收入所得的价值。消费的时候，各人必须支出自己收入所得的一部分，所以各种物资都须依一定的价值单位定一个价格。无政府主义的分配制度则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原则，全不调剂各人的收入，并且也没有收入不收入那种观念，只是调剂各人的消费，甚至连消费都不调节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是在分配上主张平等的，不过共产主义的平等关于收入，无政府主义的平等关于直接消费，可是两者之中，更有一个区别。

先就无政府主义说，卞倍巴布福等一派人主张分配底客观的平等，说各个人在年龄男女的限界内，应当分受同质同量的物资。福里耶克鲁泡特金一派人主张分配底主观的平等，即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两种主张，在我看起来都有些不妥。客观的消费平等的主张，未免蔑视各人的个性，阻碍各人的自由。又使消费的自由都得平等的主张，由正义自由平等的见地说起来似乎可行，可是非待世界的产业发达到极境的时候，不能办到。譬如今日行了社会革命明日组织新社会，而新社会都是继承旧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这生产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物当然也有限制了，以这有限制的生产，听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若果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只是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

再就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说，生产力既有制限，生产出来的物质当然也有制限，我们分配这有限的物质要求其平等，就不可不行使货币经济，对于各人所收入的货币额加以制限。还有一事，物质的价格不可不用一个标准来测定他，生产物对于需要的关系，若其分量比较的多，则定价从廉，否则定价从高。照这样办起来，那么在人类的道德程度没有达到至圣至神的地位时，对于有限的生产物要行公平的分配，再没有比这种制度还好的了。所以我是主张采用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的。

三、革命的手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说：劳动阶级的革命，第一步在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手里，

即是集中在组成支配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于是全部生产力就可用大速度增加起来了，……若照这样的发达起来，阶级的差别自然消灭，全部的生产，必然集在全国民底大联合的手中，公的权力自然失掉政治的性质。政治力本来是一阶级压服从他阶级的一种组织力。无产阶级若和资本阶级战斗，迫不得已，自己不得不组织一个阶级，用革命的手段，把自己造成一个支配阶级，并且用权力扫除旧生产条件，于是阶级对抗的存在和一切阶级的自身都要扫除的，于是无产阶级的优越权也是要废除的。

社会革命底目的，在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旧社会中有拥着生产机关的资本阶级，有特权阶级，有缺乏衣食住的资料而为他资本阶级所利用的劳动阶级。新社会中，没有资本阶级也没有劳动阶级，也没有特权阶级，生产机关为真正的生活机关，为社会全体的所共有个人和全体都能够自由发达。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概括的说起来，就是厉行非妥协的阶级斗争，以下专就具体的手段讨论一个大概。

社会革命底具体的手段大约可分数种：一、议会政策。二、工会运动。三、直接行动。议会政策的手段，是主张劳动者组织团体为参政的运动，劳动者要选议员，送到国会或地方议会去，参加立法的机关。这些代表劳动者的议员，可以在国会或地方议会提出改善劳动状态或抑制资本阶级的法案，务期循序渐进，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德英美等国社会党，多采取这种议会政策作为社会革命的手段。可是理想与事实相反，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在现社会组织之下资本阶级的势力最大，议会中的议员属于资本阶级的必然占绝对大多数，议会中通过法案是用多数表决的；劳动阶级没有金钱运动，得几名议员已不容易了，而今有几名劳动阶级的议员提出来的法案，当然要陷于否决的命运。所以无产阶级的议员要想在议会中成立一种除去自己阶级痛苦的法案，是断然办不到的。这时候就是不唱高调只求贯彻自己阶级的几分之一的主张，非与资本阶级妥协不可，非得资本阶级的同意不可。照这样成立出来的法案，无非哀求资本阶级政府行非驴非马的社会政策。社会革命的目的，简直成了一种空想。现在有一般承袭德国社会民主党旧计的人，主张无产阶级要求普通选举，这件事本可以网罗大多数无产阶级的人，加入这种运动，可是这也是难得好效果的。依照各国的先例看起来，大凡最初运动普通选举的时候，资本阶级的现政府，是决不许可的，不说人民"程度未齐"便说"时机尚早"，平民只管请愿，资本阶级的政府是不睬的。这时候若果无产阶级能够真正有觉悟，一致结合起来，举行示威运动，使政府晓得他们的力量，政府若依然顽迷不悟，无产阶级就可借口争自由争平等，或者可以革起命来。可是有一层，假若资本家政府能够见机行事，于革命未暴发以前，实行普通选举，那么，到这时候，无产阶级就没有口实可借了。结果又怎样呢？不过无产阶级能够选出几名议员送到国会中和资本阶级妥协，立几条使政府行社会政策的法案就完事了。要求政府行使社会政策，与要求资本家倡办慈善事业，究有何种区别呢？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个先例。

其次研究工会运动的得失，工会运动是劳动者想借团体的力量谋劳动阶级的解放的一种手段。其内容大概可分两种：第一种是改良的，是社会政策的，采用阶级调和主义的手段，承认现制度，谋劳动阶级地位的向上。第二种是革命的，是社会主义的，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改造现制度，创立劳动者本位的社会的。工会运动的武器就是同盟罢工。可是同盟罢工之中也有许多区别：第一种所行的同盟罢工，在要求改善劳动的条件。第二种所行的同盟罢工，其目的不在改善劳动条件，而在真实的解放劳动阶级绝灭劳动阶级对资本阶级的关

系。

同盟罢工底性质，有经济的，有政治的，有社会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底目的，是劳动者利用产业上的地位，在政治上贯彻一定的目的，如扩张选举权，要求立法部通过一定的法律之类。可是这种罢工在原则上是承认现社会制度的经济组织的，只可当作劳动阶级一种示威运动的手段，若想利用他行社会革命是办不到的。

经济的总同盟罢工，其目的一般在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工资，与现在社会的经济组织，并无何种关系，决不能当作社会革命的手段。

社会的总同盟罢工，其性质与前二者大不相同，其目的在推倒资本本位的现社会制度，创设新社会的。这种是很彻底的，这种罢工的动机有主张借用一种特别的事故使全劳动阶级突然罢工，使资本阶级手足无措，乘机扑灭资本阶级从新建设无阶级的新社会，这种主张是很对的。又有主张使一般劳动者受适当的教育和训练，准备待时而发，这种主张是难于实现的。一般劳动者既有这种教育和训练，其结果当然新社会要实现的，不过百年河清难待罢了。此外还有一种理想，最初由各地方全劳动阶级举行总同盟罢工，推而至于全国劳动阶级举行总同盟罢工，再推而至于全世界的劳动阶级举行总同盟罢工，到这时候全世界的资本阶级都要铲除了。这种理想，固然是好，恐怕非同时所能办到的，所以也只能作为一种理想罢了。

由以上的研究，归结到中国的劳动界来。中国是劳动过剩的国家，大多数都是失业者，所以中国的工会运动，是不易行的。工会运动要依那一国家那一地方的经济状态为转移，假如某一地方的经济发达，工厂办得多，劳动者都有工作，这时候劳动者很可以行工会运动和资本阶级奋斗的。可是经济界不发达的地方，劳动者失业的多，要求一个卖劳力换饭吃的地方都不能得，那能够举行罢工惹起失业的危险呢？不说远了，就把日本作比，去年日本经济兴旺的时候，罢工的运动，非常流行，到今年经济恐慌的时候，工厂倒闭的非常之多，劳动界失业的不下数十百万，罢工的运动，差不多断了影子。中国的工厂本是少，而劳动者无工作，与日本劳动者失了业的是一样。所以中国多数无产阶级都是失了业的劳动者，所以社会运动在现在的中国，是不容易发达的。可是也有一种事要注意的，我们虽不能全靠工会运动行社会革命，而为增加阶级斗争的速度起见，劳动界却不能不结合一种团体和资本阶级对抗，所以工会还是要从速组织积极进行的。工会组织之后，然后开始和工会以外的无产阶级极力结合，等候时机到来，好和资本阶级开战。

直接行动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最有效力的手段，要仔细讨论的。阶级斗争的手段，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为好。无产阶级，包括最广，所以革命运动，非网罗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在内不可。参加运动的人越多，力量越大，运动越猛烈，奏效越迅速。我很主张无产阶级为突发的群众运动。譬如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国地方自治团在巴黎干的猛烈运动，一九〇四年意大利工人干的突然发生的大运动，一九一七年俄国无产阶级在圣彼得堡干的大示威运动，一九一八年八月，日本无产阶级干的米荒骚乱，都是很有效力的。中国“五四”“六三”两大运动在形式上也是有力量的，可惜他们走错了方面。又今年北方八省无数千万的饥民，若果自己不甘冻死不甘饿死，一致起来把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打破了，也是狠好的。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混乱恐慌，达到极点，社会上的大缺陷，随时暴露出来，可乘的机会很多。所以我主张我们要在各大部会，结合工人农民兵士及他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组织一个大团体，利用机会，猛然的干起大规模的运动来，把那地方的政治力，夺在我们手中，凭着政治上的

势力，实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完全管理社会中经济的事业。所以这种直接行动，可以称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

此外还有相辅而行的手段，就是宣传。宣传的办法，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总要普遍，要能激动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敌忾心，亦能发生效力。

现在我简单的说几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论：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说，社会革命在资本制度发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自然要实现的；然而也可以用他种人为势力——非妥协的阶级斗争——促进他的速度。英美的资本制度比俄国的要发达得十数倍；英美两国的工会，比俄国的也要发达得十数倍，何以社会革命不在英美两国发生，反在俄国实现呢？这就是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实行的力量比英美两国的大的原故。所以我国在中国运动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去做。

（原载《共产党》第2号，1920年12月7日出版）

告中国的农民

（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①。）

是免不掉的。阶级的自觉(the consciousness of class)，也是利害关系，完全一致的人群之间的自然的趋势。就是从外面没有第三者来鼓吹，他们早晚总有从内部自己发现的一天。而阶级斗争（the struggle of class）也是两群利害不一致的人，到利害冲突，达了极点；被支配方面的痛苦，到了十分的时候必然发生的自然结果。上面述了三种趋势，无论你愿意不愿意，他既然有了利害不一致这种原动力，是自然要发生的。不过若是只听他底自然的进化（evolution），时间上就要慢得点，若是因为他既有了这种趋势，而再加以人为的革进（re-volution）来促进他，就要发现得快一点。中国农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所以他们既有了这种趋势，我们与其听他自然地慢慢进化，不如用点人为的方法来促进他，使他们早有一天阶级自觉，早免一天痛苦。而要促进他们这种趋势，就是设法向他们宣传了。

三

有人说中国农民底生活，并不是痛苦的，也不是受十分压制的。因为所谓农民，都是自己有着田地，自己耕种的，并不是单靠着耕人家底田而谋生的。就是耕人家底田，而所得的生产物底分配，乃是平分的，所以也没有甚么分配不平均。既然这样，你就向他们去宣传，也断不能促进他们底自觉，这话都不然。我现在只要把农民底状况记述出来，就可证明这一说底理由不充足了。不过我现在记述的农民状况，是就我住的那一县和附近的各县底状况而论的。我想就以此推想全国，也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

一、农民自身里面的阶级　有人说中国底农民，都是各有土地的，这句话是有一部分确实的，然而未免太笼统了。一家三人，所有千亩田，算是所有土地；一家十口人，所有一亩田，也不能不算是所有土地。然而你能以这样的所有，就说农民之间，生活都是一样，没有甚么特别的痛苦吗？设若细细地考察起来，就可知农民自身内面，也有几层阶级：（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一种人本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底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底土地之外，租人家底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土地底出产，决不能养活全家的。所以不得不靠着耕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一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就是最穷的农民了。上述四种里面，以第三种和第四种的人数为最多。第一种当然是少的，第二种也是很少。第一二种底生活，是丰衣足食的，不是我们问题底目的物。我们底目的物，乃是占农民全数内面的大多数的第

① 第一面被当时法租界巡捕房没收，故缺。

三四种农民。第四种农民底苦况，简直是非常厉害，每天到晚，每年到头地苦作，还不够穿衣吃饭，一遇年岁不好，田主顽强（分配底方法，后面详说）的时候，就差不多要饿死。所以这种农民底生活，是非常困苦的。第三种农民，虽然自己有一点田地，还耕一点人家的田，然而因为生活程度日高，不是东挪西扯地来借贷，也是不能维持全家生活的。所以每到收谷的时候，谷总不能全数运到家里来，直接运往债主家里去还帐，或还利息去了。因为这种原因，自己所有的一点田，也不得不渐渐卖或当给"土财主"或中等农民，（在后面田地集中里面详说）而堕为第四种农民了。所以他们底生活也是极困苦的。

照这样看起来，可见得大多数农民底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只拿着农民都是自己有田地这句话，说农民底生活都没有甚么困苦的先生们，简直是瞎说。这和说劳动者是和资本家同样地有收入，他底生活是不困难的是一样的胡闹。

二、佃户和田主间的分配方法　有人说佃户和田主之间的出产分配法，是以二除，各占一半的，所以这种分配，没有甚么不平均。其实不然，象这样的分配法，行得非常之少，十分之九是行我们乡下叫做"认谷"的方法的，"认谷"就是譬如某丘田相传出十石谷，田主就认要六石。无论该田所出的实际出产，不能十石，或超过十石，田主都不管，他只是认要六石。因为这样办，于田主有两种便宜。（一）可以省多雇用人。因为设若是照实际的出产平分，田主必于每佃户收谷时，派人去田里当场监督，以免佃户虚报。而"土财主"所有的土地很多，甚至于百里以外都有他底田地。所以于收谷时，他不得不雇一群平日他信赖的人，分向各地监督；甚有雇几十人或百人的。所以田主方面，非常麻烦，且费用也很大。又如百里以外，要派人去监督，也是件很烦难的事。他因为要节省用费和免除烦难，所以简洁了当地每丘田指定认谷若干，自己坐在家里，一点事不做，等着佃户恭恭敬敬地送上门来。（二）田主既然认定了要多少租，他就不至于因年岁不好，减少他底收入。因为有这两种原因，所以田主大概都是"认谷"，很少和佃户均分的。然而这种"认谷"的方法，对于佃户有利益没有？这是于他们决无利益的！有人必定以为设若佃户好好耕作，出得十石谷的田，使他能出十石多，那末，这种超过指定数目的出产，归他专有，田主不能来分，这不是他底利益吗？这纯粹是理想的空谈，设若实地调查一下，就可知他底结果，适得其反。原来规定某丘田能出多少谷的标准，不知道以几百千年以前某一岁有了特别的丰收，就以这一年底出产为标准规定某丘田出谷若干的。其实以后实际的出产，不但没有超过原定的数目，大多数反是不足原定的数目的。我小时在家里，看见我家里有的一点田，无论那一丘田每年底出产都没有达到原定的数目的。心里就疑是请的人没有好好地耕种。后来向各处一问，大概都是这样。所以其名说某丘田能出若干，其实不能出这样多。那末，佃户就要因此受恶影响了。譬如他租田主底一丘田，其名说是每年可收十石谷，田主认六石，他自己就可得四石。其实年岁好时，也只能收得八九石，除了应缴给田主的以外，自己只能得两三石。然而这两三石，也不是白得的；人工，肥料一切东西，都是出在这两三石内面的。试问除了人工，肥料底费用以外，能够赚得多少？所以就是好年岁，他们底生活也是困难的。一遇年岁不好，所收的谷只有六七石，那就不但没有赚的，并且还要贴本了。然而田主他是不管的，他认定某十石谷的田要六石租，就硬要六石。无论你只收得六石或七石，他这个六石是一粒都不能少的。设若佃户不照数缴清，他就把田收回，租给别人耕种。所以佃户无论自己怎样赔本，怎样挨饿，都不得不上天入地总先设法把田主底租缴清，以保下年的饭碗。这种痛苦，非生长在乡下，与农民

接触得久的人，绝对是不知道的。所以一般农民底生活困苦，简直是形容都形容不出来的。说佃户和田主之间的分配平均，所以说农民底生活不困苦的人，也是瞎说。

三、土地集中的倾向　工业上资本集中的原则，就是在农业上也不能逃掉的。在工业方面，有资本集中的趋势，在农业方面则有土地集中的趋势。照前述田主和佃户之间的分配法来看，第四种农民固然是非常困苦的。就是自己有着一点土地，而租别人底田耕种的第三种农民，又何尝不是这样？近年来生活程度一天高似一天，年岁又没有甚么好的。他们内里，则要养活全家，外面则要缴清田主底租。所以只靠田里的生产，决不能一年维持下去。那末，借贷呀，当田呀，卖田呀，就是他们暂时糊口的方法了。他们并不是不知这样"牵萝补屋，剜肉医疮"的方法不是可以永久的。然而不这样做，一家人就会要即刻饿死，田主把田一收回去，他们就要失掉谋生的路。他们因为要求田主不夺去他们底饭碗；要暂时维持生活，就不得不把自己底一点田，当或卖给田主了。所以田主就慢慢地把这些分散的，零碎的小所有地，吸收起来；而第三种下级农民，就堕落为第四种最穷的农民了。他底结果，就是所有大土地的人数越少，没有插针的地的人数越多。一地方底土地，都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而大多农民底日常生活，运命，生命都悬于这些少数人之手了。这就是社会上贫富的悬隔越甚，阶级底区分越明，一般农民底生活越苦的原因了。

综观上述，可见中国农民困苦，并不减革命前俄国底农民的。他们底怨气，已弥漫天地，象萍乡今年的事，不过是充满宇宙的怨气，才发泄一道出来罢。他们一时爆发的时期，已是不远了。然而从别一方面看，萍乡今年这件事，也是中国农民觉悟的一点曙光。他们这次的举动，范围虽小，然而正如昏天黑地之中，东方现出一线曙光是一样的。有了这道曙光，青天白日就要随着来的。谁说他们不能觉悟？谁说我们去宣传，他们不肯来听？同志们呀！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这种自觉呀！

四

可怜的贫穷农民呀！你们要知道我们人类，从娘肚里一生出来，都是平等的。从娘肚里一生出来，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地应该做工。为甚么他们一生出来，就应该一点工夫都不做，坐着吃好的，穿好的；你们一生出来就应该象牛马一样地做工，倒反要挨冷挨饿呢？这并不是你们底运气不好，他们底运气好。世界上没有甚么叫做运气的，没有甚么叫做天命的。都是少数自私自利的人，做出来的恶制度。本来是世界上的一块大土地，大家都可以共用的，偏要分开起来，指定那一块是张的，这一块是李的，弄得现在这样一方面有少数吃肉穿绸的人，一方面有大多数挨饿挨冷的人的样子。你们不要埋怨自己底命运不好，你们只要埋怨现在的制度不好。你们想一想我们应该大家共有的土地，为甚么少数的人，硬要说是他们的？他们所有的土地，是从他们娘肚子里搬起来的吗？是他们用自己底力，把大海填平起来得的吗？不是！不是！这是大家应该共有的。这是他们从你们底手里抢去的。你们要快起来抢回来呀！设若有个强盗，把你们底一件衣抢去了，你们一定要设法抢回来的。难道他们把你们靠着吃饭的田地抢去了，你们反甘心不抢回来吗？

但是要抢回来，全靠你们自己动手的。专靠人家来救你们，是靠不住的。设若你们自己不动手，人家就想来帮你们，也是不好帮的。你们不要说你们没有力量，你们底力比甚么还要大，你们只要学萍乡底农民一样，大家集合起来；设若田主压迫你们；你们就大家一齐不

耕种，看他们吃甚么？要饿死大家都饿死；要吃饭大家都吃饭；要做工大家都做工。你们却不要做看着人家吃饭，享福；你们自己却挨饿，做工这种的蠢事。你们自己快起来抢回你们被抢的东西，你们一起来，自然有共产主义来帮你们的忙的。共产主义就是要人人一样地有饭吃，一样地有工做。决不象你们现在这样，只是做工，没有饭吃。所以你们若都照着萍乡底乡民这样行动，共产主义就能使你们脱出一切的痛苦；使你们享没有享过的福。可怜的穷苦农民呀！你们快起来抢回你们被抢的田地呵！

（原载《共产党》第8号，1920年12月23日出版）

马 克 思 还 原

李 达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了。可是还有许多人正在那里怀疑，实在有替他们解释的必要，所以特意的写点出来看看。

这篇文字的大意，第一要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其次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堕落的原因和历史，末了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复活的事实，使世人了解真正的马克思。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最难于简单的答复，可是这里也为省篇幅起见，特就马克思所述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及其理想中的社会，列举大概如下：

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

二，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资本家利用收集生产物的剩余价值，坐致巨富，劳动者仅赖工钱以谋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遂划分社会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

三，人类的历史是阶级争斗的历史。资本制度发展到了一定阶级〔段〕，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就与少数的有产阶级互相对峙起来。劳动者发生阶级的心理与阶级的自觉，互相联合组成一大阶级，与有产阶级为猛烈的争斗。

四，资本主义跋扈，渐带国际的倾向，而无产阶级的作战，亦趋于国际的团结。于是全世界一切掠夺，压迫，阶级制度，阶级斗争，若不完全歼灭，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无产阶级，不能从施压迫施掠夺的有产阶级完全解放。

五，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六，无产阶级借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

七，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若无产阶级专政，完全管理社会经济事业，把生产工具变为国家公产以后，则劳动阶级的利益，成为社会全体的利益，就没有奴隶制度，没有阶级差别，生产力完全发达，人人皆得自由发展。国家这种东西自然消灭，自由的社会自然实现了。

以上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概观。综合起来说，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这就可以明白了。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

马克思是理论家又是实行家，实具有二重资格。学者的马克思与实际运动家的马克思或不免略有出人的地方，马克思的门徒就因为这种关系，发生了许多误会出来。固守师说的人

则拘泥不化，自作聪明的人就妄加修改，把一个马克思的真面目弄湮没了。什么正统派修正派也就发生了。

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堕落，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一是从实际的方面的说明；一是从理论的方面的说明。

马克思社会主义在德国本不甚流行，可是现在一般的论者，却多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代表。所以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堕落的原因，无论如何，非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本体及变态不可。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马克思派的国际劳动协会和拉塞尔派的德国劳动协会并合而成的。当时马克思派以威廉里布克勒为代表，他们最初标榜纯马克思主义。对于拉塞尔派的国家主义，带有国际主义的色彩。所以社会主义的政策，从理论上说，马克思派较为彻底，可是从当时的实际问题上说，拉塞尔派反占有力的地位。再严格的说，拉塞尔派并不能称为社会党，只可称为自由党，他们承认国家承认战争承认国家的活动。而当时马克思派的主张却与此完全相反对的。可是德国民族有崇拜国家万能的根性，所以为时不久，马克思派所信奉的主义就渐呈变态了。拉塞尔派主张经济改善，须俟政治改善，以为一切社会改革非行普通选举使全体人民参政不可，所以要纠合全国无产阶级组织一个大政党。马克思派本来标榜彻底的主义，可是到了一八六九年，马克思派的国际劳动协会，组织了民主劳动党，以实现所谓自由民国为标帜。而实现这自由民国的手段，则以获得政治的自由为政纲，说政治的自由是经济的自由的基础，所以也主张行直接的普通选举。到这时候，民主劳动党所标举的政纲，已极其保守，与拉塞尔派极相接近，马克思派国际主义，鉴于周围的形势已经放弃了。两派既无根本不同之处，而合同之机运已到。所以两派于一八七五年在哥达合并，而社会民主劳动党于是产生了。当时该党在哥达所订的政纲，在理论上虽采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而在实际政策上则采用拉塞尔派的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协和主义了。国际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派互相提携结为一党，实是一种变态。这是马克思主义堕落的第一步。

社会民主劳动党自经俾士麦施镇压令以后，该党颇受挫折，且因受当时社会状态的影响，于是理论上与政策上的见地，于有形无形中发生变化，把该党一八九一年爱尔弗尔特政纲一看，就可知道的。该党在理论上原来反对议会政策的，从前党员被选为议员出席国会的时候，常有一种标语说，“我们到议会非参与立法事宜，乃是妨害议场并宣传主义的。”又说，“我们不是赞成资本阶级的立法，不是卖同志。”所以他们虽然做国会议员，口头上还有几分强硬态度。可是自一八九〇年以后，该党不称“社会民主劳动党”，改称“社会民主党”，表明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简直要与权力阶级妥协了。威廉里布克勒简直承认了议会政策。他说：“主义与战术有别，我在一八六九年本反对过议会政策的，可是在今日则事实与前大变了。”于是从前反对预算，关税，立法，军备，殖民政策的，此时却不惜加以协赞了，帝国议会书记八名中也有一名的社会党员加入了，社会党自己也提出法案了。兵士增饷的法案，施行社会政策的法案，责任内阁的法案，保险官办的法案等等，或径由该党提出，或加以协赞了。从前主张阶级斗争，此时主张阶级调和，从前反对议会政策，现在反赞成议会政策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堕落的第二步。

其次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变态及堕落更堪注意的，就是该党对于战争的态度。社会民主党本来极力反对战争的。因为国际战争是资本阶级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是资本阶级利益的冲

突，劳动者是没有祖国的，国家虽亡，而劳动者除失掉铁锁以外并无他种损失的。劳动者若承认资本阶级国际的战争，就是承认资本主义，所以社会党是根本的绝对的反对战争的。可是由国际主义变而为国家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对于战争的态度也改变了。一九〇七年贝贝尔在帝国议会的演说，说明对于战争应取的态度，他说："本国侵略他国的战争，本可反对，若本国受他国的侵略则须应战"，是已明白承认了战争了。这种主张，支配了社会民主党大多数人的心理，直至此次欧洲大战发生的时候，该党党员因此大中其毒。在欧战将开始的时候，该党犹装腔作势，极力非战，言论鼓吹，不遗余力，可是战争开始以来，该党的态度就大变了。战费案也协赞了，党员也从军了，并且人人都努力为国牺牲，好象殉教者一般。昨日的社会党，今日已成了国民党自由党了。欧战五年间，德国除加尔里布克勒、连休修达、哈艮三人及卢森布尔克、泽特金二女士外，差不多没有社会主义者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至此时已完全消失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堕落的第三步。

由以上所述考察起来，马克思社会主义，经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主义，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由直接行动堕落到议会主义，马克思的真面目被威廉里布克勒、贝贝尔、柏伦斯泰因、柯兹基一流人湮灭殆尽了。

这是从实际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堕落的原因，而在理论上又是如何变迁附会的呢？也有详细叙述的必要，再说明于下。

依唯物史观所说，新社会的组织，是旧社会组织中各种固有势力发展的结果。资本制度发达至于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发生一种"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资本制度自己掘自己的坟坑。可是某种社会形式中固有的生产力，若在可以充分利用发达的期限以内，决不会倒灭的。这种社会形式发展的结果，内中新生产力的利用和发达，当然要与这社会形式发生冲突。资本的独占成为生产关系的梧梏。于是生产机关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遂与资本主义不能两立，而新社会组织于是起来代替了。可是这里所述的"新生产力"和"资本制度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究应如何解释呢？若说资本制度的解体是资本集中的结果，则由旧社会推移到新社会的途径，完全可以离却人的精神的要素和意识的行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变为机械的史观了。若是这样解释，社会党无须干社会革命，只听资本主义自然发展好了。社会主义者也无须鼓吹革命，只努力去开发实业好了，国家当然可以利用，阶级当然可以调和了。因为资本集中的结果，自然要发生革命的。所以照这样说，马克思一面运动革命，一面唱这种机械史观的宿命论，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是使人易生疑窦的地方，马克思派主义者的变态，未始不从这种怀疑点出发的。他们这种误人歧路的地方，早已有许多学者出来纠正了的，可是这种错误，一般普通人都可以看得出的。就是上面所说的，资本制度发达到了一定程度，资本阶级收集掠夺劳动者的血汗的剩余生产，增加自己的私有财产，劳动者仅依工钱谋生。于是社会截然分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受了资本阶级的掠夺和压迫，久而久之，就会发生一种阶级的觉悟。有了这种阶级的觉悟，就发生一种阶级的心理。有了这种阶级的心理，就会有一种阶级的组织和阶级的运动，就自然有一种团体的结合，成为阶级斗争的行动。阶级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得最后的胜利，自然要废止私有财产，推倒资本制度。所以唯物史观一方面说明资本制度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注重现社会中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若忽视这种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觉，不去助长阶级斗争的运动，社会革命是不可期待的。

过信资本集中说的人，对于马克思的学说，便生出一种根本的怀疑点，因为马克思的先见，是说明资本集中的结果，一资本家压倒多数的资本家，收夺者复遭收夺。且此时应受收夺的人已非为自己作工的劳动者，反是利用多数劳动者的资本家。照这样说，马克思的革命观，当然要跟着资本制度发达的程序益增显著。可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至于十九世纪末叶，数十年间，资本集中的步骤，并未证实马克思豫言的确实。而且在他一方面看来，资本制度的范围扩大，公司会社日见增加，中产阶级的人数因亦增多，小资本家依然存在。资本并未集中，反形分散之象。而收夺者的收夺亦未成就。马克思的豫言至此竟成空想。于是马克思派主义者，对于资本集中和社会自然革命的先见，怀起疑来，以为资本集中的学说，资本制度倒坏的学说，都是不可靠的了。于是不相信革命的必然主义，以为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过程，只有进化而无革命，只有运动而无目的，而所谓修正派的运动，于是盛行了。加以当时思想界的倾向，在文艺方面已由自然主义转入新罗曼主义，在哲学方面已由实证主义转入新理想主义，所以社会主义也不能超过这范围独立存在。所以新理想主义，渐至代替唯物史观的位置。同时修正派运动发生“新马克思派的康德化，新康德派的马克思化”的现象，愈增显著了。于是柏伦斯泰因的修正主义，遂支配了社会民主党员大多数的心理，都放弃革命主义流而为进化主义改良主义了

其须最堪注目的，就是马克思派的政治运动。一部共产党宣言，差不多纯粹讲革命的，可是把那十大政纲看起来，却很平易而且是利用国家的。这种地方就含有所谓“二元的性质”。这种二元的性质，就被他们附会到议会主义去了。从实际上说起来，一切社会问题，不尽是一阶级的问题，也有阶级与阶级间的共通问题。这种阶级间共通的问题，关系阶级间共通的利害。无产阶级对于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有时也无定要推倒有产阶级的必要，而且有时也可以和有产阶级携手的。所以无产阶级对于革命运动以外，凡有可以与有产阶级协同行动的，只有阶级共通的问题。这种协同的行动，就是政治运动。政治运动当然要利用国家，这也是必然的趋势。马克思派误会了这种地方，重视了这类阶级间共通的问题。专行政治运动，而且把阶级对抗的运动也附属于政治运动的范围以内了。于是社会党议会主义的大旗帜，在世界上招展起来了。马克思主义一入议会主义的范围，立刻就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失却了本来的面目。

要推倒资本主义，必须厉行阶级争斗。所以劳动团体阶级的运动，最关紧要。劳动团体阶级的运动，决不可附属于政治的团体。马克思也曾说“劳动组合要达到本来的目的，决不可附属于政党。劳动组合若失其独立，劳动组合立即死亡。劳动组合是社会主义的学校，劳动者在这学校里和资本阶级争斗，其结果要达到社会主义。一切政党无论其倾向如何，只不过唤起劳动阶级的热狂，而劳动组合，则在劳动阶级之间造成有力而且永久的团结。所以只有劳动组合能够造成真的劳动阶级的党派，能使劳动者的势力抵抗资本家的势力。所以由这一点看起来，劳工运动是不能把来附属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也把政治运动和阶级运动并为一事，公然要借议会政策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不过是一种梦想罢了。

以上是从理论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堕落的原因的。我们从上述实际上理论上观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变迁，就可以知道标榜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牵强附会的是堕落的了。

马克思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完成了的，在事实上也可以完成。只有一事与马克思的豫言略有不符，就是十九世纪后半期四五十年间，各国的资本主义虽日见扩张，劳动阶级的人虽日

见增加，而劳动者阶级的心理与阶级的自觉，十分幼稚，所以劳动组织和运动，都不甚发达。当时的德国固不待言，即如英国劳动组合虽日见发达，然仍不能离去地位改善运动的范围，狠带保守的倾向。这种地方是与马克思的豫期相反的。一般马克思派主义者，窥见当时的形势，以为与其求速成而无效，不如取渐进主义，愈改变而愈离奇，竟弄出非驴非马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来了。

可是最近二十年来，各国劳动运动的发达，一一与马克思的豫言相符合了。劳动组合已由职业的组合变为阶级的组合了。劳动运动已由同业运动变而为阶级的运动了。更有一种新劳动组织，已经创造了新生产组织了。阶级的觉悟与阶级的心理，愈益增大，而阶级斗争的运动，亦日增剧烈了。"一切工业社会化！"的声浪，几于无处不闻，所以说到这里来，我们就不能不佩服马克思的先见了。

更举实例说明，就是劳农俄国的缔造。世间以耳代目的人，都说劳农俄国所行的主义是一种什么过激主义，看作蛇蝎一般。其实劳农俄国的施设，在我的眼光看起来，并无新奇的地方。就是俄国所行的，各国最怕的"劳动专政"，都是数十年前马克思所倡导，所主张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列宁并不是创造家，只可称为实行家，不过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相阐明表彰出来，善于应用，这便是列宁的伟大，世人都要拜服的。

被威廉里布克勒、贝贝尔、柏伦斯泰因、柯兹基等弄堕落了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到今日却能因列宁等的发扬光大，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实。

所以我要大声疾呼地说，"马克思还原！"

一九二〇，一二，二六，于上海

（原载《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1日出版）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李大钊

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在中国今日是否具备，是很要紧而且应该深加研究的问题。我且简单的把我的意见陈述于下：

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1921年3月20日

《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

署名：李大钊

（选自《李大钊选集》）

---

* 此文原系李大钊同志写给费觉天的信，标题是发表时费觉天加的。

马克思学说研究社章程*

一、宗旨：

本社专以研究马克思底学说为宗旨。

二、入社：

不分国别性别，凡愿研究马氏学说者，经本社社员一人的介绍，得多数社员之同意，均可为本社社员。

三、方法，暂为左列两种：

甲、共同研究。由社员预先认定马氏学说底书籍，分别研究，再于开会时各自发表研究后所得之结果及疑惑之点，以便共同讨论。

乙、请人讲演。随时敦请对马氏学说素有研究的人讲演。

四、开会：

每礼拜开会一次，暂定礼拜六晚七时。

五、会员：

每人每月收会费小洋一角。……

六、职员：

由全体社员互选一人为书记，以总理社内一切事务，任期以一月为限。

（录自1921年4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附录"）

* 此章程可能是上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章程。

马克思派社会主义

李　达

一、马克思主义之分派

马克思学说出世以后，从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变而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于是社会主义就为马克思主义所代表，一说社会主义，就晓得这是马克思主义了。但是近来各派社会主义发生，范畴复杂，遂有所谓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和非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名称，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代表社会主义了。

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究竟是包含一些什么主义，恐怕还有一些研究社会主义的人弄不清楚的。他们自己要提倡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却自己不知道，倒反指摘别人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为过激主义，加以过激派的头衔，使别人害怕，不敢公然主张。揣他们的心理真是可笑之极，也许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所致。我觉得有就这中间的派别说明的必要，所以作一篇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文字。

从前说马克思主义的派别的人，多半列举正统派和修正派两种，至于工团主义和组合社会主义，(Syndicalism)(Guildsocialism)却不当作马克思主义看的。若提到多数主义(Bolshevism中国人多译过激主义或劳农主义，我主张译为多数主义)那更不消说了，一般人不特不承认这是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反说是无政府主义，这事正和北京政府中人说"劳农俄国"即是"无政府主义"的话，是一样的无识可笑。

所以我特在这里把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分为五种范畴。即是：一，正统派社会主义；二，修正派社会主义；三，工团主义；四，组合社会主义；五，多数主义。

二、正统派社会主义

既说是"正统派"当然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了，但是我却不敢这样说。"正统派"的名称是在十九世纪末叶柏伦斯泰因一派倡修正说的时候才发生的。正统派的代表柯祖基，因为要保存马克思主义的本体，和修正派争论非常激烈，世上的人就是到现在都承认他确是马克思主义代表的学者。但是据我看来，我们只可说正统派社会主义中所保存的马克思主义的质量以修正派为多，却不能说就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在正统派和修正派分裂的时候，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似乎完全变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了。所以我说正统派社会主义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中一个分派。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怎样？这一层我曾在本志八卷五号《马克思还原》一篇文字上说明了，而且在这里也无赘说的必要，所以只就各派别发生的历史和内容，叙述一个大概。在十九世纪七十年前后，马克思社会主义输入欧洲各国，各国相信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人，都很热心运

动，希望社会革命的早期实现。他们要实行马克思的学说，尽最善的努力，排斥妥协，直接行动。他们晓得确认资本家特权，妨害社会主义的发展；他们晓得社会党，应该归纯粹无产阶级组织；他们的目标在根本的社会改造，不在现存制度的改良；他们的手段，是结合无产阶级，行组织的阶级争斗；所以要行革命的政治运动，在共产主义基础上，建设共产社会；所以反对温情主义，反对劳动救济的立法；反对和资本阶级提携，反对共同运动，反对工会运动。综和起来说，这时候马克思社会主义者的运动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实现无产阶级的共产社会。所以这时候的社会运动者，很能彻底实行马克思主义的。

可是这里有不可掩的事实，社会革命，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事，全靠无产阶级自己觉悟，革命运动才有进展的希望。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虽然日见扩张，劳动阶级的人虽然日见增多，可是劳动者阶级的自觉和阶级的心理，尚属十分幼稚，所以劳动者的组织和运动还没有十分发达。因为这个理由，所以当时的产业虽然进化虽有集中的倾向，却没有照马克思的预言那样急速成就。小产业中产业似乎增加了；农业方面的实验，也和马克思的预言相反，地主之数不特不减少，而且增加了；商业上的恐慌，也似乎不多见了。社会主义者看见了当时的状况，不晓得自己对于促进劳动者阶级的自觉的努力不足，反以为马克思的学说不易奏效，于是就改变方向，在实行和理论上发生变化了。譬如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这时候早就改变方针，采用了议会主义。所以在表面上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奉行马克思主义，而在实际上已成了民主主义了。后来愈演愈进，到了十九世纪末叶，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冲突，于是就有正统派和修正派分立起来了。正统派自然是标榜纯粹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的人固不消说，就是现在的人也很有人承认正统派是马克思主义的嫡派。但是正统派有一种根本的谬误的地方，就是误解马克思的学说，坚守民主主义，支持议会政策。马克思主义是否采用民主主义和社会政策，这是马克〔思〕派中一个新近发生的最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有柯祖基和列宁、脱洛基两派人的著书和辩论；我想凡是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又读过这两派的著作的人，一定能够了解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修正派社会主义

修正派的代表，首推柏伦斯泰因(Edward Bernstein)。他于一八九九年脱离正统派，关于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主张逐渐的受国家干涉。他著了很多修正马克思学说的论文，要从社会主义内部，改革社会主义。他对于马克思的“惟物史观说”“剩余价值说”“资本集积说”“资本主义崩坏说”“阶级斗争说”都加了严格的批评，要大行修正运动。他这种主张，也得了一部分人的信仰，而尤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受影响的最多，这是不可掩的事实。

修正派运动，同时在英法两国，也发生了。法国虽然有喀特（Guesdc）一派，坚守正统说；可是又有米勒兰（Millerand）一流提倡改良主义。米勒兰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最好要和一切政党提携；他排斥马克思派的意见，反对无产阶级共同团结，来行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他反对喀特派，又反对梭列（gaures）。梭列主张劳动者地位改善，在某种程度，虽然可以和国家妥协，却不愿社会党和别的政党携手；换句话说，他就是希望继续阶级斗争，推倒中产阶级的国家。喀特也是主张用阶级斗争来实行社会革命的。

英国也是一样，正统派的社会民主同盟的势力衰弱以后，独立劳动党的劳力增大起来了。

独立劳动党是从费边主义产生出来的，即是修正派。

德国的柏伦斯泰因法国的米勒兰英国的韦卜这一流人，都把进化的思想，注入本国社会党的纲领之中，社会主义就变成了进化的或改良的主义了。

总合这些修正派的学说，虽然有种种不同的地方；可是这个进化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可分为以下四项。(一)产业协会或消费协会之发达，(二)助成产业归市有或国有的倾向，(三)组织地位改善的工会，(四)使劳动者获得选举权，(五)由国家征收累进的所得税。

进化的社会主义运动，其目的或对象，在学说上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并无不同。即是，两派的主张，都是要推倒私有的现时个人的私有制度，把生产机关移归社会管理，来组织新社会的。但是进化的社会主义，在学说上虽然有了这个目的，而在实际上，正统派的呼声较高，修正派运动的态度，却是非常冷淡的。

到了近年来，马克思还原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了，这一派的学说，在事实上，已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四、工团主义

一千九百〇七年国际社会党在巴黎开会的时候，讨论了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关系。当时演说的人，多指定工团主义的发生是社会主义复兴的新倾向。他们猛烈的批评那进化的社会主义或议会的社会主义，已经渐渐地消失了阶级斗争的思想；证明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已不存在，而自称奉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采用议会主义去了。但是工团主义是什么呢？工团主义的名词，本有劳动组合主义的意思。法国的劳动组合，最初分两派，一是改良主义，一是革命主义。前者的目的在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银，改良劳动状态；后者的目的专在革命，并不希望减轻资本主义的弊害，而在根本的改革社会组织。但是后者比前者势力较大，到了二十世纪初期以后，就支配了法国全部劳动运动的精神。

工团主义根本的思想是阶级斗争。依工团主义者的意见，社会是由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两大阶级而成。雇者和被雇者的利益完全相反。所以劳动者应当和那些握有生产机关的资本家，继续斗争。但是劳动者要得经济的解放，就要凭借自身的力量，在经济上行有效力的战斗；所以按照以前的经验，信赖议会政策，专从事投票的竞争，不惜和别的阶级妥协，反失掉革命的精神。所以工团主义反对民主主义，他们不重在态度冷淡的多数，而重在有“自觉的少数”。工团主义反对生产机关集中在国家手里，以为国家是束缚个人的。

工团主义的理想，在使劳动者有自主的“自由工场”，主张劳动阶级的解放，由劳动阶级自动。工团主义反对专从事改善劳动者地位的运动，主张行自然的总同盟罢工，而不主张准备罢工基本金。

工团主义以直接行动为主，说社会常在战争状态，资本劳动两阶级之间，有最大的隔阂，列宁是完全相反。所以劳动要用一切手段征服资本阶级，继续努力奋斗，末了行总同盟罢工，一举而实现社会革命，变更一切社会组织。

工团主义一方面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一方面又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工团主义不相信资本家社会自然的破灭，不相信社会是自己的运命的结果所产生的。只相信根本的变革，是劳动阶级多年牺牲和争斗方能做到的。马克思说：力是旧社会孕育新社会的必要的产婆。工团主义却主张把这力提早运用的。在这种地方，工团主义似与马克思主义相反，

但是工团主义者却自称保存马克思主义的神〔精〕髓的。据Lagardelle说："阶级斗争若包含社会主义的全部，社会主义全部就包含在社会主义之中，工团主义以外阶级斗争是没有的。"G.Sorel也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在工团主义的形式复兴起来了。"

工团主义也不描写理想中的社会，据法国著名的一个工团主义者说："若要将目的确定，就惹起无穷的争论，有人说，我们的目的在实现无政府的社会；或者说，我们的目的在实现善于统治善于经营的社会。这两种意见正确与否，我没有断定的责任。譬如我要到某地方去，总要等到旅行完了之后再定，到这时候旅行的目的地自然明了的"。

工团主义相信大革命的时候，劳动阶级一定要起来统治社会。劳动阶级就会要掌握从来资本家所有的一切生产机关。他们会要组织协会管理工场矿山铁道，各协会联合组成中央大协会，开全国会议决定许多职业和产业的关系，尽统治的责任。

工团主义的国家也有统治的人。各职业的全国会议选出代表开总会议，决定各协会会员所应受之分配额。有余裕的协会，又可以补助没有余裕的协会。

工团主义，否定政治的方法，但是依工团主义看起来，所谓"总会议"，当然要用代议制度做基础，这不是别开妥协，术数，和种种政略的门径吗？而且社会上各人的结合，不专在经济一方面，必定还有行政裁判，国民教育，宗教等必要的东西，工团主义排斥政治的结合，主张经济的结合，这显然是一个缺陷。

但是工团主义主张劳动者的成功，与其依赖政治的行动，不如依赖经济的行动，所以不赞成工会受政党的利用。工团主义的新运动使产业的各国，都注意于工会的组织了。譬如英国的工会，非常萎靡不振，可是受了工团主义新精神的刺戟，也渐渐进步起来了。英国的进步的劳动者也认定产业的团结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借团体运动要求管理产业了。于是产生了组合社会主义，这也可以算是受了工团主义的影响。

五、组合社会主义

组合社会主义与集产主义和工团主义都不相同；实在的说起来，这是把集产主义和工团主义的要点结合起来，另成一种新形式的。

组合社会主义的意义，就是用工会和国家共同经营产业的提案。生产机关归社会公有，委托工会管理。但是管理的权利，不仅属于生产者，消费者也可以经由地方团体，或中央团体发表自己的要求。生产的程序和方法，虽然归工会管理，而生产的种类和缓急，却不能决定的。组合社会主义者，想把现在的工会，变成合理想的组合，使适宜于将来产业的管理；推倒工钱制度，以达到与国家共同管理产业之目的。其第一步在结合劳动者向这目的进行，和资本阶级对抗；第二步要求共同管理产业，使国家收买资本家，许组合经营产业。

组合社会主义不干涉生产者的自由，拥护个人权利。所谓组合有全国的和地方的区别。全国的组合，大概是处理物品标准之决定，商品贩卖，以及需要供给之调节等事。地方的组合在一定范围之内，行产业的自治。组合的职员，由组合的会员选举而出。全国的组合作成一个中央机关，即是组合总会；这总会是生产者方面最高的权威，和消费者方面最高的权威的国家对立的。组合总会和国家又各派代表组织共同委员会，掌管产业上最高的事务。生产者和消费者，因为这个委员会，可以时时接触，互相协议，就不至有一方面的利益和他方面的利益相冲突的事情，所以能够共同拥护全社会。

国家的收入，每年用单税法形式，按照各组合所得的纯利益提出若干充作国家的收入。国家得到这综收入，就用来办理教育，公共道德，裁判，和国际事务。

但是这里有一种反对论；在近代社会之中，各种复杂的活动，关系非常复杂，象组合主义者的主张，把国际关系委托国家管理，把生产事业委托组合管理，恐怕没有这样容易分划界限的。因为国际关系，每每含有经济的生产问题；而经济的生产问题，又每每含有国际关系，所以不能明白的分别出来。

况且组合制度，就是成立，恐怕也不能保持产业的平和。这种思想，也是一种空想。组合社会主义者，以为人性本善，过于相信人类有爱他的本能；殊不知要使人类不为利益生产而为效用生产，若没有一种强制的权力去指导，必不会达到新社会的境界的。

六、多数主义

当着多数主义初次得势的时候，世人都把这当作洪水猛兽，或以为这是无政府主义，想合世界一切暴力，去完全歼灭他的。后来看了劳农俄国的施设以后，多数主义的真相，渐渐明了；但是劳动专政一层，却惹起了全世界各方面的非难。社会主义以外的各色各派的人，无论是贵族绅士〔军〕阀资本家，当然都要反对的；非社会主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乃是必然的道理，我们可以不必计较。只是最奇怪的地方，莫如社会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尤莫如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社会主义。

多数主义的施设，完全遵奉马克思主义，这一层我想人人都应知道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所谓正统派代表柯祖基一流人，却极力的攻击，不承认多数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却不能无疑意了。所以我想就列宁、脱洛基和柯祖基两派关于辩论“劳动专政”的著作和言论，略略的作一个质直的介绍：一面研究“劳动专政”是否出自马克思学说：一面说明多数主义的本质意义，和实行的方法。

多数主义指导的原理就是劳动专政，我们要完全了解多数主义，要了解多数主义是否马克思主义，只就劳动专政一事研究清楚就很够了。据列宁、脱洛基的申说，劳动专政纯粹根据马克思学说；但是柯祖基却极力否认，并且著了《劳动专政和民主主义？独裁政治？》（这是《劳动专政》书中的一部分，另印单行本的）两书，由理论批评多数主义所主张的劳动专政，不承认这是马克思的主张。柯祖基说，若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力说社会主义非和民主主义结合不可；并且说马克思纵然主张劳动专政，但这是政治状态的劳动专政，而不是政治形式的劳动专政，即不是劳农俄国所行的劳动专政。劳农俄国所行的劳动专政，是否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专政，还须由列宁的说明来说明；至于柯祖基所说的和社会主义结合的民主主义，当然是德国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了，这一层我在上面说过，我觉得这并不是发源于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在他所著的《法国内乱》一书上曾经说：“劳动阶级要想达到自己阶级的目的，单靠掌握现行的国家是不济事的”。又在一八七四年著的《哥达纲领批评》里面说：“由资本主义社会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间，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就是劳动专政”。又《共产党宣言》上说：“劳动阶级的革命，第一步在使劳动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劳动阶级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手里，即是集中在组成支配阶级的劳动阶级手里，全部生产力就可用大速度增加起来……

劳动阶级若和资本阶级战斗，迫不得已，自己不得不组织一个阶级，用革命手段，把自己造成一个支配阶级，并且用权力扫除旧生产条件，于是阶级对抗的存在和一切阶级的自身都要扫除的，无产阶级的优越权也要废除了”。这几段话，就是多数主义行劳动专政的思想的源泉，经列宁引申立论之后，凡是曾经研究社会主义的人，都是不得不承认的，无论柯祖基如何曲辩，而劳动专政发源于马克思主义一事，已有确切的根据了。

多数主义何以反对现代的民主主义，反对议会政策，而必欲实行劳动专政呢？这是因为议会政策是资本阶级社会的政治机关，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绝对不相容的。据列宁说一切民主主义都是对立的，换句话说，就是阶级的民主主义。以前的民主主义不过是一阶级的机关；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专制的表现。所以劳动阶级的民主主义(即劳动专政)要努力把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打破。又资本主义虚伪的主张一切阶级的政府，而在事实上却是一阶级的政府。所以劳动阶级的革命，也率直的组织劳动阶级的政府，以期实现一切阶级的民主主义。

劳动阶级的意义怎样？依列宁在他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上说：“劳动阶级革命的独裁政治，是被压迫的人为图谋粉碎施压迫的人而造成的先锋的支配阶级之组织”。他又在他所著的《劳兵会论》上说：“劳动专政是一句伟大的话。这句伟大的话不可空用，这是征服绞取者和恶人而且具有勇敢，强权的铁血支配”。他又在论社会革命的文字中说：“说共产党的暴力的人，全不懂劳动专政的意义。革命的自身，是纯粹的强力的行动。专政的语义，由各国语言说起来，不过是用强力的意思。所以强力和阶级的意义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革命的地位越是困难，专政的程度越是辛辣”。所以由列宁这些解释说起来，劳动专政的意义就是劳动阶级对于资本阶级运用的强力政治。

劳动专政的意义，在上面说了，劳动专政的本质又是如何呢？据列宁说，劳动专政的本质，即是一阶级对于他阶级而行的革命的强有力的国家。换句话说，所谓劳动专政，就是劳动者的国家。至于劳动者的国家又是什么？列宁的解释，也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相同。据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支配的一个机关；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因此造出法律，使这种压迫继续持久，借以缓和阶级冲突的机关。又据恩格斯说：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社会的一个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协的一个证据。列宁因此引中他两人的说话，演出自亡的国家观，他说：国家是阶级冲突的产物，是那些不调和性的表现，所以国家只限于在阶级冲突不能调协的时候发生的。反面说，国家所以存在，是阶级冲突不能调和的证明。所以依着发展的程序说起来，在资本阶级国家之次的是劳动者的国家；而这种劳动者的国家，已不是真正的国家，要不外是在劳动专政的形式里实现社会主义。所以资本阶级的国家是资本阶级专政；劳动者的国家是劳动阶级专政。

劳动专政的作用怎样？这也是应当说明的。据列宁说：劳动专政的目的在征服资本阶级，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的一切思想，风俗习惯和制度，确定社会主义的根基；一方面用强制的权力，破坏资本阶级压迫劳动阶级的机关，从资本阶级夺取武装，把劳动阶级武装起来，制服一切反革命的反动力，因此徐徐的经过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巩固新社会的基础。

劳动专政用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呢？依列宁说：劳动专政的形式，是成了劳动阶级和下等农民永久专政的典型的劳农会共和制度。脱洛基也说：劳农会是劳动阶级的组织，其目的在为革命的权力而战，所以劳农会又是劳动者阶级的意思的表现。至于劳农会的组织，依列宁

说，一切劳动者和下等农民都包含在内，所以劳农会是劳动阶级运用主权征服资本阶级的机关，把一切立法上行政上的权力，一致结合，不以地方分别选举区域，而以工厂工作场等产业的单位为选举区域的。至于劳农会组织的详细，在这里不便多为介绍，暂从省略。

七、结　论

综合上述各派社会主义而论，范畴虽有种种不同，但在社会改造的根本原则上，都是主张将生产机关归社会公有的。不过所采手段，各派各不相同，或者采用直接的适宜的手段，能够早日的达到目的；或者采用间接的迂缓的手段，愈实行而离去目的愈远。至于各派所采手段所以不同，或者因为各国国情和国民性不同所致，但是我相信近的将来，各派都要在同一的目的地会合的。

第三国际，已经可以代表各国社会党的进步派，都是赞成劳动专政，采用劳农制度的，这也可称是各国社会运动最新的趋势了。

中国何时能够发行社会革命？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未到实行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预先见到，所以不敢说中国应实行多数主义，却又不敢说中国一定不适宜多数主义。

一九二一·六·二·

本文参考书如左〔后〕：

拉金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柯祖基的《民治吗？专政吗？》
列宁的《劳兵会论》
室伏高信的《列宁主义批评》

（原载《新青年》第9卷第2号，1921年6月1日出版）

马克思底共产主义

存 统

一 序 论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是有科学的体系的。在他以前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没有科学的体系；自从他出来之后，社会主义才具备了科学的体系，划了一个新纪元。这个区别，我可以借河上肇底话来说明：

把“共产主义的社会”当做理想来描写的思想家，在马克思以前，也很多很多。可是他们都只能在他们底头脑中描写那个理想，至于可以实现那个理想的“物质的基础”，却都不能发见，所以他们都只做一个空想家就完了。简单点说：那种只想飞到空中去而不去研究怎么样才能飞到空中去的手段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空想家罢。但是如果有人想做出象飞行机那样东西来，用他飞到空中，我们就不能说他是空想家；因为他已整然想出为实现那个目的的“物质的基础”了。因为马克思关于(一)为实现那个当做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要怎样的“物质的基础”，和(二)那个必要的“物质的基础”如何才能完成——这两个问题，曾经做了科学的研究；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底社会主义可以称做科学的社会主义，可以同他以前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区别的。

这一段话，很足以说明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底区别，也很可以表明马克思底共产主义能够实行的理由。

关于（一）问题，就是生产力十分发展；关于（二）问题，就是改造经济组织。换句话说：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十分发展为前题；要生产力十分发展，必须以改造经济组织才能实现，即只有靠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社会革命，简单点说，就是改变经济组织的革命。经济组织一改变了，社会底全部制度都要随之而改变；于是新社会也就因而出现。

但是要完成这个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是有一定的顺序的。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所著的《哥达纲领批评》当中，把这个顺序明白告诉了我们。马克思是一八八三年死的，离他做这篇文章只有八年，所以我们很可以在这篇文章里窥见他的成熟的思想。我们从他这篇文章里，可以把他底实现共产主义底顺序分为三期：第一期，是革命的过渡期；第二期，是共产主义底半熟期；（这就是普通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时期）第三期，是共产主义的完成期。（其实，是不能这样严密区分的，大家以意会之就是了。）在这第三期各人都得着“生存保证”，自由社会也就完全实现了。

二 革命的过渡期

现在先说第一期，这一期就是革命的过渡期。我们把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及其他文章中

关于这点的话一同引在下面，当能格外明白。《法兰西内乱》上说：

“劳动阶级要想达到自己阶级的目的，单靠掌握现存的国家是不济事的”。

大家不要轻轻看过这句话，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底精髓呢；因为马克思主义底根柢是唯物史观，依唯物史观底解释，一种经济组织，一定要有一种政治组织和他相适应；所以一面改变经济组织，同时也非改变政治组织不可。那些要想在议会里实现社会主义，死守有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先生们，在这一点，明明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底教义的。所以列宁骂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底淫卖妇”，实在是不错的。我们之所以不承认正统派社会主义（就是柯祖基所代表的那一派）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在此。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据我看来，只有布尔塞维克主义。

《哥达纲领批评》里说：

“从资本主义社会推移到社会主义社会底中间，必须经过一个革命的变形时期。同这个革命的变形时期相适应的，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独裁政治。”

这一段话可为紧接上段而说的，也就是山川均先生所说的“这是唯物史观说当然的结论与应用。”

《共产党宣言》上说：

“劳动阶级的革命，第一步是使劳动阶级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既达到第一步，劳动阶级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底手里，就是集中在组成权力阶级的劳动阶级手里；这样做去，那全部生产力，就可以用最大的速度增加起来了。起初的时候，少不得要用强迫的攻击手段对付私有财产权和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才得达到目的。……劳动者和资本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存在和一切阶级本身，也都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底权势也是要去掉的。”

《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上说：

“劳动阶级掌握政权，先把生产机关收归国有。从此之后，把无产阶级自身也一同废止，一切阶级区别，阶级对抗，都一概废止，就是叫做‘国家’的国家，也随着废止。……无产阶级握取政权，用这个权力，把离开有产阶级底手的‘社会的生产机关，’完全移归公共机关所有。”

这一段话，是马克思说的，虽没有象前面那几段那样明白；但也明明白白教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了。总之，马克思主张“劳动专政”，实是一桩很的确的事实。他从一八四七年草《共产党宣言》以来，就抱有这个思想，不过明白确定的，却在一八七一年巴黎自治团失败之后。有人说他到了后年思想成熟了，放弃这个主张，那是不对的。

在这个革命的过渡期中，无产阶级最大的工作，就是把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国有，及把一切阶级消灭。俄罗斯同志现在所做的，就是这第一期的事业。这第一期，是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的时期。这个时期经过的长短，我看要以各国底经济发达状况和人民智识程度如何而定的。在俄国，中国这些产业幼稚，人民无知识的国家，过渡时期要比别国多一些时日也未可知。究竟要多少时日，我们固不能预定；不过共产主义不是一举而成的这件事实，我们是无疑的。我们也只有同心协力，尽我们最善的努力，以期早日通过这个过渡期就是了。

三　共产主义的半熟期

共产主义的半熟期，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期。到了这时期，因为已经经过了"久产之苦"的过渡期，把一切生产机关都收归国有了；所以就没有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区别了，也就没有一切阶级区别了；因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形态，也便随着告终了。而同时在别一方面，因为全社会底生产机关已成为"国家的统一"，和全社会底生产力已成为"意识的计划的结合"，所以"全生产方法底变革"也就实现了，"社会的生产力"也就大大地增加了。到了巨大的生产力增加的时候，社会才进到共产主义底第一期。但是在这时期底共产主义，起初还不过半熟的东西罢了。现在再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评》中关于这共产主义第一期的话写在下面：

"我们这里要处置的东西，并不是在那个固有基础上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实在是那个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出之后那些时候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时期无论在经济上，在道德上，在精神上，在其余一切关系上，都还没有脱除那个生他的母胎旧社会底遗风。在这种社会里每个生产者，都向社会正确地取回自己所给与社会的东西（扣除为社会全体所必要的费用之后）。他给与社会的东西，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向社会领受了一种证券，这种证券上面写明'供给这些这些分量的劳动'（扣除了他为共同团体所行的劳动），拿了这个证券，向消费物底社会的仓库，取出与这个所费的劳动相等的东西。这就是：他把他在这一个形式上所给与社会的东西，在别一个形式上取回。换句话说，就是同量的劳动互相交换。"

这是已经过了过渡期，进了共产主义第一期以后的事。在这时期，社会已完全没有私有生产机关和掠夺剩余价值的有产阶级了，所以一切人都成为"社会的劳动者"而劳动，各人都应其提供的劳动多寡从社会领受一定的报酬。在这各个人"在别一个形式上，取回同在这一个形式上所付给社会的劳动相等分量的劳动"一点看起来，可以说是实现劳动全收权。（但是因为从全体劳动收益当中，先扣除了为社会全体的必要费用之故，所以实不是各人完全取回他底劳动收益全部的。）但我们要问：这种承认劳动全收权的社会，就是马克思当做理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吗？那不是的。据马克思底意见，一切权利，都是有产阶级社会的残滓，劳动全收权也是一样。同在《哥达纲领批评》当中，他又接着说道：

"在这个地方，明明白白被同'那个规定商品交换（只要他是在同一价值内交换）的原则'相同的原质支配着。不过在这变化过的事情下面，因为（一）无论是谁，都不能提供他的劳动以外的东西；和（二）除了个人的消费物以外，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归个人所有；所以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关于个个生产者之间底消费品分配，是被同'商品同价量交换'一样的原则支配着的；即是这个形式同量的劳动，同别个形式同量的劳动交换。

"在商品交换里，'等价的交换'这条原则，只是在全体平均上存立的，在各个的场合是不存立的；但是在这个场合，是没有说有'原则和实际不一致'那样的事的。不过那个'平等权利'，从其原则上说，还仍旧是有产者的权利。

"这个平等权利，虽然如上述那样有进步，但仍旧还负有有产者的限制的。为什么呢？因为生产者的权利，与其'劳动给付'成比例，平等还存在用'劳动'这个同一尺度去测量这一点上之故。（所以其结果，不免要发生种种不平等）有人对于别人，在肉体上

或精神上，占着优等的地位，所以在同一时间当中，能够提供更多的劳动，或者更能劳动更多的时间。因为把劳动当做尺度使用，所以其张度及强度，也不可不斟酌的。不然，那就不是尺度了。这样说来，这个叫做'平等权利'的权利，实在是对于不平等的劳动的不平等的权利。不用说，各人都同别人一样，单是一个劳动者；阶级底区别，是不承认了。但是这个，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把不平等的个人的天分，以及不平等的个人的给与能力，认做'自然的特权'了。所以这个，同一切权利一样，从其内容来说，也是不平等的权利。……还有别的种种差别：例如一个劳动者结了婚，别个劳动者没有结婚；这个人底小孩子，比别个人多等都是。所以纵使大家做同一劳动勤务，对于社会底消费财物取同一的分量，也要发生一个人在事实上所得的东西比别人多，一个人比别人富那样的事情。如果要想避免这些弊害，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权利'不是平等的，实在是不平等的。'然而这些弊害，在共产主义社会底第一期——即在吃了久产之苦'（按这是指革命的过渡期的）之后，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出不久那些时候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避的现象。大凡权利这个东西，决不能成为比'社会底经济状态及靠这经济状态附做条件的文化底发展'更高的东西的。"

所谓"在变化过的事情上面，无论是谁，都不能提供他底劳动以外的东西；在别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物以外，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归属个人所有"，以及"大家都不过是一个相同的劳动者，不承认有阶级的区别"那些话，都不过是说明这么一个时期底社会状态；即一切生产机关都归社会公有，社会没有了叫做有产者及无产者这种阶级区别的时期——即社会已经过了过渡期进入共产主义的时期——底社会状态。在这个时期，社会虽然已经进了共产主义的时期了，然而在起初的时候，社会还没有脱除旧社会底熏习，所以关于消费品底分配，也不能就采用"各取所需"这条原则。为奖励各人底劳动起见，还有应其所提供的劳动底分量而定财富分配的必要。所以虽然已经进到共产主义社会了，然在第一期，却也还承认近于"劳动全收权"的权利的。但我们已经知道：在主张有权利的时候，是没有平等的；一切权利，都是不平等的权利。

在这种以各人劳动分量多少来定分配的时候，要发生种种的不公平：例如有两个人，虽然在同样必要的时候，但因为二人底劳动分量不同，所以就发生一个得到较多消费手段，一个得到较少消费手段的事情；还有有更多的必要的人，所得的分配额，反而比有更少的必要的人少的事。这样说来，社会虽然已经进入共产主义时代，然在第一期，什么正义，自由，平等这些东西，都还不能达到完满境域的；据马克思想，这些弊害，到底是不能避免的。

总之，在共产主义底第一期，只不过免除了从生产机关私有所生出来的弊害；至于跟着以劳动量为标准的分配制度所产生的种种不公平，一时还不能免除。这时候有两条重要原则：一条是"不劳动的不许吃"，一条是"做多少工作，给多少报酬。"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底第一期。

四　共产主义底完成期

共产主义"在那个固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渐渐儿使社会的生产力成就了巨大的发达，最后就达到"实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程度"，而社会的一切组成员也就都得着"生存保证"。

做到这样，也决不是不可能的事。到了这个时候，共产主义才脱了半熟期而进到完成期，人类也成为真正的自然支配者。关于这个时期，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评》里说道：

“在共产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状态！在从服从分业原理而发生的个人底奴隶的隶属没有了之后；在精神劳动和肉体劳动底对立废除了之后；在劳动不当做为单维持生活的手段，而劳动自身成为第一个生活要求之后；在生产力随着个人底全面的发展一同增加，而共同财富底源泉都十分流出之后：——到了这个时候，社会才完全从狭隘的有产者的法律的地平线拔出来，而且只有在这个时候，社会才能在旗帜上大书特书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所谓“各尽所能”，就是“各人应其能力为生产财富而劳动”的意思；所谓“各取所需”，就是“各人应其欲望而消费社会财富”的意思；这两句话，是把共产主义社会底生产及消费底根本原则，最简单明晰表现出来的话。这样的社会，马克思并不以为立刻就能实现的；他以为要实现这样的社会，必须先经过许多年数；等到社会的生产力大大地增加，最后，“共同财富底一切源泉都流出来”的时候，这样的社会，才能实现。他的共产主义不能称为乌托邦，也就在此。我们之所以不相信别的共产主义，而独信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也在于此。

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我们所要的自由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劳动已不是为生活的单一手段，而其自身就是第一个生活要求。”这种为“生活要求”的劳动，也就是一般人所仰慕的优美愉快的劳动，也就是一般艺术家所企望的“劳动的艺术化”。在这时候，人人都能够自由劳动，自由消费，真是一个快乐世界！而且社会的生产力既然十分发展，精神劳动和肉体劳动底对立既然消灭，则劳动时间一定可以大大减少，余暇时间一定可以大大增加，什么科学，艺术这些东西，谁也不能独占了；真正的自由，平等，正义，幸福，也都只有这时才能完全实现！这就是“各个人都能够自由发展，全体才能自由发展的协同社会”！马克思所谓“共产主义底更高级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五 结 论

由上所说，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大概总可以明白了。我为读者容易记忆起见，再把上文大意总括如下：

1．社会革命期　这期的特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期最大工作：（一）把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国有；（二）征服有产阶级并消灭一切阶级；（三）整理生产事业并发展生产力。这期工作，大部分都属于破坏。

2．共产主义半熟期　这一期就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出的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也就是经过了社会革命期后的时期。（在社会革命期中，是正与资本主义社会战争的时期，不能说是已经脱出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他去资本主义社会未远，所以无论在经济上，在道德上，在精神上，在一切关系上，都还遗流着旧社会的遗风；因之，强制力在这时期也还不能免除。这个时期，已没有了阶级的区别和生产机关底私有。无产阶级的国家也已消灭，全社会人都已变做生产劳动者。这时破坏已完，完全努力建设。因为生产机关已为全社会所有，生产事情已有统一的计划，所以生产力也就能充分发展起来。至于分配消费品，还仅能采用“各取所值”一条原则，做多少工才给多少报酬，所以在这时候，还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

3．共产主义完成期　这个时期，这是生产力已达到了十分可惊的程度，完全能够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共产社会的时期。这就是恩格斯所说“自由的王国”，马克

思所谓“协同的社会”。

大家请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对的吗？把共产主义底目的，手段，过程，都一一告诉我们的人，除了马克思之外，还有什么人呢？这种从经济上来主张共产主义不去相信，到底要信什么共产主义呢？世界上主张共产主义的学说，还有比马克思更完备的吗？自由，平等，正义，幸福，是凭空建筑得起吗？究竟是先有了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然后有平等，自由，正义，幸福呢？还是先有了自由，平等，正义，幸福，然后有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呢？这一个差别，是很大的呢！朋友们！都要仔细想一想呵！

现在再说一点我底意见。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底材料做根据的；所以他有些话，不能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但我以为我们研究一种学说一种主义，决不应当“囫囵吞枣”“食古不化”，应当把那种主义那种学说底精髓取出。比方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组织起了变化，社会组织也就要随之而起变化。我们因此就可以知道：要改变社会组织，必须先改变经济组织。又如马克思经济学说告诉我们：产业社会化底结果，共产主义是必然到来的运命。我们因此又可知道：要想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先使产业社会化。诸如此类，举不胜举。所以我们在中国主张马克思主义，实在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底精髓，乃正是马克思主义精髓底应用。

我们狠知道：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冲突的地方；但这并不要紧，因为马克思主义底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所以我以为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了；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

我以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唯物史观，忘记了唯物史观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非但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注意唯物史观，就是别的社会主义者，也非注意唯物史观不可。一种社会组织，一定要建在一定的经济组织上面。经济组织，是社会组织底基础；没有基础，怎么建筑得起？空想社会主义者底弊病，我们千万不可犯。社会革命，决非偶然侥幸的事，是要在一定的条件下面来行的。不顾一定的条件，空谈社会革命，是一件无益的事。我们如果真要使社会革命成功，除了遵守唯物史观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什么正义，人道，自由，平等，都要建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面的。找不到那种经济基础，空讲自由，平等，就是讲一万年，也是不会实现的。我们并不是不要自由，平等，我们只不过要先筑成能够得到自由平等的经济基础。我们知道：社会是进化的，由较不完善进于较完善的。要想一步跳过，那完全是梦想。我们对于社会进化必须经过的阶段，是避免不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实行阶级对〔斗〕争，必须采用劳工专政。拿什么“彻底不彻底”的话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我看是一钱不值。

总之，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定可以在中国实行的，不过如何才能实行，却全靠我们的努力了！

一九二一·八·一四

（原载《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出版）

告同胞

彭湃

我们今日的时代，是甚么的时代呢？

我们今日的时代，即是世界有史以来未曾经验的一大破坏时代！

“法律”是我们民众自由的敌，即是少数支配阶级——官僚——掠夺平民阶级一个极厉害的道具；同时亦是维持社会阶级的东西；时时都强制我们；压迫我们，使我们当兵，教我们残杀；使我们犯罪，拿我们监禁，处我们死刑；处处无不增长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就要破坏“法律”！

我们蒙昧时代，以为“政府”统治我们，可以维持我们的安宁幸福；我们现在晓得“政府”利用法律，来榨取我们的财产，扩充军备，不问我们平民的负担如何，完粮，税契，饷项，军需，公债，种种无不大铲特铲，以供给政府——贵族，官僚，军阀——享福之资，嫖赌饮吹之用。并且强制我们为他们的走狗，为他们征伐异己，不计我的父母妻子，不惜我们的人命肤血，以一钱四分四厘之伙食，使我们一命呜呼于战场，遂致社会时时酿出种种的变乱，放火，奸淫，掳掠，使我们无时得安居乐业。昔日我们平民早有了讨厌政府之心，政府就利用宗教及教育，向平民鼓吹“忠君爱国主义，”善杀人者，则奖以徽章，战死者，则为开追悼会；或赐以吊慰金，或旌其门闾；或竖碑奖励；而我们受了政府——贵族，军阀，官僚——的愚弄之后，不但变讨厌为欢迎；且对于此种教理及讲义，奉为金科玉律，以为最高道德标准。我们常常挂了一个某督军府、某省长署、某司令部的襟章，就要拿来夸示乡人；质是之由，苟能出入官衙者，成为社会所欢迎；目〔自〕我们的祖乃宗，以至于我们，都教子教孙，以做官为荣，以交官接府为人世第一发展之图；政府得此忠君爱国之徒，虚荣好脸之辈为爪为牙，更伸其毒手，今日出差掠契，收粮，明日派勇强题军需，硬派公债，虽相安无事之乡村，亦鸡犬不宁矣！我们养鼠咬破了布袋，我们要保全布袋，当然杀鼠。我们供给政府，反来侵害我们，我们要保全我们，就应当破坏政府！

“国家”这个东西与政府有连带的关系，——国家组织的要素——乃相依并存之物，政府——贵族，军阀，官僚——不但要于其本国内，掠夺其本国民，取得荣华富贵之地位；且于国际上，仍要争个优越的舞台，必欲进而征服他国民，统辖全世界方遂某欲；故国际间之冲突，战争，完全发生于国家这个组织。至如世界之文化，学术，亦因国家之区别，成为富强国家的秘诀；同时又成为一种私有财产，各自把持不肯公开；于是文化学术之昌明以阻，世世人类的进化益迟；我们既欲促进人类之进化，当然不可不破坏这个“国家”！

我们除了上述之应当破坏如外；还有一件与之互有连带的关系，为人类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者；就是私有财产制度是也。“天地万物不相离也；认而有之皆惑也。”古人说得很妙！夫宇宙间一切的物质，当然归我们人类之共同管理为合理；今竟专属于少数特权阶级之手中，而我们无有也。譬如日光，空气，土地，三者皆非人力所能创造而成者；日光则任人利

用，空气则任人呼吸，至于土地亦当任人自由居住；而竟大谬不然，少数特权阶级田园阡陌，危楼大厦，贫者无立锥之土，然则贫者非至与空气同其比重，游离于空间，总无生存的余地；天下事宁有是理耶！贫者耕不得食，织不得衣，造成屋宇而不得住，富者则反闲游无事，毫无生产，而衣食住自足，此无他，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私有财产制度有以致其然也。

今日，我们无产阶级中，无有不为经济所压迫感受生活之困难者；终日孜孜劳力而三餐不饱者，固属多之；而因生活费之难以支持，至如卖妻鬻子，堕胎，亦层见叠出；甚者抛弃其生存权，而自尽者亦有之；人间悲惨之事，有甚于此者乎！溯其源，归其因，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之罪恶也。若然；私有财产制度之破坏，更加迫切异常了！

现在社会既经中了这样的病毒，我们就不得不找个治疗的手术；——破坏的方法，——这个治疗的手术，是甚么东西呢？就是“社会革命”是也。社会革命者，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是也。

“社会主义”的派别甚多，其学说也不少。总而言之：皆出于破坏现社会的缺陷，——压迫，贫乏，无智，——而建设新社会，找出个理想的生活，极乐的天地是也。

今有反对新社会主义者，每每误指：“共产主义”为“均富分财”的概念。夫均富分财，不过将现社会各人的私有财产，拿来平均分配而已，根本上仍是承认私有财产制度之存在。共产主义者，举社会一切的东西，为社会所共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无论何人不得而私有之；即是从根本上破坏私有财产制度是也。

反对社会主义者又曰：“社会主义是提倡公妻”，一般无知之徒，遂群起而和之。若一读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亦可了然胸中。马氏谓（以下译意）官僚资本家每每视女子为一种财产，可以卖之买之；他们眼中目中早无了女子的人格；故当社会主义者之提倡共产主义也，即说道“财产可以共有，女子也是财产之一，那么，女子也当然可以共有”！遂以“公妻”二字，自为社会主义者之不法，藉为毁谤之术。马氏又谓：资本主义的社会（即现社会）有公妻；共产主义的社会（即未来的新社会）无公妻。试看现社会之妓馆林立，购买人家妇女（不是女子好为娼妓，乃迫于生活出不得已），充为娼妓；资本家，官僚，富豪，商人，皆公然滥遂其肉欲，此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之公妻制度为何？共产主义是反对这种制度，所以不是提倡公妻也明矣。

反对社会主义者又曰：“无法律则无以明是非，判曲直，势必陷于纷乱无秩序的状态”。试问：我们今日所争夺诉讼者，为盗贼奸淫者，其原因何在；无非出于私有财产制度，及买卖结婚制度使其然也。人人既无私有财产，从何处而争夺诉讼耶？人人既得饱食暖衣。谁好为盗贼耶？人人皆得自由恋爱而配合，何处有奸淫耶？要之；不过精神病者，或因一时精神之障碍，而至伤杀人，然先将精神病者，送至病院疗治，自无犯罪之人矣。何法律为！而且人类进化而事物益繁，法律都能条条限制吗？若使逐日增加，将来世界就成了法律的藏书楼罢了！

法律既无存在的价值，政府国家当然归诸消灭。但或者以为宣传此种革命，在世界全体一齐实行革命之时，故无何等问题；若在部分改造之期中，强邻虎视眈眈，恐难免于灭亡。吁！彼未知现今世界之趋势为何？难怪其抱此疑念。夫最近世界之趋势，非国家对抗国家，乃世界之无产阶级对抗特权阶级（官僚资本家）是也。今后之战争，亦非国家之战争，乃世界之无

产阶级，与特权阶级之战争是也。最近俄罗斯之实行社会革命也，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但瞠然莫敢加兵；且防止其国内无产阶级暴动之不暇也。故今日无论何国而实行社会革命，可谓安然无忧者矣！

还有一层，恐怕诸君有时谓："社会主义固然甚善，但是极难做到"。试问：诸君这"极难做到"四字，从何处经验而来呢？譬如筑舍，问于泥匠曰："何日可以造成呢"？泥匠必从脑中总合过去种种的经验，然后才能定个答案。我们今日，若将过去未曾经验之社会革命事业，判为"极难做到"，无乃过于凭空索摸。

诸君！有志者事竟成！我们既承认现社会之种种罪恶，种种缺陷，有不得不实行社会革命之决心，我们就应当赶快觉悟！互相研究！互相团结！互相联络！互相扶助而为之！盖社会者，社会人之社会也，社会革命——社会运动，合社会人而运动，而革命之谓也；非个人或少数人，所能成就者；即使之成就，必不是真正之社会运动，社会革命也，我们赶快觉悟！我们赶快结合！我们赶快进行！我们赶快将新社会现在我们的眼前！

（原载《新海丰》创刊号，1921年9月1日出版）

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朱 务 善

中国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当时在日本的同盟会知识分子，为介绍西洋学术，曾写了几篇关于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并节译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片断章节。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①记得还在1918年，李大钊同志为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曾与当时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避免当局的注意，这个团体并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的，与马尔萨士之音相近似，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好象是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机构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开始这个团体并没有展开它的工作，没有吸收广大的革命青年参加。但是李大钊同志这时已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鉴于中国当日政治经济的混乱状态和十月革命给予他的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还在“五四”以前，即在1918年当北洋军阀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就在天安门前高呼：这次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而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同时在《新青年》上面以《Bolshevism的胜利》为题的那篇文章里，李大钊同志特别指出：“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由此可以看到李大钊同志是如何热情向往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俄罗斯十月革命的成功！从此以后，李大钊同志就大力团结先进革命知识分子，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的前途，只有走俄罗斯十月革命的道路。

“五四”以后，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聚集在李大钊同志的周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赞成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们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那时除开始致力于工人运动、发展党的组织而外，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所读的是在《新青年》和其他刊物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以及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其他如考茨基、河上肇等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也都辗转相传，争相阅读。这时不但在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队伍中，即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在李大钊同志主持下，曾几次讨论过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问题。实际上，在1920年初已经组织起来这个研究会，不过还未公开登报而已。开始是利用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书籍，分别阅读。不懂外文的同志，则请通晓外文者帮助他们。再过一个时期，又筹集了一些资金，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买了一批书籍。学习的人渐渐多了，于是就在1921年11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主要是党、团员，也有群众参加。李大钊同志之所以未列名发起人，是因为当时我们组织上考虑到：他是党的领导人，对外界说，他还是以一个教授和一个马克思学说理论家的身份出现的，所以开始时李大钊同志并未出头露面，而只是在党内指导。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经常工作分下列三种形式进行：第一种是将研究会成员分为若干小组，各自研究某一问题，然后开会集体讨论；第二种是定期讲演，约请当时教授学者如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等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国际工人运动作学术报告；第三种是通过公开辩论以达到宣传的目的。记得在这个时期，一方面资产阶级右翼代表如胡适之流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深表不满，大肆诬蔑，另一方面梁启超、张东荪这一班人，也借着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罗素在中国讲学的机会，叫嚷什么中国产业不发达，谈不到社会主义。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就利用这一机会，在沙滩大楼一个大教室里，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大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分赞成与反对两派辩论，邀请李大钊同志作为辩论会的评判员。参加这次辩论会的人都是北京各大学及专门学校的学生和教员，听众很多，连座位都没有了，很多人还拥挤在教室外面听。两方面辩论终结时，听众都想听一听李大钊同志的结论，一时满场俱寂，鸦雀无声。李大钊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张笔记大纲，开始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他慢慢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封建制度因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转变到资本主义制度一样，不是人的意识与感情所能左右的。记得评判员用了河上肇所常用的譬喻来说明这一点：譬如雏鸡在孵化以前，尚在卵壳内部，及其孵化成熟以后，雏鸡必破卵而出，此为必然之理。李大钊同志最后说：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就会更具有说服力。同时他着重指出：此地所说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这绝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可以不要斗争而垂手以待社会主义之到来。李大钊同志说话声音不大，又很沉静，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与坚定性，最能吸引听众的注意，使人悦服。会后，教室里还拥挤着很多人，在那里互相争论，喋喋不休。我还记得有一位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好象是费觉天）最后对我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李大钊同志的发言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不久，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成员竟增加到数十人之多，同时其他各专校也成立了这样的研究会。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样，同为北京党部外围组织。它的活动范围，不只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对进步青年进行政治教育，同时也常参加一般政治、社会活动。这个研究会从成立之日起，就设在马神庙西口北大第二院内（即理科）。在该院西头，辟有不少房间作为学生团体活动之用，研究会占了两间，平日借阅书籍，开讨论会，都在这里。

1960.6.20

（选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年表

1871年：王韬等编译《普法战纪》，以较为原始的形式，在中国最早介绍了巴黎公社革命和巴黎无产阶级壮烈斗争的情况。

1891年：李凤苞著《使德日记》，记录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作者在使德期间所了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活动情况。其中，称德国社会民主党为“莎舍尔德玛噶里”；俄国民意党为“尼赫力士”；法国共产主义为“廓密尼士”。

1899年2月——5月：《万国公报》第121—124册刊载蔡尔康所编撰的《大同学》，在中国首次提到马克思的中文译名，称马克思“以百工领袖著名者”，其学说“主于资本者也”。

1902年10月16日：中国之新民（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著文《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认为麦喀士（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但又诬称，麦喀士“虽能难人，而不能解难于人”，主张用颉德（英国进化论者）取代马克思。

1902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日〕幸德秋水所著的《广长舌》（又名《社会主义广长舌》），该书比较系统，通俗地说明社会主义的含义、目标、产生的根据以及得以实现的必然性；驳斥诬蔑社会主义为“破坏主义”、社会党为“乱民”的种种谬说。

1902年——1903年：文明书局、广智书局分别出版由侯士绾和罗大维所译的《社会主义》（〔日〕村上知至著），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理论，着重论述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同道德、教育等的关系。

1903年2月11日：《译书汇编》第2年第11期刊登君武（马君武）著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文章称马克司（马克思）是“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文后，附录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著作的英文目录。

1903年2月26日：饮冰（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26号发表《中国之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日：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提出社会主义“吾中国固夙有之”。

1903年2月27日：邓实在《政艺通报》第二年癸卯第2号发表《论社会主义》，文章热烈赞扬社会主义“如春花之含苞，嫣然欲吐”，“其主义必将飞扬鼓舞于二十世纪”。

1903年2月：广智书局出版〔日〕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此书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学说以及《哲学的贫困》（译作《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共产党宣言》（译作《共产主义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译作《英国劳动社会之状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译作《经济学之评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作过程和主要内容。

1903年2——4月：《新世界学报》癸卯第2——6期发表〔日〕久松义典著、杜士珍译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认为“近代文明之英华，为欧美现今之最大势力者，社会主义是也”。又说：“社会主义者，非诡激狂暴之空想也。世人不察，以社会党与无政府党相混

淆，实则宗旨颇相异”。但译者仅翻译了原著中评论马克思主义以前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部分。

1903年9月：中国达识社译〔日〕幸德秋水著的《社会主义神髓》。此书基本上依据《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书，表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按：1906年和1907年，分别又有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社（蜀魂遁译）和东京奎文馆书局（创生译）的译本出版。

1903年11月、12月：《新民丛报》第40、41合号和42、43合号连续刊载中国之新民（梁启超）著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文章把垄断资本托拉斯说成“合于麦喀士（马克思）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一阶梯”。

1903年：作新社出版〔日〕矢野龙溪著的《新社会》中译本，此书用通俗的文艺形式，描绘社会主义理想在日本得以实现的途径和方法。按：《大陆报》1902年12月的创刊号上，也曾译载过此书的一部分内容。

1903年底1904年初：作新社出版〔日〕岛田三郎著的《社会主义概评》中译本，此书比较详细地评述了德国、美国、俄国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无政府党的情况。

1905年11月26日：《民报》第1号刊载孙文（孙中山）的《民报发刊词》，文中孙中山将“社会主义”一词改译为“民生主义”，提出“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1906年2月、4月：《民报》第2、3号发表蛰伸（朱执信）著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生平、《共产党宣言》主要内容以及剩余价值学说。

1906年6月25日：《民报》第5号发表劈斋（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介绍了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1906年9月5日：《民报》第7号发表梦蝶生（叶夏生）的《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介绍《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斗争的过程，断言：“社会主义较无政府主义其根据确实”。

1906年10月18日：《新民丛报》第89号发表仲遥的《社会主义论》，宣称社会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两种，马克思主义属于“欲破坏现在之社会组织，以谋再建设者也”的狭义的社会主义。

1907年12月30日：何震在《天义》第13、14卷发表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中附录《〈共产党宣言〉“论妇女问题”案语》，谓“马氏等所主共产说，虽与无政府共产主义不同，而此所言则甚当。彼等之意以为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之废，必俟经济革命以后，可谓探源之论矣”。

1908年1月15日：《天义》第15卷发表《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跋》，称“《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

1908年春：《天义》第16、17、18、19四册合刊刊载申叔（刘师培）的《〈共产党宣言〉序》，文章介绍了共产主义同盟由缘起到解散的过程，认为《宣言》“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但又称：“马氏学说之弊”在于行“民主制

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这一册合刊还登载了〔英〕哈因秃曼Hyndman著、齐民社同人译的《〈社会主义经济论〉首章译者识语》，认为马克思发明历史唯物主义和达尔文发见生物进化论一样，“其功不殊”，“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这一册合刊还登载了志达《女子研究问题》中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识语》，认为恩格斯揭示了婚姻制度的基础在于经济关系，“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始”。

1911年8月13日：渔父（宋教仁）在《民立报》发表《社会主义商榷》，介绍、分析了四种社会主义流派，指出社会主义之发生“盖原于社会组织之弊”，认为中国要提倡社会主义必须“精审其主义自身之性质与作用”，并考察中国的客观现状。文章把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量齐观。

1912年6月2日：上海《新世界》第2期开始连载恩格斯著、施仁荣译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即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者译述了恩格斯这一光辉著作的大部分内容，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国内最早的译述。《新世界》第2期还发表了势伸（蛰伸之误，即朱执信）译述煮尘重治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此即朱执信在1906年发表于《民报》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的一部分，作者删去了其中介绍拉萨尔的内容及对马克思的一些不正确评论，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1912年10月15——17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题为《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的演讲，介绍与评价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演变及其流派，称赞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同时却又认为“现在社会主义尚未若数理天文等学，成为完全科学”。演讲中对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充满了同情。

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庶民的胜利》，热情赞扬十月革命的胜利，宣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新青年》第5卷第5号还发表了李大钊的《BolsheVism的胜利》，文章满怀激情地向中国人民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讴歌欧战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并指出，布尔什维克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即马克思）为宗主的”。

1919年4月1——4日：渊泉在《晨报》副刊发表《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奋斗生涯》，文章着重介绍了马克思如何在贫困、疾病和政治迫害中，以“其坚忍不拔之毅力和献身于世的精神”写作《资本论》的简要过程。作者说明他写作此文的用意在“引起诸君研究社会主义的兴味”。按：同月，此文又稍加修改，以《马克思奋斗生涯》为题，转载于《新青年》第6卷第5号。

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发表舍译的《共产党的宣言》（摘译），是为《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最早的一部分中译文。

1919年5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特别指出阶级斗争“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此外还介绍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重要著作的若干内容。

1919年5月：顾兆熊(顾孟余)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发表《马克思学说》，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认为"'唯物的历史观'，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察法，是一种空前的社会哲学"，它与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一道，构成了马克思整个学说的基础；但文章也介绍了不少伯恩斯坦等的修正主义观点。同时，还发表了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比较客观地叙述了马克思的战斗一生，称赞《共产党宣言》"为近世社会主义之圣经"，《资本论》"实为近世经济学中开一新纪元"。此外，还发表了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作者从唯物史观出发，分析了女子贞操问题的发生、变化过程，认为在中国只有破除封建贞操观念，女子才能"自觉"，中国才能富强。

1919年5月5——8日：《晨报》副刊刊载〔日〕河上肇著、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文章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并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有关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作了详细论述。文章还强调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按：同月此文还载于《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0年6月17日，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也刊载了由陈望道译的译文。

1919年5月8日——6月1日：《晨报》副刊登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此文即是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在中国的最早译作。按：同年7月25——31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也刊载了此文。

1919年6月2日起至11月11日止：《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分138次连载了〔德〕柯祖基（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现译作《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此书由考茨基于1886年撰成，比较通俗、生动地叙述了马克思《资本论》（主要是第一卷）的内容，基本上保持了原著的精神。按：此书后来在中国有很多译本出版，如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溥贤的译本；《建设》杂志也在第一卷第4、5、6号和第二卷第2、3、5号连载了戴季陶的译文等等。

1919年7月21——24、26——30日：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译载了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中的《马氏唯物史观的概要》一文，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并着重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这一内容的部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以及阶级斗争的发展、作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作了简要的阐述。

1919年11月11日：《国民》第二卷第二期刊载马克思、恩格斯著、李泽彰译的《共产党宣言》。译者仅翻译了《宣言》的第一章，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有关《共产党宣言》的部分中文译文之一。

1919年12月1日：《晨报》副刊刊载绍虞（郭绍虞）编著的《马克思年表》，以编年形式，介绍马克思的片断生平。

1920年：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此为《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完整译本。

1920年9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德〕马尔西著、李汉俊根据日译本转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此书通俗介绍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部分思想。

1920年10月1日：《国民》月刊第2卷第3号刊载马克思著、费觉天译的《〈资本论〉自

序》，此即《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马克思所写的《序言》，是现在所知的关于《资本论》最早的部分中文译文。

1920年：李守常（李大钊）著《史学思想讲义》，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氏历史观的大体"。

1921年1月1日：李达在《新青年》第8卷第5号发表《马克思还原》，文章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指出只有伟大的列宁才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1921年1月：《东方杂志》第18卷第1期发表范寿康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文章翻译了马克思在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并依据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一文中的有关观点，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了解释。是目前所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最早中文译文。

1921年6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2号发表李达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文章介绍了列宁领导的"多数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但同时也将"正统派社会主义"（指考茨基派）、"修正派社会主义"（指伯恩斯坦派）、"工团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当作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进行了介绍。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室　吴根梁　王熹民　屠传德）

（原载《文汇报》总编办公室编：《理论探讨》1983年第1期）

〔附〕　李大钊、陈独秀、吴玉章等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的一些资料*

梁　大　为　辑

本馆收藏的《吴虞日记》共六十册。日记时间从一九一一年九月十日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日。

吴虞在日记中记载了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吴玉章等人交往的一些情况，也记录了李大钊等同志一些活动的资料。现按年代摘录出来，供研究党史参考。

1917年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　　晴

饭后李培甫、潘力山来，力山言："陈独秀安徽人年四十余，独立前看易经写小篆、作游山诗。独立后始出而讲新学，人之气象为之一变，长于英文，近于法文亦进，曾游日本，归国后充当教习，盖讲法兰西哲学者。住上海一楼一底，自教其小儿，其长子法文极佳，父

* 原题为《〈吴虞日记〉摘录》，现标题是编者加的。

子各独立，不相谋也”。

五月三日

发陈独秀信，附去《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一首。

九月初五　星期三　晴　午刻，陈岳安送来《新青年》三卷四号一本，余之《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一篇，香祖《女权平议》一篇。香祖文后独秀识语云：“此文作者吴女士即又陵吴先生之夫人也”。可谓特别标识。

九月初八日　星期六　雨　作复君毅书，嘱往访陈独秀、范丽海、恽铁樵、柳亚子诸人。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雨　陈岳安送来《民国日报》一束，中有柳亚子斥朱鸳雏诗话一段云：“吴又陵先生，西蜀大儒，博通古今中外之学，其言非孔自王充、李卓吾以来一人而已，诗亦卓然名家，尤长七言……故耆硕之士如谢无量、陈独秀、章秋桐、刘申叔辈咸深相推服，即仆亦顶礼而尸祝之，以为瞠乎其不可及也。”六年七月三十日报。

1919年

一月二十二日

过吴玉章，陈岳安已先在，谈至十二时予托吴玉章作书与李石曾介绍楷、桓。①

六月二十一日　星六　二十四　雨

今日晨报陈独秀被捕不知何事。

七月十一日　星五　十四　晴

君毅来信，六月三十日发，言叶秉诚六月初三日到京寓张表方处，又言陈独秀敢言敢行与耽玩禅悦之研究系（进步党一派梁启超、汤化龙之系统也），大异其趣。其主宰之每周评论，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吾兄于新闻之中独取此种，为之提倡固是独具只眼者也。研究系近来亦颇研究世界思潮，其在京所出之晨报、国民公报甚好。然近所谓思潮皆个人人格之表现，故就此点言之。渠辈之研究世界思潮亦不过耽玩禅悦弄古董之类而已。吾兄精学多年，每为四川开新风气极为弟所佩服，独惜峻峭少容且不喜联络，故不能大活动耳。

七月十五日

前寄上海群益书店转陈独秀君反对旧道德说稿挂号回条转来。

八月二十四日

午饭后，少荆来约明早往饯星期日留法同人。在少荆处借回大学纪念册——陈独秀字仲甫今年四十二岁，此册有其像，右眉甚高而立。

九月二十一日

饭后戊午日报来，北京十六日来电陈独秀已释放，上海十八日来电蔡元培二十一日北大开校已人校视事，此二消息皆令人欣喜不置。

十二月九日　星期二　十八

晨起坐轿过三圣街十五号访吴玉章，宫仁甫早在，刘季舟并来，玉章令子光长公子号明初者出见，云汝父好友也。

十二月十七日　星三　二十六

吴玉章来谈颇久……玉章言：今日讲学一当研究社会问题从经济着手，一当研究家庭问

题从婚姻着手，极有见地。

十二月十八日　星一　十七

午后三时归，傍晚少荆来约过，孙泳南言吴玉章、刘二仙在彼予即同行。

十二月二十日　　星六

丁毂音来信约明日到戊午社欢迎吴玉章演说。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　　阴、颇寒

饭后过戊午日报社晤吴玉章、熊小岩、赵铁桥、廖学章、王叔驹、丁毂音、李炳英、李培甫、刘二仙、张白坚、陈岳安、李伯申诸人，十二时后由熊小岩致欢迎词，略叙吴玉章历史，旋由玉章演说毕，即照像散会。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午饭后作函约吴玉章下周星三午后一时过外校讲演。

1920年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晴

昨玉章言：胡汉民与杨沧白信云，陈独秀有书与汉民，言川中当道阻抑新文化。沧白复汉民书颇论文学。又言沧白是中山派，而玉章、锦帆诸人则政学会，一主张对德宣战者，蔡孑民、玉章诸人是，反对对德宣战者，中山、沧白诸人是，故杨、熊有意见是在此也。

一月二十四日

桓女信　一月五日夜发　稿

近来张东荪、戴季陶都被仲甫、孑民诸先生痛诋倒霉了，他二位只晓得坐着乱说不贵实行，一面讲平民主义，一面与官僚为伍，所以天下事不看其行，难断以言定人。少年中国学会很惹人注意，他们最重实行的。

1921年

二月二号　　星三　　二十五　晴

楷女②寄回留法女生姓名志愿一览表，录下凡十八人。

留法女生姓名志愿一览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履历	志愿
王曜群	二二	四川犍为	省立第一师范毕业	医学
胡蜀英	二一	成都	省立第一师范毕业	教育美术
吴若膺	二十	成都	四川华美女子中学教授	文学
蒋碧微	二二	江苏宜兴	本县女子师范毕业	音乐
邹紫溟	二三	广东东莞	香港圣氏提范学校③肄业	美术
刘抱蜀	二三	香山	本县女子师范毕业	理化
刘无为	二二	香山	本县女子师范毕业	哲学
梁天泳	二二	南海	本省第一师范毕业	教育哲学

刘粹微	一九	香　山	本省第一师范毕业	生　理
李自新	二五	湖南宁乡	省立第一师范毕业	教育美术
熊叔彬	二五	浏　阳	周南师范毕业	教　育
向警予	二四	溆　浦	周南师范毕业	教　育
范新顺	二三	长　沙	省立第一师范毕业	教育生物
范新群	二二	长　沙	省立第一师范毕业	教　育
舒之锐	二二	长　沙	省立第一师范毕业	史　地
萧淑良	二十	浏　阳	省立第一师范毕业	教育美术
蔡　畅	二十	湘　乡	周南师范毕业	体操音乐
熊季光	二十	浏　阳	周南师范毕业	教　育

七月二十号　星三　十六　晴

至陶然亭会葬陈愚生夫人金绮，晤李守常，许幼田、康心如，心之，雷孝香、孝实、鄢公甫、倪平欧、李之长、康婉明。十二时，雇车过琉璃厂。

八月十六号　星三　阴晴不定

至长美轩，晤蒋梦麟，马夷初、李守常、王弘实、李贻燕、谭仲夔谈久之。

八月十七号　星三　微雨

谭熙鸿、马叙伦、蒋梦麟、李大钊、王兆荣、
王士杰、燕树堂、李贻燕、俞同奎、王家驹、
熊崇煦、邓萃英、张　黻、郑　锦、吴宗栻、
黄人望、尹贵武、张鼎乾、徐　瑾、武绍程、
许绳祖、戴兆元、葛成勋、许瑛璇、唐廷诰、

于本月发起国立八校教职员太平洋问题研究会，并定于十九日午后二时，在前京畿道美术学校开成立大会，凡八校同人，均请出席。

九月九日

楷女自法来信。吴玉章不久即到法。

寄楷女信，言考入巴里大学，教部官费生

十月二十号

顾颉刚来，同往观丛书，又同至图书馆填借书证。晤李守常。复同往观中国书库，提出书多种人研究所。时已十二时。

（选自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0期）

① 楷、植均是吴虞之女。联系勤工俭学事。
② 即表内吴若膺。
③ 原文如此。

〔附〕 实验主义（节录）

胡　适

一　引　论

现今欧美狠有势力的一派哲学，英文叫做Pragmatism，日本人译为“实际主义”。这个名称本来也还可用。但这一派哲学里面，还有许多大同小异的区别，“实际主义”一个名目不能包括一切支派。英文原名Pragmatism本来是皮耳士（C.S.Pairce）提出的。后来詹姆士（William James)把这个主义应用到宗教经验上去，皮耳士觉得这种用法不狠妥当，所以他想把他原来的主义改称为Pragmaticism以别于詹姆士的Pragmatism。英国失勒（J.C.S.Schiller)一派把这个主义的范围更扩充了本来不过是一种辩论的方法，竟变成一种真理论和实在论了，（看詹姆士的Meaning of Truth，页五十一)所以失勒提义改用“人本主义”(Humanism)的名称。美国杜威（John Dewey）一派，仍旧回到皮耳士所用的原意，注重方法论一方面；他又嫌詹姆士和失勒一般人太偏重个体事物和“意志”(Will)的方面，所以他也不愿用Pragmatism的名称，他这一派自称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又可译为“应用主义”或“器用主义”。

因为这一派里面有这许多区别，所以不能不用一个涵义最广的总名称。“实际主义”四个字可让给詹姆士独占。我们另用“实验主义”的名目来做这一派哲学的总名。就这两个名词的本义看来，“实际主义”（Pragmatism）注重实际的效果；“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虽然也注重实际的效果，但他更能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这一派哲学的始祖皮耳士常说他的新哲学不是别的，就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the laboratory attitude of mind）。这种态度是这种哲学的各派所公认的，所以我们可用来做一个“类名”。

以上两段论实验主义的名目，也可表现实验主义和科学的关系。这种新哲学完全是近代科学发达的结果。十九世纪乃是科学史上最光荣的时代，不但科学的范围更扩大了，器械更完备了，方法更精密了；最重要的是科学的基本观念都经过了一番自觉的评判，受了一番根本的大变迁。这些科学基本观念之中，有两个重要的变迁，都同实验主义有绝大的关系。

第一，是科学家对于科学律例的态度的变迁。从前崇拜科学的人，大概有一种迷信，以为科学的律例都是一定不变的天经地义。他们以为天地万物都有永久不变的“天理”，这些天理发见之后，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但是这种“天经地义”的态度，近几十年来渐渐的更变了。科学家渐渐的觉得这种天经地义的迷信态度很可以阻碍科学的进步；况且他们研究科学的历史，知道科学上许多发明都是运用“假设”的效果；因此他们渐渐的觉悟，知道现在所有的科学律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譬如行星的运行，古人天天看见日出于东，落于西，并不觉得什么可怪。后来有人问日落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人说日并不落下，日挂在天上，跟着天旋转，转到西方又转向北方，离开远了，我们看不见他，便说日落了，其实不曾落。(看王充《论衡》说日篇。)这是一种假设

的解释。后来有人说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从地下绕出；更进一步，说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行动；再进一步，说日月绕地成圆圈的轨道，一切星辰也依着圆圈运行。

这是第二种假设的解释，在当时都推为科学的律例。后来天文学格外进步了，于是有歌白尼出来说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别种行星都绕日而行，并不是日月星辰绕地而行。这是第三个假设的解释。后来的科学家，如恺柏勒（Keppler），如牛敦（Newton），把歌白尼的假设说得格外周密。自此以后，人都觉得这种假设把行星的运行说得最圆满，没有别种假设可比得上他，因此他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了。即此一条律例看来，便可见这种律例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得满人意；就是真的，解释得不满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假设来代他了。不但物理学化学的律例是这样的。就是平常人最信仰，最推崇为永永不磨的数学定理，也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我们学过平常的几何学的，都知道一个三角形内的三只角之和等于两只直角；又知道一条直线外的一点上只可作一条线与那条直线平行。这不是几何学上的天经地义吗？但是近来有两派新几何学出现，一派是罗贝邱司基（Lobatschewsky）的几何，说三角形内的三只角加起来小于两直角，又说在一点上可作无数线和一条直线平行；还有一派是利曼（Riemanr）的几何，说三角形内的三角之和大于两直角，又说一点上所作的线没有一条和点外的直线平行。这两派新几何学（我现在不能细说），都不是疯子说疯话，都有可成立的理由。于是平常人和古代哲学家所同声尊为天经地义的几何学定理，也不能不看作一些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了。（看 Poineare, Science and Hypothesis, Chapters III, V, and IX, ）

这一段说从前认作天经地义的科学律例如今都变成了人造的最方便最适用的假设。这种态度的变迁涵有三种意义：（一）科学律例是人造的，（二）是假定的，—是全靠他解释事实能不能满意，方才可定他是不是适用的，（三）并不是永永不变的天理，—天地间也许有这种永永不变的天理，但我们不能说我们所拟的律例就是天理；我们所假设的律例不过是记载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自然变化的“速记法”。这种对于科学律例的新态度，是实验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学理。实验主义绝不承认我们所谓“真理”就是永永不变的天理；他只承认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这就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

此外十九世纪还有第二种大变迁也是和实验主义有极重要的关系的。这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最重要的书名为《物种的由来》。从古以来，讲进化的人本不少，但总不曾明白主张“物种”是变迁进化的结果。哲学家大概把一切“物种”（Species）认作最初同时发生的，发生以来，永永不变，古今如一。中国古代的荀子说，“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杨倞注说，“类，种类，谓若牛马也。言种类不乖悖，虽久而理同。今之牛马与古不殊，何至于人而独异哉？”（看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页三百十一至三百十三）。这是说物的种类是一成不变的。古代的西洋学者如亚里士多德一辈人也是主张物种不变的。这种物类不变的观念，在哲学史上狠有大影响。荀子主张物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他说那些主张“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的人都是“妄人”。西洋古代哲学因为主张物类不变，故也把真理看作一成不变：个体的人物仅管有生老死灭的变化，但“人”“牛”“马”等等种类是不变化的；个体的事实仅管变来变去，但那些全称的普遍的“真理”是永久不变的。到了达尔文方才敢大胆宣言物的种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一个“由来”，都经过了许多变

化，方才到今日的种类；到了今日，仍旧可使种类变迁，如种树的可以接树，养鸡的可以接鸡，都可得到特别的种类。不但种类变化真理也变化。种类的变化是适应环境的结果，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环境变了，真理也随时改变。宣统年间的忠君观念已不是雍正乾隆年间的忠君观念了，民国成立以来，这个观念竟全行丢了，用不着了。知道天下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方才可以起一种知识上的责任心：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那绝对存立的"道"哪"理"哪，乃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那绝对的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证据的，是不能证实的。因此古来的哲学家可以随便乱说，这个人说是"道"，那个人说是"理"，第三人说是"气"，第四人说是"无"，第五人说是"上帝"，第六人说是"太极"，第七人说是"无极"。你和我都不能断定那一个说的是，那一个说的不是，只好由他们乱说罢了。我们现在且莫问那绝对究竟的真理，只须问我们在这个时候，遇着这个境地，应该怎样对付他：这种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便是"这个真理"。这一类"这个真理"是实在的，是具体的，是特别的，是有凭据的，是可以证实的。因为这个真理是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所以他若不能对付，便不是真理；他能对付，便是真理；所以说他是可以证实的。

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尔文以来，各种学问都受了他的影响。但是哲学是最守旧的东西，这六十年来，哲学家所用的"进化"观念仍旧是海智尔（Hegel）的进化观念，不是达尔文的物种由来的进化观念。（这话说来狠长，将来再说罢。）到了实验主义一派的哲学家，方才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拿来批评哲学上的问题，拿来讨论真理，拿来研究道德。

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e 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

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譬如研究"真理"，就该问，这个意思何以受人恭维，尊为"真理"？又如研究哲学上的问题，就该问，为什么哲学史上发生这个问题呢？又如研究道德习惯，就该问，这种道德观念（例如"爱国"心）何以应该尊崇呢？这种风俗（例如"纳妾"）何以能成为公认的风俗呢？这种历史的态度便是实验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以上泛论实验主义的两个根本观念第一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这两个基本观念都是十九世纪科学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

（原载《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15日出版）

〔附〕杜威先生与中国

（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胡　适

杜威先生今天离开北京，起程归国了。杜威先生于民国八年五月一日——"五四"的前三天——到上海，在中国共住了两年零两月。中国的地方他到过并且讲演过的，有奉天直隶

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种长期讲演录已经过第十版了，其余各种小讲演录——如山西的，南京的，北京学术讲演会的，——几乎数也数不清楚了！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这句预言初听了似乎太武断了。但是我们可以举两个理由：

第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国的讲演也要算教育的讲演为最多。当这个教育破产的时代，他的学说自然没有实行的机会。但他的种子确已散布不少了。将来各地的"试验学校"渐渐的发生，杜威的教育学说有了试验的机会，那才是杜威哲学开花结子的时候呢！现在的杜威，还只是一个盛名；十年二十年后的杜威，变成了无数杜威式的试验学校，直接或间接影响全中国的教育，那种影响不应该比现在更大千百倍吗？

第二，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分开来可作两步说：

（1）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O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

（2）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第一件，——注意具体的境地——使我们免去许多无谓的假问题，省去许多无意义的争论。第二件，——一切学理都看作假设——可以解放许多"古人的奴隶"。第三件，——实验——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

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杜威先生虽去了，他的方法将来一定会得更多的信徒。国内敬爱杜威先生的人若都能注意于推行他所提倡的这两种方法，使历史的观念与实验的态度渐渐的变成思想界的风尚与习惯，那时候，这种哲学的影响之大，恐怕我们最大胆的想象力也还推测不完呢。

因为这两种理由，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

杜威先生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他这两年之中，对我们中国人，他是我们的良师好友；对于国外，他还替我们做了两年的译人与辩护士。他在《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和"亚细亚"（Asia）两个杂志上发表的几十篇文章，都是用最忠实的态度对于世界

为我们作解释的。因为他的人格高尚，故世界的人对于他的评判几乎没有异议（除了朴兰德Bland一流的妄人）。杜威这两年来对中国尽的这种义务，真应该受我们很诚恳的感谢。

我们对于杜威先生一家的归国，都感觉很深挚的别意。我们祝他们海上平安！

（原载1921年7月13日《民国日报》副刊。又见《胡适文存》卷2）

〔附〕基尔特社会主义（节录）

虞　裳

…………

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英国A·R·Orage一派人所提倡的新社会主义。这种主义的提倡，是一千九百十三年以来的事。论他的历史，虽然还是很短，然而在英国却已变成了一种最有力量的新产业组织的哲学。提倡他的人，都认他为解放工人的唯一方法。我现在先介绍些他的大概。

基尔特是中世纪的一种同业组合。基尔特社会主义，是把生产者的同业组合为经济组织的基础之一种社会制度。他不单以回复中世纪的基尔特为目的，他以适应于近代产业之全国的基尔特之组织为理想。换一句话，就是组织从事于某种产业的各种工人——包括劳心和劳力的两种——之全国的基尔特。各种产业，都从各该产业的基尔特实行民主的管理，废除现在的工钱制度。他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方面实现产业的民主主义，——生产者自己管理他的生产——同时在他方面把所有一切重要问题，与国家共同管理，革除为生产者的利益而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之危险。

基尔特虽把一切重要问题与国家共同管理，然而却有两个条件：第一，就是这个国家，须有产业的民主主义的精神之国家。第二，就是以重要问题为限。基尔特内部细密的地方，国家没有干涉他的权利。

基尔特社会主义虽是承认国家和他的职分，然而决不把政治搁在经济的上面。他一面划分经济和政治的区域，一面把经济搁在政治的上面。他以为现在的政治家，因为兼管经济上的职务，对于他本身政治上的职务反不能发挥尽至。政治家所受经济上的烦恼，恰和科学者所受家庭间的烦恼一样。若是科学者专心研究，不问家庭间的事务，他所研究的结果，一定比较的更好。政治家专心政治，不管经济上的事务，他的政治的成绩，也一定比较的更好。所以他把政治专管社会一般的公共事务，把经济事务完全划出政治的范围，实行产业的民主主义。那时政治的实质和范围，比较现在的政治，一定大不相类。至于基尔特完全自治，为新社会组织的基础，他的经济关系，当然在政治关系之上。这便是把经济搁在政治的上面之理由了。

基尔特一方面代替资本阶级，他方面代替国家，对于他的团员之物质上的生活，担负完全责任。基尔特团员的权利，一律平等。无论工作，失业，健康，疾病，基尔特都有保障团员的生活之义务。工作时间和其他工作条件，各基尔特都用民主的方法自决，强制执行。各

基尔特间都有密切联络的必要。有直接关系的各基尔特间更有密切联络的必要。他们对于所使用的生产机关，并没有所有权，对于生产物，也不能当作私有，应得和代表全社会的国家共同管理。

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集产主义最相似的一点，就是把一切生产用具，如土地、矿山、工场、机械等，都归于代表社会全体的国家。其最相反的一点，就是关于一切产业的管理。在集产主义之下，国家管理一切产业；把统一代分裂，把集合意思代个人意思；不要求产业别的社会的管理，却要求囊括一切的国家的管理。总之，集产主义是完全要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即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而在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下，以实行产业的民治，废除工钱制度为主义，以基尔特为经济组织的基础。

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最相似的一点，就是主张扑灭现在的资本主义，由工人团体管理一切产业。其最相反的一点，就是对于国家的意见。工团主义以颠覆政治的国家组织为职志，依工人直接行动的结果，改造现社会。而基尔特社会主义则在相当限度以内，承认国家的权力和政治的作用。

以上三种主义，都是改造现社会的组织之方式。集产主义极端偏重国家的权力。工团主义极端偏重工人的权力。而基尔特社会主义乃是折衷集产、工团两主义。一方面承认国家之存在，他方面反对国家管理产业。一方面要求生产者的自由，他方面要求消费者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实现生产者的自由之产业的基尔特，他方面要求保证消费者的自由之国家。一方面要求彻底的改造，他方面预防绝端之流弊。这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特色。

基尔特社会主义虽是不排斥国家，然而对于国家社会主义——集产主义——却是猛烈的反对。第一，他以为国家社会主义是和民主主义相反的，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官僚主义。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把一切产业收归国有，委托官吏经营，产业上实际的管理既不属于生产者，决不算是产业的民主主义。这种主义的组织，决不能和民主主义的精神符合。所谓产业的社会化，本是指国家的所有，不是指国家的经营。第二，他以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质，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不主张废除工钱制度：不过国家独占生产，把个人资本主义移为国家资本主义。一方面排除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一方面却依旧保持营利主义。这种改造，对于现在产业上的大缺点，实在不是彻底救治；不过把组织变一形式，现在产业上的大缺点，却依旧存在。第三，他以为国家社会主义助长消费者的专横。一般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人，以为现在经济界的弊害，完全因生产者的专横而发生。今当牺牲生产者的利益以增进消费者的利益为目的。这种见解，虽似有理，而实际事情，决不是这样。因为一般消费者，本没有庇护正直的生产者的意志。他们但求购买贱物；一般生产者，便迎合消费者的心理而活动。这是生产者的自卫行动。现在产业界上的一种无政府的状态，其实都为消费者的专横所诱成。若是在国家的营利主义之下，这种专横，非但不能除去，却反助其增长。况且不生产而消费者，都是怠惰的人，若是专着眼于消费者的利益，岂不是奖励怠惰么？这便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他的意思。

基尔特社会主义一方面攻击国家社会主义的消费者本位，他方面却不满于工团主义的生产者本位。两两对照，最有趣味。基尔特社会主义所以承认国家的理由，就因为把国家当做消费者的代表之缘故。他以为社会不单以生产者而存在；生产者以外，还有消费者的一大部分，若是照工团主义的主张，把一切产业都归生产者完全支配管理，这便不免生产者牺牲消

费者的利益以利自己。因为给绝对的权利与各工人团体，势必至酿成集团的利益占夺，违反社会公平的原则。所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也不满于工团主义的生产者本位。

…………

（原载《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出版）

〔附〕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

1914年7月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成立于上海，聚会既华，乃公布宣言书于众曰：

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

资本制度者，平民第一之仇敌，而社会罪恶之源泉也。土地资本器械均操之不劳动之地主资本家之手，吾平民为服奴隶之工役，所生产之大利，悉入少数不劳动者之囊橐。而劳动以致此生产者反疾苦穷愁，不聊其生。社会一切之罪恶，匪不由是而起。故吾党誓歼此巨憝，废除财产私有权，凡一切生产机关，今日操之少数人之手者（土地工厂及一切制造生产之器械等等），悉数取回，归之社会公有。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无男无女，人人各视其力之所能，从事于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衣食房屋及一切生产——劳动者自由取用之，而无所限制。

政府者，名为治民，实即侵夺吾民之自由，吾平民之蠡贼也。吾人有自由生活之权利，有个人自治之本能，无需乎强权之统治者也。故政府必废，将来之社会，各个人完全自由，无复一切以人治人之强权，是之谓"无政府"。行无政府于共产社会，是之谓无政府共产主义。

抑"无政府"以反对强权为要义，故现社会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吾党一切排斥之扫除之，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所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斯时也，社会上惟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义，惟有工作之幸乐。

吾人所欲实现无政府共产之社会，所用之唯一手段则曰"革命"。（革命者，非但起革命军之谓之也，反持革命之精神，仗吾平民自己之实力，以与强权之战斗之一切行动，皆曰革命，）对于真理之障碍物，以"直接行动"铲除之，无所容其犹豫。

吾党乃宣言于支那之平民曰：无政府共产主义，乃光明美善之主义，出汝等于地狱，使入正当愉快之社会者也。"无政府"乃社会进化必至之境，近世纪科学之发明，与夫进化之趋势，皆宛与无政府之哲理相吻合。故谓"无政府"为理想世界无从实现者非也。无政府之社会，人人自由，人人自治，以独立之精神，以互助之大道，其组织之美善，必远胜于政府之代谋。故不必虑无政府即秩序扰乱也。无政府党万国联合，不但为一国说法。故中国无政府他国必来干涉之说亦不必虑也。吾人之反对资本制度，乃主张废除资本之私有，非但反对大资本家而止。故中国尚无大资本家社会革命非所急务之说亦不足以阻吾人之前进也。人类之罪恶，实生于社会制度之不良，吾人改造现社会之组织，即所以灭除人类罪恶之根苗。改造社会，同时即改造个人，故人类道德不良不可无政府之说亦无由成立也。总之无政府共产乃人类天然生活之本则，社会进化之要道，亦为20世纪不可避之趋势。吾人可无庸疑虑者

也。

又宣言于支那之同志曰：无政府共产之实行，赖乎吾党之实力。而欲增进吾党之实力，则联合全体，一致进行，实为今日惟一之要务。凡我同志，当各在其所在地与宗旨相同者联络为一。相其情势，创设自由集合之团体（或为秘密之组织或为表面研究学术之机关）。以为传播主义联络同志之机关，以为将来组织联合会之预备。联合会未成立以前，则以本社为暂时之交通机关，无论为个人，为团体，均望随时与本社互通声气。各使散在各地之同志，精神上皆联为一体，实际上皆一致进行。

又宣言于世界各国之同志曰："万国联合"，已为吾党今日一致之趋势，吾人虽不敏，窃愿互相携手，向此同一之途径而行，当支那无政府党联合会未成立之前，暂以吾社为交通机关，凡世界各国吾党之团体或个人，均望随时与本社互通声气。凡吾党之国际的行动，本社同人愿勉力担任之。

我辈向前进！　　无政府万岁！　　1914年7月

（《民声》第17期1914年7月4日）

（选自《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

〔附〕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告同志书

吾亲爱之同志乎！吾等之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已宣布成立矣！良心正义，直破愁云惨淡之广州而吐出光芒，吾等之喜可知也。然同志中亦有未能深悉吾人之旨趣，以至怀疑莫决，裹足不前者，故不可不有以慰之也。

同志乎！君等既怀抱无政府宏愿矣。将欲为一洁己自爱之道德家以长终乎，抑为一徒托空言之言论家，挟此主义之皮毛，快一时之口舌而已乎！吾知君等必曰：否否。吾等将必……（原省略）也。然则吾等可以起矣。矧广州固吾党之一小纪念地也。今昔日灿烂绚美之花，随风雨飘零而去乎？

本社之设原因有二：一，诸同志散处各方，不可无精神上团结之方法，使之互相砥砺，冀道行学识均随之而日增。否则吾道将长此默默，必至疑者不信，信者转疑而已；二，凡事力分则难集，力聚则易周，吾人现受此社会上种种之压迫，个人进行上每有所苦，故不可无一团结坚固之团体，以为合力的传播，一致的进行。此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之所以必当创立者也。诸同志倘有疑本社为结党性质，与无政府主义原旨已相刺谬者。吾等当有以解其惑，夫无政府党之所以不取党制行动者。其意若曰："吾人行事依于自由为原则，吾人惟当各视己力之所能者为之，不必借全党之力，为规则之组织"而已，非曰："无政府党不当有团体"也。无政府党之团体，视犹各个人之集合体，各个人均有自由自主之权，虽为同群合一之运动，而仍与个人主权未尝冲突。既无首领以为统治，复无阶级以别高下，故此种团体，实毫无普通党会之性质，此团体内之分子，各有完全之自由者也。欧洲诸国，无政府党之全国联合会，所在多有，无政府党人自由集合之小团体，更不可胜数。（各大都市，常有一城中分区之小团体，多至十数处者。）迩者万国大会，且预定有无政府党万国机关之组织，然则吾等之同志社，又何足异之有乎！

广州处于恶政府势力之下，或有以强权为虑者。呜乎！吾人之受制于强权，岂自今日始

哉。政府者，万恶之原，强权之母也。欲无强权，必自无政府始。今吾人生活于有政府之世，而鼓吹无政府之事，必将躬冒大难，以与强权相见矣。诸同志乎！天下乌有能脱去强权之羁绊，优悠快活以传播无政府主义者，呜乎！强权乎，反抗耳。吾人惟恃此至死不朽之精神以与之恶战而已。强权愈凶，则反抗亦当愈烈，最终之胜利，吾人必将得之。此可断言者也。而此恶战期中，则惟有前赴后继，百折不回，如是而已。

顾吾等今日之同志社，其性质特为研究学理传达主义之团体耳。文明各国，本无对此种团体横加干涉之理。虽今日之中国，不足以语此，则吾人亦惟有预备实力，以对付外来之干涉，其他不必问也。不观南京之无政府主义讨论会、常熟之无政府主义传播社，皆屹然存立于鸿张势力之下乎。迩者沪上又发起无政府主义同志社矣。读其宣言，读其致万国无政府党大会书，足以破东方之沈梦，示吾人以警钟，并诱使吾亚细亚之平民，与欧洲之平民，携手而竟将来之大事也。呜乎！广州者，非此主义输入支那较先之地乎！又非吾党同志多数之产地乎！而交通机关之组织，迟至今日始露端倪。此则吾人当引以为深憾者也。乃同志中尚有首鼠两端，畏法惧军者。是则适足为无政府党人之羞耳。同志诸君乎！吾等惟知有神圣之主义耳。以死自励，更乌知有强权，我诸同志亦有闻而兴起者乎！吾等请先自誓曰：决死！曰：毋畏！。

（《民声》第19期1914年7月18日）

（选自《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

〔附〕 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

凌　霜

近日友人从北京寄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其中持论颇为新颖，记者极为钦佩。内有《今日世界之新潮》一篇，似有可研究之处，亟本所知，略为批评如次：

原文第一二段好象没有什么要紧的话，然而却有几句很要紧很精确的，就是：

“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

第三段说：

“革命以后（按此指社会革命），民主主义同社会政策必定相辅而行。大概的趋向，大约可以分为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经济方面的趋向，将来都偏重保护政策，以一切的实业全受社会主义支配，使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有可以享受的幸福。威尔博士说：‘以后民主主义想达到他的目的，必定要将一切的实业收归政府所有，为政府所管；税制必须改革；经济上不完备不正当的组织必须改良纠正。但是实行这大的改革，如何可以没有流弊呢？’威尔博士又说：‘以后凡一切处治遗财私产同订立契约等事，必须取决于法律；法律生于立政、行政、司法三机关；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又产生于地方选举。所以正本清源的法门，我们当先从选举方面着手。民主主义若是要统一政治，必定要有五个条件：……’看威尔博士这番话同近来路透社的专电，欧洲现在的潮流向着这方跑是确切无疑的了。”

我们想明白这一段文章是不是确当，第一：要说明民主主义是什么；社会政策是什么；社会主义又是什么。第二：要说明法国式的革命所主张的是什么；俄国式的革命所主张的又是什么。

“民主主义”Democracy 在政治学上说，系一种政府，其国民或直接自治，或被治于代表。今日各国盛行的制度就是民主主义。法国式的政治革命也是主张这个民主主义。民主主义国家不承认社会革命，即法国式的革命。

“社会政策”Social Politics 社会政策不主张从根本上推翻现在社会的组织，但想借政府的力施行各种政策，来补救现在社会的不平。如限制资本家，保护劳动家，行累进税和单一税，设立公共教养机关，这都是社会政策。这种种的政策，欧洲各文明国已有实行的了。所以我们常说，社会政策系民主主义制度下较良的政策，却非社会革命所主张的。

“社会主义”Socialism社会主义反对私有财产，主张以生产机关（土地、机器等）归之社会共有，这是各种社会主义根本的出发点。但是对于生产物的分配方法有好几种，所以分为种种派别；然而粗枝大叶分别起来，不外“共产社会主义”和“集产社会主义”两种。(世称“国家社会主义”Socialisme d'Eiat、“科学社会主义”Socialisme Scientifique 和那“社会民主主义”Democratie Sociale，都是“集产社会主义”。德国马克斯算做他的创造人。）共产主义主张生产机关及生产的物属诸社会，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集产社会主义主张生产机关属之公有，他的生产物由国家或社会分配。两派虽有不同，但想实行他的主义，必定推翻现社会组织，由资本家手里取回生产机关，两派却没有分别。社会主义的首创家如圣西门St.simon、福烈Fourier、蒲鲁东Proudhon 都不敢主张“社会革命”R'evolution Sociale。到了一八六四年，万国劳动会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成立，形成“近世社会主义”Socialisme moderne，始敢大声宣言“社会革命”。现在俄、德的革命就是社会革命的表见。然而民主主义的国家和主张社会政策的人却不大赞成的。

以上草草将民主主义、社会政策和社会主义已经分别清楚了；我们又知道法国式的革命主张的是什么，俄国式的革命主张的又是什么；那原文说：“革命以后，民主主义同社会政策必定相辅而行”，自然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原文又说：“将来都偏重保护政策，一切的实业全受社会主义的支配”。保护政策系资本主义对劳动家所说的，社会政策就是主张这个。若一切实业全受社会主义支配，那里还有保护政策呢？说到这里，作者忽引入威尔博士的言来做根据。威尔的言是主张民主主义而又夹些社会政策的意味的。据我的鄙见推测起来，威尔博士必不主张社会革命，而社会党也没有这种拉杂的主张。照这样说来，社会革命以后的组织决不是这样。以下虽说什么五个条件，岂不是削足适履么？然而欧洲现在的新潮究竟是什么样？这也一言难尽。日本人布施胜治著有《露国革命记》，说得很详细，请读者自己去参看罢。但有一件可以相告的，就是：马克斯的集产主义现在已不为多数社会党所信仰。近来万国社会党所取决的，实为共产主义。（马克斯派的不当，下文略说明之。）

原文接着说道：

> “但是我还有几句话要申明：就是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固无大区别，就是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也是相关的，而不是反对的。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

民主主义，经济上许可自由竞争，所以有资本家劳动家的分别。社会主义主张一切生产

机关都归社会所有，人人都是劳动家，没有现在的"托辣司"。这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区别，作者乃一勾抹杀，说这两个主义没有大区别，恐怕有点不对罢！

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也有很大的分别，克仑瑞[①]所分的就是：

（一）个人主义　主张私的生产、私的消费。

（二）社会主义　主张共同生产、共同消费。

以上两条解说，已经将个人主义同社会主义不相同的点分别清楚，但是集产社会主义还有与个人主义不相容的，因为集产社会主义以国家为万能，所以蔑视个人，故变成极端干涉主义。由此可见，集产社会主义为个人主义的敌人，作者乃谓"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也是相关的，而不是反对的"，岂不是囫囵吞过么？但是"近代社会主义"却渐趋于"无政府主义"Anarchisme[②]，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个人主义的好朋友。若是作者从这一方面说"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也是相关的，而不是反对的"，也未尝不可[③]；但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政府，和原文说些什么立法、行政、司法的话，根本上已有不对，所以我认作者的主张为集产社会主义，说他和个人主义是相反的呢。

原文第四段说：

> "这个潮流涌入德、奥国内，尚无十分危险；因为德、奥人民大都受过教育，兵工两界也都是有常识的。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很；因为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知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名其妙的照他人榜样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吗"？

普通人民对于社会革命每每怀着这样的疑虑，其实智识问题不成重要的问题，我们试看十年前中国保皇党和革命党的争论可知。庚戌年我还听说满清预备十年以后才开国会，那里知道，不到三年，革命起了，国会也开了几次。所以我不信智识问题足为社会革命的阻碍。德、奥平民的知识恐怕也不是很高深罢。况社会革命的真理没有什么深妙玄微的地方，叫他们知固然容易，叫他们行也不算难；但是传播这种真理给人人都晓得，这是先觉的责任了。至于"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名其妙的照他人榜模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世界吗？"不知道社会主义正为兵士、流氓、土匪太多，所以倡改造社会的论调来救济他们，给他们复回"人"的本位，不要做杀人放火的兵士，做劫掠的土匪，做随街叫化的流民；而要人人尽力去取回生产的机关，从事劳动。纵使一时有不安的现状，这是资本家和劳动家的战争，有什么希奇？我们要晓得社会革命和科学革命不同，社会革命是将全社会的恶制度从根本上推翻，拿新的来替代了他；若是畏首畏尾，这简直是基督教的改良主义，还能算做社会革命么？而作者所说的："我们何妨架起帆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也算多事了。

原文第五段又说：

> "我们将来所希望的成功，是平民伟人的成功，不是贵族伟人的成功。所以我们与其崇拜大彼得，不如崇拜华盛顿；与其崇拜俾士麦，不如崇拜佛兰克林；与其崇拜雷歇奴Richelieu的理财，不如崇拜马克斯 Karl Marx 的经济；与其崇拜克虏伯的制造，不如崇拜爱狄生的发明。……"

---

① Klein Wachter, Lehrbuch der NationalŌkonomie S.159.

② James Bonar, Socialism (Se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1th Ed.Vol.25.P.301).

③ 详见马凌甫译津村松秀著《国民经济学原论》812页。

平民伟人是什么？崇拜又是什么？科学家发明真理，我们就应该崇拜他做平民伟人么？社会革命的时代大彼得固然不要崇拜，华盛顿恐怕也受不起社会革命党的崇拜呢。还有那马克斯，虽然现在还有许多人崇拜他的玄想的经济学Metaphysical Economics，我们却是反对的很。马克斯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是主张集产的。其中关于学理与经济两部分，实由一八四三年Considerant's：principles of socialism：Manifosto of the xlxth Century Democracy而来。至于实行的一部分，又抄自巴布夫Babeuf和班那洛奚Buonarroti秘密共产党的唾余。① 更进一步来说，社会是对个人而说的，所以既称为社会主义，则凡社会的物，概当属之公有，却不能为个人所私有。现在集产主义，以衣食房屋之类可以私有，是明明尚有个人财产，根本上已背乎社会主义的定义；况且同一房屋，牛马的圈厩既为公有，人居的房舍则为私有，于理论上也说不上去。还有一层，集产者主张按各人的劳动多寡来给他的酬报，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能力薄弱的缘故，或关乎生理，却非其人懒惰的罪，而结果不幸如此，还说什么幸福呢？② 所以我们极端反对马克斯的集产社会主义。作者说得好："近来中国学问界异常寂寞，对于世界上的新学理几乎一无知闻，就是对于一切不合真理、早经世界上大学问家驳倒了的学说，还是'奉如环宝'、'视若家珍'，你说可怜不可怜呢？我很望大家不要奉集产主义为环宝，为家珍。"

（《进化》1卷2期，1919年2月20日）

（选自《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

〔附〕 为什么反对布尔雪维克？

A.F

"反布尔雪维克！""反布尔雪维克！"这种声浪到处都有。独吾友AD和AA君，反对得很别致，从理论上反对。我也是反对布尔雪维克的，却不赞成他们的主张。他们的辩论，诸君当然看见了，那么我请说我的。

AD君说，布尔雪维克陷入二重的矛盾，既反对资本主义，却又造成资本主义的国家，反来攻击他人的资本主义。关于这一层，我以为AD君错了。

资本是什么？资本主义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国家又是什么？

马克思说："只有劳动家当享受生产的结果，因为只有劳动力能够创造新价值"。Welsh说："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只有资本家当享受生产的结果，因为没有资本，决不会有新价值出现"。这时我们当注意的就是资本的意义，此处资本是包括土地而言。那么要创造一种新价值，固然离不了资本，但资本还是从劳动里来。因此马克思说，只有劳力能够创造新价值。这话很是。但劳力尽管充足，若无土地也不能创造什么东西。因此，Welsh说，若无资本，决不能得一种新价值。这话也很是。那么到底谁能够创造新价值，劳力也不能创造新价值。那么新价值又从何处得来？不是从资本，也不是从劳力，是从资本和劳力的合拢里得

① Kropotkin, Modern Science and Anarchism, P.57.

② 师复著《伏虎集》第13页。

来。劳力之所以成为劳力，赖有资本；土地等等之所以成为资本，又是赖有劳力。合拢来，有劳力也有资本，才有新价值；分开看，便无劳力更无资本，那么那里还有新价值？

至于所谓泛劳主义，并不是不要资本。所谓资本主义，也不是不要劳力。不过一个说资本万能，一个说劳力万能，各有所偏罢了。

所谓资本主义的国家，不过说那国家的政策全凭资本主义而决定，最显著的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国家的一种政策，却是资本主义所造成。其次说那国家的机关里人物都是资本家，或是资本家的伙计，最显著的就是欧战，无论那国当决定战和时，莫不先请教资本家的意旨。其次说那国家的存在专为资本家谋利益，最显著的，好比五一节工人游巡，政府就加以干涉。所谓资本主义的国家就是指这三种意思的总和而言罢了。那么资本是什么，资本主义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国家又是什么，当可明白。

那么布尔雪维克是将资本集中，使国家经理生产和消费事项不是和资本一般，借资本以维持个人淫欲；是打破资本阶级，使人人都劳动，不是使一部分人出劳力，一部分人出资本。换句话说，布尔雪维克反对资本主义，却不反对资本的作用。因为资本的作用是吾人生存的要素，永远不能废除。好比蜂子衔花，虫蚁衔食，摆在巢里，这都是一种资本的作用。我们到了夏天，把夹衣和棉衣收拾起来，摆在箱里，这也是一种资本的作用。资本的作用永远不能免除。我们人之所以优于他种动物，全因我们资本的作用发达，知道蓄积，以备不虞，以备创造他项物质之用。据经济史上看来，最初原始时代，我们人能否知道资本的作用，实在是个问题。好比今日的中国缺乏资本的作用，我们只想设法子弄些资本，改进物质文明，却不赞成资本主义。因为资本和劳力是不可分，我们只要资本和劳力的合拢，单纯的资本是无用。所以资本和资本主义是两件东西。布尔雪维克赞成泛劳主义，也赞成资本的作用，于是国家社会主义成功。他是主张资本的作用，不是主张资本主义。AD君不把资本、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分明白，就说布尔札维克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二重矛盾，未免近于武断。任凭是什么党，是无政府党或社会党，没有一个反对资本的作用。好比阿云（即欧文——编者）、福煦烈（即傅利叶——编者），当他们试验他们的理想时，他（们）也招集多少资本，弄些房屋和土地，这都是实行那资本的作用。布尔雪维克的国家的特色有两种：

第一，就是除开监督人民犯罪等事外，并且经理生产和消费事项，所以这种国家可叫做管理物品的国家。

第二，就是阶级的国家"Class State"，劳民阶级的国家，不是资本阶级的国家。象AD君说布尔雪维克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我以为观察不精透。如果AD君说布尔雪维克确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难道象武者小路、福煦烈、阿云，他们的新村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你我穷学生都是资本家吗？我想未必然。布尔雪维克将资本集中，是大规模的实行资本的作用，象我们不过小规模的实行罢了，其实行资本的作用则一。小白是白，大白难道是黑？所谓资本的作用是合劳力而言。所谓资本主义是说资本、劳力不过附属品罢了。

总之，因为资本、资本主义是两件东西，所以布尔雪维克并未陷入二重矛盾，并非资本主义的国家。

其次AD君说阶级专制是不合于德模克拉西的精神，这话我承认；不过阶级斗争就因此而反对，我以为还待考求。说到这里，我们就当把社会革命、阶级斗争、阶级专制三者分清白。

社会革命不必就是阶级斗争，如AA君所说。因为除阶级斗争还有别样方法可行社会革命，好比用议会政策就是个方法。阶级斗争是社会革命的方法，不能说就是革命。因为那议会政策虽不好，但也是个社会革命的方法，所以社会革命的范围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小。若从他方面看，阶级斗争不必就是社会革命，最显著的就是法国革命。

我们要知道，"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并非马克思所首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历史家就有这种名词，那时法国革命就习用这名词。至今我们习用的"Bourgeois"（资产阶级——编者）、"Proletariat"（无产阶级——编者）、"第三阶级"、"第四阶级"，都是从这时发生。象这时的法国革命实在是一种阶级斗争，是中等阶级革贵族、僧侣和君皇的命，最显著的事实就是两院制。凡明白这种政治革命的历史，没有不能说。

那么从一方面看，社会革命不必就是阶级斗争；从他方面看，阶级斗争不必就是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实在早已实行，AD君正可不必因社会革命而忧惧，AA君也不能以"社会革命"四个字为"阶级斗争"辩护。

象AD君反对阶级斗争的用心，我很敬爱；不过我看AD君对于他的主义，实行上，除却阶级斗争以外，也没什么方法。AD君说，我们可以劝告那些资本家。以劝告的方法来实行主义，我看千万不能行。老实话吧，我们要想实行主义，总不能不有所牺牲，象那滑头的杜威博士，把"阶级"二字换个"社会"，有人译纳群，说一个群同他个群冲突，又说什么革命要经济，这都是骗人。

自由是要有代价，应当牺牲的就得牺牲。AD君说战就不好。我请问，象那天天叫人信上帝，口中喃喃，见神见鬼的教士，同那少年男儿，痛苦流涕，为人类而死，为主义而死，那个好，那个坏？在今日的中国，要讲经济的革命就是叫人做懦夫，做孱头。我们都承认，资本家的坏，如同虎狼一般，试问叫老虎博爱能行吗？

AD吾友，你反对阶级斗争的心，我很敬爱；我主张阶级斗争的心，你原谅吗？阶级斗争呵，自由的代价！不是我脑中被他人学说变换才有"阶级"二字，是实事，是社会告我以"阶级"二字。我常见有同学家中苦寒，老父耕田，从千辛万苦之中，从第四阶级，跳入中等阶级，到大学里念书，其困难之状态，真有令我不能笔述。最显著的，就是近来我们大学的左右，将黑时，有多少小孩唱些什么"多"、"利"、"米"、"法"、"拉"。"多"这种声音半年前都没有。半年前只听见小孩的苦声，卖热馒头声，妇人叫唤声。现在都没有了，都被那唱"多"、"利"、"米"的遮住了。AD吾友！你反对阶级斗争，你只能在理论上反对，实事上的阶级区别，你怎样反对呢？象那些小孩们，因为进了平民夜校，所以有跳入他阶级的机会。你若说这不是阶级，这是社会中的长短不齐，难得这样恰好一段一段的不齐。象那些小孩们，是因特种关系发生个变动，不是没有阶级。

从事实上，从理论上，阶级斗争是千万不能行。不过我以为我们所以要阶级斗争，不是为谋一部分人的幸福，是要解放全人类；不是为劳动阶级打抱不平，造成个阶级的专制，是要灌输劳动阶级的知识，叫他们起来，继续文明。现在是什么世界？是自私自利的世界，是禽兽世界。如长此迁延，那非把所有一切精神文明铲除净尽，只剩下什么"物质愉快"一点罢了。Helhique说："罗马为什么亡？因为人人自私、行下，没有第三阶级去救济。法国为什么不亡？因为有第三阶级。今日第四阶级若不起来，那所谓文明马上就要野蛮"。

个人自私固然不好。阶级的自私"Class—Selifsh"是一样的不好。AD吾友！你反对自私的阶级斗争，为解放全人类，救济文明的阶级斗争你还反对吗？那么虽有阶级斗争，却未必

有阶级专制。布尔雪维克实行阶级斗争的结果虽是阶级专制，但不能说，凡实行阶级斗争，其结果都是阶级专制。因为阶级斗争是一件事，阶级专制又是一件事，社会革命又是一件事，所以我主张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是解放全人类，是继续文明，所以我主张阶级斗争。至于阶级的自私，固然不好，但我们难道因噎废食吗？

那么难道我赞成布尔雪维克吗？反对！反对！我的理由如下：

（一）抹杀个人　无个人当无社会，无社会决无个人；所以我们应当于可能的范围内，对于个人自由加以开放。但布尔雪维克把个人所当作所能作的事，一概干涉，叫国家来治理；于是个人自吃饭穿衣以至于著书立说，都要仰赖国家，因为随便什么都是由国家办理。这样子是叫整齐、一致。吾人所谓文明是从参差里生出来。学术界有独一的思想，就不能进步，好比从前的中国。精神上有独一的思想，就无进步，好比中世纪欧洲的教皇。今布尔雪维克是要以国家的权力来干涉个人，是要从物质上干涉个人到精神上，因为什么印刷、教育都在国家的手中。这样子岂不是抹杀个人而使社会退步吗？

（二）滥用强权　强权本来就不好，因为他同个人自由立于反对地位。布尔雪维克却事事用强权。这样子势必弄得个人不能生存。因为无论什么人，一有强权，势必横行，如同吃烟一般，明明知道不好，但总有些人不住的吃。所以有人反对强权，或限制强权到极小限度。布尔雪维克却滥用他，不当用的、无须用的地方也去用。这就是摧残个人，这就非人道。

（三）独裁专制　我们人类的性情个个不同，刻刻变换，所以我们的事最好由我（们）自己处制。无论什么政府怎样的好，他所做的事总不如我们小民的愿。因为他人虽聪明，但总不明白我的心；而我的心又是常常变换。布尔雪维克不顾此处，却把人类当做一律，事事都由他处管；这时候的人民差不多就是机械，连他自身的事都不能由他自家决定。我们德模克拉西的精神就在使人民能决定自家的事，布尔雪维克刚刚相反，所以是独裁，是专制。

总之，布尔雪维克虽成功，我看比专制魔王还要坏。AA君说布尔雪维克的实行是达到无强权的一个方法，我决不相信。因为他只能使人类退步，不能进步。我们人类的进步全凭自由意志，在布尔雪维克之下决不能发生自由思想。他虽然整天的普及教育，也不过一种机械的教育，如同从前的军国民教育一般。我是非（？）无政府主义的，我以为热心无政府主义的不当欢迎布尔雪维克。因为所谓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因为有资本家才来主张无政府，是因为有强权才去主张无政府。布尔雪维克的唯一要素是强权，无政府主义却非强权；布尔雪维克偏重社会，无政府主义却偏重个人。他们刚刚相反。从布尔雪维克里求无政府主义，是犹从南极里找北极。总结起来说，我反对布尔雪维克不是因为他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布尔雪维克并不主张资本主义，是主张资本的作用；也不是因为他实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解放全人类，继续文明，并且是社会革命的最好方法；也不是因为他实行后可达到无强权时代——布尔雪维克和无强权主义刚刚相反。我反对布尔雪维克是因他抹杀个人，滥用强权，独裁专制，使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减削，使社会退化。我说到这里已经不少了，我希望有机会以后再谈。我希望我们青年不要做那种主义的信徒，却做主义的批评家。

（《奋斗》第八、九期，1920年4月30日①）

（选自《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

① 《奋斗》第八、九期合刊的封面上所印的出版日期是1920年4月30日，与第七期同。据推算，第七期确为4月30日出版，而第八、九期合刊则在后。

〔附〕 无政府共产派与集产派之歧点

缪 金 源

从来盛行于德国的社会民主派，是认国家，是认政权，是认议会制度，专门致力于选举，谋占议会里头多议席，以实施其社会政策。这一派的过去事实，已经给世人评定他的价值，可勿置论。方今实行俄国的集产派，在他们的元祖马克斯时，也号称共产主义。按其实际，是对于生产适用中央集权的一种主张，所以实在是集产主义。他们推翻了贵族的政权，仍然用一党来握着政权。政权就是自由的魔敌，无政府党对政治要求自由的主张，和他们拥护政权的主张，根本不能相容的。世人每因彼此同以灭除资本制度为目的，遂误认为终底相同，吾人用是急于说明其终点歧异之点。

由这一点，以反证而得一确当的判断：无政府党对于政治之终极目的，是废除统治权，消灭无论甚么形式的政治；对于经济的终极目的，是由生产者自由组合的种种团体机关，直接处理产物，依公道的法则而分配之。集产派对于政治之终极目的，是保留统治权，变更贵族式的政治为平民式的政治；对于经济之终极目的，是取所有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关而尽属于国家，由国家强迫人民从事于生产的劳动，而给以相当的工值。

最大的主张和最终的目的，判别个狠为分明，世人当不致于再有误认。至于颠覆现在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无论用劳动者团体的势力，用一般平民组合的势力，乃至不得已而用武力，都可认为暂时适用的革命手段，如俄国之破坏事业，世界无政府党未尝以为不对的。但集产派所采用的政治曰平民专制政治，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无产阶级推翻资本阶级和保障资本家的贵族阶级之后，自己即跃登政治台上，行使政权，这时候自尊无上的执权者，Dictator其实已经不分平民了。无政府党之所期，是一个无统治的自由社会，虽也许用种种手段——或者与他们同一的手段——来颠覆现世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但颠复而后，断不容政权存在，以人治人的制度一日不消灭，即一日未尽达其目的，这是无政府党最大的决心。

（《民声》第30号，1921年3月15日）

（选自《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

劳工调查

上海纺织厂工人工资和工作时间注

职业	每日工资	每日工作时间
二号车男工	〇·三四元	十二小时
三号车男工	〇·三〇	十二小时
粗纱间女工	〇·二二	十二小时
缝布车男工	〇·四〇	十四小时
括布车男工	〇·四〇	十四小时

注：此表是民国九年调查

开滦矿工工资工时调查表

工别	工资	每日作工时间
电机台小工	一角五分——二角五分	十一小时
井上头等小工	二角五分	十一小时
井上二等小工	二角二分	十一小时
井上三等小工	二角	十一小时
井下头等小工	三角五分	每一班下井八小时欲作十六小时者工资加倍
井下二等小工	三角	同上
井下三等小工	二角五分	同上

注：摘自新青年劳工专号七卷六号。

民国七年到民国十五年每年罢工次数、人数。

时　　间	次　　数	内中载明人数的	人 数 总 计
民国七年	二五	十二次	六、四五五
民国八年	六六	二六	九一、五二〇
民国九年	四六	一九	四六、一四〇
民国十年	四九	二二	一〇八、〇二五
民国十一年	九一	三〇	一三九、〇五〇
民国十二年	四七	一七	三五、八三五
民国十三年	五六	一八	六一、八〇六
民国十四年	三一八	一九八	七八四、八二一
民国十五年	五三五	三一三	五三九、五八五
九年总计	一、二三二	六五四	一、六一三、二九一

（摘自陈达：《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九二〇年我国第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资料选录）

一、上 海

工界对劳动纪念宣言

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他的意思，第一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唤起中国工人的觉悟。我们各业工人团体的目的，是在改善中国工人的生活，增进中国工人的知识，表现中国工人的人格。丝毫没有政治的意义，并且决不愿意中国可怜的工人卷入混沌不明的政治旋涡。这一层意义，要希望社会公众明白了解，须知各界的人都有他的快乐吉祥的日子，何独对于工人这个快乐吉祥的日子，使用惊讶疑虑的眼光来看呢！至若中国官厅方面，对于五月一日的世界劳工纪念日，不惟不表示同情，照近日报纸所传的态度等等，好象是非常误解，以为工人纪念五月一日是对于他们官厅和政治问题，有甚么特别意义。这种见解，完全是疑神见鬼，所以我们特地恳切宣言，我们的五一运动，是很快乐很平和的纪念日，所含的意义，完全是社会的经济的意义，和甚么政治问题都绝对没有关系，请社会公众不可有丝毫误会，万一因为中国官厅的疑神见鬼，由无意识的猜疑，没理由的干涉，发生出不幸的事来，这个不幸，在我们工人是绝不自己躲避，却是造出不幸事件，破坏很吉祥很和平的纪念日的责任，完全要官厅和社会公众负责；我们工人是丝毫没有负担责任的理由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工会总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全国工界联合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药业友谊联合会同启。四月二十八日。

——1920年4月29日上海《国民日报》

戒严声中之劳工大会

开会之困难 淞沪何军使，因昨日体育场有劳动纪念会之举，故即于昨晨令饬该管防线之十五团刘团长，督同所部二营官兵及京师兵第三营调派宪兵多人，马队三四十匹，莅场防备。而淞沪警察厅亦调齐各分区游巡队、保安队、警备队等，分头在老西门、中华路、民国路、大统路、体育场四周站立，往来巡查。中华工业协会等，因早知体育场开会已不成问题，故已于前日与提篮桥培开尔路精武体育会商定假该处开会。因恐赴会之人不知，乃特派招待员多人，于上午即在西门、体育场等处站立，知照改换之地点，而军警不容逗留，强令他去，争论多时，军警竟欲开枪。各人无法，只得散去。旋由该协会率往精武体育会商假该处开会，不意又被拒绝，谓奉美领事令，不准开会。当由该会干事汪啸涯等，至虹口捕房询问，以未得要领而返。复至青年会借用北四川路底之操场集会，一面派人知照，一面即齐赴该场守候。其时各界人士，只余一二百人。先由中华工业协会黄鼎奇君布置一切，事未完备，而闸北警署即派五区第三署署长陈子直，带同警察二三十人前来干涉，询问黄君为何团之

人，黄君据实以答，陈谓恐未必，看你形似学生。黄君答，确系工团之人，何学生为。陈即以一种无政府主义之传单询问黄君，是否为工会所发。黄君见此传单，乃知有人破坏，遂答此种传单，各工会并无发印，况今日之会，乃一劳动纪念会庆祝工界之得优待，并无他种意义在内。此种传单必为另一方面以图破坏工团者所发，如不信，此处传单甚多，不妨一查。该警官云：今日此处已禁止开会，君等可他去。倘移时陆军前来，恐与诸位不便。至此适黄介民等六人至场，黄君遂将此情告知，黄君亦无办法，只知照到会之人，姑且相候，即与各重要分子回会，开紧急会议。此处到会之人，逐渐而来，其时约有百数十人。当有汪啸涯、王享利、章佩卿、李彬等，向该警官等陈述开会宗旨，然终不许。众人无法，均谓此处既不能开会，我等露天亦可开会。遂由汪啸涯、张民权、王享利等，率领至操场西面空地，名林家花园者，由张民权、汪啸涯等立土阜上，大呼在此开会。警察见之，即带同全体持枪，前来驱逐，大呼"走！""走！"此处不许开会。众人向警察云：你们亦系一种工人，一月只七八元薪水，与我们工人无异。今日为世界劳动纪念，各国均开会庆祝，我们工人亦当开会，乃屡受压迫。夫我等手无寸铁，又何能有他项举动，只又何苦呢。言至此，又有五区警官刘德之带领警备队一队赶至，各人又向刘警要求，无论如何，必须有一结束，可否宣告数语，以略表开会之意。当承刘允许五分钟，宣告毕当即散去。乃由张民权登阜大呼，今天吾等受此干涉，而自由已完全失去，吾们以后必须紧记今日之痛苦，非达我们之目的不可云云。至此该警官乃下令驱逐，各人遂全体退至靶子场附近。沿途见有三十九团第二营陆军一营，由南而来，至青年会操场把守。其时在路旁之各界人士，而〔共〕有三四百人，殆陆军过后，遂齐至靶子场空地上，将各旗扯起开会，首由留日学生幻灯讲演会会长张民权之演说，今日为世界劳动纪念会，乃被军警阻止，吾们自由已完全失去，惟希望我们当极力牺牲做去，非达到每星期工作四十八小时不可，明年若仍如此，当全体罢工云。次电器工界联合会李恒林演说，希望大家努力牺牲前进，不可为今日之武力所屈服。次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李鼎年演说，希望组织切实有力之工团。次中华印刷职工会许素珍、工业协会李彬、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王享利等相继演说。末由李恒林说明今日开此大会，最要紧者，即要求每星期作工四十八小时，望大家努力进行，非达目的不止。末乃全体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劳工神圣万岁而散。时已将五时矣。

开会之宗旨 此次开劳动纪念大会，其最大之宗旨有二（因屡受干涉，未及在场宣布）：（一）要求中国全国工人，每日作工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八小日〔时〕，与全世界工人受同一之幸福；（二）中华民国劳动界全体工人，答复俄劳农政府通牒。兹录其答复书如下：

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

俄国工农同胞和俄罗斯劳农政府公鉴：我们是被华盛顿劳工会议屏在特殊地位底工人，接你们底通告格外感动。我们并不是感谢你们归还从前强盗政府所掠夺去财产和种种主权。我们相信一向没有国际观念的中国劳动者，今天才听到最亲切的劳动同胞底讲话。我们从有人类以来所负担的责任，以及我们亲身尝过强盗阶级所压迫的痛苦，都清清楚楚印在我们脑子里一刻不会忘记。我们要努力创造新的、美丽的、永久平和的人类世界，决定和你们同力合作负担这个责任。现在我们都处在国内国外金钱阶级压迫底下，希望你们先起的同胞〔给〕

我们和印度、日本、朝鲜、安南的劳动同胞一个很猛烈的援助。我们自己知道是知识很贫乏的劳动者，时时还处在资本阶级和含有政治臭味者的诱惑中间，更希望你们的指导。前途幸福正大，尤其希望你们勇猛前进！

中华工业协会
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
中华工会总会
中华工界志成会
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
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
上海药业友谊联合会　同启

中华工业协会昨晚发出紧急通告云：

各界各团体钧鉴：本会联络各工团发起劳动纪念，本以庆祝为宗旨，毫不参与其他意义，已经屡次声明。故本日纯取和平态度。惟到会人数过多，分子难免复杂，竟有散布别种传单者，事经确实调查，散此传单者，系由发起纪念之七工团毫无关系之一人，闻其向各民权①，谨此声明，若发生特别事故，本会及各工团概不负责。中华工业协会谨启，五月一号。

各界之表示　昨日为劳动纪念日，开会虽未有完满结果，而各界之表示，则甚有可观。英法美三租界、城内，闸北，各大小商日店，以及各路商界联合会、学生会、各界联合会、各学校，门前均一律悬旗，以示庆祝。二学生会，二各界联合会各送"劳工神圣"、"人力万万能"纪念旗二面，茶点洋十元，祝词各一篇。法界商业联合会亦送"劳工神圣"纪念旗一面。吴松路商界联合会送国旗二面。英大马路中华电器材料公司，送饼干洋十元。复旦大学送"劳工神圣"纪念徽章许多。而其他各学校、各商界团体均有祝词礼物，惜因屡被干涉，均未宣读。

军警之布置　淞沪何拥军使昨为世界劳动纪念之期，因恐各工界仍有侵入戒备区域内之体育场开会，希图违禁扰乱等情事，业于前晚令饬步兵十五团刘团长及淞沪警厅，届期各派军警往驻该处，以便禁阻在案。昨日届期，公共体育场之四周，已由十五团第一营营长贾万胜、第二营营长赵云龙二君，各调士兵二连，责令各该排长荷枪实弹，梭巡其间，并由二区警署杜警正加派双岗，自西门万生桥起，至斜桥等处，沿途密布，借以弹压，体育场之门首及场内亦有军警会同驻扎，以资严防发生不测之虞。而斜桥地方系为华法交界之区，防堵尤关重要，亦由十五团贾营长派兵一连，以二十名为一班，昨日自清晨至傍晚，轮流更调，负枪站防。法租界亦派安南巡捕八名、华捕四名站于斜桥之堍。所有沿斜徐路华法毗连之各桥梁，以日晖港为界限，港西至徐家汇为止，归步兵三十九团张团长派兵，四人驻守，以四小时为一班，日夜轮防。日晖港至北新桥为止，归十五团第二营赵营长派兵站驻各桥梁之中间，以防匪类越人。而京师宪九连那连长昨亦督率宪兵十二名，乘马四出游巡，借以保卫地方秩序。

昨晨华界岗警于出发时，均佩带实弹，并令荷枪，概装刺刀，站巡所有各要道除派双岗

① 此处疑为衍文。——编者

外，添派游巡岗，会同驻防云。

军警之示威 昨一日晨代理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特令步兵二营、机关枪两架、马队一小队，武装荷枪实弹，由龙华出发，经过高昌庙斜桥西门沿民国路，整队示威游行；又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昨令游巡队二百名由大东门出发，沿民国路直至斜桥等处游巡。

驻扎闸北王家宅陆军第十六团步兵第二营营长王保安，既〔暨〕三十九团二营辎重营营长沈希之，又机关枪连长于占标等，均奉何代军使命令，自昨日上午起，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并机关枪三架，鼓号军乐，出发游巡闸北街市，以备不虞。并以淞沪警察厅闸北办公处（即四区警察署）及五区二分署五区警署为会集休息处。当由各该处区颜玉除、牛钰麟、王金山等预备招待云。

租界之情形 英美总巡张生君昨日深恐工界中人，有在租界聚众开会情事，故特预派暗探六名，分往各机关调查开会地点，如果会场设于租界者，着即随时报告，俾得查禁云。

美界哈尔滨北四川路两捕房捕头，因昨闻劳动界，有在塘山路北四川路某某等学校开会之说。故特密饬中西印各捕与中西包探，在各该区域内，严行侦察，随时报告，以凭核夺。

法捕房在方滨桥斜桥华法交界之处，亦加派华法探捕巡察。而停泊浦江之法国军舰，于下午派遣海军陆战队，驰往顾家宅、法国老营盘驻守，以备意外。

闸北之情形 闸北方面各警区所军队，于华洋交界之新大桥、新闸桥、宝山路、虬港路等处，均加派双岗，擎枪实弹，来往梭巡，严密防备外，北火车站更有陆军散队安置机关枪两架，在被〔彼〕防守，如临大敌。晚上六时以后已断绝交通，不准民人行走。究竟此种消息是否可靠，尚在不可知之数，而官场纷扰如斯，诚可笑也。

青年会之检查 昨日午后护军使派遣军士一队，向工部局领取照会，经过租界至闸北，调查劳工开会事宜。讵至四川路青年会门首，见车马殷阗，颇形热闹，该队官误认为劳工开会，立即命全队军士屯驻门首，而一般工匠，因未得开会地点，遂拥至青年会，军士益生疑窦，该队官遂至青年会，适精武女子体育会开成立会，该队官即询干事钮立卿君，是否开劳工纪念会，钮君力辩非是。队官坚执不允，定欲钮君签字。然后打电话至高昌庙司令部，谓今日劳工纪念，并非在青年会开会云云，遂出外整队向闸北而去。

船厂汽管之保管 江南造船所长刘冠南君，该所工人有数千人之多，深虑工人参预列人，是以先期劝阻，不准附和，但工厂每有停工集合等情，须先拉放汽笛，其声不响则各工人断无半途停工之虞，因此管理汽笛之职务亟关重要，故于昨日，除特派妥员，率同本所警队，妥慎保管汽笛，以防工人擅自拉放汽声外，并函由步兵第十六团王团长，派兵一排，协助弹压，以杜他变。幸该所昨日自早至暮，各工人颇能恪守厂规，并无越轨举动云。

车站之保护 沪宁、杭甬两路南北两车站，昨晨由何代理军使拨派陆军三十九团第二营兵士，各车站一连保护外，沿铁道均密布军警，以资保护。

昨晨淞沪护军署，特派陆军第十师三十九团二营营长带步兵两连，马队一排、机关枪二架，在上午十时许，抵沪宁路北车站，驻扎票房西首。十二点半钟又有驻闸北第四师十团一营步兵一连，驻扎票房东首，是日两军在站均由该路局副巡彭铨招待一切云。

戒严时间之照旧 淞沪警察厅长徐辅洲前曾呈奉淞沪护军使核准，以商界中人，对于戒严令实施后，每晚十时半阻绝交通，颇有不便，其在租界执业，住家于内地者，往往欲返无从，逆奉准予展缓一时，至每晚十一时断绝交通，当即分令各区署所队一体遵照在案。去后

又因谣言滋多，且恐过激党或外来匪徒乘机混迹，故防务尤关重要，爰于前日傍晚时用电话通传各属，仍以十时半实行戒严，阻止行人车辆往返，以重防务云。

兵厂例假之停放 上海兵工厂全厂工匠小工统计约有三千余人，向章于星期日夜，得休息一天，此次因恐被人胁迫罢工，曾经谢总办先期劝慰，而各工人亦均抱定不干预之主义，仍然照常工作。惟二日（即今日）适逢星期，例应停工，而谢总办因防一经休息，则各工人必当四出游玩，设有被人煽动，致生意外之变，是以决计此次星期，概须进厂工作，不准停歇。故于昨日传谕炮钢弹机等各厂长，一律令饬各工匠，务于今日照常工作，以昭妥慎云云。

南市商店之损失 城内南市一带，自上月24号起，颁布戒严以来，各商店之受影响无形损失者，已属不少。九亩地一带，除新舞台只茨〔次〕日对外，夜市则无人顾问。如各彩票店及十六铺迤南至大马头各衣庄，均在日暮上市，买者商余得暇选择，卖者亦在夜间有所假借。据云每晚生意佳者，可售四五百元，次者二三百元不等，日来仅剩三四成。因此昨日该业等联合二十余家，签名具呈警厅请放宽所限钟点，以维商业云云。

分监之戒备 西门蓬莱路地方分监，李绍颜监长，因昨日工界开劳动大会，虽军政长官早经禁阻，诚恐无知游民，滋扰生事，特谕李监各科员等，谨慎防护外，监门外加派游巡队四名，并谕刘看守长督同各看守役等，小心防护云。

——1920年5月2日上海《时报》

二、北 京

北京之劳动纪念

（一）工读互助团之出发 一日早八时，北京工读互助团雇定两辆汽车，每车载四人，每人各执一旗，上书“劳工神圣”、“资本家的末日”、“劳动纪念”等字样。车上载有传单多种。大抵不外解释五一纪念的意义。八时半由马神庙出发，一向后门而去，一向东城而驶，口呼劳工万岁，手散传单。但闻向后门者行至西四牌楼当为武装警察所拦阻。向东城者行至米市大街亦被巡警阻止。并闻该团学生八人已被拘入警厅云。

（二）平民讲演团之讲演 一日早十时，北大平民讲演团分五组出发讲演，每组十人，沿途讲演“五一历史”及将来之希望。听者颇多云。

（三）北京学生之传单 北京学生因力争外交，对于此事未曾顾及。但闻该会亦于三十日印出“五一历史”传单多种，分散各校，由各校学生自行发散。并闻高师、北师、法政、北大、中大等校学生均于是日下午在各该校附近发散此项传单，并有一部分学生因恐白昼被军警阻止，有已于三十日晚即行发散者云。

（四）北大校役夜班之集会 北京大学校役夜班将于上午九时在第二院大讲堂开纪念大会，到者该校役与学生共约五百余人，会场门前悬挂国旗，场内满布万国旗。先由主席某君报告开会宗旨，继由该夜班校役并教习相继演说。至十一时始散会。是日并发散一种传单，首述“五一节”是什么，次述该夜班为什么纪念五一节。照录其文于下：

我们校役夜班为什么要纪念五一节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今天开会的几种希望。

1、校役也是一种工作。当校役的人也是自食其力，希望诸位以后要认明在北京大学作

工，不要以为自己在北京大学当听差。作工是人类的天职，我们也是对人类供献的人，人类应当作的事情，应当享的待遇，应当得的知识，我们都有一份。

1、希望诸位不要以听差有饭吃就算满足。须知道工作是神圣的事业，是人生最大的责任，能工作的人方才有高尚的人格，方才不负此生。

1、希望诸位常常纪念着五一节，把全世界人人纪念的五一节，当作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我们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个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

（五）军警防范之布置　北京学生罢课与夫“五一”、“五四”纪念消息传出后，北大附近军警甚多，且常整队游行，以便防范。闻现有军队数营驻在后门口之从前旗人所在地以资监视北大学生之行动云。

——原载1920年5月4日上海《时报》；又参照1920年5月4日上海《民国日报》校订

北京劳动纪念节再志

五月一日的劳动节，其间经过情形已志昨日本报。那天所发的传单，除掉纯粹的工人所散布的，另外还有北京学生联合会也发布了一种，表明他们对于劳动界的同情。今把这些传单的原文抄在下面，也可见得他们的见解和精神了。

北大校役的传单　我们亲爱的劳工朋友呵！今天是五月一日，是美国工党同盟罢工争得“今天八小时”的纪念日。全球的工人到了这一天都是相率罢工，举行示威运动，但是我国的工人还有很多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所以我们来告诉各位。自从今天起，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凡不作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牧师、僧、尼、道士、盗贼、乞丐、娼妓、游民一律驱逐，不准他留存在我们的社会里来剥削我们，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联络起来，把所有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取回在我们的手里，这时候谁还敢来压制我们呢！我们劳工的朋友呵！快快起来，休业一天，大大的庆祝一下！五月一日万岁！劳工万岁！

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传单　今天是我们劳动界的好日子。世界上的劳民都在这一天息了工，喜欢得什么似的来纪念他。我要问大家，你们都晓得这五月一日的故事吗？那诸老哥没有听过，让我讲给你听：

原来当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时候，美国有二十六万劳民为了要求“每日作八点钟活”，约了在五月一日作事。到了那天，他们果然一齐罢了工，把工具都丢。有个城叫芝加哥，在五月四日那天，那边保护人民的巡警对着四万赤手空拳的工人，打了个东进西出。黑马格都有些工人在那里集会，也教警察摧残了。工人们对着警察官的手枪轻轻放了颗炸弹，后来抓去了好些人，被捕的这些人经过了很悲惨的审判，都送上了断头台。现在有人常夸奖的“芝加哥殉道者”，就是这回死去的史巴孙和他的同志们。

这一回庄严的故事，感动了天下万国的劳民。

到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万国社会党在法国的京城开会，有人提议把这五月一日定做“世界劳动节”，大会便把这案热心的通过了。所以全世界的劳民到了每年这一天，都要息工一天来纪念他，去建设他们的“自由互助共有的社会”。

新纪元二十年五月一日

——1920年5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

三、广　州

广州之劳动节

公启者：五月一日为世界劳动纪念日，各国工人皆于是日举行庆祝，现际斯盛典，我国工界自应一律举行。兹由敝团体等联络省港工人于是日假座广州东园举行庆祝大会，素仰贵报热心维持工界对于斯会当具同情，用特函请贵同人届时莅会指导一切，光晖庆典，是所盼祷，并颂公安。

庆祝劳动节筹备处公启。

又函云：华侨工业联合总会于前数年成立于广州，凡百工业极力提倡，而对于一般工人尤为大声疾呼，于此劳动圣节典礼行之已历两载，今年又联合各界公同庆祝，先于昨晚开提灯大会，巡游各街，查是晚会同巡游者有工界旬刊、甲种工业学校、云母工业研究所、中国机器总会、英文排字社、机房西家十一行、通纱行西家十八行、素货西家、寿世药材行、绸布遮行、宏仁演讲所、藤器研究所、广州茶居公会、建筑行、香港铸造部、香港电车局车务处、佛山协兴窑花梨抖行等，人数约千余，今日则在东园庆祝云。

——1920年5月7日上海《时报》

纪广州之“五一”节

五月一日为世界劳动纪念，广州该会筹备所曾发出公启，通告各工界如期到东园庆祝，并于是日夕举行提灯会。闻四时在东园集队，其巡行经过地点，由长堤入永汉马路、泰康路、靖海路、山西濠口、二马路、靖远街、十三行、长乐街、十七八甫、德兴桥、洪圣庙、上下九甫、第八甫、第七甫、第六甫、第五甫、第四甫，入西门、惠爱西路、永汉北路、永汉南路，至天字码头散队。连日各工业挂号与会者数为踊跃，是晚会同巡行者有工界旬刊社、甲种工业学校、云母工业研究所、中国机器总会、英文排字社、机房西家十一行，通纱行西家十八行、素货西家、寿世药材行、绸布遮行、宏仁演讲所、藤器研究所、广州茶居工会、建筑行、香港铸造所、香港电车局车务处、佛山协兴窑花梨抖行等，所有扎作种种色色不一而足。又警厅昨据庆祝劳动节筹备处函称：

五月一日为世界劳动纪念日，各国工人皆于是日举行庆祝，以促工人之进化，去年劳动纪念日曾在东园开会庆祝。现值斯盛典，我粤工人自应一律举行。兹敝团体等及省港全体工人议决，于是日假座东园举行庆祝大会，并于本月三十日晚上七点钟至九点钟开提灯会，巡游本城各街。所有庆祝会及提灯会纯为工人联络感情起见，自应严守秩序，不敢稍有越范行动，素仰钧署保护工人不遗余力，用特具函奉达，迟请钧署饬令警区保护，俾得工人同伸庆典，不胜盼祷之至。等情。该厅据此经即通令各区署及游缉队一体知照，注意巡查，届期并由五区二分署及游缉队前往该会场并东园附近一带，妥为弹压，以维持秩序云。

——1920年5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

四、九　江

九江劳动纪念会纪盛

九江学生联合会以五月一日为万国劳工纪念会，特先期开会筹备庆祝。事为警厅所闻，当于即午由行政科长汪君，邀请学生会长俞君谈话，以军界将行干涉为言，力请改期，再看上海动静。俞君当告以庆祝会用意，系提高工人地位，并劝导工人尊重人格及国家体统，不必虑有他故。彼为学会分子，决不愿惹起暴动，妨碍地方安宁。惟改期一层，各校同志满腔热血，恐难疏通。汪科长云，既如此，即请俞君今晚邀各校代表，到厅一坐。当晚八时，遂由各校派代表二人，与俞君同至警厅接洽，适厅长留道署有所磋议，汪科长在私宅未回，由王队长接见，晤谈之下，各代表均坚持不愿改期，结果由队长电话告科长，当答以既各代表坚不改期，即请其从速写报告书到厅，以便分报镇道及电告两长。各代表遂承认退出，此官厅一方面接洽情形也。工人方面，由蒋君及蓝君接洽各工头，计三十余名。工人极形踊跃。由各工头集议，先期预备旗帜，并先期布告，于五月一日停工一天，游行后，又续停二日，以资休息，此工人一方面之进行程序也。至筹备各事，定做馒头，预备旗帜，布告传单，即由各校干事担任。一日下午二时为庆祝会举行期间，地点为宾兴洲。午前十时，军警加派站岗，整队赴龙开河宾兴洲维持秩序。各校亦派人沿街纠察。十二时，各校学生各工人团，陆续结队到会。会场就空地中心支架临时演台。二时开会奏乐，向国旗行礼，首由学生会评议长蒋宗文君报告开会宗旨。略谓社会上大都看工人不起，学生等为破除此种观念，抬高工人地位，实行工学联络，故于今日万国劳动会纪念日，为我九江劳工界祝贺，即以祝贺万国劳工纪念会。次学生会长俞君演说，工人地位，譬如邻省需米向江西购米，其火车轮船上下搬运必定借力工人，工人如不动手，则邻省及产米较少地方人，必至闹饥。其余各种莫不皆然。惟工人既占此地位，宜自尊重人格，尊重国家，有意识之举动是其自由，但绝对不宜暴动，致惹官厅干涉。次由上海各界联合会代表周君霁光演说，劝工人求学，结成正当之团体。次师范黄君、熊君、南伟烈胡君、农校曹君演说，或劝工人求学，或劝之结团体，或劝之撙节储蓄。次上海工界协进会孙、叶二君，约略宣述协进会组织宗旨、劝工人举出头目，自行集议，成立同样工人团体。末一工人上台演说，斥工人不自齐心，如上次因巡捕殴伤工人，轮船工人罢工，不抬怡和、太古两公司上下货物，而铁路上工人遂取而代之。试问果使铁路工人被殴，要不要得轮船上工人齐心帮忙，此后务要大家齐心，才好办事云。于是由蒋君宣布三呼劳工万岁，散会游行。由工头令工人排队，二人一排，工头及各校纠察在旁纠察，圣约翰军乐队前导，中间工人约三千上下（约二分之一，尚有到会未游行者及未到会者）。各校队伍则排列龙开河桥，两边干事员则在此散馒头，馒头上印有劳工纪念、工学一致、毋忘国耻等字样。大队既过龙开河桥，各校队伍遂紧随其后，从西城下转湾，过鸿安码头，未入招商码头即转湾进城，直过东岳庙，转湾至小校厂休息。由学生会长俞君赞美工人秩序齐整，不独得地方长官之看重，进城时且得西洋人二人鼓掌欢迎，真是国民程度进步。此后工学联络之机会尚多，还望大家同心协力，一致进行。语毕，行鞠躬礼，宣布散队。当开会时，有某国人一，散步会场，多数小孩鼓噪呼打，幸经二署长护往他处，学生纠察及巡警开导拦阻，未至

闹成事端。是日学生会散出传单，闻有六七〔千〕张，馒头数约六千以上。军警维持秩序，杀费苦心。警察各长官全体亲自出马，警备队向营长亦亲出纠察。第四团李团长派出四连，惟警备队全未携械，第四团尽上刺弹，闻向营长用意，系恐学生误会，李团长则恐有匪徒借端暴动云。又闻某银行跑街俞某，恐吓官厅，谓外人将加干涉，官厅则以并无若何对外暴动，且与租界毫不牵涉，置不理会。

——1920年5月7日上海《时报》

劳动者底觉悟

——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演说

（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这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坐的各种车船，都是木匠、铁匠、漆匠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才能把我们的货物和我们自己送到远方，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底功劳。这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但是现在人的思想，都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

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象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还不过第一步。

在表面上看起来，欧、美、日本的劳动者，都在那里大吹大擂的运动，其实日本劳动者底觉悟和欧美大不相同。因为他们觉悟后所要求的，有第一步、第二步的分别。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象减少时间，增加工价，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第二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时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对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第一步要求还是讨饭吃。必须到了自己有饭吃的时候，油、盐、柴、米、菜蔬、锅、灶、碗、碟等，都拿在自己手里，做工的人底权利，才算稳固。否则无论如何待遇改良，终是仰仗别人底恩惠、赏饭。

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

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各国劳动者第二步觉悟、第二步要求，并没有别的奢望，不过是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

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怎说得到第二步呢？不过我望我们国里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晓得做工人的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晓得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

署名：陈独秀

（原载《新青年》7卷6号，选自《独秀文存》）

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节录）

（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

陈　独　秀

（上略）

十六　我的意见

长沙新闻界诸君因为代湖南女工向厚生纱厂要求待遇改良，受了穆藕初先生一场奚落，实在是自寻侮辱呵！大家要晓得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分。温情主义，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主人待奴隶一种没有保障的恩惠，我们羞于去要求的；况且要求不着，白受奚落，真是侮辱上又加侮辱，前清末年要求立宪就是一个榜样，长沙新闻界现在又戳了一个同样的霉头！

有人说中国机械工业还不发达，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去劳动者要求管理权时代还远，眼前的待遇问题，还是不能放松的，况且穆藕初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见识的人，和一般专门牟利的商人不同，和他讨论讨论劳动问题也未尝不可。这话我却不反对。因为代劳动者向资本家要求固然是我们所不屑，但穆先生虽然站在资本家地位，实质上恐怕还不算是资本家；况且他若不拿资本家资格，来和我们平心静气的讨论劳动问题，我们也放不着拒绝他。

中国人向来相互不承认他人的人格，所以全体没有人格；这件事若责备穆先生独为其难，未免太看重他了。

每月八元的工资，在长沙或者不算很少，在上海的生活程度，仅够做工的个人不至冻饿而死罢了。在穆先生底意思，中国人绝对没有衣食的人很多，现在只要有工做得免饿冻而死就算福气了，你们还要得寸思尺吗？但是我们要知道得寸思尺是人类底天性，譬如穆先生办纱厂去年得利六十万，难道今年不想得利百二十万吗？假定穆先生底工厂用一千工人，每人每月以八元计算，一年工资是九万六千元；倘若一年得净利二十万元，内中提出二万四千元分配给工人，每人每月就可以增加工资二元，资本家除官利外又得那十七万六千元，总不算太吃亏罢。从前放债的利息过了二分，打官司还要受罚；开典当的，照法律只准按月二分息；安徽安福部的省议会通过了典当利息二分五厘的议案，社会上就说这是倪嗣冲祸害安徽的一种罪案；我们现在要请问上海纺纱厂底股东，去年得了几分息？中国人说的什么红利，工人照例得不着分毫；马克思说这是剩余价值，都应该分配给工人的。照穆先生说，十年前每日工资只一角七八分，五年前只二角四五分，现在有三角左右，表面上已经是递加的现象；照马克思底学说，工人每日劳力结果所生——即生产物——底价值，就算是五年前比十年前只加一倍，现在又比五年前只加一倍，而两次工资增加都不及一倍，实际上岂不是递减的现象吗？这种递减去的不是都归到剩余价值里面，被资本家——股东——掠夺去了吗？这且不谈，就

以工人生活费而论，各项物价合计起来，比十年前增加不止一倍；而工资增加不及一倍，这也是减少不算是增加。穆先生要晓得这都是事实、常识，并不是“泰西之糟粕”！

工作时间，不单是工人个人问题，也还是社会问题。假定上海日作十二时工的有二十万人，若改为八时制，日夜二班，机器并不停歇，而社会上可以减少十万个失业的人；资本家所损失的工资增加半倍，若照前例计算，一千人的工厂增加五百人，每年工资增加不过四万八千元，在净利中提出这点，还不及全额四分之一。穆先生如果不专为资本家——股东——牟利，如果明白“纺织业与民生之关系”，如果可怜“平民生计不宽裕”，如果要“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如果提倡“纺织界拯救时艰之主义”，如果忧虑“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如果懂得“救国爱群之要道”，就应该主张减少工作时间，好叫做工的人多失业人的人少才是！况且十二时制倘不改少，工人教育问题便绝对没有办法；照这样下去，工业越发达，人民底知识、精力越退步，将造成人种衰微的现象；这种社会的损失，前几天我曾和聂云台先生谈过，他也觉得有这样的危险；聂先生也说要谋工人教育，非减少工作时间不可，他并且主张八时制。聂先生到底是基督徒，是有点慈悲心肠，是比别的“想入天国较骆驼穿过针孔还难”的富人不同呀！我希望信仰“爱之宗教”的聂先生，要学耶酥的牺牲精神，莫学耶酥所深恶痛绝的富人，赶快实行八时制，为穷苦的工人谋点教育，救救他们的苦恼。我并且希望别的资本家莫让聂先生独得贤者之名！

工人教育问题，固然非工作时间减少无办法；工人卫生问题，也非减少时间无办法。至于工人储蓄问题，诚然要紧得狠；但照现时的工资仅仅足以糊个人的口，养家还差得远，拿什么来储蓄？

穆先生说：“英国有纺纱锭子五千七百万枚，美国有四千二百万枚，……日本人口仅及我国人口八分之一，有纺纱锭子四百万枚……而我国今日仅有锭子一百五十万枚，此一百五十万枚中，尚被日商英商占去七十万枚，完全为我华人所有者不及百万枚。……研究全国人口及纺纱锭数，不识诸君子有动于中否？”又说：“若徒唱道多给工值，而不问其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此唱彼和，认其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国货空虚外货愈得安然占据我腹地之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然则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焉。”执信先生对穆先生这两段批评道：“振兴工业，还是做生意；几个人做生意趱钱，中国就不穷了么？”又道：“于是乎实业提倡起来，外货不进，生货不出；做生货的人少一千万，做熟货的人加六百七十万，两下对销，就逼出三百三十万个失业的人；平心想想，这个时候，社会上是有益还是有损呢？”执信先生这两段批评，可算是对于藉口什么振兴工业，什么抵制外货，什么谋社会国家底利益来牟个人私利的人一个顶门针。另外我还有几层意思也要请教于穆先生：我们只主张把“工值”给工人，并不主张在“工资”以外要多给一点。“工值”是什么？是工人每日劳力结果的生产额在市面上的价值，不是资本家任意定的三角两角。三角两角以外的剩余工值，都被资本家——股东——用红利底名义抢夺去了，工人丝毫分不着；工值抢了去，反过脸来还要审问被抢者底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工人若没有能力和责任心，股东底官利红利是从那里来的？每日三角两角的工资还要减少几何，每日工作十二时以外还要增加几时，才算有能力有责任心呢？利息是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底救星，利息制度一天不扫除，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一天不能绝迹；不但放债、开典当是利息制度，凡是自己不劳动用资本

去生息象靠田租房租股票生活的一班人，都是利息制度之下底寄生废物。现时卑之无甚高论，我们暂且不去反对利息制度，不去把他根本取消，但是也得有点限制才好。穆先生恐怕"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是以为必用重利引诱资本家，集合得资本雄厚起来，才可以振兴工业。近世机械工业固非资本集合不可，但是集合底方法，就是不废私有财产制，不废利息制，似乎不可而且不必拿七八分重利甚至于对本对利来引诱。田地房屋和曾在银行底利息都只得几厘，尚且有人肯做；工业只要有信用，未见得拿一分利还招不着股。若嫌一分利不能引诱资本家，资本集合太微太缓，不能够和外资竞争，这个问题却大了，决不是现时的招股集资方法可以救济的。照现时的经济组织，听凭穆先生聂先生等如何热心拿厚利来引诱资本家，充其量也不过招得二三千万元；不说欧美底资本家了，只要周学熙勾一个日本资本家来就压倒了。我以为要想中国产业界资本雄厚可以同外国竞争，非由公共的力量强行把全国底资本都集合到社会的工业上不可。果然是社会的工业，他的发达，社会上人人底幸福都跟着平等的发展；工资少点，工作时间多点，都还没甚稀奇。象现在个人的工业，牺牲了无数的穷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数的资本家个人手里；若用这样厚利去引诱资本家，勉得多所顾虑，那么，工业或者可以振兴，若说有利益于社会国家，除非是少数资本家独有的社会国家，除非是多数工人除外的社会国家。欧美日本底社会危机，就是这个人的工业主义造出来的，我希望想"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的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千万别跟欧美日本人走这条错路！

穆先生或者可以说，我们中国纱业底势力，漫说英美了，就是比日本还不及四分之一；现时纱业虽有点利益，正要少数的资本家垄断这种利益，才能够把资本聚住，才能够叫他们乐于投资而且便于投资，才能够使这资本有再生产的效力；若是分配给工人，这资本不但分散了，而且都用在消费上，失了再生产的效力，因此营业不能够推广，岂不是社会的损失吗？穆先生倘若说出这个理由，恐怕有许多旧式的经济学者都要点头称是；就是我也以为这个理由含有一半真理，不能全然否认；但是我以为也有一种法子，可以免除这个人和社会间底利害冲突。这法子是什么呢？就是用Co-operative Society底一部分制度，一方面承认工人都有得红利底权利；一方面规定所有股东、经理以下事务员、工人等应得的红利，一律作为股本、填给股票，以便推广营业；如此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个人方面比现在卖劳力而得不着全工值总好得多；资本都用在再生产上，社会方面工业也因此推广了；这法子似乎可以使个人社会间利益两全，不识穆先生有动于中否？

还有一层：因为近来工厂生意不差，什么周学熙；什么梁士贻，听说都红了眼睛，倘然大规模的中日棉业公司（听说日本三千万元）或是中日棉纱厂（听说日本七千万元）只要有一个实现，听凭穆先生用什么厚利去招股都不能和采他们对敌。我想只有用Co-operative Society制度，或者可抵制。他们要在中国设厂制造，最大部分是因为中国工价低廉，我们工业界若采用这个制度，他们若不一致，招工便不容易，就是招到，和我们的厂里工人相形之下，也必然没有从前那样容易对付；若和我们一致，他们就来办一万个工厂，我们都一律欢迎。

厚生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无论办法好歹，都不但不单是湖南的女工的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有人责备厚生厂苛待湖南女工，所以穆先生不服。我现在拉杂写了许多，都不专是讨论湖南女工问题，也并不把穆先生当做一个资本家来攻击他的厚生厂；乃是把穆先生当做一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所以研究一下劳动问题来请教。

穆先生〔办〕企业的才能和他在社会事业上的功劳，我们当然要尊敬他；正因为尊敬他，所以才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

中国底资本固然还没有集中到工业上，但是现在已经起首了；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这是不可不预防的。穆先生很有预防的力量，或者不是我过于看重了他。我希望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都要有预防社会前途危险的大觉大悟，使我这篇拉杂乱谈中当心的地方将来不至成了预言，那才是社会的大幸呵！

（原载《新青年》第7卷第6号）

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

（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六日）

汉　俊

本月七号时事新报登载的东荪君“为促进工界自觉者进一言”的一段时评、真是莫明其妙、真是令人摸不着头脑。我看了这段时评、于是又想起他在八年十二日一日出版的“解放与改造”上登载的“我们为甚么要讲社会主义？”的一篇论说了。他在这篇论说里面说：

“我们主张社会主义既不象工行的社会主义建立一个全国工行、又不象多数的社会主义组织一个无产者专制政治、更不象无治的社会主义废去一切机关、复不象国家的社会主义把所有生产收归国有。乃是浑朴的趋向。”

就他这个说明看来、他底社会主义底定义是甚么？真是莫明其妙。既然是一个主义一定有一个内容、断没有只有趋向而无内容的、可以说是主义。

社会主义、虽然也有人说他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只是一个世界的时代精神。但这不过是因其内容复杂、不能象别的主义、下严格的定义罢了、不是说他无内容的。这个内容是各民族、各依各底历史的精神、现在的境遇；在世界的时代精神笼照下面造成的各民族特有的理想的世界。这个理想的世界、或为集产主义、或为共产主义、或为无政府主义、或为珊地加利主义、或为I·W·W主义、或为波尔色维主义、或为工行社会主义……。虽是分成许多种类、但都是有一定的内容的、决不仅只一个趋向。唯有东荪君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无内容的、仅只一个趋向、并且还是一个浑朴的趋向。这种社会主义、我们却还是没有听见过。他又说：

“却是唯一的趋向。好象说我们非向东不可、虽则向东走去、走到尽头、看见一种特别境象、但是在定方向的时候却不能详明说出这种境象来。虽则不能详知以后到达的境地、然而方向却是一定而不可移的了。”

这更令人莫明其妙了。他底社会主义不但是无内容的、并且连将来的境地都不晓得的。

我们讲到这里了、又想起德国社会民主党修正派底著名学者伯伦〔恩〕斯坦底话来了。他说：

“德国社会党当中、并不是有一个修正派名称的政党。修正派也并不是有精密界限的学说及政纲。只不过是存在社会党当中的一个潮流、这一个潮流的当中、更有许多小分派。修正主义这一句话、不过是要求变更、至于怎么样变更法、也是没有明白确定的。但是这一个倾向是已经狠明了的。总而言之，修正主义、就是要把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际、在进化的意义上、使他发展。”（参照本志第四十三号）

这一段话、就已经是很莫明其妙的了、但是东荪君底社会主义比这更要莫明其妙。德国底修正主义、虽然也只晓得修正的倾向、不晓得修正的方法；但他还是有一个被修正的内容。这个内容就是社会民主党底理论和实际。东荪君底社会主义、是没有象这样的内容的。德国底修正主义、虽然也是说在进化的意义上、使社会民主党底理论和实际发展；不晓得发展的尽头是甚样境地；但他底在进化的意义上发展的意义、不是说到了发展的尽头要得到甚样特别境象、是只为使他们底理论和实际便于得到政权。东荪君底社会主义、却又不是热中现时政权的主义、是逆现社会的、却是逆向的尽头境地如何是不晓得的。这不比德国底修正主义更为莫明其妙么。

东荪君底社会主义到底是甚么东西？我们实在是不懂得。除了浑朴特别四个字以外、我们是一点甚么都找不出的。趋向是浑朴的、是一定而不可移的；境象是特别的、都是不能详知的。他说这就是他底社会主义底真髓、足以打破人底误解、防止许多流弊。这就好比是一个瞎子、手里棍子也没有拿一根、只朝着一个方向、也不晓得前面有路无路、是山是水、只向前面走的一样。瞎子所趋的前面却是浑朴的。到了尽头或是遇着虎豹、或是吊〔掉〕下崖去、或是落下水去、或是走到桃源去、总是要达到比现在不同的一种特别境象的。但是甚样走法、是不管的、是不晓得的；达到甚样境象、也是不管的、也是不晓得的。这只好说他是走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走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者。

这回他“为促进工界自觉者进一言”内的意见、也与他底那个社会主义一样、是走投无路的。他底那个社会主义却只是他一个人底社会主义、那个走投无路却还只是他一个人底走投无路、我们还没有饶舌的必要。现在他却来劝天下人都要走投无路、都学瞎子一样、向着浑朴的趋向、想着现在还不能详知的一种特别境象、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顾死活、向前瞎跑。这我们就不能不来讲几句话了。

他说：

“我以为在现在中国不必促进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敌忾心。而只应促成工人对于工人的同情心。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暂且不要提倡工人对于异阶级的反对观念。而只要提倡对于同阶级的互助观念。……所以在今天只应当促进工人对于自身的自决。……对于工人只当引起他们对于自身的觉悟。”

他又说：

“所以我在今天只希望工人对于工人讲互助。而不希望工人对于资本家相冲突。”

他这些话、都是因为他“看见现在有许多人做文章大骂资本家。并有‘掠夺阶级’的名称。”他生怕“在工人未有团结未有组织以前。”使“散漫的工界个人对于资本家发生反感的行动。”不胜忧虑之极而发的。

东荪君底这个忧虑、是不是应该、是不是杞忧、我们暂且搁着不问。我们现在只问他、工人对于工人的同情心、应该怎样促成？工人对于同阶级的互助观念、应该怎样提倡？工人对于自身的自决、应该怎样促进？工人对于自身的觉悟、应该怎样引起？工人底团结、工人底组织、应该怎样使他成立？为甚么工人对于工人要有同情心？为甚么工人对于同阶级要有互助观念？为甚么工人对于自身要自决？为甚么工人对于自身要觉悟？为甚么工人要有团结？为甚么工人要有组织？为甚么现在的工人是散漫的？工人对于工人要有同情心、工人对于同阶级要有互助观念；是不是因为有掠夺他们的阶级底存在？工人对于自身要自决、是

不是要除脱掠夺阶级底掠夺？工人对于自身要觉悟、是不是要觉悟自身底被掠夺的地位？工人要有团结、要有组织；是不是因为要抵抗这个掠夺他们的阶级？现在的工人之所以散漫、是不是因为工人没有阶级的觉悟？在工人还没有明了自己被掠夺的地位、还没有阶级的觉悟以前；工人对于工人的同情心、工人对于同阶级的互助观念、工人对于自身的自决心、工人对于自身的觉悟心；是不是能够发生的？工人底团结、工人底组织、是不是能够成立的？工人对于工人的同情心、工人对于同阶级的互助观念、工人对于自身的自决心、工人对于自身的觉悟心；是不是要工人有了阶级的觉悟才能发生的？除了使工人有阶级的觉悟还有使他发生的方法没有？工人底团结、工人底组织、是不是要工人有了阶级的觉悟才能成立的？除了使工人有阶级的觉悟还有使他成立的方法没有？不知东荪君对于这几个问题、有过打算没有？如果没有打算、只说不必、只应、不要、只要、只应当、只当、只希望、不希望；是不中用的。就是说了几千个不必、只应、不要、只要、只应当、只当、只希望、不希望；几万个不胜忧虑；也是不中用的。

在有阶级觉悟的人看起来、以为工人与工人既然都是境遇相同、利害相同、工人对于工人自然都是应该容易发生同情心、互助观念；容易有团结、有组织。但是这个容易发生同情心、互助观念；容易有团结、有组织的这个要素、在没有觉悟的工人、实在反是使他们对于同阶级发生反感心、互相排挤的观念；不能有团结、有组织的原因。何以呢？工人与工人虽然都是外在被掠夺的境遇；敌人是共同的、利害是一致的；有容易发生互相间的同情心、互助观念；容易有团结、有组织的要素。但是工人如果没有阶级的觉悟、不晓得资本家是掠夺阶级、自己被掠夺阶级；不晓资本家是掠夺自己的、自己是受资本家底掠夺的。现役的工人必然以为现在自己底吃不饱的饭、穿不暖的衣、遮不住风雨的房子；都是资本家给的、感激资本家之不暇；那里会团结呢？那里有团结的必要呢？预备队里的工人天天顶香祷祝地盼望资本家发点慈悲、给点吃不饱的饭他们吃、穿不暖的衣他们穿、遮不住风雨的房子他们住之不暇；那里会团结呢？那里有团结的必要呢？现役的工人、又因为以为这点吃不饱的饭、穿不暖的衣、遮不住风雨的房子、都是资本家恩给的；当然为保持这点衣食住、想法子去博得资本家的欢心；于是对于朋辈就要起竞争、由竞争而排挤、由排挤而反抗；对于预备队里的同阶级者、就要防御。那里会发生互相间的同情心、互助观念；更那里会有团结、有组织呢？在预备队里的工人、又因为天天在顶香祝祷地盼望资本家发点慈悲给他们一点吃不饱的饭、穿不暖的衣、遮不住风雨的房子；他们对于朋辈当然就要起竞争、由竞争而排挤、由排挤而反抗；对于现役的同阶级者当然就要成敌对。那里会发生相互间的同情心、互助观念；更那里会有团结、有组织呢？他们同是处在被掠夺的境遇；敌人是共同的、利害是一致的；这不但不为他们发生互相间的同情心、互助观念；有团结、有组织的要素；反要为他们互相竞争、互相排挤、互相反抗、互相防御、互相敌对的要素。象在今天中国、工人底预备队充满市场的场合、这种情形更要显著。他们没有阶级的觉悟、就是有充分的要素、他们是决不会有发生相互间的同情心、互助观念、有团结、有组织的日子的。他们底相互间的同情心、互助观念、团结、组织；一定是要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晓得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资本家、他们底利害是一致；晓得他们底利益不是巴结资本家、互相排挤敌视、可以得到、一定是要以资本家为敌标、互相援助、才可以得到；才能发生、才能成立的。

这几层兄要略为晓得一点工人底情形的、都可以明白。就是不懂得工人底情形、只要晓

得一点劳动运动历史的人、也可以推测得出来的。北泽新次郎。在其所著“劳动者问题”内说：

“我们要晓得、唤起了近世劳动者问题的原因、不单是这个困惫了的劳动者底境遇。我们于研究近世劳动者问题之由来的时候、所最宜注意的第二要点、就是十八世纪以后的思想界底一大变迁、而尤是为法国革命所惹起的自由平等底思想。要之为工场制造工业组织底产物的无产者底穷窘的社会的境遇、是近世劳动者问题底大舞台、而为其背景的就是法国革命底产儿的自由平等底民主的思想。……加之自由平等底民主的思想渐次促进了劳动者阶级底觉悟。国民教育底普及、新闻杂志底发达、通俗图书底刊行、或者学术底讲演、关于修养的讲话、其他之关于居住改良、公共卫生等等的社会教育底发展；助长了劳动者底自觉。于是劳动者感知了阶级的意识、‘彼人也余亦人也’的观念刺戟了他们底过敏的神经、反抗象从前被视为机械而要求人格的价值、在同一境遇之下的有觉悟的劳动者、未几就觉悟了互相团结底利益。换句话来说、就是劳动者觉悟了由团结而获得的势力之伟大。于是他们就为共同的目的一致团结起来、以团体之力力求他们境遇底改良。于是近世劳动者问题底戏幕就开开了。”（劳动者问题一一页至一四页）

他又说：

“现代劳动者问题底本质、是对于阶级的意识有了觉悟的劳动者、在现存产业的环境之下、想使其生活状态向上的真挚的欲求底结果。有了觉悟的劳动者互相团结、依其自发的行动、以求改良其地方境遇的这个努力、不必一定都是由于利己的物质的动机、反是要求社会的正义的伦理的运动。”（劳动者问题第一四页）

他又说：

“依过去的经验、一国底劳动者问题底发生、在其初期、大概都是劳动者阶级以外的人、对于劳动者悲惨状态表同情、而为劳动者尽力于地位境遇底改良。但是真实而健全的劳动者问题、还是在自觉了阶级的意识的劳动者、以其自治的训练及有组织的行动、反抗社会底不合理的压迫、要求社会的正义的时候、才会发生。对于英国底产业革命所酿成的劳动者底悲惨的生活状态、最初起了反抗的、是英国社会底上层阶级里面的人。这些人同情于劳动者、力求除去其随工场生活而发生的弊害。一八〇二年英国最初的工场法是因此出世的。但是上层阶级之关于劳动者问题的舆论底发展及教育底普及、渐次诱起了劳动者底觉悟。于是这些有了觉悟的劳动者、就起来反抗对于他们的不合理的压迫、互相团结以其自助的机关主张他们底权利了。这就是今天英国职工组合运动底起因。”（劳动者问题第一六页一七页）

他对于英国职工组合底发生又说：

“现今劳动者与资本家缔结的劳动契约是自由契约、所以由表面上看来、二者底关系好象是对等的、但在实际上则不然。……劳动是一种商品、卖的是劳动者、买的是资本家。但是要晓得劳动底买卖、在其劳动自身底本质上、有与商品完全不同的事情存在。第一、劳动这个商品、或看做商品了的劳动、是固结在劳动者底身体上的、是不能与劳动者底身体离开的。……劳动者卖了他底劳动、其必然的结果、人格不能不受相当程度底桎梏。……第二、商品于其供给有屈伸力、劳动就没有这个性质。商品可以随其市场底景况、测量其需要底程度、而加减其生产。人口底增加、是受种种社会事情支配、不是劳动者自身所能左右的。第三、商品与劳动间其移动力、很有不同的地方。商品以商业底手段、能够由其需要少即价廉的地

方、向需要多即价高的地方移动，劳动不是象商品那样富于移转力的。劳动者因其家族的关系、经济的事情等等；移转住所比较的是困难的。第四、商品之有保存力的很多、劳动就完全没有这种性质。劳动者不能说、今天不卖劳动、保存到了明天、就为两倍的劳动。……劳动在其本质、既有与商品不同的地方——卖买当事者底关系、就不能象商品底场合、是立在对等的地位。更有使劳动底买卖陷于不对等的地位的原因、是在劳动者底社会的境遇。……这是因为劳动者比较资本家是处在社会的弱者底境遇。没有经济的余裕的劳动者、一日不卖劳动、自己及妻子就不能糊口。所以虽系过少的赁银、亦不能不甘受而卖劳动。但是资本家虽不买其劳动亦决无穷于衣食之忧。别的地方劳动底供给还多得很呢；就是没有也没有甚么大损失。加之劳动者闇于劳动市场底情形、在结劳动契约的时候、可以说是处在很不利益的地位。……于是劳动者不能不受强者的资本家底压迫。但在劳动者还没有觉悟的时候、这种压迫无论如何利害、他们都是把他作为无可如何的事、信为天命。到了他们有了阶级的意识底觉悟、发生了改善他们社会的地位与境遇底要求；他们才达到感觉单独行动之到底非策、觉悟要以团结的势力以当资本家、才能与资本家结对等的契约。这个结果所发生的东西就是职工组合。”（劳动者问题第五二页至五六页）

洼田文三在其所著《欧米劳动问题》讲意大利、瑞典底劳动说：

“在这些国、一般国民智识程度既低，政治产业上的旧弊又缠绵不解阻碍他们底发达、而劳动社会尤迫于贫困穷乏无暇他顾、且习于多年的压制政治而失去向上进步的精神，有阶级的觉悟而欲取独立自助的行动的人、不啻如晨星之少。”（欧美劳动问题第一六四页）

北泽新次郎是主张社会改良的、洼田文三是外交官吏是主张劳资调和的；皆不是主张阶级争斗的。如果我们举了别的主张阶级争斗的人底话为证、东荪君或者是要说他是我田引水、不足为信的。现在我们只举了这两个人底话、东荪君大概也不至于说他是我田引水了。我们只看了这两个人底话、也就可以晓得、工人互相间的同情心、互助观念、团结、组织；一定是要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之后、才会发生、才会成立的；如果他们没有阶级的觉悟、是不会发生、不会成立的。

这就是不晓得劳动运动历史、只要略微懂点近二三十年来日本劳动界底情形、也是可以明白的。日本底近代产业从明治维新以后就渐渐发生、但是为日本近代产业划了一个新纪元的还是中日战争、我们可以退一步说日本底近代产业只发生二三十年。近代产业底发生、其必然的结果、一定产生资本家阶级与劳动者阶级底对立。日本底劳动者阶级既然发生了二三十年、何以一二年前工人间决没有发生互相间的同情心、互相观念的痕迹；反而只有互相冲突、互相排挤的痕迹；即使有他们阶级外的热心者为他们组织过团体、这些团体都为他们相互间的冲突、排挤破裂了呢？何以到了近一二年在产业界正兴旺的时候、团体忽然丛生、步骤也能一致呢？因为一二年以前日本底工人没有阶级的觉悟、不晓得以掠夺阶级为目标、而互相同情、互相援助、互相团结、到了近一二年、一因世界底新潮流底影响、二因国内底有识者底提倡、方才发生了阶级的觉悟。这只要略微晓得点近一二年来的日本底言论界的情形、也是可以领略的。

就是完全不晓得劳动世界底情形、我们由普通社会上的现象也可以推得出这种理论来。大凡互相敌对的都含有互相连结的要素、互相连结的都含有互相敌对的要素。换一句话来

说、互相敌对的要素就是互相连结的要素、互相连结的要素就是互相敌对的要素。互相敌对与互相连结完全是同一要素的、敌对、连结、完全是由第二条件而定的。英国底利益是在保有印度及南洋诸岛底领有权及利益、日本底利益是在南进；这两国都是在印度洋方面有冲突的要素的。他们这个要冲突的要素，反为了他们同盟的要素。而为其连结条件的、就是俄国、就是他们都认了俄国是他们共同的仇敌。如果他们没有要冲突的要素、他们是无须同盟的。如果他们没有觉悟俄国是他们底共同之敌、他们是不会同盟的。现在侵略的俄国消灭了、日英同盟继续问题不就成了问题么？我国从前的进步党和国民党、都是我国最初的政党。他们底共同敌人是官僚武人、他们要实现他们底理想、他们要得到政权、都是要先推翻了官僚武人才行的；他们底境遇完全是同一的、他们底利益完全是一致的；他们是有互相连结的要素的。但是他们这个要连结的要素、反为了他们互相排挤的要素。而为其条件的就是进步党没有觉悟官僚武人是他们底敌人、反一再怂恿他们解散国会、一再卖国会以为巴结之资、借图己党底利益而置他党于死地。如果他们没有要连结的要素、他们是无须互相排挤的。如果进步党觉悟了官僚武人是他们底共同敌人、不去巴结这些东西、不去卖国会；是一定不会互相排挤。劳动运动也是逃不脱这个原则的。他们虽然都是境遇相同、利害一致、具有互相发生同情心、互助观念、有团结有组织的要素、如果他们缺了阶级的觉悟；这个要素反要为他们互相竞争、互相排挤、互相反抗、互相防御、互相敌对的要素了。

由上所述、无论是从事实上、无论是从理论看、工人对于工人的同情心、工人对于同阶级的互助观念；工人底团结、工人底组织；都一定是要工人有了阶级的觉悟、才会发生、才会成立的。而东荪君只希望工人对于工人发生同情心、工人对于同阶级发生互助观念、工人有团结有组织；而不希望工人有阶级的觉悟；这不是叫人走投无路么？

至于工人对于自身的自决、是自决甚么？是不是由资本家底桎梏之下自决？如果是由资本家底桎梏之下自决、那么这个自决行动、就是阶级争斗；这就自然是要以阶级的觉悟为前提了。至于工人对于自身的觉悟、是觉悟甚么？是不是觉悟自己底地位境遇？是觉悟自己底地位境遇了、当然是要觉悟到自己是受资本家阶级底掠夺的，那么这个觉悟就是阶级的觉悟了。加以工人在社会上所处的种种不利益的地位、及象现在中国劳动者的预备队如此之多；使他视资本家底势力为不可抗、甘受压迫、视自己底地位境遇为天命、不想法改善。又因为现在的道德都是使资本家阶级底利己心可以任意发展、使劳动者阶级不能不背及自己底真实利益而行动的。工人中这种道德底毒受深了、就永久认定资本家阶级底掠夺行为是正当的、自己底受掠夺是应该的，就是苦死也不会疑到自己也是有应主张的权利的。在这种境遇之下的工人、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觉悟的、无法生出自决心来的。他们要生出觉悟、自决心来；还是非以阶级的觉悟为前提不可。东荪君只希望工人对于自决、对于自身觉悟；而不希望工人有阶级的觉悟；这不又是叫人走投无路么？

东荪君说：

"这事不但与工人无利并且有害。促进资本家的团结犹其次。而破坏工人的道德（不是绝对的）使社会一班对于工人减轻信用。则与工人前途很有妨碍。"

资本家阶级与劳动者阶级原来是立在利害相反的地位；工人底利益、一定是资本家底不利益。工人不要拥护自己底利益则已；如果工人为拥护自己底利益结了团体、要来自决、就是工人还没有阶级的觉悟、也没有人做文章大骂资本家为掠夺阶级；资本家也是要团结起来拥

护自家底利益的。至于破坏工人底道德、因为他又加了一个注说“不是绝对的”、我们不懂他所说的“不是绝对的”、还是“不是绝对的破坏工人底道德”呢？还是“破坏工人非绝对的道德”？据前一说、我们又不懂得甚么谓之“绝对的破坏工人底道德”？甚么谓之“不是绝对的破坏工人底道德”？又不懂得为甚么工人有了阶级的觉悟、对于资本家发生了散漫的反感的行动；就会绝对的破坏道德、或相对的破坏道德？据后一说、我们又不懂他所设的工人底非绝对的道德是甚么？绝对的道德是甚么？又不懂得甚么谓之是“破坏工人底非绝对的道德”？甚么是破坏工人底绝对的道德。如果他所指的是“萨波达举”（Sabotage）、那就不必要他耽心了。萨波达举不一定是要有了阶级觉悟的工人才会行的、也不一定是散漫的工人才行的；没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会行、有团结有组织的工人也会行的。工人行这个方法的原因、与工人有没有阶级觉悟、有没有团结组织、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工人迫于不得已的行为、是政府、资本家无理压迫的结果。详细的理论、我也没有工夫写、只好请他谈谈本志第三十四号李陶君底“萨波达举的研究”再至于“使社会一班对于工人减轻信用”的一层、不但不能作为不应使工人有阶级觉悟的理由、并且应当作为对于社会一班应当大大地灌输资本家阶级是掠夺阶级或强盗阶级的观念、使社会一班都明了资本家阶级底横暴、劳动者阶级底不合理的痛苦的理由。现在社会一班都是为利于资本家阶级、而不利于劳动者阶级的道德所支配；资本家就是再横暴再逞私心、都是要容忍或反认为正当而嘉许的。比如穆藕初等虐待女工的行为、虽是言论上颇有人反对、却是社会一般对于他们的心理、恐怕还大多数是认为正当的呢！劳动者阶级就是略微主张点正当的利益、都是要唾骂他的。就是工人狠有阶级的觉悟、有了团结组织；只要工人对于资本家有了主张利益的行动；社会一班对于他们都是要减轻信用的。我们为打破社会一班底这种不合理的观念、应当使他们晓得资本家阶级是掠夺阶级、劳动者阶级是被掠夺阶级。这几层都是东荪君所未想到的。东荪君对于这几层的前提是“散漫的工界个人对于资本家发生反感的行动”。他对于散漫的工人既有这样杞忧、又是希望工人有团结有组织的、而他又不主张工人阶级觉悟、这又不是叫人走投无路么？

他又说：

“中国人的大毛病就是睁开眼睛只看人家不看自己。历代的道学先生所说的纲常名教都是责备旁人的。自己却不必遵守。在此处即可以看见中国人的根性。所以非矫正不可。”

他这一段话是骂谁的、我们不懂得。照他底后文看下去、好象是骂工人的。我看工人倒没有甚么对不住社会、没有甚么对不住资本家、没有甚么要责备自己的地方、没有甚么要非请东荪君来矫正不可的地方。如果是骂那些“做文章大骂资本家”的人的、我不晓得东荪君指的那一个、骂得对不对我也不管、我只问东荪君：“理想与现实一致了、还有没有提倡的必要？”现在人之所以提倡社会主义、未必尽是立刻就想实现。如果说你只提倡而不实行是不配讲社会主义的、这是不行的。如果他一说就能实行了、那里有说他的必要呢？所以想要提倡的缘故、不是因为他底理想与实现不能一致、要求社会全般来援助、使他底现实与理想一致么？所以不能说不能实行的人、就不能提倡；只能责备他连能够实行的、都不实行。或与所提倡或标榜的背道而驰、或今天东明天西。

至于东荪君说“现在还没有到相当的时机”。我们不晓得他所说的时机是甚么。未必是说要等到中国工人底境遇自然促起他们觉悟底时机、才谓之到了相当时机么？先进各国工界底觉悟、本来有许多都是因为工人底境遇苦到极点、才发生的但。他们为达到这个时机、不

知受了多少的痛苦、只看看英国底劳动历史就有了。东荪君未必是说工人底苦还没有吃够、一定要中国工人也经过这个惨苦时期、才令他们得到阶级的觉悟么？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

（原载《星期评论》第50号，1920年5月16日出版）

一个工人的宣言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我们少数同声同类的工人，再联络多数同声同类的工人，成一个大团体。由我们大团体，再联络他一大团体，以成中国一大团体。由中国的大团体，再联络他国的大团体，以成世界一大团体。世界团体呀！中国团体呀！我们团体呀！发端就在我们少数工人呢。但是我们少数工人，也有三个要件。

第一要认定我们的地位。我可爱可亲的工人呀！到了这个时候，甚么昏雾黑霾都要开了，甚么地狱监牢都要破了，甚么阶级束缚都要除了。这个潮流，比天上流来的黄河水，还要利害，还要迅速。任他甚么人，不会能撑住这个黄河水，不会能塞住他，使他从地下倒流上天去。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利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不是工人，就不能站在工人的社会里——工人中国里——工人的世界里。我们会要赶他离开地面，到天上去讨生活。我可爱可亲的工人呀！俄国已经是工人的俄国，意国将是工人的意国了，英国将是工人的英国了。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了。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我们可是要这点了解吗？

第二要贯彻我们的联络。我们要产生工人的中国，首先就要工人联络。有少数的联络，有团体的联络，有乡村的联络，有都市的联络，有本国的联络，有世界的联络，有同职业的联络，有同产业的联络。我们自己造的房子，自己住下罢！自己耕的谷米，自己吃下罢，自己缫的丝，缝麻的衣裳，自己穿下罢。不要给与那些流氓，白住的，白吃的，白穿的。我们自己做的铁道，自己管下罢！自己造的轮船，自己驶下罢！自己做的刀枪，自己使下罢，自己开的工场，自己占下罢。不要给予那些强盗政府，和强盗资本家，强管的，强驶的，强使的，强占的。最可恶的，他们得了便宜，还不要紧，还要虐待我们给他便宜的人。甚么每天九点钟的工作，十二点钟的工作，十四点钟的工作。甚么每天角多钱一天，两三角钱一天。弄得我们吃的是臭的，穿的是臭的，住的是臭的，处处是一个痛苦到了极点的。这个情形，我常要灰起脸来，吊下泪来。我们是不是要大大联络，去解决这个时间和工钱问题，再去解决那一些"自己住""自己吃""自己穿""自己管""自己驶""自己使""自己占"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贯彻联络，就会没有力量。

第三要奋发我们的热心。吾们工人，最好一方面是做工，一方面是联络。做工是各人的天职，联络是成功的手段。终其身可以不变的。——可以积极的。

（原载《劳动界》第7册，署名：海军船工李中）

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

吴 廷 康①

今天是公历十一月七日，正是三年前俄国劳工农民推倒资本家和军阀，组织劳农议会共和国的成功日！也可以说今天是全地球各国劳动〔者〕的庆贺纪念日！从有历史至今，这是头一回劳动者脱离了富豪的压制手段，夺回了自己的天赋权。现今俄国劳动者自由创造自己的生活，并不准那些制造厂主银行团和那些军阀官吏文武大臣来干涉了。

全地球资本军阀国互相誓愿除灭年幼的劳农议会俄国，他们常常的怂恿军阀协助金钱军械或封锁俄国，然而那劳工农民也可能牺牲一切，设种种方法去以抵抗他们的攻打。

天下各国的真正劳工农民没有不表同情于劳农议会俄国的，他们不但表同情，并且尽力协助年幼的劳农议会的俄国，请看英国矿工运输工铁路工（当英政府要出兵于俄国时）曾极力要求其政府停止出兵于俄国去干涉。

意国劳工更是卫护劳农议会国，爱尔兰的劳动者已有多数赴俄工厂作工以助劳农议会新俄。

美国劳动〔者〕已经组织了最大的共产党以作新俄的后援。证以事实，凡欧美的劳动〔者〕皆从心里赞助劳农议会新俄。

在俄国已经没有那些资本富豪压制劳动者了。

我们中国劳工农民啊！我们是否要脱离中外资本的压制，是否要免除军阀的痛苦，是否应解放官吏所加的担负，若是我们要脱离这些困苦境遇，就应该劳工农民互相联络起来，然后再和各国劳工农民互相联络起来一齐作俄国劳工农民所作的事。劳工农民快觉悟罢！快着手解放自己罢！有勇敢有精神的俄国劳工农民啊！你们今天庆祝第三年年幼的劳工农民议会共和国了！我们这软弱的劳工农民还尚在水火中呵！

有勇敢有精神的俄国劳工农民啊！快快的帮助你们在水火之中的劳工农民伙友罢！

俄国劳工农民不惜牺牲一切，备尝痛苦，创造了解放劳工农民受苦的实行制度，立下了拯救贫人的法则。不惜牺牲为天下先，大破了军阀资本的残暴野蛮，为世界开了一条人道光明大路，简直就是要解放天下的劳工贫民。如此说来，今日本是解放俄国劳工农民的纪念日，其实也就是解放世界劳工农民的纪念日。

祝劳农议会俄国万岁！祝世界劳工农民解放万岁！

（原载《劳动界》第13册，1920年11月7日出版）

① 即威金斯基。

《劳动与妇女》发刊大意

（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三日）

玄　庐

劳动者要求解放，正当要求劳动者所结合的团体，不当要求资本家解放；妇女要求解放，正当要求妇女们自身，不当向男子们乞怜。

有产阶级所据的权威，是劳动者给他（渠）的；男子（有产阶级的男子）所据的权威，是劳动者和妇女给他的。这种权威，不因为向他们要求解放而减杀，反因为向他们要求解放而增高。

无论哪一个人，都可以加入劳动团体，做有益于人们的工作；无论哪一个男子，都不能加入妇女负担孕乳婴儿的责任。无论哪一项劳动工作，都可以脱离资本家由劳动者自力经营；无论哪一个妇女，都不能离开男子担负传种的责任。照这样看来，劳动者与妇女，显然有不同的事实存在。那么，劳动者们，妇女们，努力的方法，也得随着这些不同的情形而各找各的路径。

但是在阶级制度下面受经济的压迫，劳动者和妇女是一样的。

历史上所陈列的种种阶级：在古代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中世纪有领主，家臣，行东，佣工，徒弟，农奴；在中国最近君主时代有皇族，大臣，科第，官吏，幕僚，胥吏，地主，店东，伙友，佃户，奴，仆；民国以来，约法上虽说"无阶级之分"，但是军阀，党阀，官僚，财东，地主，佣工，苦力，显然有种种不同的阶级层层压迫；约法的虚伪，在劳动者和妇女的地位上彰明较著地呈露了出来。

阶级制度有一日存在，劳动者和妇女就活受一日的压迫：在上面一个阶级，往往用空言来哄骗下面一个阶级；下面一个阶级里面的人，因为急于想获得眼前的小利益需要，把人格，体力，脑力，甚至于生命和爱情统统被眼前的小利益所诱惑而牺牲掉了。一般劳动们和妇女们并未曾了解用金银作武器的杀人手段：自从生命，爱情，劳力等等，化作商品之后，不知道坑陷了多少人们，如今还是继续地填着陷坑；劳动与妇女，即使目前起了极大的觉悟，也不过认识一种诱惑的行为罢了；因为劳动者的找不到资本，正如妇女们的没有社会一样。

劳动者的动作，成了机械的动作，妇女们竟直全身化为机械了。无论哪一个阶级的妇女，没有不是充男子的机械的。若单从表面上看，以为有产阶级家庭中的妇女的妆饰和消费，较有产阶级的男子还要奢侈，其实和西班牙皇后所养的狗没有两样——西班牙皇后的狗，全身的饰品值八十多万金镑，恐怕有许多夫人太太们还望尘不及；实际上和豪门巨室的车夫、仆从没有什么差别，和卖淫的娼妓比较起来，还要增加生男育女的负担。从最高的阶级起一直到最低一个阶级的妇女，没有不受男子的压迫的，伊们的劳力，是辅佐男子；伊们

的妆饰，是男子为自己设备的刺激品；伊们为人类传种的本能和负担，都隐在辅佐和刺激用的下面，过伊们恐怖的羞怯的无希望的生活罢了。

妇女问题，原来比劳动问题复杂得多。我们眼前要解决的，是压迫在劳动与妇女上面的阶级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制度，这是劳动与妇女应该起来解决的共同点。要解决这个共同点：宗教，是做不到的；手枪炸弹打死一两个人是不中用的；朝现全主义中间去求祷威权的赦免，更是小雀儿在鹰爪下求饶，万无幸免之理的；我们历来埋藏着的本能，已经和世界潮流起了应声了，我们正该检定一个主义从事实上有可建设的，我们提出一个一个问题来作实际的运动，才是我们自己要求自己解放的方法。至于提出来的问题，毛论是改良的或真是改造的，我们只要先认明是依我们共同的进程上的事实，我们都应当十分努力。在这种势力的时期中，我们并且要了解改良的动作，只是和我们的目的接近，我们虽然十分努力十分危难得来的改良式，总不要因为已经改良了就抛掉我们主义下面的建设。

弟兄们，姊妹们呵！觉悟的门前，就是刀山剑林，我们要一脚一脚踏在实地上走到我们的目的地。飞越这种刀山剑林的幻想家，是吃饱饭没事做的帮闲主义下面的产儿，是儒弱无能怕敢和阶级制度直接奋斗的弱者，这一类虚幻狡避的空谈，我们不能听的。弟兄们，姊妹们，各尽各的能力，把山上的刀，林中的剑，拔除罄尽，成了坦途，不幸落在哪把刀哪把剑牺牲了，也给后来者做一个标识。

弟兄们，姊妹们！快快自己打开觉悟的门联结起团体来，努力前进！我们不要和有产阶级比富，我们要和柜（渠）们比穷；我们不要和男子比权威，我们要和男子比责任；从今后，我们要做自己的人，我们不做别人附属的人，我们也不要别人一个人做附属于我们的人。

一九二一年"五一"纪念活动

（资料一束）

一 《五月一日》节录①

"五一"纪念日，是世界上历史上一个最重大的纪念日，比什么没有意思的国庆日还强百倍。因为"五一"是劳动界战胜资本家——即一日工作八小时的运动胜利的纪念。我们从上面知道欧洲美洲各国的工人到了那一天都有很剧烈的庆祝运动的举行已有三十多年了，但是我们中国却很沉寂的，好象"五一"那天没有多大关系，这也是我们工业没有发达，工人没有觉悟的原因。但是在近几年来，情形却有点进步了，劳动的声浪渐高，"五一"的纪念庆祝也一天比一天热闹了。

自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我国革命成功以来，一般的国民却抱有一种活泼的生气，对于社会的运动，很明显的努力的进行。"五一"在中国的运动也和革命的新纪元共同长进。一九一三年的"五一"纪念日，在中国南部的广州，由华侨工会、机器工会和一班社会主义者联合举行庆祝，那天其他的工会也有派代表到会，但是没有什么的议决和运动，不过发了一种劳动节的传单，将"五一"的历史和意思说明，并鼓动工人的觉悟，去实行一日作工八小时的运动。从这次起，每年广州都有"五一"纪念的运动，可是并没有坚决的议案和向资本家示威的运动，到了一九二〇年的"五一"，那回的运动却又不同了。那天广州的工业团体如机器行西家、岭南工党、香港电车行、石行、茶该行、学源社等和学界，如工业女子职业、铁路专门等校联合在东园举行庆祝，到会的有几万人。同日在中国的北部北京也有"五一"的运动，由北京的几个青年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坐两辆汽车，拿劳动节传单去散布，车上插了几面红旗，上面写着"劳工神圣""五月一日万岁""资本家末日"等字。传单题目为"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大概说："今天是世界劳动者争得八小时纪念日，我们工人应该快快起来休业一天，大庆祝一下才是。从今以后，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军人、大道士、和尚、盗贼、娼妓、流氓、乞丐都要驱逐净尽。我们把田园、工厂，以及一切生产机关取回——由少数人的手里归大家管理，不要将生产的结果，被一般不做工的人剥夺去了。我们要人人做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喂！我们工人朋友们，快快联合起来呀！"这种传单除在北京派外，还在长辛店各工厂里派给各工人看，他们都很欢迎。我们有一层要知道，就那张传单的宣言，不可轻易看过。这次的劳动运动却与向来外国"五一"运动有些不同，就是带有社会革命的色彩，不可不算是中国"五一"运动的特点。那天早上北大的校役夜班也开会庆祝，由各人自由登台演说劳动工的事件。到下午他们派传单，两辆汽车，一辆在王府井大街，一辆在骡马市，通通给武装警察抓去。派传单的八位热心运动者，那时就被拿进京师警察厅受审问。

---

① 这是1921年5月1日，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散发的宣传品《五月一日》中的第九节。

审问官某见了他们不象是做工的人，他问他们说："你们不是学生吗？你们不是工人为什么……"

他们不待他说完，就答说："我们就是学生，就是工人。"

他再问："谁叫你们出来派传单呢？"

"我自己叫我出来派的。"

"你知道这种传单是犯治安警察法吗？"

"什么叫做治安警察法？我不知道犯的是什么？"

"你传单上说，要驱逐官吏、政客等那岂不是无政府吗？"

"你错了，难道吃饭不做工（与公同音）的官僚政客，政府也要他吗？"

"为什么你把田园、工厂等取回，岂不是共产党吗？"

"难道人家抢了我的东西去，我不应该取回吗？"

审问官见寻不出他们犯罪的口供和证据，就囚监了他们在一所黑房子里头，后来因没有法子和理由定他们是犯法行为，所以只囚了十六天就放出来了。那天上海的各工会和社会党也举行庆祝，虽遭巡捕解散数次，毕竟有千余到会，演说者十余人分散传单万余份。有一小部分工人也休息。而唐山各工厂的工人，于做工休息的时间也聚了数百工人开了一个庆祝会，演说呀，发传单呀，也算很热闹。那时各地方的报纸杂志，如《新青年》、《星期评论》、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新社会》等都发刊劳动纪念号。

以上所说的"五一"运动，我们不能算是实际上的运动，因为不是完全工人的自动，且没有罢工、休业、种种示威的运动与具体的议决，他们也没有直接向资本家宣战，我们只可算是宣传的运动。可是经这几年"五一"的宣传运动，生出许多效果，中国的工人，却受了感动不少，觉悟了也不少。连年来各地方的工人有工会的组织，且屡次发生罢工的事，如今年三月间香港机器工人的大罢工，广州铁路工人的大罢工，和各种工业如造鞋、纺织的工人的罢工，上海人力车的罢工，唐山开平等矿工的大罢工，通通都是受了历年来"五一"运动的洗礼。他们罢工就是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结果工人占了胜利。但是没有达到八小时的工作律。现在中国各地方的工人，都正着力来从事组织工会，有许多已成立了，还有许多地方工人如长辛店、唐山、上海、广州等都自己设立劳动补习学校，以从事求知识。因为他们已觉悟非有强固的团体，充足的知识，不足以与资本家抵抗，那是可喜的一件事情。我们中国的工人也跟着世界的劳动潮卷向前进。

中国的工人们和社会党呀！你们应该赶快起来，和世界的工人一块儿庆祝这个"五一"盛节。

应该在五月一日停工！

应该在五月一日举行示威运动呀！

二　去年之五月一日

今日何日？不是一个世界的劳动纪念日吗？这个劳动节的历史和意义，世界各国殆无不"家喻户晓"。可是在我们中国方面，三年以前，真如劳动杂志所说，"不入吾人的清梦"。及到前年，国中几个学生始有谈及的。北京《晨报》竟出有一个劳动的纪念号。这不能不算

是黑暗中爆出来的明星。这个明星照耀一年，如是引起全国人士的注意了。所以去年今日，就也有几处开通的地方点缀了一番风景。我现在在旧报纸里头寻出关于去年今日各地运动的纪事分录如下。

一、湖南的五一游艺大会

是日劳工会在第一师范学校举行劳动节游艺会，到会者人数甚多。时至十句钟，始由筹备员报告开会(一)奏乐开会。(二)由筹备员李植彬君率全场会员及来宾向会旗行三鞠躬礼，礼毕三呼劳工万岁。(三)由该会创办各劳工学校学生唱庆祝劳工歌。(四)由筹备员李彤君报告开会。略谓今天是一八八四年十月七日欧美各国劳工在芝加哥开国际并国民的八大联合会，议决在每年五月一日举行总罢工，要求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嗣后欧美各国的劳工都定今天为世界劳动节。年来我们中国上海、广东、北京各处已经举行了三次。今天我们湖南是举行第一次。各位今天到会这样的踊跃，我料明年五月一日的热闹一定会达到一九〇〇年的五月一日各国劳工在伦敦海陆公园的劳动节一样热闹的。惟是今天这里地小人稠，本会筹备不周，请诸君原谅原谅云云。(五)会员演说。有兵工厂肖君异莫君百祥等演述中国劳工们的痛苦，结果宜急为劳工筹备教育，以求知识上的平等云。痛快淋漓，满座鼓掌。(六)为来宾刘亚伯君等演说，大致不外尊敬劳工，希望全国人民自食其力，无〔勿〕徒作升官发财的梦云云。(七)由本会劳工学校小学生举行跳舞，其一种天真烂漫活泼泼的精神，观者无不敬爱。(八)双簧。演者为本会纺织工陈伟涛君、矿工余定斋君，与来宾某某二君，板拍合韵，惟肖惟神。(九)演剧。演员纯为本会会员，剧名"万恶的金钱"，内分十幕，情节亦佳，对于提倡劳工感化财阀不少。全场雅静，秩序井然，未始非演员之魔力所致也。至四时，方闭幕摄影散会。

二、北京的劳动纪念

(甲)西城路上之传单，北京《晨报》纪载云，劳动节日北京城里除了一二处讲演会外，并无何种庆祝之举。记者昨在西城路上，拾得传单三种，想必为工界所发布者，兹录如左。

(传单一)

五一节问答

成君问劳君道：什么叫做五一节。

劳君道：五一节，就是民国元年前二十五年(西历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美国工人运动每天只做八小时工作大胜利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工人稍得着自由的第一纪念日。我们不但要纪念他，还要达到这同样事的"目的"呢！

成君道：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呵。那末，我们就要把这个纪念日看得非常要紧，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总要大大的庆祝的才好呢。

劳君道：不错，不错，你真是一位明白的老人家。

(传单二)

北京劳动界的伙伴们：

现在社会上吃的，穿的，住的，那一样不是我们劳动界的朋友们辛苦劳动用血汗得来的东西。

回看我们自己，甚么都没有享受，只得着痛苦和饥饿，这难道是平允的事吗？

今天是三十二周劳动纪念节，是全世界劳动界朋友们奋起图强的日子，我北京亲爱的伙

友们，也快些起来救救自己罢！

（传单三）

卖力气的弟兄们：你们知道今天世界上又出了一桩重大的事情么？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我们中国的广州、上海，以至于太阳照得到的地方，在今天都发生了汹汹烈烈的事情。

诸位，你猜这是怎样一回事？是谁干出来的事？

诸位，这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卖力气的工人们啊！

今天不是五月一日吗？距今三十五年前的今天，美国的工人们因为对资本家要求每天只做八小时的工作打了一个胜仗。不久，世界各国的工人也用“同盟罢工”的方法，得了同样的胜利。于是万国工人的代表就公共议定了这么一个劳动节，到了这天大家却都习一番汹汹烈烈的庆祝劳和〔动〕举动。

弟兄们呀！别因为今天前门天安门警察厅的门口少了一座花牌楼，总统府东西车站少了几百支电灯，便以为今日也是平平常常的日子啊。他们做官的人只知道庆祝他们升官发财的日子，至于我们卖力气的苦人的纪念日，和他们升官发财是没有益处的，他们自然是不管了。

但是我们劳动的弟兄们哟！他们不管就让他不管，我们庆祝终归是庆祝。只要大家牢牢的记着年年的庆祝，总有一天让我们作苦工的弟兄们自己出来扎牌楼，放烟火，悬灯结彩，喝酒欢呼的。

弟兄们哟！各地的弟兄们何等热闹，算来只有我们北京是地狱了。我们劳动的弟兄哟！从今天起，牢牢地记着，慢慢地结合到明年的今日，我们也可以奋起来热闹，合口同声的三呼：“五一劳动节万岁呵！”

（乙）高师之讲演会　北京高等师范工学会，因五月一日为劳动运动成功纪念节，特由该会印将多种信笺信封，赠送高师同学及各界人士。信笺信封，面上写有“劳工神圣”“庆贺劳动运动成功”“敬祝劳工永远胜利”“五一劳动纪念节”等字样，并于是晚在该校特开讲演大会，敦请刘廷芳张耀翔李建勋诸先生讲演。又该会书报贩卖部，是日卖出各种书籍，加送赠品。并于门首张贴各种祝贺劳工胜利排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格言，高悬脱尔斯泰克鲁泡特金马克斯等肖像（均是该会会员绘的），并种种现代制度讽刺画等，确是热闹。于此佳期令节悲惨冷静之北京，总算小有点缀也。

（丙）长辛店之五一纪念会　长辛店铁路工人于一日八点半开五一纪念大会，到会者几近千人，除北京保定各界人员赴会外，且有本地劳动学校铁路工人国民学校学生参与。会址在该镇庙内。工人宣告开会宗旨，有来宾张汤邓黎等演讲。讲演毕，学生与劳工游行，沿途大呼八小时工作云。

三、广东的劳动节巡游情形

广东大公报载云，本月一日为世界劳动圣节，是日广州市各〔〕工人特举行巡游，以伸庆祝。参加巡行者计有数十行之多。各均手持小旗，上书“劳动神圣”“劳动界之最后胜利”“工作八小时”“实行劳动主义”等种种字句。先于上午十一时，在丰宁路西瓜园齐集。齐集后遂即出发，以军乐队为前导，浩浩荡荡依原定路径而行。除各劳动界外，并有化装人物及醒狮三头。技击团数队随行。所至之处，观者塞路，颇极一时之盛。是日由晨至午，天色

晴霁，阳光照耀。讵至午后二时，忽尔滂沱大雨，一般参加巡行者与参观巡游者，经此沛焉下雨，多遍体淋漓，如落汤之鸡。又理发印务等行工人，原订于劳动节日休息一天，惟是日行经各街道，见理发馆与印务馆仍多照常工作云。

是日为世界上工人战胜资本家的日子，故各国人士对于此日咸抱无限的感想，粤中近来工团渐次发达，遂亦于是日共同休息一天，大举巡行，以志纪念。计是日参加巡行人数约三千人，除各工团外，更有某学校等加入。□□中人分乘自动车散布传单，甚形踊跃，见者咸为感动。参议院议长林森氏，且亲自散布关于劳动的印刷品。晚上则有茶居工会等团体举行提灯巡游。可见劳动界之纪念日已印在吾人脑海中，不知一般向持压抑工人主义之资本家，亦有动乎中否耳。

（原载1922年5月1日长沙《大公报》）

三　工界传单概略

前日劳工会在第一师范开游艺大会后，即于下午集合工人学生数百，举行游街，并发出传单数万份。传单甚长，其大要于下：华实违约，工界不服，第一步抗议，华实不理；第二步发布传单主张公办，华实请总部拿办代表；第三步游街示威。华实不顾，遽尔开工。尤谓湖南无通晓机械人材，激起工界前往质问。彭祖植向森之受辱，系因其呼警实弹之所致，然尚为在场之人拥护，幸免于为肉泥。并谓当时渡河者有兵工厂黑铅炼厂造币厂光华电灯厂湖南电灯厂贫民工艺厂高工校工场甲工校工厂等处，人数达三千，纯系自治行动，无所谓代表。华实通电各省，谓湖南工界排外，尤非事实，具呈总部。谓向森命在垂危，亦绝无其事。不承认有代表，亦不承认有凶手云。

（原载1921年5月3日长沙《大公报》）

四　一封给铁路工人的信

京奉京汉京绥津浦沪宁各铁路工人均鉴：

列列〔位〕亲爱的伙伴们！我们十七个人素来是在铁路上赚饭吃的，和众兄弟们是一样的境遇，今天特为借着段君的乡亲出的一本小册子上，和诸位说几句最诚恳最亲热从心坎儿出来的话。

什么叫做铁路工人呢？只要是在铁路上机务处车务处干一份活的，无论是工匠、司机、小工、学徒、拿旗的，各色人等，都叫铁路工人。所以我们盼望还是在铁路上干有一份活的，都请细心瞧瞧我们的信，并请众位兄弟们仔细的想想，看我们说得在理不在理。

列列〔位〕知道我们自己的力量么？咱们闲谈的时候，总是说咱们不过是个小小的工人，有吗的力量呢？殊不知道这五条大铁路，都是咱们流了许多血汗一手一足的造成的。那些客车货车能够开着走，都要有咱们一天到晚的卖力气才行的。要是没有咱们造的这五条铁路，中国什么事情也办不了。

要是咱们不给开车，政府还能有钱办选举么？军阀还能打仗么？商家还能运货做买卖么？北方灾民全靠有咱们的火车天天开着走，才能有点粮食接济。客人能够往来南北，也都靠咱们。所以咱们替没良心的政府卖的力气替大家谋的幸福，比什么人干出来的都要大。这就是咱们的力量。

卖了这大的力气，替大家谋了这大的幸福，回头看看自己的地位是怎样呢？咳，说来真伤心！一天干到晚，起码干十个钟头，还有许多伙伴们，简直一天没有休息的时间。难道父母生下咱们来，就注定了要卖一世的死力气到老么？咱们的生活年年长高，赚的钱年年一样，因此有好些不够养家的，有的自己还要受饥受累的。还有许许多多的黑暗，叫工人们受苦的，说来也难尽，大家都明白，也不用我去细说了。咱们是生来就命苦的么？

朋友，不是，断乎不是生来就命苦，也不是应当受苦。咱们要是大伙能够齐心合力的想法子救自己，那命就不苦了。诸位，咱们也不要想局长处长会发善心，总长官僚们会记得咱们，会替咱们改良地位。他们心目中那里有咱们，那一个不把咱们当牛马看待。

诸位，也不要想那些得到咱们的好处的客人商人们会想到咱们的苦处，来帮助咱们。

诸位，也不要想去拍马屁，卖伙伴，丢人格，谋自己一个人的私利。咱们要改良地位，增高生活，也不做牛马，只有大伙救大伙的一个法子。

咱们大伙救大伙的法子，就是咱们要结合起来。凡是做工匠的司机的拿旗的，小工学徒等都一齐结合在一块儿，各站结合各站的团体，合拢各站的团体结合一路的团体；再合拢各路的团体，结合五路的团体；再结合其他铁路的团体，组织全国铁路工人的团体。咱们结合这些团体，互相帮助，谋改良地位，增加生活，换言之，就是要不做牛马要做人，多赚些工钱，少干些活，这就是咱们救大伙的办法。

诸位，结合团体是最好的办法，是唯一的办法，咱们努力干去，一定人人都可得到幸福。咱们同人中间有许多听说结合团体，就吓怕了。诸位，你如果打算永远做牛马，受洋人总管工头们的压迫，你就去吓怕罢。但是你还要准备你的子孙都做牛马奴隶呢！

你如果不愿意做牛马奴隶，就只有赶快起来组织团体。组织团体，是人人应享的权利，政府不能够干涉的。你看那些学生们，他们组织了这多的团体，难道咱们就不能组织团体么？诸位，民国元二年的中华工党，是一班政客想利用咱们工人的个二〔一个〕团体，那是咱们不赞成的。现在咱们自己组织团体是为自己谋幸福的。现在把咱们的应要求的几件事写在下面：

（一）要长工钱。咱们的工钱，还是十几年前定的，现在生活程度长高了一两倍，咱们的工钱也应当随着生活程度长。因此咱们的工钱至少要长一倍。

（二）减少工作时间。现在世界上各国的工人都是至多做八小时的工作，咱们也只能做八小时的工作。

（三）增加花红。咱们铁路上每年赚的不是很多的，现在每人至多得一个月的花红，咱们得要求每年两个月的花红。

（四）放假日不扣薪。有许多地方，放假日都扣薪。我们得要求以后放假日，都一律不扣薪。

（五）星期休息不扣薪。咱们得要求每星期日都得休息，每月要作满月发薪。

（六）卫生设备。各处的医院，都是有名无实的；机务处的同人，简直象住在黑暗的地狱里，所以同人每年病的死的，简直不知多少。因此咱们得要求种种卫生的设备。

（七）改良待遇。反〔凡〕洋人总管工头们不得随意污辱工人，要一律平等看待。

（八）各路平等。各路的待遇工人和为工人的设备，都一律平等。

以上不过是八条主要的要求，其余还有许多要改良的，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了。

诸位伙伴们，赶快醒过来！赶快联合起来，咱们同携着手向光明的道上走去罢。

津浦路机务处工匠段长寿等十七人谨启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原载1921年5月1日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散发的宣传品《工人的胜利》）

五　上海机器工人致天津机器工人一封信

天津同业的朋友们：

现在"劳动纪念日"快要到了，我们趁着和暖的春光，预备庆祝我们工人最有价值的"五一"纪念，不消说得无论甚么地方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不高兴欢乐的了。但我们在这预备庆祝的时候，不禁引起无限的感想，就是我们纪念这"五一"也不止一次了，然纪念自纪念，我们同业界却并没有受这纪念的多大影响。我们的痛苦，雇主的暴虐，仍是和从前一般。象这样的不长进，纪念的效用又在那里？所以我们为不辜负这个机会起见，将我们的部分的意见，写了出来，希望和大家交换，或者因此引起了各位的讨论，开我们同业联合的一个小小的纪念。

我们觉得我们同业界的生活大不满意了，雇主对于我们行为太难忍受了，（这些话，彼此同一情状也不必多说。）所以今日以后对于雇主，应积极图谋待遇的改善。我们这里的同人认为至少应提出几项起码的要求，运用最有效力的手段，非达到目的不止。今将他写在下面：

（一）工作时间的规定。劳动自然是我们人类的义务，但过度运〔劳〕动，却又变成奴隶的生活，减损了劳动的威严。现在"八时间制"在世界各地，要算很普遍通行的了，可是我们尚在过奴隶的非人的生活。每天的工作总在十数小时以上，白天不够还加上夜工，有些地方连星期日都没有停止工作，其余的例〔假〕更没有了。试想这等失去正常休息和睡眠，专供厂主人做牛马的工作，我们体上还熬得住么？难道世界各地的工人都不能忍受的，我们偏应该忍受么？所以我们此后也应当和世界各地工人一致主张严守"八时间制"，并且同时应取得星期日和其他例假的休息（休息不能扣除工价）。至于比较艰苦的工作，为预防工人生命危险起见，更须得有严格的限制，不能任他们随意践踏。

（二）工价适宜的规定。现在工银制度，我们自然不承认他是满意的，欧美各地的工人正在要求管理工厂呢！我们现在虽说不到管理工厂，难道日常的生活费都不应该得到么？你们试看现在的工作，整天的没有休歇，对于资本家要算很卖力了，可是享受他们的酬报又怎样？多的不到一元半块，少的仅仅得到十数个铜子，莫说教育娱乐种种精神的生活没有梦到，便是衣食、居住、交通等应有的享受，都是残缺不全。有的连做了几年的工，没有加过分文的工价；有的间或加了少许的工钱，但生活费的飞涨比所增加的工价还要快十倍百倍；有的投身工厂经过了很长的岁月，生男育女的耗费，重叠的堆压下来，闹得一家子挨饥受冻。朋友们，象这样的光景，往后的日子正长呵！这断然不是消极的忍受可以获救的。所以我们为着自己生存起见，无论何地的伙伴们，应该一致向厂主要求加工价，至少应照现在各地的生活费用，

加到两倍，才能维持我们工人实际的生活。

（三）设立各种辅助事业。时间和工价有了适宜的规定，仍不过解决生活上一部分。却是我们工人的境遇，比较的是很不幸的，并且容易招致危险。譬如我们的时间既大部分被资本家所占去，便丧失了读书求知识的机会，便不能有其他娱乐的享受，精神的生命，因此就颓废了。何况我们拿血肉的身躯，时与煤气机轮搏战，身体的危险（如疾病残废等）更是容易遇着的。所做的工作既都是部分的事，失业的事也非常可虑。象这类问题已经超出上面所说两项之外，我们也须得拿过去的事做鉴戒，谋将来保险的设备。据实的说起来，我们应该要求雇主设立学校和图书馆，给我们以读书求知识的机会；应设娱乐机关调剂我们枯涩的生活；应该注重工人卫生，设立专司，应该设立工人医院；应该为工业的朋友谋救济的方法；对于不幸的工人（如残废疾病死亡衰老等）应该有相当的救助和抚恤。要知道我们因献身工厂才发生这类不幸的事，预防和拯救，自然也是工厂主不可逃避的责任，无论如何，不可放过。

上面简单的所举出三项，就理论上说似乎有些不彻底，但我相信，能先做到这一层，将来进一步的办法，自然也容易着手了。

并且就现在的同业界情形观察，怕连这几个小小提案，也不是即刻可以办妥。这些理由虽然很多，但就我们工人方面说可总括一句，就是现在还没有好的组织和联络，所以临了我们还须得申述对于组织和联络的意见。

现在上海广州等处都组织了机器工会，而且组织得很好。但是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商埠，还没有组织这种团体。各位朋友们这种组织的重要谁不知道！只因着手进行，总不免有些阻挡：或被工厂主嫉妒所压服了；或被不好的伙伴从中破坏了；甚至于又有被一些不相干的外人所利用，弄到后来，不徒没有效果，反使大家灰心；（如从前各地的工党）但组织的事务，终于不能进行。但是这些已往的事情，现在看来，却都是我们今后进行的好教训，不独不要灰心，还应该加倍努力的去干。我们今后的组织正好将以前的毛病一概去掉。选择纯粹的分子从新组织起来，本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去和工厂主的威迫利诱抵抗，至于不相干的怀有野心的人绝对不和他发生关系，那么内部的组织才能稳固。内部的组织就绪了，我们便当与各地工人联络。组织愈扩大愈精密，劳力自然愈雄厚。假若我们同业界各地都联合起来了，那便可以掌握全国机器工厂的霸权，那时候还有什么办不了的事呢？

朋友们！我们重要的意思都说完了。这通是我们切身紧要的问题，极小限度内的问题，在明年今日以前，我们总得将他圆满解决才好。

朋友们，自从"五一"节降生，年代也不少了。悠悠的岁月，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回想今日以前，已往的伙伴们，唤起几多有价值的运动，经历几多艰难苦楚，牺牲几多精神和物质，为我们留下这般伟大的纪念！我们若稍存重视这个纪念的意思，应该为他添加一点事业，创造一点新的纪念！

朋友们！欧美各地的伙伴们，现在都已猛烈地向前运动去了，现在是劳动者统治世界的时候！我们赶快联合起来罢！

上海机器工人启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原载1921年5月1日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散发的宣传品《工人的胜利》）

中国劳动界消息

K 生

广东筹办总工会

广东工界，已经组织工会的已有十几个团体；工人势力也日日膨涨。不过没有总汇机关，总觉得散漫。所以他们现在极力想筹办一个总工会。他们的办法是是：合旧工行和工团联同组织的；由发起人分投向各行工人接洽。首先加入筹备者有机器，印务，理发，籐器各工会……和花梨，玉石，机房，建筑，科木，搭棚、织布，毛巾，染布，绢遮，雨遮，生铁，铜器，刺绣，牙刷，云母壳，自由车各工行。

唐山洋灰公司罢工潮

唐山洋灰公司厂外凿石灰石的杂工，向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工钱只一角八分一天，至多的也不过三角二分。现在因为生计的缘故，忍无可忍；就猛然发动，突于三月十七日早晨聚集了七百人冲人洋灰新厂，招呼厂内工人一体罢工，把所有的炉火都灭了。并去招总理李希明说话，李出来时，就有几个人想袭击他，但为警察所阻止，并没有伤。当时旁边驻扎直军连长，也因人多恐生事端，不敢十分阻止，只好劝散了大众。工人也就在小山附近，开了一个露天大会。要求加薪。李总理吃了这一大吓，就打电周学熙请示办法，周允加薪。但公司职员开会会议：说是一开端，将来更要逐步进步了。结果就暂时劝导工人开工。再行商议加薪办法。工人方面也以事起仓卒，没有十分预备，即于第二天上工。惟声言如四月一日前加薪无办法，即行第二次罢工，一面已作种种第二次罢工的预备。但到今没有听见他们第二次的罢工，大概公司方面已允如所请了。

日本纱厂女工罢工风潮

上海杨树浦日商第二纱厂粗纱间女工头因挈领厂外人入内闲游，被该厂巡丁拦阻，互相口角。后来女工头纠合女工多人，把巡丁围殴一场，粗纱间女工一律罢工。致细纱间摇纱间男女各工，都不能接工。工厂方面损失颇大。但不几天就调和，仍进厂上工如故。

广东农人的新组织

广东东海十六沙农人发起联沙自卫，已具呈省长立案。现在又公举代表续呈省长，大意说：春耕在即，各沙民生命财产均陷于危险地位，特拟组织劳农互助团。现在把他们的章程节录于下：（一）本团注重劳农事业之发展，不借军阀势力，实行联沙互助，以期适合社会之趋势。（二)本团不设团长，由各沙民选举干事十六人分为四区，每区设干事四人。(三)每区募集沙民二百五十人，成一分团，聘请教练一员，教授兵式操法。一年毕业后，仍回各沙充当劳农职务。递年募集沙民亦如之。(四)本团自行购备全副武装一千副，分发各分团自卫。（五）各分团均设一教练所，所有各干事及教练员均常川驻所。并附设劳农学校及阅书报室。另聘请演说员多人，派往各沙演说劳农主义，以促各沙民一致觉悟。（六）各分团雇用调查二人，教员二人，书记收支各一人，庶务若干人，由干事酌量任用。（七）本团经费由各沙担任自筹，除遵缴财政厅稽征费外，其余沙捐及捕费，均请省长特准豁免。并要求省长将驻

扎各沙内之军队，一律撤往别处。所有本团经费，只由各沙民分任供给，不向业主征收。（八）本团章程，只施行于东海十六沙内，专重劳农人格及地位。务求通力合作，养成人人有自治能力，咸晓然于劳农事业之进行。

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底胜利

上海法界电车公司查票司机等工人，因要求增加工钱，改良待遇，于三月三日全体罢工。坚持了四天，到底得着圆满的结果。现在把他们底经过情形，分日记出：

第一天　他们去年曾经向他们底大班提出要求增加工钱，大班也应许他们一部分。今年大班回国，（法国）来了一位代理大班，并未实行加薪。于是他们集议，再提出条件，向公司要求，如不满意，决定直接行动。大班谓不应罢工要挟，决不肯即时照准。不得已于三日清晨通告公司，限令半小时内解决加资或停车之问题。公司方面还以为他们没有十分预备，不致居然即时罢工，仍不允所请。所以从清晨八时起一律停止职务，电车均未开驶。租界内亦顿形冷淡矣。

第二天　公司对于罢工，已有很坚决的表示，有限罢工人员，于三日内恢复原状。否则自有最后办法。所谓最后办法，未知是否一律取消罢工人员底职务。不料罢工人员立志非常坚决，不达目的决不上工。而且态度仍很闲静，秩序仍是很严肃。但公司损失已经不小。人民大感不便，莫不希望早日解决。

第三天　公司方面见罢工者如此坚决，实出意料之外。始令派代表接洽，谓已电巴黎总公司，不日当可答复，请先上工，以利交通。罢工者不允。非有圆满解决，决不恢复元状。

第四天　直至下午四时，公司方面遂完全应工人底要求，总算解决。工人即得圆满解决，就一律上班行使职务，照常开始通行，他们所要求和得到的结果是：工钱依照办事情形，加给一成至二成；各人所穿之制服等费免扣；每月办事二十五天者作二十七天算，二十七天者作月算；疾病时给予半资，因公受伤时给予全资。

开平煤矿二次罢工记

马家沟者，在唐山之东北；由唐山乘火车西行约需一点半钟。所谓开平煤矿，即指此马家沟矿局而言。每年出煤之多，获利之厚，为唐山总矿局所属各矿区之冠。去年开滦煤矿同盟总罢工时，该区尤为首先发难之地。然去年罢工的结果，所得不偿所失。关于工人工资的规定，矿局只准增加十八分之一；而此十八分之一又要存在矿局里面当作养老金之用；所以工人非到五十岁的年纪不能领出。矿局办事人员，如此愚弄工人；则今兹之罢工，实是当然之结果，毫无足怪。惟消息传来，矿局态度强硬；以对土匪的法子对待矿夫。现在把大略披露于下：

（一）罢工前的状况　矿夫每日所得的工钱，至多不过三十枚，少的只有十枚十五枚，实在不能维持生计。所以想乘机而欲罢工，已非一日。月拿几百元的矿师，对工人的惨状毫不怜惜；今复变本加厉，要想吃工人底肉。把旧例所归定的工人每月所应得的灯油费和黑白二行红赏尽行取消。于是工人含冤入骨，困苦之状，更加上几倍，不从速设法，恐真要饿死了。

（二）罢工的导火线　该局监督李某，对矿务智识经验都很好，与局中办事人员都很和穆，待遇工人也最讲道德；因此遂招该局矿师之忌；近来矿师仇视日深，李某引咎自行告退。全局工人矿夫闻之，莫不痛惜。因为监督与工人的关系很密切。若把好的换下去，另请

一位无人心的来了，则工人必愈受痛苦。因此为自己生命自卫起见，霹雳一声，遂举行全体大罢工。

（三）工人的要求条件　该局最高的实权，系操在唐山总工程师之手。他们遂举代表亲来唐山要求，主要的条件，约分四端：（一）增加五倍工人原有的工资，以维工人生活。（二）不得更换李某。（三）改良工人的待遇（A）分红利（B）灯油费及柴火费（C）卫生设备，澡堂休息室等。（四）惩戒矿师黄某。工人声言：如以上四个要求不能达到，情愿饿死在矿局里面。

（四）矿局的残暴专横　唐山总工程师，听了马家沟矿师一面的话，以为李某是罢工运动的首领，对于工人要求，毫不理会。反以金钱来压迫，申言不管你们死活，我矿局总不会因此就关门。唐山方面工人本来就想起来响应；后来因为稳健派的阻止。以为马家沟的要求如成功，则唐山方面当然可照例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如不成功再另行设法。

上海丝线工人罢工之所得

上海南北两市丝线业工人，共有三百多。向例做成丝线一两，工资钱四分。近因生活程度日高，邀同各工人，议决要求作主每两增加工资二分。作主不允，遂一律罢工。后经双方和解，每两增加工资一分五厘。

（《共产党》第4号，1921年5月7日出版）

上海英美烟公司工人罢工记

上海浦东陆家嘴英美烟公司老厂三层楼上的机车间工人，因为受不过洋监工的虐待，群起要求撤换洋监工，大班不允，遂引起了这次翻天掀地的数千人半月余的大罢工。现在我把他们罢工的经过写出来。

七月二十号老厂机车间工人百余同盟罢工后，次日就派出代表数人往新厂机车间求援。新厂机车间以为义不容辞，并且也曾感受同一的痛苦，就于二十二日和老厂机车间表同情，取一致行动，全体二百余工人也同盟罢工起来。厂主方面大显其威，将老厂代表张涛一名带往警署监押。两厂工人大愤，越发固结团体，全体共计约八九千人，都表示同情，相约加入同盟；又由两厂共举出代表十余人，组织代表会议，办理一切。议定开全体大会，共商对付。代表等在未开大会前，遂预备罢工宣言并传单数种，以便鼓吹反抗运动。至二十七号早七时，在吴家厅开两厂工人全体会，到会者途为之塞。会场中将宣言一致通过，并发布传单，议决不达目的不止。又发出宣言书说明罢工的原因，并要求八条件；（一）现在普遍的增加工资，（二）以后仍旧要按期加薪，（三）撤换虐待工人的监工，（四）罢工期内的工资无论如何要照发，（五）以后不准虐待工人，（六）星期六半天工及星期日的工钱无论如何要照发，（七）凡年节假期的日期也要照平日一样发工钱，（八）无论如何，不准开除工人的代表。

但是厂主威风太大，不肯允许工人的要求，工人的团体也坚固，不肯屈服，双方相持至十日之久。八月一号，工人开一全体大会。厂主命一买办到会和解，众不听，要依照宣言上的要求奋斗到底。决议致函总经理，要求其承认条件；又致函警察署，劝其勿加干涉。于是工厂主方面的威吓利诱的手段也不中用了。

五号早六时两厂全体工人，举行游街大会，各执三角旗帜，上书“工人自决”“还我血汗”“增加工资”“减少时间”等字样。全队绵延约三四里，每队后皆有大旗一面，上书“英美烟厂全体工人示威运动”“劳工神圣”，“谁敢侮辱”“增加工资”，“减少时间”等。齐投警厅，由代表等呈递呈禀要求维持生计，并要求将被拘工人汪有才开释，以安人心。徐厅长立派科员出外，向众开导，立将汪有才减轻一日拘役，劝令速散。工人等始各应允，仍列回队浦东，复在吴家厅开大会，决定最后办法。（一）俟汪有才出狱，再向厂家议上工的条件，如有违者，即以严厉手段对付；（二）在罢工期内，如有同人中火食费无着，同人当互相帮助；（三）与厂主议上工的先决条件；（甲）罢汪买办；（乙）逐工头王凤山；（丙）不得纵警察伤害工人；如以上三条不决定，决不与厂主接待云。

次又通电各报馆各工会各团体，陈述英美烟公司尅减工资，殴辱工人，种种苛虐情形，请求主持公论。厂主见此情形，大起恐慌，大班毛利斯急派代表朱桂生往工人代表团请派出总代表数人，与大班开正式谈判，以谋早日解决。七号上午十时工人代表派出总代表四人，毛氏大班预备汽车一辆，到新关迎接工人代表。该代表刘奉臣等四人遂乘汽车至毛氏家，双方对

坐谈判；毛氏称对于所提八条件除第一条外都可赞成。代表未允。

八号早七时，全体两厂工人在吴家厅开大会。首由代表许某报告七号接洽经过，对于第一第二条，稍为让步。是日晚已有结束趋势，当时大班毛利斯商量，请其在条件上签字，并交出二千元，大班意见，允许发给一千八百元，惟此款必得大家上工后始能照发，至于签字一层则委朱某为其代表签字。九号晨朱君即将上晚和大班接洽结果，向众代表报告。大家以为照此情形不如承认为妙。至十号早七时，两厂全体工人又在吴家厅开大会，首由代表报告由大班毛利斯代表朱君签字之八条改正条件。（一）罢工期内赔偿损失一千八百元正；（二）现在各间普遍的增加工资每人至少五分；（三）工人罢工代表不得开除；（四）撤换洋监工及汪微舟；（五）星期照发全天工资；（六）每年照例加薪二次每人每次至少五分；（七）以后不准虐待工人；（八）以上各条由大班代表签字履行以昭信守。当时又决定本日下午，放炮庆祝，全体一律上工。其交款手续，则先由朱君给一凭条与工人代表，约定星期日由双方代表同往大班毛利斯处领取。更定于下星期一开大会，讨论重新组织工会问题云。

此次罢工相持有二十多天，该厂所受损失已有百余万；而工人方面办事之精神毅力果能达到此种较素来略满意的结果，真是向来罢工所无的呀！愿该厂劳动界同胞，尚要努力勿懈才好。

（《共产党》第6号，1921年7月7日出版）

广东土木建筑工人大罢工始末

广东土木建筑工人，约有二万五千余人之多，原有组织，分为五市十堂，团结力最称巩固。近年来广州市开辟马路，建筑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包工的东家行，都得了很大的利益。但是这些东家行，对待工人却任意尅扣，掠夺横暴，比别种行业更为利害。工人们整日劳苦工作，还不能养家活口，这是何等的不平呢。不单如此，东家行又怕那些工人们团结力巩固，是他们将来的劲敌，想出了一个破坏工人团体的法子来，就在四月间纠集私人倡办建筑总商行，冒充工人，呈请官厅立案。于是工人方面为维持生活起见，也起来一致要求东家行增加工资。八月十二号工人数千，在土木建筑工会开会，议决致书东主，要求增加工银两毫，举出周国华何逸云为正副主任，并办事员数十人，向东家行交涉无效，遂于十六日早罢工，又举行游街大会，行示威运动。其进行办法，最有条理，先联合五市十堂组织一西友团，专任办理事务，组织颇称完密。又因罢工期中，以维持日食为最要，各堂特早的筹备罢工基金，又籍各界有志者捐助，实储足三月之粮，仍恐届时未能解决，一百又组织土木建筑合作社，由工人自己营业，脱离资本家的支配。罢工之后，罢工团因为和某东家行冲突，公安局袒护资本家，将工人捕去八人，工人大愤，聚众数千，坐卧于警务处两日，要求释放。公安局无法，就把那一个工人送了出来，这也算是工人方面的小胜利了。近日各东家行因为罢工期内停了业，所受的损失太大，势不得不承认工人方面的要求。二十六日由古厅长出来调停，召集东家行和西支团代表在省公署会议，双方代表各十余人。古厅长提议要求东家行承认西友团所要求之第一条，东家代表起先不肯应承，后经古厅长劝说才俯首允从。其余条件均照旧章办理，西友团亦无异言，于是十余日之大罢工，遂完全解决。最后胜利，仍归工人得到，这都是广州土木工人有阶级觉悟而团结巩固的效果，还望他们努力向前谋根本解决才好。

（《共产党》第6号，1921年7月7日出版）

长辛店工会成立

长辛店的工人，自“五四”以来，就有点觉悟了。对于公共的事，很是留心的。今年一月间，他们办了一个劳动补习学校，除招收学生外，还预备好几种报纸杂志，给同人阅看，并且常常请人讲演吸收新思想，所以工人求智识的机会越多，各人的脑袋，也比前清楚。开会的方法，结团体的能力也渐渐地的训练好了。

五月间他们又组成了一个工会，办理很有条会。工会的组织，取代议制，由厂里每科选出来的代表，组织一个代表会，代表会推出正副两个主任。工会所有进行的事务，都由这个代表会议决，再由代表会举出几个干事，去执行议决的事项。代表会定每两个星期开一次常会，有问题就讨论问题，没有问题就自由谈话。

该工会现在办了一个工人周刊，已出六期，办得很有精神。他们的努力，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共产党》第6号，1921年7月7日出版）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

李 大 钊

人类之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和文化有相互的影响。文化高的民族，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固然也高；亦憔社会观念和组织能力既高，而文化始有进步。原始社会如猎群，战团，其组织之简单，较诸今日社会乃不可以道里计。然证诸十九世纪以来，政党之发达，则人类组织能力之进步，又极可惊。英、美政治纯受政党支配，其政党都有极繁复之机关，极妙之组织。所以势力雄厚，直与政府并驾，甚或称为第二政府。至于欧、美社会方面，只要有两人以上的公〔共〕同行动，就成一个团体的组织，打猎钓鱼，旅行，音乐，茶话，都称为一个Party。他们团体生活之习惯，几若出自天性，由小扩大，所以议会，政党，亦都行之若素。如儿童，妇女，慈善，教育，科学种种结社，非常的多，并且也有切实的计划，伟大的成绩，所以社会事业才能这样发达。

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试看各国罢工风潮，及群众运动之壮烈，不难想见。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

中国人虽然也是社会动物，但几千年专制之压迫，思想之束缚，和消极的，懒惰的，厌世的学说之浸染，闹得死气沉沉，组织的能力都退化了。然而中国腐败到这个样子，又不能不急求改革。改革的事业，亦断非一手一足之力。自然还要靠着民众的势力，那么没有团体的训练，民众势力又从那里表现呢？所以我们因渴想社会之改革，就恨中国人的组织能力太低，但是这也无怪。因为团体的训练和民众的运动愈发达，团体的训练才愈高明。换言之，没有经过民众运动的人民，团体的训练是不会发达的；毫无团体训练的人民，也不能产生有力的民众运动，可见这两件事是相待为用，相随俱进的。所以我们现在要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动民众的运动，中国社会改革，才会有点希望。

中国自满清道咸海禁大开之日，就有受些欧化洗礼的两个大党产生，一是同盟会，一是强学会。强学会的成绩是戊戌变法。同盟会的功业，是辛亥革命。他们都自有他们的价值。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

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

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团体发生俨然革新运动中之惟一团体。其实学生虽有几许热心侠气，究竟还是团体的训练不大充足，其中缺憾甚多。到了现在又有“强弩之末”的样子，令人正自伤心无极。（闻最近北京学生会选举职员投票两次都未产出，照投票这样散乱看来恐怕就是团体训练薄弱之一证）

最近也产生了几个小团体，只是章程定妥之后，就算完事。其中亦是学生居多。有人称

呼"章程运动"，其言虽谑，亦自有理，尤足令人丧气。

闻特来中国讲学的某大学者，尝于私下对三两学生说："中国这样政府，设有革命党千人，便有站不住了。"然而我们竟没有那样的人，竟没有那样的团体，说到这里我们只有惭愧。

我们的社会腐败到这个样子，终天口说改革，实际上的改革，半点没有。这总因为我们团体的训练不充足，不能表现民众的势力，而从事革新的运动。

然而没有团体，也没有地方可以得到团体的训练。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Communism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

各国的C派朋友，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C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

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原载《曙光》第2卷第2期，署名：S.C，1921年出版①）

① 根据本期文章推断，这一期大概是一九二一年一月出版。李大钊这篇文章可能是一九二〇年写的。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一九二一年）

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的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由于时局本身的变化，我们的整个活动遇到了不少困难，所以，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不能向你们谈更多的经验。可是我们殷切地希望这次代表大会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经验，并对我们今后的整个活动作出原则指示。

在报告之前，我①尽量简略地向你们叙述一下北京社会生活的情况。

一、大家知道，北京是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近五百年来，又是中国的首都。在清朝时，有许多满族人居住在那里，他们利用与帝王的关系，继续保持着杂乱无章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有将近二十万这样的居民，由于他们的忠顺，仍然不从事任何固定的职业。除了这些懒汉以外，还可再加上高级和低级的文武官员，以及簇拥在他们周围的各种寄生虫。此外，还有他们的家属。最后，还有约三万个干着各种可疑职业的人物。北京的人口不过九十三万，可以大胆地说，有一半以上是游手好闲的人。的确可以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

正如我们所说的，北京是公认的政治中心。因此，似乎这地方的居民应该关心一切政治问题。可是，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当中国存在着君主政体时，人们把政治看作是帝王个人的事情，革命以后，则把政治看作是军人个人的事情，即高级军官和普通军官个人的事情，看作是那些在争夺各种特权的斗争中追求个人目的的各种政客的事情。因此，政治问题仍然不被重视。

怎样解释北京的居民抱有这种消极态度呢？首先，北京人牢牢地记住了古老的哲学家们的说法，他们说："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这种天命的思想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脑海里。第二，几千年来，他们处于暴政压制之下，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坎上。第三，最后，工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工人中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他们没有集体生活习惯，浸透了保守的传统精神，在茶馆或是饭馆里，常常碰到"莫谈国事"的告示。这种关于国家政治问题的一切谈论都加以禁止的作法，好象是对下层阶级设置的社会监督。

在"文学"革命后（推行白话文等等），知识分子开始第一次感到需要新的理想、愿望和志向。与此同时，在瓜分战利品的会议上，中日之间因山东问题发生了冲突，这就引起了前所未闻的强大的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五四运动。这时，学生已作了很大努力，想唤起群众对政治事件的兴趣。可是，这种努力一直没有效果。没有群众的支持，学生运动逐渐削弱。从这个例子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知识分子阶层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没有在无产阶级中扎下根来。

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可以大体上分为三派：１．民主主义运动；２．基尔特社会主义；

① 据考订，这是张国焘的自称。

3．无政府主义运动。民主主义运动的拥护者没有任何固定的组织。而基尔特分子只有少数拥护者，因而，影响也小。为了宣传他们的混乱不堪的思想，他们随便地利用已出版的报纸和其他定期刊物，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也与这帮家伙相差无几。拿起任何一张、即使是军阀们出版的报纸，都可以找到通篇是各种混乱思想和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学说的大杂烩的文章。自然，这种运动所使用的手段是不会达到目的的。至于说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大概已意识到他们向群众发出呼吁是怎样重要，但是他们除了散发他们的小册子和坐牢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例如，在去年五四运动时，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已集合了三十人，可他们也没能在工人中亲自发起组织游行示威，只限于印刷一些周报，可是又不能象样地组织散发，因此，散发得很不均匀。

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一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本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无产阶级则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

同志们，综上所述，我们面临着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并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样打消他们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最后，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总的说来，军阀和官僚的政权很不稳定；他们的眼界局限于纯粹自私的目的；他们没有任何固定的政治路线。只要无产阶级努力，这种政权就很容易被推翻。

二、北京的经济状况很简单。北京是政治中心，而不是工业或商业城市。因此，实际上只有百万富翁才在银行里有存款，而企业家一般地说很少，大商业家也不多。某些比较大的工厂和企业，如编辑部、出版社、地方的财政部、精密仪器厂、度量衡厂，还有铁路，所有这些都是政府的机关。因此，这里的厂主和雇主就是政府本身，为了加强上述企业和机关职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使他们不停歇地工作，政府向他们说，“为了国家富强，应当这样做”。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工作很困难，无论如何要比同资本家厂主打交道困难得多。同志们，请你们注意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工人中有许多人力车夫，计有五万到六万人。他们虽没有给资本家做工，可是他们来自下层，就其工作来说，又与广大居民阶层有接触，必须寻求向他们积极进行宣传工作的实际措施。

三、骑在别人头上是北京常见的事。外国人侮辱中国人，军官粗暴地对待老百姓，乘客用鞭子或手杖催赶人力车夫，以及其他等等暴行。我看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一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应当抓住时机，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

政府官吏、军人、官僚和警察等，他们在压迫平民百姓方面争相竞赛：“重要人物”的汽车压死行人，他们可以随意控制交通，他们在社会上布满警察，任意镇压平民。某位“重要人物”一出门，摆在首位的就是维护其尊严。所有这些事例表明，有多少向群众宣传的好时机啊！

现在，再回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过去的活动和纲领上来，我们应该看到，在去年十月产生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

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才使他们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我们人手还很少，因此，不能立即提出广泛的战斗任务。我们必须集中全付精力宣传和组织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

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

北京的工业还不发达，没有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大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把工作转到铁路员工方面来。可是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加强与他们的内部联系。为此，我们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两千名铁路工人。这所学校离北京不远，有三位教员——社会主义者在那里教课。

这所学校看来是我们接近工人的一个途径，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鼓舞他们的重要建议，结果，我们看到提出各种阶级要求，象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要求成立工会等思想，在工人中间已不断增长起来。后来，他们成立了拥有三百四十至三百五十人的铁路工人工会。

同志们，不应当限于只是组织工会，工会组织以后，首先应当引导它与企业主交锋。只有这时，工人才会对自己的工会感兴趣，才相信工会的力量。工人群众没有知识，不认识字，十人当中只有一人能看报，因此，印刷宣传工作自然做得很差。可见，我们必须与这些困难做斗争，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克服。

总之，我们在最初一个短时期内所取得的经验是：第一步，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最后，第四，我们必须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

自然，开办劳动学校时，我们不能幻想马上提高工人的一般知识水平，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力差、经费少，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建立学校，力求达到的不过是上述的两个目的。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教育工人，并使其习惯于亲自从工人当中选出有觉悟而又积极的工人来管理学校和工会的事情。学生会议能够给你们提供许多合适的宣传机会，而特别重要的是培植召开公开群众大会的习惯，而这种大会最能使到会者养成共同利益感和严守纪律。

我们教工人什么呢？我们经常不断地向他们说，他们受资本家厂主掠夺，不得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们介绍外国工人运动史。我们不断地向他们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时常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日常生活中和工厂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起初，他们觉得有些为难，但后来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了优秀的鼓动员。可是，找到导师即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的任务，是很困难的。

我认为，没有必要开办各种行业的工人学校。起初，只在那些既没有工人组织又没有工人领袖的地方，才需要建立这样的学校。经验表明，我们不能建立一般的工人学校，应当只开办专门学校，如纺织工人学校和铁路工人学校等等。这种学校是建立产业工会所必需的准备阶段。

在京汉铁路工会方面，我们努力工作，为的是使这些工人同我们建立密切的联系。同时，还特别注意各地所发生的罢工事件。一听说那个地区的采煤工人和其他工人举行罢工，我和罗同志就立即乘火车奔赴那里，想给罢工者以帮助，可是他们不但不相信能够从外人那

里得到援助，反而怀疑我们是奸细，害怕我们。因此，我们的尝试没有成功。

我们为工人阶级出版的宣传刊物，大部分篇幅不多。我们经常鼓励工人自己写简讯，并全部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或一般的报刊上。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工人周刊》，但出到第六期以后，政府禁止出版。在这个禁令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我们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工人的胜利》和《五一节》，这些出版物散发得相当广泛。可是，我们的主要宣传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上，这些要求现时已成为最有效的战斗口号。

我想举个例子来证实工人组织公开示威游行的重要性。正象我已向你们说过的，我们在长辛店播下了宣传工作的最初种子，去年五月一日，那里举行了示威游行。应该称赞同志们举行的这次示威游行，这一天召开了有千百个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工人亲自在会上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说，会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可是仍有一些工人没有来得及发言。群众大会以后，开始游行，由一千五百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高举写有重要标语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口号沿街行进。这个事件过后，不到一个星期，工厂车间里发生了数十起使管理人员感到极大不安的小型活动。同志们，请注意，我们不得不同还是没有纪律的工人一起活动，而帮助他们的最好的方法，据我看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和游行。我们要坚决采取一切能够加速这一运动的措施。

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

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印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译文尚未印出。我们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曙光》杂志虽有我们的一个同志负责出版，但不纯粹是我们的刊物，而是一个混合性的刊物。我们刊登了一些翻译的和创作的文章，当罗素教授在上海作讲学，并进行有利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宣传时，我们组织了公开辩论，作为其论敌发表了意见。我们不得不时常公开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党人进行争论，但很少参加文字论战，大部分争论是公开辩论或私人谈话。

最近几年，公开的普通教育学校在北京显著地增加了。首先，他们教育学生要有爱国主义精神，可是我们也在尽力促使这些学校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并且在这方面获得了部分成绩。

我的报告完了，可是还有几句话要说一说。现时，我们虽然把精力都用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工作上，但同时还应当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作。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的社会，一系列令人难以容忍的社会的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均取决于我们在高举红旗的斗争中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不轻。

（译自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

（选自《"一大"前后》〔三〕）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

（一九二一年）

一、去年

去年，这里没有任何组织，也不可能找到能在广州做组织工作的人。当我们回到广州的时候，创办了《社会主义者》日报，但不能说《社会主义者》就是某种组织，它是一个宣传机构。当时广州是在广西人的管辖下，他们残暴地镇压各种运动，而这时我们又有财政上的困难，因此，没有任何进展。

去年年底，B和别斯林（Песлин）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对组织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界》①周刊上发表了文章。黄凌霜同志把他们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诺尔（Минор）和别斯林同志是共产主义者。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和我②拒绝加入这个小组。他们出版的报纸叫《劳动界》③，印数为三千份。这时，广州产生了两个工人组织：一个是机械工人俱乐部，另一个是宽山④（Кваншан）工人俱乐部，宽山是离广州有五十哩的一个不大的小地方。这两个组织各有四十至五十人。因为我们不是该党党员，不能提出关于该党的详细报告。

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别斯林在内。

最遗憾的是我们非常需要钱。《劳动界》⑤已停刊，两个工人工会也得停办。因为：第一，经费困难；第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工会里已广泛地传开。

二、现状

现时，我们的宣传机关报是《社会主义者》日报，该报每月需要七百元，很难维持下去。此外，我们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计有八十余人，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法律系的学生，百分之二十是高等、中等院校的学生，其余的人是各种政治小组和编辑小组的成员。这些小组里没有工人，因为我们很难与他们建立联系。而与士兵群众建立联系，就更加困难。为了维

---

①③ 应为《劳动者》。——编者

② 根据考订，“我”是陈公博的自称。——编者

④ 可能是佛山。——编者

⑤ 应为《劳动者》。——编者

持《共产党月刊》和负担工人夜校的费用，我们每月从党员收入中抽出百分之十。

在上海（Шанхай）①，我们成立了机械工人学校，由于该校七个校务委员的帮助，我们宣传了我们的原则，并希望增加学校数量。此外，我们成立了由宣传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宣传员养成所，并委派我为该所所长。这个养成所是广东省进行社会教育的主要机构，很多教员都是我们的好同志。我们希望养成所附设工人夜校和工人组织工作学校。但是这个养成所的存在取决于政治关系，我们只能暂时利用这种关系。

三、今后的意见

1．吸收新党员

广州的党员人数不多，这就使得我们要更多地注意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工作开始时，我们不愿意轻率地吸收新党员。广州的情况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暂且不谈工人和士兵群众，可以说，大学生们是同情神秘的无政府主义的，或是受国民党所操纵。因为有这些困难，我们要特别坚定。将来，我们打算从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中、从机械工人学校和宣传员养成所中，吸收新党员。其他人也愿意加入我们党，那是计划之外的事情，现在还谈不上。

2．成立工会

这个问题更是困难，因为去年一年之中，工会已增加到一百多个，但是这些工会都受了无政府主义的熏染，或者为国民党所操纵。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用不着多谈，因为他们在广州一共才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三个人很快就要去法国；还应指出，一般来说，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任何组织。我们与国民党人的斗争困难得多。因为工人与国民党人的联系已有很长的历史，早在十年以前，他们就设法向工人和士兵群众传播他们的思想和影响，而在去年又鼓动工人罢工，援助陈将军。这个党的许多党员都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设有宣传部，专门做联络工人的工作，特别是联络五金工人和机械工人的工作。

我们组织工人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机械工人工会和铁路工人俱乐部。现在，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组织教师工会。

我们在表面上虽然与国民党人有联系，但仍在设法单独组织工会。现时，我们与某些工会，如理发工人这一类的工会有联系；我们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以便在机械工人工会中产生影响，看来我们的尝试是会成功的。

3．成立工人学校

①工会学校

成立这类学校的计划是：要求一切工会各派两名代表，每周到学校来二、三次。学校教授的课程有：工会组织法、工人运动史和欧美工人运动的现状，等等。我们认为，经过二、三个月以后，这个学校定会取得很大的成绩，许多工会对我们的工作会感到满意。

②工人夜校

现时，只有一个学校由我们的同志直接领导，虽然很多学校是由一些与我们有联系的工人自己筹办的，但是学校的工作并不十分顺利。机械工人工会在广州的影响最大。该工会里有许多拥护我们的人。这个学校取得明显成果后，我们再着手其他学校的工作。

---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广州之误。——编者

4．对农民的宣传工作

马克思主义小组组员褚诺晨[①]同志，为了实现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创办了《新农村》，我们千方百计地帮助它，使其产生巨大的影响，并扩大宣传。

5．与士兵的联系

我们特意把这一段放在最后，因为广州没有真正的士兵。军队的士兵，不是坏蛋就是土匪。他们是危险的，对他们要特别谨慎。许多军官在我们当中受到尊敬，不久，我们要把他们吸收到我们这边来。

（译自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

（选自《"一大"前后》〔三〕）

① 原文为Цу-НО-ЦЕН。——译者

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叔衡同志：

廿六日的信，今日午后接到一张欠资的通知后，才往邮局去取来，照你所约“五日”之期已赶不及了，幸而有张同志之便，免得又经邮局周转，耽阁时日，不过关于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我已记不甚清，只尽可能的写出来，供你们的参考。

1．大会在1921年7月（？）在上海开会。

2．参加会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后成为反对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二李早经开除出党>），广州代表（陈公博<早经开除>、包惠僧<1927脱党>），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泽东），湖北代表（陈潭秋、董必武），山东代表（姓名忘记了），留日代表（周佛海<早经开除>），此外有两个国际代表，其一是马林（荷兰人，听说也是反对派一分子），另一个人的姓名忘记了。

3．议事日程中有职工运动，对别党的关系和在政府作事务官等问题，都有争论。职工运动有的主张职业组合，有的主张产业组合。决议是产业组合（谁是怎样的主张记不清楚）。对别党的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必须与其他政党脱离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非得到党的许可不得兼充其他政党的党员。决议是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关于在政府作事务官的问题，有人主张绝对不允许，有的主张得党部允可，才可作事务官。决议是绝对不允许。后面两个问题大约是上海方面的代表和决议案的精神不甚一致。

4．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应为南湖——编者注）船上，将会开完。

5．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

以上是我所能记着的，国焘同志还能记得许多，请问问他，当更知道详细点。此致革命的敬礼

弟 必 武

12.31.

* 据资料保存单位初步考证，此信写于一九二九年。

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Ю·Д·斯穆尔基斯的信件（节录）*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您大概已经知道，从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议的十二名参加者代表了总共五十个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人。

……我所以谈到这点，仅仅是因为代表大会的工作正与我代表赤色职工国际所做的工作有关。我们通过代表大会来使全中国的职工运动最终建立起统一的（中央）组织。①

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在结束时选出了由四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委员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②的总部主任③就是其中之一。

---

* 按照国际工会联合会（从一九二一年七月起称赤色职工国际）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通过的决议，责成工会驻赤塔代表Ю.Д.斯穆尔基斯在该城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书记处。

一九二一年一月，他派遣M.福罗姆别尔戈到中国。在此之前，M.福罗姆别尔戈在俄罗斯共产党（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的情报局工作。M.福罗姆别尔戈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委托给他的任务，主要是在上海和Г.H.维经斯基进行联络（见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五三四，目录四，归档案号三，页号五，十；归档编号十五，页号五十八；全宗四九五，目录一五四，归档编号十五）。公布和注释该信件者为苏联历史学副博士A.И.卡尔图诺娃。

① 这里所指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工会的合法机关），它的行动纲领和具体行动措施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已制定好了的。详见A.И.卡尔图诺娃（Картунова）《赤色职工国际和中国的工会运动（他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历史）》——《亚非人民》（苏）一九七二年第一期。

李克诺斯基（Ликонъский）代表赤色职工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进行工会和工人方面的工作。李克诺斯基的身分目前还不能确定。按历史文献的习惯说法，他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但是根据Г.马林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和九日从上海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来看，李克诺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一年一月的决议成立（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四九五，目录一五四，归档编号二十三，页号一）并由共产国际委派B.舒米亚茨基（Шумяцкий）于一九二一年二月末至三月初最终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次克。

Г.马林在一封信中也提到，他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到达上海。过了几天，李克诺斯基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也来到上海。在那里他们一直共同工作到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初李克诺斯基被召回伊尔库次克为止（同上，全宗四九五，目录一五四，归档编号一〇九，一三三，一三六）。

显然，李克诺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这点也被Г.马林的报告所证实。报告说，当他和李克诺斯基在上海的时候，他仅限于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而李克诺斯基接受的也是同一任务。Г.马林还报告说，根据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指示，所有党的会议，李克诺斯基都应该参加（同上，全宗四九五，目录一五四，归档编号一三三，页号六）。显然，作为远东书记处的代表，李克诺斯基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同时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这种情况在二十年代初并不是罕见的。在某些时候，Г.维经斯基和Г.马林也是既负有共产国际的使命，同时又执行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可能李克诺斯基的姓不是真实的，而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某个工作人员的笔名。看来，苏联的历史学家经过对问题的查证，会在最近的将来弄清李克诺斯基的真实身分。

② 这个机关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劳动书记部，在苏联的历史编纂学里称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③ 张国焘被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从一九二一年起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一大"上被选为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在"二大"和"四大"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五大"和"六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一九三八年被开除出党。

除了上面提到的总部主任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有六位同志（共七人）。①这后几人，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在工厂做工的大学生，其余都是知识分子。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在今年八月十一日建立的，并在八月十六日对中国工人发表了关于自己的组织、目的等等的特别宣言，这个宣言刊登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者》的创刊号上。②

由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主持，所以党完全结合了自己的工作和领导了书记部。这正如上述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所确定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工作，而在工作中又有充分的独立性。③

Ю.Д.斯穆尔基斯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
原件是俄文打字稿

（译自苏联《亚非人民》1972年第6期第157—158页。）
（江海译，包建元校）
（选自《“一大”前后》〔三〕）

〔附〕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全世界扩大发展的整个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进程表明，人类已进入一个从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关系）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时代。

伟大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进程所发生的影响，其最重大的成果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理论，是一个持久的，复杂的，又不时充满着矛盾的过程。当然，在中国也是这样。虽然在二十世纪初一些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零星材料就已开始传进中国，但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前，中国实际上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有极少数知识分子知道这些材料，他们感兴趣的首先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一些中国思想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过高的理想，中国因为经济落后，还达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和罢工斗争的明显增长，以及伟大的十月革命有说服力的范例——这一切才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中国有了生长的土壤。

十月革命后开始系统地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尽管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一年

① 我们知道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成员只有四位，张国焘、李启汉、李立三和邓中夏。其他人的名字已不能确定。

②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行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创刊号于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日出版。见《中国工运史料》，北京，一九五八年第二册，第八十三页。

③ 新生的中国工人工会运动从一开始就和赤色职工国际有联系。一九二五年五月在成立全国总工会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中国工会正式决定参加赤色职工国际。

间这项工作的规模还比较小，尽管远非所有的翻译都堪称完美，也不是所有的译文全能忠实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实质，①但这毕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理论思想前提。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之时，也是中国最初的工人运动和急进知识分子的积极活动之际。这些知识分子曾是反对巴黎和会关于将中国山东省的主权转让给日本的屈辱决定而爆发的五四运动的先锋。在五四运动（据同时代人的看法，这个运动的“民族主义性质大于阶级性质”）②中，中国的无产阶级第一次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虽然参加运动的工人还提不出本阶级的要求，而且处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但是工人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深远的影响。

五四运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就激发了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为挽国难而寻找出路的热忱。一部分急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步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初期他们是形成共产党干部的主要来源。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驱当推李大钊，他是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新文化启蒙运动和爱国的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李大钊热情地欢迎伟大的十月革命……，并且号召“研究布尔什维主义，向人民介绍布尔什维主义，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真相。”③一九一九年九月，深受先进知识分子欢迎的《新青年》杂志出了一期李大钊编辑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专号。④这一期除登载马克思主义学说反对者的文章外，还登了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第一部分。这篇文章是在中国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早的尝试。李大钊的宣传和教育活动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向进步的青年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起了巨大的作用。⑤

继李大钊之后，另一个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急进知识分子的著名领导人是陈独秀，后者是《新青年》杂志的主编，也曾一度在北京大学任教。⑥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不是笔直的，平坦的。他对十月革命并无热情，但到一九二〇年春，则开始自称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就我们所知，在共产国际的代表于一九二〇年春到达中国之前，无论是李大钊、陈独秀，还是中国别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都还没有实际考虑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的提出迟早是不可避免的。⑦

---

① 例如，由于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范畴理解的不够准确，存在着把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现代化，过高地估计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的现象。因而助长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

② 《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彼得格勒，一九二二年版，第一八〇页，蔡和森《近期中国革命历史概要》，莫斯科，一九三一年手稿，未出版。

③ 《李大钊文章与言论选》莫斯科，一九六五年版，第一三一页。

④ 期号为五月，实际上出版较晚。参看一九六〇年八月四日《光明日报》；《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第四次科学讨论会提纲与报告，莫斯科一九七三年版，第一七四——一七九页。

⑤ 参看科里夫佐夫和科拉斯诺娃合著《李大钊.从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一九七三年版。

⑥ 参看《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北京一九五八年版，郅玉如《陈独秀》附《陈独秀年谱》，香港一九七四年中文版。

⑦ 有些材料说，一九二〇年三月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见维经斯基《中国现代史（讲座）》第一册（一九一七——一九二三），莫斯科，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十三页，《近代史资料》，北京，一九五五年版，第二期，第一六一——一六二页。又知，一九二〇年四月，上海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表了陈望道翻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遗憾的是，从不久前发表的陈道望的回忆录却看不清楚是谁，在什么时候创立了这个研究会以及它的任务是什么。（见，《复旦学报》，上海，一九八〇年第三期，第一——四页、第十页）。很明显，这两个研究会首先是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究。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苏联共产党人的直接参加下出现的。他们在思想理论、组织和物质方面帮助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他们遵循列宁的指示和俄共（布）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东方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革命运动的决议，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①

在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的情况下，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与中国的进步力量进行接触存在着客观困难。因此，西伯利亚和远东共产党员以及旅华俄侨左翼就受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托，了解中国的情况并与中国社会先进组织的代表建立联系。②

一九一九年三月，在鄂姆斯克秘密举行的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在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该局受托“与东方和美国的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组织交换情报的工作，进行口头和书面宣传……”。③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一位负责人加蓬写了一个专门报告，说区委应下设一个有远东各国人民（包括中国）的代表参加的东方局。他认为，这样，东方局就“可望立即突出、全面地把工作开展起来”，并且能够更好地完成其促进东方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加蓬的计划包括与远东各国的革命力量建立密切的联系和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组织。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月在伊尔库次克组成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辖下的东方民族部考虑了加蓬的建议。一九二一年一月，以东方民族部为基础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④

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看出，在一九二〇年春之前，俄共（布）的代表与中国同志的联系还是断断续续的。⑤一九二〇年一月，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处在地下状态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领导人库什纳列夫和萨赫扬诺娃致函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内称他们打算与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联系。⑥一九二〇年四月，经共产国际领导的同意，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的领导人之一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派遣苏共党员维经斯基⑦、其妻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等一行人赴中国。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在北京大学教师鲍立维的协助下，维经斯基等一行首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和其他急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但北京是反动派的堡垒，没有发达的工业，也就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

① 参看《列宁与共产国际》，莫斯科，一九七〇年版；《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科，一九六九年版；列兹尼科夫《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历史问题》，莫斯科，一九七八年版。

② 卡尔图诺娃《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援助（一九二〇——一九二二）》，载《远东问题》，一九七三年，第一期，第一三六——一四五页。

③ 佩尔西茨《旅俄的东方国际主义者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若干问题（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七月）》，载《共产国际与东方》第六十四——六十五页。

④ 参看佩尔西茨《旅俄的东方国际主义者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若干问题》。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加蓬任东方民族部主席团副主席，也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成员。见《共产党人》杂志（伊尔库次克），一九二一年第七期，第十四页；《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部通报社会科学版》新西伯利亚，一九七三年第六期，第七十五——八十二页。

⑤ 例如，一九一九年夏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主席团未来的主席布尔特曼会见了李大钊，后来他称李大钊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见缪勒尔《在革命烈火中》，伊尔库次克，一九五七年版，第一四四——一四五页；关于布尔特曼的详细情况，见《远东人民》（伊尔库次克），一九二一年第二期，第一七三——一七八页。

⑥ 参看《沿海边区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一九一七——一九二二）文献集》，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九五五年版，第三〇五页。

⑦ 参看格鲁宁《戈里高利·维经斯基（一八九三——一九五三）》，载《著名的苏联共产党员——中国革命的参加者》，莫斯科，一九七〇年版，第六十六——八十七页；道夫宾《维经斯基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载《匪情月报》（台北）一九七六年版，第十九卷第五期，第八十三——九十页。

队伍，当时很难成为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基地。因此，他们就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去上海会见陈独秀。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无产阶级集中地，也是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据知，一九二〇年春季和夏季，与维经斯基一道在上海工作的还有斯托扬诺维奇、马马耶夫和佩尔林。若据工作成果判断，维经斯基等一行人在了解了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情况之后，其工作计划是：首先，协助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小组，并将这些小组合并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党，第二，通过知识分子组织与工人建立联系；第三，协调各革命派别的活动，包括联络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党员。

首先计划把团结在当时上海办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杂志、《星期评论》周刊和《时事新报》等刊物周围的力量联合起来。当时估计这些刊物的领导人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和张东荪可作为建立中国共产主义政党或社会主义政党的发起人。①但是明确地提出这个想法之后，《时事新报》的编辑张东荪就与小组脱离了关系。不久，他又直接了当地宣布，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政党为时过早，因为国内似乎还没有真正的工人阶级。②

后来，《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也离去了，他不同意党纲章程草案中不准加入资产阶级政党一项。他声称他不能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决裂。③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④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不久，李达、施存统、周佛海、俞秀松和其他人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这样，上海出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主义小组。⑤

北京小组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十月。除了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和罗章龙之外，小组中还有五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时间不长。李大钊提出的对无政府主义者作一些让步以保持革命团结的建议受到张国焘和小组其他成员的坚决反对。⑥一九二〇年底，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小组，因为他们不同意小组拟定的临时纲领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款。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邓中夏、何孟雄、高尚德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支部的一些积极分子参加了小组。

关于广州小组。在一九二〇年九月——十月小组成立时，除共产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佩

---

① 参看栖梧老人（包惠僧）《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加鲁尚茨发表），载《工人阶级与当代世界》，一九七一年第二期，第一一八页。

② 参看张东荪《现在与将来》，载《改造》（上海），一九二〇年第三卷第四期；《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一辑，北京，一九五八年版，第二十四页。

③ 参看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第一——六十七页，本段内容见第二十七页（载《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三月版——译者注），《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一九六七年中文版，第一一四页。

④ 参看穆辛《中国工人运动概述》，载《中国革命问题》第一卷，莫斯科，一九二七年版，第二二八页；卡尔图诺娃查明，一九二〇年七月五日——七日在北京由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主持召开了在华工作的苏共党员会议，会上特别指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已具备客观条件。

⑤ 现有的史料中，上海小组成立的时间分别算为一九二〇年五月，七月，八月和一九二〇年年中。（见《中国共产党》伊尔库次克，一九二一年版，第二十七页；《远东人民》一九二一年第三期，第三三三页，《亚非人民》一九七一年第四期，第五十页，一九七二年第六期，第一五一页，《七一月刊》武汉，一九五八年第一期，第十一——十二页）。新西兰汉学家宾戈认为，上海小组似乎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成立，都在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二日（见《匪情月报》一九七六年第十九卷第五期，第八十四、八十九页），这与中国代表团向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相矛盾。（见《远东人民》一九二一年第四期，第五一五——五二〇页，《国际青年通讯》，莫斯科，一九二二年第十一——十三期，第一一一——一一二页。）

⑥ 参看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第二十八页。

尔林外，小组中还有七名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也没有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一九二〇年底——一九二一年一月初，维经斯基前来广州，他建议小组成员赞同其中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份提纲，但许多成员拒绝了。小组只好解散了。①

一九二一年一月初，在维经斯基和应"左派"军阀陈炯明之邀去广州的陈独秀的倡议下，成立了由九个人组成的新的共产主义小组，其中有北京大学学生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应当指出，身为省教育委员长的陈独秀的积极活动，特别是他在广东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言论遭到当地反动派和许多国民党活动家的强烈反对。当地议会的代表甚至通过了一项专门议案，要求解除他的职务并把他驱逐出广东，因为"他散布反对政府、反对私有制和宗教等破坏中国社会制度的理论。"②看来，陈独秀在广东省的切身经验是决定他以后对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持消极态度的一个因素。

除上海、北京和广州的小组外，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和一九二一年初，在其他城市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③

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中国开始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然而，"共产主义"一词于这些小组只是相对而言。这样说主要是反映了一种倾向，而不是各个小组的实际状况，因为参加小组的有无政府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偶逢的同路人和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过是暂时追求当时时髦的社会主义学说；参加组织的还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知识并逐步投身于实际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各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主要是青年学生（大部分不到二十五岁）；百分之七十的成员出身是地主和绅士，百分之十是官吏。④

中国共产党就是以这些主要从事宣传工作而成分又相当复杂的知识分子的小组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⑤

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间，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方针主要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无产阶级建立联系，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

《新青年》杂志从一九二〇年秋天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并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刊物。因此该杂志编辑部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者改变《新青年》新方向的企图没有得逞。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一年秋，在上海半公开出版了《共产党》杂志。这个杂志中刊登了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片断、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个别文件以及一些其他材料，向读者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其篇目中还有一些论述中国革命运动的现状及前景的文章。

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收集、翻译和传播工作，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积极参与下，

---

① 参看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佩尔林给舍维廖夫的信。信中说，维经斯基到（广州——译者）的时间和小组解散的时间应为一九二一年二月——三月。现有的文献不能证实这一点。

②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伊尔库次克，一九二一年第六期，第十四页。

③ 张太雷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说，到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香港和南京都有了共产主义小组。（见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建党史》，载《亚非人民》，一九七一年第四期，第四十八页）引人注目处是这个单子里并没有湖南省省会长沙。某些中国作者不引用史料，认定早在一九二〇年九月毛泽东就在长沙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如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第一卷，北京，一九六二年版，第一〇三页。

④ 参看《中国现代史（一九一七——一九七〇）》，莫斯科，一九七二年版，第六十页。

⑤ 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有这个特点，列宁指出"到处都是这样，在运动初期，知识分子是占多数的。"（《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五十二页）

一九二〇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在北京和广州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①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共产主义小组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接近中国无产阶级。

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主要活动方面是出版供工人学习的小册子和杂志。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和济南都出版了当地小组的定期刊物，如《劳动界》、《劳动音》、《仁声》、《来报》、《劳动者》、《劳动与妇女》、《济南劳动周刊》。但到一九二一年初，因当局查禁，经费不足，加之与无政府主义者分裂（他们负责出版《劳动音》和《劳动者》），这些刊物大部分停刊了。

据全部情况判断，共产主义小组在工人中印发的宣传品，其主要题目就是提出强烈的经济要求。陈独秀在一九二〇年夏天写道：“当前工人运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外国的新奇思想和外国的社会主义。我不敢奢望中国的劳动人民能很快地展开一场有如国外工人运动那样的大规模的运动。如果中国工人阶级敢于组织起来争取外国工人阶级已经获得了的某些利益，这就已经很令人欣慰了。”陈独秀建议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改善生活和建立工会的斗争。他写道：“倘若夹杂着政治运动来出风头，那结果必然和民国元、二年的工党劳动党一样”。②陈独秀为工人们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工人群众在一九一三年就上了政客们的当，被后者所利用来达到其自私的目的。不过，从陈独秀的言论中可以看出，那时候他是要把工人运动变为工会运动，他还没有认识到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确切地讲，他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后来他改正了这个错误，承认“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③然而，据我们所知，在各个小组为工人出版的刊物中没有哪一种谈到过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应该说，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人没有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品的效果当然很差。这就是为什么各小组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要为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办学。

第一个这类的学校是在一九二〇年底由北京小组的积极分子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京郊区的长辛店火车站创建的，他们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名义从事活动。工人们除了学习普通文化课程外，还参加讨论劳动人民的状况、罢工斗争等问题。他们向工人们介绍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并且号召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④

除了长辛店，在小沙渡（上海附近）、武汉和广州都有为工人建立的学校。

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开始尝试建立工会，即真正工人的组织，不同于当时已有的受工厂主和秘密道会门等控制的“工会”。但是组织工会一事开始时甚至遭到一部分工人的反对。这是因为“当时工人还远远没有认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而且他们对外人的每个行动都不相信（他们把共产党人也看成是外人，因为这些人多半不从事生产劳动）……但这些困难没有挡住共产党人。他们继续在工人中进行艰苦的宣传工作，向他们说明工会组织的全部重要性和意义。宣传起了作用，工人群众果然逐渐开始明白并最终理解了组织工会的想

---

① 参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一九二一年第四期，第十二页，第五期，第十一页，《苏维埃西伯利亚》（新尼古拉耶夫斯克）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卷，北京，一九五九年版，第二三二页。

② 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卷，第六十九页。

③ 《陈独秀文存》第二卷，香港，一九六五年中文版，第一二八页。

④ 参看《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〇八——二〇九页。

法”。①

一九二〇年下半年，上海小组参加了建立机器工会、印刷工会和纺织工会的工作。但这些工会的活动“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②印刷工会并不牢靠。据斯穆尔吉斯一九二一年底所见，这个工会“在最近两年中成立过两次，而现在又在准备第三次成立”。③而纺织工会会员极少，组织相当薄弱。

据中国的史学家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在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济南和广州成立了理发工人工会，武汉成立了人力车夫工会，济南成立了印刷工人工会。但这些工会的命运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生命力最强的组织，恐应是长辛店车站的俱乐部，它实际上就是工会。的确，长辛店车站和修配厂的铁路工人“比上海的无产阶级还要落后”，因此北京小组在这里开展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④。

上述史料说明，共产主义小组开始接近中国的工人。但这个过程很复杂，并且到一九二一年年中，收效甚微。从卡尔图诺娃的材料看，只消指出这一事实就够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共产党人连一个工人都未能吸收入党。

为了加强与无产阶级的联系，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在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的代表弗罗姆贝格的积极参加下，进行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内工人运动的机关——的准备工作。

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个工作任务，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共青团组织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它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二月，⑤有八人参加，俞秀松任书记。

继上海之后，北京、天津、广州、武昌和其他一些城市也出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从保存下来的一些地方组织的章程和其他文件可以看出，团员们把研究社会主义和以社会主义方式进行改造社会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⑥但是，参加组织的人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却是形形色色的。当时中国把布尔什维主义、“正统的社会主义”（考茨基主义）、修正的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称为社会主义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学派，上述各学派的信仰者们以及一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物也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⑦

因此，团内就存在着思想和组织上的涣散状态。为了克服这种情况，一九二一年三月，团开始“改组”。四月，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建立，它倡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是，这些建议遭到了反对，于是到一九二一年五月只好宣布团

① 卡拉切夫（纳乌莫夫）《中国共产党简史》，载《广州》杂志，一九二七年第一（总第十）期，第二十二页。

② 《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八〇页。

③ 斯穆尔吉斯《中国及其工人运动》，莫斯科，一九二二年版，第三十九页。

④ 卡拉切夫（纳乌莫夫）《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二十九页。

⑤ 参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远东人民》一九二一年第四期，第五一六页。

⑥ 见舒米雅茨基《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述评）——载《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一九二一年，第二期，第五——十页。一九二八年某些报告曾经再版，但有很多严重歪曲之处（见《革命东方》一九二八年第四——五期，第一九四——二三〇页）。

⑦ 刘少奇的证明是很有趣的，一九六〇年他说，他是一九二〇年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当时“我只知道社会主义好，知道马克思和列宁，知道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但是不清楚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见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九日《人民日报》。——译者）

自行解散，因为临时中央局显然已不能再继续工作。①就这样，试图给团建立完全共产主义的领导和急于把团变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导致了整个组织的解体。

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在思想斗争战线上所谓"社会主义讨论"的过程中受到战斗的洗礼。②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激烈论战的结果，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们得出了结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欧洲的学说，它具有国际性，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条件。（下略）

马克思学说的宣传者们认为，尽管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关系不够发展，但中国在苏维埃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援助下，能够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为了加速这个过渡，必须尽快实现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将把政权交给劳动人民并为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政治条件③。

按照社会主义信仰者们的概念，未来的中国革命将是始终一贯地反对资本主义的。他们当时没有看到本国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错误地把本国整个资产阶级统统当作买办，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斗争，他们认为是一种空想④。因持有这种立场，关于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及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对于多数社会主义信仰者来说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应该指出，有很多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建议，社会革命不可迟迟不举。例如，蔡和森并不排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他认为"不如由无产阶级先发制人，取其利避其害。……若我们无产阶级不先发制人之计，则必受制于人，则必坐待资本主义之来而无可如何，则必待五大强国社会革命之后，我们才能革命，那就真闷死人，真不值，真不经济了！"⑤

在论及中国革命动力问题时，某些社会主义信仰者断言，有"少数觉悟者"就足能够实行社会革命。同时也有另外一种观点，李大钊指出，"中国社会如此腐败，极需改造，但是个人无法实现它。自然必须依靠人民群众。"⑥按照施存统的意见，"我们要干劳动运动，必须我们自己亲身跑到劳动者群里去。……总要引导多数劳动者渐渐倾向于社会革命一途才好。"⑦同时，李达强调指出，中国是农业国，没有农民群众参加斗争，不能取得革命胜利。⑧还有关于军队工作和将来建立自己的"真正的红军"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应当特别指出，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没有共产主义政党，在中国进行革命准备是不可思议的。李大钊写道："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依托"。⑨在论及

① 见《中国青年运动史资料》第一卷，北京，一九五七年版。一九二一年秋，团组织恢复，但直至一九二五年第三次代表大会始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② 详见《社会主义讨论集》，一九二二年，广州（中文版）；捷留辛《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一九八〇年莫斯科第二版。

③ 见捷留辛《一九二一——一九二八年中共政策中的土地农民问题》，莫斯科，一九七二年版，第十二页。

④ 见《社会主义讨论集》，第六十九——七十页。

⑤ 《蔡和森致陈独秀的信》，见《新青年》第九卷第四期，一九二一年。参见《独秀文存》第三卷，第二九六页。

⑥ 《曙光》一九二一年第二卷，第九十二页。（此处俄译文与原文有出入。原文为"我们的社会腐败到这个样子，终天口说改革，实际上的改革半点没有。这总因为我们团体的训练不充足，不能表现民众的势力……"——译者。）

⑦ 见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原载《共产党》第五号，一九二一年六月七日出版，第二十六页。——译者

⑧ 见《新青年》第九卷第一期，第十四页。

⑨ 《曙光》一九二一年第二卷，第九十三页。

俄共（布）的活动时，李大钊总是把中国革命复兴的成败同劳动群众的战斗领导者——共产党的建立联系起来。

一九二一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从组织上建立起来了。

一九二一年三月，在筹备党代表大会的过程中，举行了一次预备会议，制定了临时纲领和目标与原则宣言（至今尚未找到这些文件）。与会者制定了下列任务："我们的任务乃是组织和集中阶级斗争的力量，使之在向资本主义的进攻中锻炼得日益强大。通过对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进行宣传，通过建立有统一中心的庞大的产业工人工会以及建立革命无产阶级的统一的政党——共产党，这一切是可以做到的"。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八月五日在上海和嘉兴秘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七个共产主义小组的十二名代表，他们代表着五十三名党员。这些代表是，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李汉俊、李达（上海），陈潭秋、董必武（武汉），陈公博、包惠僧（广州），邓恩铭、王尽美（济南），毛泽东（长沙），周佛海（东京）。中国最著名的两位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马林（斯内夫利特）和远东书记处的全权代表尼科尔斯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会议。

代表们面临的任务是把分散的小组联合成由一个中心领导的政党，制订党纲、党章的原则，通过实际工作计划、宣言，并选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

会上，两种主要的思潮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以李汉俊为首的少数派主张建立一个先进知识分子的不定型的合法组织，从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李汉俊认为不急于建立政党和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建议集中全力发展学生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按照他的意见，首先应当组织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知识分子；尔后，当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之后，才能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着手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②

以张国焘为首的多数代表否决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并主张组织一个有纪律的，有战斗力的，面向工人阶级并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党。会上的辩论还表明，多数代表虽然是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最普遍的原则，但同时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任务还远远认识不足。其表现为他们力图把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必定是相当遥远的目标当作工人运动的直接目标，再有他们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与其他一切政治运动对立起来。③这种倾向在刘仁静的发言中表现得最突出。他认为，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是唯一的斗争形式，以所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完全拒绝一切合法的和议会的斗争形式，并且拒绝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其他政治力量结成任何同盟或联合。

中国的党史文献断言，"左倾"分子的发言在大会上遭到了多数代表的反对。但是保存下来的大会文件证明，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刘仁静、陈公博和其他一些人的建议，至少反映了多数人的意志，并被写进（虽然有的地方写得缓和一些）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④

这些文件记录了当时人们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理解中国实际的水平。

---

① 《共产党人》，伊尔库次克一九二一年第七期第四页。《远东人民》一九二一年第一期第六十五页的引文略有不同，没有用"阶级斗争"，用的是群众斗争，"向资本主义进攻"一语删略。

② 《共产国际》杂志一九三六年第十四期，第九十六——九十九页。

③ 见《中国现代史（一九一七——一九七〇）》，第六十二页。

④ 《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第一卷，东京一九七〇年版，第五十四——五十七页（日文）。

虽然前一个文件被称为“纲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文件本身只是一些最泛泛的提纲（一——三条）和党章条例（四——十四条）。文件确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推翻资产阶级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政党的近期任务则包括参加政治斗争，反对军阀官僚制度，提出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事实上大会的文件还没有区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明确界限。

“第一个纲领”的规章部分，仿效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但是，关于党员资格问题的基本观点不符合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没有提出党员必须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工作这一要求。

对当时存在的各政党的态度问题，在会上引起热烈的争论。一些代表建议联合“其他各阶级”进行反对共同敌人——军阀的斗争，因为如果没有同盟者，中国无产阶级还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但是，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一些代表认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永远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这些人占了多数。①例如在陈公博向大会所提供的报告中，决议案记载：“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党应坚守无产阶级的立场，并不准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这是宗派主义的立场。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对宗派主义的批判，在此是完全适用的。在以后的年代里，宗派主义的倾向继续留在中共党内。

最后，代表们选举了陈独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和李达（负责宣传）组成的临时中中委员会（按：另外一些材料为中央局）。在陈独秀从广州返回上海之前，他的职务委托周佛海代理。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历史作用首先在于，它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确定了党的纲领性的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代表大会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愿望，它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大会认为必须巩固以共产国际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最集中地反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革命的进程、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多方面的援助对中国的影响。（下略）

（译自（苏）《远东问题》1980年第4期，K·B·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略有删节。
彭宏伟　潘荣译　李玉贞校）
（选自《“一大”前后》〔三〕）

① 科瓦廖夫《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见《亚非人民》一九七二年第六期，第一五二——一五三页。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1]

（一九二一年三月）

诸位同志们：因为交通上的阻碍，竟把远东和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国际中心隔离，所以我们久想和世界具有革命精神的青年联络，但未能如愿以偿。自从接读国际少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格林君的信，我们在三月十六日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并决定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但是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所以我们的代表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我们的青年团成立只有四个月，现有团员已过半百之数，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团体将来必然发达得很快。

我们的报告将用种种的可能的方法，送达国际少年共产党的总局或东方局。

国际少年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之主义——万岁！

北京青年团上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附〕 社会主义青年团之产生

民八，陈独秀自北大教育长被逐抵沪，时适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沈玄庐等在沪办《建设》杂志及《星期评论》；无政府主义者遣派金家凤、袁振英等在沪倡无政府主义。此时新文化运动者会集上海，《新青年》月刊亦迁沪出版，甚为蓬勃。而苏俄适派俄人维丁司克偕同杨明斋，及韩人安某，携款到沪，为苏俄作宣传，并负组织共产党之责任。抵沪后住霞飞路七一六号，即现在道路协会原址。遂与陈独秀密商进行，时陈住渔阳里二号（即现铭德里）寓柏文蔚处。经磋商再四，第一步，先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其时又以国内思潮汹涌，倡无政府者最多，反对孔孟及旧礼教者亦甚多，反对军阀者亦极努力，故由独秀与季陶等决定约集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等各个社会主义者，在戴宅密商组织办法。当时以法界当局对革命党之行动甚注意，上海流氓又时时索诈危害，乃由张继、柏文蔚二人之与法界有关系者出为相助，即以戴季陶住宅渔阳里六号（即现新铭德里）为团址，并办一外国语学校以避耳目。团务即由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袁振英、金家凤主持；事务由俞秀松主持；总务由杨明斋担任。但此项组织尚系各个社会主义混合物，而非马克思主义之干部。故当时曾推定八人筹办《共产党》月刊，其人选至复杂，有陈独秀、张崧年、袁振英、金家凤、俞秀松、施存

[1] 此件系关谦四月二日给王怀庆报告的附件。

统、沈玄庐及杨明斋等，一切经费当时均由维丁司克担任之。当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时，当有日人坂西多郎及韩人柏克及安某等参加之（日本《劳动》月刊上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情形完全刊出即系坂西之作也）。其后，各方志士周佛海、张闻天、李达、卜士畸、罗觉（即罗亦农）、彭湃、陈为人、李农志[①]（即李立三）、袁达时、傅大庆、恽代英等等，均自各省及国外归来，会集于外国语学社，遂成中国社会主义者之大集团，共产党干部亦渐因此酝酿以成。

（摘自仿鲁《清算陈独秀》1933年3月出版）

（选自《"一大"前后》〔三〕）

〔附〕 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情形致王怀庆报告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为报告事：窃三月十六日早，由陈德荣电招，谦于下午二时到北大第二院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谦此为第一次到青年团入会，须有二团员介绍，故谦于一时到陈德荣处，约王伯时同往。适值无政府党陈廷璠、黄兼生、陈友琴、郃光典等在坐，讨论将来统一会议之通知书，订期八月十号至廿号在汉口或广东招集，以便合力进行，谦亦签名"伊知"。发起人又议如何联合或攻击陈独秀之方法，因独秀与广东无政府党势同仇敌，每日在广东《群报》（青年团报）与《晨报》（互助团报）两相攻击，然独秀又来函至京，甚为和蔼，联络凌霜、廷璠等人，议决由北京方面去书独秀，劝勿自相伤斗，总以协力推倒现政府为要，如其再事反对，则进为排斥也。因阅广东报论说，遂延至二时四十分，谦方与廷璠、德荣、伯时同到青年团会议。查是日到会者共二十四人，探知其姓名者如罗章龙、李一志、徐六几、张作陶、顾文仪、徐文义、敦文华、宋价、何孟雄及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廷璠、伯时、德荣。由书记报告：俄国少年共产党人格林Green（英文）Гринь（俄文）现年不过二十岁，住天津，时来北京，住灯市口十二号，已来京两星期之久，因来与同人报告俄国现状，并为国际上之联络。今来函陈述赴津有事，不克莅会，惟希望我们即日选出赴世界少年共产党大会代表，此次会期为四月二十五日，会址柏林，总机关或在莫斯科分处，说明川资由伊代垫云云。查期限已近，此次会议最关紧要，将来国际间运动与信用，是吾人必须参加，愿望今日同人，以投票式慎重公推一人为华京代表，随同格林齐往。于是以何孟雄多票当选。随即建议临时设一审查委员会，以五人组织之，专收此次各同志对于赴会之意见书，并审查将来赴会提议各案事。谦于选举时，并未投票，因未知各人之名。遂于事毕由德荣起立介绍，谓谦热心改造之好同志，请众赞成入会后，谦谓连日病魔，今日不克多发言论。甚歉！唯声明愿牺牲一切，以追随诸君之骥尾，建设新社会之义务云云。后各人稍有议论，当即散会。预定收齐意见书再作饯行之大会云云。……兹将经过情形呈请

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

中华民国十年三月十七日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

① 应为李隆郅。——编者

〔附〕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情形报告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日）

为报告事：窃于三月三十日下午一时三十分钟，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开第四次大会。查是日到会者共二十五人，探知其姓名者，有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尚德、宋价、顾文萃、王伯时、郭〔郑〕振铎、徐六几、张作陶、陈德荣、李一志、顾文仪、徐文义、郭文华等。首由书记张国涛报告：在三月十六日以前，共计会员四十七人，现又加入八人，共计五十五人。但内中已有出京者七人。这几日极力设法筹经费，今由会员所缴来之款及特别捐等，共得现洋九十六元五角，并陈述料理何孟雄出发种种手续。次由李大钊、顾文萃提议，本团事务日渐纷繁，实际上发达亦得很快，所以应极急进行的手续，势必多起，兹拟设立一个事务所及筹备油印机，使总机关成立，以利办理。随付表决，多数赞成。事务所由调查股极力寻找，而油印机由李大钊、顾文萃担任筹借。惟会计刘仁静发言，谓设立事务所必添设什物，经济上应请各同志设法特别捐助云云。再由团员张君临时动议，将本团旧有之四股制及委员制，改正为执行委员会，设置委员十一人，分书记一人，会计一人，组织三人，教育三人，出版三人，并说明改组之理由：（一）旧有之四部制及委员制，有互无关连之弊。（二）将来本团人数增加，势必不能人人俱负事务上之责任，或因此影响本团精神。若改行执行委员会制，则可以免此二弊，况同志皆系负责者，有事时自可随时分担职务。等语。即付讨论，大多数同意，当即投票改选。公推张国涛为书记委员；刘仁静为会计委员，顾文萃、高尚德、祁某为组织委员；宋价、王伯时、某、为教育委员；李大钊、郑振铎、某为出版委员。并议决：每星期执行委员会集议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又由陈德荣提议，谓昨接同志李芨来函，谓本团象少爷式的平民集合，试思此语极是，欲救此弊，便须多介绍工人，中学生入团云云。公议赞成。至于如何向全国中学生及工人宣传，请同志发意见书，由大会决择。并公议办理同志赴俄调查及赴俄留学事；筹经费及造预算，事务所问题，因组织改变，须修改章程等事，统归执行委员会斟酌办理后报告大会。议至四时十五分始散。谦连日到无政府党人处，探悉该党近日并无特别议案，但各人拟半月刊出版底稿而已，前日有上海无政府同志张秀书、邹进二人来京，谓由上海方面派赴俄调查，随后一星期内尚有同志二人北上云云。查该二人准于一日晚由京出发。并由陈德荣转来汉口肖俊章来函，报告抵汉后之进行及请助资事，原函抄呈〔略〕。谦又觅得青年团代表何孟雄带交国际少年共产党书，原函译呈。以上均数日经过情形，合亟报告。按各方面进行，日见紧急，至于如何联络资助等情，以便窥其全豹，而易进行之处，恭请核夺施行。呈请

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

中华民国十年四月二日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

〔附〕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大会情形报告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为报告事：窃于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开第五次大会。查是日出席者十六人：李大钊、王伯时、谌小岑、王永禄、易道尊、王复生、张国涛、高尚德、祁大鹏、宋价、刘仁静、罗章龙，不知姓名三人及谦等。首由书记张国焘报告前三次执行委员会所议决之事：（一）修改章程，请大会通过。（二）"五一"运动已付印一种小册子，定名"五一日"，二千本；又一种明信片式之纪念品乙千张，皆于三十日前分散工厂。又一种简明宣言传单，注重工人每日作工八小时，星期停工，仍支薪金，鼓吹抵抗资本家，要求加薪，于五月一日散放各处。（三）会址因无适宜之处，暂设于平民讲演所内，以便办公。（四）陈述前次国焘与李实赴津，联合该津会，亦拟于五一日发布传单；及到唐山，此处本无青年团，经伊等联络工业学生数名，从事组织，并于五一日由京派代表及印刷品助辅进行，谓该处工人俱粤民，较易传播也。（五）宣告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同志来函，拟于五月一日开工团成立大会，是日招集工人演讲游行，请京派多数同志莅会帮助云云。次由会计刘仁静报告：收支数目尚余十七元二角，随即讨论。何孟雄来函，谓在满洲里京、沪、津赴俄同志十三人被拘，转解于黑龙江陆军监狱，已十余日，饱受痛苦，因伊有格林介绍赴莫斯科书，故只好承认赴俄考查教育，请设法向学务局或本校去电证明释放。当由书记发言，幸未被搜出本团证书及致大会书，"因该件缝在棉衣内，大半由格林带去"，尚易营救，此次是同人公推他去，现在被捕，理应尽力请公决办法。即由李大钊云：接各处来函，皆说上海代表自认过激，以致招祸，而学务局及本校事前未发证书、护照，此种彩色断然不允援救，且时隔多日，恐更有不便。兹有黑省友人熟识督署，托为设法，料有八九成功。惟昨与之预算，往返交际等费，至少所需三百元，再加孟雄回资，合计四百元应用，请公决如何募捐。当议由到会人先行认出特别捐，有李大钊签十元，张国焘、刘仁静各五元，高尚德及谦各四元，其余各捐一、二、三元不等，共计筹得四十九元；则所差尚多，拟再以分担法，每团员二元，除出京十数人，预得一百元；其不敷之数，李大钊提议向北京方面无政府党筹负小半数，"因该党亦有刘仲容、刘稀、孟知眠三人被捕"，附带代为设法；其余之数，再由热心同志分头募捐，李大钊担认总包足此数，并于未筹足以前，由伊垫办，以促救出。又议设"五一"运动委员会，推选法即：举出七人，如王永禄、罗章龙、王复生、高某等，先期设法联络北大印刷工人及各校役，财政部印刷工人，同文、新社会、国京各报工人，在北大"五一"以前集合，帮助其游行运动劝诱及派传单，预备印刷品或国旗，担任散布；并选出三人赴长辛店，及二人赴唐山，协助进行，所有各费，由会计发通知，征收四、五、六月份各团员常费及请特别捐；并请各团员于三日内拟运动法之意见书，七日内交常费及特别捐等事。……合亟报告。呈请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

中华民国十年四月廿五日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

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

（一九二〇年九月）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

（《民国日报》1920年9月28日—10月2日第1版）

外国语学社添招新班

（一九二一年七月）

本社添招英文、俄文、法文、日文学生各一班。有志向学者，请即至法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报名，每班报名者满念名以上即行开课。报名费一元；学费每月二元。

（《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1921年7月7日—7月15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经过纪实

奇　峰

自李石曾、蔡孑民二君，创设华法教育会，招揽国内青年，志愿半工半读者来法，以至微之学金，可得最新之工艺智识。有志之士，闻风而起，先后到法，达千数百人之多，可谓极留学界一时之盛。不料法国生计倍蓰战前，工人要求增强工资，厂主负担愈重，于是物值贵而营业不振，工厂停止工作，工人失所者，比比皆是。我国勤工俭学生，值此困难时期，更无插足之地。然无工即无以生活，自费读书，又力有不逮，故常因经济问题，与华法教育会时起冲突。适蔡孑民君来法，睹此不可收拾之情形，遂于本年二月间发出华法教育会对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之通告。通告一出，学生大起恐慌，纷纷往使馆请求设法维持。驻法公使陈箓，连电北京国务院、教育部并各省督军省长，报告学生困难情形，请速汇款接济。教育部覆电称，此案业经提出阁议，结果因中央政费奇绌，按期筹款维持，万难办到，其果系无力自给者，准予代购船票，遣送回国。各省督军复电，均以此项学生，非经省派，官厅无担负维持责任，应令各生家属，自行筹款等语，措辞更为淡漠。江苏教育厅覆电，则声明该会认遣送之费，不认维持之费。以上各电，由使馆宣布后，学生决议不受遣送。二月二十八日，集合数百人于附近使馆之公园，先由男学生代表十人，女学生代表一人，入使馆要求，每人月给学费四百佛郎，以四年为期。公使不允，学生不散。至午后陈箓偕留学生监督高鲁，往大众聚集之公园，向众演说。学生以公使仍不允每月四百佛郎之请，将其围住，经法国警察保护，始出重围。此次报名自愿回国者，仅二十一人，于三月二十五日，由马赛乘船回沪。

勤工俭学生之人数，据华法教育会名册登载，湖南三百四十六人，广东二百五十一人，江西二十八人，福建八十九人，浙江八十五人，河南二十八人，陕西九人，贵州九人，四川三百七十八人，直隶一百四十七人，奉天五人，山东十五人，湖北四十人，江苏六十九人，山西二十八人，安徽四十人，云南六人，广西七人，又新到学生，尚未列册者一百余人，其间籍隶四川者九十余人，统共一千七百余人。若遣送全体回国，计需川资二百余万佛郎。

遣送之消息传出，法政府及各报舆论，均极注意，谓于法国文化上，颇受影响。法外部派人向中国使馆声言，不如将遣送经费，移作维持学生之用，法政府方面愿竭力帮忙。陈箓甚以为然，于是中法两方面遂合力组成委员会，专办勤工俭学生事务。该会于五月十四日成立，中国方面朱启钤为名誉会长，陈箓为名誉副会长，使馆员二人，总领事馆馆员二人，华法教育会办事员一人为会员；法国方面，前总理班乐卫为名誉会长，现外交部秘书长白德洛为名誉副会长，外交部、工商部各派一员，银行、工厂之素与中国有往来营业者，亦派代表来会，均为该会会员。

委员会之经费，朱启钤捐中币五万元，合法币三十万六千五百余佛郎。使馆所筹遣送费二十五万佛郎，法外部捐三十万佛郎，汇理银行捐五万佛郎，共计九十万六千五百余佛郎。

候工学生，由委员会每人每日发维持费五佛郎。洁身自爱，不肯与穷苦学生，争此区区

之费者，固属甚多；而俭学生自称候工无着，至会领款，及无法检查是否力能自给者，为数亦复不少。领款之人日夥，至八九月间，竟达八百余人之多。委员会一面发费维持学生生活，一面与在会之工厂代表商议为学生速行觅工。觅工之难，前已叙述。迨觅得数起工作，学生视为笨重，乃要求改为便易者。继则有人提倡，要求不兼工作，专事读书。至是委员会既不能强令学生工作，又无法筹资任其完全读书，更不能坐视学生之槁饿，只可照给维持费，以任其自然而已。

继就委员会，对于学生拒绝工作问题开会讨论，结果以学生既愿读书，应允其要求，十月各学校开学时，即由学生自行投考，考取入校者，由委员会维持学费；不取者则学力不足，仍应工作；其不愿者，遣送回国。计划甫定，而拒绝中法借款之风潮发生，留学界群起开会反对，使馆馆员被殴。更以维持费已将用尽，法政府遂变态度，决定撤销委员会，并于九月十五日止，不复发给学生维持费，于九月三日，发出通告。学生以通告发表太晚，又要求使馆再向法政府继续维持一月，法政府又拨给十万佛郎，声明此为最后之捐助，十月十五日以后，一切不愿顾问。

先是六月六日，勤工俭学生王若飞等三百二十五人，开会决议将里昂、中比两大学，改建工学院，收容勤工俭学生，函请使馆主持。九月十日，又开会争回里昂大学，发出传单甚多。而里昂大学，适于九月间落成，吴稚晖携带国内新招学生百余人，即于是时来法。勤工俭学生闻讯，于九月二十一日，组织先发队百余人，以争回里昂大学及移学生总会于里昂为目的，由巴黎乘火车出发里昂焉。学生所据理由：（一）里昂大学与勤工俭学生有极重要的关系，是李石曾先生回国时，留别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话；（二）中国已有千余学生来法，办理里昂大学自是刻不容缓的，是蔡孑民先生答《进步报》记者问，何时在法办里大的话；（三）里昂大学是公开的、普通的、劳工神圣的，是吴稚晖先生的话。

先发队既至里昂，遂入里昂大学校舍，该校校长法人苏邦氏，大为惊慌，报告里昂市政厅。召集警察于次日将百人之先发队全数驱逐出校，押于附近兵营内。里昂府尹，将情形报告法内务部。文牍内有中国学生籍众占领房屋，损害治安，并于警察总监入劝其出校时，面加侮辱，又在里昂散布传单，种种违法等语。顾据事后传闻，学生举动之最遭法官厅之忌者，则为法国共产党省议员，代中国学生向里昂府尹严辞诘问一节。法国政府之防范共产主义，等于水火，法国共产党省议员，表同情于中国学生，则中国学生，安能为法政府所欢迎。至此法政府遂决计主张将此项中国学生，遣送回国矣。时值章行严在巴黎，陈箓乃一面向法政府用书面请其取消遣送回国之主张，一面与章氏讨论办法。章氏主张考试，以最优者送入里昂大学；中西文不通，而体格强壮者，代为觅工；均无以上资格者，遣送回国。以上办法宣布后，学生全体反对。吴稚晖亦于十月三日由里昂到巴黎，陈箓即于是日在使馆大厅邀集吴稚晖、章行严、高叔铭、□显章诸氏及郑毓秀女士，讨论最后解决办法。吴稚晖提出意见如下：（一）由章行严君担任，向国内各处募捐，每年九万元；（二）公使担任向政府募捐，每年三万元；（三）捐款未到以前，先由使馆借垫；（四）学生五百人，送往克鲁梭工厂，余觅相当学校。与议诸人同意，分负责任，并由使馆向法政府商量克鲁梭工厂事。学生全体闻信后，以吴稚晖所拟办法，多属理想，不能赞成，仍要求开放里昂大学，为根本解决。吴氏于四日在客寓候学生代表回信。候至竟日，代表不到，吴氏遂于五日，仍回里昂。七日章行严知无办法，亦往柏林而去。至此法政府方面，已深知中国方面再无善法，遂于十

月十三日，由外部派员到里昂，押送学生一百零四人往马赛，乘船回国矣。

行者已矣，而现在留落法境者，仍有千余人之多。工既不顾，读亦不可，生机断绝，饥饿堪怜。使馆既点金乏术，法人更态度淡然，转瞬寒风凛冽，其苦境尤不堪设想。振动全国之留法勤工俭学美名辞，至今成斯结果，追忆由来，伊谁之过欤！（十月二十六日）

（《时报》1921年12月8、15日）

（选自《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一〕）

遣回勤工俭学生之真相

天　光（肖子暲）

我的朋友天光君从法国到柏林，告诉我留法勤工俭学会的一段历史，我就请他把这段历史以及他的意见写出，以告国人。（澹庐附志）

留法勤工俭学是一件最有兴味的事实，也是一个极待解决的问题。考他的源来实在有了十多年的历史。而自蓬蓬勃勃的发达，或称之为极盛时代，以至于成为问题，而迄现在，穷蹙枯窘惨淡之状态，则应以最近三年来的事实为范围，才便于叙述。自来国内报纸上也不少关于这事的通信，但或则非局中人，所说不能不谓为是隔靴搔痒；或则为一时的方面的报告与意见，亦不敢谓为真相毕具。我现在想统括前后左右各方面作一个总括的报告，虽不敢谓为详尽无余，大致当不十分乖戾。

勤工俭学最初发起之时代

当李石曾、蔡孑民、吴稚晖诸氏于欧战前留学法、德、英各地时，其中以李在法为最活动，亦最有规模与计划。豆腐公司之创办，为华人在欧惟一之生产品制造厂。华法教育会之组织，中华印字局之设立，均为华人在欧之崭新的文化运动机关。出版物如《世界画报》，如《旅欧杂志》——其特刊如《旅欧教育运动》，如各种传播、介绍之小册子（尚有许多种未出版的）先后辉映于大地。当时巴黎通运公司之张静江氏尤慷慨资助，以几个个人之心思与财力，竟使这种教育的文化的——另有一派作政治运动的兹不述——国际活动，奏可惊之效果，树伟大之根基，我们不能不佩服，不能不称颂李氏为实际的"伟人"。但犹以为未足，因其与许多人实验之结果，觉欧洲生活程度虽高，然节俭之在法每年六百元可足，乃有所谓俭学的方法，而发起留法俭学会。此会发起实在华法教育会之先，可见其由来甚有步骤，事之成功，以基于小而逐渐发达者为最可靠，以此方法所介绍来法之学生前后不过二百人。追乎"豆腐公司"创办，则又双管齐下，并工人与在国内无力升学者亦陆续介绍来法。以在公司所实行之工余教育方法，又觉工学之可以试行，于是更发起这空前的勤工俭学会。他的章程说"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增进工人知识为宗旨"，可想见其原起之大概了。

大批学生来法勤工俭学之时代

从这段起，是记者上面所划"三年来的事实为范围"的叙述，但也得从源头说起。

欧战中蔡、李诸氏相继归国，继续为华法教育运动、北京之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着实进行，或则为法文教育之宣传，或则设留法预备班，然犹具体而微。迨欧战停，至一九一九年秋，各省学生纷纷至京、保各处预备，以湘省学生为最始亦最多。盖当其时，湘省之"张毒"——张敬尧——正炽，学务停滞，一般学生无求学之所，一闻有此机会，遂遏不住的北上，一时保定、北京、长辛店各处成立留法预备班，同时四川亦有留法俭学分会——吴玉章氏之进行——于是湖南、福建以及原有之广东（黄强氏）四川都成立华法教育分会，影响所及不能谓为不盛。有了预备，自然实行。一九一九年初，李石曾氏复赴法，三月中即有

勤工俭学生九十余人由沪启程放洋赴法。（此次湘省占四十五人）自此以后以至一九二〇年底止几乎每月都有人到，每到必以百计，（有两次超过二百以上）法国方面招待机关，几乎忙个要死，诚可谓空前之盛举了。但起初尚顺利，渐渐艰难，一段复杂的经过，请分述于次。

勤工俭学昌盛时代

当初几批学生之来法，李石曾氏犹在巴黎，正购置华侨协社设立中法贸易公司诸事业，以期继续前此各种经营。初至之学生法语与工艺俱不足，李氏不欲其为苦工也，乃送至蒙达尼、木兰、枫丹白露各地中学补习法文。迨来的愈多，华法教育会的力量也渐觉不足，于是才有人去化学工厂作苦工之事。时李氏一面作里昂中国大学之运动，进行颇速，一九一九年冬乃专为此事归国。时张溥泉氏已至法，以教育会中交涉员向某之善法语，各方面都很吹得起，找工亦纯用中法感情，种种说法亦时所奏效。是时凡来者一到，即送入各地公学习法语，或留华侨协社布蓬内暂住，有工位即依序分批送去，学徒工、技能工、散工、苦工都有作者，这是勤工俭学最盛利之时代。

勤工俭学衰落时代与其原因

来者愈多，分配愈难，尤其不妙的，大战以后欧洲经济界变动太厉害。失业停工之事，自一九二〇年秋初起，法本国工人都不得下台。自然这些初到的外国人，言语也不尽通，技能又大都缺乏，势必欲求工作而不能，于是勤工俭学生之命运，异常困蹇。是时或则居各公学继续为法语之补习，或则向华法教育会领每日五法郎之生活杂持费以过活，住校者亦多由会中借贷费用。此物质生活受压迫最甚之时，于是精神生活亦为之不安，逾越常轨之事，如与办事人冲突之新闻，便不绝见于国内报纸上面。论者不曰勤工俭学生复杂、糟乱，则曰华法教育会办理不良，无以善后。二者诚各有一部分是实在话，因此学生方面一千多人自有品类不齐之弊，但人多则自有这种现象，不能笼统的说凡勤工俭学生都坏，教育会方面；人少事繁，许多处所，自然不周到。然一个由私人发启的社会机关，而举行这种大事业，谁也不能苛责。而其总要的原因，不外是物质的经济的，学生方面以此影响于精神生活之不安，教育会方面则以此不支持。其无量的怀抱，这是平情之论，事实之谈，敢告邦人君子者。

华法教育会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及勤俭学生二八运动之各面观

教育会以私人机关，毫无基本金，而七扯八绊的维持许多人，要读书，要吃面包，此其为难何待说得。在当初发给维持费之时，李石曾氏之意，以为挪借别种款项接济勤工俭学生暂时生活，待工作后有余款时复可以缴还，这种互助的办法何尝为过？谁知待维持者一天天加多，工作一天天难找，更何能望前欠之归还。（亦有少数归还者，但其比例真小极了）因此学生与教育会办事人的恶感日深，究实两下都是因于经济的原因哪！至一九二〇年年底，而有蔡孑民氏之至法，各方面都若大旱之望云霓，以为解决此困难问题者惟有"斯人"。不料蔡氏虽名为华法教育会会长，无奈如此复杂之问题，实非有专人不办。蔡于在法各种运动，除作作文及以资望为各名誉职员外，实际事务，盖纯由李石曾氏为之尽力，蔡何曾过问？且一抵法即有教育会职员，陈述一方面的言论，于是亦先人为主，而发"即无勤工之志

又无勤工技能”的通电于国内。机不凑巧，本来经济问题困难已极，乃于是时宣布本年二月底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学生方面固也知道此中苦处，但一时多数人无工可作，二月底后即发生面包恐慌，没有法子，便向使馆要求。使馆领馆有什么好答复，迁延敷衍，限期已迫至尚尚没有结果，只有组织善后处，叫学生去报名回国。学生们大家数万里跑来一场，如何甘心？所以要求不遂，便继之以总请愿。二月二十八日四百余人齐集使馆旁一公园，事后所谓二八运动者此也。当日学生不得入使馆门，陈箓出园演说，无结果，要退去，群众欲跟去，陈箓乃嗾法警拦阻，法警自不免拳足交加，群众因为在他人境地，没有法子，只好散去，这是当日情景如此。事后使馆自然大张其词，电回国内，说“围攻”说“咆哮”说“几被殴”；有些通信，说勤工俭学生怎么坏，怎么丢脸，屡见不一，见于国内报纸。在身受其辱者则以为本为“生存”“求学”两事而要求，而请愿，中间人不说公道话，还要极力丑诋，这真是没钱的人便愈没有理呵！究之以中立的态度作事后的批评，则华法教育会因陷于极困难而不能不脱离经济关系，手续上固有些不对；自来官厅无好意，这一面则又不待说；至于学生方面虽亦情有可原，但所采的方法与形式，失之过激，是以不能得任何方面之同情；至于当日实情也不过如此而已。在此运动中，学生方面有很可纪述者，即一般人作运动、请愿、要求，说“生存欲，求学权”，而一部分人反对之，以请愿要求为认贼作子，为不值，而说“工学主义”。前者则以请愿要求为提出问题叫支配者解决的方法，工读主义在资本制之下行不通；后者则以为要为劳动运动，非实行劳动不可，并发起组织新的勤工俭学会。事后前者由公使馆之维持仍退至各地学校，后者多赴各工厂以实行作工。久之以客观事实之困难——工厂停工——有工作者，终居少数，至作“里昂大学解放运动”时，两派有力分子遂以渐了解而取一致的态度。

二八运动后勤工俭学生之状罪及中法监护处之组织与工学院之要求

二八运动既无良好效果，有之只是陈箓答应维持三月一个月，学生除一部分陆续去克鲁邹作苦工外，其余有些仍退回各地公学，多数乃住巴黎西部古碑华、哥仑布一带小旅馆及华侨协社以待工。但三月以后，仍由使馆继续维持，自后虽不时宣布停止维持，而亦总不能遽尔停止。惟领维持费的，办法非常奇妙，每日六个佛郎，每星期发一次，必得亲自持护照等件到领事馆去领，每星期一三五下午三时起发费。至时，人数之多，手续之繁，领事馆房屋又小，至容不开来，其情状，恰同施放饥民一般。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之无聊，不说是绝后总可谓为空前。其实每月百八十佛郎，尽可送入各地学校，若是各种实习学校，则此数还可减少，那么可以求学，可以习艺，生活也较安定，时间不至虚掷。而当事者独不为此，必任数百青年学子，流落巴黎哥仑布一带小旅馆，自炊自煮，跑街，领费，使法人看着莫明其故，真也不明其故哩！五月间，朱启钤来了，捐出十万元来，陈箓乃想出别门面的邀集许多中法机关与个人，组织一个留法中国青年中法监护处，发出会证，叫大家去报名入会。可是这个门面，唱了许久而后成立，成立之后，仍是没有什么正式的办法，依然继续发维持费，一周一领，每日六方，……到八月而又减为每日五方，以后竟减为四方，学生们只求面包敷肚，也没有话可说。惟当监护处成立之时，曾有旅居巴黎方面的勤工俭学生二百多人及各地共四五百人，署名上呈向使馆及华法方面要求设立“工学院”，以解决求学问题，其余陈之办法大纲是：

一、就里昂中比两大学改组或附设工学院；

二、院之内容使学生在学业上有适当之预备，（自设班及赴各校上课）经济上有一节廉之组织；

三、院中设备，如炊爨、洗衣、洒扫等事，学生分工自任；

四、三年为限；

五、每年用费以二千佛郎为度；

六、院内附设劳动部介绍假期间之工作；

七、经费：1．借两大学费用，2．监护处已筹得之费，3．中央及各省津助，4．社会方面募捐。

此种要求，盖即含有开放两大学之性质，但亦非完全欲据为私有，特以两大学与勤工俭学生有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又当此别无良策之时，故作此种说法。然而当事者本无诚心，亦无规划，仍是没有效果。所谓工学院之创设，迄今只成为历史上一段话而已。

拒款大会之影响与里大运动之由来

朱启钤、吴鼎昌等至法，极力为借款之进行，法报不时登载此种消息。从来"爱国运动"容易号召，以故旅法各界一时反对借款之集会、演说、传单极为热闹。勤工俭学生人数最多，亦最激烈。八月十三日巴黎哲人大厅之大会，遂将使馆头等秘书、世人所称为陈箓之灵魂王思曾者饱以老拳，并迫令签字誓不再借款，并叫他去要陈箓也签字，并为文向法政府人员声明，而通告旅法全体侨民。这样一来，虽当时群众势力太盛，可怜的王秘书始强硬而终俯首负伤听命。事后陈箓之怀恨，其深切可知。因为名义上打了他的代表，便如同打了他自己。法政府本来想借款给中国，一旦听见这些黄色人如此之强硬反对，即是反对他的利益，自也不高兴。加之陈箓屡次对法人，利用其深恶痛绝流行之过激主义，加学生以过激党之蜚语，于是乎监护委员会九月十五日停止维持之布告以出。

自工学院运动即含有要求开放里昂中法大学之意，在勤工俭学生自身——明了勤工俭学问题的局外有心人亦无不同此见解——以为法国停业之祸有加无已，华法教育会——自脱离经济后声言仍继续为精神上的帮助如介绍工作及学校等事——与监护委员会数月以来找不到工位，偶发见几个位置，则报名者必过原额很多倍，而常在华侨协社用抽签法表决去取，其踊跃其拥挤可想，谓"无勤工之志"得乎？工作既总难得，维持费的生活又如此无聊，在巴黎哥仑布、古碑华一带的勤工俭学生，盖已因这种生活、这种政策被拖得八死九活，简直奄奄不复能有生气了。然而拖到这种地步，而犹继续忍耐、奋斗，在这一点，不能不说中国穷学生的精神确有不可及处。且说候工的既如此潦倒，在工厂作工足了一年二年的，以其长期间的经验，知求学问题之须另求解决之方，加之各工厂不时纷纷斥退工人，更觉地位之恐慌，一旦失业，真是危险。以一种欲望与一种恐慌——都自事实的经验得来的——之结合，遂于"不得不"三字之下而蓬蓬勃勃的发生"求学运动"。克鲁邹法国史来德第一大工厂之所在，华工前以万计，近亦数千。勤工俭学生，最初二十余人为学徒工者，成绩很圆满。今年来作技能工学徒者亦有，作苦工者百数十，故此地几为勤工俭学之中心。当此时，同学们即有各种工余印刷物之刊行，一为华工教育，而一即为求学运动。八月间该处勤工俭学生全体于某星期日开一次大会，佥以勤工俭学生欲求求学问题之解决，惟有要求里昂大学之开放。而追溯里大设立之原因，与其发起运动，迄于告成之历史，则勤工俭学生实其惟一之对象。今

者该大学完全变性，置勤工俭学生于不顾，勤工俭学生此时舍此又没有路可走，则惟有“争回”里大之一途，于是为正名及进行起见，便首先成立一个“争回里大运动团”，（当时附带说及比国劳动大学校，后以该校尚没有进行，便暂不说）一时全法国各地、各工厂、各学校凡有勤工俭学生者无不众口同声，成立同样的团体，为相互的进行。不复如二八运动时之党派各异，各持异见。会九月十五停止维持费之布告出，多数人复发出极危险的面包恐慌，各地便相率派遣代表会于巴黎而组织各地勤工俭学生委员会。此委员会为勤工俭学生自来未有之全体一致的组织，他的任务不外一为面包问题，一为较长期的求学运动。而见乎面包所以不时发生恐慌，其故由于无根本解决之方，后者实即前者之较长期的解决。于是临时发生面包恐慌之候工者与在工厂者，遂无不一致的集中于求学运动，将两者打成一片的进行。

里大运动之失败

各地勤工俭学生委员成立，其统一之目标为争回里大，故实际即名之为争回里大运动团委员会亦无不可。其运动之方法，不外首先为文字之宣传，冀与里大当事人为正式的谈判，并向官厅及各方面要求主持或帮助。以里大与官厅虽不相涉，而勤工俭学问题，官厅实负解决之责任，至各方面人士，则又直接或间接与里大有关系之人也。九月十五之期迫了，委员会代表数次往见，公使拒不见。一日忽然态度大变，使馆召集学生代表及第三者开会，陈箓申明前之不见，系无人在署，非过为拒绝，临时面包问题自要解决，而根本解决也宜同时进行。席间代表陈述要求里大开放之理由，陈箓极口称是，并谓“里大方面，中国当事者，我不接头，不能说话。我曾去参观，该校筹备处甚至不招待我，这方面你们自去交涉。至法国人方面，我可帮你们说话。”复有数次代表会时，陈且明言“你们可搬到里大去住，哥仑布一带房子不好，冬天了，无火，很冷，里大好多了，吴稚晖快到了，你们知道吗？去时哥仑布一带候工的人，应多去一些。”本来学生方面，也明知老陈的毒计如此如此，但是四面无路，只有此途走。并且官厅方面也只能将计就计，我们亦何尝不可互为利用？恰好九月十五过了，在哥仑布一带的立时发生绝粮问题，在各处学校的校长逐客，甚至有停止开饭者，万留不住。二十日，学生委员会遂组织先发队百人直向里昂中法大学开发，计巴黎、哥仑布、圣日耳曼、蒙达尼、多居里、木兰、枫丹白路各地均去有人。二十一日早都集合于里昂而直入大学内部。

这是所谓直接行动。读者只须想想，勤工俭学生当时之艰困——绝粮、无住——便知道这种行动之为不得已。但是里大当事人如何能允许？而筹备员副校长之褚民谊，又口口声声里大是中法合办的，凡事须得法人同意，并耸出法国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及中国里大法国书记古朗出来说话。当夜此百人者露宿坪中，借寒霜为衣被，其惨可想。二十二日则里昂警察长来了，首先没收此百人的居留证。晚边则武装大队实行用武力，将大部汽车五六架运此百余人入一军营，而监禁起来。过天副领事李骏奉陈箓命令到里昂，名为交涉恢复自由退还护照，而里昂警察厅说法国外交部、内务部与你们公使会商好了，来的电话叫好好看住大家。李骏当时变色，因为此有学生代表在旁亲耳听着哪！

当百人到里以及前后被禁若干日，里昂一般对于学生之议论非常之好，对勤工俭学生表极深之同情。当警察用武力押送百人入兵营后，里昂《进步报》纪事题云“警察之横暴”。当吴稚晖氏率百余人抵法至里昂，报纸大摄其男女学生之影，而译“欢迎你”三字之音为法

文，以为纪事题，于叙述新学生事后，对于勤工俭学生，为极长之论述。其言曰“但是这些近来一二年而现状穷窘不堪的天国之子，（法人每称中国为天国，称中华民国亦称天的民国，有意思）难道便没有权入学吗？我们无论新到的和从前的，我们都一概欢迎，我们很愿意我们的邑长能实行于大学内设新的班次之议。”同样又一报名《里昂》，议论亦称是。这因为学生方面发了许多法文传单之故，所以社会上很为了解，不料后来总不免被遣送回国。

百人二十二日下午进兵营，二十三日李骏来交涉，结果出人毫不自由。二十四晨吴稚晖到，下午至兵营向百人演说。二十七日有十代表出营（有李骏的名片才能放人出入）与吴正式谈话。学生方面的条件约为：(一)由勤工俭学团体调查确实勤工俭学生人数；（二）以里大房屋能容限度为招收勤工俭学生之标准；(三)不入里大者得以相当之经济额入其他指定之学校；（四）自愿作工者得受相当之补助；(五)经费筹集由中法政府、中法少年监护处、里大及与勤俭学有关系之团体共同组织经济筹备委员会筹集之，其方法运动庚子赔款及向国内募集；（六）所筹得之经费交由里大分配。

吴氏乃宣布他的办法：现在送入半工半读的学校或工厂，每日作工四时，余时读书，分筹款十二万元为补助费，以两年为限。两年后再筹每月三四百方的半官费，完全读书，以三年为限。十二万元的筹法：湖南答应三万元，四川三万元，北政府三万元，江苏广东各省三万元。此款一时难到，半年内请公使每月暂垫五万方。如大家承认，明天同去巴黎向公使交涉。里大暂只收二十人，你们自己推举；比大收百人，分四年进，今年收二十人。里大余屋修理太贵，如果大家定要搬进来，里大会变成华侨协社呢。学生方面虽觉这种办法相差很远，但一觉吴氏之意还诚恳，二被押禁不自由实为遣送回国之先声，不如暂承认，徐图补足。故当时承认次日同去巴黎商量。这么一来，李骏知道坏了，又去巴黎我使馆，还行吗？于是当夜跑回巴黎去，大家留他同走不成，而自他一来一去，里昂方面以后遂一个人也不能出兵营了。十月初三留学监督高鲁至里昂，邀同吴氏去巴黎与使馆及在巴黎之章行严氏磋商办法。吴氏的办法，半工半读，分四步进行：第一步筹款请章行严主持，并约国内之熊秉三、范静生诸氏加入；第二步请使馆筹备三十万法郎；第三步学生方面承认为一种契约的表示，并调查确实人数；第四步请法人组织工厂交涉处。吴氏这些办法在巴黎时只在章氏家所遇见一位代表说过，要那代表签字，那位代表当时痛陈半工半读之难于实行，且说“这亦无签字之必要，先生能行得通，照行就是。”但当时取出使馆转来的蔡孑民、李石曾两氏联名一电云“于里大设补习班，十万元津贴可望实现，勤工同学务稍待”。吴氏看了，顿足大骂，“狗屁的李石曾，自己又不来，叫人设补习班……”不知怎的，吴氏忽遄回里昂去了。

读此诸君，请注意这个关键。自百人直接行动占据里大，学生方面便已铸成一大错，再无退步。官厅的毒计早已预备，至是便得以为所欲为了。学生方面只去一百人，他们料想最少会去五六百人，这一点他们正还很不甘心呢。无经验的褚民谊、曾仲鸣、彭济群，忘记了勤工俭学生与里大实在是一家人，而好似帮官厅的忙，叫警察索去大家的居留证。褚且诬告百人为“这些都不是好学生，是无钱无学的革命党。”狡猾的高鲁在里昂说“如法国政府送这百人回国，我也带官费生一同回去”，爽快的吴稚晖说：“如果法国政府不要法国的面子，陈箓代表中国不要中国的面子，遣送你们回国，我吴稚晖还要什么面子，只有打毁里大房子，带我的这班贵族学生通通回去，和法国断绝关系。”以及纯恃主观总作不危险的推测底几个学生委员会的代表，一味空心瞎眼的强硬到底，总说回国不成问题，是破坏者故意造

谣言的……可怜通通上了大当呵！都被陈箓口口声声所说“送学生回国是法政府的意思，因为不满意八月十三之事，屡次交涉，外部说你保不住你的秘书不被打，难道你能保学生不再闹事？便无词以对，只好等有了办法再去交涉，如果法政府定将学生送回，他也只好拿护照去外交部签字--同回国”一派油腔滑调，腹剑口蜜的话所欺呵！说什么四条大罪，又甚么由法外交部牵入法内务部，再牵入北京政府，如此小题大作，布置周密，节节吃紧，被欺者各方面还在争条件哪，闹意见哪，而陈箓之计划已贯彻了！

十四日有船开往中国的消息出来给大家一桶冷水，然百人被禁得愤郁不堪，国庆日且全体绝食一天，为极沉痛的表示。奈绝者自绝，不理者自不理，同是中国学生，同在法国里昂，兵营百人绝食，指着肚子饥倒床上，中法大学学生、教职员唱戏饮酒大热闹一天。日子紧了，十三夜警察先生，兵士大人法兰西自由平等博爱之纠纠干城，便正式动手，将这一百另几个手无寸铁、为要求学而来的远东青年捉将囚车里去，荷枪佩刀的夹着，车上窗帘都蔽着，人不知鬼不觉，二十四日到了马赛，将车箱七参八曲装到码头上，再一个一个放出车来的踏上甲板，恰似放畜载禽装货的一样。下午四点钟汽笛一鸣，鼓轮望地中海开驶，一路滔滔，唉，好不凄惨，遄回东亚去了！

目下救急之方法和将来之希望

上面论述既完，敢以最诚恳的态度，有所告于三方面：

一、国内父老昆弟。三年以来这种蓬蓬勃勃的运动，提倡者具多大的规模，一般关心教育者抱多大的希望，实行奋斗西渡者又怀多大的志愿。这种空前之盛举岂不是中法间一种绝大的教育事业？岂不是东西文化上千百艘火轮船？今乃成如此局面，李石曾氏自然只有加病呕血，关心教育之一般人士只有丧气寒心，苦学生自身更只有叫要命。但是愈穷的人，愈能耐穷。所谓穷当益坚，穷则实自能益坚，这有何为证？即穷至如此地步，而报名回国者自十月底，迄于今依然不上一百人。因为谁则愿意如此空走一场无所得而归去，归去又有什么生路？邦人君子，这一点坚忍奋斗的精神终不能不说是勤工俭学生的特点。现在半官费及有津贴与其力俭学者外，真正无力求学者实只六七百人，而此数有三百人上下在厂作工，余则极困难而嗷嗷待哺者。目下救济之者，惟有望阁议通过之十万元速汇的款，勿徒为虚文。各省津贴赶急汇来，此项比较靠北政府为有望。来法苦学生以湖南、四川两省为最多。湖南曾数次汇款，但一为教育会扣作完债之用，余则杯水车薪尔已枯竭。四川倒好，已有年助的款之望，最近复到了十四万多佛郎，总算是大旱之云霓。各省父老均有关系亲切之子弟在海外，当能赶急接济。技术讲习所之议如成，亦足以补助一般勤工之条件。全般的较长期的解决不得，则只有为部分的，一段一段的解决。至于陆续被遣、被压迫回国者，大都无机会升学，受过一番激烈的压迫之后，他们所得到的教训真多真深切。有心人当抽头的想一想，何以中国才有勤工俭学生？是不是生计为难教育不平等各种社会制度不良之结晶体？日本本年五月苦学生之示威运动，是不是与中国苦学生在海外作直接行动东西辉映者？中国苦学生在国内者更何可胜数，示威运动能免不能免，都愿关心人筹划一下。

二、告苦同学。我们的境遇算恶劣极了，但是我们的觉悟也日深了。我们虽则觉得怨愤难遏，我们却应该回头向他道谢。我们既不惮辛苦，不畏艰难来到数万里之海外，这便是大家的勇气与精神。我们四周的机会都是如此低的，我们舍经得苦、耐得穷以外，再有什么方法

与生路？在欧洲当流氓，在国内也不过要变土匪。土匪流氓，都是现社会制度之产物与彩金。此际在欧洲多留一天算一天，多留一个算一个。

三、告国内同境遇的同志。你们与我们“同境遇”，所以是我们的“真同志”。我们的经过与现状，何一不是你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国内学潮层见叠出之原因，试考究一下是否大都系一个同样的问题之所致？你们観此海外同志运动之始末，又当作何感想？由法寄信回国者，自来便各异其说，一则说得天花乱坠，一则说得狗矢不如，其实都是没有回顾到自己的经济社会的地位，而承认其为现社会制度之必然的产物，本来如此如此，有什么奇怪。同境遇、同志愿的人们呵，能奋斗、能耐苦，才是吾侪本色，正不必视欧美为畏途，作望洋兴叹之懦夫，绝处逢生是吾侪之运命。提倡苦学者最初之意思也大都以此为出发点，请以这层话说为我这篇纪录之结论。

（《时事新报》1922年2月12—15日、18日）

（选自《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一〕）

赵世炎旅欧书信选

（一九二一年五月——一九二三年二月）

一

太玄兄：

又有两件事告诉你，并且希望你赐复：

1．此地工界朋友对我们感情太好，然而他们不自由的身体实在令人痛心，我们为想建筑一切事的根基，亦为想感情上建筑信用起见，打算使这里边几个——大约五、六人——优秀分子脱离陆军部的合同使他们身体得自由。

脱离合同没有别的就是要钱。陆军部的六百法郎固然不可免，领事馆的一千法郎太无道理。他们绝不愿出（也并不是没办）他们连向领事馆说好话都不愿。最近领事又加成一千五百法郎，不知为什么，更是岂有此理。有某君已寄一千法郎去，而得回信要再找五个有职业的保人，否则还要五百法郎，真是荒谬绝伦。

隆郅向我提议，要我写信问你看可不可以想法子就是想求你并再找几个——如郑毓秀、李阐邦、李光汉、齐云卿等——公共作保人，向领事馆具保这五六个人，使他们不花钱从脱合同。因为领馆李骏曾对李光汉说：只要有人保是可以的。李光汉亦曾说：保几个人是可以的，不过多了不行。我们想求你得便问问郑，看她能不能，她若肯为力便好办。李、齐等我们再写信去求。

我们对被保人负责，一方面对于保人也绝对负责。这几个人我们敢断言是绝对无问题的。

这种事实在关系太大，能做比什么还有益。

这事如何请你赐复。

2．袁子贞来说工会将改组。最后他们在这里又议决等到七月大会再说，袁子贞及此地办工会之孟杰亭、董国铨等对我们都极好，袁、董等屡次要我们对工会提出意见，并要我们组织一个工会来代替（因为我们新认识有许多是他们向来所不能联络的），我们却婉辞谢绝。只声明实实地做小事，尽力不谈谈组织（我们实在苦于还站在勤工俭学界中）。

但有一事隆郅告我，袁子贞曾对他说，捐钱之分配方法，并提及《华工旬刊》，蔡每月捐350，郑捐300，又说前请人编辑月薪400，后无钱又请你编辑。现在他又想请别人，这话是他这样说，袁在工会是不是什么都管，对于《华工旬刊》他亦未必有许多成见。他们写两句信，到两篇文章，都带一点“萧子升”味，热心则有之，而且极可佩服，作事与思想各部极幼稚。

旬刊现状如何？你前说你走后交鲁之，在现时言论机关非常重要，看印刷与发行方面如何，宜竭力整顿，使复原状。你既决去门百里柳，可向他们——工会——介绍鲁之稿子方

面，我们现在与华工有密切关系，定能常供给。且近日薛世伦来信极力讨论出版事务——我们曾向他们提议合办一种出版物——他们确很读书定多材料，可要他们也供给些，这是一个联络方法。

以上两事说完，再还有些事也拉杂说：

1．李卓、李合林、陈延年弟兄（合起来说就是华林无政府派）等大发言，各派都加攻击，尽说刁钻话，说的都似〔是〕而非，很足以动人。稿子是一个姓冯的做的，他在此地作工，我们也很好。我们决定这星期日约谈话并质问他。他们中间如李合林曾通信意见并不象宣言所说。还有一位陈宝孚上星期向我们道歉，说不赞那宣言及以前的通告。但写信去阻已来不及了。这宣言或者你得见并攻击有《旅欧周刊》。

2．吴明决定让他来克临办亦移克勤会决定支持，支持的标准就是小组织——其实真正的勤工俭学者本来只少数人，假使一千六百人现在来成个会，这个会才不是勤工俭学会，监督会听说成立陈录大过其瘾，可谓宿志已偿，但要考试看大家怎么办。真猾稽极。我们从今决不再有所表示了，（或老等勤会成立以后）因为防害太大。

3．对华工事完全因为所谓的"同学"方面的关系，渐渐生出问题，故从此决不大做，只从小处入手，并从感情方面建筑信用，消费办杜亦尚在进行。学校已将开班名为"工余读书会"。

4．我们现在成为众矢之的实在太苦，但只好仍努力。勤会成后就好办了（至少一百人）。我们也才可以自问，否则精神痛苦受不住，象熊自难已经算是"弱了一个"。

5．勤会入会的现象太好，来索志愿书者绝是真诚的。我还发现有"华工"来入会，因为通信处是中国人组合，但这只有欢迎。此地许多初来时便已殷殷相问"我们能不能入你们的会"？

6．周刊仍望竭力支持不变，态度非常要紧。

7．一月或两月以后我想慕韩兄可到此地来住。不过怕他不愿住长久，但此地熟人极多，他的令侄又在此地，他又很热心华工的事，我极望他能来替我们指导一切，所以要一两月以后因我想我工资必很不错很可共同支持。我这话说来太唐突，但我说来确是真实并无虚伪。慕韩兄之生活也似乎以"热心奔走"的生活为最宜，可以调剂他的脑病。

8．家里好象硬要给我寄钱来，只这一次我也不拒绝了。前回承你替我转的那封信便是这回事。三哥与二哥，西安与顺庆来往打了好几个电报（因为"二八"事陈打回的电的影响）说要给我汇钱。或者不久会到，信是由你转，如有由北京来的挂号信，求你代签字收下，并无防打开因若有钱也须在巴黎取钱若到也存在巴黎，我除还债外别无用处。二哥在道君〔尹〕署秘书而且咨议抢人的钱我只好不拒。太乱说了，夜亦深，我这几日很苦，遂致爱乱说以自娱！敬祝你好！

弟 炎 24

（注：这是世炎在法国时给周太玄的信，估计是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于克鲁梭发出的。）

二

××（立三）：

昨天才收到你回国后的第一封信，读阅之下颇是欢喜。但只要看你的信，就可以知道你

的情景：你还是那乱七八糟的样子，毛茸茸的象一条小“大虫”：你走路一定还常“绊斛斗！”我很是为你耽心，你能不能稍稍改良，以慰朋友。

我现在还在北方，状况比以前较好，或者不久便有变动，仍然到南方去。因为我和瘦石感于同志在欧之无基础事业，决计重振旗鼓干起来，这事现在不能详说，事成以后再告诉你们。我只希望你们不必代我忧虑，说我没有再蹶再起的精神，但常常为我供给忠告，使我不致起而又蹶。

我留在欧洲虽然苦些，但也有用处，你们当能承认。你们若能承认，便请不必催我回国。固然你们的意思我当感激，但我自己的意思现在回国算是走了曲绕的路，还有我个人在国内的关系也极不相宜，请你们不必再催促。仲甫先生之催促，我明知道是无名和你的主动；你们为我计，我回国自有相当理由，但与我现在的情况不合，亦与我现在的意思不合，所以我不能从命。申府兄来信屡次亦促我回国，他现在仍坚持（他自己于三月内便将回来），我至今几乎穷于答复。你若再到上海会到仲甫先生时，请你替代说我的意思；我若不能于一个时期可以有效的读书——专门读书——以后，我决不回国来。我现在毫没有涵养性，我看见国内的情况异常烦闷，我虽然相信在中国实行布党的计划是一线的曙光，但我现在实不敢自信我能够作事，所以我暂时决不回来。

申府兄的四周的安排对于他太不适当，所以他非觉得回国不可。他写信给我说：“对于欧洲恶感太深，恨不得立刻去之！”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我想他也许真的不久便回国来，在他回国后，关于欧洲方面同志之团结与事业，一定有一翻〔番〕详的报告；对于国内关系之希望，亦从此逐时讨论起来——请你们暂等着。寿康与伯简去俄事，及我们公荐寿康为第四次代表事，申府兄已有几次信与国内了。我很盼望国内能答应，即时委命，寿康兄的个人，你和无名当都能代向国内说明，自无容我多说，又寿康兄近又提出，如果去成，但他以为一人太孤单（其实披素、子璋、伯简都同去）要添一人帮助，他并提伯简此事申府兄想亦有信回国来。我意亦无不可，因伯简信仰很坚，诚实又有见地，且善活动，不过不善言语就是，将来他们去时，欧洲“青年团”当都给以代表名义，拿团体的责任，壮他们的行色。

去俄的重要任务是希望能运送大批同志——勤工同学及工人——入俄，这事能不能成自不可定，但他们能去一趟，或者去了又回来，旅欧同志方面的事业与精神都当有若干的效果，况且现在欧洲情形实在可以乐观，财政大会的结果，资本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实在是弓在弦上。这次巴度在忍诺真不要脸，（米勒兰到亚拉伯去了，因此保安加勒不能亲自出马，真不愧一个法国有产阶级资本帝国主义的代表。这两天因为俄德条约，忍诺会议中的大多数资本帝国的代表都惊惶失色，纷纷抗议，看着将要下不了台。

德国最有希望，我们可以说是德国的社会革命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实际上现在德国的宣传运动等也自由得多，拿法国去比真有天渊之别了。最近寿康与伯简在德与德的C·P接洽，他们被介绍去各城市演说（此段是法文），他们去了好几处，大受欢迎。黄面孔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与西方无产阶级接触，此其开端了。法国实在该死，这样不要脸，还成天成夜的鼓吹仇德，我在北方看着舆论与民气尤其比南方利害，真正叫人肉麻而又痛心。我以前曾和你说笑，拿勤工俭学问题与法国妇女问题相比，现在法国的政治问题也就如我们当初所谈的法国的妇女问题的困难了。

别的话我将在与无名的信中另说，我这次给你的信且只写这一点，也因为实在没功夫。

我希望你此后常不断的给我信；更希望你对于你粗暴夸大的性情加以改良，差不多朋友中间只有你我最不放心，你的行动尤望常常告诉我。

你还是要找机会设法读书。

世　炎

一九二二·四·二十五在法国北方

三

无名①：

约两星期前有一信给你是否收到？我们通信总要勤些，民国日报地址若不甚妥，请你从速设法另找一个地方较固定且转交很快的，因为我们从此通信等事愈繁又愈重要。

在这封信里只能有下列的话告诉你，但有若干的问你的事件：

1．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大约一月以内可以完成，因为现在开会地址是很难觅）。

2．青年团的开始仍取极端严格手续，将来是否作公开的运动，可由成立开会时决定之，决定后再报告国内。现在人数因系严格，大约法国二十人，比国七、八人，德国六、七人，但现在"工学世界社"维汉、世伦诸人务要强迫全社加入在该社以去就力争。我本只请求他们出以个人行动，但他们务要如此，因此人数殊不可预定，一切将来自有报告。

3．支部暂时决不提及，况现已有代表团（申府等在德发起的，我亦承认）有事以此与人接洽便是，况青年团不久亦告成。我们已认定青年团之内幕即"少年共产党"故与国际党人接洽有"青年团"亦可。

4．寿康、伯简、子暲、披素四人去俄。我们荐寿康为第四次出席代表。此事务望你在国内亟力建白，速加委命。简、暲、素将来去时都用青年团代表名义。

以下是问你的话，并请记的事：

a，青年团有否总机关，并除章程外尚有其它规约或印刷品否？如有请即转告速寄来（暂时先寄我）。

b，凡关于C.P之重要印件，亦请你随时寄我。

c，青年团对C.P之关系如何？常有何义务与责任？应与何机关接洽？国内"青年团"是以地域建立，抑只总的一个？执行委员会如何组织法？产生法？或还有其它详情，都望一一是告。

d，在欧组织后，大家都是靠作工生活的，故公共经费必不充足，然将来向国内购书报为第一要事，绝无疑义，而且不能迟延。我以为此事既属有益，你能否先向出版机关（或发行机关或总部）代为要求，即开始将书报等陆续寄来？（暂时亦可直寄我）

这几件事等你从速答复。

我因为昨日接到隆郅的信，将复了他一信，由你转交，因他来信未说地址，我想他亦是常乱跳乱跑的，请你将我信速寄给他去。在他信里有些话已都说过了，故给你这信无容再说。但乃有二事：

---

① 即陈公培。——编者注

1．侨民教育经费十万元，李石曾求得寄法欲与勤工生设传习所，其实勤工生得不着半文，因被陈篆把持住了，且隐瞒不承认。但现又有问题，即工界之愤怒是也。昨日我见瘦石有一信来，与李石曾，未免太激烈，其实此事亦极难忍，望你于见李时或与之信时亦代诉说法国工界之现状。——陆军已脱离关系，大多数人已送回，剩下的只少数有希望之自由工人——善为其辞。

2．李合林事后，安那起朋友奋然而起。但以我观察，有一部分之安那其倾向颇变。其最著者为大陈——延年——趋向极为可爱，近日他们所出的工余杂志，竟高呼暗杀……革命……，气魄可钦。惜我与二陈均无接洽，你可否速来一信，与之问讯，且探其动静。因安那其中颇有人。近来最爱刻薄骂人，将来如生冲突，亦麻烦，可厌事也。

余再谈。

世炎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国北方

我在欧的行动，你在国内于认识我的朋友面前务暂时绝对的秘密，我们来往的信如无用时最好烧去。

四

吴明①：

接到你三月十七的信。

我日前复有隆郅一信并你一信想已收到。

我今天正在忙迫，明天“五一”去巴黎，并拟去蒙达尼、里昂、准也儿等处绕一遍，完全为青年团事。青年团事前信已略告，所谓全欧大组织即青年团，依我所计人数约三四十，然我不知者尚多，尚待各友之总汇名单于我。我现在持意两点（1）初步极端严格；（2）又务求没有遗漏，因此至今没成立。日前德国诸友联名——寿康、申府、伯简、恩来、清扬、子暲、披素——给我信促于五一告成，但实办不到，法国方面来不及（因工学世界社世伦硕夫等欲等该社开会要求全社加入且以去就力争，我不赞成——我意即在初步严格取人之意，要求他们取个人行动，现在他们亦承认）我被迫不得已，故决定于明日丢了工作出去跑一趟，大概一月以内准可告成，下一次的信定可告诉你详情。今天因结束在此诸事，百忙之中接到你的信，因先发这封信。

关于青年团的事，尚有下列诸件，亟待你们在国内的帮忙，接济并答复：

1．速寄关于青年团一切的书报印件等来；

2．关于C.P的；

3．请转告青年团总部指示应有的方略等等；

4．法国旧时安那其如二陈等近时倾向大变，望你们有私人关系者，速来信接洽，（即以青年团为题）

5．请你转告存统希望他与我通信。

下面的话是答复你来信中还有的事件：

a，申府现在德，应该常有信来，他给我信最密，我在法国方面事事审慎，故进行很迟，

① 即陈公培。——编者注

因此常遭他的责备与催促，他不能没有信来的；

b，我回国实在是不可能，四川问题到底现在详情是怎样？宝琪他们难道毫不能进行？北高川生中同志颇多，请问他们这般将来要回乡当教育家的注意？我对于四川是毫无关系的，请千万不要再想到我！

c，刘深山处你的书容设法寄，但必很迟。你若决定久顿上海，应当告诉一个妥的住址，说不定有人回国来，我才有地址可介绍。

d，罗承鼎的钱你应该写信向他说。你的一百元我经济有余可代你还。熊自难艺术家早已经疯了，始拘于比国，现移在里而狱里，我们百法挽救无效！

e，你要买书只有钱的问题，没有别的；但一半年一次约百万上下之书报我在不失工的时期还可对付，多了则只好请你寄钱，如果你能够。

匆复　并愿

你好

弟　炎

四月三十日下午

这信写的太匆忙

只许你一人看。

五

吴明：

兹转来伯简自柏林信两封，前一封在北方时收到，后一封昨日在巴收到。他既没另给你们信，我亦无暇重述，故最好如他所说将他给我的信寄来。

力子处转信是否很妥？你能否速找一个不致遭注意的地址？譬如这样信若遭检查很是问题，请留意！

巴黎都不自由，何况中国？庆云住巴很久，我的信都寄他处，因为信太多，遭警厅盘问；昨日伯简来的这封信，简直不客气，拆开了！另外加封寄了来！自然从李合林事件以后，在巴勤工老爷价值较高也是原因，但此次信所以被拆，因伯简不该盖火漆，太遭注意。此次信已停搁一日才交来，如果检查找人翻译便是问题，我此刻劝庆云搬家。

通信处最是问题，关于此层请从此千万注意，并速设法答复。（指国内通信处说，如青年团之总通讯处等……）

江亢虎今日在巴演说大批评苏俄，而自称中国社会党，他回国后很可注意（今晚已由巴动身赴马赛）。

我明日去蒙达尼。这几日很疲；北方半年奇趣之生活，现在走回都市异常不惯。

匆书余再详

大家健康

世炎　五月五晚巴黎

六

罗觉、述之两同志：

前复信被打回又由柏林寄出未知收到否？后又有一信亦由柏林寄出。罗同志所开来地址照样书写而不能寄到未知何故。兹以此次信同样写成三封分三个地址发出，想必总有一封可以收到（若某一封收到，请即亦知以便以后照样直寄）。

兹开来西欧同志愿来俄者十五人之名单，其简略履历如经过学校等项恐无用处故未开出。此十五同志已经此间执行委员会之认可，合于当初所规定之条件与情形。望同志们于接此信后即向东方大学交涉，请求莫斯科政府速电驻柏林苏俄代表，准予此十五人发给入俄护照。发电时恐未必能将名字一一开列，但请指定十五人之数目，我们在柏林便可交涉。

西欧青年团于本月十七、八、九三日在巴黎开大会，会闭后十五同志便动身，故月底以前均在柏林，因经济上关系不能久停，故务求交涉速发电为盼。

书记

赵世炎

一九二三·二·十四巴黎

（选自《"一大"前后》〔一〕）

德法问题与革命

（一九二三年四月六日）

周 恩 来

（上略）法兵现已占据莱茵右岸鲁尔Ruhf区域的矿区，德人敌忾之心日盛，英国作壁上观，意比则多袒法。法人进兵愈多，德人愈无意赔款交煤，长此支持下去，必要激出事变。论正轨自是革命，否则便是反动派起来骚扰。德国工人势力虽大，然眼前革命还做不到，且法意不动，德亦不便为此先驱。俄人现很注意于德，极力援助德国工人，图谋工人政府（但非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政府乃以和平手段取得，仍许有产阶级以选举权，换言之，即是要联合全体工人一致从议会政治中争得多数地位。）实现。此事成望虽小，但颇有可为之机。反之则反动派在德国也渐渐抬头起来，此在南部最盛，其名为国家社会党。此派若得势，近则像意大利的反动派（Fasciste中报译为法雪斯党），远则必像中国的义和团。德如有此行动，法政府更可藉口进兵而意大利也得乘机入澳，于是莱茵河上的血腥，又将布满中西欧了。

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他的最后保证者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欧乱现正方兴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各国劳动阶级如肯一致起来革命，赤军必可西出南下为援。所可惜的，现时英法的劳动界中有许多叛买〔卖〕劳动阶级的工党社会党领袖，欺骗着工人，阻挠着革命，以致第三国际，前敌一致的号召，到现今还未见效。

第三国际中有人说："赤军是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用的。"卢森堡当年也说："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这都是独到之语。然而许多小有产阶级的伪和平论者，于此却要大声疾呼的说："俄国共产党野心勃勃"了。其实俄国共产党要无野心，何能有今日的赤俄？野心未必便怀〔坏〕，但须看本着什么见地来运用。且人若无野心，无论求什么学，做什么事，都不会有大成，中国人最少有野心，所以学业也最不发达。近来俄兵不退出蒙古，且进占中东路，我意稍具世界眼光的革命家对此必无异议，否则抱绝对国家主义鼓吹征蒙伐俄，也尚不失为"有作为"的人。但是证之事实，则大多数人的思想，恐还是依违两可，不知所从罢。此而言救国都不可能，更何能言根本改造，世界革命？（下略）

（原载《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一期〔下〕）

伍 的 誓 词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

周 恩 来

（上略）我的近感和趋向，我也很愿意同你们多谈谈，不过在致小、山的信中已经说过的，我便不再提了。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前几天我曾做了首白话诗，词句是非常恶劣，不过颇能达我的竟〔意〕念，现在抄在下面给你们看看：

生别死离

一月前在法兰西接到武陵来信，他抄示我们离北京时在京汉车中所作的《别的疑问》诗，当时读完后怀旧之感颇深。本月初来德，得逸豪信，因念强死事论到生别死离；继读石久给奈因信，谈点似是而非的资本万能；最后又看到施山给念吾的信，知道黄君正品因长沙纱厂工人罢工事，遭了赵恒惕同资本家的诱杀；一时百感交集，更念及当时的同志，遂得此篇，用表吾意所向，兼示诸友。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作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那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它，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
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渗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你们看了我这首诗，可以想见我现时的志趣来了。不用多谈，谅能会意。

（中略）国内的消息——新近传来的——很让我们乐观。正品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这个意念的决定，分开来可以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津会时受了不少施以等主张的暗示，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其中以衫峙，衫逸，石逸三人之力为最大。出国后得了施山一封谈主义的信，引起我采求的兴味，最后又同念吾奈因经了〔很〕多的讨论，直至十月后才正式决定了。到德后，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念十分坚决。无论如何，我总信我可以不负这个死友了，不管他信的是C.还是A.。（下略）

——原载《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二期

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

——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

（一九四六年九月）

〔编者按：本文在刊出前，经邓颖超同志重新审定，并在文字上作了某些修改。〕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的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份。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七词唱。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话："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

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满洲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给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给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当主席。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留学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〇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日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一九二〇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锦琪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

有张历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国。

• • •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因此，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当时，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达到了维新，中国也想寻找这一条路。可是，中国封建势力根茎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未打倒封建主义，袁世凯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权，中国对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轻工业曾一度有机会发展，国内的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一定数量。大战结束后，德、奥、俄帝国倒台。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运动，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民主主张。但中国国内封建势力的头目袁世凯竟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那时的孙中山活动还仅仅浮在上层，他的主张中没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动不深入群众，没有群众作基础。因此，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农民运动。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实质上是农民解放。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这些革命运动常带有农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找出农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领导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了农民的要求，运动又无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来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来的袁世凯，都依靠外力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运动常告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加以发扬，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学得了美国改革土地的办法——即收土地税。但他的活动始终未深入农村去了解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并未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城市也未与小市民结合，奔走数十年，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对孙中山没有深刻印象。当时的三民主义仅有几个简单口号，没有政纲和政治理论。后来，国共合作，三民主义的内容才充实起来，成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这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三民主义才深入群众，在群众中生根。所以，今天我们所遵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张作标准的。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可分五个时期。这是根据它每一时期所包括的阶级成份与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划分的。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兴中会，一九〇五年成立同盟会。这个时期，它代表华侨资本家和劳动者（洪门）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国内依靠知识分子中不满意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人，还有社会上的青帮红帮，不满社会现状的人，失业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后，到一九一三年改称国民党，一九一四年又改称中华革命党，它的成份日渐狭小。当时，华侨中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一派反对它。在国内，是依靠一部分绅士、买办官僚、知识分子，而以依靠军人为主，它的基础很小。知识分子与军人合不起来。结果，代表军人的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赶走了代表知识分子的孙中山，于是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组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基础大为扩大。因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员就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层人士，总之，成份包括各阶层，成为一个民族的政党。也正因此，党内分成左右两派。革命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两派破裂，发生了“四·一二”的清党运动。

四、“四·一二”之后，国民党本身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五、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抗战开始后，基础又有所扩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上层军人阶级的利益。国民党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与它的纲领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纲领中任何规定都不能实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阶级的反对；改善军人待遇遭受上层军官的反对；发展民族工业，遭受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反对。不仅政策与党的统治集团相矛盾，而且党内上下层互相矛盾，下层的意见、利益，都不能实现，一切大权操于CC、黄埔与财政集团之手中。这些集团所以能操纵全党，首先是依靠军权，并且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帮忙。

国民党现在是靠军队、政权、特务、银行控制全国，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银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国（孔祥熙）、农民（CC）、交通（一半CC），但党的开支靠金库。参议会曾向国民党提出过批评，其后他们往金库拨了一笔款子做基金。国民党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就是因为它握有军、政、金融等权。

• • •

一九二四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一九二五年参加两次东征，任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的，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主持其中的两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组织三十六万工人总罢工，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

团，共一万多人，工人缴获了步枪四千多枝及其他短枪、机枪等。当时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八十万，直接作战的一万多人。开始时工人只有三百多枝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吴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政府已经开始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罢工，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京沪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四月十一日，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第二天"四·一二"，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三十多人，伤二百多人，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逮捕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独立十五师，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这一起义的失败，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一师人会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武汉警卫团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即离开南征军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〇年在上海时，我曾去过一次欧洲，绕道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认识邓颖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谈判开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头四次完全失败了。第四次是陈诚指挥的，失败得最惨。于是蒋介石决心加强训练，这便是庐山训练的开始。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

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来秘密接洽，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同时蒋介石仍加紧压追东北军向红军进攻，以便削弱红军，使中共易于接受他的条件。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共产党，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和平。在西安参加和平谈判的共五人：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蒋夫人、蒋、还有我。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打日本。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张学良被囚以后，东北军将领、士兵大为愤怒，以至杀死张学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况严重，闹了两个月才告平静。从那时起，东北军被蒋介石分散到各处，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一九三七年二月正式开始了国共谈判。我曾一次去杭州，两次上牯岭。当时顾祝同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谈判的结果国民党答应中共为合法政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八路军。但是政府始终未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

抗战开始后，我与朱德、叶挺将军去武汉，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划定作战地区。朱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我亦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合作。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月间，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临汾，然后回延安。十二月底去武汉，一直住到武汉失守之前，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是武汉失守前最后离武汉的一批人。从武汉撤退到路过长沙时遇长沙大火。后去桂林，一九三八年底去重庆。

抗战中的国共军事磨擦，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以南的关中地区。十月，河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十二月，山西阎锡山的旧军打新军。一九四〇年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冀豫边区。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发生了皖南事变（茂林事件）。新四军军部近一万人，除有二千人突围以外，都被杀、或被俘，目前仅放了二百多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曾自重庆去桂林，到皖北视察新四军。顺路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五月返重庆。七月返延安。因骑马伤右臂，未治好，九月赴莫斯科医治。政府的飞机送我到兰州，然后乘苏机赴苏，入克里姆林宫医院。到一九四〇年二月返延，体重增加了九磅。五月去重庆，八月返延安一趟。一九四一年茂林事变发生，谈判决裂，开始在报纸上斗争。一九四二年林彪去渝。林彪同蒋介石谈判也无结果。一九四三年八月，我与林彪等离渝返延。

一九四四年五月，史迪威将军决定派美军观察组和记者团去延安，我在延安欢迎他们。十一月赫尔利去延，达成五条协议，大概内容为打败日本后，同意中国建立联合政府，包括各党派人士，统一军队，改革政治，给人民自由。这是毛主席与赫尔利双方签字的，但具体内容从未公布。

我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又去重庆。

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华。他也赞成联合政府，但对共军的援助必须经过联合政府。赫尔利的主张虽如此，但蒋介石仍然不同意，结果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

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

马歇尔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开始来华时，我觉得他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我们在三个月内相处得甚好。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东北问题起来之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协议。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选自《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1辑）

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的答词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谭 平 山

今日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日子，并且同时是纪念马克思先生，承各界来宾拨冗光临指导一切，兄弟谨代表敝团同人答谢诸君盛意。兄弟更于感谢之外，还有一事希望于诸君的，我们组织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以改造社会为最大目的，但改造社会不是少数人的事，是全社会的人们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的，而且本团的组织，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因为我们确信马克思主义有改造社会的能力，但马氏学说实在高深得很，我们团体的目的志在参加实际运动，虽不是专尚高谈学理，但我们想改造社会，应该以现实社会做对象，故不能不先经过研究那一个阶级。但我们现在团体的分子对于马氏学说，多是属于初步研究的，故这要对于马氏学说有兴味的人，或研究有素的人，都加入本团，来指导本团，或时时和本团分子共同讨论，这是我们同人所希望的。

又青年团之设不自今日始，这也须向各位声明的。查青年团前年已经发起于上海，各省成立的也有八区。广州一区在前年八月亦经成立，兄弟亦是当时一个职员，但前年的青年团，当时没标明那种主义，也没有拟有具体的计划，团员宗旨也不能一致，所以去年三、四月间自行宣布解散，各省区虽没达解散的目的，但于进行上发生种种的困难，故去年十月间上海总团提出改组，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并且设七种委员会，分途联络，研究与实行并重，这是本团改组的目的。我当时受了上海总团的委托，再在粤组织分团，十二月间，先行联络同志，至今年一月开第一次筹备会。当时到会者有五十八人，修正章程，分途联络，至二月开第二次筹备会，人数已经达一百四十人，到现在已有五百余人。至佛山、肇庆、梧州、南宁、汕头、琼州等，均派有人组织分团。这是本团成立的经过。至各省成立的已有十一区，将来正式中央机关设于上海，且决定于四月间开全国大会，且选派全国代表出席于第三国际。

至本团的进行计划，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凡属团员都要负有一极大的责任，而且一个团员，同时要担负研究评议执行三种责任。本团所出版的青年周刊于二期所登载的组织大纲表，虽没有详细说明，但这边的意思，现在可略加说明：这个组织大纲表、评议、执行、同隶属于执行委员会，同时受执行委员会之指挥。凡属团员，必须加入一种委员会以上，又要在执行部担任一种任务。所有执行大权，集中于执行委员会。故本团之精神，是主张中央集权的。但执行委员会是由各委员会委员长和执行部各部部长，以及全体大会所选举出之书记共同组织而成，纯属于委员制。故本团组织，评议与执行不分离，所以无议会制度的弊病。采中央集权制，所以无地方分权的弊病。一方又采委员制，所以无少数专制的弊病。更有一层，本团虽以实行改造为目的，但我们也要经过一种研究工夫。所以要设立社会主义讨论

会，以供团员的讨论，而且人人都有提出问题及解决的职责，所以无普通社团随意挂名的弊病。至本团已经成立的，有青年周刊，青年剧社，劳动通讯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讲演队、巡回影画等。而讨论会、通讯、图书馆，日间亦可成立，这也可以报告的。但我们既是以改造社会为目的，改造社会的事业，并非少数人能办得了的，要以社会全体共同担任这个责任，方易解决，故希望各位都要加入这种社会运动，并须人人都担负改造社会的责任，这是我们除感谢今日到会诸君的盛意之外，所希望于诸君的。

（原载《青年周刊》第4号，1922年3月22日出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

（一九二二年五月六日——十日）

一九二〇年八月某日，上海有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这团体叫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处就有同样的团体发生，与上海的团体相响应。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宣告成立。

那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确定了那一派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就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

因为分子如此复杂，所以凡遇见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各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规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到了一九二一年五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

可是团体虽已解散，而其中一部分有革命精神的分子，却总是时图恢复的。刚巧同志张椿年那时从俄国回来，受了国际少年共产党的命令，要在中国组织少年共产党，拿这事情与一部分老团员商议。商议的结果，大众都以为不如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内容加以整顿。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正式恢复；首先恢复的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各处社会主义青年团统先后恢复了。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恢复，由于一部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所发起。他们得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所以恢复的时候，就主张确定主义使分子不致于复杂。于是他们就确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不过表面上却说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是很短的，至今不过三年左右。可是一面因为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他面因为先驱者的努力宣传，竟使马克思主义能在最短期间发达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际此时会，所以竟能很快的发达起来：从恢复到现在，不到六个月期间，地方团成立者有十七处（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唐沽、武昌、长沙、杭州、安庆、广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全国团员达五千余（大多数为工人，次之则学生）。其他各处将成立而未正式成立者尚很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既发达到这个程度，就感到从前的组织和训练有不能应付的地方，非另筑更稳固的基础不可。于是上海临时中央局就议决定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解决本团根本问题。

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下午一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在广州举行开会式。这一天并同时举行马克思诞生纪念大会和欢迎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与会者除本团各处代

表外，达一千五百余人。首由主席张椿年同志致开会辞，继则来宾，劳动大会代表及本团团员演说。演说者共十六人，多鼓吹社会革命，真是慷慨激昂，使人奋发。直至五时余，始三呼社会革命万岁而闭会。

从五月六日起，就连日开会讨论议案。到五月十日晚上议案讨论完了，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三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万岁而闭会。

这次大会：代表到者有二十五名，代表十五处地方团，又外国代表二名；会议日期共六日；通过议案共六件。现在将大会通过的六件议案正式公布于下：

（下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

（一九二二年五月）

在最近十年间的世界情形，完全为欧美资本帝国主义所威胁。这可惊可怕的欧美资本主义大企业日益扩张，其出产品的大部分并不销售在欧美自己的国内，而输出于欧美以外的国家。

结果，每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想日日扩张自己的市场，以销售自己国家过剩的出产品，一方面又从欧美以外的消费国中收买原料及半制品。因为要不断的争夺及保护这些市场，所以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弱小民族就不得不用武装的侵略和竞争，现今他们竞争最烈的大市场就是亚洲。因此印度、中国和高丽等国就特别受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惊天动地的世界战争，其发生的原因完全由于英、法、德、奥互相争夺市场。战争的结果，瓜分了德国的殖民地，毁灭了德、奥、保加利亚的经济基础，使德、奥、保加利亚成为英、法的殖民地，并且把世界的经济秩序完全破坏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先后在巴黎、华盛顿及日诺瓦会议中貌为和平，心实争夺宰割世界。此等会议中互相冲突的暗礁，又将为第二次世界战争的导火线。

日、美战争既为最近期间必不可免的趋势，而英、法冲突又将相见于疆场，所以将来第二次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爆发起来，其猛烈凶残必较新近完结的大战为尤甚。

华盛顿和日诺瓦会议，不过为苟延将来必不可免的大战时期之一种方法，一方面彼此藉此稽延期间充分作战争的准备，他方面又可在此稽延期间尽量吸收弱小国和殖民地底精液如原料劳力等，以补偿其在大战中的损失，并准备第二次大战的经济基础。

上次大战的结果，使英国、日本对于东方各民族的侵略愈加厉害，如英国侵略印度，每年约有百万印度劳苦人民死于饥饿，日本侵略高丽，更是一口吸收其所有精液一滴不漏。

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侵略中国又另取一种形势，中国最足为资本帝国主义在世界上贪婪掠夺的写照。各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以中国有广大的肥美土地，多量的贱价原料和多数的消费人口是一块肥美之肉，各想夺取比较他国更优越的权利，以至互相争夺，而造成中国现今在国际上的特殊情况。

资本主义的列强欲达到其侵略的目的，自然要努力破坏中国的独立和自强，扶植督军武人使之互相争斗，以收渔人之利，同时又因为列强间的互相竞争，各自特别扶植其势力所及的督军武人使之互相争斗，以获得特别的权利；在这种国际资本的相配及竞争之下，遂使中国四分五裂，内政无从整理，于是列强更藉为口实而谋瓜分中国或共管中国，所以中国国内的特殊状况，也是国际资本势力造成的。

中国的分裂和内乱既是由于国际资本的扶植而加之又有一班由国际资本养成的外国资本家走狗、汉奸、卖国党，在现在及最近将来更能把中国一统的经济生命尽量卖给外国资本家，例如种种权利的割让，最廉价的原料之输出，最廉价的劳力之供给等都是。

国际资本的压迫日甚一日，中国农民与无产阶级之失业和贫困也就跟著日甚一日。他方

面，大都会里又产生了欧化的资产阶级，这种资产阶级也采取外国资本家同样的形式用资本压迫中国的无产阶级。

在最近的中国，这种欧化的资产阶级虽有相当的势力仍未得着充分发展的机会；而组织中国社会的最多数最重要的分子，还是农人，小商人和小工厂主或工厂主以及知识者等小资产阶级。

这种小资产阶级，受了国际资本和国内武人多重压迫，日在恐慌崩坏之中，于是其中的开明分子为自身生存与发展起见，遂发生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抗本国封建武人的压迫这两种愿望。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二年义和团事件，正是资本帝国的势力压迫中国，使中国人民心情狂乱而反抗的表现。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事件，正是资本帝国的势力压迫中国，使中国人起来直接反抗封建帝国以铲除革新障碍，间接革新内政以反抗国际资本帝国势力的外患之表现。

这种反抗封建的民主革新战争，在政治和经济进化之历史的过程上有重大的意义。具体说起来，这种革命战争终局的胜利，是在能够得着对外的民族独立对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及普通选举各种权利。这种革命战争现时正在奋进途中，鉴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我们无产阶级和最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这种革命的争斗，造成无产阶级的真实力量，不应该取旁观或反对态度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但同时我们要知道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无产阶级虽可以得着些自由与权利，然而不能得着完全解放，因为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战胜以后，他们马上就会变成大资产阶级，而与无产阶级间的资本主义关系——即支配的关系——依然存在。所以接着民主的革命成功，便会发生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种革命之目的是采用劳农制度，即是将政权归诸无产阶级。这种革命实现之迟速，乃依世界状况及中国无产阶级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之强弱而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换句说，就是要建设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然这种奋斗的道路并非直径的，所以现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特规定下列现时的方针，以期达到最后的目的。

政治方面

（一）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二）工人和农人在各级议会和市议会中应获得无限制的选举权。（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应有绝对的自由权。

经济方面

（一）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工人——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过六小时；十八岁以上的青年工人，每日不得过八小时，但应争得平均的工值；禁止十二岁以下的青年作工。（二）每星期至少应有连续三十六小时的休息；一切节日停止工作。（三）禁止厂主与艺徒私自缔结契约，应制定保护艺徒的法律。（四）改良工人卫生，禁止十六岁以下的青年作有妨害健康的工作。（五）男女工人待遇平等，女子在分娩期两月中应停止工作，并须照常给发工资。

教育方面

（一）关于社会教育，社会主义的青年，应为所在地方的青年无产阶级组织俱乐部、学校、讲演会以发展他们的知识和社会觉悟，并发刊通俗的日报、月报、小册子。对于青年农人亦应特别注意。又应使年长失学的青年受普通教育。

（二）关于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的青年应宣传社会主义于大多数青年无产阶级，其方法或集会讲演，或刊行出版物和小册子，并特别讲述中国政治情形及其他种种情形，以启发并养成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及批评力。

（三）关于学校教育，社会主义的青年应运动改革学校制度，使一般贫苦青年得受初步的科学教育。并极力运动建设普通的义务教育和学生参加一切学务管理。取消宗教关系地方关系及一切不平等的待遇。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各种运动当协同中国各种青年团体共同工作。协同各种青年团体反抗各种迷惑青年阻挡青年思想进步之政治或宗教运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承认对于解放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为世界问题，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非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共同起来革命不可。

（《先驱》第8期，1922年5月15日出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十七号通告

——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

（一九二二年九月六日）

本团第一次全国大会议决本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承认本团为青年共产国际之一部，而青年共产国际又属于第三国际，则第之国际所规定的"少年共产团（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共产党之关系"本团理应服从。

依第三国际底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或少年共产团）与共产党之关系、同青年共产国际与第三国际之关系一样，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青年团须完全服从共产党底主张，在其他一切为青年利益而奋斗的方面，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一个独立的团体，有完全自主权；为使两团体关系密切进行顺利起见，并有互派代表出席会议之规定。

本中央执行委员会承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邀请，共同讨论时局问题。深感为进行顺利起见，两团体有早采用第三国际所决定的原则之必要；于是两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开一联席会议，议决此后两团体的关系如下：

（1）除了政治上的主张须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以外，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完全自主之权。

（2）两团体各级执行委员会会议，得互派有表决权之代表一名出席。

为此本委员会特通告各地方执行委员会须一律依此执行，并须将此事解释给每个团员听，使每个团员都明白此事的重要。至于有本团地方团而无共产党支部或有共产党支部而无本团地方团的地方，第（2）种关系当然无从实行。

（《先驱》第16期，1923年2月1日出版）

对于第二次全国大会的意见

（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大会之会期将近，本支部认此次会议对于青年团将来工作的进行有重大的意义。所以特于本月十二日召集全体会议讨论对于此次会议上所应注意的意见，并派代表赴会事。（当日会中共产少年国际东方主任大林和西方部主任“Tsemp Olc-kuu关于中国青年团将来进行的方略均有报告）今将其当日会议所讨论的结果照录如下：

一、对于青年团第一次会议的议决案。自第一次会议后，时期虽近一年，环境也经过许多的变化，然我们现在将第一次会议的议决案重新检查，觉得其中无论理论的叙述或实际的条文，都没有多大变更的必要。不过就一年来运动所得的经验，与新环境的适应，稍加以补充或切实而已。所以我们认第一次会议的议决案仍有继续进行之效力。

二、加入民党问题。中国在经济方面，大部分还建筑在中世纪手工业和农业的基础上，同时又为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销货场与原料出产地；在政治方面，完全是封建阶级——军阀——居统治地位，同时封建阶级又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指挥和支配，因此造成十余年来的纷乱局面。在这种局面之下，我们劳动阶级，无论为目前的利益计——如各种集会，出版、罢工……等自由权，或将来的发展计——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唯一出路只有促进民主派的革命，消灭国内的封建阶级，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才有可能。所以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会议上，就决议加入民主联合战线，继又决定命令党员加入民党。我们青年团是有青年工人和农人……等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队，我们随共产党之后全体团员加入民党，是必然无可疑义的。不过当加入民党或已加入之后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下列三点：

（A）加入民党须以个人名义。加入之后在民党中仍须按小组有独立的组织，特别的训练。团体各机关，尤须独立的努力进行，不得与民党机关混合。

（B）加入民党并不是消极的助其张扬声势，而应积极的为之组织群众，训练群众，领导群众向革命的正轨进行，以促成真正民主革命早日实现。同时对民党首领之错误倾向，尤须特别纠正。如近时孙中山国内四大势力妥协之宣言，及与段祺瑞张作霖之联盟等，须毫不客气的据理加以攻击。如遇民党对于工人有不利益时，尤须极力反对。

（C）本团团员诸系青年，意志未免不坚强，一旦突然加入最复杂之民党难免不受腐败空气之影响。对于此点，我们应特别注意。在这种民族革命之过程中，我们尤须防闲其自由派与爱国主义派的倾向。

三、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团的基础是筑在青年工人身上的，故此后青年团应特别注意各工业区述青年工人的组织与训练，促其自动的独立的去作经济和政治的奋斗同时仍须到工会中组织Cekyus，（支部），一方面训练青年工人，一方面帮助工会作组织与宣传的运动。

四、青年农人运动。在农民占最大多数的中国，青年农民对于青年运动有绝大的意义。以前青年团对此点未免轻忽，此后我们应实际到农村去组织与训练青年农民，第一步须注重

教育，灌输一些政治常识，使之觉悟其自身地位的价值，然后冲进于经济奋斗和政治奋斗（如反抗加租运动等）。

五、学生运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这样经济和政治状况之下。学生是容易趋向革命的，故我们对学生运动绝不可轻视，尤当引导其向工农群众中去。但同时应该注意到学生之本来的智识阶级的危险性。

六、青年军人运动。十余年来封建阶级——军阀所以横行无阻的。完全是凭着一部分失业的游民无产者为其雇佣军队，在这种军队中，青年无产者确居大多数，我们想推翻军阀对此一部分无产者的青年，非加以特别宣传和组织不可。

七、组织与纪律问题。组织与纪律是团体一切进行成败的关键，故应特别慎重。此后对于组织与训练应注意的是：

（A）青年团以前是以地方支部为基础本单位，此后应改为以工厂或学校……等中的小组织为基本单位。（统按现在本团正采此种组织，只是实行的结果不好。）

（B）各地方执行委员会须严密分配各团员工作。

（C）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地方执行委员会之委员，除智识阶级外须有工人若干。

（D）上级机关应当派代表到各地方调查活动情形，同时各地方须报告其活动于上级机关。

（E）此后中央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宜特别严格执行团体一切规律。

八、青年团与共产党。以前青年团的活动，未免全为共产党的活动所摄收，太偏于政治方面。以后青年团与共产党的活动范围，应有严明的规定。青年团除政治运动——反对军阀及帝国主义外，无须有自己独立的工作——经济改良和教育工作等。

九、出版物。出版物为宣传最重要之武器，此后须特别扩充其分量。同时对于内容须力除浮薄的理论注重实际问题。尤须引起青年工人和农人投稿。

十、青年团须协同共产党及职工会进行劳动立法运动。同时须提出关于自己利益之青年工人年龄限制，及青年工作时间减少等问题。

以上数条我们认为在第二次会议上须特别注意的故提出于此。其余关于教育经济及与各团体的关系等种种详细问题，我们以为在第一次会议的议决案里很为恰当，只在切实施行而已。总之我们远居国外对于国内情形，已属模糊，虽略有所闻，亦不过东鳞西爪，不能有所贡献，但我们希望在第二次大会上，应特别注意三个要素：

（一）各地一年来运动的经验。（二）现在国内政治的经济的状况。（三）青年国际第三次大会的精神。本此三者，审慎地详细地而运用之是在我们最亲爱的代表诸同志。

旅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

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日

（《先驱》第22号，1923年7月1日出版）

讨论本团此后进行的方针

中　夏　存　统

（一九二三年六月三日、十一日）

存统同志：

S.Y.为将来无产阶级革命之主力军，其重要不特

不减于共产党，实有过之。弟有意见数项，简约写在下面：

（一）政策须与共产党绝对一致。

（二）组织须保持独立。——在前此一年内，S.Y.之糟，无庸讳言。糟之原因，固然办理者办理未善，应负相当责任，然组织未完全独立，亦其一大原因。从前同志皆认S.Y.为加入共产党第一道门槛，几乎是共产党附设的预备学校，凡好一点的分子，皆由S.Y.挑选加入共产党去矣，所余者多未成熟之分子耳。以未成熟之分子而欲使团势扩张与发达，宁非梦呓。况且一个团体必有一种威严，如认为共产党附设的预备学校，威严何存？无怪乎加入者鞅鞅觖望，作工不力。故弟主张前此这种误谬主张应力矫正，凡年长者直接加入共产党，年少者直接加入S.Y.非俟年龄踰限或有特种原因，不得挑入共产党。又凡已加入共产党者，势不能受两方之指挥，S.Y.应准予除名，必如此S.Y.的分子方可统计也。换言之，必如此S.Y.的基础方固定，组织方独立也。但弟此地之所谓独立，乃指组织，非指政策。并且共产党乃兄，S.Y.乃弟，两者关系须异常亲密一贯，决不可因误会独立之义，而断决亲密关系也。闻兄在京有S.Y.向共产党宣告独立的主张，是何异封建督军向中央政府宣告独立一样，谬误荒唐，莫此为甚，望兄力改之。高明以为何如？

（三）须绝对注重青年工人运动，相对的注重青年学生运动。——世界各国的S.Y.，其主张与工作，都较共产党如左，而中国乃适与相反，此何故哉？因无多数青年工人在内故也。学生因无经济与阶级的背景，故利害观念不一致；而且所受教育，皆资产阶级的教育，其观念为"德谟克拉西"主义，为"自由主义"，为"安那其主义"；其心理为"发展个性"，为"反对束缚"，为"好名"为"趣味"，为"怯懦"，为"怕死"，五光十色，无样不备，这些皆与吾人主义与革命精神根本冲突，无怪共产党的主张原不算左，而S.Y.犹望尘莫及也。若青年工人则无青年学生之病，故弟有此绝对的与相对的之主张也。

（四）须极力注重教育与训练。

（五）须注重体育与娱乐——关于体育须注重，理由甚明、无庸絮说。至娱乐亦为必要，青年人当此身体发育之会，如无娱乐，往往不能起引他们的兴趣。因枯燥无味的结果，不是发神经病，便是自暴甚至自杀。墨子以自苦为极主义，其道大觳，超人或可为之，非所语于一般群众也。

（六）须组织一健全有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以上六端，不过稍引其绪，特写出供兄等之采择。　　　弟中　夏白　六月三日

中夏同志：

来信所论各节，弟个人大体极表赞同。本届全国大会开会在即，我们对于各种实际问题都应豫先有充分的讨论，以便大会得一切实解决。中央决定最近几期“先驱”专门讨论内部各种问题，网络各种不同意见，意即要引起同志的注意，激起讨论的兴趣，使之得一真是真非的解决。今把你的意见发表出来，供同志们公开的讨论，意即在此，

“政策须与共产党绝对一致”，“组织须保持独立，”此是弟等年来一致的主张，又曾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开会决定，弟纵荒唐成性，既在本团之内，又处负责之地，也何敢有S.Y.向共产党宣告独立的主张”！此种罪名，不知兄何所据而遂加于弟之身？只要是中国共产党为第三国际正式承认之中国支部，本团在少年共产国际指挥之下，则我们两团体间之关系始终应该密切，谁也不得发生任何异议。弟若真有此种主张，就应该受开除的处分。

不过我以为无论任何中央委员会的进行，都应以大会，或从前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决定为根据，绝不能以个人自由意思随便加以变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所通过的“少年运动的决议案”里面说：“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个独立的团体；关于普通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常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当时所以不规定政治运动须服从中国共产党而只规定须与共产党协定，是因为在中国这种特别情形之下一时做不到而又未得到本团全国大会承认之故，这是弟亲历亲见的事。再去年我们两个中央委员会开联席会议曾经正式决定：“（一）除了政治上的主张须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以外，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完全自主之权；（二）两团体之各级执行委员会会议，得互派有表决权之代表一名出席”。试问以上两种决议，是否是有效的？如果是无效，可以由个人随便取消，则弟就不忍说：如果还有效力，则弟主张中国共产党不能干涉本团内部之事，不能对本团下命令，不能直接指挥本团，乃是当然的事，有何“向共产党宣告独立”之有？在哪一点可以证明“与封建督军向中央政府宣告独立一样”？弟之所言，乃是针对目下有几处S.Y.组织未能完全独立的现象及少数要把S.Y.变成共产党的附属机关的同志而发，自信与兄之意见丝毫无二，何劳吾兄如此动气？兄乎，兄乎！请你平心思之，所谓“组织独立”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只要一个“空名”就算了的？

本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究竟如何，当俟本届全国大会去决定。许可中国共产党党员挂名在本团而不能替本团做事的同志的除名，我想也是必要的事。但同时那非共产党员的团员，须有根本的觉悟：（一）须明白本团独立组织的作用及本团特殊工作的意义，切实负起责任来为本团服务；（二）不要以为本团是进共产党的预备学校，目的只希望进共产党，进了共产党就算荣耀，未进共产党就要失望。如此，才象个独立的团体呢！

篇幅所关，暂止于此。

弟存　统　六月十一日

（《先驱》第22号，1923年7月1日出版）

刘绍周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祝词

（一九一九年三月五日）

列宁：……现在请中国代表发言。

刘绍周①（中国）讲中文，然后用俄语继续发言。②

中国代表的祝词③

共产国际已宣布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斗争。中国民主力量第一次有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对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五万万中国人民感受特别深。上千年的闭关自守之后，我国人民接触了世界生活，其标志便是欧洲列强、美国、日本向它发动了空前的进攻。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在中国推行西方文明的旗号前来，他们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他们都企图奴役中国，使之变为殖民地，以便从它的资源中为欧洲资产阶级榨取种种利益。欧洲各国依靠技术成就的力量屡获胜利。在一系列战争之后，欧洲列强似乎准备安于"门户开放"的原则，不再触动中国。实际上这是一群凶恶强盗的和解，他们守着自己的牺牲品，每人都惧怕过分贪婪的竞争者，互相牵制，不让对方另有所求。这是列强的默契，因为每个国家都从广袤的中国割得了一块地盘，为银行家和资本家的利益而进行剥削。

中国人民认清了西方列强的企图，但无能为力，只能痛心地眼看着祖国日益陷于奴役地位。清王朝使人民无法生存，人民又苦于它的压迫。中国人民的优秀分子在反对清王朝的国民运动中联合起来了。伟大领袖孙中山领导他们齐心合力推翻了清王朝。辛亥革命这一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行动之后所发生的事件，更加清楚地表明了欧洲帝国主义的真面貌，它的代理人无所不为，企图把中国的民族运动限制在有利于他们的范围内。对反动派袁世凯的支持以及张勋疯狂复辟帝制的企图，最清楚不过地证明西方列强对年青、进步的中国究竟有几分真心同情。接着就发生了欧洲大战。在此期间，欧洲资产阶级使用强大压力迫使中国参战，并利用了中国无产阶级：不是当炮灰，就是在俄国北部的冻土带和沼泽地、在矿山和欧洲战场的后方做工，当做驯服的劳动力使用。确实，欧洲资产阶级也不会有别的做法，为了战神和资本，他们数以百万计地杀害欧洲无产者。

1917年中国南方又爆发了革命，要求推翻反动政府。还在那时，聚集在上海的部分优秀

① 即刘泽荣。——编译者

② 刘绍周为何改用俄语发言，其女刘华兰同志1979年4月回忆说："曾听父亲说过这件事。因为他讲的是广东话，怕参加会的人听不懂。——编译者

③ 本次大会记录里没有中国代表刘绍周的发言。这段祝词选自1912年3月6日《真理报》。——编译者

的中国议员就曾向俄国临时政府致意。然而，这种问候和共同进行反帝斗争的呼吁，当时自然不会在克伦斯基政府中得到反响。当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声音在《告东方各国人民书》①中，特别是在契切林致中国的骄傲——孙中山的信中，通过战争和革命的炮火圈传到中国革命者中间时，他们的喜悦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些书信里，中国第一次从外国同志的话语里听到自己的宿愿已被人理解，听到以工农政府为代表的俄国人民已经决定为与世隔绝的中国民主力量的优秀分子所追求的理想而坚决斗争。中国南方革命者的斗争异常艰苦。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他们必定会有所牺牲。但是，俄国的声音和它兄弟般的召唤，必将最有力地鼓舞和号召他们去进行斗争。

本国际是俄国共产党创立的。这个党领导的政府，为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各国人民的自由而对世界帝国主义宣战。因此，这个党获得了中国人民最真诚的友情。

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不仅代表成千上万散居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地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代表刘绍周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①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签署的《致俄国的东方穆斯林劳动人民书》曾发表在1917年11月2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232号上。——原编者

刘绍周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刘绍周（中国）：1918年底，中国内战正酣。南方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其宗旨是同北洋政府进行无情的斗争。领导南方政府的是第一次中国革命的著名领袖孙中山。但是，过了不久，因为同残留在南方政府内的旧官僚代表发生冲突，孙中山退出了广州政府。从那时起，他不再正式参与政府事务。

南方政府至今还在继续其同北洋政府的斗争。同时，这场斗争还是在孙中山派所宣布的口号下进行。其中基本的口号是：还权予旧议会和旧总统，取消北洋政府。斗争时胜时败，但无疑南方政府更可望得胜，尽管乍看起来，似乎北方财政条件较为有利。近几日传闻南方政府军已占领华中湖南省，并挥戈指向北京。

1917年反动的北洋政府参加反德意志的协约国联盟时，曾向全国许诺，参战就能获取各种利益。各革命党表示抗议，也反对过这种做法，但徒劳无益，因为已经宣战了。中国人民终归是相信了这一许诺，对凡尔赛会议寄予很大希望。凡尔赛会议没有给中国任何好处，反而更加巩固了在战争期间日本靠损害中国利益而获得的一切权力和领土，中国人民大失所望。就这样，中国代表开完凡尔赛会议回国后，国内开始了反政府和反对日本的强大的运动。领导运动的是大学学生会。运动的中心是上海。学生们广泛开展宣传鼓动，组织示威游行、罢工，印发呼吁书等等。同时，他们提出了抵制日货的口号。的确，这场运动的成果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它被强力镇压下去，而且许多游行者惨遭枪杀。然而，尽管有这些情况，运动仍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它唤醒了群众的革命精神。

近来，学生们看清了，孤军作战不会有任何成果，便开始争取工人群众。中国工人也开始明白自己是一支力量，尽管代表的是刚刚产生的工业无产阶级。例如，去年上海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固然，还是纯经济性的。就连中央位于上海的社会主义党，也在工人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据它办的名称朴素的杂志《周报》，我们就可以判定，这场运动确实很重要。例如，5月1日这期杂志里有这样的口号："不劳动者不得食"、"世界是无产阶级的"等等。这家杂志坚持不懈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以反对民族主义，坚持同苏俄结成亲密的兄弟联盟。这家杂志反对去年旨在占领西伯利亚的中日条约。所有的文章都贯穿并强调一个思想：无产阶级定能战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必将让位予社会主义原则。这家杂志威信很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工业无产阶级，而且连手工业者也都开始组织起来。

欧洲的工业危机在中国也反映出来了，中国市场洋货泛滥。中国工业不能发展，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是很令人失望的。总之，中国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工人拥有从事革命宣传

鼓动的丰富材料。至于农民，尽管中国并没有大土地占有制，但比较富裕的农民仍在逐渐收购土地，因而毫无疑问，贫农的数量就不断增加。不言而喻，这部分人必将自愿跟随城市无产阶级参加革命运动。

目前，中国是一系列几乎独立的省份，每省有督军独揽全权。他们和政府委员们都是安福系成员，即旧军事官僚派系，大部分人在帝制时期也占显赫地位。所有这些督军几乎都独立于北洋政府，即使支持它反对南方，那也仅仅是为了自身利益。督军们执掌国家财政全权，擅自处理中央政府的收入。因此，政府的财源当然就微乎其微了。政府只好借外债，主要是向日本借款。既然日本愿意提供这个方便，当然，不是白给，那么，自然而然地，日本在华的权力和物质上的特权就愈来愈大了。例如，在中国许多省份里，日本就象在被征服的国家里一样，独揽一切。另一方面，我们已说过的那些督军们的独裁政权、两百万唯钱是听的涣散军队的存在，形成了一片混乱的局面。这就是经常出现革命风潮和群众反政府情绪的原因。

目前，反对两个中国政府的全部力量正通过自己的主要代表在上海集中。那里有孙中山及其第一次革命的拥护者，还有学生总联合会、工会和社会主义党。这些集团已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反对北洋政府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特点是具有坚定的革命精神。

为了再次概括我方才的全部发言，必须强调一点，目前中国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第三国际的代表大会应该极其严肃地注意这一事实。支持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本身，而且对全世界的革命运动都有重要意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深深扎根于亚洲，并将其帝国主义阴谋扩展到西伯利亚、太平洋的一些岛屿，甚至南美。目前，唯一能对抗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因素，就是中国劳苦大众强有力的革命运动。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几个文件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

我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以下的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提纲草案，请同志们讨论，并请全体同志，特别是具体了解这些复杂问题中的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同志，**以最简短（至多三两页）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评论、修正、补充或具体说明，尤其是关于以下各点：

奥地利的经验。

波兰犹太和乌克兰的经验。

亚尔萨斯—洛林和比利时。

爱尔兰。

丹麦和德国的关系。意大利和法国的关系以及意大利和斯拉夫的关系。

巴尔干的经验。

东方各民族。

同大伊斯兰主义的斗争。

高加索的关系。

巴什基里亚共和国和鞑靼共和国。

吉尔吉斯坦。

土尔克斯坦及其经验。

美国的黑人。

---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举行。大会开幕式在彼得格勒举行，以后各次会议都在莫斯科举行。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有二百多名，代表三十七个国家的工人组织。除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三十一个国家的）的代表外，参加大会的还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意大利和法国的社会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西班牙劳动民族联盟等组织的代表。

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在各国共产党力量迅速增长、革命路线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研究如何克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危险，确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原则、行动纲领和战略策略。

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大会前，列宁发表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重要著作，为大会做了思想和理论准备。在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列宁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在大会上对企图钻进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政党和中派政党展开了无情的斗争，对一些共产主义组织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和"左"倾宗派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列宁参加了下述委员会的工作：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土地问题委员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委员会。列宁提出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任务提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土地问题提纲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都被批准为代表大会的决议。

列宁被俄共（布）代表团推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第二次代表大会为制定共产国际的纲领、组织原则、战略和策略奠定了基础。——第315页。

各殖民地。

中国——朝鲜——日本。

尼·列宁

1920年6月5日

1.按资产阶级民主的本性说来，关于一般平等问题，其中包括民族平等问题的抽象的或形式的提法，是资产阶级民主所特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来大大欺骗被压迫阶级。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借口个人绝对平等，把这种思想变为反对消灭阶级的斗争武器。要求平等的真正意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

2.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斗争的自觉的代表者，它根据自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揭露其虚假和伪善的基本任务，在民族问题上也不应当把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作主要之点，而主要之点应当是：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一般人民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来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相对立，这种虚伪性蒙蔽着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强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绝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

3.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一切民族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面前，特别清楚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词句的虚伪性，在事实上表明，标榜为“西方民主”的凡尔赛条约是比德国容克和德皇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更加野蛮、更加卑劣地压在弱小民族头上的暴力。国际联盟和协约国战后的全部政策到处加强先进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使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幻想更快地破产，从而更清楚更尖锐地揭露了这个真理。

4.从上述的基本原理中就得出以下的结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

5.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除了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他们别无生路。

6.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实现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

7.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无论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过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芬兰苏维埃共和国、拉脱维亚苏

维埃共和国，现在的阿捷尔拜疆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中，或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部同从前既没有成立国家又没有实行自治的各民族（例如，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1919年建立的巴什基里亚自治共和国，1920年建立的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中，联邦制在实践上已经显示出它是适当的。

8．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是进一步地发展、研究以及用经验来检查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产生的这些新的联邦制。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须力求达到愈来愈紧密的联邦制同盟，第一、因为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最紧密的联盟，便不能捍卫被军事方面无比强大的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所包围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第二、因为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必须有一个紧密的经济联盟，否则便不能恢复被帝国主义所破坏了的生产力，便不能保证劳动者的福利；第三、因为估计到建立统一的，由各国无产阶级按总计划调整的完整的世界经济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继继发展而臻于完善。

9．在国家内部关系方面，共产国际的民族政策决不能象资产阶级民主派那样，只限于空洞地、形式地、纯粹宣言式地承认民族平等，在实践上却不负任何责任，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派，不管是坦率地承认自己是民主派，或者是象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那样，借社会党人的称号来掩饰自己，都是一样的。

不仅在共产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议会讲坛上和议会讲坛外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应当不断地揭发各资本主义国家违背自己的“民主”宪法，经常破坏民族平等，破坏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种种事实，而且还必须做到：第一、经常解释，只有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首先把无产者、然后把全体劳动群众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制度，才能实际上给各民族以平等；第二、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的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例如爱尔兰，美国的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

没有后面这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反对压迫附属民族和殖民地的斗争以及承认他们有国家分离权就仍然是一块假招牌，正象我们在第二国际政党那里看到的一样。

10．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用市侩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不仅是第二国际各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而且也是那些已经退出了这个国际的各政党中，甚至往往是现在自称为共产党的各个政党中常最见的现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内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这种祸害的斗争就愈会提到首要地位。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又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因此，在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拥有真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人政党的国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同歪曲国际主义的概念和政策的机会主义和市侩和平主义作斗争。

11．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首先是落后民族在殖民地关系或财政关系上所依赖的那个国家的工人，有义务进行最积极的帮助；

第二、必须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反动的和中世纪式的分子作斗争；

第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大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派别作斗争；

第四、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并且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必须特别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

第五、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集合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条件下，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第六、必须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以外，附属的和弱小的民族别无生路。

12.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对殖民地的和弱小的民族的压迫，使被压迫国家的劳动群众不仅憎恨而且不信任整个压迫民族，其中也包括该民族中的无产阶级。这一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正式领袖，在1914年至1919年曾经按照社会沙文主义的精神，借口"保卫祖国"来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迫殖民地和掠夺在财政上处于依赖地位的国家的"权利"，他们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卑鄙行为不能不加重这种完全合理的不信任心理。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和闭塞性就愈加厉害，而且这种情况必然使最深刻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狭隘性特别厉害和顽固。既然这些偏见只有在各先进国家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基础急剧改变以后才能消逝，那这些偏见的消逝，就不能不是很缓慢的。因此，各国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受压迫最久的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感情残余要特别慎重，特别注意，同样，为了更快地消除以上所指出的不信任心理和偏见，必须作某种让步。没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自愿追求联盟和统一的愿望，战胜资本主义这一事业是不能顺利完成的。

1920年6月发表

（按手稿刊印并根据列宁修改过的清样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4—130页）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同志们，我只预备简短地讲几句开场白，然后，由我们委员会过去的秘书马林同志向你们详细地报告我们对提纲的修改。在他以后，补充提纲的起草人罗易同志也要发言。我们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提纲初稿和补充提纲。这样，我们在一切最重要问题上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现在，我就来作几点简短的说明。

第一、我们的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要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要从具体的现实的各种现象出发。

我们看到，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有十亿以上，都是被压迫民族，他们的总数大概是十二亿五千万。我们把世界总人口算作十七亿五千万，他们就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他们有些是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关系中，有些是象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些则是被某个帝国主义大国的军队打败，由于签订了和约而深深地陷于对该国的附属关系中。把各民族区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这个思想贯串着整个提纲，不仅由我署名的、以前发表过的第一个提纲是这样，罗易同志的提纲也是这样的。后一个提纲主要是根据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的，因此，对我们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们提纲中的第二个指导思想就是：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哪怕这个问题谈的是世界上某个最遥远的角落。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

第三、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某些意见分歧。我们发生争论的地方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样说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正确。讨论的结果我们一致决定：不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说民族革命运动。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说，如果它在这种国家里能够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但是当时在委员会里有人反对说，要是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就抹杀了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一切区别。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这种区别最近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极力在被压迫民族中培植改良主义运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家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虽然也支持民族运动，但同时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在委员会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所

以我们认为，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字样几乎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我们这样修改的意思是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的英雄们也属于这种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国家里已经有了改良主义的政党，这些党的代表人物有时也自命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上面指出的那种区别现在已经贯串在整个提纲里面了，我认为，这就更确切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

其次，我还想对农民苏维埃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俄国共产党人在以前属于沙皇的殖民地里，在象土尔克斯坦这类落后国家里进行的实际工作向我们提出过在资本主义前的条件下如何运用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因此，还谈不到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些国家里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尽管如此，我们在那里还是担负起了领导者的作用，并且也应该担负起领导者的作用。我们的工作表明，在这些国家里一定要克服巨大的困难，而我们工作的实际结果也表明，在这些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尽管有这些困难，仍旧可以在群众中激发起独立思考政治问题、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愿望。这个工作对我们比对西欧各国的同志们更困难些，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正忙于国家工作。显然，处于半封建依附地位的农民能够出色地领会苏维埃组织的思想，并且在实际中很好地运用它。同样明显，那些不仅受商业资本剥削而且也受封建主和封建国家剥削的被压迫群众，是能够在本国的条件下运用这种武器和这种组织形式的。苏维埃组织的思想很简单，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虽然还不很丰富，但是委员会里进行的有殖民地国家的几个代表参加的讨论，完全无可辩驳地向我们证明，在共产国际的提纲中必须指出，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并且指出，无论在落后国家或者在殖民地，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无条件地应该普遍宣传关于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的思想；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他们就应该立即设法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

现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而又十分重要的领域。在这方面我们的一般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我们会逐步地积累起更多的材料。毫无疑问，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胜利了的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并且能够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目前的阶段。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不但对我署名的提纲，而且更多地对罗易同志起草的提纲进行了相当热烈的讨论（罗易同志还要在这里作些说明），并且一致通过了对后一个提纲的一些修正。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对于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国苏维埃政府以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末，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

组织农民苏维埃，设法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必须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不可能预先指出。实际经验会给我们启示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最遥远的民族中的全体劳动群众对于苏维埃思想也是很亲切的，苏维埃这种组织一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共产党应该立刻在全世界开始这方面的工作。

我还想指出共产党不仅在本国进行革命工作的意义，而且在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工作的意义，特别是在剥削民族用来控制其殖民地人民的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的意义。

英国社会党的奎尔奇同志在我们委员会里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普通的英国工人会认为，援助被奴役的民族举行起义反对英国统治是叛变的行为。的确，有侵略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的英、美工人贵族对社会主义是最大的危险，是第二国际最有力的支柱，这就是属于这个资产阶级国际的那些领袖和工人的最大叛变。第二国际也讨论过殖民地问题。在巴塞尔宣言上关于这个问题也说得十分清楚。第二国际的党也表示要本着革命精神进行工作，但是，我们看不到第二国际的党做了什么真正的革命工作，也没有看到它们援助被剥削附属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起义，我认为，大多数已经退出第二国际而希望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公开地说出这一点，这是无法驳倒的。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人想来反驳。

这些看法就是我们决议的基础。无疑，这些决议是太长了些，但是我相信它们毕竟是有用处的，它们将有助于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开展和组织真正革命的工作，这也就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精确规定共产国际与政治上被压迫而且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例如中国与印度）内的革命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世界革命历史正经历着这样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正确理解这个相互关系乃是必要的。欧洲大战及其后果明显地表明了：非欧洲被压迫各国的人民群众与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集中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例如，殖民地军队与大批工人队伍在大战期间之派至前线，即其表现。

（二）欧洲资本主义主要不是从工业的欧洲各国，而是从自己的殖民地汲取自己的力量。为着它的存在，必须控制广大的殖民地市场和必须有广阔的剥削场所。英国——帝国主义的堡垒——一百年来遭受着生产过剩的痛苦。倘若没有在销售商品与同时供给原料上所十分必需的广大殖民地，英国的资本主义也许早已垮台了。英国帝国主义使亚洲和非洲几万万居民处于奴隶地位，同时又使本国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

（三）从殖民地所取得的额外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财力的最主要源泉。欧洲工人阶级只有在这种源泉完全枯竭时，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应该说不是毫无结果地）恢复自己业已动摇的地位，其办法就是对殖民地的人的劳动与天然财富加以广泛和紧张的剥削。由于对殖民地居民的剥削，欧洲帝国主义才能够给与欧洲工人贵族以好些赏礼。欧洲帝国主义一方面企图将殖民地各国工人低廉劳动所生产的商品输入到大陆以减低无产阶级仅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同时资产阶级甘愿牺牲本国内所得的额外利润，只要是能保存从剥削殖民地所得的额外利润。

（四）殖民地的分离和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推翻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共产国际应当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共产国际应当与目前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压迫各国参加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保持密切的接触。为了世界革命的完全成功，这两种力量的共同行动是必要的。

（五）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集中化了的意志。它的使命是组织全世界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传播共产主义。共产国际是一个战斗的单位，它应当把全世界各国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

彻头彻尾为资产阶级文化所渗透而由一撮政客所领导的第二国际，不曾估计到殖民地问题的全部重要性。对于第二国际，欧洲以外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欧洲革命运动与其他各洲各国革命运动相互呼应的必要，对于第二国际是不明了的。不给殖民地革命运动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帮助，第二国际的成员们自己已成了帝国主义者。

（六）强制地向东方各民族移植的外国帝国主义，无条件地阻止了他们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剥夺了他们达到欧美已经达到的水平的可能性，因为帝国主义的政策力求阻止殖民地工业的发展；本来意义下的土著无产阶级，只是不久以前才存在的。

地方的、零散的家庭手工业，已让位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集中化的工业，因此极大多数的人口不得不从事农业并把原料输出到国外去。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土地很快地日益集中于少数大地主——资本家和公家手中，这大大促进了无土地的农民数目的增加。这些殖民地的极大多数居民都处于被压迫的状态中。由于这种政策的结果，人民群众中的处于潜伏状态的反抗精神，只是通过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中等阶级表现出来。外国的压迫始终妨碍着社会生活的自由发展；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的压迫。这样，帮助推翻外国统治的斗争，并不是赞成土著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趋向，而只是给殖民地无产阶级开辟一条达到其解放的道路。

（七）我们可以指出相距日远的两种运动的存在。其中之一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运动，其纲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实现政治的独立；另一个是贫穷和无知的农民和工人群众争取自己从一切剥削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第一种运动企图控制第二种运动，并且往往得到成功；但是共产国际应当反对这一类的控制，促进殖民地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发展。因此，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但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则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这样，在落后的国家内，人民群众之加入共产主义，将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由于先进国家觉悟的无产阶级领导下阶级的自我意识之发展。

（八）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实在力量、基础，并未封锁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者狭小

范围以内。在大部分殖民地中已经存在着有组织的革命政党，这些政党在与工人群众的密切接触中工作着。共产党应当通过这些政党或团体与殖民地里的革命运动发生接触，因为它们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目前它们人数不多，但它们是群众意志的表现，领导群众走向革命。

帝国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应当与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作中有密切的接触，通过它们给予一般革命运动以物质的和精神的帮助。

（九）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时期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要是它从头起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那末革命群众，由于渐次地获得革命经验，将走上达到所抱目的的正确道路。倘若力图用纯粹共产主义的原则来解决土地问题，那会是完全错误的。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殖民地革命应当按照带有纯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各点的纲领去进行，如分配土地等等。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殖民地革命的领导应当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相反地，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加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最初的可能之下创立工农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将与进步的资本主义各国的苏维埃共和国平等地工作，以便完全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①

---

① 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0—53页。——编译者

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

（一九二一年六月）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的春天到达了伊尔库次克，为了与东方书记处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书记处指示他准备一个报告，并在即将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交出来。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代表杨和德(音)也来到了伊尔库茨克。这两个中国人和远东书记处的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决定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中国支部。在一次会议上，张太雷提出了这个支部的主要任务如下：

（1）兹建立（设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以关照解决涉及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系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

（2）由两个书记负责这个支部：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出任此工作的代表，另一个代表由远东书记处派出。

（3）按照常例，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要成为第三国际属下的支部，中国支部也隶属于共产国际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之间的关系也必须遵循同样的组织联系的原则，即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全体成员，应由驻远东书记处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属的各地区代表组成，这个支部本身隶属于远东书记处。

张太雷和杨和德于一九二一年六月离开伊尔库次克，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原载〔苏联〕《革命的东方》一九二八年第四——五期，第二一六页。本文据尤登与诺特合著《苏俄与东方》一九五七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第一三九——一四〇页译出。高欣译　高定安校。选自《“一大”前后》〔三〕）

〔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出关于建立远东书记处的决议。书记处驻在地择定为伊尔库茨克。

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过了几天我就前往住所。

从莫斯科到伊尔库茨克，当时即使坐火车也要花费两周左右的时间。1921年8月我抵达该处，书记处的成员已最后确定，全体工作人员也已配备齐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主持书记处工作。组织问题方面他的副

* 题目是编者加的。

手是明斯克尔，书记处的成员有：维经斯基（吴廷康）、国际妇女书记处代表勒柏辛斯卡雅、青年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即本书作者、办公厅主任——布卡蒂。

鲍里斯·扎哈罗维奇·舒米亚茨基（安德列·契尔沃纳）是远东本地人，1886年生于上乌丁斯克（今乌兰乌德）。他在十二岁时就被父母送到赤塔去做工。很快他就在铁路工厂工作了，在那里他结识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十七岁的舒米亚茨基入了党。1905年革命期间他已经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人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了。起义遭镇压后，他隐蔽起来，后来流亡到阿根廷。1913年返回俄国，但很快就被捕了。

二月革命以后，舒米亚茨基成为西伯利亚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领导者之一，他做为该地区的代表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在高尔察克反革命叛乱期间，舒米亚茨基从事地下工作，组织游击运动。粉碎高尔察克以后，他被任命为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委员，后来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人，同时兼任第五军革命军事政治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消灭恩琴（翁格尔恩）男爵白卫军反革命叛乱的战役。当时舒米亚茨基三十五岁。他身着军装，穿一件骑兵的长大衣，戴着布琼尼式军帽。他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党的战斗工作。虽然我们参加革命运动时也与他的年龄相仿，但和他相比，却还是年轻人。问题不在他比我们大十——十五岁，而是因为他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05年就曾积极参加了武装起义。虽然如此，舒米亚茨基总是很平等地与我们交谈。同时，我们总觉得，十月革命的胜利、粉碎高尔察克反革命叛乱，也是他本人的胜利。因为他整个一生已经和革命事业紧密地连在一起了。他总是高昂着头，脸上显出一种不可一世的神情。其实他是一个质朴、平易近人的同志。他一心为党、为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利益而奋斗。

明斯克尔于1891年诞生在基辅的一个工人家庭里。1911年，他二十岁时加入社会革命党。一年后，他因从事秘密活动被捕，并被判处终生流放西伯利亚。他在狱中和流放地常常与社会民主党人往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1917年3月，明斯克尔在伊尔库茨克被选进工农代表苏维埃，十月革命以后，他脱离了社会革命党并在1917年12月积极参加镇压伊尔库茨克士官生的反革命叛乱，为此他被社会革命党开除。

1918年，明斯克尔当选为西伯利亚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被选进中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年8月，由于白匪逼近伊尔库茨克，他和中西伯利亚人一起先撤到上乌丁斯克，后又撤到赤塔。白匪占领赤塔后，他转入地下。1918年11月辗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1月，他被白匪的反间谍机关逮捕入狱，一直被关押到1920年1月底，才被起义的工人和游击队释放出来。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红旗报》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后来，被俄共（布）滨海边区委员会派往哈尔滨，到中东铁路职工中开展工作。他作为俄共（布）滨海边区委员会的全权代表，领导哈尔滨的党组织。

1921年，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的决定，明斯克尔被调离哈尔滨，先到赤塔，后被派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担任舒米亚茨基的副手，直到1922年2月。

我在伊尔库茨克时，格里戈里·维经斯基（吴廷康）是二十八岁。晚些时候我和他在莫斯科共事，我们住在特维尔大街卢克斯饭店①（今高尔基大街上的“中央”饭店）同一条走

① 即Luxe，亦可意译为“豪华”饭店。——译者

廊上。当时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都住在那里。

维经斯基出身于小职员家庭。贫困迫使他在初小毕业后就到印刷厂去做排字工，以后当会计。最后，在1913年他二十岁的时候，到美国去谋生。1915年他在美国加入社会主义政党。十月革命以后，维经斯基于1918年春回俄国，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他立即加入了共产党。国内战争使他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来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高尔察克反革命叛乱期间，他从事地下工作，参加了反对高尔察克的鄂木斯克起义。击溃白匪军以后，他又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反革命暴动发生以后，他被白匪逮捕并流放到萨哈林岛服苦役。推翻白匪政权后，维经斯基于1920年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他有在高尔察克后方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并通晓英语，这便预先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他和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马马耶夫一起被派往中国。在北京萨赫扬诺娃与他们会合了①，她也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

在北京大学两个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伊文）的协助下，维经斯基首先在北京认识了李大钊，后来在上海认识了陈独秀。他们二人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是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共产国际的创建，向殖民地人民发出了为争取解放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号召，引起了全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在中国，这个高潮的标志是1919年汹涌澎湃的"五四"学生运动，斗争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帝国主义。最革命的分子从这一运动的左翼分化出来，他们在第二年联合起来建立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于是，在反帝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决条件成熟了。这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和共产国际建立积极而直接的联系，了解它的纲领和组织原则，汇入到世界工人运动的总潮流中去。在这方面，白卫军成了障碍，他们使中国和苏俄的联系中断了好几年。但是，高尔察克反革命叛乱一被击溃，苏俄与中国边界连接起来，中国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就变为可能的了。

维经斯基有幸成为1920年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直接联系的第一个苏联党员。李大钊和陈独秀周围已团结了一些革命学生小组。维经斯基帮助这些小组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巩固下来，建立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在1921年7—8月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春，维经斯基、库兹涅佐娃和萨赫扬诺娃从中国回到伊尔库茨克，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

在勒柏辛斯卡娅到伊尔库茨克以前，库兹涅佐娃致力于妇女运动问题。萨赫扬诺娃是布里亚特族人，她专门研究蒙古问题。

我想说几句关于国际妇女书记处代表勒柏辛斯卡娅的情况。她出生在一个侨居国外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里，在英国长大。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这是一个非常美丽、衣着雅致的妇女，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年代里，女共产党员和女共青团员都是军人打扮，尤其是在西伯利亚。冬天戴护耳皮帽、穿皮短大衣、毡靴。夏天的打扮是红头巾、军便装、士兵的皮带、长统靴。至于时髦，当时没人谈论，也没有人去想。当年谁也不会从外

① 维经斯基偕库兹涅佐娃与萨赫扬诺娃一起很快就去上海了，马马耶夫留在华北。萨赫扬诺娃在上海同朝鲜侨民中的革命者建立了联系。

表上怀疑她不是布尔什维克。无论从外貌、气质和通晓英语的程度上，都难以找到一个比她更合适的女同志到上海去工作了。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勒柏辛斯卡娅被派往中国，在那里她从事革命妇女运动问题的研究。（十年以后，我和她在国际列宁学校相遇，我们两人同在该校任教，勒柏辛斯卡娅在那里用英语讲授英国工人运动史。）

布卡蒂1890年出生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的父亲是立陶宛人，1863年因参加起义而被沙皇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母亲是西伯利亚本地人。1905年布卡蒂在两年制技工学校毕业后，进铁路总厂当工人，直到1912年应征入伍。

早在1905年，他还很年轻时，就参加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人的武装起义，为此被捕，并坐了一段时间牢。直到应征入伍前，布卡蒂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布尔什维克党人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地下组织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17年6月，他在前线入党，并在军队里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中工作。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他回西伯利亚，到了伊尔库茨克，在高尔察克的后方与白卫军进行了积极的斗争。1919年9月被捕，但同年12月就被起义的工人解放出来。

红军占领伊尔库茨克以后，布卡蒂担任东西伯利亚军的政委，后任伊尔库茨克省委副主席。1921年4月他被调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他与苏赫巴托尔共同担任领导，在蒙古打败了恩琴。1921年10月底，布卡蒂回来以后，就筹备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

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依靠的是各国支部：日本、朝鲜、中国和蒙藏支部。这些支部都由本国共产党人主持。通过任何决议，都要有他们直接参加。

各支部中还有苏联工作人员。机关人选配备得当。一部分是革命后从美国回来的俄国侨民；另一部分是长期生活在满洲的人，那里有相当多的俄国人，主要集中在哈尔滨，或多或少地都能讲汉语；第三部分人曾在莫斯科或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研究机关专门学习过地理；第四部分是党的专职工作人员，他们已具有在革命前的俄国或在白匪后方做地下工作的经验。

书记处里最大的是朝鲜支部。日俄战争后，朝鲜被占领，并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很自然引起了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1919年3月爆发了朝鲜人民自发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起义，后被残酷镇压下去。

三月起义以后，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内部的阶级分化开始了。资产阶级、地主分子聚集在所谓的上海政府周围，革命民主主义者同旅俄共产主义组织建立了联系。当时在俄国，特别是滨海边区有许多朝鲜侨民。

远东书记处的朝鲜支部，在建立和联合朝鲜本土的、旅居中国和俄国的朝鲜共产主义组织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记得朝鲜支部的许多工作人员有韩满申①、谢列勃里亚科夫（金满根）②和太洪。后者从事青年运动。

1921年5月，朝鲜共产党在伊尔库茨克举行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在朝鲜、中国和俄国工作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八十五名代表。舒米亚茨基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向大会致辞。

在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工作的，先是张太雷，后来是张国焘。张太雷于1921年3月到达伊尔库茨克。几个月后他出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

①② 音译。——译者

代表大会。这两次代表大会之后，张太雷回到中国，筹备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工作。张国焘很快来到伊尔库茨克代替他。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被选进中央局。同时他接到中国共产党的委任书，作为该党代表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

在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工作的还有一些苏联同志：阿勃拉姆松、马马耶夫、克利莫夫、多比索夫、达维多维奇等。

最大的困难是同日本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辛亥革命的失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和俄国的国内战争，狂热地觊觎远东。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已把整个满洲抢到手了。在苏联的远东，日本依靠匪首谢苗诺夫的白卫军，支持并组织俄国的反革命势力，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着滨海边区和阿穆尔省，派军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最后在蒙古扶植起自己的走狗恩琴男爵。

笼罩着日本的沙文主义狂热、国内反动势力的猖獗、压制日本工人运动、残酷地镇压革命组织都给处在十分严密的地下状态中进行活动的日本共产党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远东书记处到底还是和他们建立了联系。日本支部的工作由前来伊尔库茨克的田口主持。

1921年2月，反抗恩琴白匪军占领蒙古的运动，是蒙古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早在1921年3月，蒙古人民党就在恰克图举行代表大会，提出了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

由于中国的反动派一直把蒙古看成是自己的领土，并打算派兵前往，人民党就此事向中国人民发出了呼吁。

布里亚特共产党人在蒙古人民党及以后的革命青年联盟的创建中起了很大作用。在远东书记处蒙藏支部工作的有丹契诺夫、萨赫扬诺娃、科尼亚耶夫、纳佐夫、伊希多尔任、鲍里索夫以及尤金和斯塔尔科夫（扎里克托），他们在粉碎恩琴以后，曾在蒙古工作。

舒米亚茨基曾积极地参加蒙藏支部的工作。在建立自由的蒙古国家的过程中，他给人民党以很大的帮助。后来他被选为蒙古的荣誉公民不是偶然的。

远东书记处出版了铅印的机关刊物《远东人民》。这是一本内容丰富的杂志，它经常刊登有关日本、中国、朝鲜、荷属印度（印度尼西亚）甚至澳大利亚等国经济方面的文章，以及这些国家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状况及革命运动的资料。书记处情报部工作人员斯列帕克、佩尔林、考夫曼、拉依戈罗茨基专门为这个杂志准备材料。

当我到伊尔库茨克的时候，远东书记处的一名女工作人员，伊尔库茨克女共青团员柳托姆斯卡娅已经在从事青年运动了。现在她正投入远东革命青年组织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远东人民》第一期上，刊登了青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向中国、朝鲜和日本青年团发出的呼吁书，吁请参加远东各民族和青年革命组织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全体工作人员热情奋发地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任务。不仅要和日本、朝鲜、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取得联系，而且要同朝鲜、中国的工会，同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所有组织取得联系。这一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当时日本是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最反动的国家之一。在朝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任何行动都遭到极为严酷的镇压。至于在中国，则是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地方上的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共同对付革命运动。

日本依靠白匪残部，于1921年5月26日在滨海边区进行反革命叛乱，推翻了当地远东共

和国的政权，建立起日本的傀儡政权——大资产阶级、投机商麦尔库罗夫兄弟的政权。1921年12月29日，白匪占领了哈巴罗夫斯克。

1921年中期，麦尔库罗夫的叛乱切断了滨海地区与远东共和国及苏俄的联系。因为叛乱，代表们无法经海路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只剩一条路，即假道满洲，再前往赤塔和伊尔库茨克。满洲到处是白卫分子、日本部队、警察等等。必须在上海、北京、哈尔滨建立联络点，保证代表们前往苏俄。尽管困难重重，这项工作还是进行得很顺利。

在这件工作中，舒米亚茨基的妻子丽娅·伊萨耶芙娜起了很大作用，她在远东书记处主持国际联络部。对于这方面的工作，她是很有经验的。舒米亚茨卡娅从1905年起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员，十六岁时参加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武装起义，曾被捕，但因未成年而获释。以后，在苏维埃政权胜利前的那些年代里，她一直在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下印刷所和秘密联络点工作，与同高尔察克进行斗争的游击队进行联系。这就是这位善良、出众的女性的革命经历。

虽然困难很多，但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结束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担负的这个任务也完成了。

（选自〔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张太雷（中国）：同志们！我想向你们介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况及其反帝革命斗争的全貌。但时间不允许我这样做。在五分钟的时间里，我只能向大家指出远东的运动对于世界革命的意义。

日本帝国主义是远东最近期间内必须解决的一个相当紧要而又迫切的课题。在没有解决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将经常威胁着苏俄，使远东国家不能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前进。但还不只于此。战后日本几乎也成了英美那样的资本主义强国。如果帝国主义的日本，象它现在在华北那样能够控制全中国，那它就会利用这个国家的富饶资源和人力去反对无产阶级，从而必将对世界革命造成威胁。因此，我请求共产国际和西方各国共产党更加关切远东的运动，并给予更大的支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将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三大台柱之一已经垮台。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打败世界资本主义，而且只有那时，世界革命才算完成了任务。

如果你们对中国有一定的关注，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力量必定会在这一伟大事业中给予我们相当大的帮助。现在正是我们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时机。那里的青年学生们已行动起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其中许多人徘徊于歧路上，所以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把他们引导到共产主义方向。我们应该把这些力量引上正确的轨道，不让无政府主义或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他们。中国工人在无产阶级革命后也已开始觉醒。罢工在中国各地司空见惯。我们应该用红旗去保护这些萌芽，不使其变为黄色。还有另外一支革命力量，这就是在中国老百姓中占有相当数量的“流氓无产阶级”。虽然他们没有阶级自觉，但他们还是有革命性的。如果我们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吸引到我们队伍里来，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会支持我们的事业。这是一些很好的战士，他们在俄国红军反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斗争中已经露了锋芒。但是，如果世界资本主义把他们招募去，强迫他们去打无产阶级，就象俄、法帝国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利用他们去修战壕，或如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利用他们在满洲和山东为推行其政策服务那样，那他们境遇之险恶是可以想象的。

在今后的世界革命中，中国富饶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劳动力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还是被无产阶级用以反对资本家，这一点则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但是不应该忘记，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运动的关注。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

远东困厄的人民呵！

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安南，太平洋群岛和南洋群岛各地的工人们和农人们呵！

远东各国被奴视的人民呵！

你们困厄于欧美和日本强盗们摧残与劫掠之下，已是好多年了。遍朝鲜全境，都被日本侵略屠杀的血淋湿了。日美英法的强盗们正抢夺着四百兆人民的中国，以中国人民的血和泪来造成他们生活的甜适。这些强盗们并不将被压伏的民族当人类看待。他们所图谋的只是利益，只是黄铛铛的金子，为了诛求这些，几百兆人民的生命——在他们眼里——真不值什么。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汉城等地外人居留地的公园和公共场所，中国人与朝鲜人和狗一例的被禁不得入内。但在这些地方靠着你们血和汗吃成很肥的外国资本家们，他们出门乘人力车子却要顺他们兴的奔驰，若是稍不当意，他们不是足踢便要手打了。中国的苦力——世上最受富人们掠夺和压迫的奴隶——迫而为这些强盗们勤苦一直到死，在工忙的时候，中国农人们要一天做十六个钟点的工作，甚而至于十八个钟点，但享受他们的劳力的收获的却是外国的投机家，吸血的人们和他们的走狗。穷苦的朝鲜人民都没有土地，土地是在日本拓殖公司和资本家手里，他们以枪刺和弹丸来威迫着朝鲜人民替他们做工。如有一语反抗，如有一点失望的表示，便要有成千百的人被日本人屠杀了；这些正和在菲列滨，台湾，安南及南洋群岛的情形一样，也正和他们的近邻印度的情形一样，三百兆的印度人民久本已是扼迫在英国残酷的拘禁之下，为种米棉和咖啡的奴役了。蒙古努力从资本主义保护者的日本扼迫之下得着解放，但不过是着手还不久。日本统治阶级是远东的屠户，在这儿的劳动者——在田间或工厂——他们的生活简直和畜类一样。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听见几百万人被压迫的呻吟。压迫别人的人们决不是埋没被压迫民族自由和独立的请求。

这是最近才经过的事情，这些强盗们集合在华盛顿——美国交易空气的浓荫里，图谋成功一个结合更有力的来侵略远东各民族。这次会议的结果就是他们已结成了他们图吸血者的同盟。朝鲜，东部西伯利亚及满洲一这几处他们已久许日本独吞了；对中国他们所采用的，便是他们一切抢夺利益的分配要有个协调，而且承认在这个恶毒的侵略里是让美国资本来做领袖。一九一八年美国所倡议之银行团，他的目的是在将中国制造美国的纳贡藩属，中国的农人是要纳田赋给美国银行；同时中国的实业也入于美国人手经营。不是因为强盗们利益自相冲突和中国人民一致反对的缘故，这个企谋那时并没有成功。但是现在他们要组织一个新银行团，一个国际托拉斯来做中国军事财政实业的侵略了。英美日法在太平洋上因势力冲突而即将现在目前的战争是暂时延期了。但是他们只是将他延期了，并不曾将放弃。他们所以将这个战争延期，完全是要并力来苟延他们抢劫的残喘。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使这些强盗们的座石根本摇动了。欧洲工人革命

已扼着他们喉头，来数他们的罪恶了。他们做了四年图谋颠覆苏维埃共和国——全世界被压迫和被掠夺的人们的祖国——的工作，最后他们却不得不承认他的强盛和他们自己想征服苏维埃的失败。但是他们企图恢复他们已零落了的势力，现在正计算着远东；要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和我们的势力做达到他们目的的代价了。

他们准备好要加我们——奴隶的，而还忍耐着的远东惇厚的人民——以新的锁练，新的恐怖，和更新的虐待了。

我们不让这个，到何时也不让这个。我们要自己做我们自己命运的主人了；我们再不是别人俎上的肉、不再要供帝国主义者们任意宰割了。

国际共产党早已向世人呼着：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们联合起来呵！"

我们准备着要去将这样呼声传到我们穷苦的乡村，传到为人奴役的田场，传到我们的工厂，传到我们的学校，传到我们的兵房。

我们会集我们在苏维埃共和国两个赤色的都城——莫斯科和彼得格拉，为了要从这个"世界的讲台"提高我们反对世界的刽子手们的呼声，提高我们反对华盛顿吸血者的四国同盟。

我们签名的：四百兆被压迫人民的中国代表——工人农人及学界民主革命团体代表，国民党代表，南中国代表，革命团体代表省的有湖南，山东，安徽，广东，浙江：代表城市的有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太原，杭州，唐山，少年中国会，各地工会，各铁路工会，中国共产党，女界联合会，代表民主报纸的有民国报社代表，太平洋与中国杂志社代表。

帝国主义的日本的被压迫的劳动群众代表——劳动社代表，日本工会左翼代表，东京，大阪及九州各地印刷工会代表，坑夫联合会代表，日本劳动报社代表，日本共产党。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朝鲜代表——大韩劳动社，细道（译音）劳动组合，韩国共产党，韩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韩基督教联合会，大韩光复社，大韩革命军，全韩青年联合会，留华韩国学生会，留日韩国学生俱乐部，韩国学生总会，大韩独立报社，解放后的蒙古代表——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革命青年会。在美英荷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荷兰印度各处代表，萨里落特伊斯棱会左翼代表，赤色荷兰印度工会同盟，荷兰印度共产党。

我们要的是平等，自由和独立。我们向我们不破坏自己利益的人们高呼，我们向以受压迫人们利害为关与人们高呼，我们向受虐待而却不愿再继续下去做奴隶的人们高呼，我们高呼要他们来承担这个合法战争的重任。

我们知道，我们的自由不是能从仇人手里得来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解放的战争是要经过大努力和大阻难的。但我们要生存，我们将以武力夺回我们应享的权利，我们决不退缩，我们有几百兆，在我们边的是大多数，我们团结起来是有很大的力量。

我们要对英美日法和其他的世界强盗们宣布一个"死生以之"的战争，我们要对剥削中国的中国军阀宣战，我们要对日本武人和官僚宣战，我们要向努力使中国和朝鲜……太平洋群岛，安南和荷兰印度脱离束缚呵——使远东脱离束缚呵！

我们日本的工人们伸亲爱的手给中国和朝鲜受压迫的群众。日本帝国主义所凭藉的刀要在日本无产阶级手中折毁了。

从今天起，我们将我们远东受压迫群众不可破分的联盟确立在共产党国际旗帜之下。

我们定要得着解放。我们要战胜压迫我们的人们，来建设一个公平劳动的制度；我们要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将权力握在我们——工人和农人，自已手里。

坚切的团结起来呵！加入我们赴战的行伍呵——我们工人和农人要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准备这个战争——反对华盛顿匪党；反对吸血者的四国协定！远东受压迫人民联合万岁！共产党国际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呵！

（《先驱》第十号，1922年8月10日出版）

〔附〕 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

1920年9月，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曾在巴库召开。各国代表约一千九百名出席了大会。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叙利亚、巴勒斯坦、印度、埃及都有代表参加。同时参加大会的还有刚刚从外国干涉者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阿塞拜疆、达格斯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费尔干、布哈拉、希瓦、巴什基里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喀尔梅克劳动人民的代表。参加大会的有朝鲜人、中国人，但主要是旅俄的侨民。国内战争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还未结束，这是蒙古、布里亚特、中国、朝鲜和日本没有派代表出席巴库大会的实际原因。

因此，1920年底产生了召开一个与巴库大会相类似的特别代表大会的想法，这个大会叫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鉴于太平洋地区所形成的形势，在1921年召开这样一次代表大会就成为特别急迫的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扩张和侵略的规模已经很大，成了远东各民族最大的威胁。

我们已经说过，日本是盘踞在蒙古的恩琴的后台。现在男爵穿上了蒙古长袍，自称为佛教徒和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并扬言其目的是要占领从布里亚特到主要是喀尔梅克人栖居的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地带。

1921年5月，恩琴白匪军入侵苏俄领土，力图窜到西伯利亚大铁路，以便向上乌丁斯克推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指挥恩琴的行动，同时唆使滨海边区和阿穆尔省的白匪积极活动。

红旗军第五军的部队奉调出师镇压恩琴，粉碎了白匪并活捉了男爵本人，把他押解到伊尔库茨克，很快就在挤满人的话剧院大厅里公审。恩琴给人以狂躁的印象，难怪人们称他为“疯男爵”。

日本帝国主义夺取蒙古的企图破产了。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阴谋。恩琴被歼以后，独立的蒙古国家就成立了

俄国远东出现了复杂局面。为了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1920年苏俄和日本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国家，即民主的远东共和国，首都是赤塔。这里通行的只有沙皇时代的金币和银币，私人店铺仍在营业。政权都在劳动人民手中。远东共和国的版图从贝加尔湖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远东共和国开始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已恢复了与哈尔滨的铁路联系。以老革命家优林（金托夫特一捷瓦尔托夫斯基）为首的使团已前往中国。他长着浓密的连腮胡，贵族似的相

貌，态度谦和。他和别人不同，是民主共和国的代表。

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没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依靠白匪的力量，到1921年底实际上掌握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哈巴罗夫斯克这带地方。这样，当时日本的统治就扩展到了朝鲜、台湾、整个满洲、蒙古和俄国远东，形成了一个地域广袤的帝国，它威胁着苏俄和中国。这就是1921年的远东形势。

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触犯了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正实行转折，从孤立主义转而实行对外的经济和政治扩张政策，并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插足太平洋彼岸。九国华盛顿会议订于1921年11月11日开幕。帝国主义列强希望调节他们在远东的矛盾。日本的算盘是，它在俄国远东及中国占有的土地越多，在谈判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

很明显，在华盛顿会议上，美日互相矛盾的利益必定会发生冲突。美国力图改变力量对比关系使其有利于自己，同时企图博得中国和朝鲜人民对它的同情。实际上是想以一个大国的统治取代另一个大国，或者至少是削弱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而加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

当时，朝鲜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幻想着美国能担负起"解放"远东的"使命"，即希望它把日本人赶出朝鲜、满洲、蒙古，把中国从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因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们对华盛顿会议寄以很大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听取日本、朝鲜、中国、蒙古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意见，用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对抗华盛顿会议。初步决定这次代表大会于11月11日，即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同一天，在伊尔库茨克开幕。

1921年10月，代表们就开始陆续到达伊尔库茨克。他们历经艰难，辗转前来。相当大的一部分代表12月初才到达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大会会址迁往莫斯科，这就赋予大会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

1921年12月底，一列专车载着全体代表、远东书记处成员及一些工作人员驶向莫斯科。

代表大会共有一百五十名左右有表决权或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各种政治流派的组织：从共产主义组织到宗教组织，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把所有的组织团结起来了。前来参加大会的还有工会代表。大约有一半的代表，是共产党员或革命青年组织的成员。

大会开幕前，与会者已到齐的时候，大会的名称有了变动。《真理报》在《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的标题下，刊登了有关这次大会的消息，而1922年共产国际出版了题为《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资料汇编。这一名称更符合大会的特点和与会者的成分。

朝鲜代表团的人数最多，其次是中国。获得独立的蒙古也有两个组织的代表参加：人民党和革命青年联盟。荷属印度的一名代表也出席了大会。

日本代表参加了大会工作，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日本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已代表本阶级同朝鲜、中国的劳动人民结成了联盟，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工人运动的老战士片山潜参加了日本代表团，也使日本代表团赢得了极大威望。片山潜于1921年12月首次来到莫斯科，这时他已被选进代表大会名誉主席团。

除了这些代表团以外，亚库特、布里亚特和喀尔梅克劳动人民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22年底，俄国的远东地区还没有完全消除白匪军和日本武装干涉者，日本帝国主义正在酝酿一个计划，企图把亚库特人、满洲人、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和喀尔梅克

人联合起来，建立“泛蒙古国”。这个日本保护下的“泛蒙古国”，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幻想。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期间，符拉迪沃斯托克还在日本干涉者手中，而帝国主义的日本威胁着亚库特、布里亚特、喀尔梅克各族人民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民族的代表参加大会是完全合理的。

1922年1月21日，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隆重开幕。片山潜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加里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洛佐夫斯基代表红色工会国际，许勒代表青年共产国际致了贺辞。

日本、中国、朝鲜和蒙古代表致了贺辞，另有罗易代表印度共产党、卡尔代表美国共产党也致贺辞。因此，大会开幕式开成了亚洲、欧洲和美洲劳动人民展示国际主义团结的大会。

大会的工作会议是在萨多沃—卡列特纳亚大街苏维埃大厦三号的一个大厅（现在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大厦）举行的。

大会正式开始时先是形势报告。报告的中心内容，是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华盛顿会议（该会在1922年2月结束）问题。

果然不出所料，华盛顿会议正是在这种标志下进行的：美国、日本的矛盾已尖锐化，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与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关系。德国战败，而日本则想趁机攫取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美国大发战争财，从欧洲的负债者变成了债主。

1922年1月底，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进行期间，华盛顿会议的基本结果已经明朗。对朝鲜和台湾，会上未置一辞。各帝国主义国家从而确认了日本占有这些领土。美帝国主义迫使英国解除了它和日本的军事同盟，并强迫日本把它占有的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还给中国。但是，华盛顿会议却未涉及英、法、葡在中国的殖民地。

美国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即取消欧洲列强对华资本输出和贸易特权。但是华盛顿会议把归还中国海关和关税收入的问题束之高阁，恰是这笔收入保证了外国向中国提供贷款。由于苏俄的力量已增长，国际帝国主义矛盾的加剧，美国、日本被迫接受会议的决议，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撤军。

美国迫使日本退出远东，但这种情况并未缓和日美之间的矛盾，而只能使之更加尖锐化，从而导致二十年后他们之间的战争。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谈到了不可避免的战争。说实在的，当时都认为这场战争再过五年或八年就要爆发。

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专门决议，强调“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有效途径，是远东各国劳动群众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只能和他们结成联盟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

决议不仅提出了与中国、朝鲜资产阶级的幻想完全相反的一个问题，即似乎美国是亚洲的解放者，它还展示出被压迫民族摆脱外国帝国主义桎梏后的前途和发展道路。决议中说：“只有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战胜帝国主义之后，远东各国的劳动群众才能为自身利益，在国与国之间以及与先进的无产阶级共和国之间建立经济合作，并保证充分利用科学与技术成就而自由发展。”①

国际形势报告以后，大会听取了一些代表团关于远东各国形势的内容丰富而饶有兴味的

①《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料汇编》，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75页。

报告。

关于中国形势的主要报告人是张国焘。他讲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土地关系、农民状况，以及学生运动和罢工运动情况。另一个代表邓培谈到了中国的工会、铁路和冶金工人罢工情况。第三位代表林敦①介绍了外国资本把持中国工业的情况。

根据大会决定，中国代表又获得一次机会再作两个报告。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介绍了本党和孙中山南方政府的情况；最后，女代表黄壁魂讲了中国妇女状况。

在会上，我认识了莫斯科的一家中文报纸的记者瞿秋白。他会讲俄语，故而有可能用原文研究列宁的文章、讲话和苏维埃政权的法令。他在莫斯科加入共产党，后来在中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

朝鲜代表作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谈华盛顿会议与朝鲜问题的关系，另一个是关于朝鲜的经济状况。

在大会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是蒙古问题。粉碎恩琴、人民党取得胜利、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家，这些自然在外国帝国主义阵营中引起了反响。英国和日本于是要求将蒙古"归还"中国，这就意味着镇压民族革命，保存外国势力，使蒙古人停留在游牧部落制的阶段上。

粉碎恩琴白匪之后，日本多次催促北京政府出兵蒙古。中国反动派和掌握着蒙古贸易的商业资产阶级支持把蒙古"归还"给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代表登德布②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引起了普遍注意。他谈到了日本在恩琴白匪入侵蒙古时所起的作用，蒙古人民党的历史及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登德布宣读了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的声明。其中说，中国革命者反对把蒙古"归还"给中国。这个声明十分满意地被通过了。

登德布在说明当时的蒙古人民党的性质时说："我们的党不仅不是共产主义的，甚至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她更接近于西方的激进民主党，所以她以使蒙古完全摆脱外国强权者的经济和政治压迫为己任。"③

蒙古人民革命党现在是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的。她走到这一步，党内并不是没有斗争的。但是登德布对该党的评价在当时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自然，阶级分化在蒙古社会是存在着，然而其阶级结构是前资本主义的。贫民很多，可是几乎没有无产阶级。一半左右的男人是和尚和喇嘛。

以要求"归还"蒙古为目的的中国军事干涉迫使人民党暂时保留了以"活佛"为首的君主政体，并与上层人士、王爷和佛教界结成联盟。只是到1924年，活佛死后，蒙古才宣布为人民共和国。

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各代表团的报告，最后以片山潜关于日本经济和政治状况的详细发言做为结束。

日本代表由共产主义小组和所谓工团主义——共产主义者组成。会上工团主义者声明，他们确信自己的观点与共产党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要从组织名称中取消"工团主义"一词，而与共产党合并。

各代表团的报告，相互介绍的各国革命情况，都表明大会代表面临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

---

①② 音译。——译者

③ 《真理报》，1922年1月29日。

题，即共产党与各民族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据此作了题为《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

报告说，如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确实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并以民族解放为己任，共产党人就应支持这一运动。同时还谈到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反对国内反动派，战胜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支柱——封建残余势力。指出了工人阶级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特殊作用，和把远东人口中最基本的群众——农民吸引到这场斗争中来的必要性。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代表团成员，工会代表顾① 某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之间发生了一场并非偶然的争论。张秋白把国民党几乎说成是共产主义政党，声称上海的产业工会似乎完全赞成国民党的纲领。接着发言的顾某坚决驳斥了这一声明，他指出，张所说的工会根本不同意国民党的纲领。后来的事件证明，这场争论背后掩盖着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当时的国民党所持的否定态度。

大会一致通过了共产党与民族革命组织相互关系问题的决议。

后来代表们应邀到彼得格勒，1922年 2 月 2 日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

革命组织代表大会在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大会消除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对美帝国主义所抱的幻想：认为它有解放朝鲜和中国的使命。大会强调指出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帝和反封建的双重性质，指出吸引农民参加民族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大会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以国际主义态度对待远东各国的民族解放问题。

每逢星期日和各委员会工作的日子，就举行妇女——参加大会的女代表——的会议。该会于 1 月22日开幕，后来又举行了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

妇女代表会议人数很少（因为大会女代表只有七名），但开得卓有成效。妇女代表交换了远东各国妇女所处地位的情况，商讨了未来妇女革命组织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于1922年 1 月30日开幕，进行了三天。有六十七人参加大会，即几乎占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代表人数的一半。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占多数，但也有年龄大一些的代表。应看到，当时革命青年团体是作为独立的政治组织进行活动的，有时四十岁以下的人也加入团组织。一些新的青年组织一般都叫“青年团”，以区别于原来的组织。

沙茨金宣布青年代表大会开幕。匈牙利共产党领袖贝拉·库恩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贺辞。

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包括以下诸问题：1）青年共产国际及其对远东青年革命运动的态度；2）各国代表团关于青年运动的报告；3）远东青年运动的任务；4）通过代表大会宣言。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理查·许勒作报告。他详细地叙述了青年共产国际的历史，介绍了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特别谈到殖民地国家青年工作的情况。许勒讲的是德语，他的报告首先译成俄文，然后再译成其他文字。虽然经过两次翻译，代表们十分专心并很感兴趣地听取了他的报告。因为当时远东的青年革命组织对于青年共产国际，或是一无所知，或是了解很少，而不久的将来，他们还都要解决与这个国际组织的关系问题。

我们对各地代表的报告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是日本、中国、朝鲜和蒙古共青团的创建

① 音译。——译者

史。

日本当时还没有单独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参加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的日本代表几乎全体出席了革命青年代表大会。日本共产党正在筹建之中，其代表在出席革命青年代表大会的同时，还一面研究拟在本国建立的共青团的政治与组织原则。

远东其他国家却是另一种情况。朝鲜在沦为日本殖民地后，青年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展得最为广泛。汉城青年学生积极参加了1919年3月的群众性起义。这次“和平起义”惨遭镇压后，朝鲜出现了各种青年组织，最初主要采取了宗教形式。基督教青年会在城市里很流行，通常它只不过是朝鲜青年革命活动的合法掩饰而已。在农村中进行活动的有“天路”那样的青年宗教组织以及各种教派。这些组织首先都是抗日组织。亲美的基督教青年会所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仅仅是因为这一运动指向日本。为了对抗基督教青年会，日本殖民主义者在朝鲜成立了亲日的青年佛教会。更加普遍的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和体育活动的朝鲜青年的各种合法联合会。至1922年初，朝鲜已有数百个各式各样的青年组织，联合了十五万人。除去其指挥中心在国外的基督教青年会和青年佛教会外，所有的组织都是当地的。他们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也没有中心领导。

1920年曾打算把各组织联合起来。1920年12月举行了朝鲜青年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朝鲜青年联盟。到1921年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召开时，这个联盟已有二百个组织，五万七千成员。这个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

我稍微说一点后来的情况。应该说，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在团结朝鲜青年联盟内部的革命分子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莫斯科代表大会两个月之后，即1922年4月，联盟在汉城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革命派退出联盟，建立了自己的联合组织。1923年，各革命联合会举行代表大会，联合了各派七十四个组织，其中甚至包括了宗教青年组织，但是这些组织都坚持反帝斗争和劳动人民国际主义的共同立场。这个新组织中的最革命分子不久便联合成立了共青团①。

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和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代表太洪在团结朝鲜革命青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关于他的情况我已经提到过。他的伶俐和反应敏捷有时令人发笑。他很快就学会了俄语，但往往词汇不够用。不过，他从不慌张，把雏鸡叫“母鸡的儿子”。有一次在以木制手工艺品闻名的维亚特卡（基洛夫）市，他看到一个烟盒，就问：“香烟的房子多少钱一个？”

朝鲜的革命青年组织历史很长，团员相当多。中国则与朝鲜不同，在1919年中国首先建立的是学生会。到1920年，这些学生会中最革命的分子成立了社会主义学生组织。实际上，这是一些研究社会主义的小组，但在这些组织中起领导作用的已经是共产主义者了。到1922年初，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未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中国各地的学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二十七名代表，出席了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

蒙古革命青年团建于1921年8月。到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召开时，它已有三百名团员。团组织是在十分复杂的政治条件下工作的。前面我们曾引述了登德布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说当时的蒙古人民党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组织。军事干涉的威胁迫使这个党保留了君主政体，并与王公、喇嘛结成联盟，而且这些阶层的代表当时还在党内有

① 参见达林，《朝鲜革命运动中的青年》，莫斯科，1924年版，第94页。

一定的作用。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蒙古政府终归还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机构，所以仍然得到人民党和革命青年团的支持。不过，在君主制度下，青年团对政府曾持某种反对立场。蒙古革命青年团的一个文件中写道："尽管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了，但仍然保留下许多旧东西：维护旧秩序的贵族不顾人民死活地压迫人民，照旧按继承法办事，抗拒人民政府。"① 人民党与青年团之间的关系曾具有冲突的性质。有时是因为青年团在个别问题上，采取了左倾立场而造成的。例如，在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就曾提到：青年团的任务就是在蒙古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另一些时候，冲突是因向贵族和喇嘛们所做的让步而引起的。

大会一致赞同关于远东青年运动任务的决议。决议中明确规定了蒙古革命青年团的任务如下："因政府捍卫民族独立，而民族独立的最终目标是蒙古摆脱外国压迫，所以青年团应竭尽全力支持政府；但另一方面，青年团应该注意使广大牧民群众的利益不致被忽视，所以青年团在国家建设中，应该执行民主改革政策。"

蒙古人民革命党当时正在筹建中。正象以后所出现的那样，党内存在着反对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后又反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势力。在那样的情况下，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当时并不同意革命青年团隶属于人民党。同时，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蒙古青年团支持并积极参加贯彻党和政府的一切进步和革命的措施。过了几年，人民革命党清洗了消极分子，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它与团之间建立了如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规定的那种关系。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委托我做了青年运动任务的报告。1922年2月5日《真理报》上登载了这次会议的简要报道。从那时起已过了五十年。在此，我不用回忆去记述，而引用当时的一段报道。报道说：

"达林同志作了关于远东青年运动任务的报告。他指出，青年运动并不单纯是青年人的运动，而是共同的政治运动。他指出学生组织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朝鲜、蒙古的青年运动也具有同样性质，目标是争取国家的民族解放。这一切都说明，青年运动在远东的革命运动中有着深厚而坚实的根基。在评价个别国家的青年运动时，报告人指出，中国的青年运动至今仍不具群众性。虽然近来开始向接近广大群众方面转变，它却仍狭隘、闭塞，没有力图成为群众运动。但应该具体制定政治纲领。否则就会流于分散、无定型，异己分子就有可能渗入到这些组织中去。比如在中国，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青年就加入了社会主义组织。

"革命运动的政治任务各国迥异。特别重要的是在工人青年和比城市青年更加落后而愚昧的农民青年中开展工作。广泛的文化教育工作，是吸引这些阶层的青年最好的、也是最易行的方法。尤有必要在女青年中开展工作，把她们从男女平权组织的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并向她们指出，只有在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斗争中，妇女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至于组织形式本身，则必须高度集中，这必将大大有利于解决重大的革命任务。"

大会根据报告所作的决议，强调了把青年革命组织工作转到城乡劳动青年方面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了同工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保护工人青年的劳动而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在它通过的宣言中声明："在这次大会上，我们东西方劳动青年

①参见达林，《蒙古革命运动中的青年》，莫斯科，1924年版，第25页。

决定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结成生死与共的联盟。我们承认青年共产国际是我们的领袖。”

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在远东青年运动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规定了运动的政治和组织任务。大会还建立和巩固了远东各国青年革命组织之间以及他们同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联系。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不久，就召开了朝鲜青年同盟全国代表大会（4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5月），蒙古革命青年团代表大会（7月）。这些代表大会都根据各国的条件，依据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通过了各自的决议。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请求青年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1922年2月初，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闭幕后过了几天，我就动身到中国去了。

（选自〔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

《先驱》发刊词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

先驱出版了，在先驱与读者相见的第一天，先驱要告诉读者"他出世以后的使命。"

中国自近年以来，与外人通商的结果，旧的农业社会的经济组织，已次第为新的工商业社会的经济组织所撼动所代替了。在这样变迁的中间，就发生旧道德，旧制度的摇动，和新道德新制度的乘时代兴的现象。但二者是不能相容的因不免互相冲突。请看前数年由专制改成共和的运动，和近数年来的新文化运动便是这二种势力互相冲突最显著的表示了。只不幸这种冲突还未告一结束，就全国的形势看来，还是旧的势力占着优势。如国内武人军阀的横行，他们的勒索聚敛，毫无忌惮使我们感觉着这还是法国大革命以前封建社会的状态，何曾有一丝民主的气味呢？全国由辛亥革命以后，直到现在，可说还是反革命的势力冒着民主的招牌，以行他们的抢掠之实罢了。再看新文化运动的结果，使我们尤抱悲观，近一二年来的言论界，大非"五四"前后的言论界了。大家都在纸上空谈不着边际的主义，并毫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反动的势力便也乘着这人家不注意他的机会大施其活动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社会里的道德，还是农业社会所留存给我们的。因袭，奴性，偷惰，倚赖，这社会里的事业那一种不受他们的影响？各种事业经他们的熏染自然是麻木不仁，因之中国的政治，也在一般武人操纵把持了。我们以为军阀武人的专横不是他们的力量强大，实是我们国民的力量薄弱，实由国民还未觉悟的结果。所以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惰，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我们的政治，以后就不至于这样黑暗，我们达到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的道路，也就容易得多了。

既有了这种精神，我们若不知道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形，还是无用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何尝不富于反抗的和创造的精神？但他们因为不明白实际情形，他们的努力不知不觉的就变成盲目的和反动的了。我们要知道那不就客观的实际情形研究，而徒凭个人主观的思想想改造社会的人，他们的罪恶在实际上与反动派保守派没有什么分别。（虽然我们可以原谅他的心迹。）在一个时候，改造社会的方法是只有一种的，他们反对那一种最合于环境的要求的改造方法而不谙实际的传播一种高调的主张，便是使一般人入于歧路，分散对敌人的力量，而我们的理想社会也终于不能达到了。所以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我们除了以上种目的之外，还要介绍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绩和失败之点，以供我们运动的参考。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俄国革命的状况和革命以后的建设。许多人都只知咒骂俄国和赞美他，但他的施设，和他运动的方法，从来无人注意研究的。我们想在此时将他们实际运动的真相，忠实的介绍国人。

本刊发刊的旨趣说完了，我们很希望海内外表同情于我们的目的的人对于本刊物都加以充分的赞助。

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节录）

邓 中 夏

（记者按：这是重远先生给他朋友的一封信，我们因为他们讨论的问题，颇关重要，故发表于此。）

（上略）我在长沙讲演，说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终极的政治观念都是相同的，同是主张无政府，你对于此点很怀疑，说“在各书上都没有见着这个话”。是的，先生，你这个怀疑是很有道理的，我就借此地答复你罢。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评》中说：

“从资本主义社会推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间，必须经过一个革命变迁时期。同这个革命的变迁时间相适应的，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独裁政治。”

这就是说在从资本主义移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间，要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以办理经济上把一切属于有产阶级私有的资本统收归国有，实行“生产方法底革命的变革”的事情。原来马克思不相信共产社会的理想是可以一举而实现的，他以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完成，至少要经过三个时期：（一）由资本主义进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二）共产主义半熟期；（三）共产主义完成期。但三个时期里所采用的手段各不相同，这上边引的一段就是第一期所采用的手段了。

《哥达纲领批评》又说：

“在这时期（按即共产主义半熟期）无论在经济上，在道德上，在精神上，在其余一切关系上，都还没有脱除那个生他的母胎旧社会（按即指资本主义社会）的遗风。在这种社会里每个生产者，都向社会正确地取回自己所给与社会的东西（扣除为社会全体所必要的费用之后）。他给与社会的东西，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向社会领受了一种证券，这种证券上面写明‘供给这些分量的劳动’（扣除他为共同团体所行的劳动）；拿了这个证券，向消费物底社会的仓库，取出与这个所费的劳动相等的东西。这就是：他把他在这一个形式上所给与社会的东西，在别一个形式取回。换句话说，就是同量的劳动互相交换。”

“然而这些缺点（按即指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承认人类的材能不平等而报酬亦异的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底初期——即在吃了‘久产之苦’（按即指革命的过渡期内）之后，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出不久那些时候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初期（即半熟期）一切生产机关总都归公有，社会上叫做有产者及无产者这种阶级的区别虽已废除，但因为他去资本主义社会未远，流风遗沫，浸焉未泯，因之强制力在这时期也还不能免除，换句话说，政府在这时期也不能不暂行保留，以作这尚不公平的“各取所值”的分配的事情。

《哥达纲领批评》又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状态；在从服从分业原理而发生的个人底奴隶的隶属没

有了之后，在智力劳动和肉体劳动不当做为单维持生活的手段，而劳动自身成为第一个生活要求之后：在生产力随着个人底全部均平的发展一同增加，而共同财富底深泉都十分流出之后：——到了这个时候，社会才完全从狭隘的、有产者的法律的地平线拔出来，而且只有在这个时候，社会才能在旗帜上大书特书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这就是说到了共产主义完成期，生产力已经发达到了极点，完全可以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地位，完全是"各个人都能够自由发展，全体才能自由发展的协同社会"，到此时自自然然用不着什么政府了。

恩格思在他的文章里也说：

"国家并不是永远存在的。……在经济发达的一定阶段里，社会必然的分成阶级，国家在那时由这分裂的结果而变成必要。我们现在在生产发达中快又到一时期，在这时期里，阶级的存在已不必要，而且成为生产之直接阻碍了，故阶级的消灭在将来不可避免，正如他从前的发生不可避免一样。阶级消灭了，国家也自然随之消灭。当重新在生产者自由与平等的结合底基础之上组织生产的时候，社会将把国家全部机器，封送到于他最适宜之地——古物陈列所——与纺车，铜斧并列。"

国家全部机器在将来当与古物并列，可见共产主义终极目的是主张无政府的了，请问与无政府主义的差异到底在那里？

是呵，我们想向空中飞去吗？我们究该研究怎样才能飞向空中去的手段，我们究该研究制造飞机飞艇这些东西以为飞向空中去的手段，否则，那有如愿以偿之望呢。马克思共产主义是给我们指示出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步骤，手段方法，应有尽有了，无政府主义呢？……马克思与恩格思在当时痛恶无政府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奋斗终身，皆为的是无政府主义徒有美妙的终极理想，忽略了当前的实际事实。恩格思因不禁大声疾呼道：

"这些先生（即指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看见过一次革命吗？革命自然是最要有强权的行为。革命是一部分人民，依赖手枪炸弹炮火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他一部分之上的行为——就是要靠最有强权的手段。并且这战胜的一党是必然的被迫而用武器所及于反动党的恐惧，以维持自己的优势的。巴黎共产团不是依靠武装的民众的权力来反对第三阶级吗？他不倚靠强权他能支持一天吗？我们未必不应责备他因为他还没有充分使用他的强权吗？所以或者这些反对强权者他们自己不知他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如此，便只是种下昏乱的种子。或者他们知道他们所说的是甚么，如此便是卖无产阶级。无论那样，他们只供反动的利益罢了。"

这是何等痛切？何等恳挚？空想的无政府主义者读此，不应该有一番省悟，奋兴吗？

总之，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终极的目的没有甚么两样：无政府主义的好处，共产主义都包有；共产主义的好处，无政府主义却没有了。共产主义有目的，实行有步骤，有手段，有方法，反之，无政府主义除开他视为掌上珠，图案画，绣花衣的最美妙的理想目的以外，却空空毫无所有了。

这以上是我答复你的话。（下略）

再者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对于此点解释尤为详明，闻吾国有康明烈君译为中文，大约不久可以出版可购参考。

（署名重远，原载《先驱》半月刊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

共产主义者所应取的态度

凯　旋

（一九二二年一月三十日）

先驱出了创刊号之后，很得着几个朋友的批评。有的说："态度不大好。"有的说："树敌太众"。平时又常听见人说："不要谈主义，先谈人格"。……因为这许多的原因，所以我今天把共产主义者所应取的态度说出来，一方面以解除一般误会，一方面以勉励我们的同志们！

第一，我先说一说我们共产主义者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所应取的态度。本来马克斯与克鲁泡特金在目的上是一致的。这一点由马克斯的最后的著作，《哥达纲领批评》中，已经可以证明。如若无政府主义者能采取初步共产主义的手段，那末，不只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是我们的一家子。所以共产主义者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实在没有同室操戈的道理。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精神，牺牲态度，我们是异常佩服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比较历史长一点，对于运动上经验也一定多一点，所以我很希望无政府主义者——不只是无政府主义者——，改变空想的，盲目的态度，同我们携手，一致对敌。

第二，那主张以政治支配经济的人，我们知道他在经济学上的根据是错误了。不过，说法虽然不同，步骤却是一样，我们为集中且增大力量起见，也希望他们赶来纠正自己的错误，来同我们联合起来一致进行。

第三，我们共产主义者所反对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唯一反对者就是专讲进化(Evolution)不讲革命（Ruvoletion）的，冒着社会主义的招牌，缓和阶级斗争以使资本家间接收利益的人们。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不过，在现在诱惑的世界中，青年一时受的迷惑，是可能的。所以一方面虽不喜欢他们，但一方面却希望他们启发良心，即叫向左转，受革命的洗礼，和我们同向光明道上奋斗去。

我们看一看现在的社会唉！得到最小限度生活费的人有多少？经济逼得人虚伪，狡诈，堕落，……。资本主义把人们的幸福生活剥夺尽了。私有制度把维系人类的"爱"打得粉碎了。我们眼中看见许多的文化运动者，社会改造家，沦陷在浊恶的害人坑中，甘为官僚，军阀，资本家所利用。中国的需要改革已经是很急了！在现在的时候万不容我们自己再彼此闹意见了。一条路上的奋斗者一我们都是本着良心为社会而运动的。我们不同之处，没有不可以开诚布公的商量的。我们似不必再闹意气，以资敌人呀！我们醒来罢！

现在我又来说一说共产主义者的修养。革命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情！社会革命更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情！此后共产社会创造的责任，完全要我们一肩承荷，我们的责任，何等伟大呀！革命家有革命家的人生观，革命家有革命家的特质特操。革命第一个条件，是"牺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主义牺牲一切。什么刀锯鼎镬，枪弹刺刀，……管他哩！革命家的第二个条件是"纯洁"。分子的行为，可以影响团体，有时分子不好，使人家连团体所信奉

的主义也不信任了。故须修整一个高尚的人格。共产主义是何等清白一个名词，到了中国不要再把他弄污秽了！一革命家第三个条件是“血诚”。什么生命牺牲尚不放在心中，何况外人的无意味谩骂与讥评呢？无论他们怎样的膳说，我们总当竭诚和他们相见。我们的活动是“水银式”的，无孔不入，我们决不要只作表面上的，可以出风头的……的事情。这是我受刺激的而生出来的反应。并且也认为是我们必要应取的态度。质之一般社会革命家以为何如？

一九二二，一，三十

（《先驱》第2期，1922年2月5日出版）

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

陈 独 秀

（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

今天有两个大会：一个是马克思纪念大会，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这两个大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关系在哪里呢？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成立（的）。但是，今天讲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精神，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和其学理，在马克思纪念册上叙述了，诸君都可以见到。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刚好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

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怎样叫实际研究的精神？说来很繁杂。古代人的思想，大都偏于演绎法。怎样叫演绎法？就是以一个原理，应用许多事实。到了近代科学发明，多采用归纳法。怎样叫归纳法？就是拿许多事实归纳起来证明一个原理。这便是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反之文。我们自然对于这两种方法，应该互为应用。但是科学发明之后，用归纳法之处为多，因为一个原理成立，必须搜集许多事实之证明，才能成立一个较确实的原理。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代〔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现代人说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便是在此。这便是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

我很希望青年诸君，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不要单单以马克思的学说研究而已。知其单研究其学说，那么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完全（去）却！不过〔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了。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这是马克思的精神。这是马克思第一种实际研究的精神。

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马克思所以与别个社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他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凡能实际活动者才可革命。不是在屋中饮茶吸烟，研究其学理，便可了事。这是研究孔子康德的学问一样罢了。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主义革命。我望青年同志们，宁可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青年们，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诸君，须发挥马克思实际运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做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

我今天特讲马克思这两大精神，请诸君注意。

五月五日记

（《广东群报》1922年5月23日出版）

新青年之新宣言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

“我将创造成整个儿的世界，
又广大，又簇新，请几万万人
终身同居住，免得横受危害，
只希望我自己的自由劳动……
我终看得见奇伟的光辉内
那自由的平民，自由的世界。
　那时我才说：唉，“一瞬”，
你真佳妙！且广延，且相继！
　我所留的痕迹，必定
几千百年，永久也不磨灭。”

葛德之浮士德（Gocthc，“Fnust.”）

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诞辰。于此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向着千万重层层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文化，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伦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中国革命，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败落瓦解之表象而已，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书符的教育，几乎丝毫没有受伤。如何能见什么自由平等！可是中国的大门上，却已挂着“民国”招牌呢。当时社会思想处于如此畸形的状态之中，独有新青年首先大声疾呼，反对孔教，反对伦常，反对男女尊卑的谬论，反对矫揉做作的文言，一反对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才为“革命的中国”露出真面目，为中国的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绝未曾有的奇彩。五四运动以来，更足见中国社会之现实生活确在经受剧烈的变迁过程，确有行向真正革命的趋势，所以新青年的精神能波及于全中国，能弥漫于全社会。新青年乃不期然而然成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中国现时的旧社会，不但是宗法社会而已，他已落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虎口，与世界无产阶级同其命运。因此，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凭藉世界帝国主义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一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新青年自诞生以来，先向宗法社会军阀制度作战，革命性的表示非常明显。继因社会现实生活的教训，于"革命"的观念，得有更切实的了解，一知道非劳动阶级不能革命，一所以新青年早已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但将于宗法社会的思想行剧激的争斗，并且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同时攻击。本来要解放中国社会，必须力除种种障碍：一那宗法社会的专制主义，笼统的头脑，反对科学，迷信，固然是革命的障碍；而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琐屑的对付，一谬解科学"浪漫"，亦是革命的大障碍；因此种种，新青年孤军独战，势不均力不敌，一军阀的统治，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如此之残酷，学术思想都在其垄断贿买威迫利诱之下，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既不得充分积聚人才能力之可能，又内受军阀的摧残，外受"文明西洋人"的压迫，所以困顿竭蹶，每月不能如期出世，出世的又不能每期材料丰富。然而凡是中国社会思想的先进代表必定对于新青年表无限的同情，必定尽力赞助；新青年亦决不畏难而退，决不遇威而屈。现在既能稍稍集合能力，务期不负他的重任，所以在可能的范围内，重行整顿一番，再作一次郑重的宣言。

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新青年之有革命性，并不是因为他格外喜欢革命，"爱说激烈话"，一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已有解决社会问题之物质的基础，所以以发生社会科学，根据于此科学的客观性，研究考察而知革命之不可免；况且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期然而然突现极鲜明的革命色彩。中国古旧的宗法社会之中，一切思想学术非常幼稚，同时社会演化却已至极复杂的形式，一世界帝国主义，突然渗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弄得现时一切社会现象繁杂淆乱，初看起来，似乎绝无规律，中国人的简单头脑遇见此种难题尤其莫名其妙，于是只好假清高唱几句"否认科学"的"高调"。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勇猛精进，不怕"打开天窗说亮话，"应常竭全力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之正当轨道，一研究社会科学；当严格的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况且无产阶级，不能像垂死的旧社会苟安任运，应当积极斗争，所以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知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凡是中国社会之新活力，一真为劳动平民自由正义而奋斗的青年，不宜猥猥琐琐泥滞于目前零碎的乱象，或者因此而灰心丧志，或者因此而敷衍涂砌，自以为高洁，或自夸为解决问题；更不宜好高骛远，盲目的爱新奇，只知求所谓高深邃远的学问，以至于厌恶实际运动。新青年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必定要由浅入深，有系统有规划的应此中国社会思想的急需。一"社会现象复杂得很呢，单是几个'新术语'尚且要细加细释，然后能令真正虚心诚意的革命青年及劳动平民知道'社会'是个什么东西！"

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真正的科学，决不是玄虚的理想。中国新思想的幼稚时期已过。现在再也可以不用搬出种种现成的模型，勉强要中国照着他捏，一其实"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不但不详悉他自己所荐举的模型，而且也不明瞭中国社会，正因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方法，不能综观实际现象而取客观的公律，所以不是泥于太具体的事实，一说到中国政治，头脑里只有张曹吴孙几个大姓大名，就是力避现实，逃于玄想，一说到经济改造，满嘴的消费，生产，分配，等类的外国新名词，不会应用于实际。新青年现在也要力求避免此等弊病，当尽其所有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

新青年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社会科学本是要确定社会意识，兴奋社会情感，以助受压迫被剥削的平民实际运动之进行。所以对于一般的思想及情绪之流动，都不得不加以正确的分析及映照。一切文学艺术思想的流派，本没有抽象的“好”与“坏”，在此中国社会忙于迎新送旧之时，新青年应当分析此等流派之渊源，指出社会情绪发动的根由，方能令一般的意识渐渐明晰，不至于终陷于那混沌□顽等于飞蛾投火的景象，再则，现时中国文学思想，一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此旧社会的反映，与劳动阶级的心声同时并呈，很可以排比并观，考察此中的动象；亦可以藉外国文学相当的各时期之社会的侧影，旁观出此中的因果。却尤其要收集革命的文学作品，与中国麻木不仁的社会以悲壮庄严的兴感。

新青年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社会科学本无国界；仅因历史的关系，造成相隔离的文化单位，所以觉得各国有各国的“国粹”其实不过是社会的幻觉，泥滞于形式上的差别。中国受文化上的封锁三千多年，如今正是滚入国际舞台的时候，非亟亟开豁世界观不可。况且无产阶级的斗争本来就是国际的，尤其不可以不知道各国劳工革命运动的经验。因此新青年当注意于社会科学之世界范围中的材料，研究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之过去与现在，一使中国得有所借鉴。一从最反动的日本至赤色的苏维埃俄国，都应当研究。

新青年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社会科学，因研究之者处于所研究的对象之中间，其客观的真理，比自然科学更容易混淆。因此，人既生于社会之中，人的思想就不能没有反映社会中阶级利益的痕迹；于是社会科学中之各流派，往往各具阶级性，比自然科学中更加显著。新青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无产阶级，于现代社会中，对于现存制度自取最对抗的态度；所以他的观察，始终是比较上最客观的。何况新青年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字机关中，算是最幼稚的。未必有充分健全的精力，足以为绝对正确的观察。有此两因，都足以令新青年不能辞却与各方面的辩论：——一则以指出守旧各派纯主观的谬误，一则以求真诚讨论后之更正确的结论。于辩论之中，方能明白何者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结论，何者为更正确更切合于事实的理论。总之，为改造社会而求真理。

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仅仅有最小限度的力量，能用到新青年上来，一令他继续旧时新青年之中国“思想革命”的事业，行彻底的坚决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运动，帮助实际运动，一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新青年虽然力弱，必定尽力担负此重大责任，谨再郑重宣告于中国社会：

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

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新青年既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先驱，如今更切实于社会的研究，以求智识上的武器，助平民劳动界实际运动之进行。而现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派别，最与实际的世界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共产国际。所以新青年新整顿之时，特以此“共产国际号”为其第一期。

（《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出版）

北京同人提案

——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

For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朋友们：

这次杭州盛会，北京同人因种种原因未能参与，引领南望，能不依依。我们认这次大会，不仅是联络会友感情，乃为求彼此意见一致而讨论几个根本问题。所以我们虽未到会，我们很愿对你们的讨论贡献我们的一点意见。如荷你们的多数赞同，请共同签名在月刊上发表。

下面便是我们的意思。

我们现在不谈任何主义，我们只研究中国目前的事实问题，只看他要求于我们的是那一种，是政治活动，抑或社会活动。凡是此时住在中国的人，我们想，恐怕没有不感觉武人的横行和人民所受的困苦的。军阀盘据在各省，各省的财权、政权悉归于他们的掌握。他们登用一般趋炎附势、借公肥私的官僚，豢养一群毫无纪律的土匪式的兵士。他们为保存他们的势力和他们的一大群寄生阶级，遂迫而横征暴敛。他们因军队太多，一省地盘不足，遂迫而侵略邻省。于是教育经费被挪移了，实业经费被侵吞了，将各种为公共事业而用的财源都集中于养赡游民和征夺地盘之用。战争的荼毒、勒索的淫威、兵匪的横行，将中国的工商业摧残殆尽，以致毫无发展的余地，只得苟且偷生。言念及此，我们真觉不寒而栗了。

中国内政腐败既已如此，而同时外国资本挟政治势力以俱来，以金钱贿买，以武力威吓。他们从中国的军阀与官僚手中将中国利权劫取无余，复束缚我们海关订税的自由，享受豁免厘金的权利，更能避免去兵匪的滋扰。他们挟几十年休养的雄厚的资本主义，以与在种种束缚之下的我们新兴的资本主义竞争。为防止我们民众的勃起，乃维持扶植腐败的北方政府（如日本借款给北方讨伐西南），使中国永远在军阀互争之下，不能崛起，他们也可永远遂其劫夺。近又为调解国际间的资本竞争起见，成立新银行团，召集华盛顿会议，希图以协和的国际资本主义代替互相竞争。在这样情状之下，我们内受军阀的滋扰，外遭国际帝国主义的胁迫，我们的经济日渐枯竭，生活的程度日渐增高，于是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沦落无已，直到奴隶的生活为止了。

这样物质的束缚，影响及于精神。他在道德上的表现，是缺乏振作的精神、奋斗的意志。大多数生活不安，自顾不暇。所以同情心消失，合群性沦亡。他在知识界的表现，是知识贫窳，缺乏活气。大多数既奔在衣食，日营“从手到口”的生活，何能更有余力研究学问？道德、知识两俱缺乏，这便是今日惰性的中国，也就是今日麻木不仁死气沉沉的社会了。

我们认这种社会，不是以空泛的道德目标和不实用的科学知识所能征服的。而且除非物

质生活的改善，永远不能将他完全征服。改良物质生活的唯一方法，是只有刬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的这二重的障碍，由中国人开发本国的实业。我们要贯彻这主张，势惟有向保护督军制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举行斗争了。我们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是只有引导被压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

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人民为最切迫的利益奋斗，在群众集会、示威运动、游行、煽动、宣传、抵制这些具体事实当中训练而团结自己。扫除与群众不相容的习惯和道德，吸收富于活气的实际的知识。因为与共同的仇敌作战，养我同仇敌忾的精神，锻炼了互助的能力。这样有价值的经验的获得，将远胜于读书万卷和教育十年了。

在现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势力以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加速度破坏人类生活，将人类境遇愈陷于悲境，将人类道德愈约成服从的奴性的道德的时候，我们对于他不敢而且不想动他分毫，要学脱尔斯太慢腾腾的以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减速度做不干涉政治的"小学教师"式、"园丁"式的社会运动，还侈言创造少年中国，这真是甚于希望以若干人的唾沫便可扑灭燎原之火了。倘使少年中国不因此侈谈而得创造，我们也就延宕少年中国的运动，成了少年中国的罪人了。

希望以社会运动教育全体人民，待全体人民觉悟后再谋政治运动，推翻恶政府，这永远是一不可能的幻想。在社会上尚有不平等阶级之时，被压的民众永远没有全体意志之可言，一部分的民意总要统治者阶级所收买或威吓。俄国的农奴有反对农奴的解放的；林肯放黑奴，而黑奴反对者颇不乏人；俄国帮助撒[①]的人民名为Black-hundreds（黑群众[②]）；湖南的人民竟有替张敬尧请愿者。只有真的革命家他不顾退化层的人民的反对，径引导一般最有觉悟的群众向前斗争，以冀顽固的人民的归附。我们如若死守或全体参加政治活动或不参加的教义，这只是一种怯懦的心理，只是不敢以少数与最有势力的权威对抗罢了。况且，照不问政治的社会运动者的想像，社会运动不直接与军阀冲突，怎样可以一时大显灵异将黑暗政府扫去无余呢？

我们鉴于中国内军阀政治的横暴，国外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将中国改良的各种希望都渐灭殆尽了，我们不能忍了，是有诚意改革社会的人们都应该不能再忍了。起来引导民众，打倒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啊！任何主义者，我们以为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United Front，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朋友们，我们再不能延宕了！我们不能再使内部分裂反与敌人以可乘之隙了！

我们不是奴性主义者，绝不相信军阀能实现民主政治。因为这就是说，军阀可以扑灭军阀政治，也就无异说君主可以废除君主专制政体，资本家可以废除资本主义了。我们不是改良主义者，也不相信不破坏这制度，加入军阀或官僚阶级中，即可将他改变过来，实现我们的主义。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个人，而是制度的本身。我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要连根带蒂的拔除督军制度以实现民主主义。在这一点，我们根本上不信任北洋军阀可以改造中国。

中国的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屈

---

①"撒"既沙皇。——编者

②"黑群众"即帝俄时代的黑帮党人。——编者

服。（虽然有人认他们联段、联张是放弃主义，是屈服于军阀的武力，但我们只承认他是一种战略，是可以容许的。）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革命精神。他们在广州近二年来的施设，如废止治安警察法、承认工人罢工权、振兴市政、发布工会条例、办理外交不辱国体等，也可证明他们还是民主主义者。虽然他们常为军阀所驱逐（袁世凯、陈炯明、陆荣廷等）以至失败，然而这是我们人民不能帮助他们的原故。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因为像这样，便是间接的扶持或默认反动阶级的利益了。

少年中国学会是知识阶级的团体。知识阶级在中国只有三条道路：第一是替治者阶级的丑行做知识上的盾牌，替治者阶级用深渊的学识解释、辩护他们的一切罪恶。第二是不干涉政治，任军阀残暴而不敢抵御，自己却以“到民间去”安慰自己，间接延长军阀统治的寿命。第三是引导少数觉悟的民众在各种事业中与军阀代表的黑暗势力奋斗，唤醒国人的同情。朋友们，你们创造少年中国到底走那一条路呢？

少年中国的文学家啊！你们不是因为要创造少年中国，所以创造动人的文学以冀民众的觉醒么？但是你们若不加入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不更在实际活动的范围中指导他们，民众虽由你们得了感情的激发，他们或者将陷于无办法的境地，或者流于无结果的暴动了。

少年中国的科学家啊！你们不是想在中国发达科学、普及科学教育么？你们的同胞现在正为奴性和因袭思想所支配，他们现在只能终日营“从手到口”的生活，他们要你们先将他们从物质生活的羁勒中解放，再来领受你们的精神粮食啊！

少年中国的工程师和实业家啊！你们不是要创造一个工商业发达的中国么？你们的机会、地盘全遭军阀和国际的帝国主义所蹂躏或强占了，你们还不起来收复么？

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学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

黄日葵　陈仲瑜　邓仲澥
刘仁静　李大钊　沈　昌

（《少年中国》三卷十一期“学会消息”，1922年6月1日）

造　国　论

独　秀

我们中国此时在名义上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比南洋马来群岛酋长割据的英荷殖民地高明不多，那里算得是一个独立的国！在经济方面，国家重要的权利大部分抵押给外国了，外国货充满了全国，全中国人都是外国生产国家的消费者，全国金融大权都直接或间接操诸外人之手。在政治方面：大小酋长分据了中央及地方，这班大小酋长之发号施令又惟公使团之意旨是从。南洋英属荷属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完全是这样，如何能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种殖民地状况之下，有何国会可言！有何法统可言！有何宪法可言！有何政治可言！所以我们以为中国还在"造国"时代，还在政治战争时代，什么恢复法统，什么速制宪法，什么地方分权，什么整理财政，什么澄清选举，对于时局真正的要求，不是文不对题，便是隔靴搔痒。时局真正的要求，是在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

这个问题倘然决定了，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来造国？

我们的答案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

这个国民军，是应该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而成。在这创造国家的大事业中，自然少不得许多有力的领袖，但英雄时代贤人政治时代都快过去了，这种新势力若不建立在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在中国的产业状况看来，这种大群众决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群众在短期内能够壮大到单独创造国家的程度。商人说，在商言商不与闻政治，教育家主张不谈政治，至今没有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发生，这都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壮大的表徵；在私产制度之下，资产阶级未壮大，无产阶级也自然不能壮大；因此，我们敢说：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o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来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可以证明的。

各阶级大群众联合的国民军如果成立了，国民的革命如果成功了，压迫我们的内外恶势力如果解除了，民主的全国（指中国本部而言）统一政府如果实现了，这时候才有宪法才有政治之可言，这时候中华民国政治上的创造才算成功，而真正的中华民国还只创造了一半，其他一半，乃是中华民国经济上的创造；因为民国必须建设在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的生活为最切要，经济的生活不进步，所谓人民的幸福，仍只是一句空话。

用什么方法来创造经济？我们的答案是：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由中央或地方（省及市）政府创造大的工业商业农业，一直到私产自然消灭而后已。

照中国社会的现状，要开发实业，只有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用私

人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在理论上我们不能赞成，因为他在欧美日本所造成的罪恶已是不能掩饰的了；在事实上，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断然不能在短期间发展到能够应付中国急于开发实业的需要，而且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扰乱未解除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很难得着发展的机会，到了国民革命能够解除国外的侵略和国内的扰乱以后，无产阶级所尽的力量所造成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以推知，那时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所以我们敢说，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

政治的创造及经济的创造都能成功，那时国民军创造真正中华民国的工作才算完结。

总括起来说：我们造国的程叙是：

第一步组织国民军；

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

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

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

（选自《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出版）

〔附〕 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日）

胡　适

我们的朋友陈独秀是反对联省自治的。他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篇的末三段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他很武断的责备那主张联省自治的人“未曾研究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在那里。”他自己断定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在于“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我们要很诚恳的替他指出：他所举的只是纠纷的现状，并不是纠纷的根源；只是乱，并不是乱源。试问，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又是从那里来的？独秀说是“帝制遗下来的。”这又是“米是米瓮里生的”的故事了！我们如果进一步研究帝制运动的时代，就可以明白帝制的运动确可代表一种“强求统一”的迷梦。这个迷梦的来源长的很呢！自从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的历史确然呈现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势。这二千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所以中央的统治力一衰，全国立刻“分”了；直到大家打的筋疲力尽，都厌乱了，然后又“合”起来。明朝用极端的专制，只落得十七世纪的大乱，连一个“分”字都够不上，只是“瓦解”了。清朝承大乱之后，恩威并用，也只能支持到一百五十年；乾隆末年，匪乱已四起了；鸦片之战以后，中央的纸老虎已戳穿了，故有十九世纪中叶的大乱。洪秀全的徒党在十八个月之内，自广西直打到南京；全国也几乎“瓦解”了。后来平乱的人，不是中央的军队，都是起于保卫乡党的新军。我们看湘军的组织和长江水师的历史，可以想见当日的统一，实由于各省的自卫。（长江水师与湘军的饷费，皆不出于中央。）二十年的大乱之后，

中国仍归于统一，然而皇室与中央政府统治力的薄弱，早已完全暴露了。六十年来，中央的权限一天天的缩小，地方的自觉一天天的增加；到了辛亥革命军起，"省的独立"遂成一件历史的事实。当袁世凯的时代，这个现状的意义已有人看出了，所以有民国二、三、四年间的"联邦论"。"联邦论"已起，而袁世凯还想做他的统一的迷梦。第一步是"袁家将"的分布各省；然而军阀分封之后，仍旧不能减除各省独立的趋势。袁氏误解病源，以为皇帝的名号可以维系那崩散的局面，故第二步才是帝制的运动。故从历史上看来，军阀的封建与帝制的运动都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为强求统一而封建军阀，然而封建军阀却使各省格外分裂，遂成了独秀说的政治纠纷的现状。

我们不愿意用一两个简单的公式来解释那复杂的政治问题。但我们从历史的事实上看起来，不能不说："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于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个大原因。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

我们且看看历史上的事实，独秀说：

此时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连国有的铁路、盐税他们都要瓜分了。若再要扩大地方权，不知还要扩大到什么地步？

我们要知道，各省督军总司令的权大，是一件事；地方的权大，另是一件事。在今日的制度之下，只是督军权大，而地方权极小。（这一点大家不可不特别注意。）就拿财政权来说罢：民国五年政府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权，把许多向来归地方的收支，都划归中央管理，即如安徽一省十年度的"国家收支"，如下列表：

国家岁入经常门：

一、租税	5,064,200元
二、杂收入	175,880元
合　计	5,240,080元

国家岁入临时门：

合　计	129,198元
国家岁入总数：	5,369,278元

国家岁出经常门：

一、外交部管	9,840元
二、内务部管	1,471,414元
三、财政部管	62,159元
四、司法部管	560,808元
五、农商部管	58,304元
六、教育部管	35,300元
七、陆军部管	3,800,305元
合　计	6,557,190元

国家岁出临时门：

各部合计　　　　375,880元

国家岁出总计　　　　6,933,070元

我们要知道，这五百多万的收入，七百万的支出，都是"国家的收支"，都是省议会无权过问的。所谓"地方的收支"，只限于本省的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项，都是省议会可以过问的。自从民国五年以来，各省都是如此。（参看"银行月刊"第二卷第八号，刘大钧："中央与各省之财政"。）因为地方的财政范围缩小，因为省议会无权过问那绝大的"国家收支"，而中央又无力实行管理，所以各省的财政大权都操在督军与总司令之手。兵马权的历史，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说：今日只是督军权大，而地方权小；若因为督军权大而就说地方权大，那就是独秀所谓"发昏之发昏"了。

我们要知道，督军总司令的权力所以扩大到那么地步，正是因为他们现在处的地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央有"权"可管他们，而无"力"管他们；地方有潜势力可管他们，而无"权"管他们。试问我们今日要想裁制军阀的权力，还是希望那有权无力的中央呢？还是希望那有力无权的地方呢？我们的答案是：

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能充分发展他的潜势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这是省自治的意义，这是联邦运动的作用。

地方有了权，就可以裁制军阀吗？可以的。我们试看江苏近几个月的公债案，那便是一证。因为中央把地方的大部分财政权都收去了，故"地方收支"项下列有"公债"一门。公债已属地方，地方便有权过问了。今年江苏要发行四百万公债，加上"江苏国库分金库"的字样，想只要财政部的批准，不经省议会的通过。但地方的反对究竟起来了。韩国钧只得召集本省的绅士，开一个财政会议，改四百万为七百万，总想躲过省议会的一关。但地方的反对还是不息的。他们反对的最大理由是：

募集公债，非行政机关所得单独行动者也。国家募集公债，须经国会之议决，省政府募集公债，须经省议会之决议。法律昭然，宁堪弁髦？

我们可以预料江苏这七百万的公债是发不成的。我们再看曹锟曹锐威权之下的直隶省议会；他们别的成绩虽不足道，但这几年中省议会始终不肯通过一个公债案。我们于此可见地方权力的范围之内，军阀的权威也不能不受限制。在今日地方权力薄弱之时，这种裁制是不能完全有效的。（如奉天、广东之借外债。）但将来地方的权限加多，中央的掣肘全去，地方变成了可决否决的最后一关，那时候的军阀就不能再有现在的容易日子了，那时候，全省的视线都注在省议会，本省的人才也会回到省议会去努力，省议会就成了军阀与人民决斗的战场。军阀也许用金钱与武力来作最后的奋斗，——如山东的现状，——但这种奋斗的结果，一定是军阀失败的。

总括起来，我们的意见是：

（1）中国不适宜于单一的国家组织；军阀的割据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恶果。

（2）今日只是督军总司令的权大，而地方的权极小。这两件事决不可混作一件事。

（3）军阀的权限所以大到这个地步，是因为地方没有权，又因为中央虽有权而无力裁制军阀。

（4）今日决不能希望中央来裁制军阀；裁制军阀与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增加地

方权限，在于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

至于独秀说的"联邦制若建设在人民经济状况不同及语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到也无可非难，奈中国的状况决不是这样"。——我对于这种论调，真不懂得了。独秀在前面明明指出中国的经济状况，从家庭农业，到近代资本主义式的工商业，有三种悬绝的状况。至于语言宗教的不同也有许多不可掩的事实。（语言更明显。）何以他又说中国的状况"决不是"这样呢？况且稍研究联邦国家的人，也应该知道联邦制并不必建筑在经济状况及语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美国不是一个例吗？独秀又说：

> 他们的联省论，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不是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不过联省自治其名，联督割据其实，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

这也是不研究历史事实的笼统话。我们且不论辛亥以前提倡的"新湖南""新广东""新江苏""新浙江"；我们且不谈民国三、四年的联邦论；即论最近三年来的联省自治运动，那一省不是先由反对军阀反对驻防的人提倡的？联省自治的声浪传播远了，事实上已不容易压制了，"联省自治"四个字已成为可以号召的旗帜了，于是军阀也不能不注意他了。军阀之中，对于这个运动，有两种态度。一派是投降在这个旗帜之下，想借他的招牌来苟延残喘的。湖南的赵，浙江的卢，便是这一派的代表。孤立的卢永祥甚至于不惜冒借浙江，这是谁投降谁的表示？一派是还想做"武力统一"的迷梦的；他们的地盘大都根据在驻防异省的对联之上，联省自治便是他们的致命之伤；他们既不能学卢永祥的冒借，自然不能不出来反制度省自治了。我们试看湖北争省长的一幕戏，便可以了解直系武人反对联省自治的心理了。明明是武人军阀最忌的一个武器，偏有人说他是"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这也是独秀说的"发昏之发昏"了！

我们可以大胆说：

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

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

（原载《努力周报》第19期）

〔附〕读独秀君造国论底疑问

思顺　君宇答

中国现在底政象，确是腐败极了。什么国会底召集，开会，什么制定宪法，什么借债整理财政，这都是表面上的时髦调子，究实没有从根本上着想，须知现在底政象，无一不是破坏中国的元气，试观一班政客在北京方面怎样捣乱？国会召集起来，更使他们活动得多……或者最多不过多造几幕把戏给我们看看罢了。所以独秀君说：中国还没有造成，确是不错，我以为中国非独没有造成，就说已建造一半；我也不能同意，我说中国现在正当破坏最盛时代，中国不是已经起手造国，中国已朽腐了，国固不成国，说邦也不对；所以邦也不成，省也不成，现在只成为散乱底分子，想行联邦制去救中国的命是，药不对症！中国病症底治

法，非彻底清泻消毒不可！若在表面上修饰下，不都都不免旧底子复现。

独秀君说："用真正国民军去创造真正民国"是对的。我想要把中国去消毒，除了"革命"实在没有别的法子，革命啊！大家起来革命啊！革命才是中国一线生机！

但是"国民军"如何造就呢？独秀君没有说出，我想组织真正有力的"国民军"断断不能一时之间，登高一呼，便能集合，须要先使一般人明瞭这"革命"底意思，和怎样去做；这才是有真正"革命"永久的精神底"国民军"；这才有用，才有成功底希望。

独秀君又说："无产阶级革命底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已经成熟了"，这里我有点疑问就是："如何而可使两阶级联合"？现在一般有产阶级完全觉悟的有几个？他们对于无产者底心理，能出之这个"平"字吗？纵使不计其他，就联合起来（？使两阶级联合"，现在一般有产阶级完全觉悟的有几个？他们对于无革命"；到"革命"以后，终不免有产者专政，这样底"革命"是不彻底的，不彻底的"革命"，仍是"革命"罢了。

独秀君又说：到了国民革命能够解除国外的侵略和国内的扰乱以后，无产阶级所尽的力量所造成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以推知，那时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我想这正是资产阶级底大忌！正是两阶级联合底绝大障碍；我们且推论现在两阶级所抱"革命"的宗旨，我们敢说他是一致向同一目的看去吧？我想仍是背道而驰的。这样怎能使他们两方融洽而联合起来呢？

况且独秀君说："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来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可以证明的"我说这是不足证明的：现在的打倒军阀底呼声，并不是两阶级联合底呼声，不是各呼各的，声是同的，心理是不同的；自己呼打倒军阀，及去捧军阀下的脚；这倒不明他们是忘却抑或什么，自己口呼去建设民生政治，反跑到北京去捣鬼，这可是有没有呢？

若拿十余年来的政治史来证明两阶级底联合，更不能成立，这十余年来两阶级之冲突，一天厉害过一天，你说他是联合，我说这是分裂底证明，从前专制时代的无产者，屈服于有产者之下，那时尚可说他们两方有联合的可能，一这是因无力抵抗而联合一现在是不对了。

改造成民国十余年来的种种"革命"这都是有产者底利用手段，实行到无产者去，并不是无产者已觉悟愿与有产阶级联合，况且无产阶级一觉悟，只有和资产阶级宣战，断没有愿与之联合的道理。

所以我说：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并未成熟一因无足以证明一只有无产阶级底"革命"精神已露端倪，现在努力谋"纯粹的无产阶级底革命"易，谋两阶级联合的"革命"难，质之独秀君以为怎么样？

一，十，一九二二，于上海通惠

独秀昨往安徽去了，思顺君对他造国论的质疑，暂先由我代作一短答；他如有要合思顺君详细讨论的地方，待他返沪后再说。

思顺君疑问最扼要的，是"如何而可使两阶级联合"来革命。解答这一点，自然先要分晰目前中国实际政治和经济情况，两阶级现在各自的地位，还要看两阶级的"联合"究站在一种什么基础上面和到一种什么程度。

讲到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形，独秀文中和我们都早论过了；他是国际帝国主义公共殖的民

地，他的经济生命被他们宰制了，同时支配政治的又是这些海盗们和他们扶植成的封建势力。幼弱的资产阶级他是随资本主义侵入而诞生，但他被都扼抑在外国资本主义的阻害之下，尚未能为迅速的发展，到了现在远没爬到掌政权的地位；同时无产阶级因经济情形落后的缘故，亦尚未能壮大。在这种情形之下，两阶级同被压迫是一件事实；决定目前的革命是两阶级都要来做，就是这种事实。他们都要起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有压迫，这是思顺君和我们都一样不否认的事实。

我们很承认两阶级目前是呼声同而心理不同的，且要说两阶级是利益对立的，这不同的敌视且是会一天一天跟着近代化的程度增大起来，单拿经济的地位来说，他俩是没有协作的可能，且没有这样个需要。但目前确有一个问题摆在中国无产阶级面前，就是他自己还没发展到独立的政治奋斗的地位，而目前的压迫又非统一全国的革命力量，号召起全国被压迫人民一致不可抗侮的势力，不能迅速成功。吸收一切革命的势力都参加这个奋斗，这是一件最大需要，思顺君认目前已是只有无产阶级就可革命的决论，我们日夜祝着事实早成这样，但不得不说这确是离了实际需要的说法。

我觉得读者要对我们提出的质问，应当是他们究联合在一种什么基础上面和联合到一种什么程度来革命；但思顺君未提到。我现要就这一层申说一下。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壮，这不止是现在的现象，任何时都是这样，因为无产阶级那一时总是较多数，只要他们团结起来。所以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就是说这个革命是要让群众革命的动因来支配，无产阶级要从事这个革命，他很明白的是为了自己阶级利益，他并不为了任何别阶级利益；他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过只是个推翻共同仇人的政治连锁。他虽至少要求这个革命给他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他决不认这个革命就是解放他们的革命。如这国民革命成功，他们所得的实际完全革命经验和组织力量充实，是会使完全解放他们的革命马上接着成功的。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最反动的封建势力交迫之下，实际的政治和经济情形是决定工人的革命是要经过如此进程的。“从事实到理论”我们要使工人革命是活的，是进展不已的，国民革命确在目前是最有意义呀！

造国论所谓“联合”的会义，我们更要认他明白。他不是指大家滚和在一起来革命。见有一定方式的，上段稍说到了。若以为讲“联合”就是要讲“工商友谊”和“劳资互助”，将工人和雇主混合组织黄色的行会，这不止是独秀和本报所反对，明白的工人和站在工人利益一边的都应当反对。无论何时，无产阶级要独立的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当中更要是这样；且无论何时，不能因连锁而放松了他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斗争。

独秀所说“只创造了一半”，是指国民革命政治创造成功之后，不是指现在；请思顺君再细读他原论一过，你文中还有些欠斟酌的地方，请覆按一下当自发见，无须我在这里指出了。

“革命后终不免有产者专政”，这是思顺君考虑到最有意义的一点，但也要由无产阶级在这革命中所造的地位来决定罢！临了，我要代表本报表示欢迎思顺君疑问的意思，因为他的立意是站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一边。

（选自《向导》第4期，1922年10月1日出版）

民权运动大同盟宣言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五日）

我等人民困于水深火热之中，受尽种种强权者的非法摧残，其痛苦已达极点！同人等于忍无可忍之余，起而组织这个"民权运动大同盟"，冀得伸张民权，以解厄运，仅为此宣言，告我全国被压迫之同胞：—

全国教育家，学生们呀！你们近来不是因为军阀养兵太多，而使你们教育事业累受影响吗？你们所酷爱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不是横遭军阀或军阀鹰犬非法的摧残吗？"自由"虽然是与全体人民大家有关的事，可是最感其必要的是你们。临时约法上虽然明订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可是为了"但书"之限制，军阀得制定各种特别法—！如治安警察法之类—！轻轻的把你们天赋的权利澌灭殆尽了。这不是共和国民大耻辱吗？你们甘心情愿忍受吗？你们如果不甘心情愿，为什么一声不响，不起来自卫呢？

全国的劳动同胞们呀！你们不是除去受了军阀之害外，还要遭资本家地主的剥削吗？工人为要维持生活，不得不每日到工厂里去作十小时以上的工，冬春两季，整整的不曾见过天日！而且你们都是很小就要过这样生活，因之不能受丝毫教育，迄至成年，家庭的负担增大了，你们于是竟须昼夜兼工！倘若你是个矿工，更有朝不保夕的生命危险，什么"幸福"，什么"快乐"，你们是不曾梦见过的！如果你们有时为不堪资本家剥削而起小小的反抗—！罢工，他们的密友军阀，会派军警来干涉，打！杀！又如你若是个贫苦的农人，每年三百六十日的劳苦经营，被地主打发一个管帐的于收获时来说一声要七八成，就只好如数给他送去了！此外更要遭军阀的勒索敲诈，致使你自己要将耕牛和农器押钱来过活！劳动同胞们！这些痛苦，你们情愿忍受吗？你们如果不甘心情愿，为什么一声不响，不起来自卫呢？

全国的妇女们呀，你们不是从不知几何年以来便横遭男子的压制吗？你们不能受教育，不能有财产，更不能参与政治，只是附属于男子，供男子的玩弄，践踏，这是何等可耻，何等不幸的事！你们近年来觉悟了，随时高呼男女要平权了，不准男子独霸教育，要男校公开；不准男子独占财产，要遗产平分；不准男子独握政权，要女子参政；不准男子娶妾于蓄婢，要男女平等；这些，有觉悟的知识者表同情的倒不少，可是军阀因为与他们的利益有绝大的冲突，掀髯大笑道："男女平权"是天地反常的事，国家还成体统吗？他们左一个"姨太太"，右一个"如夫人"，不是强夺民家良女，便是他们趋炎附势的鹰犬买了奉送，这是何等蹂躏人道的事，你们甘心情愿忍受吗？你们如果不甘心情愿，你们为什么一声不响，不起来谋自卫呢？

全国的兄弟姊妹们呀！我们所受痛苦的来源在那里呢？简单说：无法律的保障，如比自由权因宪法上"但书"之限制，遂有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之产生，人民实际上没有得到一点自由。又如劳动者因宪法上没有劳动者权利之规定，遂有新刑律上罢工为骚扰罪之产生，劳动者有时不得已为了生活困难而罢工，要受官厅无理的压迫与惩治；又如妇女们因宪

法上没有何项权利之规定，要受种种不人道的待遇，又如最大多数的穷苦人民，宪法上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所以他们没有呻诉疾苦的地方，只好活活的饿死苦死。

全国的兄弟姊妹们呀！宪法是人民的权利保证书，我们该乘此国会重行制宪的时候，来作一番争夺民权的运动，所以我们组织了这个“民权运动大同盟”。我们揭橥底四大标的，就是——

（一）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有绝对自由权；

（二）普通选举；

（三）劳动立法；

（四）男女平权。

全国的兄弟姊妹们呀！我们又要知道光是宪法规定权利还是不够，请看以前种种毁法和阻止宪法成功（如解散国会）的行为，那一样不出自专横的军阀；况且南北战争，直皖战争，湘鄂战争，川鄂战争，奉直战争，……以及其他各省内部的地盘战争，那一次不给你们以死亡，离散，掳掠，奸淫的损害？那一次不给你们勒捐，增税，抢劫的赐予，而且战争之后，土匪蜂起，无论何等偏避的地方，没有能逃其祸的。同胞呀！这些痛苦，不都是军阀赐给你们的吗？故我们真想要争民主国的幸福，打倒军阀，是为必要的。

全国的兄弟姊妹们呀！你们又要知在军阀后面，还有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存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为要保持在中国的侵略，所以要利用我们国内的纷乱，以妨害我们的实业政治种种的自由发达，于是多方扶持我国无知残暴的军阀，延长扩大的内讧，往事不必举例，即就目前说罢：日本明助张作霖，英美暗助吴佩孚，英国提携陈炯明，那一样不是使中国内讧的延长，那一样不是摧残中国真正民主主义的实现。故我们真想要享受民主主义的幸福，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又是必要的。

我们“民权运动大同盟”，就是以伸张民权，剷除民权的障碍（即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为职志，希望被压迫的同胞大家起来谋自卫呀！我们在此高高的大呼：

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民主主义万岁！

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

（选自《先驱》第12期）

陇海路罢工志详

陇海路自二十日路机师全体罢工，至今迄无办法。探其起因，系由该路车务总管对于机师时行酷虐。近又新抚总管若里氏对于机师更形刻薄，罚薪裁人，任意行使。以致激成全体机师罢工，推举代表提出条件要求容纳，并详陈受虐种种，发布传单，惟该项印刷品因有顾忌，不于徐城发散。记者现从工人方面商将两纸抄录，惟语太冗杂。但一片苦情满露于字里行间，也兹撮要纪之，约云：机务大总管若里，自按办以来改变诧异，司机行车，油炭不照核实发给，减油数倍，勒令照用，如汽力不足，以至行车误点，油不足，照罚加倍。每月扣款几次，合一月之工资，减去一半。擦车不给棉纱，机器受污，即行受罚，现皆自备破衣擦洗。设法减工资，裁汰工人，不管有无妨碍云。其所提要求条件，计共十六条：（一）要求若里总管不准克工减料虐待工人。（二）要求因八号门房被革之人免究，复允此门不准任意锁闭。（三）要求机车照常修洗。（四）要求各厂应用材料，照应用接核算所实行发给。（五）要求行车油炭、棉丝照原先考验成章，核实发给。（六）要求司机生发给工服、雨衣。宿舍柴炭与车首一律不分。如司机生火工作以外候差，理应照钟点加金。（七）要求大小工人每月加薪，年给双支。（八）要求工人因工受伤，一律发给工资，及至残废之时，公司格外优待体恤。（九）要求车务处稽查站长对工厂工人和平一体不分上下。（十）要求如因活忙夜班加点以六小时算一工。（十一）要求稽查厂首在厂司事，以公理公章指示，不准恃尊虐下口出不逊。（十二）要求每新年与员司工人一律歇工不分上下。（十三）要求中外年节及星期日并每公事工，做钟点工人能与员司一律相同。（十四）要求在厂疾病准赏半工，及至病故，赏六个月工资另给回籍免票。（十五）要求因工亡故准给薪三年并回籍免票外，其子弟准其袭业。（十六）要求从今开工后六个月不准自行裁人。

（原载1921年11月28日天津《大公报》）

共产党广东支部敬告罢工海员

（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

最亲爱的海员同志们：我们为争生存而举行这次大罢工，凡是有良心好和平的人们，除资本家及帮助他们的走狗——官僚军阀——外，没有不同情于我们的。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有人格的自觉，不愿将劳力仅仅当作货物卖出，而想把各人都取得一个有意义有兴趣的生活！就是不被少数人利用，为之做牛马奴隶的生活。所以才与资本家宣战，实行阶级斗争。那么，我们此次轰轰烈烈的伟大举动，当酝酿与发动的时候，就算是我们得到光荣的时候了。我们的胜利，是可预期的。资本家在现代生产制度下，筑起独占的保垒，豢养许多的守卫，他用巧妙心思，奸狡计划，兼并了榨取了多数人的精血。但是他好象吮人血的蚊虫，他太饱了，他渐渐飞不动了，他故意在社会中筑成一道分别阶级的厚墙，墙外的人们越多，他自己就成为孤立了，他不知不觉在自己狡狯的打算中，就掘下他自己的坟墓了。全世界的劳动同志们，将群起收回自己的权利，不至再受将死的资本家的糟踏了。我们海员在这样世界工潮中，为此正当的要求主张，那自然是不会失败的。

不过我们还是不可疏忽，就是资本家的爪牙众多，侦探遍布。他有本事能够造作谣言，颠倒是非，欺骗我们的同志。所以下列诸点，还要注意！

一、坚持到底。我们最后向船东提出的条件，那是体量现社会组织的情形，为争个人生存上最低限度之一种，断不可因威迫利诱而稍形退让。任何人出面调停，必须如愿相偿，方能应许。

二、团结一致。中国人办事没有五分钟的热度，外国人常常用这种话讥消我们，就是形容我们不能团结的意思。俗话说得好：“众擎易举，一木难支”，我们劳动者能够战胜资本家的优点，就是仗着人数多，合起群来能有阶级觉悟，若使不能团结行动，资本家就不难用种种方法，把你各个击破。

三、严守秩序。我们由长河大海，惊涛骇浪的生活中，暂时来住陆地。我们应该想想，这岂不是资本家逼我而成的吗？我们当然有一种愤恨填在胸中，但是这样愤恨，都要针向我们的仇敌发泄，不要对于帮助我们的人们，稍有得罪。所以我们的言语行动，也要守着一个范围，就是很奋敏的很严正的采取一些文明手段，去要求帮助我们的朋友，对待仇视我们的敌人。

四、注重自治。我们到省城的不下数千人，承各界同志的帮助招待，自然是感谢不尽，我们要晓得仇敌的侦探是很多，他最会的是造作谣言，挑拨是非。他冒充我们海员，来混在团体中，故意作成种种不名誉的事，冀〔企〕图破坏我们团体的，恐怕也是难免的。我们因此上凡是起居饮食，一切细微动作，都要加一层的注意。不然，他们就要说我们程度不够的话头了。我们应该随时想想，我们一切的动作，果有可以被人谈论的地方么？没有么？

我们最亲爱的海员同志们！我们应该抖擞精神，完成我们的这一次伟大举动。我们晓得资本家已到命运的末日了，但是也要晓得将熄的灯火，他有回光返照的幻象，我们更是应该鼓起百倍的勇气，防备他回光返照样的一大打击。本党以海员同志为开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定当竭其能力，为之后援。海员同志们啦！快快共同一致的望着我们的目标奋斗，以期得到我们的最大光荣最大胜利啊。

共产党广东支部

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

和　森

一、劳动运动的目的与原则

自近世生产的土地、工具、资本、日日集中，归最少数人私有后，最大多数的人就不能为他们自己的消费而生产。最大多数的人要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只有向占领一切生产手段的资本家卖力，才能得着少许工钱，去买生活的物质。由此资本主义的工钱劳动制，就成为近世工人的铁锁。工人们不向资本家去卖力就只有饿死一条路！

然则工人阶级的命运，果真只有“卖力”与“饿死”两条路吗？这两条路是谁命定的，是八字、或“上帝”、命定的吗？不是的；是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命定的。然则工人阶级要从“卖力”与“饿死”两条路中解放出来，就只有根本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将一切生产手段一即土地、资本一收归社会公有，才能打破这把工钱制度的铁锁，而直接过那“为消费而生产”的社会生活。

“一切生产手段收归社会公有”，这就是劳动运动根本的目的。

但是怎样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惟一的方法，就只有实行阶级争斗与社会革命。请看以下简单的理由，就明瞭这种方法之适当而且必要了。

近世资本主义的社会，是建筑在“以资本掠夺劳动”的根本冲突之上的。这样的冲突是怎样一回事呢？就是最大多数劳动者的生产品，归最少数不劳动的资本家所占有。近世社会“劳”“资”两阶级的关系就完全建筑在这样经济事实的根本冲突上面。这样的冲突，只有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才能解决；调和妥协，是万万不能解决的。

譬如“增加工钱”“减少时间”，这本是劳动运动，迫切的急务；但这不过是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未实现以前，为一天一天的生活所压迫，不得不日日从事这种救急的要求运动罢了。每每要求一次，妥协一次，最好的结果，不过是资本家从这方面增加几个工钱，从那方面抬高物价罢了。所以单靠这样的运动，工人阶级是永远不能摆脱工钱的铁锁，逃出“卖力”“饿死”的圈套的，换过说，就是工人阶级永远不能超出“工钱奴隶”的地位。

故在社会革命未实现以前，一天一天的要求运动虽然是必要做的，但是要以阶级争斗的精神去做，万不要以阶级妥协的精神去做。敌对阶级之间，只有“战胜”与“战败”可言，没有“调和”与“妥协”可言。譬如这次总罢工，要求增加工钱若干，目的达到了，就是一次小胜利，没有达到，就是一次小失败。失败了，固要抖擞精神再图战争，就是胜利了也更要一息不懈，愈接愈厉。争斗一次，就要把范围扩张一次，性质严重一次，战斗力团整并发扬一次，阶级觉悟和阶级抵抗显著一次。由一地方一行业的争斗，酿成全国全阶级的争斗，由继续不停的阶级争斗，酿成总解决的社会革命，实行取消阶级，建筑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共

产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从此完全解放，人类社会也就从此没有"人掠夺人"的罪恶制度了。

"由继续不停的阶级争斗，酿成总解决的社会革命，实行取消阶级，建筑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劳动运动的根本原则。

二、中国资本主义可怕的形势

凡工业后进国的经济生活，未有不受工业先进国的操纵、压迫的，至于被侵略的弱国、殖民地、就更不待说了。中国无用说是被国际资本主义侵略的弱国，但中国的资本家是不受害的，受害的只有工人阶级。

资本家不但不受害，而且他们所藉以上升的楼梯就是国际资本。原来工业后进国的资产阶级不过是国际资本的附属品。他们必须仰仗国际资本，才能开工厂、开公司，开银行。他们的工业资本、银元资本、既须仰仗于外资，所以他们的资格无异就是英、美、法、日、资本家的驻华代表。是显著的例，就是旧交通系和新交通系。

但他们以怎样的方法取得与国际资本勾结的地位呢？就是尽先占领国家机关，和夺取政权。譬如新旧交通系各首领，类皆为穷鬼、无赖、留学生出身，他们现在的资本和"财神"资格，都是由他们长期在交通部，外交部、中交两银行、以及别的政府重要机关中取得的。国际资产阶级要在中国树立一个保护债权，巩固其长久侵略地位的附属资产阶级，就舍却他们莫属了。

中国的资本家，现在虽然不仅只有新旧交通系，但是最近的将来，一面为国际资本所资助，一面结合野蛮的反动势力，来争夺全政权，以建筑恐怖政治与资本政治于中国的，迟早就是他们。由此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将完全形成为"恐怖的资本主义"质言之，就是"张作霖与梁士诒式的资本主义"。

据欧美各国的历史看来，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总是在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和资本政治巩固之中及巩固之后。同样的事情，现在就轮到中国来了。中国资产阶级，现在虽然这样微弱、无能，但是他们的第一举必然是掠夺政权，凭着国家机关，吸收外资，以供私人的产业经营；凭着国家权力、军警、法律、议院、以高压工人阶级，他们将以"戒严令"统治工厂的工人，以"枪毙"对待罢工者。

总之，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那派军阀财阀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这样"恐怖的资本主义"正是英、美、法、日、国际资产阶级要求在中国赶快建设的。

三、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

然则无产阶级怎样对付这种"恐怖的资本主义呢"？惟一的办法，只有无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组织工，兵，农，的国家机关，没收一切生产手段——地，大工厂，资本——和交通工具为国有，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发展中国的大生产事业，以建筑共产社会的经济基础。

原来资本主义在中国，无论如何，是不能充分发达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这是怎样说呢？分两层解释于下：

第一，就是因为国际资本主义始终是要以中国为原料地和销场，而不容许中国为完全的

大工业国。假使中国完全变成为工业生产国，不但根本杜绝英，美，法，日、的销路，而且中国加倍的价廉物美的商品反将输出于国外的市场，而占国际贸易的优势，那末国际资本主义无异是养成教他自己的刽子手了。这是国际资本主义，断不容许中国如此的。中国的工业一天发达一天，入口的商品就要一天减少一天，同时英，美，日，法，内部的失业问题，便将一天扩大一天。这是英，美，日，法的资本家，会容许的吗！决不会的。所以希望充分的外资来开发中国的实业，这不过是一种梦想罢了。

第二，然则中国的资本家，可不仰仗外资，而专靠集中"国内资本"来振兴实业吗？集中国内资本，可以办得几个工厂，可以修得几条铁路？这乃是完全不明国际情形和近世产业性质的稚想。自近世资本主义国际化以来，业已把东方隶属于西方了，农业国隶属于工业国了，野蛮国隶属于文明国了，还能成立锁国自立的"本国资本主义"吗？

国际资本既不容许中国生产事业大大发展，而国家资本又如此微弱不能独立经营甚么大产业，然则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革命就可想而知了。

资本主义在中国之必然的要倒霉，要短命，就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的要行运，要快来的对照。故中国劳动运动的根本方针惟有"早日在中国实行社会革命以促成世界革命，用国际共产主义的资本开发中国的实业"。

（《先驱》第7号，1922年5月1日出版）

广州一年来之劳工运动

陈 公 博

几年来受尽军阀压迫蹂躏的广州，居然在打破军阀之后，罢工八次，成立工会三十二，这不能不算是可惊可喜的劳工运动成绩。我对于这个趋势生出两个感想，一个是工人已有根本的觉悟，一个是今后社会已由政治问题而入于经济问题。由此两种感想，遂引起我今后对于工人的无穷希望。我现在先把一年来广州劳工运动的成绩列了出来，然后再述我的意见。

一年来广州市罢工总数

罢工团体	罢工时日	罢工原因
粤汉铁路工人	〔民国〕九年十月	抵抗桂军
广九铁路工人	十月	抵抗桂军
粤汉铁路工人	十二月	要求请发欠薪抵抗刘焕
电报局总管领班	十年一月	抵抗监督李瑞珍
革履工人	一月	要求减少时间恢复工价
搭棚工人	二月	要求增加工价
牙刷车骨工人	三月	要求增加工价
花地警察	四月	抵抗区长

注意　此外罢工的尚有九年十二月的潮安锡薄〔箔〕工人，十年十二月香港茶居工人，香港燕窝工人，香港织造工人，香港印刷工人。三月的佛山联生堂工人，香港打包箱行工人，佛山织布工人，虎门车衣工人，因为在广州市范围以外，不列入本表。

一年来广州市成立的工会总数

工会名称	成立时日
汽车驾驶工人总会	九年十一月
革履工会	一月
广州酒楼茶室研究工会	一月
理发工会	二月
货箱行工商研究会	二月
茶居工会	三月
旅业工人联合会	三月
印务爱群俱乐部	三月
机织总工会	三月
成衣工会	三月



木屐工会	三月
景源工会	三月
印刷研究会	三月
洋服工人研究会	三月
缝衣工社	三月
剃剜工会	三月
影相工会	三月
油漆工会	三月
派报工会	三月
油业工会	三月
制帽工会	四月
女伶工会	四月
装设电灯线工人研究会	四月
机器工人联合会	四月
木行工会	四月
工程师工会	四月
总工会	四月
木工行工会	四月
车务研究会	四月
广州金银首饰总工会	四月
机器工会	四月

注意，此外工会成立的尚有一月的汕头工会，六月佛山的理发工会，香港的洋务工会，因为在广州范围以外，不列入本表。

从上列成绩看来，除一两次罢工单纯含有政治意味之外，无不是增加工资，减少劳工时间——工人本身的问题。工人能够觉悟到本身问题，已是离脱了运动劳工运动的时期，而入于真正的劳工运动的时期，真是可喜的现象呵！至于工会的组织说是一年来的成绩，倒不如说是近两月的成绩，因为三十二个工会之中，倒有二十七个是成于三、四两个月，然莫为之前虽后弗彰，假使没有在先运动之因，也没有近两个月成绩的果，这是我不能不佩服广州工人毅力、勇气、觉悟、坚忍的地方。

但我对于广州工人一面抱无穷的希望，一面还有掬诚的说话：

（一）希望要为独立的政治训练。我们既认阶级斗争不能免，那么自然承认工人要为政治的训练。但我所谓政治训练，并不是单指现实的政治而言，实是为未来的政治而言。而现在的工会不独没有政治的训练，并且专被现实无聊的政治和政客支配。他且不论，即此次市参议会选举，闻得有许多人居然在工会里替资本家包办，替政客包办。我们为什么要组织工会？我们都是因为受资本家和现实政治压迫，才有这种组织，若是容这般阔人在里面侵略，岂不是把组织工会底原意都失了吗？岂不是组织这项工会专为阔人捧场底器具吗？我们工人底疾苦，那里关到他们身上？我们底体力为资本家牺牲已觉不值，若把精神组织也替他们牺牲，那更不值了。不独如此，大凡无论什么组织，有目的——尤其是本身目的，那团体必定

二二一八

坚固恒久，没有目的那团体必定散涣动摇。试问我们工会底目的是什么？以我们本身底痛苦为目的呢，还是以资本家底福利为目的呢？如果注重本身底痛苦就叫做有目的，替资本家政客捧场就叫做没目的。没有目的底组织，其危险小之只供一两个包办人在资本家政客面前献殷勤，大之可以供他人利用去营官业。这种危险并非我凭空臆想，都是已经发现而且还要继续扩充发现的。

还有一层以工会而受无聊政治的支配，将来政潮一有迁变，工会必会随着政潮播荡，甚者至于消灭。我们千辛万苦来组织——工会，其结果究竟等于寻常饮食团体，供人牺牲，我们反躬自问，究竟值不值？这是我第一层引以为憾事的。

（二）要为独立的自育组织。无论在阶级斗争成功之前，或在阶级斗争成功之后，我们工人所需要的全在知识。我且不说旁的，假使现在阶级斗争已经成功，一切工场交给我们管理，我们能不能？一切生产分配交给我们支配，我们能不能？现在未成功底时候，我们与有产阶级开战，要有相当底知识不要？要有充分的知识不要？但知识从什么地方来？除了教育就没有旁底方法。所以我对于无论任何工会，第一句说话，就要他们组织劳动补助学校。近代欧洲底劳工运动，其初发源都在伦敦风磨大街工人教育会。马克思还有一句话“今日底组织第一步是谋教育，有教育然后才有真正底组织。”今日世界固然已经有工人的真正组织，但在我们中国恐怕还在“今日的组织第一是谋教育”一句话的时代。今日广州工会自己组织学校的固然也有，但靠资本家补助的也不少。希望政府补助的更不少。资本家也许有觉悟，政府也许帮助我们，古语说得好“自己底力才是力，他人底力不算是力。”所以我们与其希望资本家和政府帮助，不如望自己帮助。

对于今日底工会，我底希望仅是这两点，并且将来工会底发展不发展我也以为在这两点。我底结论是：

（一）排除资本家；

（二）排除政客；

（三）自己教育。

我们工人呵！我们快快起来大联合！

（原载1922年5月1日《广东群报》）

《山东劳动周刊》宣言*

（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

本刊的同人自从去年"五一"节后组织了一个济南劳动周刊社。当时曾有一份简单的宣言写在前头。想来大家注意过的应当还能记的。嗣后因为经济不继，不得已宣告停止。在同人心中，总觉着非常抱歉了。现在感于世界的潮流和劳动界的需要，更觉着这种刊物的印行实在是刻不容缓，所以又勉竭驽骀，继续进行，并且从新改组，易名为《山东劳动周刊》，作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的刊物，也就是我山东劳动界同人交换智识联络感情的纯粹机关。形式上虽然有点变动，但是精神上却是丝毫没有变更，并且我们敢说，不但没有变更，且是比较从前更要纯粹，更要彻底，更要亲切，更要诚恳，这是同人们很可以自信的。所以这次本刊出版，也不用格外另作宣言，就把从先的宣言再录一遍，印在下边：

"我们为什么出这周刊呢？他的答案就是：我们出这周刊为的是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好向光明的路上去寻人的生活。

说到这里，又不免生出三个问题来：（一）劳动者怎样才能觉悟呢？（二）光明的路在那里呢？（三）怎样才算得人的生活呢？因为有这三种疑问，所以我们不能不再把我们进行的方针再简单的说明一下：

（一）增进劳动者的智识。原来中国劳动者的智识实在也不免太薄弱了，要想叫他增进，非努力教育不可。要想增进教育，非设法劝导他们，启发他们，使他们都知道教育的重要不可。所以平民教育不普及以前，我们这周刊要作一个前驱，平民的教育施行以后，我们这周刊也可以作一个补助。

（二）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劳工神圣原是已经确定的名词，不过中国沿数千年来的习惯，贵劳心者贱劳力者，显然分出个阶级来，才叫些强权者利用到今日。我们这周刊可以介绍各家的学说，引他们向光明的路上去。他们自己觉悟过来，那地位自然可以提高了。

（三）改造劳动者的生活。中国现在社会的情形，说到'人的生活'四个字，实在是有点担当不起，所以若要根本改造，非先从劳动入手不可。若是大多数劳动者都得到人的生活，其余的那些寄生虫类当然也可以容易屈服了"。

我们的宣言既然是仍旧不变，那么，我们这次出版，说是复活也可，说是改组也可。不过大家要知道的，从前的名字是《济南劳动周刊》，现在的名字是《山东劳动周刊》；从前的出版者是本社同人，现在的出版者是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从前的周刊是同人们对于劳动界的贡献，现在的周刊直接就是劳动界自有的机关，劳动界自有的喉舌。所以从前的刊行的责任属于本社同人，现在刊行的责任完全属于山东劳动界全体。就请我劳动界同人们赶快起来合力进行罢。

本刊同人

（原载《山东劳动周刊》第1号，选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

* 原题为《本刊出版的宣言》。——编者

京奉路山海关工人罢工矣

京奉路山海关工人酝酿罢工之详情，已志本报。顷该工人等已发出宣言书，原文照录如下。

工友们！同胞们！我们山海关工人受工头赵璧，及其党徒陈宏经等之虐待，和生活艰难，年长日久了。于今赵贼虽去，而其党陈贼仍留，千方设计，图谋破坏工人俱乐部并无端开除俱乐部委员佟惠庭景树庭二工友，我们曾向路局提出要求条件，已宣言过了。

工友们，同胞们，京奉路局曾于八月三十日并未向工人俱乐部磋商，单方用上谕式批复，对于驱逐陈宏经及佟景二工友复职，毫未提及，其他最低限度的经济要求，亦未允许十分之一，工人等忍不能忍，全体议决于本日（十月四日）以最后手段——罢工——对待。工友们！祈本"阶级的利益"，"奋斗的精神"与以"实力援助"。同胞们，请依"平等的原则"，"互助的友谊"表以"热烈的同情"。工友们！同胞，我们已开到前线放火了，祈起来努力助战啊，无产阶级的胜利从此开始了，人类的幸福从此传来了。

要求条件六则。

（一）速开革陈宏经请我们的代表佟惠庭景树庭二君复职，并将二君停工期间工资完全发给。（二）每星期日及各种假日，均要休息，并须发给全薪。（三）凡工人一律加薪，按十五元以下者加三成，十五元以上者加二成，五十元以上加一成。（四）以后每年加薪一次。（五）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损失极大，应照火车房例，同样发给奖金。（六）关于待遇平等，包含下列各项。（1）每年须有两星期假，假中发全薪。（2）每三年须有两月例假中发全薪。（3）病假必须发给全薪。（4）工人向厂买物及购煤，必须与员司受同等待遇。（5）工人家眷来往乘车，须发给全免费票。（6）每年发给五路乘车免费票一次。

（原载1922年10月7日《晨报》）

唐山制造厂工人实行罢工

唐山制造厂工人受各处工人罢工之影响，曾于上月向该厂当局提出要求六条，限时答复，业志报端。兹闻该厂当局与京奉局长接洽后，除工人所要求之“以后每年应加薪一次”，“及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之损失应照车房例同样发给恤金”二条外，余已分别办理，惟工人方面认为不满，因于前日复提要求六条，限路局于十月十二日以前答复，否则罢工。其要求之六条如下，（一）铁路当局应承认职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限。（二）以后厂中雇用和开除工人，须经过职工委员会通过。（三）铁路当局应在适当地点建筑工人居住房屋和工人俱乐部，并须设备自来水电灯。（四）工人因公受伤或年老不能工作时须养其终身，并照常发给薪金。工人死亡，工作一年须给两月工资恤金，工作二年给发四个月，余此类推。（五）罢工时间工资须照常发给。（六）消灭旧包工制度。及至十二日路局无答复，该工人等乃于十三日晨七时许相率罢工出厂，其时厂中员司尚未进厂，工人即将全厂入门处派人把守，并组织纠察队一千余人，维持秩序，及组织调查队，探访各机关消息，故秩序尚无纷乱状态。闻路局方面闻讯后，即于十四日派警务处长吴某前往调查，至今尚未接洽就绪云。

（原载1922年10月17日《晨报》）

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宣言

工友们同胞们呀，我们工人一身一世，如牛马一样的劳苦工作，自己所作的，自己完全享不着，这已经是够不平了啦，现在我们虽然那样的拚死作工，竟落得自己一饱一暖，都享不着，天下岂有这种道理。我们铁路上的工人，尤其是我们京绥路车务工人，一身如机器一样的跟着火车奔走，不论怎样的烈风暴雨，怎样的酷寒炎暑，不论日夜，火车转一下我们也得转一下，火车跑，我们也得跟着跑，什么节日啊！什么礼拜日啊，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些事。这也罢了，但终久也总得使我们吃几顿饱饭，穿几件暖衣，并且使我们家中老的小的得以安然养活罢，——我们京绥路车务工人，有许多自从火车头一天在京绥铁路上跑起，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至少的也跟着跑了五六年，计看这二十年来社会上的生活程度，增高了若干倍，京绥路线又延长了多少里，大人先生们的官俸又增加多少了，这些事谁都知道，独单单我们工人藉以养身养家的一点苦工资，至今却没有加多分文。工友们，同胞们，这是一回什么事。我们工人现在就是想拚命作工，也快要无命可拚了，我们就是怎样的想恶衣糟食，以维持这机械似的身体，现在也维持不下去了。加以我们家中待着的老小，不住的在后面哭哭啼啼，望着要吃要穿，这叫我们工人如何办呀。我们车务工人在万不得已之中，上次也曾呈请本路局要求加点工资，以维持我们的生活，不料一直到现在，差不多一个多月了，上面不但没有半个字批示给我们，反出一些通告，说什么我们铁路上几年亏了啦，希望本路职工人员安心服务，维持这条铁路——种种的话。哈哈他们积聚我们工人一些血汗，造成他们的快乐还不够，另外还想一些好听的话来哄骗我们。即使是真的，铁路上亏了，难道这是我们工人没有尽义务，或者把国家的钱，抢到荷包里去修洋房，讨小老婆去了，致铁路亏的吗？铁路上亏了，要我们工人补偿，来作要求加薪的抵制，这简直是要我们作了工，还是要我们的命啊！这是何等蔑视工人、欺骗工人，我们现在实在忍无可忍了。然而我们前天还是以诚恳的态度，向着当局作最后最低的条件请求，不料当局仍是一味的哄弄，还加着威吓，毫无顾及我们利害的意思。我们现在实在无法了，惟有出我们所不愿意作的最后行动，暂行罢工，静待解决。工友们，同胞们，与我们以实力的同情援助呀。

还有我们应当郑重申明的，就是我们这次罢工，系因被生活的压迫不得已而出此，完全是自己自决的，决没有受何党何系之指使，务要请大家谅解我们这一点。特此宣言，布告全国。并附录要求条件如左。

（一）工人一律加薪，从要求之日起实行。

（甲）工人月薪，无论多少，一律加增二元。

（乙）工人跑车饭费，一律加至三角。

（丙）每年加薪一次，至路局工人薪资表最高资额为止，但遇社会生活程度超过此项高资额时，须重新定薪资表。

（二）每逢礼拜日节日，路局官假，及工人应休息之假日中作工者应给双薪。

（三）工人因病身故者，给全薪一年于其家属；因公遇险身故者，给全薪二年，如系积劳或因公致病告假者，其假期不论长短，均不得扣薪。

（四）直奉战争期内，工人在官假中曾作工者，请照局电，一律补给双薪一月。

（五）承认现在之车务工人同人会有代表车务工人之权。

（六）局中因故开除工人，须先期以充分理由通知车务工人同人会，俾有辩护余地。

（七）工人亦须一律发给与本路下级员司同样之制服（京绥铁路车务同人联合总会）。

（原载1922年10月29日天津《大公报》）

正太铁路工人全体罢工

太原函云，正太铁路工人，迩来鉴于各路工潮之勃兴，曾于数月以前，组织全体工会。该会自成立后，精神颇为团聚，全路路工均行加入。据云，该会前月曾向路局申述彼等要求改良待遇之意，提出九条件，要求路局履行。旷日持久，尚未得复。工人至此，深知非和平手段，所能奏效，遂于十四日决议，即行总罢工，以示决心。现已发出正式罢工宣言，并要求条件。其条件如左：

（一）加薪分三等：（甲）现得薪金十五元以下者，加日薪二角。（乙）十五元以上至三十元者，加日薪一角五分。（丙）三十元以上者，照原价加十分之一。

（二）以后每年按第一条之规定，加薪一次。

（三）路局增用工人，须先尽容纳工会之所介绍者。

（四）凡车务处工人以及夜间守厂与屋外操作工人，均应由路局每年发给羊皮大袄一件。

（五）星期日，国家例假日，及重要劳动纪念日，均须放给例假；按照员司成例，并每年给二十天特假。例假及特假，仍给工资。倘若于假期间加工，而得工人同意者，给双薪。

（六）路局每月须辅助工会所办之每一工人学校二百元。开办费由路局全给。

（七）工作时间，不得过八小时，否则，照所增之时间增薪。

（八）工人因工受伤，除应由路局供给医药费外，其因伤不能做工者，仍发薪，治愈而成残废者，照最后工资给予抚恤至死后三年为止，除由路局给予三百元之丧葬费外，并照最后工资遗恤金于其家属至三十年。又在路局服务，满二十五年，或十五年，而年逾五十五岁者，应照最后工资给予养老金，至死后三年为止。

（九）由路局发给工人本路常年免票，及无限制之家属免票。并每年发给全国铁路免费通票三次。

（原载1922年12月16日《晨报》）

第三共产国际为二七屠杀告中国铁路工人

中国铁路工人同志们！

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得悉你们为反抗军阀——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忠仆而血战，敢用无限的敬信，祝贺你们从此以后不要从你们手中放松赤色工人的标帜，用你们困苦的最后罢工手段，加入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反抗世界的压迫者。

暂时你们虽尽少数工人做了反抗军阀的示威，但接踵而起来加入你们的队伍反抗军阀的同志，何止千万数！

你们最近罢工的口号——“工人自由集会结社”，你们当努力的坚持到底。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了，你们曾经开始了的斗争，实在是恰当的。你们在外国帝国主义和他的忠仆们——本国军阀压迫之下唯一的急务，是要打紧中国无产阶级的团结，增加自己团体的斗争力，以达到中国人民的解放。

你们的仇敌——军阀在汉口和北京，屠杀了你们的同志，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困苦的和你们向现有的军阀共同作战了，你们从此以后同中国共产党更亲密，并且由斗争的经验，可以了解必须与这个革命享共同的祸福。中国共产党不仅保护铁路工人的利益，乃是为全中国的无产阶级而奋斗的。

你们快同中国共产党一致，快同国际共产党中国支部结合，徐图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二月

（《劳工流血纪念》，1925年）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惨杀宣言

（一九二三年三月一日）

全国工人们，农人们，学生们，及一切被压迫的人们！这次吴佩孚，肖耀南，曹锟，靳云鹗等凶暴野蛮的军阀屠杀京汉路争自由的工人的空前大惨剧，想你们都已耳闻目见或身受了。那狡诈险恶的吴佩孚的“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也由他自己揭穿了。军阀与人民对抗的阵势也更加鲜明了。打倒军阀的要求和奋斗也一天紧迫一天了。

这一次的大惨杀，不仅是军阀惨杀罢工的工人，实在是军阀惨杀争自由的人民。在这反动的军阀政治之下，全国人民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系于枷锑镣铐之内，横受军阀的压迫和摧残，绝无自由可享。所以目下自由是我们全国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必需品，军阀是我们全国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大仇人。军阀存在一日，人民的自由就被剥夺一日。自由与军阀不两立，也即是人民与军阀不两立。凡我全体被压迫的人民，若不甘永过屈服于万恶的军阀压迫之下做军阀的奴隶，就应该一齐奋起，为我们的共同必需品一自由，去打倒我们的共同大仇人一军阀！

军阀之所以能残存至于今日，一半固由于我们人民没有革命的觉悟和组织，一半却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或明或暗地扶植。例如日本帮助袁世凯段琪瑞张作霖，英美帮助吴佩孚曹锟陈炯明，都是很显著的证据。国际帝国主义深怕中国人民觉悟进步的势力发展将阻碍他们在中国肆无忌惮凶暴露骨的榨取，故极力用种种法子(金钱或枪械)扶植我国反动的军阀来压迫我国的人民，务使我国永为他们的消费市场和原料产地，以遂其操纵我国经济政治实权的资本欲大野心。最近且明目张胆惨杀我们唐山汉口等处为争生存而罢工的劳苦同胞，催迫肖耀南杀死我们的为劳苦群众利益而奋斗的共产党员施洋同志，其横暴狠毒压迫我劳苦人民，绝不下于我们万恶凶暴的军阀。所以我们一面须打倒本国军阀，同时还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早已对国人宣言：要救现在纷乱已极受军阀和外力两重压迫的中国，只有团结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协同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无产阶级，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一法。现在实际的形势更加证明我们这种主张是目下全国被压迫的人民的唯一的出路了。吴佩孚肖耀南曹锟辈的惨杀京汉铁路争自由的先锋军，北京军阀政府和傀垒国会的毒打请愿学生和示威市民，帝国主义的惨杀唐山汉口上海各地为争生存而罢工的劳苦工人，……等等悲惨横暴的事实，都不能各个单独解决，必须要有一个整个的统一的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才能解决。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祖师马克思曾经告诉我们一句金言：“团结即权力”。自从这句金言出世以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闻风响应互相团结成了国际的结合以与国际资本主义相斗争；最近且使全世界被压迫民族都觉悟了加入了这个战线，造成全世界最伟大最强固的革命的势力。我们深切地知道：只有权力才能战胜权力，组织的权力是最伟大的权力。军阀

和帝国主义有组织，我们无组织，故我们敌不过军阀和帝国主义。我们要战胜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必须遵守马克思这句金言，先把自己组织起来一再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都组织在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共同的革命目标之下，一齐拚命地向军阀和帝国主义进攻。如此，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得着！

一切被压迫的民众，最勇敢最觉悟最有革命精神最有战斗势力的分子，就是屡次为争生存争自由而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工人同胞。这次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全国被压迫人民所共同需要的自由而遭吴肖等凶暴军阀的大屠杀大压迫，实际就是全国公敌军阀对于我们全体被压迫人民的最勇敢的先锋军的大屠杀大压迫，也即是对于我们全体被压迫人民的大示威大压迫。我们最勇敢的先锋军组织一日不能强固，我们对于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进攻也就一日不能得势。我们全体被压迫人民的利害，是与我们的先锋军一工人同胞的利害一致的。所以我们全体被压迫人民对于此次京汉路工人"二七"大惨剧，绝对不能如隔岸观火一般，须一律感同切肤，我们为争得我们所共同需要的自由，打倒我们共同的仇敌一军阀和帝国主义，须首先援助京汉路及各处被封工会的恢复并促进其组织的巩固。这是一切被压迫民众的共同的急切的任务。

工人们，农人们，学生们及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我们受军阀和帝国主义两重压迫已经很够了，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需要已经迫在眉睫了！我们三十九个为争自由而惨死的同志已在血阵中招呼我们冲上去了！我们须一致团结起来奋力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争回我们的自由以继诸先烈未竟的伟业呵！

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三月一日

中国铁路工人的罢工

（一九二三年三月八日）

马　林

今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由于迫切要求成立全国总工会，而付出了血的代价。就在这一天，四日就开始的罢工在长辛店和汉口这两个中心遭到了镇压，北方是曹锟将军的军队，南方是汉口督军的军队对群众进行了枪杀。在长辛店有五名工人死亡，十五名工人受重伤；在汉口被枪杀的人数不下三十二人，几天之后汉口工人运动的两位领袖火车司机林祥谦和律师施洋被杀害。后者是根据"自由派"将军吴佩孚的特别命令执行的，这次罢工是由于吴佩孚用武力解散二月一日召开的铁路工人总工会成立大会而引起的。从此，出现了一股反对共产党人和北京激进学生的反动浪潮，它遍及中国的各大城市，甚至到达上海，它不仅是来自上述两个军阀，也得到所谓的"中央政府"的支持。

铁路工人的罢工促使我们为本刊撰文，报道年青的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

在这个大国，现代工业还处于很年青的状态，到目前为止，仅在几个中心城市有所发展，在内地的一些省份有发展大工业的雄厚条件，然而在这些地区还没有现代交通，中国广大群众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几百年以前的水平。尽管中国同外国掠夺者已接触了几十年，然而外国的影响至今未能推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向前发展。但是在沿海及铁路沿线的几个中心城市，人们过着现代化的生活，近几年来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这里建起了现代的矿山和工厂，出现了一支现代的产业大军，这里不仅外国剥削者的财富，而且本国的工厂主——他们有的同外国掠夺者合办企业，有的独立经营现代工业——的财富都在增长。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有廉价的劳动力，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受到广泛的剥削。在现代工业中，老的行会已起不到保护工人的作用。相反，在大工厂中它将工人按省籍分开，在例如长江沿岸和上海等地的秘密组织在反对工厂主的现代斗争中也毫无作用。

华南的海员中，产生了第一个现代海员工会。他同民族主义运动及其领袖孙中山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广东省省会广州，大多数企业中行会至今仍是建立新的组织的障碍，尤其是它妨碍工人力量的统一，而海员已经有了自己的同盟，该组织集中了许多海员小组，正是这一同盟，通过一九二一年初著名的大罢工，极大地推动了各地的工人运动。这次罢工一开始只是为了提高工资，但香港英国当局的干预使它具有了政治性质。民族主义政党（这时在南方组织了孙中山为首的政府）声援罢工的海员，全力支持海员的斗争，使年青的同盟能坚持较长时期的斗争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时在上海的海员（他们来自另一省份），尽管他们未参加罢工，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还与香港的海员同盟取得了联系。香港的海员争取提高了工资，上海虽然未经罢工，海员的工资也提高了，只有一中国公司是经过当地的一次罢工才被迫这样作的。

华南海员罢工的成绩还表现在它促进其他工人（建筑工人、冶金工人及许多较小的组织）

也开始改组他们的组织。民族主义政党对工会的影响是很大的，不过一九二二年六月孙中山的失败使工人组织的发展暂时中止了。孙中山对工会的影响的确很大，这可以用下述事实说明：陈炯明的死对头恰恰是工人，他们对推翻陈炯明的斗争热情比资产阶级分子高得多。今年一月底，这位军阀又被赶出广州，而孙中山回到广州时受到当地工人组织的热烈欢迎。

华中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大，当然在运动中也表现出民族主义思想，然而运动的组织工作主要是由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作的，学生们通过我们的同志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接触到共产主义。一九二一年这些学生的代表组成劳动书记处，开始在上海、北京、汉口、长沙（湖南）等地开展组织工作，在北京和上海出版周报，开办一些培训工人宣传员的学校。

在铁路上进行的宣传工作特别有成效，工人们有计划地筹备成立铁路工人总工会。在京汉线上就成立了十六个地方工会，今年年初总共有会员一万二千人，各地都必须克服许多困难。工人大多数是文盲，地方当局常屈服于外国人的压力，反对工人的组织活动。特别是在实际上被外国人全部控制的上海、对组织工作进行了迫害，上海的卷烟及纺织工人举行的每次罢工，领导罢工的工人都被逮捕，并被长期关押。有些外国报纸虽然不时报道丝绸与纺织工业中的可怕状态，却总是准备采取一切手段使工会运动不能进行合法宣传。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经判罪的罢工领导人坐了几个月监牢之后又被送交中国当局，又立即被关入中国监狱中，并被无限期地关押下去。

一九二二年的特点是华中举行了多次较小及较大规模的罢工。今年年初参加纺织工人罢工的两名青年学生，在长沙被当地督军逮捕并杀害了。开始多数罢工都以增加工资告终，但去年夏天上海卷烟及纺织工人罢工时，资本家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让步而且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通过饥饿迫使工人放弃斗争。另外"基督教青年会"还插手将调停人派到罢工的工人中去，企图抵销劳动书记处的影响。在汉口（湖北）京汉线及汉口长沙段的铁路工人举行过几次罢工，在这些罢工中冶金工人、纺织工人和烟草工人也通过斗争实现了增加工资的要求。在汉口一长沙段的斗争中，罢工的工人卧在铁轨上以阻止火车开出，这时有四名工人被杀害。汉口工人斗争不仅是为了提高工资，还反对铁路当局的残暴和警察的干预。这一年汉口发展了许多组织，半年前汉口各组织成立了联合会，包括二十四个组织，共四万名会员。所有的组织工作都是由我们的同志领导的。这二十四个协会中有汉冶萍钢厂（矿工、冶金工人、运输工人）的总工会，一万人；汉口一长沙铁路段工人工会，五千人；京汉线南铁路段工人协会，五千人；此外还有三千名冶金工人、三千名纺织工人，六千名人力车夫等。

唐山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是年青的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重要事件，有三万名工人参加了这次罢工，天津的英国当局为了保护英国的矿山打算从天津派出军队，从而使这次罢工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在这些地区没有国民党分子的组织。国民党过去是，至今仍然是华南的政党。工程学校的学生曾声明支持工人，他们为了表示抗议而举行罢课。中国当局派出自己的军队到唐山，以防止英军的干预。几个星期之后，罢工者的处境变得很不利，因为罢工所需要的大量费用无法募集到。北京的学生援助唐山工程学校的同学，但是罢工的人数实在太多了。在一次特别会议上，铁路工人曾讨论过，是否有可能举行罢工以确保矿工的罢工取得胜利，但铁路工人的力量太弱了，无法实现这一计划。铁路工人不得不限于对矿工进行物质援助，但中国工人的工资太低，难以作到多援助一些。铁路工人捐助了三千元，从当地的条件

来看已不算少了。经过罢工工人的工资略有增加，实际上矿业公司得胜了，清除了工人中的激进分子，从此以后在工人中间只有一个小小的地下组织，它与劳动书记处保持联系。

京汉线上的铁路工人组织，于去年年底得到很大发展，有可能成立一个总的组织了。到目前为止，控制京汉线的吴佩孚将军还未采取什么措施对付工人。相反，他的政治顾问同北京大学激进派教授之间的个人关系被我们以典型的中国方式充分利用了。一些铁路工人组织者被安插在这条线上，继续进行宣传。这个例子绝不能说明吴佩孚这个"民治主义者"会承认工人的权力，他的保护有一些坏处。新的组织可能被吴佩孚的军队控制的危险是存在的。只是在工人想要举行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斗争时，他们才真正了解吴佩孚观点的这一方面。吴佩孚对铁路工人组织的同情以及他对他的铁路线上发展起来的新权力的认可究竟有多大价值，已从最近的一次罢工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次罢工是在北京大学的学生进行反对现中央政府和支持受爱戴的蔡元培教授的斗争时发生的，蔡教授由于认为新上任的教育部长完全不称职而辞职的。北大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普遍性的学生运动，学生们打算动员店员组织也加入反对得到曹锟元帅大力支持的现政府的斗争。尽管这一政府是违背吴佩孚的意志而建立的，而且这两个军阀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但吴佩孚却往"卡诺沙"去了，放弃了与反动元帅曹锟的斗争并赞成曹任下一届总统。吴佩孚完全投入了反动营垒，自然也就反对学生进行反现政府的斗争。

他了解他的铁路线上学生们的活动情况，因此他打算阻止铁路工人总工会的成立并制止一月三十一日在郑州（河南）召开的会议。约有一百名铁路工人和一些积极参加组织工作的学生出席会议。在会议已作出决定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并确定了选举执行机构的办法时，突然遭到军队的阻挠，不能再继续下去。派往洛阳同吴佩孚谈判的代表也不能改变这位民治主义者的决定。因为工人已同激进的学生和教授相结合，因此吴佩孚反对成立总工会。会议是在到会的杰出代表们提出了保证集会权利、惩办郑州警察头目、赔偿损失等项要求之后才被迫解散的。如果要求得不到同意，工人就要于二月四日开始罢工。罢工委员会已选出，并立即出发去汉口，指望在那里争取工人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汉口有强烈的要求立即罢工的倾向，四日京汉全线交通陷于瘫痪。政府起初打算出面调解，但军阀曹锟和吴佩孚都不主张这么作。吴派出他的技术连去郑州镇压，但未能成功，从北京向北方的中心长辛店派兵，汉口吴佩孚的心腹肖耀南对罢工进行血腥镇压。吴佩孚大将军曾企图征服河南的几千土匪，未能成功，他发现除将他们收编成"正规军"外，别无其它办法。但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却能轻易地用武力取胜。汉口学联及工会联合会已声明以各种方式支援罢工者。由二十四个工会派出的大型代表团六日向铁路工会表示汉口工人准备投入战斗，并将于九日举行罢工。六日在汉口举行了一次完全秘密的外国工厂主及商人的重要会议，至今没有人知道会上究竟讨论了什么问题。中国的资本家还表现出想要妥协，而欧洲殖民主义者在国外、在这里的心理状态都使人认为：七日的流血事件直截了当地就是六日秘密会议的结果。

以下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不仅镇压铁路工人，还封闭了汉口工会联合会，逮捕二十名各协会的工人和约三十名参加斗争的烟草及纺织工人。北京对汉口发生的事件还不了解，这时长辛店工人派代表通知学生说有五名工人被害，十五人受伤，十一名领导人被带到曹锟管辖的Taoingin去，还拿出了死难者的血衣，证实他们的消息。学生向政府提出七点要求，最重要的是承认工人的结社权，惩办元凶，给死者家属赔偿等。第二天学生举行示威游

行，他们想冲进去见民国总统，但未成功。汉口的消息都被封锁，那里实行了新闻检查。两天后就传来工人群众被杀，组织活动被镇压和铁路运输恢复的消息。

汉口中国当局的行动完全是有计划地进行的。他们逮捕了一些工人活动分子，那里的铁路工人要拯救他们的同志时，他们又设圈套，对工人开枪，结果已如上述，之后五十名影响最大的工人被捕并押往车站，汉口军队在那里三次要求铁路工人领袖下令复工，他都坚定地回答："只有我的工会才能命令我这样作"。于是英雄林祥谦被绑，在五十名工人面前被杀并枭首示众，威迫工人放弃罢工斗争。残暴的士兵又将林祥谦的弟弟，同他一样也是一位罢工者，在他家里杀害。他们威逼五十名被捕者回去复工，否则统统处死，他们别无他法，只好屈服，因为再抵抗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勇敢的士兵又接到命令搜查铁路工人居住区，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却没有找到罢工委员会。委员会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建议举行总罢工。汉口一长沙段已有许多铁路工人参加了罢工，一起罢工的还有长江沿岸的冶金工人和运输工人。显然这些罢工只能引起进一步的暴力镇压。汉口一北京段的铁路工人被迫复工，还被禁止相互交谈。津浦线铁路工人也举行了短期的罢工，罢工未能继续进行。十日铁路工会和汉口联合会发表宣言，宣告罢工结束，并宣布组织活动还要继续下去，同沾满人民鲜血的暴君清算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尽管反动当局发布逮捕令，铁路工会罢工委员会的成员还是顺利地离开了汉口，但我们的同志施洋，三十六岁的汉口联合会法律顾问被军阀肖耀南逮捕关押。我们都知道他有生命危险。这位以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半年前加入我党，是年青的工人组织的真正领袖、顾问和朋友。军阀萧耀南对这些也都很清楚，但是在吴佩孚从洛阳下令之前不想将他杀掉。吴下令后，施洋被枪杀，当时的情景就象从照片上看到的那样，他面带微笑，坚信他的理想将在中国实现。

他死后遗孀带着孩子来到上海，把照片交给我们，使国际的同志能看到东方人也能为崇高的思想献身。

我们还能举出许多残暴地对待工人的事实。在洛阳附近禁止商人向罢工工人售货，一名司机拒绝开车，在郑州车站被绑，当着许多铁路工人被鞭打。

紧接着北京发布了对十一名同志的逮捕令，他们在党的周报上发表过文章。国务总理声称，陈独秀和李大钊两同志逮捕后将处以死刑。上海发布了同一逮捕令，党报的主编也被捕，在整个铁路线上反动派都得胜了。我们工会组织只能在地下活动。这一时期，我们懂得了应该给予中国同志的不大的小组的勇气和积极性以高度评价。

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些事件引起的反响并不大，这一大规模的屠杀在全国来说几乎未被人们注意到。中国新闻界，国民党报纸除外，对此未提出任何抗议。欧洲的报纸在报道了一名传教士被匪徒绑票时总是十分激动的。现在却不仅不发表任何批评，而且相反还怕发表会激怒官方的煽动性消息。一名中国工人的生命是不值钱的。而传统的观念在这里仍然存在，他们认为最好还是用子弹来教育这些胆大的、要求愈来愈高的、厚脸皮的工人。

上海的报纸上，近日来无中生有地刊登了关于将发生一次全国性抗议罢工的消息来进行煽动，而且中国当局发布了戒严令。在根本不能给死者家属必要支持的情况下谈什么总罢工呢！但我们的同志在长江沿岸又开展起工作，建立组织，它们将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剥削者和军事专制统治的斗争中起极大的作用，长沙的学生黄爱和庞人铨、汉口的火车司机林祥谦

及律师施洋，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在工人运动中牺牲的无名英雄，他们是当代建设新中国的成员，在新的中国千百万人将铭记烈士的英名。

——译自《共产国际》（德文版）1923年

第27号，第120—125页

（叶秀玉译，钱文彩校）

（选自《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

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

（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君　宇

这一回京汉罢工的失败，有两个大原由：

一是军阀武力的摧残。

一是工友的组织还未完善。

手无寸铁而组织幼弱的工人们，加以如虎如狼的兵力压迫，那自然是抵敌不得，所以京汉罢工就失败了。不过，我们确信：假使京汉工友的组织更较完固，势力虽终不足抵敌持枪带刀的军队，也不至受摧残到如是地步。

现在情形是很明白的，我们需要的自由是没争到，屠杀我们的军阀是更横暴了，我们的组织——工会——是被摧残了。这是证明我们更不自由了。我们要为了自由而奋争，应当比过去还勇敢努力。我们要努力恢复我们的工会，恢复和扩张我们的势力，以期打倒摧残我们的军阀，争到我们未获得的自由。

我们绝不灰心！我们从事的是个很长远的战争，这回失败不过是我们开场的暂而且小的挫折罢，我们决然要继续这个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组织我们是第一重要了！我们需要再组织成工会，就是努力使被封工会恢复，产生出很完固有力的团体。但我们只有完固有力的工会，还是不够奋斗的；从这回京汉罢工被摧残，使我们看明了。当京汉和武汉罢工被摧残，工会被封之后，工人中的重心和交通便消失了，行动上骤感非常的困难；这证明工人要于工会之外另有组织，才能奋斗。工会之外，还要的组织是什么呢？就是政党。我们早和工友们谈过的：我们所从事的是个战争，为了这个战争的胜利，工友们一致的很完固的组织成自己的军队——就是工会，是非常的必要；不过只有兵士群众的组织，必不足应付战争，要和通常军事组织一样，于兵队之上还有参谋部的组织，计划和统率全工人阶级利益的争斗。参谋部就是一个政党。

这个政党是怎样个政党呢？是帝制派或复辟派吗？不是的！——这些是替一人一姓谋皇位的奴才，绝不是工人的政党。是交通系进步系或安福系吗？也不是的！——他们都是官僚们升官发财和捧军阀的结合，不是替工人阶级谋利益的。此外，什么民主派呢，什么无政府"党"呢，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派呢，虽然他们于工人初步利益在相当范围之内也表示赞助，但他们也都不是始终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派别。现在一切政治团体，惟一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只有一个共产党。我们工人需要于组织工会之外，还组织政党，我们要的政党就是共产党了。

全国奋斗的工友们当然会记得，这几年来共产党是怎样和我们一块儿奋斗呢！他起首引导我们组织工会，又助我们争到工钱的增加，使我们大家认识"团结就是工人的势力"，他的目的在不断的领我们向解放之路，所以他决不畏难与懈怠，又引导我们来争我们最迫切需

要的自由了。这几年他和我们肩并肩亲密的奋斗，至少当已使我们认识，他是始终为我们阶级利益亲切奋斗的了。这回他的党员与工友们奋争自由，至于被屠杀而都不稍畏缩，是何等勇敢的为阶级利益奋斗呢！而不久在北京开二七被难诸工友追悼会，当时并未曾受何等武力的压迫，不但招牌社会主义者们没有人来，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代表（国民党议员）也没到了一个，他们对死者甚至连这么点同情心都没有！这件很小的事情，不但证明共产党是为了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且是惟一的为了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政党呀！

这里就许有人接口要问：共产党不就是“过激派”吗？不就是在俄国“杀人不眨眼”的那一党人吗？——可怕，可怕！你是听了好些关于俄国革命的话吗，你是被那些消息震吓过吗？但我要问你，你可知你听过的消息是从什么来源传来的吗？我可立即指出那些谣言和咒詈都是华洋资本家和白党炮制，经他们宣传机关传播来的。他们报告过列宁的死，不知有若干次了，然而列宁却未曾死，他们是造谣可证明了。资本家为何要造俄国的谣言呢？就是因为俄国是工人革命，国家由工人管理了；如果各国工人都要学起俄国的榜样来，全世界资本阶级马上就得要倒；所以美日法等强盗国家，便一致努力一致造苏俄的谣言，捏造他好多坏话，来蒙蔽全世界的工人们，使他们消失对俄国革命的同情，所以我们这几年关于俄国的听闻，大半是被他们欺骗了。哪一个革命能免掉了杀人？俄国共产党人是杀过人的，但杀的是阻挠革命进行和反对工人利益的那一类人。“过激派”的确是可怕的，且要使人吓得抖擞的；但这话是要对全世界资本家说，因为“过激派”的革命是在推翻资本主义。资本家永远是工人的仇敌，我们没有所为来怕“过激派”；资本阶级恨“过激派”，怕“过激派”，替“过激派”造谣，反倒证明“过激派”就是在我们工人这边，他所反对的就是我们工人的仇人，他们所争斗的就是工人的利益。这或者倒是我们不当怕“过激派”，反要去和他亲密的一大理由！

我们的现在的责任很明白了，我们要努力去恢复我们的营垒（工会），同时也要努力组织好我们的参谋部，凡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驱，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内。

“确认于工会之外，还须有党的组织，这是我们这次失败之下，一个很有益的教训。假使工友们努力迅速向这个需要进行，努力去扩张共产党的势力，我们损失的马上就会恢复。”

中国共产党万岁！

（选自《京汉工人流血记》）

“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

张特立

一、“二七”前工会运动之发展

我国北方和中部的真正工会运动，发生于民国十年，尤以铁路工人得风气之先。由是工会运动，风起云涌，彼响此应，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推其原因，系由于工人身受种种痛苦，因而要求改善，更因而组织工会。在工人所受种种痛苦之中，最先感受的原因有二：一、中外员司之虐待，如刻扣工薪、贿赂公行、包卖米粮、包赁住宅、放印子钱、私行役使等等，种种黑暗，罄竹难书；二、经济的压迫：车务工务两部分铁路工人，大概月薪都是九元左右；机器匠的月薪，以十五元上下为最普遍。生活日高，而工人工薪如此低微，数口之家，何以度日！

但是工友们怎样知道组织工会，就能改善他们所感受的痛苦呢？换句话说，便是有什么事实，发动工友们起来组织工会的观念呢？这里也有三种事实：一、五四运动虽然是排日的爱国运动，而又完全是由学生发起的，但是五四运动完全表现一种群众的势力。工人们看见学生一有组织，便能殴打公使、罢免总长，于是也就起来组织职工会或十人团，赞助学生的爱国运动；后来这种爱国组织便一变其色彩，而为工人的经济组织了。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劳动运动，澎湃已极，报纸连篇累牍，日有登载，中国工人不免受其影响。尤以俄国工人之大胜利，最能惊醒中国工人。三、一班信仰共产主义献身工人阶级的志士，最先组织工人补习学校、劳动组合书记部等机关，宣传工会的作用，开发工人的知识，并实际赞助工人们组织工会。

在这里有一点，须特别注意的，便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铁路工人曾经也受过很大的刺激，开始发生的对于政治的兴趣。那时也有少数志士提倡工人组织团体，结果都失败了。其失败原因是：那时的工人团体，并不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人团体的宗旨只图参加选举，而未注意工人切身的经济要求，所以失败后，就烟消云散，并未在工人群众中留下丝毫影响。五四运动后，一班提倡工人团体的志士却不然，一面助长工人的爱国运动，并因利乘便的输入正确意识，一面宣传真正工会组织的意识，并进而引导工会为工人切身利益而奋斗。所以“二七”失败后，工会虽然被封禁了，但是真正的工会的观念，依然存留在全体工友脑海中；还有不少觉悟分子在“二七惨变”，后，仍为工会努力；足见“二七”虽遭重大打击，工会运动却依然进行不已。

工会运动既然有了工人的经济痛苦和种种虐待做基本原因，同时又因五四运动的发生，使工人知道群众的组织势力，世界各国的劳动运动又做了工人们的实际例证，又有一班志士的正确指导，所以真正的工会运动，就发生于民国十年而莫可抵挡了。

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发生于两个地方：一是唐山，一是长辛店。五四运动的时候，京奉路唐山南厂工人即开始组织职工同人会，于民八“五七”国耻日举行示威运动，曾有三千余工人

参加；该会并加入唐山各界联合会，做种种爱国运动。后来爱国运动渐渐消沉下去，职工同人会的色彩也渐渐改变；直至民国十年，遂变为纯粹的工会组织了。五四运动的时候，长辛店工人即有十人团的组织，加入者二百余人，开始与北京一班热心工人运动的志士接触。民国十年一月一日，才成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该校在发起之初，为长辛店一班有力工头、工人中觉悟分子及热心工人运动的志士所主持；至同年五月一日该校遂发起千余工人之示威运动，并产生工会的初步组织。后来经过许多困难和分化，淘汰了一些不良的工头，才成立了纯粹工人的工人俱乐部。铁路工人既然有了这两个组织，同时还有一个《工人周刊》替工人们鼓吹工会组织的消息，传达工人们的意思，因此各地各站的工友们都一致奋起发动他们的组织了。

工人们初有组织的时候，同时也就发生经济的奋斗。这就证明工人们受了不可忍耐的痛苦，简直不能等待他们有坚固的团体，即勉强举行罢工运动。这种事实，也证明工人运动并非凭空由少数鼓吹而成，实是有不可忍耐的痛苦为基本原因。十年八月间有长辛店工务处工人的加薪运动，十一月间有粤汉路工人的加薪罢工运动，陇海路工人驱逐洋总管若里的罢工运动，十二月又有汉口人力车夫及香烟厂工人的罢工运动；还有许多的零碎的加薪和改良待遇的运动。

当工人们进行工会组织的中间，当他们举行罢工运动的中间，他们得着了许多的教训。第一点，他们知道和平的哀求是没有效果的。如粤汉工人上禀要求加薪，结果不但不能加薪，还被开除八十一位小工。而且他们从此觉悟幸福与利益，是要靠工人自己的力量奋斗得来。第二点，惟有工人才能帮助工人。在他们组织工会和罢工运动中间，路局员司军阀官僚交通系等等都是或明或暗的破坏他们或压迫他们；只有同一阶级的工人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热心志士是忠实的帮助他们。如陇海工人罢工中，路局千方百计破坏罢工，竟想利用京汉工人往陇海开车，以制陇海工人之死命；但是京汉工人不但不受利用，反而赞助陇海工人。第三点，他们渐渐了解组织愈大，力量亦愈大。这是他们开始组织的时候，以及每一个组织问题中或运动中，都能直接感觉，无须特别举例证明。这些教训因此又变成促进工会的要素了。

接着就有十一年春间的香港海员罢工，那次罢工参加的海员至三万人，支持至五十七日之久，算是我国工人运动有史以来的一桩惊天动地的事件。那次罢工不但得到香港和广州全体工人的同情罢工和经济援助，而北方工人，亦极为兴奋。京汉、京奉、陇海、正太、京绥等路工人，发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曾举行许多次大会，并发出许多通电和文告，一面向铁路工人宣传阶级休戚相关之义，一面充分援助海员罢工。正当海员罢工的紧急关头，"援助香港海员"的旗帜从北京一直飘扬到汉口：陇海、京汉、京奉、正太、京绥等路工人汇寄海员工会之捐款，至二千元。这就可以表现北方工人运动怎样受海员罢工的影响了。海员罢工之大胜利，又使全国工人更确信工人阶级的组织势力，而工会组织因之也更易发展了。

自海员罢工胜利以后，全国各地的工会运动和罢工运动有如雨后春笋。而工会组织得最完善的，有京汉铁路工会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等。罢工运动最重要的，有五月间的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七月间的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八月间的京汉工人罢工和九月间的安源矿工罢工等等。而且这些罢工都得着相当的胜利。不消说得，罢工胜利的结果，自然使工人得到许多的新教训，工人的团结力亦因之而增厚，工会的组织更易扩大到各地各种工人了。

工会发展的过程中间，遇着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便是集会结社自由问题。工会发生之初和罢工运动中，没有一处地方未曾遭过强权压迫或武力恫吓。如上海纺织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之被封禁，京汉及各地罢工中以及安源矿工罢工中，都遇着严重的武力恫吓。因此十一年八月曾发生全国工人的劳动立法运动，要求国会通过劳动立法案。这个劳动立法案共十九条：第一条即是要求承认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第二条要求承认工人同盟罢工自由，第三条要求承认工人团体的契约缔结权；同时又要求取消束缚工人的治安警察法和罢工刑律。工人们从痛苦中了解自由之可宝贵，要求自由之迫切，于那次布满全国的劳动立法运动中完全表现出来。自然直系军阀豢养之国会，丝毫不能给工人以自由权，不过那次运动，是工人群众争夺自由之必须的初步办法，也是工人群众进行政治运动的发端。十一月间唐山五矿三万余矿工发生反抗洋资本家的虐待和要求加薪的罢工运动；罢工支持至二十余日，竟横遭洋奴杨以德的武力压迫。唐山矿工会、京奉路唐山工会、洋炭工会都被封禁，矿工伤五十余人，京奉路唐山工会书记彭礼和君被捕入狱。那次矿工罢工之受摧残和工会之被封禁，北方铁路工人异常愤激，愈觉得非夺到工人集会结社和罢工的自由不可。

正当唐山矿工罢工失败之际，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聚集北京，议决各铁路一致罢工，要求恢复唐山铁路工会、矿工会和洋炭工会，并承认矿工条件，虽然因为时机已过，各路罢工运动没有实际举行，足见那时工人所感受的切肤之痛，便是压迫工会的事件。那次会议最终决议有两点：一、筹备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次第统一各路的组织；二、如某路遇到压迫时，各路工会一致行动，以图全体互相保障工会之存在。从这两个议决案看来，那么，我们便知道，十二年二月一日京汉总工会成立大会被禁止，因而引起大罢工，诚非偶然。

综起来说，北方及中部工会运动到"二七"时，发展到什么程度呢？铁路工人有组织者，如京汉、京奉、津浦、正太、京绥、陇海、道清、粤汉、株萍等九路，共计会员约四万人。武汉有二十个工团组织的工团联合会，人数约三万人；湖南有十四个工团组织的工团联合会，人数亦在三万人以上。北京天津济南等处，亦均有各业工人之工会发生。那时工人方面的计划是：先成立京汉总工会，再次第成立各路总工会，再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为铁路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各城市成立各业工会，再由联合而成立各城市工团联合会，准备于同年五月一日在武汉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谋全国工人运动之统一。工人们这种一日千里的进步和这种伟大的计划，军阀岂有不忌刻之理，怪不得吴佩孚揭穿假面具，而实行其大屠杀工人的阴谋了。

二、"二七"大罢工之始末

我们知道工会运动正在猛烈发展之中，而团体尚未集中，基础尚未稳固，正是工会运动最危急的关头；十二年春间就是我国工会运动的一个最危急的时期。我在前面已经叙述了北方及中部工人运动发展的大略，现在我再特别说说京汉工会蒸蒸日上之形势，证明"二七"罢工是不可免的事变。

民国十年以来，京汉工人陆续组织"工人俱乐部"，至十一年春，全路皆组织就绪，得十六个单位。四月九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筹备组织总工会，整饬和划一全路的组织。八月十日复召集全路代表于郑州开第二次会议，制定总工会章程，举定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决定总会地点设在郑州。紧接着第二次会议以后，即同月二十四日，复由北段工人发起全路总同

盟罢工，作第一次经济的奋斗，全路一致响应，支持二日，结果工人胜利，路局不得已承认工人九条要求，每人每月加薪三元。足见京汉工人稍有全路统一的雏形，便不能忍耐，奋起而为改良生活之决斗。胜利自然又给与新的兴奋，京汉总工会也就无形中得到了一种权威了。总工会筹备了四个多月，十二年一月五日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复在郑州开会，尔时全路纪律确已一致。即该路少数工人组织之传习所，亦自行宣告取消：该所之百余工友，亦悉数加入总工会。至是全路总工会统一之局完全告成，遂定于二月一日在郑州正式举行京汉总工会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既已定期举行，于是由筹备委员会登报宣告成立总工会的宗旨，并邀请各工团各界到郑州参与盛典。不料一月二十五日京汉局长赵继贤南段段长冯澐忽致电吴佩孚，要求其禁止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遂利用机会，以赵冯等报告为根据，下令靳云鹗严禁开会，靳又指使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执行一切；至一月二十八日，黄殿辰即到工会声明禁止开会，工会与之相持三日，终无结果。至三十日，忽得吴佩孚致总工会电，召代表赴洛计议，工人于愤激之余，遂派代表杨德甫、史文彬、李震瀛、李焕章、凌楚藩等五人即日赴洛与吴交涉。三十一日见吴，吴一味敷衍恐吓，仍声明禁止开会，交涉遂无结果，代表即于当日晚回郑。是时京汉十六个分会，到郑代表已有六十五人；应召而到郑之各工团亦有三十余，计代表二百三十余人；各地男女学生及新闻界到者亦有三十余人。不但成立大会已准备完善，并已由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命令各分会全体工友，于是日举行庆祝大会。在此情势之下，成立大会岂能因吴之禁止，而遂中止？

代表由洛回郑后，即召集全体代表会议，报告与吴交涉情形，当时全体代表一致愤激，咸谓集会结社乃人民应享之自由，吴佩孚何得而干涉！然犹再三计议，委屈求全，共同议决成立大会或可延迟一二日举行，但各工团所送之牌匾，则须于二月一日迎送总工会会所。当以此意详告黄殿辰，亦足见工人让步求全之苦心。不料二月一日清晨，郑州全部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当各代表及郑州全体工友整队护送牌匾向工会进发时，中途竟被军警包围，举枪威吓，阻止前进。于是全体大愤，群以人民自由既遭武力干涉，誓非开会以雪此耻不可。全体鹄立街心约二小时，代表与军警长官再三理论，终无结果。乃奋勇拼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首由主席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及此次被强权无理压迫之可恨，并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正式成立。群众亦遂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是时全场四周，已尽被武装军警包围，群情至此，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震屋瓦。既而黄殿辰至，出言百般恐吓，强迫解散，但群众仍照常开会，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是日下午，代表所驻各旅馆，即有重兵监守，不许偶语；总工会在酒馆所定酒饭，亦不准开售。各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也尽被毁弃道旁，不许馈送。总工会及郑州分会会所均为军队占驻，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杂物，尽被捣毁。问何以如此强暴？兵士都说：是奉大帅命令。当晚郑州会所即被封闭。

我们现在试静心思想：当初这种情形，工会应当如何办理才好？吴佩孚始则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禁止开会；继则由黄殿辰秉吴意旨，用强压手段，干涉开会，交涉数日无效；最后并不准各团体代表送牌匾，包围工人行列，监视行动，不准走路，不准谈话，不准吃饭，并蹂躏会所。军阀之凶横至于此极！而我工人数年来奋斗得来之工会亦遭封禁！是可忍，

孰不可忍！这到底是吴佩孚的用心惨暴，手段险毒呢？还是工会代表的主张激烈呢？京汉工友在此严重压迫之下，极端侮辱之下，还是束手待毙呢？还是急起以图最后的奋斗呢？想无论何人，凡有血气者，无不愿舍死拥护此神圣之总工会，奋力争夺此获而复失之自由，虽死亦无余恨！

各处代表目击此种情势，知毫无挽救之余地和退缩之可能。即郑重致函京汉总工会，其大要云："京汉铁路总工会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希望京汉总工会必能为争自由而取最后奋斗之手段，各工团誓必为实力的后盾……。"各团体全体代表于当日晚车及次日早车分别离郑，各回原地准备实力奋斗，临行时，无不慷慨激昂，大有破斧沉舟之慨。京汉全路各分会代表于十分忍无可忍之中，当即秘密会议，本着拥护总工会之天职，真实代表全体工友的愤恨心理，为紧急之决议，其大意是："我们为抗争自由起见，谨决于本月四号午刻宣布京汉路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辨公，全路一切进行，于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决无退后的。"这个议决案，便是我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有价值的议决案。如火如荼的"二七"大罢工，便根据这个议决案而发生了。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说：吴佩孚为什么摧残工会呢？吴佩孚这个人是阴狠成性，口是心非的大奸雄。当他看见工人们毫无势力的时候，他便宣言"保护劳工"，以为沽名钓誉之计；及至工会势力日见澎涨，他便用种种阴谋破坏工人。一面设法买得工人领袖的欢心，如工人代表于十一年八月间去见他时，他亲自接见，殷勤抬待，并赠送代表川资及纪念品，殊不知诚实工人并不如官僚政客之易牢笼，吴佩孚的手段遂毫无效果；一面又令他的兵工队学习开车，为破壞罢工之准备。等到他觉得工人势力已不可侮，他又唆使他的死党在京汉南段段长冯澐组织京汉同人会，借以破坏京汉工人的组织；但是他的破坏手段，都着着失败。所以十二年二月一日京汉总工会开成立大会时，他便毫不客气的揭穿假面具，明目张胆的摧残工会了。但是他究竟为什么摧残工会呢？这个道理，是最易明瞭的。京汉全路早已是直系军阀的私产，换言之，就是吴佩孚的私产，京汉路是他的重要财源，供他挥霍奢侈，供他养兵乱国，并供他镇压人民之用。京汉第一次罢工时，他迫于时势，不得不允许工人每月增加工薪三元。但是后来他详细计算一下，每个工人每月增加三元，京汉路二万多工人，那么，每年便增加支出约八十万元，便是他每年减少收入八十万元。他如何舍得这笔巨款？因为这八十万元，他就认定了工人们与他个人的利益是根本冲突的，将来工会扩大，得陇望蜀，再接再励，这还了得！恶贯满盈的吴佩孚，又知道他自己是为人民所痛恨的；工人有了组织，终久是他的隐患；所谓"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因此吴佩孚下定决心，非摧残工会不可。当初就是工人方面能够格外容忍，也不免遭他的毒手。工会与其无声无臭而被封禁，不如轰轰烈烈的不屈而死！工人回想吴佩孚压迫工人的事实，应该明瞭军阀与工人的利益是永远冲突的。工人还可正告全国人民：中国铁路名虽国有，实则无异军阀及交通界官僚的私产；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军阀官僚和洋资本家是冲突的，与全国人民是共同一致的。

到了四日上午十二时，果然全路一律罢工，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止。京汉工人罢工后，第一件事情便是向旅客散发传单，说明人民的自由权被摧残，不得已而罢工。一般旅客与工人们同是被军阀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无不表同情于工人的壮举。他们痛恨军阀垄断国有铁路，摧残人民自由，因而妨碍一班人民的交通。工人们内部的组织是十分整齐严密的，因全路

工人，自司机升火以至小工，无不是工会会员。各会员均听命于各分会，各分会均听命于总工会，秩序井然。维持秩序，则有全路各分会素有训练之纠察队；刺探消息，则有罢工期内各分会临时组织的调查队。但是在这组织严密的中间，也有一二缺点，为工人所必须注意的。第一，罢工后，车辆一概停止行动，总工会与各分会的信息来往，亦遂断绝；曹锟、吴佩孚、萧耀南、赵继贤等到能往返电商，调动军队，屠杀工人；我工会反不能彼此互通消息，及至敌人杀来，犹在梦中。这种缺点：一则因为铁路上的电报生未加入工会，二则因为电报局工人无组织，并与铁路工人没有联络。故铁路工会将来必须劝导铁路电报生加入工会，为初步辨法。第二，北段各站员司及站长等，居然私自开车，运输军队，屠杀工人。铁路下级职员这种助桀为虐的丑行，工人们此后亦必须尽其能力之所及，开导感化之才好。

四号罢工时，京汉总工会即发表宣言，提出五条件，其原文如左：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澐，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辨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官到郑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日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放年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工人方面，既有总工会负责，又发表宣言，提出条件，当然是静待吴佩孚和路局方面派代表与他们接洽，俾得早日恢复自由。谁知奸险之吴佩孚，不但毫无与工会和平协商之意，且纵使其爪牙，多方压迫，百计破坏。吾人不妨叙述一二事实，证明当日吴佩孚之狠毒手段。在总工会所在地之江岸，始则由萧耀南之参谋张厚生要挟工会交出林祥谦、罗海臣、杨德甫等五人，不遂；继则派大批军队占领铁路工厂，于深夜在工人家中拘去司机二人，强迫开车，江岸二千余工友闻讯，即全体冲破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张之险谋遂完全失败。于是一变其险谋破坏之手段，而为威吓强横之暴行。首先捕去纠察团工友三人，并连工会派往要求释放被捕三工友之代表项德隆、罗海臣等四人，亦一并拘禁，百方威吓，谓须枪毙斩首，他们毫不为动，而二千余工友又与军警对垒相持；张氏无法，只得将项罗等七人释放。直至七日下午二时才有警官来工会，谓奉萧督军命令，当派全权代表于下午五时来工会与工人代表开会谈判；谁知五时二十分即有大批军队突然包围工会，向工人群众开枪袭击，事前并无丝毫警告。此种一网打尽之毒计，始则诱骗工人以开会谈判，继则乘黄昏之时突然的袭击，不下警告，诚所谓绝无仅有之惨酷事件。郑州方面，由黄殿辰等，逮捕工会领袖刘文松、高彬、姜海士等五人，非刑拷打，游街示众，逼其下上工命令，刘等始终不为之屈。长辛店方面，一面由赵继贤限工人于十二小时内上工，一面调动大批军队，形同围猎；结果捕去工会领袖史文彬、陈励茂、吴雨铭、武把等十一人，及至工人群众要求释放被捕领袖时，此等手无寸铁之工人，亦遭江岸工友同一之运命。

是役也，计江岸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残伤者二百余人；郑州被捕者八人；长辛店死者四人，重伤者三十余人，被捕者十一人；沿路各站，亦均有捕拿工会领袖，严刑拷打，或杀伤工人之同样事件。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捕不屈，于回答三声“不下上工命令”之

后，当工友群众之前，即遭斩首。京汉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以热忱赞助工人之故，亦于二月十五日被害。

统观当日情形，国人细想，这是工人行动激烈，要求过当呢？还是吴佩孚等居心险毒，立意谋杀工人呢？假若吴佩孚等稍有息事宁人之意，"二七"罢工，极易和平解决。当日工人方面要求之主要目的，即为撤退占据郑州工会之军警，恢复京汉路总工会；所提条件，工人方面未始不可由协商而让步。并且工会方面，曾将撤革赵继贤、冯澐、黄殿辰之条件可以让步之意，由代表委婉达知张厚生及其他曹吴爪牙，此种事实，为参加此次罢工之工友所共见共闻。无如吴佩孚狼子野心，毫不顾及工人方面之意思，而以屠杀无辜之工人为称心快意之事；事后复捏造谣言，谓工人身藏手枪，与军队互斗，以淆乱国人之听闻，掩饰其屠杀之罪恶。其爪牙黄殿辰复勾结郑州少数流氓，假借国民大会名义，为反对工人之虚声。其实国人中稍有血气者，未尝不赞叹工人此次为人民争自由之壮举，而自惭不能附工人之骥尾也。

当日工人之奋斗情形，实笔不胜书，但是工人为反抗军阀为人民争自由之最勇敢的先锋，诚毫无疑义。工人中如林祥谦者，竟能于白刃加颈之际，连呼三声"不下上工命令"，虽古之英雄豪杰亦何以过此！江岸工友，处枪林弹雨之下，倒毙者已三十余人，犹死守工会，无一逃避者；相持至数十分钟，得工会退后之令，始渐次退散。郑州姜海士等被黄殿辰强迫执旗劝告工人上工，姜等竟不畏强暴，反劝工人万勿上工。正定分会委员长康景星被军阀捕拿之后，于下令枪毙之时，彼乃要求稍延数分钟，俾得略申数语，时围亲者数千人，彼乃从容叙述工人争自由之意见，滔滔不绝，言词慷慨，历一小时半，听者泪下如雨，狂号震天地，卒使某军官慑服，不敢加害。此种义烈行为，诚可歌可泣！因此吴佩孚无论如何横蛮残暴，无论如何严厉压迫，工人有如上述之奋斗精神，虽局外人亦知其绝无一蹶不振之理。"二七"大屠杀后，京汉工人之所以陆续上工者，虽由于军队之捆绑、强迫、监视，并绳之以严刑，其势不得不上工；实亦根据总工会二月九日之命令，该项命令，为劝告全路工人暂时忍痛上工，以图将来之再起。因总工会认定全路工友要能恢复工作，将来才有报复之可能。故屠杀后二年以来，京汉路的秘密组织，是从没有中断的。无怪乎曹吴一倒，京汉铁路总工会之旗帜，又复高扬于郑州矣。

上述种种，均系"二七"京汉工友奋斗之实际情形，现在我们不妨再说说各路和各地工友的奋斗经过，证明工人阶级的一致，及中国工人的阶级觉悟。读者于这些事实中，更能看出"二七"京汉罢工之扩大，及其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之重要意义。

各路的罢工援助，当各路代表离开郑州时，公同约定如京汉罢工三日仍无切实解决办法，即实行继续罢工援助。代表回至本路即实行照此公约准备，现在不妨分别简单叙述一番，以明当日情形。

一、正太路　二月四日京汉路罢工后，是日下午一时，正太工会即行召集一个紧急执行委员会议，讨论援助京汉方法，结果决定：（一）立时发出通电，以作声援；（二）准备实力援助，七号实行罢工；（三）派纠察队往京汉正定分会石家庄部分，夜间帮同守望；（四）下午六时，召集全体大会。是晚召集全体大会，工友异常愤激，委员会议案一律全体通过。七日正午，该路即一致罢工；直至九号晚得到京汉工会通知，谓京汉工潮已被武力压迫上工，请贵会明日开工，免遭意外。此通知证实后，正太方面才于十号一律忍痛开工。他们上工后，虽经武力恫吓，但工人团结坚固，故未受害；工会虽被封闭，然路局开除工会委

员时，工人复一致反抗，路局遂不得不允许他们复职。

二、道清路　该路工人数不过千人，然于“二七”奋斗时最为勇猛，该路工会与京汉同日同时举行罢工，支持九日之久，始陆续开工。工会领袖王榷俭等四人被捕入狱；黄业兴、李培学、谷雩岭、秦梦虎等均因此被开除，工会亦遭封禁。该会此种奋斗精神，正所谓“虽败犹荣”也。

三、津浦路　该路工会秘密约定于十三日上午五时，全路一致罢工，但南段浦镇方面已先行发动，于十日上午实行罢工，嗣因京汉工友已遭武力强迫上工之消息传到，该路南段工人遂不能不即时恢复工作，而全路罢工之计划亦只好中止了。

四、粤汉路　该路工会自八日起举行罢工，随后该路工人即被军队用麻索捆绑上工，徐家棚工会亦被封禁。

其余如京奉路工会京绥路工会均一致议决于八九号实行罢工，一切罢工手续，均已准备完善，不幸京汉大惨剧发生，罢工风潮亦渐平息，他们同情的举动也只好相机停止了。即彼时尚无组织之胶济路工人，亦准备于津浦路罢工之后，立刻参加此次光荣之奋斗。“二七”罢工蔓延如是之广阔，工人团结力如是之伟大，军阀武力压迫，表面上虽暂告成功，然亦足以使军阀胆战心惊了。

至于各地各工团之实力援助京汉罢工，以武汉各工团出力为多。当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去后，各以此次所身历的压迫与不自由，当众发表，武汉工友，大受感动。各工团全体议决于八日实行罢工，与京汉工友取一致奋斗。于大罢工之第三日（即二月六号），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持旗至江岸总工会慰问，即于江岸举行露天大会，合江岸及各工团工友到者，有万余人，并举行大规模之游行示威，声容之壮，为从来所未有。不幸二月七日江岸工友即遭大惨杀，同时武汉特别戒严，湖北工团联合会及各重要工团均被封禁。然八日起执行工团联合会之议决案而实际举行罢工者尚有：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丹水池工人、杨子机器工人等等，结果均遭悲惨的厄运，甚至工人子弟学校亦被蹂躏，开除工人至二百余人之多。其余如电灯、电话、自来水工人，事先即被重兵看守，故未能实行践约。其他各处，亦有同样之准备和行动，如上海总同盟罢工之酝酿，北京电业工人之暗中准备，香港海员工人之大愤激，种种事业，不可胜记。

至于那次罢工所得到的同情声，更是难以尽述，如湖南、广东、香港、上海、北京等处的工人团体之电报，如雪片飞来，举行示威者有之，召集大会者有之，集款援助者有之。真是“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意义，于奋斗中特别能够表示出来。那次罢工不但得到全中国工人阶级的同情，而且震动全世界的耳目，第三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特因此发表宣言，海参崴工团总会和日鲜无产者同盟以及其他各国工会工人政党，均有最恳挚之电报，遥寄其阶级的同情。即我国民众团体，亦能认识工人争自由之真正意义，为充分之同情表示，如北京市民曾举行四千余人之群众示威运动；通电者、发表宣言者有：北京全体教职员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及各地学生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及各地各界联合会、民权运动大同盟、南洋华侨协会等团体。甚至直系御用之国会中亦有不少有良心之议员屡次为此大屠杀之事件提出查办、质问及弹核案者。工人要求之正当自由为全国人民所急切需要，于此广大之同情声中，已足见其一斑。我工人更须毫不客气地昭示国人：“二七”之后，实为我工人争自由之起始，自由一日未获，我工人誓必与各业民众为共同需要之自由而奋斗；在此奋斗中，我工人当继“二七”未竟之功，以争自由之先锋自任。

三、"二七"后的工会运动

"二七惨变"后，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既然受了偌大的损失，自然工人运动转到了一个新的局面，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最困难的局面。表面上看来，简直没有工会的活动，其实工人运动何尝一日停止，不过在严重压迫之下，进行迟缓罢了。就是在先进各国的工人运动，每当一次大压迫之后，亦必长时间才能恢复元气，何况初登舞台之中国工人。我们要知道"二七"后的工会运动情形，最好先检查"二七惨变"所留下之残破局面。

"二七"失败后，统计死者四十余人，残伤者三百余，京汉及各地失业者在千人以上，被捕者四十余人，工会领袖，多在通缉严拿之列，故多逃亡在外。新兴的工会运动，蒙此巨大损失，何能负担！故彼时工会第一义务，即为抚恤死伤、救济被捕工友及其家属。因此工会运动者一时均奔走呼号，设法募集捐款，以图稍舒被难者之困苦。此种救济事业，有极重大之意义，不但直接安慰被难者，实亦间接安慰全体工人。工会运动者既多逃亡在外，同时又为救济事业所苦，秘密工会运动，进行自然更迟缓了。

直至十三年二月七日，才有全国铁路工会代表之集会。彼时检阅工会势力：计京汉工会各重要车站，均有数人至数十人之秘密组织，领袖人物为姚佐唐、刘文松等；京奉工会尚秘密存在，暗中拥有实力，工会基金亦尚有千余元；京绥车务工会亦颇为进步，有会员约一千五百人；正太工人尚能团结一致，委员会亦依然存在，惜工会基金分散；粤汉工会亦秘密存在，但会员亦略有减少；津浦工会只有浦镇方面有五十余人秘密组织；株萍路组织如旧，且极有进步；"二七"后异军特起者为胶济路之工会，该工会竟能于工人运动大受打击之后，突然发生会员至一千五百余人，算是"二七"后第一件难得的事。北京《工人周刊》，于极端艰难困苦之中，依旧出版为指导工界之明星，这也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武汉等处各工团，至此亦只剩下秘密组织。全国铁路工会代表在此情形之下开会，到者计九路代表，共二十余人，卒能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其成绩不可谓不佳，兹录其宣言如后：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

前年十月间开滦五矿罢工时，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曾于北京集会，除计议援助开滦矿工外，并产生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正式成立，自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进行极为顺利，本拟去年三月间召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不幸"二七"事变发生，京汉工友大遭屠杀，京汉和各路工会多被捣毁封禁，筹备委员会委员及各路工会重要分子，死伤的也有，监禁的也有，逃亡失业的也有。那么一来，进行就极为困难，因此一年之内，除救济死伤失业被害者外，简直没有余力，去精密的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幸赖筹备委员和各路工会领袖都具热忱毅力，所以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事宜，没有停顿，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中之大幸！

我们经过了这一年多的艰难筹备，直至如今，我全国各路工会代表才于本年二月间集会，正式宣告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章程制定好了，机关也设立了，负责人员也推选出来了。那么全国铁路总工会，便形成而实了。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简直是我全体铁路工友于痛苦不堪之中，得着一颗光芒万丈的救星。

全国铁路总工会怎么是我全体铁路工人的救星呢？我们只要看看总工会的宗旨，便能知道了。总工会的宗旨是什么呢？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福利；

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境域界限，排解工人相互争端；三、提高知识，促成工人阶级的自觉；四、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各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界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这四条宗旨，写得多么明白，那一句一字，不是为我全体铁路工人谋幸福呢？

总工会既然有了宗旨，办法又怎么呢？我们要谋得幸福首先便要有团体，所以这次成立大会已经制定了一个全国铁路组织计划，务使已经组织好了的各路工会，团结更加严密，各路工会被封禁了的，设法恢复，还没有组织的，从速成立团体。死伤被捕失业工友，总工会当力图救济，各路工会互相关系，总工会当力谋密切。从前各路罢工已要求到之条件，总工会当力争实行；并决定加入万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实现全世界联合之目的。我总工会既系全体铁路工友的总机关，当然以谋全体铁路工友之利益，为第一要义，但工人亦国民一分子，所有救国救民以及反抗军阀官僚之横暴和外人之侵略等国民运动亦当视能力之所及，参加而促进之，我工友若参加此种国民运动，必首先提出争自由和恢复工会等要求。如有为恢复工会而奋斗者，吾人亦必同情之。这些办法，如果能够一一做到，不但总工会的宗旨实现了，我全体铁路工友的幸福也就不小了。

总工会既然有了很好的宗旨和办法，最可注意的，还有各路工会代表的精神。各路工会代表都抱定坚强的志愿，牺牲的魄力，大家约定非实行互助不可，非组织坚固的总工会不可，非奋斗以解除痛苦谋到幸福不可。这种全体代表一致的精神，便是铁路工人万众一心的表示，也就是总工会团结坚固之表证。如果我全体铁路工友能以代表之精神为精神，那我们前途的希望，就很远大了。

全国铁路工友们！全国铁路总工会是我们全体铁路工友的，我全体铁路工友务必拥护我们的总工会，务必依照总工会的宗旨和办法做去，并须在总工会指挥之下，一致团结起来奋斗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除痛苦，获得幸福哩。全国铁路工友们！我们的总工会已经成立了，从此一致团结，一致奋斗，并一致庆祝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工会运动为之一振，各路组织，均有显著之进步：如胶济路会员之大增加，京绥路车务工会会费之能确实收齐，正太工会组织之大加整饬，皆其明证。不料又遭国贼曹吴之所忌，于五月间捕去汉口工人领袖杨德甫、许白昊、罗海臣、周天元、黄子章及律师刘芳等六人，牵连所及，全国铁路总工会北京会所亦被抄封，干事张特立、彭礼和、李斌等同时被捕，未几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亦在石家庄被捕。四月间胶济路工会又因举行大会被封禁，工会领袖郭恒祥等四人被开除，至此又有郭君等七人被通缉。一时各工会领袖有被开除者，被通缉者，亦有逃亡者，共计不下四十人。于是工会运动又受一大打击，为“二七”后工会运动的第一大厄运。然工会运动之进行，亦未尝因此打击而停顿，此则足见工人再接再厉的精神。

此次曹吴倒后，民众势力随之增进，工会运动亦遂蓬然有生气。京奉路二千余失业工友，因工会之坚苦奋斗，居然达到完满恢复工作之目的；京奉路唐山四千余工友，虽无公开会所，然团结精神，极为浓厚；最近唐山工友捐助京汉被难工友恤金约二百元，即足证明京奉唐山工会之真正存在而具实力。胶济路工会亦已恢复，有会员千余人。京汉总工会恢复未及月，郑州分会已有会员七百余人，彰德分会已有会员二百余人，将来向南向北发展，不难恢复“二七”以前的局面。这些事实，表现什么意义呢？这就是说，工人运动又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个新的局面，足使工人运动发生极大的进步。

前前后后工会运动的略史，都约略叙述完了，最后我觉得有几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一、工会运动虽然遭受了“二七”那次的大摧残，但是二年以来，仍进行不断，前仆后继；那么我们便知道：无论如何压迫，工人运动决不会消灭的了；二、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发展的局面，工人们应一致奋起，恢复“二七”以前之原状；三、我们不但要恢复“二七”以前之原状，还要知道“二七”失败后之一败涂地，究竟是我们工人的组织还有未完善的地方，我们应该谋更完善的组织；四、我们有许多先烈既然为工会牺牲了，我们决不能退缩，决不可畏惧，无论如何，要继承“二七”未竟之功，争得工人集会结社之自由；五、“二七”失败既然因为工会组织力还薄弱，以后处处要谋工会运动之统一，进而谋全国工人的统一组织，更进而谋全世界工人之联络；六、我们既然得着“二七”的教训，我们知道军阀与工人的利益是冲突的，我们以后处处要小心提防才是。

“二七惨变”是我国工人运动不可幸免的难关；“二七惨变”给了我国工人许多痛苦的教训，许多工友们已经为工会死了，为工会入狱了，为工会失业了，我全国工友只有继续这种光荣伟大的奋斗，只有不怕死的奋斗到底，才能改善我们工人的地位，造成更光荣的工人运动史。

（《新青年》第2号，1925年6月出版）

二七惨案略史

僧

自一九二一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总部于上海，即派员成立北方支部于北京，武汉支部于汉口，南方支部于广州，中国劳动运动从此便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营垒，亦从此初具端倪了。同年初冬，陇海铁路工人，受了洋监工的压迫，感受生活上之必要，遂有同盟罢工之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下紧急动员令，指挥北方支部及武汉支部，联合京汉粤汉津浦京奉京绥正太各路的工人，作同情的声援。尔时各路工人，均在军阀官僚以及帝国主义者的高力压迫之下，既没有组织，又没有训练，所为声援者，不过是摇旗呐喊，并没有甚么实力，可以使敌人屈服。故陇海罢工运动，几受顿挫，记者与北京罗章龙同志，均奉总书记部命令，前往参加罢工运动，会于开封，遂计划京汉路工会之组织，并决定京汉路从郑州以南，由武汉支部负责组织；郑州以北，由北方支部负责组织。未几，江岸信阳郑州长辛店等处，先后成立工人俱乐部，即为工会之先身，是为京汉铁路工人有团体之始。

自陇海罢工以后，至一九二二年初夏，京汉铁路全线工人对于工人团结，均感觉有深切必要，组织亦渐有规律，遂改俱乐部为工会。计成立工会之处，有江岸、信阳、广水、驻马店、堰城、郑州、彰德、顺德、正定、保定、长辛店等十六处工会之成立。而在此半年中，为增加工资，反对苛待，以及提高工人人格和待遇，与夫反抗军警之蹂躏工人工会等事，与厂主军阀洋监工绅士们对抗者，不下十余次，每次均有相当之胜利。因此工人气势甚高，间或亦有锋芒太露者。故一般厂主洋监工以及军阀官僚等，均为之侧目。但尔时正值吴贼佩孚谦恭下士之时，通电保护劳工之日，压迫工人者尚不敢公然压迫，而一般意志薄弱之工人及其领袖，亦以为军阀从此被工人降服矣，而不知失败之机流血之惨，即潜伏如此。

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各站工会联合开京汉铁路工会筹备会于郑州，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支各部，均往参加指导，并议决总章，成立总工会于郑州。定期于次年元月一日开成立大会，先派代表高斌等九人见吴佩孚，告以总工会之成立，完全为公开，盖表示总工会之组织，完全本诸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当时吴贼亦未表示反对意见。同时旧交系分子，组织全路工艺研究所，各局处长如赵继贤冯云均暗中主持，以图与总工会相对抗，希图真正代表工人利益之总工会，中途破坏。其收买工贼，造作诽语，种种阴谋，不一而足，故二七失败，此亦原因之一。

惟时工会之进程，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全路工人之加入工会者，除打旗挂钩者，以旧交系之关系，另成系统外；其余工匠小工加入工会者，达二万人之多，其组织之宏大，与纪律之谨严，几为全国工会冠。因工人工作关系，遂于夏历年关元月一日即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典礼，除全国各工人团体派代表送匾额以志庆贺外，其他如各报馆、各行政机关，亦致函请派代表前往观礼。京汉路局，并准挂专车迎接南北各工团前往参观之

代表。故至元月一日，郑州市上，各处代表非常拥挤，欢呼之声，震动遐迩。此时此地的郑州工人心里，是如何高兴呵！

青天霹雳，吴佩孚突然派来全副武装军队数千人，把守会所，监视旅舍，禁止开会的命令，颁布下来了；而京汉铁路工人，以一年来的训练与战胜一切反动派的威力，自然不能被这些武力遽然解散下去。所以当时各处工人代表，及京汉铁路工人，毫不退让，并且还是照常继续预备开会事务。岂料愈逼愈紧，吴佩孚竟命令军队，占驻会所，封闭会场，并禁止各旅馆留工人住宿；而且运动商人请愿，驱逐工人及工人代表，并散布种种流言，以图恐吓。当时各工人领袖，一面派了九个代表到洛阳去见吴佩孚，说明开会的旨趣，一面仍是不屈不挠准备开会。而一般人的心理，均以为曾经通电保护劳工的吴佩孚，决不会禁止工人开会，此种举动，或是出于一时误会吧？果然吴佩孚见了工人代表，还是满口的仁义道德，说："工人开会，是应该的，只是你们的局长赵继贤冯云，均有电来说你们工人中有匪类参乎其间；而且此时郑州是戒严区域，不能容许多工人在此开会，还是请你们改期或改地都可"说了这一大套，遂微微的一笑走了。各工人代表以为吴佩孚果然是同工人要好，虽然没有承认工人开会，但是最低限度也不至于解散工会杀戮工人！回到郑州把吴佩孚的说话报告工友，工友群众，十分愤慨，遂一致决议仍照常开会。江岸工会总干事项德龙同志，领率数千工人，冲过了吴佩孚大军的警戒线，从枪林刀山之中走过去，启了会场的封条，工友群众及各处工人代表鱼贯而入者达五六千人，由主席宣布开会，少顷派来武装部队，环绕会所，"打倒军阀之声"“集会结社自由”与“解散”“不准开会”之呼声混作一团，震动屋瓦，终以工人无武装之故，遂未终会即解散，各工友及各处工人代表于愤慨之余，回到旅舍，而旅舍之中，已为军队所占据，并不准供给工人的食宿，以致武装军警驱逐工人及各社团代表。尔时汉口律师公会会长京汉铁路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同志亦与会，遂随同各工人顺车南下到各站时，均演说军阀祸国与违反约法压迫人民各事，听者无不为之感动。

京汉工人既受此种打击以后，遂集合各分会领袖开秘密紧急会议，谋对付及善后事宜，均认为此种事件，不独为工人阶级之耻辱，而且是全国民众的耻辱，非独为工人阶级之利益而斗争，而且是为全国民众集会结社自由而斗争，遂下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之最大决心，而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之盛举，从此开幕矣。

总同盟罢工之议既定，遂议决以李震瀛、杨德甫（现已堕落）、史文彬、高斌、张特立等为罢工总工会委员，主持罢工事务，并将总工会移至江岸，各站由工友组织纠察团，以防军阀官僚之阴谋破坏。布置既定，即下令于四日总同盟罢工。以京汉二千余里之路线，南北交通之枢纽，吴贼佩孚视为控制南北之要道者，从此完全停滞矣。从四日起至六日夜，工人秩序甚好，而武汉工人学生市民之结队前往慰问者，日有数万人之多。同时湖北工团联合会，亦下紧急动员令，预备各工会亦总同盟罢工，作实力之援助。即如京奉、京绥亦预备罢工援助；津浦南段及正太、粤汉、陇海已议决于六日起罢工援助；其他如上海、青岛、广州、北京各处产业工人或职业工人，均预备作同情之援助。京汉工潮，已振动全国，宣传海内矣。

吴佩孚知工潮已扩大，彼既不愿民众势力起来，故除以武力高压外，即无第二法门，遂电令肖耀南及京汉路局长赵继贤，于七日正午，同时动作。而二七惨剧，既从此开幕矣。

自罢工事件发生，肖耀南即命令汉口镇守使派兵一营，往江岸镇慑。七日早，派军署参

谋长张厚庵（生）往江岸分会，声言欲晤杨德甫、林祥谦（分会委员长）。尔时总工会已另迁秘密地址办公，遂派项德龙、张连光为全权代表，与二张会晤，及见面时，二张无他言，只说要见杨德甫等，方有话说，遂无结果而散。至下午一时，又派来大队武装兵士，撞入工人家中，逮捕工人，当时并捕获司机一人，拟解往大智门车站，预备开车北上。同时据大智门纠察团报告，车站已开始卖票。纠察团团长曾玉良、罗海成等，即下令一面夺回被捕之司机，一面设法制止大智门开车，同时肖耀南派来之队伍，即将江岸分会包围。曾玉良同志愤武力之压迫，遂指挥各队员，冲出工会。而张厚庵亲在车站指挥，吹冲锋号，一时枪声四起，弹如雨下，人声鼎沸，哭声震野。曾玉良同志等三十二人，已为吴肖二贼枪下之冤鬼矣。当场并捕获工友百余人，林祥谦同志亦与焉。张厚庵问谁为林祥谦，惟时已入夜，对面不能辨识，无一应者。后张亲以灯光一一审视及林，张即厉声呼谓："林祥谦你有几个头颅，还不下上工命令？"林祥谦同志答应说："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是总工会的命令，我是分会的委员长，不能下命令。"张遂以指挥刀指祥谦同志，其侍者即照祥谦同志之胫部一刀，祥谦同志，尚忍痛连声应以"杀头也不能下上工命令"，复连击三刀，祥谦同志，遂与世长辞矣。当晚五时，又复捕施洋同志于汉口后城马路，羁于陆军审判处未及一旬，吴贼电令枪杀。后闻侍卒云，施洋同志临枪毙前之一刹那，尚高呼"劳工万岁！""中国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等口号。同时长辛店之被枪杀者五人，郑州被枪杀者二人，其被捕入狱者，除保定十九人外，其失踪者不计其数。此二七血史之所由成也。记者忝为后死，而对于诸先烈之悲壮伟烈，尚不能描写其万一，惟对于诸先烈死乱之两大意义，直述于次，以作本篇之结论。

一，二七之役，为中国无产阶级之第一次示威运动，虽然牺牲了我们几十个战士，然而振醒了睡梦沉沉的八十万以上的劳动群众，引起了全国民众的同情。近几年来，中国劳动运动之勃起，及去年"五卅"事件与"省港罢工"，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力与战绩，表现非常明显，均为二七之代价。故二七惨案，为中国劳动运动之新纪元，亦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导火线，其价值不在一七八一年，法国巴黎公社失败以下。

二，二七事件，不独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斗争，而流血，而且是为中国一切人民争集会结社自由而斗争而流血。中国近几年来，人民会社之被军阀官僚帝国主义之所封闭者，不知凡几，然而真能为集会结社自由奋斗而流血而牺牲，而且再接再厉，一往直前者，除工人团体外，无一有二七惨案之精神表现。从此更可知无产阶级工人群众，实为国民革命当中之最勇敢最坚决，而且为最能牺牲者。故中国之国民革命，不能失去工人群众，而且应以工人群众为战斗之主力，吾人既为国民革命而尽忠，当须瞭解于斯二义。

（《革命史上几个重要纪念日》，1926年）

衙前（在浙江省萧山县）农民协会宣言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农民在中国历史上是被尊敬的人民，可惜精神上的尊敬，被第三阶级资本主义底毒水淹死了。

农民出了养活全中国人最大多数的气力，所有一切政费，兵费，教育费，以及社会上种种正当和不正当的消费，十有八九靠农民底血汗作源泉，而这许多血汗所换来的，只是贫贱，困顿，呆笨，苦痛。积了许多人的贫贱，困顿，呆笨，苦痛，才造成田主地主做官经商聪明的威福。

我们农民，从小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长大时做了田主地主不用负担维持生存条件的牛马奴隶，老来收不回自己从来所努力的一米半谷来维持生活。人生少，壮，老，三个时代这样过度，这还好算是人的生活麼？

天年丰收，丰收的还是田主地主，我们农民没有分，天年歉收，田主地主在收租簿上就记上一笔第二年该还的欠帐；农民今年正不知道怎样图明年的活，却叫农民今年预欠明年的债。乡镇上所有一切典当，杂货，米，布等铺户，又没一家不敲剥农民流剩的一点汗血。

一般第三阶级主政的世界，已经支持不住我们所需要的生活了。他们所崇拜的经济制度，发展我们底贫困，比发展他们底私有财产还要快。关于这种不良的经济制度所给的苦痛，农民和工人是一样受着的。照这样看来，他们第三阶级正不配做主权者。

我们底觉悟，才是我们底命运。我们有组织的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决定我们底命运，正是决定全中国人底命运。

大地敞着胸襟，欢迎我们下锄头铁耙造成锦绣，人人生活在这锦绣堆中，全仗农民底气力。农民在锄头柄上传播气力，才用得着土地，所以我们该认定“土地是农民传播气力来养活人类的工具。”

那么，这种工具不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么？在目下似乎这句话还很远的。

我们因为处在“这样，叫我怎样活得过去呵！”的叹声中，权且定了一个眼前救急的章程出来。

我们终不忘记世界上农作生产事业是我们底责任。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我们不要忘记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

（《新青年》第9卷第4号）

衙前农民协会章程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第一条　本村农民，基于本村农业生产者还租的利害关系，求得勤朴的生存条件。

第二条　凡本村亲自下气力耕种土地的，都得加入本会，为本会会员。

第三条　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

第四条　凡生产工人及社会主义运动者，本会都认为极良好的朋友；遇必要时，本会对于佢们底团体或个人，应当尽本会能力所及，加以扶助。

第五条　本会底组织，基于会员全体：由大会选举委员六人，为本会委员。又由委员六人中互选，选出议事委员三人，执行委员三人。

委员一年一任，只得连任一次。

执行委员，掌管本会名册及登记簿，执行由大会及议事会议决事件；并连络别村与本村同性质的团体。

议事委员会，议决关于大会所交议及会员三人以上所提议的事件。凡有利益于本会的事项，议事委员有考查提议的责任。凡本会会员有私人是非底争执，双方得报告议事委员，由议事委员调处和解，倘有过于严重的争执，由全部委员，开会审议解决。

大会召集，由会员五分之一或议事委员会之主张召集大会。

第六条　本会会员，月纳会费铜元　枚。每月一号，交由执行委员存贮应用。

第七条　本会会员，将每年农作所得成数，分春华，秋收两期，报告执行委员会登记。

第八条　本会会员，每年完纳租息的成数，由大会议决公布。租息成数，以收成及会员平均的消费所剩余的作标准。

第九条　本会会员，有因依照本会大会议决的纳租成数被田主地主起佃者，本会有维持失业会员的责任。如有因上项情事被田主地主送租者，本会全体会员皆为被告人。

第十条　会员不得违反本会底决议案。

第十一条　会员有违反本会决议案及有不利益于本会的行为者，除名。

第十二条　两村以上的农民协会，得组织农民协会联合会。

第十三条　凡是关于两村以上的农民利害关系发生时，随时可由联合会协议，议决执行。

第十四条　本章程由大会议决，大会能随时以多数同意修正。

这宣言和章程已经由衙前全村农民，于一九二一，九，二七，在本村议决，并举出委员六人。附近三四百里内的农民，也正在酝酿同性质的团结。

玄庐附记

（《新青年》第9卷第4号）

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

单有精神，算不得一个人；单有体力，也算不得一个人。人，必定兼有精神体力并且合而为一的。有人说“体力容易被掠夺，精神不容易受劫制”——可是体力既经习惯在被掠夺的状况中，精神也一被受了劫制。

中国在海禁未开以前，大多数人底体力和精神，一半被劫夺于君主政治底因袭，海禁一开，便渐渐地换了一个新的劫主；革命以后到现在，这新的劫主所施展的新的手段已经十分显著，而且这个新强盗底全身分明涌见在大多数人面前，显他的威阔，体面。

这个新的强盗，便是中国经济史上由欧洲美洲留学速成毕业回来的“有产阶级。”

从来无产阶级底体力被有产阶级夺了去替他们生产，这是大众所知道的。一般无产阶级究竟断不得种，这是有产阶级底公意。有产阶级不能离开无产阶级而生存，又不愿无产阶级得到支配经济的知识，所以用极秘密极严酷的经济制度压迫着无产阶级底儿童，使伛们永远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要不然，便是施一种为有产阶级作爪牙的教育。

因此，儿童底精神，一部分被有产阶级夺去，一部分被困在压迫底下的穷家庭夺去，一部分又被替有产阶级训练爪牙的教师们夺去；一方面显出有产阶级自己儿童底天才，一方面还似乎有遗憾似的说“穷人底儿女到底呆笨。”

处在这种泰山压顶势的私有财产制度底下，正不知压煞多少有天才的儿童！在从前科举时代，“穷读书”，也还有万一的希望——如今无产阶级底儿童连不出学费的学校都断了念，还希望甚麽高等，专门，大学，出洋留学呢！

照这样下去，不是世界上穷的永远穷，富的永远富，人类最大多数陷于穷困愚笨的一境，这不是人类自杀么？

在儿童清洁的心地，从来不染阶级底污秽，我们一方面反抗人类自杀的制度，一方面保持儿童心地底灵光。我们信仰这一种意义是高尚的。我们自信是有决心的，所以我们建设这个“农村小学校。”

农村小学校不能单独脱离有产阶级底势力，可是能够改变现在的社会的教育的社会底性质。因为农村小学校中现在的我们，是从有产阶级底势力里面跳出圈子来的。

我们已经了解农村小学校经费底性质，已经改变掠夺劳动剩余的性质为自己使用的性质了。我们更了解农村小学校所施的教育性质，已经改变有产阶级训练爪牙的教育性质为“人底发见”的教育性质了。所以我们不但反抗有产者底掠夺无产者，并且要禁止父母底掠夺儿女。

小学生呵，你们是荆棘丛中最美丽的花，朝起的太阳，正对着你们含笑哩——

这篇宣言，已经于一九二一，九，二六，在肖山衙前农村小学开幕这天，当着许多工人，农夫，和资本家，地主，官吏，面前宣布，——而且用讲解的形式宣布的——听众很动容并且很能容纳；足见中国内地，不是不能宣传不能组织，只是有识无产者缺乏改革的决心罢了。

玄庐附记

（《新青年》第9卷第4号）

海丰农民运动（节录）

彭湃

第一章 海丰的农民状况

第一节 海丰农民的政治地位

一九一一年即辛亥革命以前，海丰的政治状况和辛亥以后以至一九二二年已经呈出大有不同的地方。而自一九二二以至今年，这四年间更呈出急激的变化（我这里所要说的就是一九二二年以前二三十年间的状况）。

辛亥以前，海丰的农民一直是隶属于满清的皇帝、官僚、绅士和田主这班压迫阶级底下，农民怕地主绅士和官府好象老鼠怕猫的样子，终日在地主的斗盖①，绅士的扇头②，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

在这个时候，一般农民——失业的贫苦农民，已经有了反抗运动的要求。三合会秘密结社之盛行，几乎普遍了全县。一八九五年间，一个农民的失业者洪亚重号召了数千人众，在海丰暴动，到处抢掠。旋为清政府所执而杀之，其后相继也有小小反乱，但不旋踵而消灭。然而他们秘密结社的势力已经谁都知道了！辛亥革命的时候，有钱佬实在利用这班人加入革命的战线，才得到胜利。所以三合会都公开出来，以为此后可以在政治上取得相当的势力。谁知有钱佬推倒了满清皇帝，得到政权之后，就把他们压迫下去，解散的解散，枪毙的枪毙，从此三合会在海丰就无形消灭了。

辛亥革命陈炯明实利用三合会的势力而取得都督、省长、陆军部长、总司令之各种重要位置之一个代表者。陈炯明一握到广东政权，所有海丰的陈家族，自然随着陈炯明的地方家族主义占据了广东的政治势力及军权，以巩固个人的位置。所以海丰人之为官者以海丰之人口及土地的面积来平均与别个地方比较要为全世界之第一。他们不但在别个地方铲地皮，在他们的家乡主义底下的家乡也是一样的对付。所以海丰一旦就增加了无数军阀、官僚、新官儿、政客、贵族及新兴地主阶级（即地主兼军阀）！那些处在陈炯明家乡主义底下的农民也曾欢天喜地的庆祝“我们老总（海丰人呼陈炯明表示亲爱之别名）必能福荫同乡，能够登基做起皇帝更好”。

可是他们的希望愈高，他们的失望愈大！他们不但在陈炯明家乡主义底下得不到半点幸福，不但不能脱了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官府的锁链，并且增加了新兴地主的护弁及手枪之恐吓。从前农民与地主发生争议，地主不过是禀官究办，现在新兴地主阶级用直接行动毫不客气的殴打、逮捕、或监禁这些农民了，也可以直接追勒抵租和强派军饷了。

---

① 地主向农民收租，自制一租斗盖，系极坚重的木，长约一尺七寸，大约一寸半径。如农民的谷不好或短交，地主用斗盖打他，轻者出血，重者可以毙命。

② 农民有不如绅士之意，随便可用扇头敲他。

陈炯明家在海丰城南门设了一个将军府，主持者为其六叔父鸦片鬼陈开庭及陈炯明之母亲。凡行政、司法、教育、苛捐杂税、派勒军饷以及商场买卖，——人家死一猫、死一狗都是要经过他的将军府一道衙门。甚麽教育局、法庭、县署都等于虚设。自然而然的成了军阀、贵族、政客、官僚、新官儿、买办阶级、劣绅、土豪、新兴地主及旧地主与其亲戚走狗的大本营——将军府第！

将军府既得了政治上的势力，当然利用政治的工具榨取了不少的金钱，不用说了。于是乎除了大部分投诸外国银行，一部分就拿在海丰收买土地或作高利盘剥的资本。

海丰的零落的小地主已不能维持他的地位，纷纷须把土地来卖给将军府，其中好多是千数百年来的契约，条文固然不能明白，而土地的方向及所在地也不分明白，陈氏把它买来，叫兵士造了数十支竹签，上写将军府三字，按着契约上彷似的田土就插下去，一面出布告晓谕农民，谓凡有竹签所插的地方如有契约的就来认回，无契约的便是将军府所有！

一般土地被其所插之地主，固然可以由契约对回，而多数自耕农及半自耕农被其所插的土地，便多不能收回，其原因：

（一）农民的祖宗遗下来的土地，虽有土地契约，然因保管不合法，或为虫蛀或遗失，起初不晓得马上去税过契，后来一天过一天，一代过一代，都得安然按地耕种，无时间及专去注意这件事，故多有土地而无契约者，一旦受其所插而无可如何。

（二）到将军府比入皇帝殿尤难，农民要到将军府说话，差不多要先拜候绅士，专托一些贵族、官僚、政客、道道去用钱，才能去见陈六太（即开庭），这是农民绝对做不到的，所以有契约的亦等于无。

（三）即可得向将军府交涉，而昔日之契约条文往往不甚完备，以将军府如此横行，倘若靠着他们的良心来维持农民的田土，直等于痴人梦想！而且农民又不大会说话，即使会说话也不值他们一骂："糊涂，赶他出去！"

因为以上三个原因，一般农民就敢怒而不敢言的屈服了！

又他们到乡村去收租，都是叫护弁或警察武装收租的。有一个叫做圆麻乡的几家人，因凶年还不清租，他们就叫护弁搜家，吓得男妇老幼魂不附体，抢去妇女的头鬃装饰品六件，值银两元，小孩烂衣服六件，米二升，谷种一斗，以后该乡农民誓愿饿死不再耕陈家土地，就实行总辞田，但地主说：你耕也好，不耕也好，我是一定要向你收租的！以后适陈炯明回来海丰，农民去告诉他，陈炯明说："你们要辞田，怪不得他要向你收租了。"

又有一次当年关的时候，将军府的亲戚陈基隆写了三张讨债单：

> 凭单付护弁四名
>
> 收取旧欠租谷银一元二毫
>
> 此致
>
> 又兵士脚皮银每人六毫
>
> ××兄
>
> 陈基隆　印

三张单都是一样写法，不过是分三个债务者。当他们的护弁到乡时，乡民皆惊奔，护弁

掠鸡数只，并放了数枪而去。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就是海丰农民在政治上所受的痛苦。

第二节　海丰农民的经济地位

一　自耕农的堕落

海丰一县人口约四十余万人，约七万余户，其中五万六千户是属于农户，这些农户中的成份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纯自耕农　　约占百分之二十。

（二）半自耕农　　约占百分之二十五。

（三）佃　　农　　约占百分之五十五。

至于自耕农兼小地主及雇农极为少数，全县简直不上五百人。

自耕农兼小地主其地位比较颇为优越，而半自耕农之地位则次之，最苦者莫如大多数之佃农。

自耕农兼小地主及自耕农这两种农民本可自给自足，自帝国资本主义侵入以来，中国的工商业不能发展，而一般手工业又被其打得粉骨碎尸！为帝国主义的海关政策所束缚，同时一般物价日高一日，而农产品之价格极其量只得保持原状。故农村的生活程度只有继长增高，农村日趋荒废。况且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连年战争，于是农村对于种种军费负担真是不胜枚举。苛捐杂税农民负担亦异常重大，农村生活日陷困难，结果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变卖其土地以应付目前生活之恐慌，遂至零落变成佃户——逐渐无产阶级化。

二十年前自耕农有十户之乡村，最近只有二三耳。

二十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穿鞋的斯文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

二　佃农之亏空

佃农向田主佃一石种田地（以中等为标准）每年中等年况两造可收获得二十七石，除了一半还田主的租（纳租额自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所余十三石五斗算为一年中的收入，每石价额值银六元计银八十一元，又禾藁约三元，共合计收入银八十四元。但是此项里头有一部血本未扣除：

（一）肥料每年两造三十元；

（二）种子费约五元；

（三）农工具消耗费约五元。

以上合共四十元，此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本银，是农民最易忘记的——或完全不知的，就是工钱。本来工钱的计算在农民的劳作的零碎状态和复杂状态中是很难把算学计算，但也可以找出一个标准，大约每个身体强壮的农夫的劳动能力至多仅可耕得八斗种宽的耕地，而一个农夫每年要用多少生活上必须的营养资料才能持续耕八斗种的田地呢？那末就应该从一个农人的衣食住三方面求之。现在别的不要说，单讲食每餐至少要用六个铜仙（即半角），一天就要一角半钱。以一年计就要五十四元。合计上述肥料费等共血本九十四元，再把来与

收获所得八十四元相抵，不敷十元之多，表如左：

甲　收入之部

（一）一石种每年收获——二十七石——除一半还地租之后剩十三石五斗每石价值六元共得八十一元

（二）禾藁　　三元

合共八十四元

乙　支出之部

（一）肥料　　三十元

（二）种子　　五元

（三）农具消费　　五元

（四）工食　　五十四元

合共九十四元

收支相抵不敷十元

难道他们除了食之外不用穿衣吗？房屋坏了不用修理吗？夜来不用点灯吗？都不用养父母妻子吗？自己老了无力耕作时，都不用养一个孩子来代替工作吗？我看起来样样都要紧的，既不能免，那就亏空得更厉害了。

三　佃农的救济法

佃农的生活既然如上述这样的痛苦，他就不得不想出一个补救之法，大概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

在积极方面：就是佃农除了耕田之外，或种山、或植果子、或养牛猪鸡、或上山斩柴割草、或为船夫、或为抬轿挑工……种种。将所获的微利来补救亏空，但总是不够的。

在消极方面：因积极的方法仍不能弥补所亏，乃将其所有祖宗遗留下些少田地屋宇厕地典卖了，或把农具都押去了。或者就是借债——高利债等，这种典卖借押的结果还不足弥补，乃进一步用其最残忍的方法了。

本来农夫甚会爱敬其父母，痛惜其妻儿的。因生活之困难，忍不住外来的剥削，常夺其父母妻儿的衣被去当，使其不能御寒，减少其食料使其饥饿。我们每每见农村小孩穿的衣服，多数有了数十年的历史，经其祖宗几世穿了遗留下来的，补到千疮百孔，硬得如棺材一样。儿童因为失了营养，所食的是芋和菜叶之类，所以儿童的手足，都是瘦到和柴枝似的，面青目黄，肚子则肥涨如兜肚状，屁股却小得怪可怜，屎与鼻水终日浸着，任苍蝇在目边口角上体操，都不会知觉把手动一动！他们对于父母亲本来是要好的白米饭猪肉蔬菜……等来供养的，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无钱之故，就把这些米肉等从父母的口里抢出来代以蕃薯水及一些树根木叶。农夫也会爱其老婆漂亮些，可是结果只有剥了她的新衣首饰代以破烂不能蔽体的着物，任凭爷们笑她无廉耻，只有低头缩在破烂的房子里。他们这样去压迫和欺凌其父母妻儿，致引起家庭间父子夫妇的冲突，日陷于悲哀和不幸。

农民这样把生活费减少而压迫父母妻儿仍是不能填无底深潭的亏空，仍不能餍地主们享福的欲望，乃更进一步用嫁妻卖儿的办法以抵租债，妻儿卖尽，问题就发生在他的本身，遂

不得不逃出农村，卖身过洋为猪仔，或跑到都市为苦力，或上山为匪为兵，总是向着“死”的一条路去！

海丰县召冲乡有一个地主黎某，对农民异常苛刻，迫农民租，农民乃卖子以还租，该农民并以卖子还租事告地主，希望其可怜，地主笑道：“卖子还租算是一举两益，你还清租便是汝的老实，我的田还是继续给汝耕，此其一；你卖了子家里少了一人食饭，减了汝一个负担，此其二。”

第三节　海丰农民的文化状况

海丰虽有中学师范高等小学国民小学之设，但只限于城市的地主们或富商的儿孙们才得到教育的机会。至于农民呢？只有负担有钱佬的儿孙们的教育经费。全县教育经费之收入大约百分之八十是抽诸农民，而农民倒不知教育是甚麽东西！全县的农民能自己写自己的名字者不到百分之二十，其他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

他们所操的言语多属于一种土话，若不是农村长住的人虽是同一样语言的人也怕不容易懂，同时若受了教育的人所说的话他甚至完全不懂。我们对农民谈到中国受帝国主义军阀的祸国害民的政治问题，叩其意见，大都是保留其数千年来的旧观念：“真命天子不出世，天下是不会太平的。真命天子一出来，连枪都不会响了，便马上可做皇帝。”对于经济方面如关贫穷种种痛苦压迫的问题，他们大都说：“这是天命使然”，并且“没有得到好风水”。

乡间完全没有阅报演讲团平民学校之设，不过有唱戏唱曲及舞狮种种之娱乐机关，然其中的戏剧歌曲文章几千年来差不多是一样。

所以农民的思想一半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传统下来，一半是从戏曲的歌文中所影响而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人生观。以反抗（革命）为罪恶，以顺从（安分）为美德。对于旧教育（如满清时的八股先生）教其安分守己，顺从地主，尊崇皇帝为农民所最欢迎，如新教育反抗命运风水等都为农民所讨厌。他如菩萨鬼怪等说更为农民所信仰，这通通都是压迫阶级欲农民世世代代为其奴隶而赐予这些奴隶的文化。

有的只是那些乡村的私塾，请了一个六七十岁的八股先生教一般面青目黄肢瘦肚肿的农村小孩们，读“子程子曰……”“关关雎鸠……”，不会念的就罚跪抽藤条打手板夹手指等酷刑，简直只有把这小孩们快点弄死罢了。然而农民们不但不以为怪，并说这个先生明年还要请他再干，又说有这位严厉的先生这般小孩们就不会回来家里哭，嘈闹！唉！这等学校简直是一个禁止一般青年农民呻饥号寒的监狱罢了。

“教育重地”“闲人免进”虎头牌赫然的教育机关，高唱着强迫教育的口号，每每派视学员到乡村去查学，把一般小孩和八股先生惊得鸡飞狗走！结局局长就换了一位师范生或中学生为所谓校长所谓教员，增加了学生的学费，附加了甚麽农产品的捐税，今日教甚麽算学，明日教甚麽格致，再教甚麽历史、地理、古文、体操，废止了野蛮的酷刑，而用文明的面壁、记过和扣分，表面上多么好看，结果使一般面青目黄的小孩们回想到念那“子程子曰”“关关雎鸠”是没有这样多么麻烦和苦恼。这种绝不考虑病弱的农村小孩而硬施以费神费脑的教育大家，我说他是杀人不用刀！

第 二 章

第一节 农民运动的开始

一九二一年五月间我为海丰教育局长，还是发着梦的想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的革命，因召集全县男女学生多数有钱佬的儿女在县城举行“五一”劳动节，这算是海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参加的绝无一个工人和农民，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高举着“赤化”二字的红旗去游街，实在是幼稚到了不得！海丰的绅士以为是将实行共产共妻了，大肆造谣，屡屡向陈炯明攻击我们，遂致被其撤差，县中所有思想较新的校长教员们也纷纷的下台了。

此时我们曾和陈炯明的家乡报《陆安日报》开了一场思想的大混战。我和李春涛同志等出了几期《赤心周刊》，自命是工农群众的喉舌，可是背后绝无半个工农，街上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也绝不知我们做甚麽把戏。有一天我刚从外边回到家里来，我的妹妹阻止我不好进去，说母亲今日不知因何事哭了一场说要打死你。我初是以为我的妹妹是故意来骗我，跑进厅内果然我的母亲在那边哭，查问起来，因我们在《赤心周刊》做了一篇告农民的话，出版后放一本在我的家里，我的七弟他把读出声来，适我的母亲也在旁听，七弟刚刚读完了那篇文章，我母亲的泪遂滂滂下而至放声的哭起来说：“祖宗无积德，就有败家儿。想着祖父艰难困苦经营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我乃极力多方劝解始无事，此时我就想到这篇文章若是农民们看了心理必非常欢喜并且要比我母亲的痛哭有相反的厉害。同时我也自信农民一定可以团结起来。我们乃放弃《陆安日刊》无谓的笔战而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此时在本地和我接近的朋友，都是站在反对的一边，他们说：“农民散漫极了，不但毫无结合之可能，而且无知识，不易宣传，徒费精神罢了。”同时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我家里的人听说我要做农民运动，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此外同族同村的人，都是一样的厌恶我。我只有不理。

五月某日我即开始农民运动的进行，最初到赤山约的一个乡村。我去的时候，是穿着白的学生洋服及白通帽，村中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看我来了，一面在村前弄粪土，一面向我说：“先生坐，请烟呀！你来收捐吗？我们这里没有做戏。”我答道：“我不是来收戏捐的，我是来和你们做朋友，因为你们辛苦，所以到这里来闲谈。”农民答道：“呀！苦是命啊！先生呀请茶，我们不得空和你闲谈，恕罪！”他说完这句话便跑了。少顷又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民，样子比较清醒些。他问我道：“先生属那个营？当甚麽差事？来何事？”我答：“我不是做官当兵的人。我前是学生，今日特来贵村闲游，目的是要来和你们做好朋友……”他笑说：“我们无用人，配不起你们官贵子弟，好说了，请茶吧！”头也不回的那边去了。我想再多说一句，可是他已听不到了，我的心头很不高兴，回想朋友们告诉我枉费精神这句话，心里更是烦恼。我就跑到第二个村，一跑进去，那犬儿向着我大吠特吠，张着牙齿对着我示威，我误认它是来欢迎，直冲入去，见门户都是锁着，去街的去了街，出田的出了田。再跑过第三条村，适太阳西下，天将晚了，恐怕村中农民疑我做甚麽事，不便进去，乃回家。

我回家里没有一个人肯对我说话，好象对着仇人一样。他们饮食完了，只剩的饭汤一斗，食了点饭汤，再到我的房子去，把一部日记打开，想把今天的成绩记在里头，结果只有一个零字。一夜在床上想法子，想东想西，到了天亮，爬起身来，随便食了一餐早饭，就再到农村去了。在路上看着许多农民挑着芋或尿桶等到城里去，若在小路相逢的时候，我是很恭敬的避在路边，让他们先过，因为城市的人每遇乡人是不让路的，只有负担的农人让那空手的城市人。所以农民至少必有一部分知道我是看重他们的一个城市人。

我又再到昨日所到的农村来，遇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他问我："先生呀！来收帐呀？"我说："不是！不是！我是来帮你收帐的，因为人家欠了你们的数(帐)，你们忘记了，所以我来告诉你们。"他说："呀！不欠他家的帐还是好的，怎有帐在别人处？"我说："你还不知道吗？地主便是欠你们的大帐者，他年年闲逸无做工，你们耕田耕到死，结果将租谷给他收去，他们一坵田多者不过值百元，你们耕了千百年，试计算一下，你们给他收了好多谷呢？我们想起来，实在是不平，所以来和你们磋商怎样和地主拿回这笔帐！"他笑道："有得拿就好了，我们欠他一升一合还要锁打，呀！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久久是食租，耕田的久久是耕田！先生你请——我要出街去。"我问："老兄你是贵姓名？"他答道："我是……我是在这个乡村，无事请来坐罢！"我知道他很不愿意告诉我，我也不再去问他。村中女子做工者颇多，男子则出田的出田去了，女子也不便和她说话，我徘徊了好久，就再过别村去了。

是日跑了几个乡村，结果是和昨日同等于零。不过是日的日记比昨日多说了几句话。

是晚我忽然就想到一来我对农民所说的话，太过文雅了，好多我们说来农民都是不晓，所以就把许多书面的术语翻译做俗话，二来是我的面貌身体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惯受了面貌服装不同者的压迫和欺骗，一见我就疑是他的敌人；二者表示阶级不同，格格不入，总不欢喜和我接近，所以乃改变较为朴实的服装，并且想出明日进行的一个新计划，就是决定明日不到乡村去，专找在农民往来最多的十字路中去宣传。

次日就到一个龙山庙的面前的大路去，此路乃是赤山约、北笏约、赤岸约、河口约交通的孔道，每日都有无数农民在此经过，并且在庙前休息，我就乘此机会，对他们开始谈话，大概是说些痛苦的原因及救济的方法，并举出地主压迫农民之证据及农民应有团结之必要，起初只与少数人谈话，但愈听愈众，遂变成演讲的形式，农民听者都是半信半疑，是日与我谈话的有四五人，听我演讲的有十余人之多，其成绩为最好。

第二节　六个人的团结与奋斗

由第二日以至半个月的时间，我都是站在路口，与过路农民谈话或演讲，大约喜欢和我谈者已有十余人，听讲者增至三四十人，比前大有进步。我还记得有一天走到城中，遇着商店里的人看见我呈出一种特别可以注意的形状，我的家里亦有许多亲戚拿着许多食物来看我的病状何如？我这时觉得甚为奇怪。后来我家一个雇工，对我说："喂，你以后在家闲坐好。"我问："为什么？"他答："外边的人都说你有神经病，你须休养才对。"我几乎把他笑死。后来查出是一般反对的绅士所制造的谣言。同时乡村的农民也有许多人都信我是有精神病的人，几乎看见我就好象可怕，要避开的。但是我仍积极在龙山庙前做宣传。有一天，我是专讲农民如能有了团体，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就可实行减租，那时地主一定是敌不

过我们，只有束手待毙。甚麽“三下盖”、“伙头鸡”、“伙头钱”、“送家交纳”、“铁租无减”、“加租”、“吊地”种种压迫都可以免除净尽。我刚说到这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就厉声说道：“车大炮！说减租！请你们‘名合’（‘名合’是我家里一个店号）不要来逼我们旧租，我才相信你是真的。”这时我方欲开口答话，忽从我的旁边一位青年的农民起来说：“你这话真是错了，你是耕‘名合’的田，‘名合’如能减租，不过是你的利益。我呢，不是耕‘名合’的田，怎样办呢，所以现在我们不是去求人的问题，是在我们能否团结的问题。好比着棋一样，谁的度数行得好，谁就胜利。倘自己毫无度数，整天求人让步，也是失败的。今日不是打算你个人的问题，是打算多数人的问题。”我听了这几句话，欢喜到了不得，我的心里想道：“同志来了。”我就问了他的姓名，晓得是张妈安君，就约他于今晚在我闲馆来谈话。他果于是晚来找我，我就表示我欢迎他的心情，他说：“我们听见你讲演以后，每每与乡村里头一班未睡醒的人驳论，他们总是恐怕你说谎，我们有几个很相信你的说话……。”我接着就问道：“那几位呢？”他答：“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通通是我的好朋友。”我说：“今晚可请他们来谈话吗？你去叫他们，我就备茶来待。”他说：“好”，就去了。不好久，我的茶热了，张妈安君和他的朋友通都来了，我看他这几位农友，都是不上三十岁的青年农民，举动说话，都很活泼，我就一一问了他们的姓名，谈起农民的运动了。我提出一个困难的问题：“我天天下乡去宣传，农民总不理我，总不愿意和我多谈点话，你们有何办法？”林沛说：“第一是农民不得空闲，第二是先生的话太深，有时我也不晓，第三是没有熟悉的人带你去。至好是晚间七八点钟的时间，农村很得空闲，我们可在这时候去。同时你所说的话要浅些，或由我们带路”。我听了他这个办法，知他是很聪明的农人，他并且郑重告诉我：“你到乡村去宣传，切不可排斥神明。”我听了这话，更服膺弗失。李老四说：“喂！我们几个先立一个农会，将来有人来加入，那就不用说。如无人加入，我们也不要散，好不好？”我赞成道：“那好极了。”我说：“明天你们找二人同我下乡去行一行，晚上就在那乡村约农民来听演讲。”他们很赞成，就举张妈安、林沛二人，并约定明早出发。大家很高兴的再谈许久乃散会。我在日记簿记道：成功快到了。

次早饭后，张林二农友果来了，一同出发，到了赤山约附近几个乡村。村中农民经过张林二人介绍之后，觉得和我很亲密，而且很诚恳的和我谈话。我就约定附近几个乡的农民今晚来此听演说，他们很赞成。及晚，他备好桌椅及灯火等我了，听的男女小孩约有六七十人，小孩站在前面，男的站在中间，女的站在后头。我所讲的，就是农民痛苦的原因，及地主苛待压迫农民之事实，农民应如何解救。我讲时是问答式，所以是晚农民很赞成我的话，并知道他们理解的能力。我演说毕，并定改晚再来时，设有留声机，还有魔术，届时必先通知他们。

第二日到别个乡，也很好。第三日，我就通知那几个乡村的农民来看魔术，并听演说。时间到了，来的农民男女有二百余人，我演了魔术，农民就喝彩，我乘兴就演说，结果也是很好。如是者有一两个星期，所得成绩不少。可是林沛、张妈安二君在这几天好象心里别有所思——表现有些灰心，不大活泼，我以为必定是地主造谣中伤以致别有顾念，我就很诚恳地问他：“到底有何缘故？”他初不肯说。我硬要他说。他就答：“我们父母及兄弟等看我天天不到田里去做工，到你处闲游，很不满意，我听父母骂我：‘你去跟彭湃，彭湃不怕饿死，你就会饿死哩！’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的父亲几乎要打我。不只父亲母亲，兄弟老婆也同一样的不满意，所以我的心里很烦恼不快！”我和张林二人想了许久，想了一

个很好的办法，由我去向朋友借了三块钱，先交林沛，让林沛回到家里去，把袋里的钱拿起来算一算，弄在地上碰起声来，沛君的母亲果然问道："钱从那里来？"沛君答："无钱那个想出去，你不要以为我是闲游，是有钱才去做的。"他的母亲就变怒为喜了。同时他的兄弟也不敢多说了。老婆看见丈夫有钱，更不必说了。沛君把这钱马上拿回来，交给张君，也依法去到他的母亲面前弄弄，也得到同样的胜利，张妈安君即将该钱带回来，由我交还了朋友。这个方法实行后，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使张林二君切实去工作，这时张林二君很进步，居然会演说了。

可是说到要求农民加入农会，则比甚么都困难，一般农民都是说："我是很赞成加入农会的，等人家通通加入了，我一定是加入的。"我们就对他解释，若是个个都和你一样，千年后还是没有农民成立农会，我们入农会，比方过河一样，这面河岸是痛苦的，对岸是幸福的，可是个个都怕被河水浸死，都不愿先过，我推诿他，他推诿我，互相推诿，结果没有一人敢过。我们加入农会，即是联合的过河，手握手的进行，如一个跌下河去，就手握手的接起来，所以农会是互相扶助，亲如兄弟的机关。他始说道："好了，加入加入。"我就把他们的名字记在簿子里。同时有几个听了也要加入的，因我要将名字写在簿子里，以为将来一定上当，吓的跑了，我以后就不敢用簿子记名字了，从此每星期加入的不过两人，我们继续努力一个多月，才加入三十余人。

这时间，适有赤山约云路乡，有一会员的媳妇才六岁，因出恭跌在厕池溺死了，她的外家即母家男女三四十人到云路乡来打人命，谓我们会员无故打死他的女，一定要偿命，来势甚凶，我们便召集了三十个会员开会磋商如何对付，决议由全体会员到云路乡向那来打人命的理论，看谁道理长。我们到后，就质问那来打人命的人是何道理，并将男女的姓名一个一个都写在簿子里，我们喝他回去道："你们一定上我们的当。"他们因我们把他们的名字都写起来，不知道我们弄何手段，所以有点惊怕，当时适遇一个约正卓梦梅来调停，拟把农民来处罚，被我们赶他出去，几乎要打他，打人命的人更骇怕，只要求："你们若不赔命，须开棺来看看。"我们说："好，你敢开，就去开，你不怕坐监，就可去开。"那班妇人听见坐监，更怕，遂牵着那些男人衫角要回去。我们更是迫他们退，他们又说："我是对我的亲戚，关你们何事。"我们道："你还不知道我们有了农会，农会是贫人的会，团结一起，亲甚兄弟，他的事即我的事，我的事即他的事，今日我们农民兄弟有事，生死是来相帮，我看你们也是耕田的，他日必加入农会，如果你加入了农会，也是一样的帮助你们，你们快回去吧。"他们乃垂头而去，我们毫无损失。这件事一传出去，很多农民知道农会的兄弟尽忠心，能够互相帮助。我们并且拿来作宣传的材料，说："我们若不团结，就无力量，无力量的人，定受人欺负，大家若要力量，就请速来加入农会。"这个时候，加入的人逐渐增加。

不久又发见农民互相夺耕及地主加租易佃的事，我们农会就定出条例，大概是说，凡已是会员，未经该会员之许可及本会之批准，不得夺耕。如地主对我会员加租易佃时，凡未经该被易佃之会员声言放弃及本会之批准，无论何人，不得认批耕作，如违严重处罚。如会员被地主加租收回耕地时，该会员如感受生活之恐慌，得请求本会代其设法，向附近会员磋商让耕，或介绍其作别种事业。此条例发表之后，会员与会员间，完全无互争之事，地主亦受了抑制，不敢对农会会员加租。不过有的系非会员夺会员之地，我们即派人前去忠告那非会员，既时就交还我们。但是地主很不满意，谓原佃不好久租，无论如何不给原佃（即会员）再

耕。我们即宣告"同盟非耕"。地主恐田地荒了，不得已，仍归原佃耕作，我们又得了一个胜利。

又有一件事，是农民用船驶到城市的河边来运粪肥等，那城市的土霸，就强要他的码头费，每只船二毫，如不照纳，既将舵取去，如去赎舵，即勒索数元不等，农民不胜其苦，农会即宣告取消。我们的方法，就是如遇城市的土豪向乡村经过，或有城市的船艘到乡村，我们就要他纳路费，如他不给我们，我们就不用给他，所以码头费又无形取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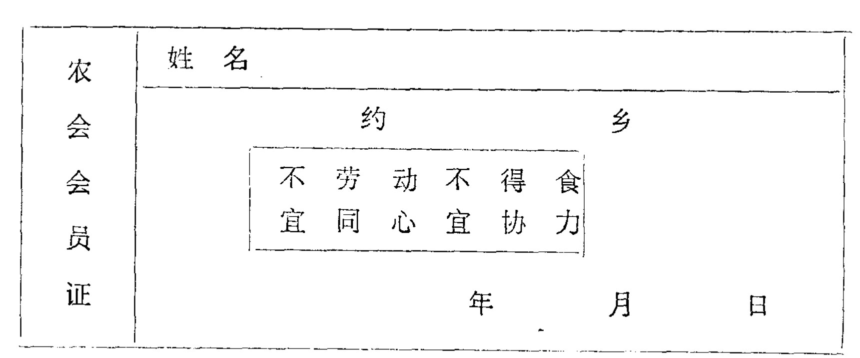
我们又发现农民时常自己发生争端，每为绅士土豪所利用，诉诸官厅，卒至破家荡产。我们乃发出通告，凡农会会员，自己发生争端，须先报告农会。如不先报告农会，而去报告绅士及官厅者，姑无论其很有道理，即宣告除名，以全力帮助其对敌之会员。如本会会员与非会员争端时，会员亦须先来报告。如对于地主有争议时，不来报告而交涉失败，本会概不负责。

从此以后，乡村的政治权力，已由绅士土豪之手，而移至农会。同时各区警察及司法衙门之生意，亦觉冷淡，由是警察法官亦深恶农会。农会既为农民解决许多纠葛，及帮助其胜利，故加入者日众。

第三节　由赤山农会至海丰总农会

这个时候，已经是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九月间了，加入的会员约五百余人，是属于赤山（二十八乡）为多，乃定于九月某日开赤山约农会成立大会，到会者全体会员，参加者有中学校长黎越廷，高小校长杨嗣震等演说，并推举黄凤麟等为会长，茶会后，各会员甚兴高采烈而散。自这成立会开后，益加影响到各乡，请求加入者日渐加多，大约每日平均有十个人了。

加入农会之手续，是由其本人到农会申请入会，并交二角银为会费（本来入会是要入会金和年费或月费等，当时因为恐农民头脑不易明白，致使入会者发生疑问，故定每年收二毫，较为简单，而便其宣传，俟将来各农民加入后，有相当的训练，始为改变），并由我们与之谈话作宣传，再发给一会证，其原形如下（以名片纸印的）：


农会会员证

姓　名

约　　　　乡

不　劳　动　不　得　食
宜　同　心　宜　协　力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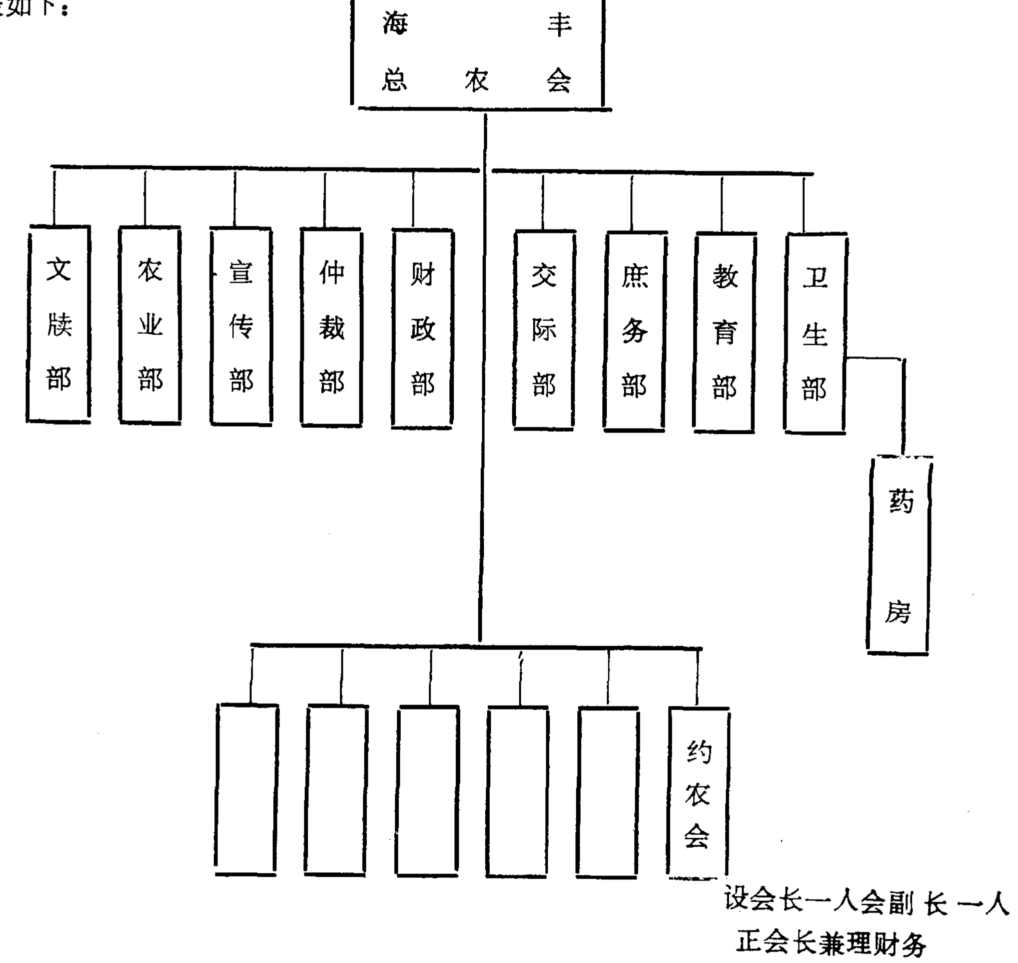
此时农会并发出有宣言（须待检查）及农会利益（须待检查），兼之无论何日何夜，我们必到乡村去宣传。到了十月份，加入农会会员每日平均有二十人了。由赤山约而平岗约、银镇约、青湖约、河口约、西河约、公平约、旧墟约……十余约，都成立了约农会，把县城东西南北都包围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筹备成立海丰县总农会。

这个时候，农会就发起组织一个济丧会，由会员自由加入，约百五十余人，无论那个会员的父母或自己死了，由各会员拿出两毫钱来济丧。此方法宣布后，第一日即有某会员的父亲死了，各会员拿出两毫钱，共约三十余元，同时会友并往致祭，行送葬的礼节，农民益加欢喜。到了第

五日，又有会员的父亲死了，这个时候，济丧会的会员无法负担，乃先由农会代出，另日由济丧会筹还。到了第七日，又有一个会员死了，再由农会代出三十元。这个时候，济丧会会员吃了一惊，成立未十天而死者五六人，倘继续下去，如何办法呢？乃开全体会员大会，宣告临时停办，俟农会财政充裕时，始继续办理。

又办了一间农民医药房，在海丰大街，由一热心农民运动之西医生某君担任医生，凡农会会员有病须药者，准由该会员执会员证到来领药，药价仅收一半，非会员则全收。请诊病者如为会员，不取诊费。并由该西医之老婆担任接生，凡遇会员不收接生费，仅取药费一半，大约二三角钱。自是领药接生者甚众。甚至有非会员而借会员证去领药者亦有之，乃在会员证中加数条规则以限制非会员借用，并规定会员证失落补领费二毫。

到了一九二三年，新历一月一日，乃海丰总农会成立大会。此时加入会员已达二万户，以农会管辖下之人口计，有十万人，以全县人口比较，占全县人口四分之一。是日各乡代表到者共六十余人。开会次序：一、主席宣布开会理由，二、各代表报告，三、主席报告筹备经过，四、演说，五、选举，六、讨论章程，七、提议，八、欢宴。结果选出彭湃为正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蓝镜清为财政，林沛为庶务，张妈安为调查……（其余忘记）。总农会之组织图表如下：



讨论的问题是：总农会成立后必须增会费，查番薯市、糖市、菜脯市、地豆市、牛墟菜市、米市、柴市、猪仔市、草市，通通是农民的出产，每一个市的权力皆绅士、土豪或庙祝所掌握，计番薯市每年至少亦有五百元之收入，倘各市算起来，每年收入可得三四千元，可否将各该市的权移在我们手里？决议我们欲握到市权，一定与绅士冲突，宜先与交涉，如绅士不肯将市权交出，我们就将番薯先移过别个地方，其余各市亦相机进行，并限三日内进行。进行的步骤，先由农会制出一枝公秤，由农会派人到番薯市去管理。绅士大加反对。农会即布告全县农民，将番薯移过附近农会之处摆卖，绝对不准到原旧市摆卖，我们果得胜利，乃将该市收入，拨为农民医药房经费。

农会的会旗，是用黑赤两色分四联今，此是因海丰前日各乡各姓有黑红旗之分别，时常发生械斗，械斗杀人是很厉害的，他的岳父或兄弟等是黑旗，自己是红旗，也不客气把他杀死，所以我们不用黑，也不用红，用黑红旗联合当日械斗的勇敢奋斗的精神来干革命，所以农民黑红观念从此打消了，共用一农旗。农会的印是用圆形的，因农民很怕四方印即官厅印，一印出来，就是剥削农民的告示，所以农会要使农民注意，乃用圆的。

此时农会渐渐得到城市的中学生高小学生及较为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同情，多来帮忙者，农会即给与宣传工作，故此时之宣传工作亦进步。宣传之方法：一、定期演讲，即由各乡订定时期，由宣传部派员前往宣传。二、轮回宣传，由宣传员到各乡去轮回宣传。三、临时演讲，由农会通告各乡会员，如遇各乡有迎神赛会演戏等等，须于三日前报告农会，由农会派人前往宣传。故各乡来请求宣传者甚众，有应接不暇之势。

教育部的工作。农民怕新学如怕老虎，谈起新学就变色。何以呢？一、教育局系官厅性质，教育局下一训令到乡村去，农民先要敬奉局丁的茶钱，如教育局所限期间，该乡不办起来，就拿学董。二、教育局完全不会指导农民办教育。三、农民无钱，教员又贵。四、学生学费也昂。五、农民子弟多劳动，以生活为紧，无暇去享受教育。有这几个原因，迫他办教育，就把他弄怕了。所以农会对于教育，打出一个新口号，叫做“农民教育”即是办农民学校。农民教育，是与新学不同，是专教农民会记数，不为地主所骗，会写信，会珠算，会写食料及农具的名字，会出来办农会，便够了。农民很赞成。而且农会替他们请便宜教员，指定校舍，规定学生，读书不用钱。他们多很喜欢。那末，学校经费从何而来呢？就是由该建立农民学校的乡村，指定相当的耕地，作为学田，由学校向地主批耕，种子肥料由农会出钱，农具牛只人工由各入学学生的父兄分配工作去犁去抓去种，及至刈草时，则由先生率学生到学田去，把学生分为甲乙丙丁四队，田草也分甲乙丙丁四段，每队担任刈一段来竞争，马上就把草弄完了，而且学生也可习耕种的方法。到了禾将成熟，再由学生父兄去收割，除还地主租外，余的送给先生做薪金。这方法实行之后不一月，而农民学校之成立者十余校，夜校也有数间，概由教育部指挥之监督之。自是与教育绝缘的农村儿童，有五百余人得入学校读书了。

农业部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是农业专门家，所以对农业是毫无把握，而且农民在未减租及未得到永佃权以前，农民对于农业的改良，只有为地主行孝耳，看他们每因土地不是自己的东西，连肥料都不肯尽量放下去。有的肯下肥料的倒因弄好了田出多了谷，而惹起田主之加租，所以不如不下还好！海丰有一个蚕桑局每年花费了不少的钱，时时去劝农民种桑，农民皆因怕地主之干涉及恐怕失败无租谷交还田主之故皆不敢去种，即外洋的肥料也不敢试用，

由这点看来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是很妨碍农业的发展，至如要整理耕地等更是不容易的事了！但是我们要养成农民有公共的观念，乃由农会发起种山松，因各乡村前后都有大小的山，这些山是毫无树木的，城市的资本家想去种山，农民多不肯，而农民本身又无能力，乃决由农会出资买松苗，农会会员出工去种，将所有的山松，归为全县农民之公有财产，到有利可得的时候，那负担作工的得多分配一点。一举办之后，各乡有山的，都欢迎农会去种。并且种下去的山松，不要甚麽森林警察，因农民个个都是警察，如有遇火，附近农民便会去救，甚为得法，我们当时计划三年内就可把全县的童山变成绿色的树林，关于水患也可减少。

仲裁部的工作呢？就是做个和事老，但是我们能够在和一件事的时候，来攻击现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度之罪恶。据该部所报告的案件：

婚姻案占	百分之三十
钱债案	百分之二十
业佃争议	百分之十五
产业争夺	百分之十五
命案	百分之一
犯会章	百分之一
迷信	百分之十
其他	百分之八

该部所统计，婚姻案为最多，如离婚人赘发生冲突，夫老妻少以致冲突、奸淫、拐带、嫁妻，其中又以人赘发生冲突为多。

卫生部的工作。即上述农民医药房接生等之事，据该部的报告所医之症如下：

因营养不良发生贫血症发冷者占	百分之六十
刀伤疮痢等	百分之二十
崩脚赚者	百分之十
接生	百分之五
杂病	百分之五

该部所用的药料，以金鸡腊散为最多，次为皮肤病药。

海丰总农会在这个时期，已经入于极盛之状况，海丰此时期之执政者——县长为陈炯明最亲信之翁桂清，他不赞成农会，也不敢解散或禁止农会，所以我们得以比较自由发展，农会至此，亦有相当的力量。我们对内（农民））的口号：一、减租；二、取消“三下盖”；三、取消“伙头鸡”“伙头鸭”，取消“伙头钱米”；四、不给陋规与警察。对外的口号：一、改良农业；二、增加农民知识；三、作慈善事业。但是我们对于实行减租一层，预备五年的训练之后实行，目前不能做到。

光阴很快的，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的旧历元旦来了，各乡的狮子曲班都来庆祝，农会就发起一海丰全县农民新年同乐会，在旧历正月十六日开会，是日各乡的旗帜鼓乐很多，狮子曲班等都有，会场在桥东林祖祠门口的草埔，到会者会员六千余人，非会员来参加者三千余人。开会次序：一、奏乐，二、主席宣布开会理由，三、演说，四、歌曲，五、舞狮子，六、高呼农民万岁，七、燃炮。当时演说者：彭湃、黄凤麟、杨其珊等，谓无产的民众们未得到革命以前，无年可乐，因为过年的时日，就是剥削者逼债的时日，我们有苦可

联，而无欢可联，不过我们藉这个机会来表示我们的群众有几多给敌人看看，并唤起我们革命的精神，准备杀敌，所以各人的感情非常沉痛，又非常快乐。计是日加入农会已发会证者二千余人，收会金四百余元，极一时之盛，自后入会者亦日以百计，农会接洽新会员者有应接不暇之势，每日农友到来农会问事坐谈入会者约三百余人，会务实在忙极了。

可是此时惹起了地主的注意，他们对人说："我（地主自称）以为他们是弄不成功的，是车大炮的，不料现在竟有其事！"有一地主兼大绅士者陈月波，即谋扑灭农会，谓农会为实行共产共妻，时适钟景棠不知在何处打败战，带着百余个残兵回海丰，陈月波即以解散农会为请。钟答："我虽有兵，我的兵'引火不足他吃烟'。"不理了，陈遂无法。

陈月波者，即前广东教育厅长陈伯华、公路局长陈达生之兄也，此人在海丰的势力，可说陈炯明以外，就是他了。可是他是最迷信鬼神的，天天都是求神拜佛祈祷农会消灭，过了不久，即旧历正月尾二月初的时候，地主和农民第一次开始冲突。

第三章

第一节　粮业维持会之压迫农民

海丰县城内有朱墨者，是一个恶地主，平素交官接府，颇有势力，他因要把公平区黄坭塘乡余坤等六个佃户来加租，余坤等以所耕之地系"粪质田"（即其先祖向田主批耕时先有银给地主为质，如没有欠租，地主不能收回耕地，也不能加租，此项田租比较便宜，故佃户耕此田历数百年者有之），地主故意加租，太无道理，置之不理。朱墨大怒，促使奴役闹余坤等家，余坤即报告海丰总农会，谓该地主平素暴虐异常，不堪其扰，彼既欲加租，不如辞还。农会准其所请。但是朱墨早知道农会会员的田如辞退，附近无论任何农民不敢耕的；朱墨益怒，即叫余坤等六人所耕之田三石余种悉数交出，余坤等乃如数交出。地主朱墨到了次日，即向法庭起诉，指余坤等六人"佃灭主业"，即谓余坤等交出之耕地，不足坵额，被其所偷。该分庭推事张泽浦即派法警三名，携票传余坤等质讯，法警到黄坭塘时，乡民妇女小孩畏官兵如虎，即闭门逃散一空。法警见乡民惊，益狐假虎威，将余坤等捉住，勒索脚皮钱六元，宿费二元（县城距该乡不过四十里，何用宿费），另票费一两即大洋四元（欺农民不晓大洋价格），余坤等无法照付，即饱以老拳，拿之至公平墟，余坤以所穿衣质之公平当店，得银六毫，交与法警饮茶，余款请出某商店担保，明日送县交还，始将余坤释回。次日余坤携银到农会报告经过情形，农会告以两种办法：一、除票费一两交还外，余如法警要钱，你可谓钱交在农会请来取；二、你在堂讯时，可对张泽浦说，以后传讯可到农会，即传即到，不须至吾乡，并告以口供。余坤等赴讯，张泽浦骂朱墨说：你告余坤等灭你的地，毫无证据，既无证据，便是诬告；朱墨语塞，继乃谓我有证据，候下次携来，遂宣告退堂；余坤等谓以后如传我，可请到农会便妥，张推事许可，遂散。

朱墨以第一堂讯失败，乃奔告各地主，谓："地主自来与农民打官司未有失败的，这次我竟失败，一定农会作怪，我们如不乘机早日扑灭农会，实为将来之一大危机！"并谓张泽浦受农会运动。城厢各地主为其所动，最先响应者为陈月波，遂发起请酒于城内朱祖祠，到会地主绅士如保卫团局长张士豪等共五百余人，将军府最大势力、陈炯明六叔父陈开庭也出席，

到会的人都是长衫马褂，金丝眼镜，金表金链，面团团肚胀胀的；主席陈月波，宣布农会罪状，实行共产共妻，并运动法官，欺侮地主，吾辈以钱买地，向政府纳粮，业从主管，天经地义，何物县蠹彭湃者，煽惑无知农民，希图不轨，若不早为对待，不特吾业主之损失，抑政府之危险有二：小则粮不能完，国库恐慌，大则他们随便可以造反……。众皆拍掌赞成，地主兼劣绅王作新提议：农民即有农会，吾辈业主亦须联合一会，以抵抗之。朱墨起来赞成，组织一田主会，陈月波则谓田主会的名牵连不到政府，应用“粮业维持会”，众皆一致赞成。推出陈月波为正会长，王作新为副会长，陈开庭为财政，章程由会长起草。陈月波又提出会费问题，谓吾辈此后定与农会作对，如无多大进款，万难制胜，以我（陈月波）意见，全县田租就附城方面有十万余租，如每石租纳一元，则共数亦有十余万元，我们实可以用银片去埋葬了他。此时大地主则赞成，小地主不置可否，不敢十分反对，卒为通过。陈开庭提出法官张泽浦受农会运动，不顾业主血本，殊深可恶，以我（陈自称）意见，须全体向他质问；如他不把农民锁起来，我们就予以相当对付，众鼓掌赞成。即列队前赴海丰分庭，见张推事，张闻讯，吓得手忙脚乱，陈六太爷（开庭）大骂一场之后，叫他马上把农民拿禁，张唯纳之，惟必须双方再讯一场；朱墨提出须派人来旁听，张亦唯之；粮业维持会这班东西始各回去了。张泽浦第三日即来农会传余坤等堂讯，因事起仓卒，农会开会，本想派一部分会员前往旁听，因时间迫促，未能派到；一方面以为此案仍属民事诉讼，根据法律在未判决以前断无把余坤收押的道理，不妨由余坤等与之对讯，农会职员尽量前往旁听，决议通过。我们正在预备前往旁听中，忽有人来报告，谓：“粮业维持会暗伏烂仔百余人在东北两城门，专来候你们，如你们进去，一定受伤”。农会再派侦探往查，其报告与前同，我们只由余坤等六人先去，余人在农会候消息。余坤等六人到分庭，法官即上堂讯，地主方面来旁听者七八十人，皆大粒之绅士；张泽浦于是被其所威吓，故对于余坤等六人，并未如何讯问，只叫法警把余坤等六人收监，并加以镣铐，地主大欢而去。农会闻讯，以该分庭法官，胆敢玩视法律，擅自押人，违法已极，以执法者而违法，民众当不认其为执法之官，非诉以武力不可；乃召集附近各会员，临时会议。表决：“明日向分庭请愿”，即夜下动员令，派出四十个农友，分担东西南北四路，通知各乡农友于明日上午十时集会于龙舌埔。次日上午十时，到会农友六千余人，皆手携小旗，先由彭湃宣布理由，略谓：“农友无罪，被分庭枉押，法官违法，我们应认定此事不是余坤个人的事，须认为我们农民一阶级的事；余坤如失败，十余万农友皆失败，余坤如胜利，就是十余万农友胜利；生死关头，愿各奋勇前往请愿，湃生死与俱。”黄凤麟演说，谓：“现在地主已联合起来，谓彼附城各田主共有十万余租，每石租银一元，有十余万元，专来与我们农会打官司，众农友不要为其所恐吓，不说他们有十万租，即万万租也是不怕的；因为租者谷也，谷是放在我们农民的家里，不是放在他们的家里，若地主与我们认真的干起来，我们就一致不交租，所以十万租是在我们农民手上，不是在地主手上，我们把五万租来作食料，五万租与地主对抗是有余的，那时地主那里有租呢！众农友不要怕！（众大鼓掌。）现在斗盖会（农民称地主粮业维持会）异常蠢动，地主与农民的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希望各弟兄不要为人所恐吓，小弟极好的方法就是：“如果地主要与我们宣战时，我们即宣布拆去田基，将田的四围各小壆掘去，混成一大块田地，使地主认不出了自己的田在那里”，我相信用不着我们去打地主，地主与地主间都要打起来了。”众皆欢呼，主席并宣布：“我们农会筹备六千余人的午粥”，大家食了粥，即向分庭进发。当出发时，天下大雨，农

民以久旱逢此大雨，喜气扬扬，此时分庭已派代表来磋商，我们不理，只有请愿。我们正到分庭的门口，就有县公署好多游击队武装把守门口，阻止我们进去，我们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就冲进去了。游击队不敢开枪，我们进到衙门，迫近法庭会客厅，我们就选二十个农民做代表，分庭推事张泽浦把他的房子锁了，法警武装的跟着他迎代表进去，张招待茶烟甚殷勤。张问我们来做甚麽，我们提出几条件如下：一、即将枉押农民放出；二、燃炮鼓乐送被枉押的农民出去；三、推事应向农民道歉。张答："押农友是六太爷硬要的，我是不得已的；湃哥，你是和我很相好的朋友，请你先退去请愿的农民，明日便放他出去。"彭湃答他："今日不能论好朋友，因我是代表农民来说话。"此时农友们异常愤激，有几个在外头大声叫道："放不放赶快答覆！"张又说："你们来得这样多人，恐怕你们劫监狱。"我们说："代表等可以保障无此举，不然，代表等可令群众离开监狱门口十步。"张不得已，乃即放人。此时六千余农民，高叫"农民万岁"及"打倒地主"之声，震动全城。等余坤出狱时，群众把他拥着，狂呼狂跳，连衙门的栏杆及吊灯等都被毁烂了，及行至大街，雨更淋漓，农民更加欢呼，游行各街时，有学生在街头大呼："农民万岁！"并用红布写着"欢迎出狱农友"，燃鞭炮抛与群众。此时农友们，更加欢热，及群众回到总农会时，天已晴，乃开大演说会，由彭湃演说，大意谓："农民千百年来都受地主绅士官厅的冤枉和压迫，总不敢出声，今天能够把六个被押的农友放出来，这是谁的力量呢？请你们解答。"此时有的说是彭湃，有的说是农会，有的说是耕田同志。我乃再说："说是农会及耕田同志的力量是不十分对的，还不至大错；说是彭湃个人的力量乃是大错特错的；彭湃如果有力量，还要你们六七千人去作甚麽？我相信一个彭湃，任你有天大本事是放不出农友来的。但是农会不过是一个农民集合的机关，官僚是不怕的；耕田佬更不必说了。今天得到胜利的力量，是农会能指导六七千人的耕田佬团结在一块地方，有一致的行动。集中六七千人的力量，为一个大力量，使官僚不得不怕，不得不放出农友来！我们在今日得到这个经验，大家应该自今日起，更加团结，加紧扩大我们的势力，否则今日的大胜利，会变成将来的大失败！"最后乃三呼万岁散会。

海丰总农会经过这次的请愿及示威，农民已认清农会是代表农民本身利益奋斗的机关。同时，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仇视，也非常厉害；农会的声势，也播扬到附近各县。由是要求入会者纷至沓来，实有应接不暇之势，紫金、五华、惠阳、陆丰诸县农民加入者逐日加多，乃由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各县分设县联合会。不两月，又发展到潮州、普宁、惠来方面去，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各县均设县农会。此时会务异常复杂，每日农民到来农会接洽者不下三四百人，幸此时做工作（农民运动）的同志也增加了，如李劳工同志即其一也。李同志捷胜约之第六区人，在蚕桑学校读书，一向与彭湃不相识，甚表同情于海丰的农会，有一天他即宣告退学，写了一封长信给彭湃，这封长信现在不知下落，其内容之主要点是说他对于农民运动的同情，要来和我见面；我即草一函请其来谈，当时李劳工同志和林务农同志等同来，劳工同志等对于农民运动的计划贡献得很多，从此劳工同志成了农民运动的很负责任者。

在客观方面，海丰的绅士地主贵族所结合的粮业维持会，受了未曾听过未曾看过的六七千农民群众放人及示威运动吓缩了；同时，我们并请农民宣传地主无租，租在我们，地主如敢作怪，则铲去田基（即田的界限）等口号，更使粮业维持会毫不敢动。这时候，该会会长陈月波及一般迷信神权的绅士等，请求菩萨赐回良方妙策，来对抗农会，乃在城老爷的庙中扶乩，当时来就乩者说是元天上帝，他一下乩便写"农会必定胜利"；一般迷信的地主绅士

等，垂头丧气。次日，陈月波乃召集粮业维持会大会，到会者百余人，陈月波劈头一语就是：提出辞职；他辞职的原因，说"昨日扶乩，元天上帝乩文说"农会必定胜利"，并有一首诗（前三句忘记），后一句说："任凭汉育去生机"，原来汉育是彭湃的旧名，由元天上帝的主张是万不可去反对他了。我（陈自称）当时又问元天上帝怎么办，元天上帝叫我去香港吧，所以我多两三天定要到香港去，故特提出辞职。"众皆不自在的哑口无言，旋由地主的走狗陈小伦提出，我们可以找出几个代表到农会去问他们是不是专要对待地主，众说好，乃举陈小伦一人为代表，遂无结果而散会。隔了两天，陈月波果然去了香港，这就是陈月波怕惧农会势力，想出元天上帝的乩文来做脱身之计，从此粮业维持会无形解散了。

陈小伦到农会来问农会将来是不是要共产呢？我们答："现在是为农民谋利益，实在还是为地主的荷包计算。何以呢？第一、倘农民饿死了，被地主绅士官厅压迫死了，地主收租不但很困难，而且无租可收，同时影响到社会的饥荒，地主也自然饿死；第二、农民生活好，便不去做贼，地主安心睡觉，社会也安宁；第三、农民得到生活的好处，便自然有钱去改良耕地，增加肥料，地主的田好起来，收租也容易；第四、农民得到生活的好处，便安安乐乐替地主做工，就不去反对地主了。农会对地主有这么多利益都不知道，天天来反对农会，这班人真是可怜可恨！"陈小伦说："我没有听过你的话，我也是反对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当对他们解释。"

自此之后，反对农会的只有陈秋霖陈伯华等所办的《陆安日刊》，天天造谣破坏农会，地主兼劣绅王作新及劣绅丘景云（丘是陈炯明的老师，甚有势力）暗中打电陈炯明及广东审判厅，说农会造反，擅拥衙门，强劫人犯等等不关重要的事；农会在此，可说是一个风静浪平的时期，所以得以从容的做宣传及训练农民的工作，并发展农会的组织。

惠阳、紫金、五华一带之土匪，一闻农会是专救贫民的，也有相当的觉醒，甚表同情于农会，彼等对于有农会的乡村，牛只皆不敢劫，如有劫者农会叫其放还即放还，土匪的所在地无人敢经过，农会的人即可随便出入，故反动派又以农会勾结土匪电陈炯明。

此时（三、四月间）县长是吕铁槎，他是老劣绅，心里反对农会，不过为维持县长的椅子，在表面上不敢谈及反对农会。因此，农会亦得以相当的监督他的行动。及吕铁槎辞职，丘景云上台，海丰学界反对甚为激烈，农会以丘之上台有不利于农会，与学界联合反对之，乃召集公民大会，可是我们倒丘觉着不难，但是倒了丘之后找不出相当的人物可为县长；农会方面，对于县长之人选毫无把握，因能稍顾及农会的利益而可以做县长的无其人；在绅士方面则通通是敌人，故此时只有绅士和农民两大营垒的竞争，农会既找不出相当的人，当然是让绅士去做，那会变成以暴易暴了。此时《陆安日刊》又造谣说彭湃有做县长之空气，我们为急于解决县长问题，乃提出马焕新；马是一个青年，在农会任教育部主任，在学界方面可以过得去，在绅士方面则马是马育航的亲人，有点政治势力的关系，赶紧提出以破《陆安日报》之谣。及我们的公民大会将开会的时候，陈炯明已委任了王作新为县长。学生方面以陈炯明既委任了王作新，也知道王作新是坏人，但怕陈炯明命令，乃各自埋头去读书了。惟农会方面，对于公民大会是一定要开的，当时到会的人六、七百人，除少数学生商人工人之外，大多数是农民的代表；我们只有利用这大会作宣传，我们的口号，老丘的下台完全是民众的力量所推倒，学生及其他各界不肯奋斗到底，故由公民大会选出县长的计划不能实行。

王作新上台，对于农会无何等表示，惟暗中恨死了农会，此时农会也没有去理他，只注

重内部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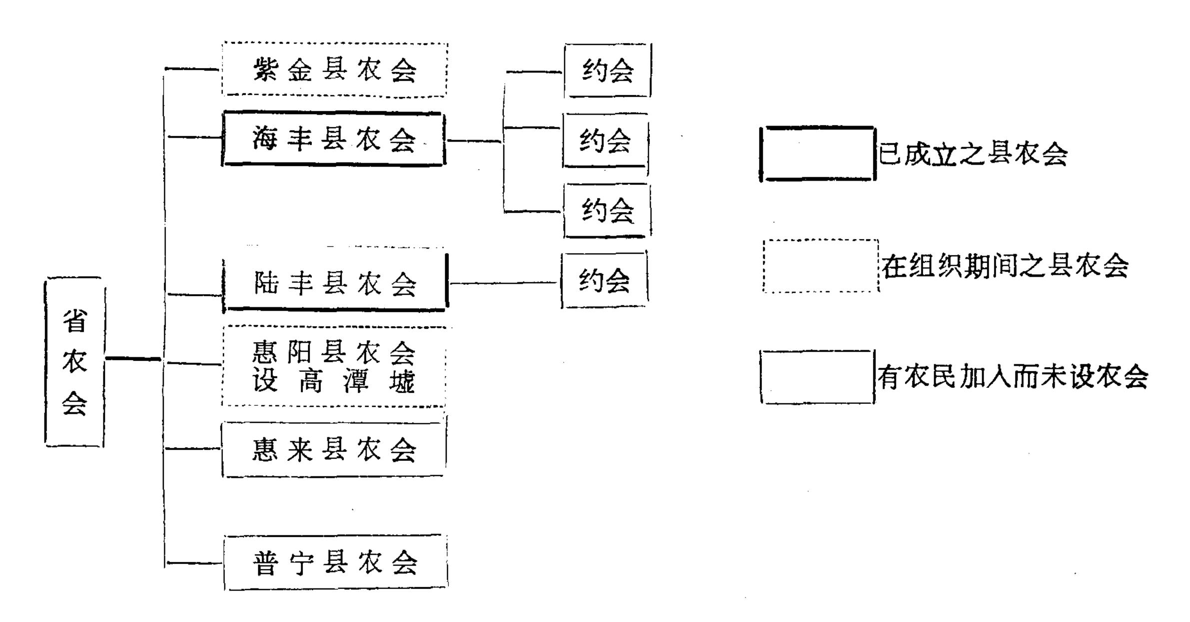
海丰总农会既发展而改组惠州农民联合会，复不久而改为广东省农会，招牌虽是很堂皇，但是各县组织除了海丰、陆丰之外，是异常散漫的。省农会的执行委员，共十三人：

执行委员长——彭湃（知识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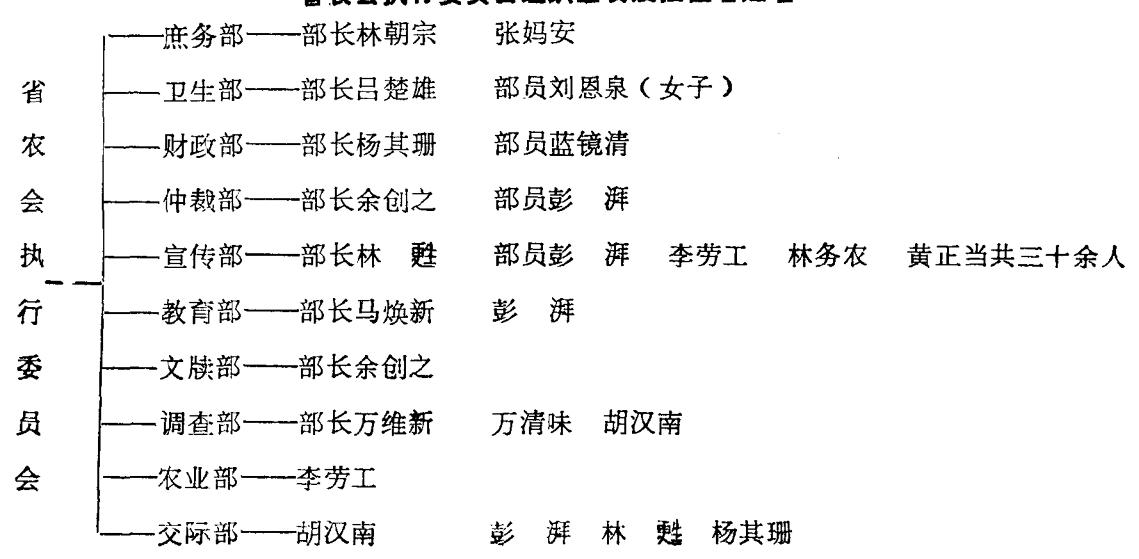
执行委员——杨其珊（农民）、马焕新（知识界）、林甦（知识界）、余创之（知识界）、蓝镜清（农民）、黄正当（农民）、李劳工（知识界）、张妈安（农民）、彭汉垣（知识界）、万维新（农民）、万清味（农民）。

广东省农会设在海丰，同时兼摄海丰县农会职权。

省农会之组织系统图表如下：



省农会执行委员会组织图表及担任者姓名



各县会员人数一览表　　（大概数目）

县名	户数	人数 （以户数为单位每户约五人）
海丰县	12,000	60,000
陆丰县	7,000	35,000
惠阳县	4,000	20,000
紫金县	3,000	15,000
惠来县	300	1,500
普宁县	500	2,500
共户数二万六千八百户		共人口十三万四千人

海丰县农会调查（一九二三年）

会员成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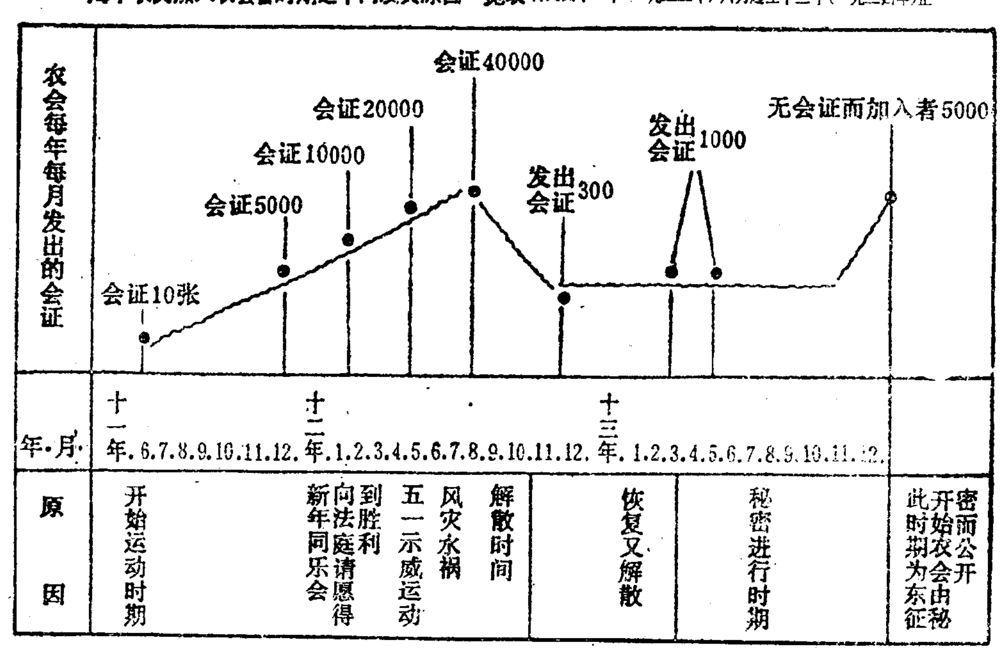
凡农民如自耕农佃农……等以户为单位加入农会，学生教员工人小商人及其他以个人为单位，地主绅士不得加入

自耕农	百分之二十
半自耕农	百分之三十
佃农	百分之四十
雇农	百分之十
学生	三十余人
小学教员	十余人
工人半农工小工业	五百余人（盐町工人理发工人染布工人）
小商人	三十人
失业者	三百余人
自耕农兼小地主	十人
乡绅半教员	十余人
陈炯明护弁	三人
巫者	一人
船夫	四百余人
基督教（农民）	五十人（自人会后叛教者甚多，如万清朱者系一长老会之长老，自人会后已反教了。）

海丰农民失业离去乡村所到区域及其职业

地名	人数	职业	备考
南洋群岛	约十余万	种芭车夫小商人	到南洋者系因生活所迫
香港	万五千人	车夫泥工小买卖巡捕	去做猪仔，小部分与商
广州	五千余人	车夫及其他小工	业有关系而去者，其原
澳门	二千余人	车夫店工	因皆受失业荒灾之故。
汕头	五百余人	车夫及其他手工人	因香港不能容生，
宝安	五百余人	渔业	而移入宝安县者。

海丰农民加入农会各时期之不同及其原因一览表 自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起至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止



（选自《海丰农民运动》，广东省农民协会编，1926年10月出版）

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

（一九二三年）

李 春 涛

（注意）海丰农民运动，有主义有组织，是研究中国劳动问题者所应当特别注意的。李君是专门研究经济学的人，而海丰农民运动首领彭湃君又是李君的知己，材料真确，判断公平，可想见了。

高一涵附注。

缘　起

海丰农民运动，自去年七月二十九日（旧历六月初六日）在海丰城外桥东龙山（一名赤山）成立赤山农会起，至今年八月十六日（旧历七月初五日）被海丰县长王作新带同军警围捕解散止，前后一年。此一年中，其运动区域由一二乡扩大至五六县；其加入员数由数十人增加至二十余万人。进步之急速，殊足惹人注意。最近出版界之纪载此事者，有香港《华字报》九月五日所登载之《海丰农会的组织及最近状况》，及《建设周报》第四五两期所发表雨我君的《评海丰农会运动》。雨我君所据以批评者，系本自超君赴海丰调查的报告书。据超君报告："农会的灵魂，就是彭湃。要知道农会是什么，晓了彭湃便得。"作者与彭湃于一九一七年在东京认识；嗣复同校同科同级，且尝同住亘二年久。去年彭湃为海丰教育局长时，作者往任该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教员；后因"五一"劳动纪念节事件，见忌当道，彭湃去职，作者亦离海丰。彭湃自是遂始专心一志从事农民运动；时有信来讨论农会组织及进行事宜。今年暑假，作者南归，适彭湃因农会被解散，只身出走，经历紫金、龙川、五华、梅县、大埔，来潮安相会；作者复得就问农会经过一切。近日又得来信，知尚往来香港、广州、海丰、汕头间，为在狱诸农民求救及谋为农会复活。是海丰农会之灵魂，确为彭湃；而知农会及彭湃事最详晰者，除彭湃自身外，当无过作者。作者向每劝彭湃将农民运动经过事实作成报告书，报告于国内外诸研究社会问题及从事社会运动者。顾彭湃方忙于运动，无暇执笔；且自谓已成为无智识阶级之一分子，愈不能作文章。此次相见，却反以兹事见委；然作者亦不敢应。今因报章杂志既有所论列；而超君之调查报告，复多涉及成见。不得已，乃始搜集彭君年来信札，编成此文，以供留心社会问题者之参考研究，并以塞彭君前日委托之命。

一九二三年，十一、七、志于北京　赭　庐

一

大凡真能"到民间去"（TO among the people）的社会运动实行家，其思想和行为，必

都已是“平凡化”。他眼见社会上有一种矛盾的状态，就是一般民众现受着社会种种恶制度所囚系压迫以至沦为非人的生活，即现代无资产阶级的贫民生活，却还是一味盲目无自觉的甘于挨饿受苦，以是认为现代一切制度。但他又很明白：他们决非甘于挨饿受苦，不过他们尚未晓得“苦饿就是现社会制度所颁与一般民众的赐物”罢了！于是，他因为要向他们宣传，好教他们自己起来解放自己，他便决定到民间去了。他这一去，不特把现社会一切可以使他更加进于优越的机会都抛弃，而且早已抱定一种“我即贫民”“我即现社会制度的叛逆者”的坚决态度，很平凡的走入民间去了。

可是，一到实际运动的时候，因为大多数民众尚未能形成其阶级的意识和缺乏组织力的缘故，结局，在一定的过渡期间内，仍迫得非他出来指导不可。当此关头，他正在烦苦艰辛，任怨任劳；而局外人早把他的行为当作英雄崇拜，把他的思想当作宗教信仰；甚且，那些“有洁癖的批评家”，便假此一端，大施攻击。事势至此，他才当真成了一位“问题的人物”。

实则，我们论人论事，断不可早存着因人论人、因事论事的成见；而必须先明白此人何以有此种思想和此种行为，这事何以会这样发动和这样进行；然后再行慎审批评，庶几始有一当。

作者对于海丰农民运动经过的叙述和批评，亦正严守此种态度。

海丰农民运动的指导者，现已知道是彭湃。但彭湃“到底有什么大法力能够造成这样的事业？”（这是超君的最大疑问）要明白这一层，须先明白彭湃何以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及何因缘，而如是的勇于从事社会运动。

依唯物史观说所指示，人们的思想行为，多半是由他的环境所造成。彭湃的思想和行为之变迁进化，想当亦不能外此准则。彭湃当一九一七年初到东京留学时，还是一位褊狭的爱国主义者。他眼见日本人褊狭的爱国狂，亦就以为生做中国人的唯一责任是救国，当头的急务是排日。他自有了这种见解，一直到一九一八年末，完全是一位热烈的排日人物。东京警署内排日派的中国留学生“黑表”上，遂有了彭湃的姓名。然而不久，彭湃竟信仰了基督教，主张博爱。据彭湃自己说：“有一日，正是因军事协约问题要往神田中国青年会开会那一日，湃带了几件重要文件，也要赴会。刚在早稻田电车终点候车，忽来了一个日本‘刑事’，要夺取湃所带文件。湃与之争。正在相持，忽地从人丛中走出来一个雄赳赳的日本中学生，竟帮同‘刑事’，反剪了湃两手，拥湃到警察岗亭。路上，湃问那学生：‘你何以亦不讲法律？须知你不是警察！’不意那学生却反问湃道：‘你是不是支那人！’”彭湃当时忽有所悟。暗想：“无错！爱国的极致，自然要排斥他国！我断不能向日本人说公理！因为彼我都是为了爱国。彭湃自那日起，便渐自勉为一超国家主义者了。”及至一九一九年以后，日本社会主义思想渐次普遍发达，彭湃思想又大受影响。且鉴于向所信仰的基督教之不彻底，及基督教徒之堕落，遂翻然一心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与一二友人同入早大学生所组织之建设者同盟，研究劳动运动诸派别及其学说；且单独加入劳动者同情会；常助劳动者推挽重载上坂。至是，彭湃遂始渐成为一广义的社会主义者。后来，建设者同盟改组为晓民会。会中人物，如高津正道等，皆在从事实际运动。彭湃数与往来，因与大杉荣、堺利彦、近藤荣藏等相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日人堺利彦、韩人权无为等在东京发起组织“Cosmo Club”。彭湃与二三友人，因与界、权相识，遂首先加入。一月之后，加入此团体者，有日本（如新人

会、晓民会等思想团体及大杉荣等社会运动实行家）、韩国、台湾、俄国（如爱罗先珂）、印度、南洋群岛，及欧美诸国人。某夜，会于某所。适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来会，为日本警探所侦知。散会时，门外遍布“刑事”，逐人尾随。彭湃与其友亦被尾随，卒被问得姓名住址国籍。嗣后，遂时有“刑事”追随彭湃。彭湃姓名，亦遂列入淀桥警署内社会主义者“黑表”上，为八百注意人物中之一分子。自是以后，至一九二一年归国止，彭湃始终是日本警察眼中一个注意人物。

二

彭湃归国后，即到广州。其时，孙、陈尚未决裂，海丰要人钜公在广州者极多。彭湃初到广州，群因他是海丰人，且是留学生，皆极希望他亦能象某某等一样作了大官，好为相识交游光宠。不意他竟反向某某要人锯公宣传社会主义。彭湃当时有信来，说道：“湃到广州二月，镇日里只向人解说社会主义是主张共产不是主张均产；是主张自由恋爱不是主张公妻。虽然他们都不见信，但我却愈力向他们宣传，必至他们了解了才止。实在他们何曾便了解，不过不好意思反对，故而静密罢了。”然而，海丰许多要人钜公，因此遂不敢交纳彭湃。就是那些素来看重过他的人，亦都叹气失望，说彭湃往日本留学，竟学坏了。而彭湃亦顿觉失望。二个月后，彭湃转回海丰去了。回家未久，海丰县长翁桂清竟请他出来担任海丰县的教育局长。他就职后，首先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及劳动者同情会二种团体。那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说道：

“唉！今日的教育，早不是贫民阶级——劳动者农夫贫民——的教育，而是贵族官僚资本家的教育了！今日的教育，与贫民分离的太远了！贫民阶级对于现在教育，早无丝毫享受的机会了！今日的教育，不是图平民福利的教育，乃是专教资本家官僚一班掠夺阶级的教育！

现在的教育费，从贫民手中取出者实在不少；但贫民却连丁字都不解！今日的学界——智识阶级，每每言论所提倡脑筋所思索的，皆拥护自家的权利，或作特权阶级的走狗；早已忘了贫民阶级的痛苦！学校的讲演会，地方的教育会，何时有一语涉及贫民阶级的教育事业呢？今日的社会状态，无论同一地方及同一语言的人，常见智识阶级所谈论演说的，贫民阶级好，‘鸭仔听雷’，一些不懂！这岂不是现社会一种怪象吗？教育与贫民分离，这是个铁证！我们知道现代教育的缺陷到了这个地方，特组织劳动者同情会，表同情于劳动者。凡我们能力所能及的，必欲与劳动者协力工作，互相扶助，交换智识，以促成教育和贫民相接近。庶社会的革新，有些希望！

诸君！愿意加入本会者依下列二项请到社会主义研究社报名。

一，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具有劳动能力者得入会。

二，劳动的时间场所及事件由本社临时酌定。

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日劳动者同情会”

这篇缘起，名虽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实是彭湃在教育局长任内反对现代教育制度的宣言。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彭湃与二三同志在海丰举行劳动节纪念游行。因一日至三日有

雨，乃递延至四日举行。是日，由彭湃高擎红旗前导，次各校列队依序随行；沿路布散传单。最后，在公共运动场露天演说。陆安师范学校廖某等演说今日是五四运动纪念日即是救国运动的纪念日；县立一高小校杨某等演说今日是五一运动纪念日即是社会运动的纪念日；两方论旨不同，遂互相辩驳。

而各校所发布传单，或宣传国家主义，或宣传社会主义，亦不一致。惟忆一高小校所发传单，有几句说道："学生虽然现在机会好，得在学校读书。可是一毕了业，跑进社会里头，依然要和别人一样似的感着生活困难。所以今日的学生，就是他日劳动者的后备队，无产者的候补员。"最为特色。游行后四日，即五月八日，海丰《陆安日刊》忽登有某教育当局大著《藉教育以宣传主义之谬妄》。结局，彭湃遂得了"与二三友人在海丰藉教育宣传社会主义"的罪名，由某锯公拍电给海丰县长说："彭湃如果不职，可另择能委任。"彭湃遂因是去职。彭湃既卸职，自谓如释重负。不数日，与其友所办之《赤心周刊》创刊号，遂以五月十四日出版于海丰。周刊之目的，在向学生宣传。因之，学生同情于彭湃者日众；彭湃社会运动的决心亦愈坚定。《赤心》第四期，彭湃发表有一篇《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的论文，最能道出他决心从事农民运动的意志：

"去年有一位劝学所长对我说道：'社会主义我是很赞成的，但必君出来提倡才对；因为君是富家的子弟。我可不行；因为我是贫家的人。'前几天有一位新闻记者又对我说道：'我对于社会主义是极表同情的。闻君亦出来提倡社会主义，可是君对于社会主义尚未了解。君住的是洋楼；君食的是贫民把血汗换来的白米；君亦配提倡社会主义吗？君是不忠实！君不配来提倡社会主义！'这两位朋友，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智识阶级的主要人物，他们自称都是同情于社会主义。却为什么一个主张我去提倡社会主义，一个否认我去提倡社会主义？……

"这两位朋友的心理，很可以代表现社会一班人对于社会主义的心理。前一位以为：'我家贫，明明是我自己的无能为；出来提倡社会主义，要和那富家均产，大非廉耻，所以不可。'后一位以为：'君若要出来提倡社会主义，君就应当先出来实行给大家看看（原文如此——编者）！把君的家财先拿出来和人家均分！或拿出来做慈善事业！若是住洋楼食白米的人配出来提倡社会主义，终是骗人的话，不忠实！'他们必然是这样着想，才发出这样的话。……

"社会主义并不是主张社会一部分的改良，是主张全体的改造。所以社会主义不是'个人主义''宗族主义''地方主义''国家主义'，是社会的主义。社会主义，是社会一部分有心人，本着博爱的心肠，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组织）大抱不平；因而发见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来代替他。但代替的方法，不是学那慈善家、社会改良家步步来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是取一种破坏的方法——社会革命。所以凡在现社会制度下生息的人，无论他是皇家的公伯爵，或是市井的贫穷儿，只要他确是抱着不平，确是主张社会革命，都可以出来提倡社会主义。所以提倡社会主义的人，是不能限定那一种类的。我们试看下社会主义运动者的历史，便可无疑。那么，以上两人对我所说的话，都是错了。

"……我现在不过把一枝笔靠一张嘴出来提倡社会主义，他们（《陆安日刊》记者）便在报端骂道：'唱高调'，'太新'，'离我们的生活太远'；若是我真把家财拿出来运动社会革命，他们又将说我是乱党叛徒，要帮同官府来捉捕我了！……

“老实说：我们现在正在盼望那住洋楼食白米的人快出来认真的提倡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生在较富的人家，受教育的机会当然比别人多些，或是程度比别人高深些，所以他就应该比别人的觉悟更彻底些，更猛快些！若是，受了教育，全无觉悟，专为官僚军阀作走狗：那就太不忠实了！……”（六月二日　彭湃稿）

彭湃家虽非富，但在海丰，还可算是有钱的人家。不过他家里特地花了一笔钱送他出洋留学；及他回来，不特不去做官挣钱，反而说要拿家财去运动什么社会革命；那他家里可就不答应了。然彭湃却愈因此愈和一切人表同情。以为：人本无罪，罪在制度。所以他不但叫无钱人应干社会革命，尤其是有智识的人尤应该干社会革命。但到后来，他觉着对于有智识的人的希望，完全绝望。他才自己责备自己，死心踏地，单身只影，走入无识无产的农民阶级中实际运动去了。

《赤心周刊》第六期出版后，因种种原因，同志星散，遂竟休刊。以后，彭湃便开始实际从事农民运动了。

三

“龙山、龙津自一班西装的青年男女去后，很觉寂寞；留下一个彭湃，手一卷书，叫那悲惨惨的农民快些出来反抗；又教那饥饿着的牧童唱道：

冬呀！冬！冬！冬！田仔骂田公！
田仔耕田耕到死；田公在厝食白米！
做个（的）颠倒饿；懒个（的）颠倒好！
是你不知想！不是命不好！
农夫呀！醒来！农夫呀！勿憨！
地是天作！天还天公！
你无分！我无分！
有来耕，有来食！
无来耕，就请歇。”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信）

这是《赤心》休刊后，彭湃每日在龙山（一名赤山）龙津（亦称龙溪）和农民接触的生活。

“暑假后，湃就决定到民间去了。可是，农民被人欺骗的多，总以为湃的话是谎的。县城内的旧派，谣传彭湃发狂了。在这个时候，债主又临门了。——湃欠了人家约七八百元的债。——几乎把要到民间去的念头打消。幸而湃的决心是十二分坚决的，遂把这个形单影只的我，送到农村去作单独的奋斗。旧历六月初六日（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赤山农会草草宣告成立。当时加入为会员者，仅七个人。这七个人，是很聪明的农民。他们对湃说：‘无论我们仅七个人，亦要成立此会。’这七个人，内中仅三四人可以帮湃到各村去演说宣传。可是，我们袋里没有钱，他们七个人更是赶不上无产阶级线上的人物，怎么能够忍饥耐饿来奋斗呢！后来，他们择定夜里和我去。足足经过了一二十日的工夫，赤山农会的会员，才增到三十左右人。到九月初六日（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开一演说会，嗣震、钟彝、陈修都到场，加入的增至五十余人了。”

（一九二三年二月九日信）

"事势渐有希望，湃的宣传能力和经验亦进步。尤其是我们《赤心》的感动人，更有力量。有一日，大街宏仁西药房吕楚雄君在林璠记的店头和湃坐谈，问起农会的事。湃就不遗余力，从头到尾，说了一顿。不意竟感动了他。他从那一日起，便和湃一块儿的奋斗。湃自得着他的帮助，运动的能率，亦增进了。因为他晓医术，农民受他的赐不少，故农民愈益相信我们；我们亦愈益乘机拚命运动。我们两人，真是食尽了四乡的茶饭，差不多日日是早出夜归。"（前信）

此时彭湃个人的生活呢？

"湃的生活，终是苦罢了！"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信）

"陈△△曾叫湃到他家里去，说△公很注意湃；问湃为什么不出去省城呢？湃问他道：'难道叫我去做官吗？'他答道：'虽然不声明叫你去做官；但若肯往省城，他（△公）当然有事给你干的。'湃道：'我还要在家里求学。'"（前信）

"湃的生活路，通通为湃自己塞尽了。"（前信）

"但是可以慰藉湃的，还是赤山的农民。"（前信）

"湃也不愿和现在最有生机的农会及亲切可爱的农民离开了！湃一家人，除了湃的子或妻之外，余的都讨厌湃的行为。汉垣（湃的三兄）则颇与湃表同情，这也是难得的。"（前信）

彭湃对于农民，何以便怀了这么多大的希望呢？

"他们（农民）实在不乏聪明的人。他们对于农会的组织，都具有很热烈的情感。他们现已渐有了阶级的觉悟。他们现已渐能巩固自阶级的营垒。他们还能向别约宣传，教导别约快起。"（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信）

因此，"继赤山农会而起的，有守望农会，即守望约一带——在北路银屏、莲花诸山麓居住的农民为多。两会农员，共有五百户。每户平均约七人，共约三千五百人之多。现在罗山约、北笏约、银溪约、联峰约，在酝酿之中。这回冬季收获后，他们即可成立。"（前信）

彭湃于是，"计划到了旧历年尾（一九二三年一二月间），可成立农会八处，少亦五六处。那时候，可以组织总农会于县城，可以向田主挑战。中国农民的阶级斗争，将现出于南部海带（丰？——编者）一隅！陆丰亦有托人来叫我们到那边去，这也是很好的机会。可惜湃单身匹马，顾不及许多！"（前信）

其后，果真一遵彭湃的计划，到了一九二二年（旧历）年尾，海丰一县，竟成立了十二个农会，总共九十八乡，二千七百六十户，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人。

	"会名	户数	乡数
1	赤山农会	五六五	二八
2	守望农会	二一二	五
3	银溪农会	三七四	一〇
4	西河农会	二三〇	六
5	北笏农会	三〇七	五
6	罗山农会	二九五	一〇

7	青湖农会	一五六	四
8	平岗农会	二四五	一一
9	守望分会	二三〇	八
·10	汀洲农会	七三	三
·11	雷峰农会	三〇	一
·12	联峰农会	四八	一

共二七六〇户，九八乡”（实际数字为“九十二乡，二千七百二十四户”——编者）（一九二三年二月九日信）（说明）：有·号者，是已经报名尚未开成立会者。

“农会的名称，是用该农民住在约名冠之。

“因为赤山和湃接触最近，所以会员特别增加。

“各约农民加入为会员的，都是佃耕农。自耕农是很少的。

“农员共二千七百六十户，每户大约六人，共人口约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人。里头不乏有革命精神的人。”（前信）

同时，“海丰总农会亦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成立。其临时简章如下：

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

纲领：

图农民生活之改造。

图农业之发展。

图农民之自治。

图农民教育之普及。

组织：

一、本会称为海丰总农会。

二、本会以联合各约农会本合群之天职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而实行本会所定之纲领为宗旨。

三、会所暂设龙山宫。——通讯处大街宏仁西药房。

四、本会由各约农会代表及决心援助农民之青年组织之。

五、本会选出正会长一人，代表本会，总揽会务。副会长二人，辅助正会长。庶务部书记部财政部调查部部长各一人，主任各一人，部员若干人，专理各部事务。

六、本会经费，由各约农会每年会费缴交一半。

七、本会每月开常会一次。遇紧急事件发生时，由会长召集，开临时会。

会务：

一、本会议决事项，通知各约农会施行之。

二、各约农会如遇有不能解决或重大事件，得报告本会，代为解决之。

附则：

一、本简章于本会章未制定前有效。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公布。”（前信）

（说明）：“湃本来是要仿照‘苏维埃’的组织法。不过我对于这种组织，尚未彻底明白。次是，一般农民智识低下，头脑简单，怕那难记的名词；所以就普[参]照普通学生会式

的章程。至于各约农会章程，亦是湃起草的。另外附上参考。”（前信）

‘◇◇农会简章

第一项　会〔纲〕领：

一、图农民生活之改造。

二、图农业之发展。

三、图农民之自治。

四、图农民教育之普及。

第二项　总则

一、本会称为◇◇农会，由◇◇约农民组织之。

二、会所设在……处。

三、本会本人类合群之天性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而实行本会所定之纲领为宗旨。

四、本会会员无男女姓氏之别。凡◇◇约内农民赞成本会宗旨者，约得随时加入为会员。但入会时，宜先纳入会金若干毫。每年每人纳会费若干毫。

五、凡◇◇约内各乡会员，均得选出代表若干人，出席本会。惟代表人数，以该乡会员人数多少为比例。计每三百人得选出代表一人。但不足三百人者，亦得选出代表一人。

第三项　职员

六、本会选定左列各职员：

甲、正副会长各一人，代表本会，总揽会务，并出席于总农会。

乙、干事员若干人，助理本会事务。

丙、会计员若干人，掌理会中一切收支数目。

丁、书记员若干人，专理会中一切文件。

戊、调查员若干人，专任调查本约内农民生活状况及一切与本会相关事务。

七、以上职员，由各乡代表于每年正月某日开职员选举会互选之。任期一年。再选得再联任。

第四项　会议

八、本会会议，分列于左：

甲、职员选举会　每年一次，于正月某日举行。

乙、劳动节大会　每年五月一日举行。

丙、本会成立纪念大会　每年某月某日举行

丁、职员会议　每月◇次，某日举行。

戊、职员临时会议　遇会内紧要事件发生时，举行之。

己、临时大会　遇会内紧要事件发生或社会上事故与本会有关系者，得由职员临时会议表决后，临时召集之。

九、会议时以正会长为主席。如遇事不能出席时，得由副会长代理。

十、会议时必三分之二出席过半数通过方得决定。可否同数时，由主席判定，通告各乡代表，转知会员。

第五项　会务

十一、本会会务，按照第一项纲领，逐渐做去。如因经济及专门人才之关系，一时不能

做到时，得暂从缓。

十二、本会对于各处工会学生会等，均表示互助及联络。

十三、会员与田主发生争议时，须即报告本会；由本会派遣代表，与之交涉。

十四、本会对于会员间争端，当本自治之精神，极力和解之。

十五、本会如遇无赖之徒，到会员处勒索时，当向前与之理论。

十六、本会对于会员之老弱疾病无依者，当设法救济之。

十七、本会对于普及教育一节，当设法实行之。（半日夜学公共阅书报社之类）如会员子弟升学者，本会得视经济之能力，规定条例补助之。

十八、本会凡遇会员之父母或自身死亡时，当规定如例给助丧费；并由本会派遣代表，前往吊慰。

十九、本会对于会员有犯左列各则者，得由职员会议提出忠告或除名：

甲、滥用本会名义者。

乙、违背本会规章者。

丙、不纳会费而无通告者。

丁、其他不正行为者。

二十、本会如有重大及不能解决事件，得报告总会。

二十一、本会基金，由会计保存生息之。（如买牛或种树）

二十二、本会得由职员会议聘请热心帮助农民诸志士为顾问；或时常请有识之士开会演说。

二十三、本会简章，自本会成立时实行。嗣后如有未尽之处，得提出于总会，临时修改之。附农会“会员证”图样（图略——编者）。

又，当时宣传用《农会利益》传单：

（一）防止田主升租　现今百物腾贵，农民死力苦耕，不能糊口；儿童失学，苦作于田野；婴孩无法抚养，抛弃河中；九十老者，行乞于市；妇女衣服破烂，不可蔽体；贫穷饥饿之声，无乡不闻：可见贫民之困苦，已达极点矣！而田主之视农民也，不若牛马：犁之策之，绝不虑其饥且寒。升租不遂，即示威插田。只知一己之利，而不计农民之死亡也！既有农会，当可减杀此患。

（二）防止勒索　一般无赖之徒，以及衙役、警兵、田主、工役，狐假虎威；一入乡村，便肆意苛勒，鸡犬不宁。农村之受此种欺凌，苦不忍言！既有农会，即可代表全村，而向其理论，以正义人道之武器而抗之；当可省却乡村往往冤枉之费用。

（三）防止内部竞争　常见买者相争必买贵货，卖者相争常至亏本，田佃相争必纳贵租于田主。既有农会，即可防止。

（四）凶年呈请减租　从前遇凶年，田佃往往用个人名义向田主恳请减租。若遇稍有良心之田主，或可轻减。若遇残暴者，不特无效，且反取辱。既有农会，可用团体名义，恳请折成轻减，其益较为普遍。

（五）调和争端　农民既失教育，性或躁急；常以琐细之故，致起诉讼。是非曲直，暂且勿论；而破财则一也。既有农会，即可出任和解，而省乡村之讼费。

（六）救济疾病　常见乡间一农夫而养其父母妻子者，一旦染病，卧床不起，田园抛

荒。一家不特有冻饿之忧，而医药费不知从何措借。一家老少，死肉一团。既有农会，可观察情形，尽力救助。

（七）救济死亡　谁无父母，孰免死亡！常见农村有者，父母死后，束手无策；故不得不出于典卖。而无可典卖者，更加惨痛百倍。既有农会，可规定条例救助。

（八）救济孤老　一生苦耕以养万人，而自己至老反无壹粒以支持残命。世人不但不敬而怜之，反至怒而叱之。盖亦苦矣。既有农会，即可设法供养之。

（九）救济罹灾　罹灾乃不测之祸。农民既鲜有余资以防之者；既有农会，亦可视情扶助。

（十）防止盗贼　农产物成熟之际，四处常有盗窃。既有农会，即可设法防止。

（十一）禁止烟赌　吸食鸦片，在农村固为仅少；而赌博时有所闻。既有农会，亦可设法防止。

（十二）奖励求学　现在农民，生活尚且乏术；何况求学。既有农会，便可规定补助之法。

（十三）改良农业　肥料种子耕法或农具等等，可以由农会专设农业部专事改良以期进步。

（十四）增进农民知识　既有农会，即可时常开讲演会，或夜学等等，以增进农民之智识。

（十五）共同生产　在农会未发达之际，可用会中基金买牛以供农家饲养。一则生利；一则可利于耕种，并于将来可创办种种副业。

（十六）便利金融　农民常因财政支绌，无法施肥；或年关之际，而用衣服家具农具质在当铺，其利息甚高：亦农民贫困之一因也。既有农会，可设金融机关（以最低利及长期）以利农民。

（十七）抵抗战乱　中国政争战潮，到处波及，农村鲜不被其祸者。如前年桂军入赤石，放火残杀，一任所为。我小民何辜，受此惨痛。既有农会，可用团体正当防卫。我小民庶克安居乐业而无事也。

四

海丰总农会成立后，即发出二种宣言：一，报告总农会成立；二，声明农会对于当时广东政变的真正态度。

其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各农会，各工会，各学会，各报馆，暨全国各无产阶级团体均鉴：我们农民，是世界生产的主要阶级。人类生命的存在，完全是靠着我们辛苦造出来的米粒。我们的伟大和神圣，谁敢否认！可是，我们农民，几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无日不在无智机饿压迫的难关恶战苦斗以维残命！而地主虎狼的掠夺，军警无厌的苛勒，日甚一日，惨痛百般，不可言喻！若常此隐忍以往，社会灭亡，不特我农民一个阶级！所以，我们一旦觉悟，集合全县农民，组织农会，协力团结，反抗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争回我们生存的权利；经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宣告成立。我们自知智识幼稚，能力薄弱，前途浩远，深虞倾厥；很望我亲爱的同志，时加教导！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海丰总农会

印。〔即址广东省海丰县大街农民医药房〕；

其二：

“海丰总农会《对时局宣言》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产出许多军阀官僚，各各占据地盘，争权夺利，战云时起，弹雨横飞！我们中国的平民，尤其是农村的农民到处鲜不被其焚毁杀戮。

“但是，他们这班军阀官僚之所以敢明目张胆不顾民困惟利是图者，完全是我们平民，尤其是农村的农民，太过无自觉和放任了！中国弄到今日这等悲惨的地位，我们是不能辞其咎啊！

“此次广东的政局，又变动了！外间说什么‘不得了’的话，和惊恐的态度。这虽然庸人的自扰；但是我们鉴于中国农村屡受兵燹的教训，不能不为光明的团结和正当的防卫！经本会召集各农会，开会讨论表决：我们不问什么党派，不问什么政府，我们都没有敌对的表示；但是有侵害我们农村的安宁，破坏我们农村的秩序者，我们农民，与其无辜坐受摧残，倒不如正当防卫为愈！

“当以摧残我们者为敌！

“亲爱的农民呀！同心协力团结起来呀！

“一九二三年（旧历）正月二十六日海丰总农会印”

至于海丰总农会建设的事业，有农民医药房和农民学校。

一，“农民医药房附设在大街宏仁西药房。农民领药半价：余半价由农会和会外乐捐补充之。”（一九二三年二月九日信）

二，农民学校约有二十余校。较海丰县教育局所辖学校尤多。

又，海丰农会“所取的政策：（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一九二三年二月九日信）

海丰农会既告成立，陆丰、归善二县农会亦相继成立。

今年（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三县农民在海丰县城外菜墟埔集会纪念，示威游行。统计是时，农会“有七十余约，五百余乡，二十余万人的会友。”（一九二三年五月三日信）

是日，海、陆、归三县的农民发有《五一宣言》。说道：“我们相信资本家和田主的财富的增加，是榨取工人和农民的剩余价值而来的。社会的财富，一面渐次无制限的集中在资本家和田主的手里；一面，贫困的问题亦无制限的逐渐扩大。资本家日趋恣肆淫奢的生活；而工人和农民则日陷于饥寒压迫无智的地位。所以，社会上由贫穷而发生了种种极大的罪恶。这是世界上极普遍的极显著的现象。——那么，处在今日饥寒压迫无智的地位的工人和农民，在生活上和人道上，是不得不要求自身的解放和世界的改造。五月一日这一天，就是在三十八年前美国芝加哥的工人有了这种觉悟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劳时获到胜利的日子，亦即是我们工人和农民开始解放运动的日子！但是，这个日子，不是我们庆祝的日子；是我们试验有否解放自己的觉悟和勇气的日子！我们要在这一天，轰轰烈烈地显示我们伟大的阶级团结；鲜明我们的阶级意识；整饬我们的先锋队伍；发挥我们的斗争精神；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协力推倒国际资本家以完成无产阶级的解放！

起呀！我们亲爱的工人和农人！起！起！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资本主和军阀！争回我们的固有权利——自由和幸福！世界的无产阶级呀！团结起来！”

又，《海丰劳农节报告书》，说道：“都市劳动者的阶级斗争，已大大的影射到农村

了；农村对于田主的反抗运动，亦渐渐的扩大起来了！海丰、陆丰、归善三县，自彭湃、马肖、林甦等组织三县农会以来，不过半载，而会员竟达二十余万人之多。其声势和威力，都很足令人注意。五一这一天，是世界的无产同胞停止工作向资本家的定期警告的日子。海、陆、归三县的农民，对于这一天，特在海丰城菜墟埔开劳农节纪念大会，和世界的无产同胞一致行动。当日开会情形：农会会员到会的约八千余人，并汕尾造船工人百余名，及附城男女学生千余人，共数不下万人。……农民的先锋队，拿起一面大红旗，写着'劳动节纪念大巡行'；并有一面乌红布对角做成的农会大旗。又有白布写着'反对升租吊田'，'反对三下盖'（佃户纳租谷还田主时，田主必用斗盖盖三下，系田主掠夺和侮辱佃户的表示），'反对伙头鸡'（田主每逢早冬到佃户家收租时，必要佃户贡鸡一只，谓之伙头鸡），'反对国际资本主义'，'打倒军阀'，'赤化'等字样的长方旗，翻扬空中。其余，则各手执小红旗，旗里都写着警告资本家田主和军阀的标语。沿途发出宣言书数万纸。……查劳动纪念节，在海丰连这回不过二次，而竟这样热烈；此后海丰的农民运动，将愈不可思议了。"

其后，彭湃因"农会愈进步，遂改组为惠民农民联合会。海丰、陆丰、归善已设了分会，拟要推到惠阳去。"（一九二三年六月五日信）顾因惠州有战事，惠阳之行，终竟不果。遂转向紫金方面进行，后竟成立紫金农会。

惠州农民联合会成立无久，复"因进行上的便利起见，把它改组做广东农会。各县则设分会。每一个会员，每年常捐二毫，即足以维持。"（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信）兹录《广东农会章程》于左，以供参考。

"纲领

一、谋农民生活之改造。

二、谋农业之发展。

三、谋农村之自治。

四、谋农民教育之普及。

第一章　会　　名

第一条：本会定名为广东农会。

第二章　会　　址

第二条：本会会址暂设海丰县。

第三章　会　　员

第三条：本会会员无男女姓氏之界别。凡属本省农民，赞成本会纲领，无违犯左列各项者，均得随时加入为会员。

一、未满十五岁者。

二、不正当行为者。

三、有资产者。

第四章　组　　织

第四条：本会由广东农民组织之。

第五条：各乡会员十户以上五十户以下须选出委员一人。但每乡选出委员至多不得超过五人。

第六条：区委员大会选出区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任期内因特别事故缺职时，得由上级委员会派委之。）

第七条：县委员大会选出县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任期内因特别事故缺职时，得由上级委员会派委之。）

第八条：省委员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

第九条：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省委员大会选出十二人组织之，并选出候补委员五人。

第十条：中央执行委员会互选委员长一人，总理会务。

第十一条：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得分任左列各部。

一、文牍部。

二、会计部。

三、交际部。

四、教育部。

五、宣传部。

六、农业部。

七、卫生部。

八、调查部。

九、庶务部。

十、仲裁部。

第十二条：县及区执行委员会之组织，按照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原则组织之，但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可。

第十三条：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县区各分会须依案办理。

第五章　纪　律

第十四条：全省委员大会为本会最高机关。

第十五条：在全省委员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第十六条：大会或执行委员会之决议，须得该大会或执行委员会多数公意之通过。少数须服从之。

第十七条：下级委员会须服从上级委员会。否则上级委员会得取消或改组之。

第十八条：对于各上级执行委员会决议有抗议时，有五分之一赞成者，得提出上级委员会判决之。但在抗议时间，仍须服从各该上级委员会之决议。

第十九条：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有抗议时，得提出全省委员大会判决之。但在抗议期间，仍须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

第二十条：会员违背纲领章程或决议时，得由该区委员会报告上级委员会开除之。

第二十一条：会员无故连续三次不到会者，或不纳会费而无通告者，得由该区执行委员会直接开除之。

第六章　会　议

第二十二条：各区分会每年须开委员大会一次。

第二十三条：各县分会每年须开委员大会一次。

第二十四条：全省每年须开委员大会一次

第二十五条：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省临时会议。有过半数县分会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必须召集全省临时会议。

第二十六条：县分会及区分会临时会议，亦得照全省监时会议之办法召集之。

第七章　会　务

第二十七条：本会应行会务分左列各项。

一、防止田主升吊以免农民生活不安及对于耕地不加工作肥料致生产日下。

二、遇岁歉或生活程度过高时，本会应体察情形向田主请减租额。

三、会员如有发生争执事件，得由本会极力和解以息讼累。

四、禁止会员吸食鸦片、赌博等事。

五、办理各乡农民学校半夜学校阅书报社演说团及其他关于教育等事。

六、办理农桑垦荒造林改良肥料种子耕法农具及其他关于农业事项。

七、办理疏浚河流湖塘修筑坡圳及其他关于水利事项。

八、办理农民医院育婴养老及其他扶助事项。

九、调查农村户口耕地收获及其他农村状况。

十、办理农业银行消费组合及其他关于经济事项。

十一、饲养耕牛以供会员无力养牛耕作者之借用。

十二、办理农团以防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产品。

第八章　经　费

第二十八条：本会经费分左列各项。

一、由各县分会会员每年会费提出三分之一充作经常费。

二、由会员临时认定乐捐充作临时费。

三、由本会向各界劝捐充作办理公益费。

第九章　机关报

第二十九条：本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办一机关报，各会员有担认购阅及销售之义务。”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条：本章程得由全省委员大会过半数之议决修改之。

第三十一条：本章程由本会第一次全省大会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日起，发生效力。从前各处农会章程，一律取消。

第三十二条：本会对于各处工会学生会及其他无产阶级团体均与之联络。

第三十三条：本会得聘专门学家暨有识之士热心帮助农民者为顾问及时常开会时得请其演说。”

（说明）：“这章程第五条应当要修改一下。因为五十户得选一人，将来全省委员大会的到候〔后〕，那里有若大的会场容人？所以应规定会区大会由几户以上选几人出席；县大会由几户以上选几人出席；省大会由几会以上选几人出席；才对。”

（一九二三年七月七日信）

“此外未当的地方，想亦不少。……但是现在我们做事，是不能纯依章程的。章程不过是个形式耳。”（前信）

“这章程是完全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信）

此时虽把海丰农会扩大为惠州农民联合会为广东农会，而其实他所最努力的还只是海丰一隅。这确是因同志和人才缺乏的关系。他自己亦确因此常感着困难。不过彭湃性格有一确为我们所不能及处，就是事愈困难他愈硬干。他自从把农会改组为广东农会后，因惠阳、博罗方面有战争，不便进行；乃折回潮、梅方面发展。这时惠来已有了农会，他遂打算“要到普宁去。……因为这方农会的声势，已侵入了那边。”（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信）然卒因广州方面有人来约他往商农会事，复变计定先往广州。七月“二十六日，湃已收拾好行李，想动身往省城。——因和石安君有约。忽是日狂风大作，历二十余小时，越发越大；又继以大水，倒坏房屋无算；田禾完全失收。农民大恐慌，纷纷到会请示办法。因又不果行。”（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信）至八月五日，复大风雨，农村受灾剧甚。于是，决定趁机向田主挑战，实行减租运动。但据彭湃本来意见，“农民的解放运动，减租运动，如是因着年凶，是无甚价值的。因为恐他们或竟忘了减租的意义和我们的目的。故有价值，还是要在丰年来减租。但是，这回的风灾水祸，虽觉着很可痛心；而农村的阶级斗争骤然呈出很好的现象，阶级的对立很分明，革命事业进一步了。这回对抗田主的办法，湃已有了把握。可是进行上能否依照我们的计划，这就不敢逆料。因为没有同志的关系！——唉！同志在那里！恐怕这次的运动太过于平和为可惜！这也是归咎于同志不来！农会的发展，真是叫做一日千里！唉！可惜无同志去干！如现在县县都要去干，无同志怎样办呢？”（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前信）

彭湃方自“恐怕这次运动太过于平和为可惜”，乃不意愈平和（如会员戴阿扶等被捕后，农会议决：一方面依据法律诉诸法庭；一方面筹金救济入狱家属。）愈受压迫，终竟于八月十六日遭被逮捕解散。然此实非彭湃之失策，乃完全是同志不来之罪。

海丰农会被解散后，发有《海丰全县农民泣告同胞书》：

“我海丰农民之不聊生也久矣！然生活之悲惨困苦颠连而无告，则未有如今之甚者！

“查我海丰农民，有田可以自耕者，百不得一。余则皆就田主领田佃耕，按季纳租奴于田主以为活耳。幸而丰年乐岁，尚可温饱；不幸年凶岁歉，则将不免于饥寒冻馁。于时，我海丰农民，为自卫计，——为欲防止田主之无理升租计，为欲弭消农民之内部纷争计，为凶年可以呈请减租计，为救济天灾人祸死亡计，——遂于去年八月组织成立海丰农会。一年以来，农会之范围，由海丰而陆丰而归善，近且延及于紫金、惠来、普宁；而农会之名称，亦由海丰农会而惠州农民联合会，近且扩称为广东总农会。凡若是者，皆我农民自觉悟其生活之悲惨，知非自卫将无以自存，故不约而共同谋之者也。然不意因此竟见忌于当道！且不意最

先受压迫摧残者即为我生活最惨之海丰农民！

“海丰于今年七月二十六日（阴历癸亥年六月十三日）八月五日（阴历癸亥年六月二十三日）两次飓风大水为灾，农产物歉收，房屋倒塌不计其数。农村受灾极烈，农民受害尤甚。故农民遂招集大会，讨论旱季纳租问题。议决：际此歉收之季，免租既有所不能，完租必至于饿死，无已，最高限度只能输纳三成。而田主阀闻之，大起反对，竟派人下乡逼租。祸事遂从此肇矣！

“八月十一日，突有承批教育局租批商林卓存（现任海丰县保卫团局长）命其侄某，前往北笏乡(约三十余户之小乡村)收租。佃户戴阿丑以凶年恳减。林谓：‘官租无减，十足照收。’顾阿丑无力照纳。林便用斗盖木迎头痛击。阿丑逃避。林复追击。乡人闻声，争出劝阻。林藉势逞威，蹂跳怒骂。失足仆地。遂卧地诈伤。嘱其下人用轿抬回，诣县请验。县长王作新，竟侵越法庭权限，贸然受理。验后，即派游击队二十余名武装到北笏乡围捕。乡民畏官，闻枪声响，纷纷走匿。时值久雨，潦水未退，妇孺无地隐藏，则相率呼号奔哭于途。官兵追至，圈而捕之，恣意搜房掠物。最后，遂苛索差礼银三十余元；掳去乡民戴阿扶等三人，镣锁投狱中。此八月十二日（即癸亥年七月初一日）事也。

“农会闻讯，当于十五日（七月初四日）开大会。议决：一方面依据法律诉诸法庭；一方面筹金救济入狱家属。而县长王作新竟与粮业维持会等绅士集议，勾结军队；突于十六日早〔七月初五〕带同军警百余名，围捕海丰农会会员。当被掳去职员及会员杨其珊、黄凤麟、洪庭惠、郑渭净等二十五人。会中所有文卷器具以及会金九百余元用马二匹，皆被没收。同日，又封锁会所，解散农会，四贴布告，通缉会长彭湃、余创之、林甦等。十七日早〔七月初六日〕复查封农民医药房，缉拿医生吕楚雄。甚且诬说农会存款五万余元，寄存吕楚雄处。当勾串海丰粤军筹饷局局长冯璧环，着令吕楚雄交出提充军饷。旋又纵令各区警兵四出下乡迫租；并查缴农会会员证章。多方苛勒，百般骚扰。农民生机全绝，惟有待死。近虽曾由老隆陈总司令去电，着令该县长王作新即行释放被捕会员，恢复农会机关。然迄今尚未见奉行。而军警下乡逼迫，日甚一日。因此，谨据实沥陈。幸我同胞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有以援助其后！是为至感！海丰全县农民泣告。”

五

海丰农民一年来发展进行之经过，略如上述。

以下尚有应该补叙者二事：一，彭湃对于农民运动之特有见解；二，彭湃对于同志知己之梦想裹求。

一、彭湃来信说：“湃觉得农民运动比都市的劳工运动有几点的确是很好的：

(一)农民中，自然是佃耕农占大多数。赤山约约占十分之九。因和田主的距离很远，凡什么运动，田主都不知。不比工厂的工人，一旦给资本家知道，马上就解雇。

（二）农民虽然少有团体的训练，不比工厂的工人。但他们有忠义气，能老老实实的尽忠于自己的阶级。

（三）他们亦可采用同盟罢耕。因为田地不是和机械一样的关在资本家的工厂里，而且是绝对不可移动的。将来占领田地，是极容易的。

（四）海丰现在做官钱很多，竞买田地，地价骤增；农民之纳田租，当然亦增加；佃主

的争议，亦必多起来。

（五）海丰物价日贵，农民生活日益困艰，他们时时都有暴动的心理，反的心理。”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信）

（一）（二）（三）是一般原因；（四）（五）是海丰的特殊原因。

彭湃根据上列各因，并考察海丰地势；计划至不得已而采取同盟罢耕或同盟抗租时，对于县城，可以实行“经济的封锁政策。不出三天，必可得胜利。实行经济的封锁后，县城与各乡的形势如下。”（一九二三年二月九日信）（图略——编者）

最后，他对于农民运动太抱了乐观的见解，以为：“农村的纯无产阶级对于田主资本家的敌视是很深的。……故农村的阶级的反目，老早就有。不过没有人来唤醒和挑拨罢了。”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信）

二、彭湃来信说：“我的最憾事，即是少同志。这个问题，我差不多夜夜都梦去寻求同志。唉！同志在那里！”

（一九二三年六月五日信）

“和田岩君你记得吗？日本建设者同盟的中坚，我们阶级斗争的战友，尤其是农民运动的健将；闻他因到乡村去，十几日没得睡眠，回来发生胃肠病，一命呜呼。唉真惨悲！真痛恨：唉！我的泪要滴下来了。”）前信）“唉！患病的CT，真是可怜；我好幸无病。”（前信）“我逐渐的无智识阶级化了。”（前信）“我将来若是不幸走错了路；或民众的解放机会被我弄坏；这要归罪于同志不来咧。”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信）

但，他虽然这般呼求同志，而同志终竟不来。他于是不得不就近旁求了。他最后的慰望，就是：“汉坦等实在难得。不过主义上无法用工，为可惜耳。”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信）

结　论

最后，作者的批评，是：

一，彭湃并非英雄；亦非教主。原来“农村的纯无产阶级对于田主资本家的敌视，是很深的。不过没有人来唤醒和挑拨”，故而尚潜伏着尚沈默着，未能形成为阶级意识及发为阶级斗争。彭湃一经明白这个道理，便能毅然牺牲自己在现社会上的优越地位，走入农民中间，去唤醒和挑拨他们起来反抗；从这一点骤然看去，似乎彭湃当真是一个英雄。然若细察其思想和行为之变迁进化，则彭湃盖完全是一位极平凡的人物。试看：初时农民尚不相信彭湃，后来“农民之趋农会恍如二十年前乡人之趋向天主教”；（超君评语见《建设周报》第四期）并非彭湃前后做人二样，实是因为初时农民的阶级意识尚各潜伏着，及经了唤醒挑拨之后便不约而同的把阶级意识形成起来的缘故。故彭湃实非英雄；尤非教主。农民运动之成功失败，完全是以农民的阶级意识之能否形成，决之。

二，至谓“农会以减租为对付有产阶级之第一条件”，（超君评语见《建设周报》第五期）亦未尽然。彭湃很明白地说道：减租“如是因着年凶，是无甚价值的。……故有价值，还是要在丰年来减租。”丰年温饱，何以尚必减租？凶年冻馁，减租何以无甚价值？彭湃答道：“因为恐他们或竟忘了减租的意义和我们的目的。”毕竟，减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

目的又是什么？依作者的解释：减租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挑战。果然，则凶年减租虽可救死，而田主施惠佃户感恩，有时反易没却阶级的意识，故无甚价值；反之，丰年减租，则直是劳动全收权的主张，故有价值。至我们的目的，当然是在于推翻现代的资本主义组织以实现未来的社会主义组织。实现此目的之唯一手段，为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之完成者，当属劳农阶级。而劳农阶级在未完成其社会革命的事业时，莫要于鲜明其阶级的意识，整饬其先锋的队伍，发挥其斗争的精神。果然，则凶年减租虽可救死，而田主施惠佃户感恩，有时反易没却阶级的意识，故无甚价值；反之，丰年减租，则直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挑战，故有价值。

总之，海丰的农民运动，可以说完全是农村的社会革命运动。——此种运动，在其一定的过渡期间内，因为大多数农民尚未能形成其阶级的意识及缺乏组织力的缘故，仍非有人出来指导不可。——而海丰农民运动在此过渡期间内之指导者，可以说就是彭湃。

（原载中国大学校刊《晨光》2卷1号，1924年1月30日出版。
选自《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2期）

广东农会之组织及经过[①]

（一九二三年九月）

海丰农会自去年八月成立，初入会者限于海丰人，后推及陆丰、归善[②]、紫金、惠来、普宁等县，会员达十万余人，可谓空前大会。后曾改称惠州农民联合会，近以范围渐广，遂改称广东农会。其纲领：一，谋农民生活之改善。二，谋农业之发展。三，谋农村之自治。四，谋农民教育之普及。其组织分区会、县会、省会三级。每级分大会、执行委员会两机关，大会为本会最高机关。各级执行委员会分文牍、会计、交际、教育、宣传、农业、卫生、调查、庶务、仲裁等部。其会务计十二项：一，防止田主吊〔田〕，以免农民生活不安及防止耕地不加肥料工作致生产日下。二，遇岁歉或生活程度过高时，本会应体察情形向田主请减租额。三，会员如有发生争执事件，由本会极力和解，以免讼累。四，禁止会员吸食鸦片赌博等事。五，办理各级农民学校、半夜学校、图书报社、演说团及其他关于教育事项。六，办理农桑、垦荒、造林、改良、肥料、种子、耕法、农具及其他关于农业事项。七，办理疏浚河流、湖塘、修筑坡圳及其他关于水利事项。八、办理农民医院、育婴、养老及其他扶助事项。九，调查农村户口、耕地、收获及其他农村状况。十，办理农业银行消费组合及其他经济事项。十一，饲养耕牛，以供会员无力养牛耕作者之使用。十二，办理农团，以除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产品。第一、二、三、四、五、九、十二各项均已实行。该会主持其事者为彭湃。彭系日本留学生，卒业于早稻田大学，人甚刻苦坚毅，无论暑天雨天日常步行数十里，到各乡村演说及调查各事。此会日渐发达，东江各属无论男女老幼均无不知彭之名，因而田主恨之者亦日多。往往起以为难，惟彭始终不屈，恨之者固无如何也。本年旧历正月二十日该会发起开新年同乐大会，到会会员达五千余人，鼓乐喧天极一时之热闹。该会宣传部白话剧团演《二斗租》之农村悲剧，当一贫农被田主侮辱时状最可哀，观众悲愤交集，全场为之鼓噪，而年迈农夫赌〔睹〕此不觉老泪夺眶。当时田主闻知其日盛，有不利于己，已有扑灭之野心。今年五月一日之劳动节，更为空前之大集会，当日到会者万余人，手持小旗，呼声雷动，巡行城厢内外。从此会员日益众，组织亦日渐完备。军警到乡，农会出而与之论理而无所持其威。乡民有事，不用求于绅士之门。官厅绅士益加仇视，每每造谣农会交通土匪收买枪弹，希图不轨以构陷农会，然毫无凭具〔据〕，莫可如何。最近七月二十六日、八月五日大〔两〕次台风大水，海陆丰惠阳各县损失不下千万，农产物完全失收，倒塌房屋不计其数，实为该处空前之巨灾。甚受害者尤以农村为甚。故该会按照其会务第二项特召集大会讨论早季减租问题，议决输纳三成为最高限度，遂与田主冲突。该会执行委员会发出减租传单如下：

"八月十一日，突有承批教育局租批商林卓存（现任海丰县保卫团局长），命其侄某，前往北笏乡（约三十余户小乡村）收租。佃户戴阿丑，以凶年恳减。林谓：'官租无减，十足照收。'而阿丑无力照纳。林便用斗盖木迎头痛击，阿丑逃避，林复追击。乡人闻声，争出

① 此件是彭湃一九二三年九月给团中央的报告稿。

② 即现惠阳县。

劝阻。林藉势逞威，躁跳怒骂，失足仆地，遂卧地诈伤。嘱其下人抬回，诣县请验。县长王作新，竟然越法庭权限，贸然受理。验后，即派游击队二十余名，武装到北笏乡围捕。乡民畏官，闻枪声响，纷纷走匿。时值久雨、潦水未退，妇孺无地隐藏，则相率呼号奔突于途。官兵追至圈而捕之，恣意搜屋掠物。最后，遂苛索差礼银三十余元，掳去乡民戴阿扶等三人，镣锁投狱中。此八月十二月（即癸亥年七月初一日）事也。

农会闻讯，当于十五日（七月初四日）开大会，议决：一方依据法律诉诸法庭；一方筹金救济入狱家属。而县长王作新，竟与粮业维持会等绅士集议，勾结军队，突于十六日早（七月初五日）带同军警百余名，围捕海丰农会所。当被掳去职员及会员杨其珊、黄凤麟、洪庭惠、郑渭净等二十五人。会中所有文卷器具及会金九百余元、用马二匹，皆被没收。同日，又封锁会所，解散农会，四贴布告，通缉会长彭湃、余创之、林甦等。十七日早（七月初六日）复查封农民医药房，缉拿医生吕楚雄。其且诬说农会存款五万余元，寄存吕楚雄处，当勾串海丰粤军筹饷局长冯璧环，着令吕楚雄交出提充军饷。旋又纵令各区警兵，四出下乡迫租。并查缴农会会员证章。多方苛勒，百般骚扰。农民生机全绝，惟有待死。近虽曾由老隆陈总司令去电，着令该县长王作新即行释放被捕会员，恢复农会机关。迄今尚未见施行，而军警下乡逼迫，日盛一日”。

以上是香港华字日报九月五号第二张第三页粤闻栏所载的。予添多同某会及“五一”会于中段。至于请愿一段尚未添下。到底这几段若非详细写下，似觉不甚重要，如何，请裁之。至该报说我好处，仍有过当，姑留为君一看。

（选自《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

党创办的第一所平民女校

王会悟

上海平民女校，是我们党为妇女解放而创办的第一所学校。虽然学生不多，为时也只有一年。但，这所新型的女校当时影响很大。它不仅为革命培养了妇女骨干，而且有力地抨击了旧中国腐败的女子教育。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领导妇女解放运动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党的“一大”结束后，代表们回到各地，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都积极着手培养妇女工作人材。这年十月间，陈独秀和李达开始酝酿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并指定我负责具体筹备工作。

筹备工作的第一件事是找房子。上海房子很紧张。这时我和李达已经结婚，住在成都路辅德里。恰好在我们家后面斜对门有一所独院的二层楼房要出顶，顶费是五十元。我和李达就凑了五十元，把这座房子顶下来，做平民女校的校舍。这就是辅德里932号。

接着就是以什么名义开办学校？当时，党完全是秘密的，不能公开办学。我是上海女界联合会的成员，陈独秀和李达同我商量是否就用女界联合会的名义？但，这要得到会长黄宗汉的同意。黄宗汉是国民党元老黄兴的夫人，是国民党内的左派，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者。黄兴遇刺后，她精神受了刺激，但，她也很想做点事情，当我同她商谈办平民女校这件事时，她高兴得拍起手来，连说：“好极了，好极了，我们就是要多作点事情才好。陈先生、李先生都是有名望的人，这么一来，对妇女很有好处，女界联合会的声望也提高了。”她不但赞成用女界联合会的名义，还表示要尽一点力。后来，她捐献了一部分带椅子的旧课桌。

第三件事是请教员。上海平民女校进行的是新型教育，教员条件很高，多是当代的名流，如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高语罕、张守白、沈雁冰、沈泽民，这些人当时都是共产党员。还有周昌寿、范寿康，他们都曾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还有一个美国人艾利斯，自愿来教英语会话。由于我们党的经费缺乏，所有教员都是义务教课。但是，每位教员都极为尽心尽责。记得在我聘请陈望道教国文的时候，他风趣地对我说：“让我教国文，可得听我的，不要老框框啊。”我说：“我们平民女校要的就是新，我们就请你教白话文，老框框我们也不要”。后来，他在给学生讲作文的时候，就和一般的国粹先生完全不同，他先讲文法，指导学生作文不但要重文字，而且要重意义。其他教师所选的课本，也都是适应新思潮，又合乎平民这个教育宗旨的。如：邵力子所选的国文，是当时报纸、杂志、小说中的名著译文及评论之类的文章；语法教员张守白，自己编讲义，详细明瞭；沈泽民教英文，要学生注意翻译，采用的课本是法国名作家莫泊桑的小说。陈独秀和李达讲社会学、马列主义深入浅出，对学生影响很深。

一九二二年初，上海平民女校正式开学，设有高等、初等两个班，一个工作部，共有学生二十余人。

高等班，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当时中国无论官办或私人办的女子中学，程度都很低，学生毕业后仍考不上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我们设高等班，是用较短的时间，教授

学生较多的知识，使之达到考入高等学府的水平。所以课程的设置，着重于补习基本学科。共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八门功课。入高等班的学生，都是不满足在官办或私人办的贵族女校受贤良教育，为追求革命真理而来的进步女青年。如王剑虹、王醒予、丁玲、高语英、王一知、富戒凡、黄守衡、黄淑英等，都在高等班学习。她们的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食宿自理，大部不住校，每学期交学费两元。

初等班，收年长失学的女子。学生程度很不齐，有文盲，有粗通文字的，也有上过初小或高小后失学的。初等班的课程有国文、算术、英文。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和我教国文，柯庆施教算术，我并和沈泽民教英文。对根本不识字的学生，我们就从扫盲作起，手把手教她们学写字。在初等班学习的有钱希均、张怀德、秦德君等十几个人，其中还有个姓徐的母女俩，母亲三十多岁，女儿才七、八岁。初等班学生有的是挣脱顽固家庭羁绊出来求学的，有逃脱封建婚姻出来革命的！也有党员和革命者的家属。如安徽的高语罕，被敌人盯上了，他闻讯逃来上海，陈独秀就安排他住在平民女校的楼下，并请他担任高等班的国文教员。他带来一位反抗旧婚姻的妹妹高语英，就在平民女校高等班学习。一个是被江苏军阀通缉的革命者，带着爱人和两个孩子来到平民女校，党中央安排他本人住到商务印书馆，还给他找事作以维持生活，他的爱人张怀德，就在平民女校初等班学习，并抚育孩子。她们经济都很困难，所以初等班学生全是半工半读，大部分住校，不交学费。

工作部，是为初等班学生做工而设的。里面有缝纫、织袜、编织三个组。缝纫、编织都是手工操作，织袜有两台手摇机。学生每天是做半天工，读半天书，挣得的工资，可供自己生活、学习所需的费用。开始有些人不会做，我们就采取边做边学，互教互学的办法。姓徐的母亲教大家缝制衣服；我能教编织，秦德君会教织袜，有一台手摇机就是她带来的，在大家团结协作之下，不熟练的人，每天也可得工资三毛钱，除去每月吃“包饭”三元外，还有剩余。因此，大家生活、工作、学习都感到很有意义。

两个班除分别规定的课程外，每周还有一次上大课，两个班的学生一起参加，大课主要是讲马列主义、政治时事报告和妇女切身问题。陈独秀、李达、张太雷、刘少奇、恽代英、张秋人、陈望道、施存统等都在平民女校做过政治时事报告。

由于教师是兼职的，每个星期日我们都全天上课，星期一才休息。

上海平民女校的学生，不但在课堂上学习，还经常到社会实际斗争中去经受锻炼。一九二二年，正值我国出现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上海的工人罢工斗争也是此起彼伏。劳动组合书记部同志经常带领我们到工厂去参观、调查女工生活、办女工识字班、帮女工写家信，和女工交朋友，并向她们宣传党的主张，鼓励她们同资本家斗争。这年春天，上海杨树浦日华纱厂工人举行罢工，资本家扣发她们工资，造成生活困难，在党、团领导下我们就组成募捐队，胸前挂个小竹筒背后揹着大一点的竹筒，手拿小旗，到四马路、南京路等地一面宣传一面募捐，用募集来的钱援助罢工工人。还有一次英美烟草公司全体工人罢工，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资本家疯狂镇压。当时，不少女工认为自己的命不好，情绪低落，我们就组织宣传队，去向她们宣讲资本剥削的道理，说明不是她们命苦，是资本家太残酷，鼓励她们坚持罢工斗争，不达目的不罢休。并且向她们宣传工人团结起来的重要性、启发她们组织自己的工会。女工们听了我们的宣传，就象见了亲人，也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诉苦，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种种压迫。使我们又反转来受到了教育。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日，我们党在小西门召开一次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五周年的群众大会，杨杏佛在大会上讲话。我们平民女校的学生到会场散发传单，宣传苏联的群众生活，讲布尔塞维克的革命情况。我们还把事先准备好的列宁像、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像拿到大会上去卖。群众听了宣传、演讲都很激动，争先恐后地来买像，我们把卖像的钱全交给党组织去支援工人运动。

每次参加社会斗争回来，同学们都感到很自豪，大家说："我们这就是做革命工作"。一次比一次更积极。

平民女校的生活，是紧张而有秩序，愉快而团结的。大家都是短发、放足，互相间十分友爱。校内的卫生、杂活，都是我们自己做。张怀德年龄较长，她每天自动承担了刷马桶这类脏活。柯庆施年纪较轻，个子高，力气大。除教课外，他还抢着干重活、杂活。虽然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但，相处得如一家人。

上海市平民女校还担负着一项特殊任务，就是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和党内同志。当时党中央在上海，陈独秀是党的总书记，李达是党中央宣传部主任。各地党组织经常来人联系、商谈工作，从国外回来的同志也先到上海接头。平民女校实际上就是党中央的联络点。党的领导人在这里接头、开会，在他们开会时，我们就在楼下起放哨的作用。

由于上海平民女校是一个这样的特殊学校，学生在这里学的是新的文化科学知识，受的是马列主义薰陶，接触的是革命实际斗争，所以她们的文化素养，理想情操，特别是革命意志，都是一般女学不能与之比拟的。高等班学生王剑虹，是一位极热心妇女解放的分子，曾在《妇女声》等党领导的报刊上，发表过不少论述妇女解放的文章，一九二四年因肺病早逝。高等班的丁玲后来成了著名的文学家，王一知成了教育家，初等班的钱希钧，成为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参加过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

她们过去为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现在，还利用有生之年积极为建设四化的强国做着新贡献，壮志不减当年。

一九二二年三月，李达在《妇女声》第六期发表过一篇文章，对平民女校的作用，做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他大声疾呼"大家不要把平民女校等闲放过了"。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未推倒以前，"平民女校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哩！"当然，在整个革命的历史长河中，上海平民女校不过是小小的一滴水珠，但是，这滴水确曾激起一阵翻腾的波涛，向几千年来束缚妇女的旧制度猛烈冲击。至今回忆起来，仍觉亲切，感到浑身都是力量。

（选自《妇女运动史研究》1981年第1期）

现代的女权运动

李大钊

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的时代。

凡在“力的法则”支配之下的，都是被压迫的阶级；凡对此“力的法则”的反抗运动，都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运动。妇女屈服于男子“力的法则”之下，历时已经很久，故凡妇女对于男子的“力的法则”的反抗，都为女权运动。这种运动，历史中包含甚多，名之曰“革命”并不过分。

妇女要想达到伊们完全解放的目的，非组织一个世界的大联合不可。

就在白人所居的乡土，亦有多处女权运动才见萌芽。在东亚，在非洲，妇女底羁绊依然未全打破。但在此等地方，妇女的时代亦渐发见曙光了。

女权运动底国际的组织如下：妇女国际会议以各“妇女国民会议”底主席职员组成。一国底妇女俱乐部，为施行一定的普通政纲都可以加入一个国民会议。第一个国民会议，一八八八年成立于北美合众国。随后在坎拿大、法国、瑞典、英伦、丹麦、荷兰、澳洲、瑞士、义大利、奥国、诺威、匈牙利等国均有了这类的组织。

这妇女国际会议所代表的妇女数目，尚无统计。彼底会员大约将近千万人，国民会议只许以团体加人，不许以个人加入。构成妇女国际会议的各国民会议的会长，专以伊们的主席职员的资格列席。

妇女国际会议是一个促进有组织的国际的女权运动的永久机关，这是一八八八年在华盛顿成立的。

妇女参政运动是女权运动的另一形态，亦同样地依国际的形式组织起来。但对于女权运动是完全独立的，妇女参政是为有组织的妇女所提出的最急进的要求，后来在各国为急进的女权论者所拥护。伊们认妇女参政是女权运动底入门，由此可以达于更远大的目的。所以国民会议会员底大部分，不能在一切情形之下都把妇女参政加入伊们的政纲。然至一九〇四年六月九日，国际会议在柏林关于此点已有可决了。

国际妇女参政联合会在华盛顿成立后，不久在柏林亦有一个代表八国的妇女参政同盟发生。这个同盟所代表的八国，是北美合众国、威多利亚、英伦、日尔曼、瑞典、诺威、丹麦与荷兰。这个同盟与联合会联络起来，从此以后妇女参政运动便成了女权运动中最昌盛的部分。这曾声言过要在五年终再召集第二次会议的“国际妇女参政联合会”，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九年间已经开了三次会议（一九〇六年在Copenhagen，一九〇八年在 Amsterdam，一九〇九年在伦敦），会员扩张到二十一国（北美合众国、澳洲、南非洲、坎拿大、大不列颠、日尔曼、瑞典、诺威、丹麦、荷兰、芬兰、俄罗斯、匈牙利、奥大利、比利时、义大利、瑞士、法国、勃加利亚、塞尔维亚、冰岛。）第一次的会长是加特夫人（Mrs Cariie Chapmae Catt）。

女权运动的主要的要求在各国都是相同，此等要求可大别为四：

一、属于教育者：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的机会；

二、属于劳工者：任何职业选择的自由，与同类工作的同等报酬；

三、属于法律者：民法上，妻在法律前应与以法律的人格的完全地位并民法上的完全权能。刑法上，所有歧视妇女的一切条规完全废止。公法上，妇女参政权；

四、属于社会的生活者：须承认妇女之家庭的、社会的工作的高尚价值与把妇女排出于各种男子活动的范围以外生活的缺陷、粗粝、偏颇与单调。

各国底女权运动，都是发源于中流阶级，劳动妇女底运动比较的后起。但女权运动与劳动妇女底运动，并不含有敌对的意味，而且有互相辅助的必要。在澳洲、在英伦、在北美合众国，这两种运动全无敌对的形迹。但在阶级争斗剧烈的国家，中流阶级的妇女运动与劳动阶级的妇女运动决然分离。这是因为中流阶级的妇女没有彻底的觉悟的原故。中流阶级底妇女应该辅助劳工妇女底运动。这个道理，与美国劳工团体宣言赞助妇女参政运动的道理全是一样。因为多数劳工妇女在资本阶级压制之下，少数中流阶级的妇女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反之劳工妇女运动若能成功，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此外，劳工妇女的运动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的行动。

苏俄劳农政治下妇女享有自由独立的量，比世界各国的妇女都多，就是一个显例。第三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二〇年指定Clara Zetkin为妇女共产党的国际的书记，计画着开一国际共产党劳工妇女会，示全世界劳工阶级妇女以正当的道路，以矫正大战开始后一九一五年在Berne开的第一次国际妇女大会的错误。这又为女权运动开一新纪元。

一个公正的娱快的两性的关系，全靠男女间的相依、平等与互相辅助的关系，不靠妇女的附属与男子的优越。男女各有各的特性，全为对等的关系，全有相与补足的地方。国际的女权运动和国际的劳工妇女运动的起源就在全世界对于此等原理的漠视。

生活上职业的要求，使妇女有教育的修养的必要。女子教育机会的扩张似乎比承认参政权还要紧。Canon Gare劝告英国工人道：

"除非你得了知识，一切为正义公道的热情都归乌有。你可以成为强有力与骚乱，你可以获得一时的胜利，你可以实行革命，但若把知识仍遗留于特权阶级的手中，你将仍旧被践踏于知识的脚下，因为知识永远战胜愚昧。"

这几句痛言我借以奉告世界上未曾解放而方将努力作解放运动的妇女，特别是中国今日的妇女。

（署名守常，原载《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25期，1922年1月18日。选自《李大钊选集》）

中国最近妇女运动

誉　予

中国最近妇女运动可分为劳动妇女运动，女权及参政运动，基督教妇女运动三派。

一，劳动妇女运动　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发展，已把数千年农业手工业生产的中国日渐月累的近代工业化，各大商埠幼稚的半独立的大工业以及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工厂逐渐发达，于是纱厂丝厂香烟厂等遂成为女劳动群众——其中包含许多素不抛头露面的妇女——集中的场所。资本家们，——尤其是外国资本家，知道妇女们愚而易欺，不容情的向他们压榨，他们的生活非常之痛苦。左列的罢工表，就是他们被资本家——尤其是外国资本家逼到走头无路时，为保卫自己生存计不得已而起的阶级争斗，也就是一九二二年中国劳动妇女运动的开端。

一九二二年中国劳动妇女罢工运动表

址　点	厂　名	人　数	时　间	原　因	结　果
上海杨树浦	日华第二纱厂	千余人（粗细纱间女工全体）	二月二日	要求厂主允工人自带饭食进厂并要求按月发给全薪	一致坚持完全胜利
同上	三新纱厂	千余人（细纱间日夜班女工）	二月十三至二十日	因日食艰难要求增加工资	因不能一致坚持失败
上海宜昌路	申新纱厂	八十余人	二月某日	因管车拔升私人为工头	因捕房派警弹压上工工人失败
上海杨树浦	日商东华纱厂	七十余人	三月二十九日	因不服帐房扣减工资	领袖被捕工人失败
上海浦东	日华纱厂	三千八百余人（男女工）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	要求增加工资	男女工一致工人胜利
上海浦东陆家嘴	英美烟公司	三百余人（叶子间女工）	五月三日至五月五日	要求厂主取消新订章程	工人胜利
上海浦东洋泾镇	源茂织布厂	二百余人	六月十五日	要求增加工资	胜利
上海新闸闸北一带	四十四家丝厂	二万余人	八月十五至九月十四日	要求厂主承认女子工业进德会增加工资减小时间	首领被捕大多数女工不能坚持完全失败
上海杨树浦	日商大康纱厂	工人全体	十月二日	要求厂主勿苛待工人	工人胜利
上海中华路	万生织袜厂	工人全体	十月十七日至十九日	要求增加工资	工人为生活所迫不能坚持自行上工完全失败
上海浦东	日华纱厂	全体女工	十一月一日至二十五日	要求启封纺织工会及其他条件	不能坚持失败
上海浦东陆家嘴	英美烟公司新厂	二千余人（锡包间女工全体）	十一月二日至二十四日	要求增加工资	不能一致坚持失败
上海	英美烟公司狄思威路一号	一百五十人（哈德门卷烟女工）	十一月十三日	要求增加工资	领袖被捕群众无主自行上工工人失败

续表

上海浦东	恒大纱厂	全体	十二月十七日	为虐打女工	一打散场
湖北	英美香烟厂	三千余人（男女工）	十一月约一星期之久	要求承认工会增加工资	完全一致工人胜利
同上	同上	同上	十二年一月（一星期久）	要求承认工会履行条件	同上
广东	军衣女工会	五百余人	未详	要求军衣铺照原订价目付资	一部分工人受资本家诱惑破坏团体工人失败
同上	织袜女工会	未详	未详	要求资本家承认工会	罢工领袖被开除团体瓦解失败

按上表统计女工罢工的工厂共六十余个，罢工人数共三万余，罢工次数共十八次，罢工原因不外要求增工资减工时承认工会。这六十余次罢工中，要以上海丝厂女工同盟罢工上海日华纱厂罢工湖北英美香烟厂罢工人数为多运动为大。上海丝厂女工同盟罢工为上海四十四家丝厂女工之总结合，人数二万余，以承认工会列诸要求之首条。原来丝厂待遇工人极其恶劣，工人忍痛含苦已非一日，团结抵抗实是他们生存竞争上一个迫切的表现，虽因高压及不能坚持而失败，然不失为吾国劳动妇女运动之空前大举。其次上海日华纱厂及湖北英美香烟厂罢工，前者后者都是三千余人的运动，此两次运动的特点为男工女工一致对抗外国资本家，他们所以取得胜利的原因也在于此。

二，女权及参政运动　中国女子参政运动随辛亥革命成功而发轫，其时颇有组织，有领袖，有行动，因而亦激起少数群众，然北洋军阀第一首领袁世凯掌握政权民党失败，政治上之反动日甚一日，此新茁之嫩芽不旋踵而与民权同斩。再过几年，护法政府南下，女子参政又在广东一隅蠕蠕而动。未几，湖南有所谓省自治运动发生，于是又引动了湖南少数知识界妇女的参政热。他们的第一步骤是要求省宪明白规定女子与男子平等的享有政治上财产上之各种权利。结果湖南有了一个女省议员，一个女省视学，十几个女县议员，还有少数的女子供职省议会及各行政机关。去年旧国会恢复大唱制宪的高调，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女生所发起的女子参政协会女权运动同盟会其乃于时应运而生。接著上海天津南京湖北等处也都发生同样的组织。他们此次运动完全是以国会做对象。主要目的在于宪法上取得男女一切的平等。所以上书请愿，不约而同的成为各地女子参政协会女权运动同盟会普通一致的行动。但是参政派的意见谓政治问题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枢纽，故女权运动只须著重于参政一点。女权派虽然承认参政运动的重要，但谓仅此一点还嫌不够，故有左列的纲领：

（1）参政权

（2）财产与承继权

（3）职业与工资平等权

（4）婚姻自由权

（5）教育平等权

…………

这两派文字上规定的范围虽有不同，然以去年他们成立时直到现在的实际行动看来则二

而一。但是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则还做了几件可以纪载的事体：

（ 1 ）要求北京清华学校考送女生出洋

（ 2 ）致书总邮务司招考女生

（ 3 ）代丝厂女工呼吁　致书丝茧总公所要求三条：一，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过八小时；二，十四岁以下之幼童男女不得工作；三，每星期须有一日之休息。

（ 4 ）推举代表参加万国女子参政协会

三，基督教妇女运动　基督教女青年会，中英美妇女会，妇女节制会……等，他们成立的历史比以上妇女团体为长，而人数也比较为多。他们常向妇女群众宣传育婴卫生节俭及禁止无益之嗜好（如烟酒牌）等家常茶饭的道理。此外更用种种娱乐动人的方法使群众喜与他们接近。他们一面成立有利于知识妇女的家务团和女子职业介绍部；一面以重要分子加入各妇女团体或至各女校演讲或登文各报发表他们对于各种妇女问题的意见以吸收知识界妇女。他们对于一般知识妇女所轻视鄙贱的工厂劳动妇女尤其特别注意。他们的成绩有下列各项：两次派代表参与国际女子保工大会；二，上海中英美妇女会通过函请市政厅取缔童工办法三条"(一)禁止十二岁以下幼童男女作夜工（二）督率教育委员在各地工厂内创办工读学堂(三)工厂须讲求工人卫生"；三，上海女青年会领袖上海妇女七团体代丝厂女工呼吁；四，上海妇女节制会在杨树浦一带设工儿院　他们于劳动妇女要称不遗余力的帮助。

上面已把中国最近的三派妇女运动述了一个大概，现在且就三派做个比较的批评。大凡一种运动实力的标准，常因群众的多寡及组织力战斗力的强弱而决定。女权和参政运动从未有过千人以上的群众运动，而且他们除了叩头式的请愿和打拱式的哀求，对旧社会从不敢有反抗的表示，甚至这些叩头式的请愿和打拱式的哀求还是最少数的人做的，大多数职员会员连平常一个会议也到不齐，好象甘心做无人格的附属品可耻的玩物无用的寄生虫似的，镇日里装饰得天仙化人一事不管！独有穷无所归工厂卖力的劳动妇女他们为争自由争本身利益常常以几千几百的群众——至少也有几百——用罢工的手段一致与资本家积极作战，忍饥挨饿牺牲工钱或被革除都所不惜。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争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

照理说，女权及参政运动的分子都是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妇女，其觉悟奋斗之程度应比劳动妇女高，何以现在适得其反呢？问题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拜服马克斯空前的发明唯物史观之卓识。原来人的思想和意识，决不是无中生有的海市蜃楼，而是他的物质环境之反映。劳动妇女寒苦的家庭已丧失了父与夫的靠山；环境逼着他们跳出经济的附属地位而与无产的男子一样卖力营独立的生活。于是日受资本家压榨，常有不能生存的危险，而团结奋斗遂成了他们生存的要件。因大工业的发展把他们成千整万的聚在一块，使他们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从而他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超出于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女权及参政运动团体完全是知识妇女的结晶，他们过的是小姐太太的生活经济上处于纯附属的地位，他们秉赋著几千年传统依赖性吃惯了这碗奴隶饭，未嫁靠父既嫁靠夫夫死靠子。他们出来做运动不过一时高兴装点门面，实际上丝毫不感需要。在他们的意思做运动到底不及逛公园玩笑闲谈的自由，更不及插麻雀打扑克的有趣，而且因此还找了许多烦恼却何苦来，所以久而久之便逃之夭夭连会也不赴了！自来知识妇女的团体，无一不是软弱无力有始鲜终就是这个原因。固然女权及参政运动团体中也有最少数觉悟奋斗的分子我们不能一概抹煞，只是都因知识的不足环境的恶化

犯了几种错误的趋向。兹且写出供大家的研究。

一，他们不知道女权或参政运动要大多数妇女群众结合进行才有意义有作用。他们一方面摆不脱旧礼教的遗毒闹出不许姨太太加入的笑话；一方面又嫌劳苦妇女知识浅薄衣服破烂玷辱了他们美丽修整的行伍；所以始终是个几十人飘飘洒洒好看无用不足轻重的团体。

二，他们以为几十个人开开会打打电报上封书便已尽了女权运动问题的能事。对于受旧礼教高压——家庭社会高压——无处逃生以病以死的妇女们毫无实力的援助，甚且视如秦越恬不加意！这个团体，既与妇女群众不相干，所以妇女群众也不需要他。

三，他们把女子参政运动弄成了女子个人做官做议员的运动。他们并不要妇女群众瞭解女子参政的意义和必要，所以女子实际有了参政机会的湖南，现在还没有女权式参政运动的团体。他们不明白中国的大势，不明白中国现在的政治是军阀武人割据的政治，真正人民政治还在革命改革之中，只一味对向现实政治瞎冲乱撞，对于真正的政治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为完成女权及参政运动之先决条件的他们反没有勇气参加；对于为女权及女子参政障碍的军阀政治——全国觉悟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喊打的——反而俯首将顺妄想委曲求全！妇女杂志的编辑瑟庐说“现在从事参政运动者则大都为稳健派，如女子参政协进会开成立会时受警察干涉也便改为讲演会并不反抗，所以不象从前的惹人注意”。这正是女子参政运动者的耻辱呀！如果秉着此种意义去做参政运动，其结果不过是无聊的议员队里增加了无聊的女议员，可耻的官僚群中添多些可耻的女官僚可以说毫无意义！

四，把大多的劳工妇女除外了。劳工妇女界的大部分，又为妇女界最受痛苦的部分，去年一年他们罢工次数不算不多，罢工理由不算不正，罢工呼声不算不惨，舆论界及一般社会的同情都激起来了，独激不起女权及参政运动姊妹们的一声半响！今年某月虽有差强人意的上海妇女七团体破天荒的代丝厂女工呼吁，然而对于丝茧公所剥削女工在约法上的人民集会结社自由权——此不独为女工命运所关——，七团体竟提也不可提，好象女权及参政运动团体，真是划了界线专门代表知识妇女的利益似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从客观上分析妇女界还只有新兴的劳动妇女最有力量，最有奋斗革命的精神，女权及参政运动姊妹们如果抛弃这支主力军，便是女权运动参政运动绝大的损失，永远不能望发展。

五，各地参政团体女权运动团体，尚无统一集中的组织，亦无统一集中有声有色的宣传——连稍有力量的出版物也没有一种——已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大缺点。

我国知识妇女的运动如上所述既那样的软弱，何以基督教妇女能深入群众比较有力？因为他们在组织上方法上技术上人才上经济上无一不有国际的后援与指导，并非中国基督教妇女本身之力量。这派运动现在虽然比较有成绩，但恐终会成为外国资本的机械，而不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需要之独立的妇女运动。

（选自《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出版）

湖南学生的大觉悟

存　统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确定学生联合会的伟大使命
领导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
并注意本身问题作切实的准备
全国学生闻之能毋兴起乎

现在的学生真太无觉悟了！军阀的横行，外国的侵略，工人被压迫，教育受摧残……这种种可痛可愤的事情，都不能使他们发生觉悟——很大的觉悟。一部分所谓"好学生"，更是除了读死书想做准学者外不知社会上尚有何等样事。学生乃少数号称新文化运动者，虽稍微有点觉悟，亦是皮相梦幻之谈，很少去探求社会的根本缺陷及其原因的。看了这种个形，实在不能不使人对之发生极大的悲观！

据我个人的信仰以为我们要在中国成就社会革命，非"学生无产阶级，兵士三种人结成联合战线"不可。此意曾在"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一文中详细说过，目下尚信之不疑。我以为中国的无产的阶级，兵士都非学生跑进他们队里去宣传，教育，组织不可。学生本身是没有何等很大的力量的，他的力量在民众中才能表现出来。如果有几万，几十万为民众为革命的学生跑到民众里去，何惧社会革命不能成功！所以我们希望全国学生都了解这一层，知道自己使命的重大，努力去参加这开阔人类历史的光荣革命！

好了！现在湖南的学生，已经有了如我们所希望的觉悟了！一向以革命精神丰足著称的湖南学生的现在已做了全国青年学生的革命的先驱了！我们日夜所引领而望的革命学生，已首先在湖南发见了！

我们看了本年十二月七日湖南学生联合会评议部议决的进行方针和计划，真是有无限的欢喜，表无限的倾服。我从他们的进行方针和计划中，知道他们有三个极大的觉悟，就是：

（1）他们觉悟自己的使命，是领导群众去反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压迫；

（2）他们觉悟要与旧社会作战，须有一个铁般的集中的组织，并须由学生自治做其根基；

（3）他们觉悟须将教育普及于一般人民，并须在可能的范围内立即举行。

这三种觉悟，不能不说是湖南学生的极大的觉悟。第一种，可以表示他们已有从空泛的文化运动进到国际的社会运动的决心了。他们对于"五四"运动的意义，亦已由漠然不清的观念变成极其明确的认识了。换句话说他们已经认识了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实业停滞，教育恐慌的根本原因并有挺身改造他的决心了。这种极大的觉悟，每个学生都不能轻易看过，须有极大的注意才对。他的意义，比"五四"那种单纯的漠然爱国运动，要大得多。或者可以说他是"五四"精神的积极的正当发展。

第二种觉悟，亦有很重大的意义，有前一种觉悟而没有第二种觉悟，什么事情都不会有成功之日。中国人不怕没有前一种觉悟，只怕没有后一种觉悟。这事，凡是有点团体经验的人都会知道，以向无团体训练的中国人，要他组织这般的集中的团体，原是非容易的事。但我们即然下了决心要改造社会，什么东西都要牺牲，怎么区区个人的一时的自由都不能牺牲呢？！我们要晓得：我们所牺牲的不过是个人的一时的自由，但是所得的却是大众的长时的自由呵！以个人的一时的自由与大众的长时的自由较，究竟孰轻孰重呢？我们个个都晓得散慢无统一的团体是成不了什么事的——尤其是革命，那么我们何不觉悟牺牲我们个人的一时的自由去换一个铁般的有力的组织用他来取得大众的长时的自由呢？所以我们以为湖南学生这种觉悟实在是根本觉悟，他的意义不在第一种觉悟之下。

至于第三种觉悟，我亦以为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从前都错了！只晓得对于现在社会取根本反对的态度甚么改良运动都看他不起，以为都是不彻底的运动而不去参加。我们现在晓得这是不对的了！这是犯着孩子病的了！从唱高调在理论上否认了现社会在实际上反放任了现社会就是现状拥护者了！我们必须冲进旧社会的壁垒，用一切手段与旧社会交锋！工厂，农场、学校，军队……都是我们的战场！加增工钱，改良租税，学生自治，投身军队……都是我们的战术！我们一面固然要坚守我们最后的目的，一面还须要讲究达到我们目的的一切手段。我们必定要晓得目前种种改良运动是达到最后目的的不可避免的过程。我们在没有达到最后目的以前是要种种努力的。所以我们以为湖南学生注意学生自治，注意目前的社会教育是很有意义的。他们将在学生自治，社会教育当中得了许多经验，增了许多智识，加了许多能力，获了许多觉悟——培植了许多人才。我们以为这是很有价值必不可少的运动，全国学生，全国有志改造社会的青年，都不能不注意。

最有趣的，他们回答那些说“学生只应该读书，不应该做事”的人道：“这种话实在没有理由。第一，我们为甚么求学，我们不是拿学术做装饰品，是要拿学术来应用的，为甚么只管学不管用呢？第二，我们处在现在的社会，是不是应该知道现在社会的实况？第三，我们求学是不是专靠书本？我们应不应该注重观察和实验？第四，我们处在这种变态的社会，我们学生负着重大的使命，岂可专心读书不管他事？第五，我们想想我们在现在的社会能够安心求学，是不是我们的幸福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上，我们不应帮助他人吗？第六，我们能够求学，许多人不能够求学，我们忍不忍呢？应不应该分些时间帮助别人求学呢？第七，我们受着本国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应不应该起来反抗呢？我们把以上的问题想一想，我们还是守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咧？还是与大多数劳苦的民众共同谋福利咧？同学们！我们要猛省呵！努力呵！不要因循苟且的与现社会妥胁，要热烈的奋斗起来呵！”

我现在特将他们的方针和计划转录于下，希望全国学生全国同志的特别注意。

（一）湖南学生联合会进行方针

处在这黑暗阴沉的社会，腐败恶浊的政治，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政治两重压迫的中国学生，他们的责任何等重大！他们应该如何起来奋斗！

在中国这个时候，教育未普及，人民知识程度甚低，文化破产，一般有知识的青年学生他们的使命何等伟大，他们应该如何起来努力！

中国这个时候，正如孤舟处大海迁狂风巨浪一样。一般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正在共同来侵略中国，将以中国天然的富源和贱价劳动，补偿大战的损失，因侵略而竞争，将来免不掉

要在中国演世界的第二次大战争，这是何等可怕的巨祸！中国的学生，还不起来领导中国的劳苦民众来反抗吗？

中国现在的学生，是社会的中坚分子，是最近的将来中国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的领导者。他们努力的程度，即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程度。同胞们！起！起！大家一齐起来，领导大多数民众，做改造中国的事业呀！

各地的学生联合会和我们湖南学生联合会因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应时诞生，于今六年。从他的历史背景观察，即知道他的重大任务是反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改革中国的政治。自五四运动以后，学生们从政治运动中得到了教训，知道腐败的社会上，不能建筑良好的政治，因此学生团体的活动渐趋重于社会方面，如新文化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等等从此学生联合会也就添了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改造社会。

但就各地的学生联合会和我们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经过情形考察，知道他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只向外活动，而不向内活动。所以弄成学生联合会不与学生发生关系，有些同学以为学生联合是别的东西与自己无关痛痒。这虽然是观念的错误，但一面也实在是学生联合会本身精神上和组织上已有了缺陷。从这一点，我们也得改变方针，就是学生联合会必得注意于我们本身问题。

本会根据以上的理由，确定本会进行的方针如下："本会以团结学生，领导民众，谋学生本身的利益；并反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与本国军阀政治的压迫；造成真正民主主义的政治；进而建筑真正平等的社会；创造真正的光明世界"。

（二）湖南学生联合会进行计划

我们觉得以前学生的活动，从没有远大的具体的计划，要遇了刺激，才起反应，是被动的而不是自动的，是零碎的而不是有系统的，因此中国的学生运动，渐由热烈而趋于冷淡了。本会根据第一节所定方针，决定进行计划十四条列左：

（一）巩固并完成本会组织：

（1）使全省中等以上各校通加入本会；

（2）促成各校组织学生会；

（3）促成各地分会。

（三）聘请驻会办事员。

（四）促进学生自治：

（1）先组织学生会；

（2）拟定学生自治办法；

（3）周报发行学生自治特刊；

（4）由各校同学向各校要求学生自治；

（5）由本会向各校校长教职员要求学生自治。

（五）举办社会教育：

与教育会农会工会商会各团体合办之，共同组织省垣平民教育委办会。

（六）组织学术研究会延请名人演说。

（七）组织学生俱乐部：

音乐，戏剧，电影，均须次第举办。

（八）要求政府增加教育经费，务使按照省宪实施。

（九）女子教育促进运动。

（十）校革新运动。

（十一）减少学费运动。

各地学生诸君！湖南学生联合会的进行方针和进行计划，你们看见了吗？你们看了能无有一点感动，能无一点觉悟吗？你们的身体，不亦是一样地受着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两重压迫吗？你们的幸福，不亦是一样地“建筑在他人的苦痛上面”吗？他们已经做他们所应做的了，你们呢？还不赶快奋起吗！

起！起！起！一齐奋起！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创造合作共意的新社会！

（选自《先驱》第14期，1923年1月9日出版）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人是不能不求学的。求学是要有一块地方并且要有一种组织的。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所谓书院可毁，在他研究的内容不对。书院研究的内容，就是“八股”等等干禄之具，这些只是一种玩物，那能算得上正当的学问；就这一点论，我们可以说书院不对的很！但是书院也尽有好处。要晓得书院的好处，先要晓得学校的坏处。原来学校的好处很多，但坏处也就不少。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行行为罢了！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有心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学校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总括这些坏处，固然不能概括一切的学校说他们尽是这样，并且缺点所在，将来总还有改良的希望。但大体确是这样，欲想要替他隐讳也无从隐讳。他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毁掉性灵，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则都没有。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故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但是现代学校有一项特长，就是他“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

以上是说书院和学校各有利弊。自修大学乃取其利去其弊。现在再说自修大学独有的利，而书院和学校则为共有的弊；就是平民主义与非平民主义。书院和官式大学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学固不待言，实及了而偶不及，即有本为优才，经入学考试而见遗的，便从此绝其向学的路。现在确实有好些有志青年，没有得到求学的机会，实在可叹可惜！是一。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是二。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是三。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一则除住校学生因房屋关系须稍示限制外，校外学生则诸凡有志向学以上均可入学。二则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则自修大学在现在这“金钱就是生命”的时代，固不能使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

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也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比较官式大学便利得多，花费也就自然少了。

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既如上述，那么自修大学的内容怎么样呢？现在说一点大略于下：第一，自修大学学生研究学问的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自修大学里面的“图书馆”就是专为这一项用的。第二，自修大学学生于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各种研究会的组织，就是专为这一项用的。第三，自修大学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第四，自修大学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定。第五，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最后要说自修大学在湖南的必要了。诸君！湖南不是至今没有一个最高的学术机关么？省立大学在最近期内之必无成理，和即使成了也不过是一个官式大学，这是大家都明白的。而住在这湘江流域、沅江流域、资江流域、沣江流域的三千万湖南民族，他们精神的欲求和文化的冲动将如何的去表现出来，发挥出来呢？湖南人尽管是峥嵘活泼如日升的，尽管是极有希望的，但使没有可以满足其精神的欲求而发挥其文化的冲动，湖南人到底有什么意义？说到这里，便觉得湖南人有一种很大的任务落在他们的肩膊上来了。什么任务呢？就是自完成自发展自创造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大学之设，窃取此意。事势上虽不能和湖南人个个发生关系，精神上要必要使他成为一个湖南全社会公共的学术机关。虽不能说一定有很好的成绩，但努力向前，积以年月，相信总有一天会达到我们的目标的。

（《新时代》1卷1期，1923年4月10日）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

——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①

（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

吴廷康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

陈独秀

① 副标题是编者加的。

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1）现在状况

A、党员及党费

去年（一九二一）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余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国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计一百九十五人；内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

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

B、政治宣传

1．关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之运动如左：

Ⅰ、译印第三国际对于太平洋会议宣言（五千份）。

Ⅱ、译印山川均及堺利彦批评太平洋会议论文（各五千份）。

Ⅲ、印陈独秀论太平洋会议论文（五千份）。

Ⅳ、印李汉俊批评太平洋会议小册子（五千份）。

Ⅴ、在上海国民大会散布关于太平洋会议传单（五千张）。

Ⅵ、在上海工人集会散布关于太平洋会议传单（五千张）。

（附注）论文及传单内容，都是解释侵略的帝国主义会议决无利于弱小民族。此外各地方都有此项运动，而长沙工人最猛烈，此为黄爱庞人铨被杀原因之一。

2．一九二二年正月一日，上海共产党全部党员及中国朝鲜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百余人工人五十人，上午分散“贺年帖”（内载鼓吹共产主义的歌）六万张于上海市内，下午分散攻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的传单二万张于“新世界”等群众聚会的游戏场。结果一朝鲜青年因散“贺年帖”在法租界被捕。

3．正月十五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开Karl Liebknecht纪念会，由全部党员出席演说，分散纪念册五千本；纪念册内载Karl Li-ebknecht及卢森堡女士传及“斯巴达卡司团”宣言。此次纪念会广州最盛，工人参加游行者二千余人。

4．五月五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开马克思纪念会，分散马克思纪念册二万本。

5．奉直战争后，由中央机关发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的小册子五千份，主张联合全国民主派对于北洋军阀继续战争。

6．中央机关设立之“人民出版社”所印行书如左：

马克思全书二种

Communist Manifesto,

Lohn Arbeit und Kapital,

列宁全书五种

Lenins' life,

Soviet at Work,

讨论进行计划书，

Erfrlge und Schwierigkeiten der Sowjetmalht,

共产党礼拜六，

康民尼斯特丛书五种

共产党计划（布哈林），

俄国共产党党纲，

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

第三国际主义案及宣言，

Trosky'S From October to Brest Litovsk

（附注）以上书十二种各印三千份。

C、劳动运动

1．上海方面

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共产党合法的公开的劳动运动，设分部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本年（一九二二）由书记部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各省工会代表到会者一百七十三人，由五月一日至五月六日开会六天，发表宣言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议决明年（一九二三）五月一日由书记部在汉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全国罢工援助等议案。

书记部在上海发行《劳动周刊》，至四十一期为会审公堂所封禁，发行最多时五千份，前后统计印行十六万五千张。

英美烟公司罢工，发布传单二种，各数百张；机器工会开会时，发布传单一种数百张；印刷工会开会时，发布传单二种，各数百张；“双十节”发布传单三千份，鼓吹工人革命思想，反对太平洋会议传单三千份；香港海员罢工时，发布传单五千张；浦东纺纱工人第一次罢工时，代其发宣言二万份，又代发传单六百张；邮差罢工时，代发工会章程三百份，又传单二种各四百张；本年（一九二二）“五一节”发传单二种，每种二千张；浦东纺纱工人第二次罢工时，共发传单九次，每次数百张；在杨树浦小沙渡（上海纺纱工人最多的地方，两处共有纺纱工十余万）向纺纱工人发传单三千张，劝他们都起来组织工会应援浦东纺纱工人，工人因散传单被捕者四人；黄、庞追悼会发传单二种，每种一千张；发布《全国劳动大会宣言》五千份；《劳动周刊》被封禁发布传单三百份；发布《赤色国际工会告中国工友》二千张。

参加罢工六次：

英美烟公司二次

海员一次

邮差一次

浦东纺纱工人二次

有关系之工会五处：

烟草工会

机器工会

印刷工会

纺纱工会

邮务工会

参加工人群众运动五次：

反对太平洋会议

国民外交大会

本年“五一节”

澳门惨杀华工事件

黄庞追悼会

因罢工运动受官场压迫三次：

因香港海员罢工书记部通知各省工界发起后援会并运动上海水手应援，李启汉同志及水手二人被捕拘留数日。

因为浦东纺纱工人罢工散传单，四人被捕拘留十余日。

因为参加邮差罢工，李启汉同志判罪监禁三个月，期满逐出租界，现在狱中。

2．北京方面

《工人周刊》每期印二千份，大部分销行北方铁路工人，今犹继续刊行。

参加陇海铁路罢工。

参加京汉铁路及京绥铁路工会组织。

设立长辛店铁路工人学校及俱乐部，唐山铁路工人图书馆，天津工人补习学校。

3．广东方面

参加建筑工人大罢工，组织广东建筑工会。

参加机器工会改造运动，设立工人学校三所。

香港海员罢工时，全部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招待及演讲，以共产党名义散传单三千份。

设立劳动通信社。

援助盐业工人罢工。

4．汉口方面

参加粤汉铁路罢工，组织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及学校。

参加组织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
参加人力车夫罢工，及组织工会。
参加扬子江铁厂组织工会。
参加烟草工人罢工及组织工会。

5. 长沙方面

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

组织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及学校。
组织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

6. 浙江方面

组织八十个农村的农民协会反抗地主，被军警解散，死伤数人。

（2）将来计划

A、党务

1. 在全国各都会增设支部。
2. 多收工人党员，务求居全数一半以上。
3. 厉行中央集权制。
4. 严查党员每星期工作成绩。

B. 政治宣传

1. 多印行对于农民工人兵士宣传的小册子。
2. 发行《共产党半月刊》，专讨论世界的及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
3. 联络全国各革新党派，作普通选举制及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
4. 联络各革新党派，作承认蒙古独立及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运动。
5. 联络全国工商界，作改正协定关税制的运动。

C、劳动运动

1. 准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工作。
2. 集中力量组织全国五个大的产业组合：

Ⅰ、全国铁路总工会
Ⅱ、全国海员总工会
Ⅲ、全国电气工人总工会
Ⅳ、全国机器工人总会
Ⅴ、全国纺纱工总工会

3．组织三个地方总工会：

Ⅰ、上海总工会

Ⅱ、广东总工会

Ⅲ、武汉总工会

4．设立四个工会职员讲习所：

Ⅰ、北京

Ⅱ、上海

Ⅲ、汉口

Ⅳ、广州

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T.S.Chen①

① 签名是陈独秀。

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

（一九二二年八月）

1、根据马林的报告，代表的所有活动必须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为基础。

2、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坚持辛亥革命的使命，并渴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

3、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在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建议在这些团体之外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立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及组织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主张。

4、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由于国民党在最高政府中负实际责任，它暂时需要避免与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

（《共产国际与东方》第252页，302页）

〔附〕 维金斯基与孙中山的第一次会见*

那是一九二〇年的秋天，在上海。中国的Ч①同志建议我结识孙中山。当时孙在法租界住一个独院，房子是国民党内的一些华侨党员为他建造的。

我高兴地接受了陈同志的建议，因为我也一直很想认识孙中山博士。此外，我知道，他近日要动身去南方，到其追随者、国民党员陈炯明将军的军队掌握的广州去。

在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关于这位陈将军流行着各种离奇的传闻，说他组织了许多研究社会主义的学校，邀请革命学生到他的军队里进行教育工作，有的说他几乎打算在中国南方建立一系列的公社。

认识了孙中山，我就有可能认识陈炯明将军和就近仔细观察他的“神奇的”空想和计划。

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象是四十五岁到四十七岁(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靴筒里。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孙中山一反通常的中国客套，马上让我们坐在桌旁，就开始询问俄国情况和我国的革命。然而不一会，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异常兴奋起来，在后来的谈话中，即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孙中山对我讲述了军阀袁世凯如何背叛革命，如何企图借助日本帝国主义来复辟帝制，而孙中山本人又怎样在东京经过朋友们的斡旋对当时任外相的加藤施

---

* 标题是编者加的。

① 即陈独秀。——译者注

加影响，以使日本帝国主义政府与袁世凯断绝联系。有趣的是，孙中山几乎很有把握地说，日本政府和袁世凯之间那个有名的条约即二十一条，并不是由于日本方面的压力才签订的。孙中山认为，这简直就是袁世凯本人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或向其暗示的，即只要日本方面协助复辟帝制，他就签约，后来果然签约了。

我们临走前，谈话快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显然，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他详细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满洲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从那里我们就能够和广州取得联系。

（江海节译自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真理报》，李玉贞校）

（选自《“一大”前后》〔三〕）

〔附〕 达林与孙中山最初的几次谈话

孙中山之所以载入中国史册，首先因为他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领袖；再者他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改变中国革命方向的倡导者。

孙中山于1866年出生于广东省广州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当他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时，他离开家到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去找哥哥，后来在那里的英国学校读了五年书。

1883年孙中山回国，在广州的一个医科专门学校继续受教育，后来又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1892年毕业。按所受教育孙中山是一个医生，不过他行医时间很短，他把自己觉悟的一生献给了革命活动。

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建立了革命组织——兴中会。孙中山在南方第一次组织武装起义的尝试失败以后，他只得跑到欧洲，后来又辗转到与中国邻近的日本。从那里孙中山组织了广东的起义，但又遭失败。

1905年，兴中会与另外两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建立了新的革命政党——同盟会，曾在1906、1907和1908年三次举行起义。后来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日本将这些起义的组织者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侨居到美国。不久，新的起义酝酿成熟了，这一次是在华中的武昌。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中国革命的开始，同年12月，孙中山回到中国并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以后，孙中山犯了一个大错误——他自愿辞去总统职位。这就为中国反动势力的代表袁世凯踏上这个职位开了路。

新的斗争时期开始了。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领导国民党于1913年和1914年发动了反袁起义。两次起义都以革命力量失败而告终，于是孙中山又流亡到日本，他再回国时，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6年了。

凡尔赛和约、日本夺走德国在华的殖民地、五四运动、全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这就是导致孙中山于1921年组建广州政府时的局势。这次胜利是通过与军阀陈炯明的妥协而取得的，因而基础是不牢固的。

这就是孙中山的简历。其中包含着一系列不成功的起义。失败的原因，首要的是中国经

济和社会关系尚未成熟及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外国帝国主义统治的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

我到广州的时候，孙中山政府正在经历新的危机，其原因是与陈炯明的冲突。就在我到来的前几天，仍旧忠于孙中山的军队刚刚占领了广州，把“同盟者”挤了出去。不过，这不是危机的解决，而是危机的加深，因为陈炯明的军队就驻在附近。

城里已经是一片安定的气氛了，滨河街上挤满了人，店铺也开张了。简直不能相信，就在几天之前，这里还曾兵戈扰攘。

这时在华北，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已启战端。英美支持前者，而日本支持后者。这两个军阀之间的战争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的角逐。很明显，华盛顿会议并没有缓和列强之间的矛盾，反而使其更尖锐化了。日本着意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反对“门户开放”政策。英国也主张维护“势力范围”，但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也威胁了英国的利益。在现有的形势中，美国决定支持英国，从而也支持吴佩孚。

既然孙中山认为在其斗争中可以联合军阀，那么与“自由派”的吴佩孚协同行动反对张作霖就是最合情理的。不过孙中山却采取了相反的作法。他想利用北方军阀的混战打击主要的对手——掌握着华中的吴佩孚。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军事协定就是为此目的而签订的。

许多人，甚至孙中山的某些朋友，对于同最反动的军阀张作霖结盟是不理解的。敌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利用这一联合搞宣传，反对孙中山。

北方军阀混战方酣，广东孙中山与陈炯明发生了冲突，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将要初次会见孙中山。这是1922年4月27日。

在约定的钟点，我和张太雷、瞿秋白一起乘车来到了孙中山的总统府。当时孙本人及其政府都在这里。汽车停在典型的中国式的带飞檐的门楼前。这是可以进出高墙围绕的官院和与之相毗连的楼房的唯一通道。

趁卫队长打电话与某人联系和办理入门证明的时机，我仔细环视了第一个院子，这里驻扎着警备司令部和大约不下一营的士兵。

第一眼看到的是堆堆篝火，上面煮着饭食。篝火旁围着一群群的士兵，稍远一点的地方，堆着架起的来福枪。这场面象是在刚占领的地方露营。

人们一直在忙乱和奔跑。军官们跑来跑去，发布命令，更换岗哨。士兵们就睡在地上的阴凉处。令人感到整个局势紧张而不平静。

通行证办好了，一个军官应派前来，带领我们进入座落在高岗上的总统府。我们穿过许多道内门和僻静的庭院，最后在一个台阶旁停下。这里的武装卫队没有步枪，挎的是毛瑟枪。

上山的台阶被严密地遮掩着，象一个筐子。里面黑洞洞的象隧道一样。广场上到处是岗哨。天很热。上山要走很久。我们汗淋淋地好不容易走到“人世间”——一个栽满树木的小平场。又过了一道岗，我们才进入了总统府。我被带进了将和孙中山会晤的那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小桌子和四把椅子，石头地上铺了一张普通苇席。墙上挂着几张照片。墙角上立着花几，上面摆着银制的小花瓶。

几分钟后，孙中山进来了。他中等身材，穿着竖领带领钩的灰色弗列奇式上衣，中国式的漆皮鞋。当时他五十五岁。他的表情和姿势表现出典雅、沉静，缓慢的动作给人以某种恬静的感觉。有了初进总统府门口时的印象之后，这种沉静、安详更显得突出。门口那里的人们在

奔走、忙碌，而这里却是沉着、缓慢。从容不迫。

孙中山冷静的外表与传说并不一致。据传在战时，孙中山曾亲自开炮射击敌人。

孙中山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富于热情，目光炯炯，很象列宁。我对这两双眼睛的相似感到惊讶。孙中山目光的敏捷与外表的平静也是相矛盾的。

我们坐下来，马上就送上茶来。

我向孙中山递交了说明我的全权代表身份的信件，并转达了苏俄工人、农民的敬意和对他在工作和斗争中取得成就的良好祝愿。我同他谈话时，强调了"总统"一词，以示与所有外国帝国主义报纸相反。外国报纸不承认他的总统职位，只简单地称其为"孙博士"。

他在回答我的祝贺时，畅叙了他对苏俄的友好感情，表示很乐于向我介绍华南的情况和了解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

我们谈话的中心是关于陈炯明的问题。虽说发生了武装冲突，陈炯明名义上还仍旧是广州政府的陆军部长。我确实晓得孙中山向陈炯明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谈判关于消除冲突和陈炯明返回政府的问题。谈判的结果我不清楚。我提出了关于和解的可能性问题。孙中山突然变得怒气冲冲并提高了声调说：

"我是总统，部长们应当服从我。他反对我，反对共和国总统，反对人民的意志。如果他一定不服从，那么他将被消灭。没有任何和解可谈。"

不过，这次谈话以后，孙中山的几个代表团又去找陈炯明进行了谈判，但是事实证明没有任何结果。

我们转到了与吴佩孚斗争的问题。孙中山告诉我，已经调补充部队到北线，同时以很乐观的语气谈到了北伐和迅速取胜的必然性。

话头又转到了苏俄的形势。孙中山对红军的人数、其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然后，孙中山询问了列宁的健康情况。在会谈结束时，我们约好以后将再会晤。

当时，我有些奇怪的感觉。一方面感到孙中山很矜持和谨慎。另一方面，他希望经常和我见面，说明他打算与苏俄建立联系。

在后来的会晤中，专门讨论纲领问题时，我搞清楚了孙中山对我若即若离的原因。当时我们谈到俄国和中国革命的问题。

最初谈话的中心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孙中山反复询问我这个问题。我们谈到了苏维埃、红军和自由对人民大众的意义等问题。孙中山听得很仔细，然后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

这样的问题我只好一笑对之。我说，对全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来说，一个县的战场太小了。但我明白孙中山建议的含义，孙中山知道，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知道，广州的共产党人反对他，而我和这些人经常会面；他知道，广州工会已经脱离了他。很自然，孙中山一开始对我曾有某些怀疑，但是我的话与广州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并不一致。

在一个县里"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出人意外的建议，是孙中山在试探我的意图。所以，我只开了句玩笑作为回答。然后我向孙中山阐明了我们关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建立民族革

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及其可行的纲领等问题的观点。这些问题成为我们会谈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活跃起来，他的紧张神情消失了，眼睛里放出热情的光芒。他开始向我介绍他亲自写的党纲。他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两篇演说分别阐述了这个纲领。

在这些文件中可以感到孙中山精心研究过的那种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经验。他试图把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应用于中国国情。孙中山不讳言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他在自己的演说中说:“和美国总统林肯所说的‘人民的政府,人民选举的政府,为了人民的政府’是相通的。这些原则不论对欧洲人，还是对美国人都是最高成就。中国也有同样含义的话。兄弟就把它译作民族、民权、民生。”①

孙中山当时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居住在中国的五个民族（汉、满、藏、蒙、回）通过汉族同化其他民族的途径融合成统一民族，孙中山纲领的这一部分只字未提把中国从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三民主义”原则上建立的新中国，应当成为独立的国家，但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吸收外资。

孙中山的“民生”首先指的是对土地“按比例”收税。土地问题是纲领中这一部分的中心问题。收买部分土地，将其分配给贫苦农民，按比例收税——这就是“三民主义”中阐述的土地纲领的实质。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同时废除土地私有制，国家只是规定了可以节制大土地所有制形成过程的按比例收税的办法。

关于孙中山的土地纲领,列宁早在1912年就有论述。他写道：“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接着列宁又继续写道：“试问,孙中山有没有用自己反动的经济理论来捍卫真正反动的土地纲领呢？……没有,——问题也就在这里。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①列宁指出了孙中山的土地纲领与俄国民粹派纲领的相同之处。孙中山的土地纲领是反动的。因为尽管纲领本身的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实际上这样的土地改革只能加速它的发展。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这毕竟还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改良。

孙中山当时在农村力图依靠的，不是贫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富农，而是中农和小农。农民的利益在这个纲领中主要是在调整税制这一部分中有所反映。孙中山哪怕仅在他占领的广东省境内迅速、彻底地实行这种税制改革，他就可以把几百万农民争取过来,有他们的帮助，他也能够胜利地继续进行斗争。但他没有这样做。

当我问孙中山，他为什么不实行自己的土地纲领时，他回答说，现在他面临的是军事任务，他要把全中国从军阀手中解放出来。只有到那时，才能实行土地纲领。这就是他以往斗争的基本错误。如果依靠了农民，他就不会在斗争中经常遭到那样多的挫折和失败。

---

① 1921年8月21日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全文作为附录载于拙作《在中国革命的行列里》一书中。（作者所指的演说，从时间和内容看，当指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一文。但对照原文略有出入，原文为:“和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的‘of the peopi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be people’的话是相通的。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没有适当的译文。兄弟就把他译作民有、民治、民享。”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二集，第207页。上海民智书局，中华民国十九年二月初版，八月再版。——译者）

②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5页。——译者

孙中山不懂得，他的纲领反映了哪些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不知道，在斗争中究竟应当依靠谁和怎样争取群众。他以为，他的思想和声望就能使敌人放下武器。孙中山认为防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避免阶级斗争是可能的。他知道阶级斗争的起源，也懂得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引起的。他说，欧美的全部不幸就在这一点。那里"财产分配不均"，那里群众贫困，而国家全部财富都集中在资本家手里。

孙中山说："由此可见，外国是患不均，中国是患贫。……有人说，中国没有大资本家，这是实在的情形。"①从这里他得出结论，中国不可能有阶级斗争。但是，按照他的意见，危险就在于大资产者能够出现。需要和这种情况斗争。不应允许大工业、铁路、煤矿、矿山的私有。这会引起"财产分配不均"，会在中国重蹈欧美的复辙。

"欧美社会在今日之患不均，便是吾人极好的教训，……所以兄弟提倡民生主义，讲到归宿，不能不解决土地和资本两个问题。"②

简单地说，孙中山当时关于民生主义的学说就是这样。把古代中国村社理想化是民生主义的基础。他自己说过："……井田制的道理，和平均地权的用意是一样的。"③

资本国有化的学说即归结为节制大私有生产的发展，因为它使中国手工业、小商业、农业均遭破产。同时，深谙英、美的孙中山懂得现代技术比之于中国落后的中世纪技术的优越性；大机器工业比之于手工劳动的优越性。他认为把先进的现代技术引进中国是必要的，并详细拟定了规模宏大的中国经济发展计划。但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而是根据资本的国有化，根据对铁路、港口设施等等的国有化。实质上，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纲领。

在中国铺设铁路网，这是孙中山的夙愿，他非常喜欢谈及。孙中山写了一本专著《建国方略》专谈此问题，在这本书里，他论述了中国达到国际经济发展水平的必要性。这本书已被译成俄文并由国家出版社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书名出版（新译文见：《孙中山选集》，莫斯科，1968年版）。

孙中山经常问我，苏俄能不能帮助他实施此计划，即着手在中国大规模地建设铁路。他认为建设一条铁路，经过苏联的土尔克斯坦④连接莫斯科和广州，是实现其计划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孙中山把建设这条铁路视为中国革命最紧要的事业。现在他有充分的理由指靠苏俄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按照孙中山当时的理解，"五权宪法"阐述了"民权主义"的原则。实质上，这个宪法乃是一部理想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宪法。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的斗争时期，它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进步纲领。应该考虑到，中国无产阶级只是在孙中山的晚年才开始成为"自为阶级"。因此，孙中山只是到晚年才能用新观点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

目前，他还是按老办法办事，依靠的主要是军队。

（选自〔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

---

① 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二集，第211页。上海民智书局，民国十九年二月初版，八月再版。——译者

② 同上。

③ 在二十年代初，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等苏维埃共和国所在的地域仍沿袭旧习泛称为"土尔克斯坦"。

〔附〕 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

——个人印象点滴

（一九二二年九月七日）

马　林

今年一月我得机会去桂林，当时，这个城市是孙中山军队准备讨伐满洲①的大本营。为此，我横越过具有独特的中世纪风貌的广西省。

孙中山的南方政府视北方政府为非法政府，为了统一中国，他决心再次北伐。

桂林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保留着许多纪元前几千年的历史遗迹。这里有一些将军决定支持孙中山，虽则他们并不同意国民党的纲领。孙中山本人和国民党的一批领袖人物也在此地。这些领袖人物是过去主要由知识分子参加的秘密组织的有机延续。国民党是在驱除清王朝之后建立的，这个党所通过的纲领只有三项主张，即：中国的完整和独立，民主的政府形式以及所有中国人应有的生存权利。

国民党的领袖多数都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在考察日本、法国、美国期间，同各社会主义党派建立了联系，曾试图使社会主义理论去适应中国古代哲学。上述国民党纲领，各种人物都可以接受，因为随便哪一派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这个党的经历不算复杂，还不致在策略和纲领问题上发生分歧。不可忘记，中国的阶级分化尚不十分明显。属于国民党的南方大资产阶级并不在广东省这个革命运动的中心，而是远在太平洋——从新加坡到美国这一带的各侨民区。这些大资本家——商人、工业家、银行家——之间联系薄弱，他们认为，中国形势不够稳定，所以不迁回中国。他们的意见在党内表现得并不突出，相反，由于这个党在各阶层广大人民中进行宣传，它主要是面向小资产阶级分子、手工业者、产业工人和中国南方军队的士兵。这种宣传的特点带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气味。

各大国对中国政治生活有巨大影响，对他们的恐惧是国民党不敢大力进行宣传的原因。尤其是，国民党在北方的工作很差，甚至在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没有建立自己的组织。南方的领袖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倾注全力去争取对工人的影响。他们知道，虽然无产阶级还很年青，人数也很少，但为了实现其民族主义目标，他们需要无产阶级。他们毕竟对俄国革命、对苏维埃俄国抱有很大的同情。至于中国南方政府未能同苏俄建立直接联系，他们仅仅解释说是广东地理位置不便的原因。

宣传工作远不够有力，这是国民党的弱点之一。孙中山自己确实也在桂林的军官中进行政治宣传，但高级将领阻挠士兵加入该党。结果，党受制于将军们，这些人心怀叵测，常常谋求私利。最后，很可能仍象一九一三年南京的情况一样，他们会迫使孙中山同温和派分子妥协。

当我到桂林时，满洲的督军张作霖建议南方政府缔结反吴佩孚的联盟。国民党的领袖们（除广东省省长陈炯明外）都认为吴佩孚是主要敌人，一定要将其击败。尽管张作霖反对民族

① 原文如此。——译者

革命运动，还是建立了这个同盟。孙中山希冀着，北方两督军的火并会两败俱伤，南方则坐收渔人之利。

当时，孙中山和广东省长之间还没有发展到公开决裂的地步。他们在经济问题上观点一致，主要在政治问题上有分歧。孙中山首先是着眼全国的民族主义者，而陈炯明在他的军队据有广东以后，则只关心本省的发展。他主张推行广泛的联省自治和全面的地方分权，因而，他接近于其他督军的观点。正是这样的统治方法才会使他们有更大的可能维持其独裁统治。

陈炯明从一开始就反对北伐，他拒绝指挥孙中山的军队。孙中山在下决心公开反对陈炯明之前，长时期犹豫未决。当确实弄清楚陈炯明试图靠拢吴佩孚时，孙中山乃离桂林回师广州，解除了陈炯明的职务。陈炯明带领部队逃逸而去，静待事态发展。他了解到总统决定清洗政府机构以后，就向广州发动进攻，赶走了孙中山，解散了南方政府，公开支持吴佩孚。但据最近的消息判断，桂林的军队正反对陈炯明，力图恢复孙中山政权。

在海员大罢工期间，国民党领袖（多数是孙中山的拥护者）同广东工人的密切关系，颇引起了我的关注。这次争取提高工资的海员大罢工，矛头指向外国航运公司，具有政治色彩。而且，英国政府在这场斗争中支持香港资本家。这种情况就使得国民党领袖有可能在罢工工人中开展民族主义宣传。罢工工人得到了国民党的大力支持。应当承认，党对待这次罢工的路线是符合正确的革命经济斗争路线的。

民族主义理想在罢工工人中得到了广泛传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举行了抗议集会，聚集在这里的约五千名工人情绪激昂地倾听国民党领袖反对外国列强争取中国独立的演讲。罢工之后，广州、香港和汕头的海员开始加入国民党。这个党也得到了冶金和建筑工人的拥护。当前，如能在工会斗争基础上进行宣传工作，中国南方必将取得重大胜利。

红色工会国际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可以做。无疑，共产党将在革命的工会运动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

——译自1922年9月7日《真理报》（王福曾译）
（选自《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

〔附〕 广州党团干部会议

〔苏〕 C·A·达林

许多共产党员来到广州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两位成员陈独秀和张国焘也到会了。后者是共产党在1921年建立的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劳动组合书记部完成了召集全国劳动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在两个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各省党组织的领导人。

在此之前，我已经会见了孙中山。我把会见的情况告诉了陈独秀，建议召开前来广州的党的领导干部会议。

约有二十——二十五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应当指出，当时全国党员仅有一百二十五名左右。这样，全党几乎有五分之一的党员已在这里。我们开会的目的，乃是讨论党在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应遵循的路线问题，首先是对孙中山的政府和他的党——国民

党的态度问题。

广州的局势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而极端复杂化：首先，广州的共产党组织支持军阀陈炯明并进行反对孙中山政府的宣传；其次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资产阶级左右着国民党的政策。

我在这个重要的会议上做了报告，根据莫斯科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的决议，我谈了关于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关心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改革的那一部分人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在发言中，我具体说明了我们将与国民党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指出工人阶级应支持孙中山政府。

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还不满一年。党员的人数不多，而且主要是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个党乃是中国唯一的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的政治组织，她从阶级立场出发摧毁旧的作坊和行会，她所建立的实际上是中国无产阶级崭新的组织。中国工人阶级一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工人不晓得有改良主义者。

现在党应该前进一大步，应该摆脱单纯的宣传工作和闭塞的小圈子式的工作方法，而登上群众性政治行动的舞台，成为中国历史的动力。欲达此目的，就要与孙中山以及他的党结成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会议提出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但要以保持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为条件。在这里我想强调指出，在与孙中山谈判时所说的不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个人身份加入不需要孙中山的同意。共产党随时可以让本党的这些或那些党员大量地或少数地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便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并影响其政策。我们谈的是指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以保持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为条件。我们认为，这样加入国民党就是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这一点我同孙中山也谈过了。当然，统一战线要有一个前提，即国民党不应对工人运动进行任何限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力，有罢工的权力。

4月底至5月初在广州举行的共产党的会议上，关于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广州组织的代表不发表意见，实际上企图把全国劳动大会拉向支持陈炯明的那一边去。前面我已讲过，他们是孙中山的反对者。

以张国焘为首的另外一些与会者反对统一战线，他说是“反对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宗派主义者。尽管张国焘在讲话中承认，孙中山政府是中国最民主的政府，而陈炯明起的是反革命作用，但实际上他的立场对广州的代表有利，因为这种立场实质上是反对支持孙中山。

张太雷和瞿秋白支持我，他们所持的观点是，在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和国民党联合以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都是必要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好几天。陈独秀动摇不定，但在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大多数与会者同意了（附有很多保留意见）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没有通过一定的决议，会议决定继续讨论。

虽然与会者之间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广州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开始转变了。在这次会议后约一个半月，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表了《对于时局之主张》的声明，表示愿意同所有的民主党派合作。这个声明

得到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赞同。不过，当时党还是反对加入国民党。

（选自〔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

〔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

（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一次会议（指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七日会议——译者）上，X同志①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X同志在中国呆了一年半，不久前刚回来。他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大国混乱不堪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操于列强之手，而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国国内尚无完全成形的阶级）并不发生有力的影响。在孙中山政府统治下的南方进行着民族主义运动，它得到侨居国外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赞助。

由社会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哺育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里最活跃的一股力量。但是，这场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一般中国人民中间，在农民中间却引不起丝毫反响。农民的大多数是租种小块土地的小佃农，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情况是如此之独特，与其他国家农民的境遇相比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至直到如今也无法为他们制订出任何一个总的土地纲领。

处于外国资本家统治之下，而又是大工业中心的华中（上海），还不具备由中世纪行会组织和秘密组织向现代工会转化的可能性。南方的情形则不同，在这里，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这一点从最近有组织的海员大罢工中可以看出。广东的许多工会小组组织得很好，很集中。那里已拥有五万名有组织的工人，其中海员工会最强大，有一万二千人之多。

随后，报告人详尽地描述了中国极其复杂的内部关系，在那里，大国之间尔虞我诈，彼此倾轧，为此他们竞相利用中国的各个派别。孙中山反对北京的斗争，是南方拥护改革、反对北方满洲反动统治阶级的民主制② 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孙中山看来遭到了失败。虽然南方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很有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政府也希望运动有所发展，可是我们在那边的同志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而把自己毫无起色的工作和背离群众迫切利益的现象归咎于什么非法地位。中国青年，尤其大学生，乃是极易接受社会主义的人。但还谈不上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

现在，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特别在南方，具有卓有成效地推进工作的十分适宜的土壤，因此，问题应当认真地加以讨论。

在讨论时，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以自己在中国北方的所见所闻对报告作了补充。北方很难说有工人运动和有什么工业。城市里无产阶级的人数很多，他们以自己苦役般的劳动代替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日《真理报》。

① 即马林。

② 原文如此。

牲口和蒸汽机干活。照我们的认识，农民落后了好几百年。但知识分子的情况则不同，他们公开表示同情苏维埃俄国和共产主义，就象南方的孙中山一样。但知识分子不能深刻领会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和意向，所以同政治运动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在自己那个小圈子里研究社会主义的书本。可是，在国内战争的现阶段，在中国可以大步前进的时期，应当坚实可靠、严肃认真地设法把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

决定委托×同志起草致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信。

（元吟译自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日《真理报》第二版，首萝校）

〔附〕 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

关于一九二〇——一九二三年的中国问题

〔美〕 伊罗生

我被派往中国，是由于我参加了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那次会上，我代表爪哇党。我是一九一九年被驱逐出爪哇的，一九二〇年初，在荷兰被邀前去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我被指定参加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列宁是这个委员会主席，里面还有罗易。我任秘书。我们依据列宁和罗易的两组提纲进行工作。

当时，虽有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在进行与远东的联系工作，莫斯科仍想派一个共产国际的直接代表驻在中国。我是一九二〇年八月被委派的。在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维也纳处理了一些工作并重访莫斯科之后，一九二一年四月，我动身去中国。

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之所以没有其它指示是由于没有什么指示可给，因为只有伊尔库茨克局了解一些中国动态的情况。伊尔库茨克局全都是俄国人。它与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国使团有联系。中国承认赤塔远东共和国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伊尔库茨克局只与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动仅仅受俄国在华北的利益所支配。这是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间的情况。

在上海，我必须从头做起。在北京，那时有俄国使团的一些代表，有苏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人员等等，他们与北京大学一些小组有接触。而在上海，我不得不从了解中国情况入手。这使我同那里的国民党总部发生了接触。当时孙中山与陈炯明在广州。陈炯明的观点是把民族主义运动局限于广东，一种中国斯大林式的在一省发展民族主义运动的观点。孙中山则着眼于全国，他要攻击北方的腐朽的军阀、政客和外交官。孙中山要求组织北伐，他的主

* 本文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伊罗生（原名H.R.Isaacs，伊罗生是他的中文名字）与斯内夫利特（H.Sneevliet，即马林）谈话记录，载《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四十五期（伦敦，1971年），第102—109页。伊罗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教授，他曾在中国工作过，一九三二年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时就用伊罗生这个中国名字。曾任《中国论坛》主编，著有《中国革命的悲剧》（1938年）一书。——译者注

要敌人是吴佩孚，孙认为吴是英帝国主义的工具。那时，吴的傀儡曹锟正在主持北京政府。张作霖也是吴佩孚的敌人。张和孙中山关系很好，孙中山批评赤塔政府把张作霖仅仅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在赤塔俄国人认为纯粹是日本的工具的张作霖，在孙中山看来实际上在想尽办法反对日本人，他修铁路、建港口等等，以与日本对抗。孙中山在沈阳有一个常驻私人代表，在一个长时间内由汪精卫掌管这些联系。

孙中山正在广州准备北伐，和他一起的有国民党的最重要人物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蒋介石等。在上海，我会见了孙中山的最重要代表之一张继，他是中国第一届国会的议员，作为孙中山的人，他曾在国会内积极反对向外国借款。他比我曾遇到过的任何一个人，在政治上更为成熟，并具有更多的西方观点。这是一九二一年下半年的情况。

与此同时，我与北京的俄国代表和伊尔库茨克局建立了联系。从伊尔库茨克局我得到了第一份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情报。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中共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很少。中共只有几个分散的小组，到那时为止，真正的组织工作还没有做多少。

由于同张继的联系，国民党邀请我去访问孙中山。他那时正致力于控制广西和组织北伐。我和共产党员张太雷一起经过湖南到广西去会见孙中山。在湖南省会长沙，我同被认为与国民党友好的省长及其顾问们取得了联系。我听说长沙有一个青年学生组织与工人阶级（纺织工人）有联系，就去和他们接头，并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向这些学生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和在他们帮助下建立工会的必要。

然后我续赴广西。孙中山正在那里组织部队，拟进军汉口。我在孙中山的总部大约住了两星期①。我向他的军官们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我与孙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等。我告诉他爪哇民族主义性质的群众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的发展；孙则向我讲述了国民党的策略、它的历史、袁世凯时期在国外的非法活动、与太平洋各国华侨的联系和他们对国民党的帮助。他还利用这个机会与张太雷就需要青年更加积极地参加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就在这一次，他宣称马克思主义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中国的经典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都已经说过了。为了给你提供孙中山思想的神秘特性的某些概念，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孙向我说明他是怎样发展一个有希望的青年军官加入国民党的："一连八天，每天八小时，我向他解释我是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伟大的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重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推迟六百年。"孙中山比甘地更有战斗性，但是他单纯地沿着搞军事阴谋的路线想点子。

一九二二年初，正值香港海员刚刚宣布大罢工的时候，我继续前往广州。罢工的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国民党的领袖们支持这次罢工。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现代式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始。海员的组织已经存在好几年了，它是孙中山同海外华侨联系的一个纽带。

在同一时期，中共领导人以北京为中心开始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陈独秀在北京的组织与汉口的铁路工人总部有密切的联系。

我回到上海，发现在我离开以后的三个多月中，共产党人已经和上海工厂工人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系。一九二二年初，我们安排在杭州西湖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我记得还有瞿秋白，另外还有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

①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孙中山抵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十二月二十三日，孙中山在桂林军次会见马林。——译者注

这次会议上，讨论了中国党和工人运动的前景。我坚持了以下观点：首要的是，赤塔政府对待吴佩孚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这次强有力的海员罢工和国民党的领导证明民族主义运动同工人阶级组织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到那时为止，工人阶级活动的最强烈表现是香港罢工；国民党领导集团方面对群众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相联系的重要性缺乏理解，这是中国反帝力量在发展民族主义运动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国民党松懈的组织形式使得在党内很容易促进群众运动的思想，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人应该利用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他们应该加入国民党，但应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

我提出这些意见时，从来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什么具体专门指示的问题。我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什么指示，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伊斯兰教联盟是爪哇最早的群众组织。它建立于一九一一年，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混合一体的性质。它的斗争锋芒直指欧洲糖厂主对爪哇人的剥削。这个群众组织的左翼（集中在三宝垅）接受印地社会民主同盟的宣传，这个同盟是我帮助组织并使之沿着阶级斗争路线开展宣传。这种宣传在伊斯兰教联盟内部得到了强烈的支持，特别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战争年代里是如此。结果，在一九一八年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接受了同“罪恶的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思想。和伊斯兰教联盟左翼的联系创造了在我们自己人领导下组织工会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工会。纯粹民族主义分子反对我们社会主义宣传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效法正在发展中的工联主义，建立他们自己的工会。伊斯兰教联盟这一松懈组织形式，使我们社会民主同盟的印尼人、爪哇人、马来亚人的影响迅速增长。其影响之大，甚至在军队里也建立了联合会，而这种情况还是在战时呢！

由此，你就能理解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保持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是这条路线的逻辑结论。在爪哇，实现了这一点。至于中国，更有必要强调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兴起，而在爪哇则还没有。从一开始就预料到，我们的人参加进去，国民党领导人将会抱着怀疑的态度迎接他们。还预计到会出现这样的可能性：即我们的人被收买过去，使他们成为执行国民党政策的工具。当我们采取在这一类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的策略时，这种危险总是存在的。

在杭州，绝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些观点。只有一两个人反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反对最强烈的是张国焘。这些反对者的论据，集中围绕着对国民党的评价问题、它成为群众运动组织的可能性问题，以及预料得到的、来自国民党领导人方面的反对的问题，等等。陈独秀同意我提出的观点。没有要求作补充说明的明确的反对意见。

（在这里，伊罗生向斯内夫利特提出询问，说他关于这次会议的叙述同陈独秀所说的有出入。他回答说：）

如果陈独秀的叙述是真实的，那么，第一，杭州会议后的一个时期，这个问题曾有许多机会拿到莫斯科讨论，中国的同志也可以把这个问题提交同年后期来华的越飞，但当时没有此种做法。第二，没有“服从纪律”这个问题，我向来十分反对这种手段。何况，我并没有从共产国际得到什么专门指示，我手头没有任何文件。①

① 伊罗生提出，陈独秀曾说一九二二年作出国共合作的决定是由于马林以共产国际的纪律相威胁而服从的。对此，马林作了上述回答。——译者注。

我认为这是可以采取的唯一策略。一切决定于我们的同志是否有能力保持他们的独立性和他们的报纸。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有爪哇的经验为依据，而且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和大会所通过的殖民地问题提纲。

况且，香港海员大罢工证明国民党与工人阶级组织有真正的联系，国民党也愿意与工人阶级组织保持友好联系。当时，南方的工人阶级组织正在发展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在上海和北方情况大不相同，那里只有少数工人俱乐部。这就使得加入国民党更有必要。因此，作出这个决定基于三个因素：爪哇的经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以及南方无产阶级组织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所处的有利地位。其中包含的危险并不大。国民党的组织形式是松懈的，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推行我们的思想和开展革命的反帝群众运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孙中山在一九二二年被陈炯明逐出广州后，我曾与他在上海多次会谈。他请我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他变得更易于接受意见了。我劝他不要用军事行动收复广州。我向他建议要使上海成为一个在全国城市工人中以及在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国民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右派反对这个建议，他们想不要群众参加而实现民族主义目标；但是以廖仲恺为首的左派则赞成这个意见。由于孙中山在广州的失败，迫使他不得不按照发展现代群众运动的路线来考虑问题，其次，考虑从俄国取得援助。

这时，我经马赛回莫斯科，到达莫斯科时（约一九二二年九月），正好决定越飞来华。我向共产国际、特别是向被认为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拉狄克报告了我的工作。在我和他谈话中，产生了我应陪越飞来华的想法，并被接受了。这就意味着我在莫斯科只能停留两星期。这期间，我在《共产国际》上发表了一篇论中国革命运动的论文（马林：《中国南方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共产国际》，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

在与拉狄克的谈话中，我清楚地看出他们对那里的军事问题比对宣传工作更感兴趣，那时，我心中已经怀疑有两条路线、两个中心（正在形成），即俄国利益中心和革命中心。无论如何，我的报告成功地粉碎了赤塔依赖吴佩孚的方针，那种想法宣告彻底终结了。我还没有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正式报告，就很快与越飞一起启程。越飞也赞成和国民党保持友好关系，此后一个时期内我和他配合得很密切。我们到达中国后，越飞到北京，我到上海。随后，我们之间开始了关于事态发展的频繁而生动的通信。越飞的意见是我们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组织与国民党建立紧密的联系。当然，不能取消共产党和他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和《前锋》月刊。

一九二三年初，我被派往沈阳见张作霖和他谈铁路问题——（我真奇怪，为什么一个革命的先锋战士要混进这种关系和这一类事情中去！①）——回到北京后，我天天与陈独秀接触。这正是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二七”运动）时期。汉口工人中心的活动迅速发展。汉口工运高涨，正是一九二二年香港罢工的直接后果。这次运动的事实众所周知，无庸复述。你会记得京汉铁路工人的失败，表明汉口工人运动在其后一个长时期内被镇压下去。“二七”屠杀后，汉口中心被摧毁，北京发布了对马林和陈独秀的通缉令。我们于郑州枪杀后不久前往上海。

---

① 括号中的话是伊罗生所加。——译者注

我在中国一直呆到一九二三年十月。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发展是越飞与孙中山建立了关系。孙中山当时已回到广州，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和国民党总部，经常遭到陈炯明的攻击。我在上海停留了很短一段时间后去广州，以我和越飞的通信为依据，我与孙中山每周保持三、四次联系 。一九二三年“五一”节，我在广州一次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当时我们的党员已经在广州、汉口、北京、上海开展工作。在北方，杭州会议带来的变化不大，因为国民党在那些地区没有多大影响。在吴佩孚所统治的整个长江流域国民党是非法的。在上海，只有几个领导人，不成其为一个党。只有在广州它才真正存在，而我们的人如陈独秀，在工人组织中开展了工作，出版小册子和报纸等等。

孙中山直到临死的时候，从来没有真正吸取群众运动的思想。他接受它，但并不真正热心。一九二三年时，他对发展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问题。但是只有广州是我们共产党人能开展工作的唯一地方。海员工人为我们提供了工作基础，并且有机会将民族主义工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工会。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出发点。

在我知道越飞要离开、加拉罕和鲍罗廷到来之前，我被先后提议任驻广州领事和俄罗斯通讯社① 记者，我拒绝了。后来，当我知道已作出上述人事变动的安排时，我就离开了。在哈尔滨遇到了正来华的鲍罗廷。工作被转移到一个新的航向。此后发生的事情是很清楚的。尽管提供了发展真正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机会，共产党人却变成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具。作为工具，他们此后不过是为蒋介石做嫁衣裳。

在中国所采取的准备步骤，业已证明对发展工人运动是大大有利的。但是，在斯大林、加拉罕、鲍罗廷和罗易（一个天生的民族主义者！）领导下，为开展群众宣传所付出的代价是太沉重了。

（刘莹、杨云若译：王淇校）

（选自《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

① 塔斯社的前身（一九一八——一九三四年）。——译者注

国民党是什么

陈独秀

凡研究一个党派的内容是什么，必须将他的党纲和党员分子分析一下，才能够明白。要明白中国国民党是什么，也须用这个方法。

从中国国民党的党纲说起来，他起源于同盟会；同盟会的誓约中，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四句话，这就是从同盟会，一直到现在的中国国民党所始终主张的三民主义。第一二句是民族主义，第三句是民权主义，第四句是民生主义，这三民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国民党党纲之骨干。我曾亲听过孙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大意是说，满洲皇室虽然推倒了，而中华民族备受列强的压迫，民族主义仍有提倡的必要；民权是指选举权，复决权，罢官权，创制权等直接民权；民生主义，於平均地权以外，更加上土地国有，机器国有，少者归国家教育，老者归国家赡养等主张，这可以说是国民党民生主义最近的解释。

从中国国民党员分子说起来，知识者（旧时所谓士大夫，现在的职业是议员律师新闻记者教员官吏军人等）居半数以上，华侨及广东工人约居十之二三，小资本家约十之一，无职业者约十之一。

照以上两点分析研究的结果，再参看他十几年来革命的历史，我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

中国国民党何以成功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团体，此事决非偶然，因为有两个重大的原因：（一）是国内产业发达的程度，尚未到阶级反抗显然分裂的时期，因此代表一阶级的政党自然不易发达；（二）是国人思想进步落后，至今尚在封建时代，而外来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输入，思想界顿呈复杂的状况，中国国民党正是这种复杂状况具体的表现。我希望国民党党员和他党党员，赞成国民党和反对国民党或批评国民党的人，都不可忽视了这一点。

署名：只眼

（选自《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出版）

讨论与国民党联络及社会主义者的生活问题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正 厂　存 统

正厂

你於九月十七日给我们的信，早想公开地答复你，只因我们一向很忙而且又病，所以迟至今日才能提笔答你，望你原谅。你信中主要的地方共有两点：一是可否与国民党联络二是社会主义者底生活能否安全。我现在分层答复如下：

（一）来信：“我以为和民党接近为不妥。鼎元说‘同是革命团体，民党比较好些’要知道第三阶级的革命，和第四阶级是不相干的。民党比较好些，不过是对其他团体而说；乡村僻壤地方，略识之乎，便是比较好的学者了。这种说法，究属欠妥。而且三民主义，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如果主义相同，只能由他们来加入；我们断不能因为同是革命团体即勉强拼家。况且近来民党人物运动，正不能确守自己党纲，《惟利是图》而已，几句门面话，便是比较好，‘好’字太不值得了。所以S.Y.如果要和彼搭头，恐怕比德国社会民主党还不如。我意如此，不知你俩如何？”

对于这一段话，我有一句声明，就是S.Y.至今尚未与国民党正式发生过关系。至於我个人的解见，却是这样：（1）在中国目下这种经济，政治的情形之下，不能发生无产阶级的革命，只能发生一般国民反抗封建式的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所以我很赞成同那以国民们底共同敌人（封建式的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打倒，然后再各显手段，决个胜负。至於谁胜谁负，全由那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能力来决定，也与俄国三月革命，十一月革命那种形势一样。（2）我们赞成与国民党联络或加入国民党，一不是因对于国民党的感情良好，二不是因为赞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认三民主义即社会主义，三不是因为民党较其他政党（？）好些，四不是要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我们以为共产党有共产党的使命，国民党有国民党的使命；使命不同，组织自然不应混同“一家”之说决不会发生。然则我们所以要与国民党联合或加入的理由何在呢？简括地说，目下还是行国民革命的时代，我们行动的社会主义者不能对于国民革命取旁观的态度，所以不能不与实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携手或竟加入里面去活动。这种政策，在学理上（马克斯学说上）有根据，在事实上是必要的。至於民主政治能否建成，却不是我们的重要问题。（3）党纲和政策，目的和方法，是不能混合为一的。一个政党，党纲和目的，是不能常常改变的；然政策和方法，却常应实际的需要而改变的。我们不能说改变了政策或方法，就是背叛党纲，或违反目的。对於一种政策一种方法的对不对，决不可轻易下断语。无论政治革命家或社会革命家，都是要刻刻活动的，都不能死死捧着党纲或目的而不去筹一种政策，一种方法来实现其党纲或目的的。所以国民

党党员不确守自己党纲（取谓三民主义，实在称不得党纲，党纲须有具体的计划）去活动，亦是应有之事，无可诋讲。（中山联张联段等政策对否，是另一个问题。）我以为我们应当指摘国民党的：（1）不向群众中去活动，专联结几个有力军阀；（2）至今尚无一个具体的党纲；（3）没有严密的组织；（4）采用个人独裁制，至於我们S.Y.要与国民党联络或一部分团员加入，我以为亦是目前应采取的政策，没有什么不妥当之处。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以堕落，是另有原因，与此是不相干的。这是对於你第一个问题的答复。

（二）来信说："据鼎元说，S.Y中不乏热心之士，但坐谈者亦不少；我很痛恨坐谈者，不必说。要之生活不安全，容易被惑。S.Y中人，不少生活不安全之人：有些是文字生涯者。我虽不以文字生涯为可耻，但总以求生活安全为宜。上海工厂林立，学一手艺，亦何难之有况投身工场，於宣传上是很有益处的"。

这一段话，可以分三层来答复：（1）单是坐谈，确是要不得；但做文章宣传或向群众演说的，不能说他只是坐谈。作文与演说，在革命的进程上是有重要的意义的，我们不能轻视他，尤其是现在，虽然我们希望同志们都更进一步。（2）投身工场，我们当然赞成，同志中且已有实行者，不过生活仍不安全罢了。须知在现制度之下，无产阶级，生活是永无安全之目的。至於做革命的人而欲生活之安全，更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我们同志常从工厂里学校里开除出来，即是明证。不说我们中国，失业者到处皆是，即英美产业发达的国家失业者亦常达几百万。最近伦敦即有四分之一劳动者失业的事。这种责任是谁负的呢？不是业者本身应该负的，是社会制度,应该负的。（3）社会主义者有一部分，（色彩明显不为旧制度所容的）生活不能安全，乃是当然的事实：若因生活不安全而即被诱惑，那亦不必讲革命了。社会革命是起于生活不安的人,不是起于生活安裕的人的,这是经济上的一个重大原因，我们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岂可闭眼不看。我以为什么团体只有建筑在利害上才能坚固，利害的结合才是真结合。我们S.Y.，亦不过是一种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利害上的团体，有阶级觉悟的失业者的无产者，当然亦是我们的同志。这种从困苦中经历过来的同志，才是金纲百炼的好同志。我们绝不应该因他现在失业而鄙薄他。同志处在这种境地的我们是该帮助他叫他为团体服务；可惜我们现在有心无力，以致坐视少数同志冻饿（其实现在无业的同志很少）而不能相助！唉！这是我对你第二个问题的答复。

正厂！我知道你是一个是真实的同志，虽然现在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团体。我希望你以同志的资格切实批评我这封信！你以我的话为然，就请你赶快加入我们的团体，毋再徘徊观望吧！

一九二二，十二，二十五

（选自《先驱》第14期，1923年1月9日出版）

“今日”派之所谓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田　诚

我昨天买到一本《今日》二卷四号，把那几篇反抗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的文章略读一过那知竟是一大堆无意识的话。《今日》的作者们很想找出一些驳倒中国共产党不应联国民党之理论上的根据，不幸这个工作超过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外，他们不能了解殖民地问题，民族革命运动和社会革命运动的关系，布尔塞维主义——第三国际理论的根据——等理论，是毫不足怪的。但是那些人们很喜欢引用马克思的话和第三国际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劝他们看看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最末一章和第三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议决案。马克思在他所草的共产党宣言最本一章，指示德法波兰瑞士等国的社会党人须按照自己国内政治经济情形，赞助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派；第三国际号召凡属赤色旗帜之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同志们，实际帮助国家主义的革命运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今日》的作者若能早看到那些理论，或许可以少闹些笑话。

在他们那几篇文章里面把陈独秀同志实在说得太多。他们居然把陈独秀同志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认为是他变节了。这个多可笑呢。谁也知道陈独秀同志是多年的老革命家，老早就是共产主义旗下最勇敢的战斗员，历年不断的用全部精力为共产主义作战。那些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马克思派，也有这种资格来说老共产党陈独秀变节，这不是太可笑了么？听说《今日》的作者多半属于一个什么共产主义同志会，胡鄂公便是他们的领袖。这就更有趣了。胡鄂公是谁呢？他是从前王占元的政务厅长，现在的国会议员，他曾跑到保定去和曹锟拜拜寿，也曾率领议员到总统府去吵闹吵闹，新近又由黎元洪保荐他做教育次长，给他二等嘉禾章。他真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表面上看来，胡鄂公和他的信从者仿佛站在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仿佛站在比我们更左更彻底的地位，倘若我们照他们的文字来判断，或许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患“左派的幼稚病”，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这个判决是错误。因为我们看了胡鄂公在国会中帮吴景濂反对民党议员，再看了他如何包围曹锟和黎元洪，我们便容易找出他的真正色彩。在现在的中国，那一个丢掉了脸孔的人，都想戴上一个新名辞或主义的假面具，把原形遮盖一番。所以我们可以说胡鄂公不但不保卫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说不上患“左派的幼稚病”，不过是光怪陆离的东方式的投机官僚罢了。在他们那一组人中间，也许有些诚实的分子，也许有些真正想做马克思派学生的分子，不过懂得的还太少。他们大叫特叫的说：共产主义者要推翻资产阶级，反去与资产阶级联络，不是变节么？这些语调，一方面似乎表示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多少具点热情；另一方面，表现他们完全不知道去分析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也不知道除了本国的资产阶级以外，还有多少分子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更不知道去估量各种反无产阶级的势力，找出他们中间的冲突，决定马克思派应取的策略。这个工作或许是他们负担不起的，我们决不勉强把这

付担子搁在他们肩上。但是如果他们自信是诚实的分子，如果他们真要做有气节的马克思派，或许首先便要拿胡鄂公等的行动，用马克思派的初浅观念，加以深深的考虑。

因为响导的篇幅有限，我们此时不能详说为什么共产主义者现在应该赞助国家主义的革命运动，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今日》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同志的话大半是无意识的；《今日》的作者们并不能够证明他们自己是真正保卫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证明他们自己是有气节的马克思派。我们还可以说：中国现在唯一的革命的马克思派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仅仅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个个真实的马克思派现在都应该跟着中国共产党去赞助国家主义的革命运动才是。

（选自《向导》第15期，1922年12月27日）

刘仁静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一九二二年）

刘仁静（中国）：同志们，我发言的时间有限，因此我虽然有许多话要说，却只能向你们大概叙述一下中国目前的形势。

我首先要谈谈中国的政治形势。从今年5月到6月，中国有两个政府被推翻了。这两个政府被推翻对中国的革命运动至关重要。

首先被推翻的是南方政府即孙中山的革命政府。这个政府是被他部下的一个军人、一个国民党员推翻的。这是由于在领袖孙中山和他部下的这个军人之间在北伐计划上有意见分歧。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革命的军事计划完全失败。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国民党，多年来就已制定了军事革命计划，期望通过武力征服各省，然后在中国建立民主。它没有在国内开展群众性的宣传运动。它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它企图单纯通过武力达到目的。它在1920年取得广东之前就已组织了政府。它希望倾广东全省的物力来装备一支远征部队，去讨伐充当封建军阀及世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北洋政府。

开始，这个计划似乎是可行的，因为全体党员好象都同意这样做。但是一旦广东省被占领后，该省的军事长官，一个国民党党员，就抛弃了全部北伐计划，变得日益保守，日益满足于一省之地，不愿过问外省的一切事情。国民党内这种党员很多。他们在取得政权之前，是革命的；但夺取政权之后，就变得保守了。那位推翻南方政府的将军不过是这类人物的一个例子罢了。大多数国民党员，按其本质来说，都是反动的。如果他们有一天在其他省份取得政权，他们也会象这个军事长官一样，反对军事讨伐的计划。这就表明武力征服的计划的失败。它还证明革命运动必须采取新的方针。这就是说，为了取得革命成功，就必须组织群众并且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切不可单纯依靠武力。这种单纯依靠武力的方法在中国已经行不通了。

在北方，两派封建军阀在4、5月间发生内战。一派军阀亲日，一派亲美。结果是吴佩孚派军阀的亲美集团获得胜利。这个结果对于中国革命运动也是异常重要的。

北洋政府处于日本的影响之下大约有五年之久。日本帝国主义是通过贷款来施加它的影响的，这些贷款使北洋政府有能力继续内战。日本政府贿赂中国北洋政府的官员，以保证它在中国的采矿业中拥有股份和有权在山东建筑铁路等等。所有这些权利都是通过贿赂取得的。所以，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中的日本的代理人抱仇视态度。中国人由于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就日益支持美帝国主义。由于张作霖控制下的北洋政府十分反动，人民就开始比较同情吴佩孚那派军阀，因为吴佩孚思想比较进步。他主张裁减军队和废除督军制（各省的封建割据），并且得到美国人的支持。最近吴佩孚和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得势，这将证明吴佩孚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而且他和张作霖没有多大差别。尽管他支持民主政纲，但他不能实现裁减军队和废除督军制的计划。这将使群众失望并转而反对美帝国主义，这就意

味着群众激进化了。人民将会认识到唯有自己才能够实现民主，他们不能信赖任何军阀集团。群众将看到吴佩孚不会履行他在未掌权时所作的动人诺言。和平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因为吴佩孚作过改善他们经济状况的诺言而支持他，但这种倾向将日益消失，并且最后在这样的政治变动中完全消逝。

让我们看看吴佩孚的所作所为。他声称不向列强借款，这使他赢得了人民的同情。但他取得政权之后，依靠一帮亲美的知识分子组织内阁，这伙人就立即着手向美国告贷。诸如此类的行为将促使群众觉醒起来。这样的形势将愈来愈有利于中国的革命运动。

其次，我要谈谈工人运动。今年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今年初，香港海员罢工五十天，开始还只限于经济要求，不久就具有了针对英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因素。这次罢工开始只有海员参加，但是后来发展成为香港殖民地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总罢工，并且向北方扩展。接着发生了一直扩展到华中的京汉铁路大罢工。此外，还有香港的钢铁工人罢工、上海的纺织工人和卷烟工业工人罢工以及矿山工人罢工。所有这些罢工此伏彼起，间隔很短。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扩展几乎唤醒了工人群众。这说明中国的群众运动并不光是社会主义者的梦想，而是明摆着的现实。这还说明，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工作是能够获得很大成就的。由此可见，共产党和前几年它还只是一个派别和一个教育组织时的情况相比，今后将会取得很大的发展。今年我们已经有机会看到我们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增长了。

现在我来谈谈中国共产党最近的政治活动。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想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力量同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打击帝国主义，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如果我们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所宣传的共产主义就会是一种虽然伟大崇高，却不能为群众接受的理想。群众会宁可追随小资产阶级政党并且被该党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我们加入国民党，我们就可以向群众说明我们也是赞成革命的民主的，但是这种革命的民主，对我们来说，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且我们还能够指出，虽然我们是为了这一尚为遥远的目标而奋斗，但是我们并不忽视群众的日常要求。我们能够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并分化国民党。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二二年）

…………

或者说中国的情况吧！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事件的过程吧！当吴佩孚同张作霖打仗时，他有长江一线和那里的兵工厂作后盾，但是他没有掌握北方的铁路，控制铁路的人被日本收买了。他是怎么办的呢？他向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寻求支持，共产党派了一些党代表给他，在战争中间，党代表们牢牢地掌握了铁路，供在那儿进行革命斗争的吴佩孚部队使用。在中国，谁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谁就是为中国的革命发展而斗争。共产党人懂得了这一点，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加强了对自己的独立性、自己的重要性的认识。后来，工人向吴佩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共产党人也使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实现。由于这样的支持，由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力量实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的同志就能够在华北的工人群众中站住脚。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总是对我们说：傻瓜，你们不懂得，有些恩维尔·帕夏、有些吴佩孚实际上一再出卖了你们。我们回答他们说：尊敬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先生们，只要还存在小资产阶级（而你们是属于这一阶级的），它总是要动摇于资本和工人阶级之间。而你们，你们这些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已经千百次出卖过工人阶级。尽管如此，在每次出卖以后，我们还是重新争取你们参加统一战线。你们反对统一战线，但历史却和你们开玩笑，你们被迫参加了。不管你们是否愿意，尽管你们也曾经出卖过我们，但是你们不得不再一次同我们合作，并且为我们的事业效劳。

…………

同志们！我现在对报告、对这次会上有关我们东方各党的情况和工作的发言讲几句话。

我还是象往常一样开头。同志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中国同志在这里站出来发言说：我们已在整个中国牢固地扎下了根。我却不得不说：尊敬的同志！在工作开始时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一工作，这是好的。但是毕竟应当看到实际的情况。我们的中国党是在中国的两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彼此是相当独立的。在广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象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象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个样子。由于孙中山倒台，革命事业本来已在华南遭到一次打击，它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具有强大的力量呢？在北方，一般说来党是弱小的，只能依靠铁路工人，你们在那儿怎么可能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呢？塔尔海默同志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不要事先夸耀胜利。这句话很好，正象古代中国圣贤的话一样，应当学习和好好理解。

中国同志的任务，首先是观察一下中国的运动的可能性。同志们，你们必须懂得，无

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遗憾的是，在中国甚至连全国统一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共和国的问题，都还没有提上历史的日程。我们在中国的体验使人想起十八世纪的欧洲、十八世纪的德国，那时，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还很软弱，资本主义还没有建立起单一的、统一的民族中心。你们谈到督军，你们喊道：孙中山在这里，吴佩孚在那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资本主义是围绕好几个中心开始发展的。一个三亿人口的民族，没有铁路，怎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呢？尽管我们有远大的前途，而且你们要以你们年青的共产主义信念的全部热情为之奋斗，但是我们的任务仍旧在于，把工人阶级中正在形成的现实力量统一到两个目的上来：一、组织年青的工人阶级；二、使它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采取明智的态度，以便组织反对欧洲和亚洲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刚刚开始理解这些任务，因此，同志们，我们必须对自己说：我们必须在那里制定一个具体的行动纲领，使自己更加强大。共产国际对西方的共产党说：到群众中去！而我们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不仅到工人群众中去，不仅到苦力中去，而且也到已被这一切事件激动起来的农民群众中去。①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① 译自《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德文本第630—633页。——编译者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大会后的一些情况

——张国焘给威金斯基、穆辛的信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编者按：这封信的原件，是一份手写的英文稿，原存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题目为编者所加。张国焘在这封信中，记述了党的三次大会以及大会后的一些情况，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对我们研究党的这段历史有某些可以参考之处。但是，可以看出：张国焘写这封信，是站在美化自己、指斥他人以寻求同情和支持的个人立场上的，这就决定了他很难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此，读者是能够分析地看待的。

亲爱的威金斯基、穆辛同志：

你们二位给我的亲笔信，我已先后收到。我非常感激你们对我应该如何在党内进行工作的忠告。同时，也感到非常抱歉，因为我没有经常地、全面地把中国的情况写信告诉你们。因此，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很可能会对我产生误解。

当然，要我用自己的观点来全面地回答你们二位信中提出的一切问题，这对我恐怕太困难了。因为我的英语很差。不过，我将尽力简单地回答你们的问题。

一　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

当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提到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时，我们许多同志没有把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谈得很清楚。为了阐明我和我的对立面之间的意见分歧，可以把我和马林的观点，作一个比较。

马林的观点如下：

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是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我们有了改组国民党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共产国际以为国民运动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苏维埃俄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内的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中国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

不错，中国的劳动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都还太年轻，太软弱，目前在中国只能开展国民运动，国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这些我们都同意。但是，国民党代表国民运动吗？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存在吗？中国的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吗？这些就是我们所怀疑之点。

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的对立面的同志就叫嚷说："要忠于国民运动。""不要怕国民党，劳动运动不会在国民党内迷失方向的。"他们不以客观分析，而是用许多这类主观的辞句表达他们的意见，以证明自己说法的正确。甚至有些领导同志也说出这样明显的错话，如："中国没有劳动运动。所谓劳动运动实际上就是国民运动。""谈论阶级斗争就是破坏国民运动的统一"等。由此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策略被曲解到何种地步。

我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要论点是：

（一）中国的民族运动受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同其它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埃及的情况不完全一样。直到现在，我们还谈不上已经有了一个纯粹的民族运动。我们只是有了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而这个运动却多少被美国帝国主义所利用。现在的民族运动不但不反对美国和大英帝国，反而出现了一种保护他们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而一直只顾组织政府、进行军事行动的国民党，则被迫同这个或那个外国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军阀搞妥协；因此，它已称不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了。

（二）中国资产阶级（即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及商人），在各方面仍然十分依赖外国资本家，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即使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是，国内的资产阶级除了反对日本的压迫之外，还远不是一支反对外来压迫的自觉力量。

（三）即使工人阶级还很年轻，力量还很弱，但是它在斗争中已经显示出相当力量，这支力量不可完全被忽视。这是劳动运动，不能把它说成国民运动。

（四）我们不能指望，一场意味着反对世界上所有列强的民族运动，会轻而易举地到来，这是需要几年时间的。而且，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政党也不可能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产生。再说，工人已经有了相当力量，它将成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运动的一个强大因素。

（五）国民党现在并不代表国民运动，必须予以改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有一种力量去迫使国民党进行自我改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我认为就很难有改组国民党的可能。

（六）因此，当前我们共产党人首先要对国民革命的思想继续进行一般的宣传，特别要做大量的工作，把工农民众组织起来，引导他们投入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然后下一步，我们再运用自己的力量去改组国民党，或采用其它任何形式使我们参加到联合的国民运动中去。

（七）与此同时，我们将留在国民党内，为国民党组织支部，并设法改组国民党。这就是说，我们留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或者一般地讲，是为国民运动寻找新的动力。这项工作不是压倒一切的，但它和上述的第六条同样重要。有人提出：马上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如果失败了，就离开国民党，哪怕是短时间的。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意见。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再呆几年，因为我们要使国民党做些事情。

（八）由于国民党还没有进行改组，它仍然集中力量于军事行动和组织政府，我们共产党一方面要作为一个独立地对我们关于中国目前时局的政治主张进行宣传的组织而存在，另一方面，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的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

（九）我们不要忘记，组织工人，提高他们的觉悟，乃是我们党的特殊任务。同时，我们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进程还不明确，也许从一开始，工人队伍就是联合的国民运动的左翼。所以，在现阶段，只有在共产党有强大力量控制的工人集中的地区，我们才能自行组织国民党支部；而在共产党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工人集中区，我们就不必为国民党在那里组织支部，也不让其影响渗入。只有在广州和汉口，我们的职工运动工作才

不得不在国民党内进行。

这里我还要向你们指出几点：

（一）前一阶段，我们的同志过多地期待国民运动的统一。可是国民党不但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政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党。因此现在谈论国民运动的统一还为时过早。现在只能说为国民革命创立某种基础，从而为其打开新的局面，然后再把各种不同因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合的国民运动。

（二）事实告诉我们，组织一个真正的中国国民政党还需要几年时间。首先要做许多初步的宣传工作。中国人民，甚至革命者，至今还没有感到组织政党的必要性。他们把革命工作看得非常狭窄，认为只有军事行动才是革命工作。孙中山先生本人一直坚持他的陈旧观点，认为革命进程首先是军政，然后才是训政阶段。他和他的追随者也都认为，首先他们必须掌权，然后再建党。

如果国民党是一个有作为的党，它的领袖们首先必须完全放弃组织政府和搞军事行动的主张，诚恳接受首先建党的思想。在国民党的领袖们还没有放弃其陈旧观点和老一套的行动方式的时候，苏维埃俄国却去支持他们的斗争，这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是决不会成功的。一旦国民党在反对北方军阀和陈炯明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孙中山就会马上被他自己的将领们所抛弃，广州政府也就会马上彻底垮台。所以，对广州政府的支持不仅毫无价值，反而会延误国民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只有当国民党遭到失败，放弃旧的主张并接受新的做法后，方可给予支持。

（三）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曾试图改组国民党，但遗憾的是没有成功。这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就认为："自上而下的改组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必须对它进行自下而上的改组。"在我看来，中央执行委员会目前正热心于组织一个国民革命青年团。最近我收到陈独秀同志本人的来信，说他现在感到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这很清楚地证明，陈独秀和马林同志的计划遇到了困难，目前不能兑现。而且，这些困难并非来自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而是现实状况造成的。

（四）当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传到上海时，我正在那里。上海市党员大会开会讨论了这个宣言。我在会上发表了以下几点看法："宣言中计划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不可能立即组织好。我们一方面必须宣传关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张，并且坚持不懈地要求这样做；另一方面，我们要赶快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并深入到地方的国民运动的组织中去，以便完成宣言中所提出的计划。"虽然一些同志认为全国代表大会应立即召开，并认为我的意见是"破坏"（"破坏"这个词在三次代表大会上曾多次出现），但经过短时间的讨论以后，大会采纳了我的意见。这清楚地表明。当我们着手进行某种政治运动时，每个中国同志就会懂得，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是何等重要。这同组织或改组"国民党"一样重要。我们不能等待真正的国民政党产生之后，再去着手组织工人和农民。

（五）有人会说，中国共产党如何幼弱，如何不能把工农组织起来。是的，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仍然想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的政党，所以现在我们只能促使幼弱的共产党来承担这双重的任务，即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党和把工农民众组织起来。

不过，现在形势起了一些变化，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上面所说的，只是这个问题在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时的概况。上周以来，得到这样的消息：国民党

将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因此，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我在上封信中提到，想给你们写一篇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现在我想把这篇文章推迟一下，改为同你们讨论讨论关于即将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

据悉，要求各省派六名代表参加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于广州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六名代表中，三名要由孙中山先生指派，三名由各省的支部选举产生。

在上星期一举行的北京市党员大会上，我就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问题作了一个报告。我把报告的要点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些要点可以表明我对大会的看法。我报告的要点如下：

一年前，我们所要求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两个月以后举行。虽然我们还未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这件事的通知和指示，但是我们必须抓紧进行讨论并作好准备。

代表大会是否能如期召开，这取决于广州的战局。可是，关于广州战局的现状如何，前途如何，现在北京没有人能说清楚。

这次大会能否成功，确实难说。不过，据说每省只派六名代表，那么这些代表可能多数是国民党的将官，能代表普通国民党员思想的代表极少，故而会议不会取得什么好结果。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求增加代表名额，尤其象广东这样的省份，名额应增加得更多些。我们应该提议：国民党的知名党员，那些虽不是国民党员、但却是国民党的朋友的革命者，以及各种民族主义的和革命的团体的代表，都应被邀请出席这次大会。这样的结果，就会增强群众对大会的影响。

其次，我们必须要求国民党在各地的党员召开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国民党所有的报刊都应该动员起来讨论和宣传这次大会。尤其是我们党的报刊，应该立即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邀请一些进步的国民党员和非国民党员的革命者，一起为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代表大会草拟一个纲领，并把它提交大会讨论。这次大会将表明我们同国民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假如我们这个纲领被大会采纳则很好，如果不被采纳，那些和我们一起起草纲领的革命者，就会作为国民党的左翼，同我们站在一起。

此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至少要把首先用武力攻占一省，继而攻占多省，然后再发展国民党的主张，改变成首先组织一个坚强而集中的党，然后再进行革命。这就是我们对这次大会的主要要求。

北京市党员大会已采纳了我的报告，并决定报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推选我草拟前面提到过的纲领草案，作为下次地方党员大会讨论的基础，然后再送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最后决定。

关于这个问题，这里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从上月起，上海的一些国民党员中出现了一股反对我们留在国民党内的情绪。李守常同志还为这件事去了一趟上海。看来，国民党员中对我们加入国民党产生了意见分歧，而且日趋尖锐。但是由于近来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所以无法告诉你们确实的情况。

二　我们党的目前状况

在这次广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上，马林在祝贺大会成功时一方面说，大会排除了在解决党的组织问题上的“障碍”，另一方面，他希望我们这些对大会结果表示不满的同志

不要"不合作"，不要搞"破坏"。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障碍"不仅没有"不合作"，没有搞"破坏"，相反，他们仍然同过去一样积极工作。如果马林真的把中国共产党内的这些"障碍"排除了，我不知道他将会如何地向那次大会的成功表示祝贺呢！

代表大会一结束，其错误就暴露出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支部中，对我们同国民党关系问题抱反对的情绪有了发展，反对者可能占多数。再者，象长沙、汉口和北京这样一些大的支部，曾设法要求马上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问题。那时，我们不仅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反对上届代表大会和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由于我们的帮助，使这种情绪平息下来了。因此我们深深懂得，我们幼弱的党根本经受不住这种打击。

在党的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我们热烈讨论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有些同志根本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分析，而且他们在那次激烈的讨论中，不去避免产生困难，甚至还在会内会外利用我们党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纠纷，对我进行攻击。我不知道莫斯科是怎样谈论我的。我要公开地答辩："的确，由于我们年轻，我们都犯过许多错误，甚至于犯过一些很愚蠢的错误，这是难免的。但是，有些错误我们过去没有犯过，将来也决不会犯。"

你们二位提醒我，要我注意维护幼弱的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穆辛同志甚至还表示相信我不会在党内设法制造任何新的困难和分裂。确实，我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维护我们幼弱的党的团结的。我决不会亲手损害我视为自己生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从一开始我就参加的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

总的说来，党的三次代表大会并未给我们党带来任何困难。至于某些支部出现的一些小纠纷也只是因为我们党的组织还不够完善、党员太年轻又有些个人主义的东西所致。最近我们党的工作没有多大进展，因为遇到了诸如缺乏办法等实际困难。有些决定，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没有贯彻执行，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受到了同志们的阻拦。现在，根据我自己的看法，简单地向你们谈一谈关于我党的工作情况。

自从我们代表大会决定了同国民党关系的政策以来，我感到我们党的机关现在并没有加紧宣传工作，也没有对国民党问题提出什么要求。甚至对于我们党公布的关于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也没有作什么宣传，我们党的刊物不能按时出版。

譬如长沙支部，这是我党最好的支部之一，也由于战局的影响，和长沙工会一样，都处于几乎无法开展活动的境地。

长沙支部领导机关遭到了军阀赵恒惕的镇压。汉口外交后援会过去是反日的民族主义组织，近来已把矛头转向英帝国主义。我们在汉口开展国民运动多少还得依靠它为基础，可是最近它也遭到了湖北督军的镇压。

有些地方的工会运动有了进展，但由于我没有得到全面的消息，所以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确实情况。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危机。上海一些或多或少反对我们的工人领袖，打算举行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和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当然，有些政客是支持这些工人领袖的计划的。我们也打算召开这些代表大会。但我们是否能同他们顺利合作，目前还很难预料。交通系的政客和张作霖大帅以及其它一些人，正企图利用工人为其反对直系的斗争效劳。有些工人领袖也想从某个政客身上寻求支持。倘若这些工人领袖一方面同某些

政客或张作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得到工人的信任，那末这在今后很可能会成为分裂中国中部和北部工人运动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些领袖尚未和任何政客有任何联系之前，我们要委派两名同志去奉天揭穿他们的企图。过去我们因为派同志去奉天而犯过错误，因此，现在我们也许还会受损失。

最后，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共产党好的一面。我们看到出席党的三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们对政治问题都能切实地积极讨论，这表明了我们党在成长。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并在大会上多次提到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年轻的、赤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革命者组织起来的，是唯一具有远大前途的党。我希望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给我们以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对工会运动的支持，以使中国革命能得到更快的发展。

现在再说几句关于我个人的情况。我现在在北京工作，我的任务是编辑北京《劳动周刊》，每周的发行量为二千五百份。同时我还担负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并在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一个委员会里工作。我还经常为我们党的报刊和国民党的报刊写些文章。可是我现在不是党的专职工作者，所以还得抽些时间搞自己的事务。我个人动用的一部份共产国际东方部为购买中国刊物寄来的款子。当然，我将尽快于短期内归还，并且要给你们多寄一些刊物。我每两周给你们寄一次刊物，寄去的刊物想均已收到。

希望你们能给我寄些书刊来，并告诉我一些关于莫斯科的情况。希望你们能马上给我回信，对我上面所写的问题，请多多提出批评。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张国焘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于北京

（周　敏译）

（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①]

——为开展承认苏联运动

（一九二三年十月）[②]

中俄外交为现在国内重要政治问题之一，于反抗英美帝国主义侵略极有关系，兹决定各区或地方委员会，极宜联合各该地方一般团体向社会公开为承认苏俄的运动。其理论的根据，可参看《向导》四十二期君宇所作的论文，以“反帝国主义之国际的联合”为口号。

委员长　T.S.Chen[③]

秘　书　Leo D.

① 第十九号可能是第九号之误。

② 时间为编者判定的。

③ 签名为陈独秀、罗章龙。

中央通告第十一号

——各地应召集紧急会议发起反英运动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①

广州政府现拟收回海关用人管理权，本属正当办法。乃英人竟因此派兵占领海关，当此英帝国主义进攻最横暴之日，各区及地方同志应即召集全体紧急会议，筹备联络各团体发起剧烈的排斥英货运动，并通电全国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以恢复国家应有之主权。

委员长　T.S.Chen②

秘　书　Leo Dschanlung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时间是根据文件前后联系判定的。

② 签名是陈独秀、罗章龙。

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
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要

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本定于十月二十日召集，嗣因与劳动大会时间冲突，改在十一月十五日，又以候驻粤委员，延期到二十四日始开会。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开会，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闭会。到会者中局委员四人，驻京驻鄂委员各一人，SY代表一人，特别招待同志一人，共八人，驻湘驻粤委员未到，中局委员一人因事赴湘亦未到。议事日程如左：

（一）中局报告大会后进行事项；

（二）各委员报告地方工作情形；

（三）国民运动进行计划；

（四）劳动运动进行方针；

（五）教育宣传问题；

（六）第五次国际大会准备事件；

（七）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张绍康、陈天党籍问题；

（八）胡鄂公等党籍问题；

（九）党证问题；

（十）中局会计报告。

讨论的结果：第（六）催取各地方对于党纲草案之意见，原选出席代表张同志失踪，届时由中局另派。第（七）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四人，执行大会决议，开除党籍；张绍康、陈天均已登报脱离，亦应开除。第（八）胡鄂公，在未能证明其确未帮忙贿选以前，仍旧停止出席小组会议；熊得山、汪剑依因与胡有连带关系，亦应同样办理。第（九）暂行从缓。其余报告及决议案另录。

中央局报告

（一）政治　大会后即发生北京政变，中局随即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印汉文六千，英文三百），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只香港各英文报发生反感，在国内舆论上无什么影响。同时并函请孙中山赴沪召集国民会议，亦无结果。

（二）宣传方面　因中局及出版机关迁移之故，《新青年》应出二期，只出一期；《前锋》应出五期只出一期；《向导》应出到四十九期，只出到四十六期，小册子无。在三种定期刊物中，《向导》在社会上稍有影响，因此社会上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大会后比大会前渐渐

8

浓厚起来。

（三）与国民党关系　大会决议案，尚未能充分执行者，一，因同志中对于决议案有多少疑虑；二，因国民党本部办事不敏决；三，因同志们和国民党党员间的猜疑及政治观念不同；四，因本党经济困难。有此四因，原拟在最短期间成立北部中部各重要支部之计划遂未能实现。此时惟北京已有组织；天津，哈尔滨，湖南也在进行，湖北，南京方与国民党交涉中；山东、四川国民党本有组织，对于我们的同志加入工作者颇信任。安徽国民党分两派，均不得社会的信仰，现需有能力者前往另行组织。此时国民党中有一派人拟实行改造，并决于明年正月十五日在广州召集大会，又一派人反对之，将来或酿成重大的变化。

（四）劳动运动　中局直豁〔辖〕之劳动运动，惟路工，兹据铁委报告如左：

一，正太路　正太情形最好，因为彼方有九个C.P.同志，二十余S.Y.同志，人都很好，并且都勇敢努力，他们对于工会的组织潜在外进行，执行委员会不断地开会。二，京奉路　京奉情形也很好，唐山山海关天津丰台等工会都还秘密存在，这四处尤以唐山和山海关更好。三，京汉路　京汉以江岸、郑州比较好一点，该两处都有秘密小组。信阳亦由江岸派有专人负责。辛店比较差一点，但现在亦找了几个工友常来京谈话，屡次教他们把小组组织起来，但他们都很怕，前两三星期他们虽已组织十余人，但现在又无形消灭了，不过大多数对于工会还信仰，只不敢出头；今日辛店又来了一位工友，教他回去活动小组织，他已应允了，或者从此后，辛店可有中心了。四，津浦路　津浦南段浦镇已有了三十余人的小组织，不断地开会；北段亦有人接洽了，但一时都不敢出来，有几个活动分子都很好，但被工贼崔某监视，不敢动作。五，胶济路　此路现在已组织一个一千六七百人的工会，此间已与他发生了关系，工刊每期寄去二百份。六，京绥路京绥车务工会还好，对于我们还时常有信来。七，道清路　道清情形比较差一点，因为那方面的工人，刚把工会组织起来，便遇了二七事件，所以工友更〔格〕外的胆小，但有一同志在彼处，亦有相当活动和宣传。八，陇海路　此路至今还由林之英魏某等把持工会，王同志久无信来，彼间情形不大清楚。

（五）农民运动　新起的农民运动，一在广东省之惠州，一在湖南省之衡山，惠州各属有一万户以上的组织，衡山也有万余人的群众运动，两处都是S.Y.同志在那里指挥，现在都已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一我们的同志在农村中尚无深的根基，一时经济的煽动，遂召中农多数的反抗，勾结军阀官僚，加以武力的压迫。二惠州在陈军反动的势力之下，衡山在赵军反动的势力之下，政治也是一个原因。

（六）党务　大会后党员增加不过百人；新发展的地方，一是济南成立了地方会，一是哈尔滨成立了一组，也只有□两个地方工作最力，湖北的工作最松懈，官厅的压迫和同志们的委顿两个原因都有。南京，杭州，四川，江西，福建均可望有新的发展。

各委员报告

（一）京　区

（A）国民运动　初因同志中政策怀疑，继因与民治主义同志会有龃龉，民党本部又有人利用同志会从中阻挠，故无速效。现拟派得力同志加入该同志会，其障碍当可去。同志会疑

忌我们，与我们同志受民党委托在京沪办杂志也有关系，现已解释清楚。前此王、安二同志在京时，内部稍有精神，现范、高亦甚努力，惟因内部意见不协，进行上颇多障碍。现亟须加派新同志担负工作。天津方面已有数同志在组织讲演会及国民党。

（B）劳动运动　亦缺乏人力财力，此时最困难的是应付失业工人及在狱同志及其家属。

（C）学生运动　自韦青云为王正廷收买，造谣损坏范、高二同志在学生会的信用，并借以使学联分裂，此项工作吾人应急加入得力分子去整顿。

（二）湖　北　区

（A）国民运动　武汉近来突起的爱国运动，忽然沉寂下去，外交协会已为官厅封禁，官厅对于外交委员会虽尚未封禁，而明示以勿许工人团体参加，该会虽未遵行，而态度转为消极了。国民党有成立支部的可能，但多为工学界的新分子，旧党员可靠者极少。

（B）劳动运动　武汉工联虽解散，近来暗中尚极团结，惟缺乏负责之人出头组织。党中现设一劳动运动委员会，即为从事此项工作。武汉失业工人多无大希望，今后须向工厂去寻勇敢分子以教育训练之。

（C）青年运动　学联毫无群众，近令各同志借各种机会向各学校活动。

（D）党务　负责者少，事多照顾不到，前时工作都是向外发展，对于内部教育训练工夫，太没有注意，故同志精神颇不振。学生好批评而不努力工作，工人思想过于幼稚，不能独立担任工作，区委拟今后向此方努力。

（三）沪　区

大会后，本区专力整顿上海地方之内部，因前此内部涣散，等于没有组织，现在内部的组织稍有头绪，党费已能收到应收数一半以上。上海为中国第一大都市，可是我们的工作仍然毫无起色。关于国民运动，因为我们的同志多是无职业的外省人，和本地的社会隔绝得厉害，所以不容易进行；关于劳动运动，上海为全国工人最多的地方，而工人运动并不发达，其原因是：（一）交通便利，劳动者供过于求，同业间竞争甚烈，遂不敢与雇主竞争；（二）丝厂、纱厂、香烟厂之女工占全埠工人半数以上，这也是上海劳动运动不易振起之原因；（三）工人籍贯复杂，地方观念也是阻碍团结的原因；（四）原有的青红帮，不但无形中阻碍工人团结，并还自引捕房恶探，侦察工人的主动①，无微不至。我们办的机器工人俱乐部，因为他们生活利害关系太不相同，他们居住距离也相隔太远，似此散漫不相粘结的分子，如何能够团结起来，所以上海的机器工人组织，前此已数次失败，现在这个俱乐部也无形消灭了。邮差运动前此尚好，现因受压迫而停顿。现在着手吴淞及高昌庙的部分运动，吴淞设一工人学校，已开过一次工会预备会；高昌庙亦拟组织一个工人夜学。店伙组织已着手联络，一二月后即可成立。南京党务比前此略有起色，现拟合浦镇成立一地方会。杭州同志太少，尚不能成立一地方会。沪宁、沪杭铁路工人都立有进德会，会员为熟练工人及员司头目等，颇为工会运动之障碍。

（四）湖　南　区

（A）政治　自七月初，湖南局面即成“讨贼”“护宪”之争，北军未入湘以前，谭已

① 原文如此。

拥有湘南湘西全部，赵则仅据长沙、湘阴、岳阳、平江、浏阳五县以相抗；攸、醴则在或得或失之间，自中立军鲁挥戈附谭，湘谭①随之以去。上自湘谭②，下迄湘阴林沚口，谭、赵之兵皆夹河而阵，战争之重心，则在攸、醴之间。九一之变以后，赵氏虽得回复长沙，然各军溃散及倒戈而去者过半，原驻防地尽失，形势过弱，赵乃升十四团长为旅长，叶、贺、唐、刘（钏）尽编成师，招兵买马，勒捐强借，竭泽而渔，长沙市民独当其冲，或捐或借，搜索在十次以上（房捐抽收三四个月，田赋征收到十四年）上自富商，下及车夫走卒，无一幸免者。加以内河交通断绝，生意凋零，商家陆续倒闭，工厂尽数歇业，人民之苦于兵，为民国以来未曾有，赵氏知民不附己，索性撕去护宪假面，延引北军，南北夹攻，谭军遂不支而撤退赴粤，赵乃重握政权。

（B）党务　四个月中，同志增加者，长沙十四人，安源二十余人，水口山十余人。教育进行，长沙较好，同志颇喜于政治及问题之讨论，安源次之，水口山又次之，常德数人太幼稚，目前无办法，衡阳数人亦幼稚。

（C）劳动运动　长沙因各厂歇业，工人竭蹶求生，且多星散，纺纱、造币、黑铅诸业俱乐部，顿形冷寂，惟整理其中S.Y.的组织而已。其他各手工业工会，则只能保持原状。安源四个月来，现状颇好。工人颇能在工会指挥之下，练习自治生活，地方军警均失其作用。工会对于社会亦不似从前之隔阂。合作社亦渐有起色。工人补习学校虽未得适当之人主持，然工人居领袖地位者，现在特别班，专事主义与政治上之训练。工人子弟学校有七：惟株、醴二校，受战事上之影响，维护颇不易。在安源可虑之点，则三公司（汉冶萍）资本素仰给于日本，自震灾发生，来源断绝，安源工资，积欠已二阅月；或竟停工亦未可知。然安源煤矿可以独立，汉冶歇业，萍煤有不歇业之可能。但有何方法，做到此着，此间尚无把握。水口山工会尚能保持现状。合作社已成立，因交通断绝，尚未正式开办。衡阳之白果，组织了一个农会，会员约二、三万，但因水陆交通断绝，无法加派得力人去主持。距长沙四十五里之靳家河之矿矿③亦有数千工人，曾派人去调查接洽过，一俟战争停止，便可进行。

（五）山　东

（A）党务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开第二次地方全体大会，同志十三人，又新介绍同志三人，共十六人。第一组因吴同志辞组长，故未开一次会，殊属失当，此后仍请吴同志负责进行。第二组虽开过几次会，亦未见精采，以后希努力进行。党费务于本次大会后一星期内由组长收齐汇交。

（B）劳动运动　理发工会已就绪。自王同志去青岛，彼方面劳动界中已着手活动，现正努力进行。张店方面，已由同志联络路工十余人，不久即可成会。津浦路亦有车务工人与我们连络，将来一定也有头绪。不过最近胶济路全路工人因待遇不良，要起大风潮，这是我们应特别注意的。

（C）将来进行计划　1.关于党务方面，要通告青岛方面同志，迅速发展一地方，张店

①② 原文如此，"谭"似为"潭"之误。
③ 原文如此。

方面亦然。努力发展使山东成立一区。2.关于劳动方面，先以全力注重胶济路，因有机可乘也。胶济路组织好了，则青岛工人与沿路矿工即不成问题。3.关于国民革命方面，要督促国民党正式成立山东支部，大加扩充起来，借以改造腐败的学生会。4.关于宣传方面，努力扩充《向导》报及各种宣传品，并相机组织研究主义的团体。

又对于最近发生的事件，由学生会发起的国民大会——于十四号开，决计一致加入，并主张不承认北庭，打倒国贼梁浩如①，严惩猪仔议员，追悼留日被害同胞。

（六）哈 尔 滨

1.民校 民校事，张同志的部长委任状已接到，我们现开始活动。事务所将租妥，以后预备以三十人为基本，从事有意义的组织。

2.《晨光报》 此报的销数在哈埠现已占第一位，一个月以后，可归我们主持。

3.青年学院 官厅已批准。现正在特警处粮捐下活动经费。青年学院半月刊——《青年》——下星期内正式出版。

4.劳动运动

A.有京汉高碑店分会得力工友来此，他是天津人，又在东路做工多年，会俄语，现已由俄友供给生活费，办东路华工部事。

B.此间友人每月出八十元，办《劳动周刊》，此报由我们办，下星期出版。

5.通信社现已有了两个办公处，电话等都全备，与无线电收发处合办。仍加力进行津贴，俟根基在握，在此希望再调一同志来专办，以保持这块招牌。

6.S.Y. 基本人已有六人（C友出外），努力于商人学生两方面，从事组织。

7.已发起一群众对外的组织，下星期日开大会。拟乘机鼓吹反帝国主义的联合，促进中俄会议等……内幕由我们主持。此间同志皆以"参加团体组织团体"为唯一方法。

（七）广 东 区

（A）国民运动 自某方面代表于十月到广东，国民党改组之事遂实际进行。某代表到广东即召集C.P.及S.Y.执行委员及两中局驻粤委员开会讨论国民党改组进行方法，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孙中山毅然召集此会议，同志出席此会议者五人。会议的结果，大多数并不反对改组，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遂于十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由孙中山特派九人为委员（内有同志一人），特派五人为候补委员（内有同志一人），是日开第一次会议，提出讨论者：（一）广州市分区组织问题（现已分为十二区，同志有势力者有四区）；（二）召集全国代表会议问题（定于明年正月举行——每省六人，海外华侨有支部者代表一人）；（三）筹办国民党周报问题（已出版）；（四）党纲起草问题（已由廖仲恺起草草案，载在周报）；（五）经费问题。又另组临时委员会上海执行部，推定汪精卫、张继、戴季陶、胡汉民、叶楚伧五人为委员，并已派廖仲恺到上海克日召集成立云。广东未来的国民运动，是收回海关主权问题，此时国民党及广州政府都有此倾向，倘真能有点运动，便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冲突之第一步。

---

① 原文如此，应是"梁如浩"。

（B）劳动运动　广东劳动运动到今日渐将回复其原始状态，三年来带经济性质之运动已普遍做过，加薪减时之口号，在现在很难适用。目下唯一的工作，只有内部组织，而各工会因成立时组织形式太涣散或太旧，又因会员已失工会之需要，多数不能号召会员，其散漫状态与其原始未有成立工会时之状态相同。范围小的人数少的职业不甚重要的，已经无形中自行解体，或仍留其躯壳而已。其比较稍有组织者，只建筑工会、油业工会、机器工会、粤汉路机料工团而已。

（C）学生运动　自第三次大会之后，四个月以来，在广州方面虽有新学生社为公开的学生运动。但非S.Y.的社员不甚多，而活动分子则更少，故新学生社的组织，只得到对外发表主张，发起或加入各社团体之群众运动等作用；尚未做到能左右广州学生的地步。凡曾参□群众的同志，无论是谁，都觉得我们在学生群众中势力之薄弱。每次都要假借别的团体的力量或政治势力，才能得到较好的结果。故此次S.Y.区代表会有“扩充新学生社”之决议案。现已由各地方会先整顿各S.Y.支部，进而整顿新学生社各支部，再进而扩充之。新学生社出版之《新学生》半月刊虽未能得到多数学生的同情，但于广州的麻木群众当中总有些少影响。虽销行不多——在广州学生方面连社员三百余份，但稍有研究精神，有读书兴趣的学生，都已知道这个刊物。至其不能多销的原因：（一）因政治批评太多，关于文化运动及学生切身问题的批评太少，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二）因没有确定的编辑负责者。故此次区代表会曾讨论及此，通过了应多发表关于文化运动批评的文章，并举定罗绮园同志担任编辑。可惜他又就了兵工厂的事，故至今仍无负责人。今天〔年〕九月间全国学生大会，虽然通过了许多关于国民革命的议决案，广州学生会代表且提出拥护中山组织政府案，可是闭会之后，他们又回到原校去读死书，把所有议决案都忘记了。最重要的是实行赞助三民主义者的三种办法，如召集该地方的学生大会进而召集该地方的国民大会宣布学生大会的主张，他们都完全没有做一点工夫。其他关于威海卫问题，天津、汉口租界问题，铁路共管问题，长江警备舰队问题，任由英美帝国主义者，猛烈进攻，都完全没有表示。即反对曹锟贿选，请愿北伐的示威运动，虽由我们拉他们加入发起，亦只得一个名义加入，毫无实力。至于根据全国大会议决的章程，改组广州学生会一事，更丝毫没有提到。此次区代表会认定现在的广州学生会实不能领导学生群众做国民革命的工夫，非改组不可，故有“改组广州学生会”的议决案。但我们势力所能支配现已加入广州学生会的代表，实缺乏活动力量，故拟先组织法大学生会，俟他加入之后，然后提出改组。现法大的同志已极力活动，且已有头绪，组织学生会事大约不久可成功。

（八） S. Y.

开过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次，最重要的是对于各地方团问题，均有相当的决议，各地答复大致尚能实行。宣传方面，《团刊》十月已出两期，《中国青年》已出六期，《青年工人》已出一期。各地工作，以广东最佳，各项运动，S.Y.均参加。山东近因派专人前往已改组，青岛已快成地方。农民运动，湖南狱〔嶽〕北农民自遭地主联合官厅高压后，被捕者数人，死一人，现农会尚存在，有决议案数起，以排斥洋货反对军阀为口号。太原、哈尔滨、济南等地十一月七日的运动甚好。现S.Y.分子缺乏真正青年，尤缺乏青年工人，故实际上无什么独立工作，此应设法改正。

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

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因为目前的中国劳动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在政治上的意义都只是国民运动。兹根据大会议决案，议定国民运动之进行计划如左：

（一）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因为大规模的国民运动不可无一个有力的公开的党为之号召指挥。

（A）扩大其组织：（1）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2）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3）新创设之组织，须遵用国民党中央部所发之党纲章程及党证，其名称则暂随当地情形自定之。（B）矫正其政治观念，根据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比反军阀运动更为切要，在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有冲突时，吾人得助军阀以抗外人，断不可借外力以倒军阀。（C）我们与国民党之关系：（1）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2）我们预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3）我们的同志倘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其经费受诸国民党者，应公开的支配，其帐目只报告国民党；受诸本党者则对本党负责。

（二）国民运动之主要动力固然是国民党，而国民党之力量必须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必须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

（A）农民　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中国国民党的基础便应该建设在农民上面，各省支部应竭力推广其分部于乡村。运动之策略，以教育及自治入手，以“全农民利益”为号召，如水利，防匪，排洋货，抗苛税等，不宜开始即鼓吹佃农的经济争斗致召中农之反抗。

（B）工人　工会的组织应与党的组织并重，对于近代产业工人，更应发展其阶级的意识。

（C）商人　注意地方商会及大都市商会中，对于官僚分子之反对派。

（D）店伙　上海，汉口，天津等大都市急应进行此项组织。

（E）各机关职员　即衙署局所雇用之下级人员，此项组织与店伙组织在都市中均极有威力。

（F）学生　应以之为各种人民的组织及宣传之媒介，初级师范生对于农民运动尤为重要。

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

自“二七”工潮以后，中国北部中部之工人组织大部分破坏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精神，亦因此而涣散，胆怯，有的还堕落了。全国工业中心——上海——以种种特殊原因，劳动运动仍旧毫无起色。南部——广东——大部分是手工业，海员因缺乏宣传与组织，总会职员素不为会员所信任，又以经手财政不清，互相冲突甚烈，内部危机日迫一日。依此状况，大会所议决的全国总工会及其他类似之组织一时均不易着手，兹拟先行选择最重要的产业工人，如铁

路，海员，矿工，集中我们的力量，加以切实的各个组织或整顿。候这三个产业工人都真有了全国的组织，然后再谋这三个产业工人的联盟；即使彼时有组织全国总工会之必要与可能，亦须十分注意于这三个产业工人的联盟以为之中心，方免涣散。

组织整顿这三个产业工人之目前计划：

（一）铁路　由现在之铁路委员会派人分往各路接洽，俟各路能够派出有力代表（以在职工友为限）担负组织责任，即应择相当地点召集各路会议，以议决各路公开的或秘密的组织方法及各路公同的关系。在此会议前，上海，杭州，山东及广州同志对于该地铁路工人之组织，须特别努力。

（二）海员　（1）由上海及留法同志努力于宁波海员之联络及宣传；（2）上海、汉口、天津同志，努力于北洋及长江航路之船员组织；（3）由广州同志用国民党的力量设法改造中华海员总工会，并在香港特设国民党海员部，以便开始宣传及改良其组织。上海、香港、新加坡间之文件输送，亦海员运动中重要工作。

（三）矿工　以奉天、直隶、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包含在内）为主要区域。湖南已有组织；直隶之唐山应由京区及唐山地方设法进行，并各指定同志主持此事；山东之坊子，溜〔淄〕川博山，峄县等处矿工运动，山东同志应把它和津浦胶济路工运动同时并重；奉天以设法成立本党组织，河南以恢复本党在彰德组织，为入手办法。

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

A．宣传方针

一、政治　最近期间可略偏重于下列几种政治上的及外交的宣传：

1．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之各方面的宣传。

2．中俄亲善及承认苏俄（以爱国主义为立足点之分数当加多：中国可以利用俄国抵制英美日；俄国实际上决不能侵略，而必须经济的政治的合作）。

3．国民党之改组（反对非政党说，提倡健全的国民运动的政党，当就现有的国民党着手）。

4．反对曹吴及外交系（当注全国目光于直系，对其他军阀不必与以同等之攻击；不可落于普遍否认的稚气，当以竭力求变更现状为宣传的最近目标）。

5．反对研究系——宪法派（证明宪法非民众实力不能保证；研究系借“法律条文”投机与外交系借“西餐礼节”卖国有同等的罪）。

6．各省的现实政治之批评（如省区及地方组织尤当注意：如山东哈尔滨等有C.P.所能支配之新闻机关者）。

7．地方自治之实际建设（如职业选举之类，当以能实行为前提：如哈尔滨市议会——中国，日本，俄国平民——之选举权等，都可借此相机引起中国商人，工人等的政治运动）。

8．五权宪法的研究（应当借革命的一权说，民党所谓五权宪法，不过组织上的问题而并非“权”）。

9．其他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之宣传及介绍。

10.近时德国革命形势之论述。

此中尤以反对英美及直系为最重要。

二、劳动　劳动群众中，除上述的政治外交问题当以极浅近的口号宣传外，并须特别注意下列几项：

1.经济斗争（须有组织有步骤之坚决斗争，勿作孤注一掷）。

2.经济斗争与政治及外交之关系（当取中国实际经验作例，如海员唐山京汉等）。

3.自然及社会科学之常识，共产主义之浅释（当与工人以整个的科学的奋斗的人生观）。

4.普通集会组织的方法。

5.世界劳动运动史略及现势。

已有的《工人周刊》及《劳动周报》当尽力推销于工人及党员之间。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当尽力运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之材料，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Popularization）。

当尽力编著通俗的问答的歌谣的小册子。

有可能的地方当设贫民学校。

三、农民　农民间之宣传大致与工人中相等，但材料当取之于农民生活；尤其要指明农民与政治的关系，为具体的经济改良建议之宣传，如协作社，水利改良等，尽可以用外国译语，只求实质能推广农民运动。

四、文化　文化思想上的问题亦当注意，这是吸取知识阶级，使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工具的入手方法。

1.反对东方文化派（纯粹的东方派是幻想的退步的思想；纯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是个人主义，伪慈善主义；共产派当宣传为斗争而互助，斗争乃为将来全人类之互助；无斗争即无生活。）

2.文学的及科学的宣传主义。

3.反对宗法社会之旧教义。

4.反对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组织（如青年会）。

5.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反对个人主义；"各个人当择一宗旨，结为团体，服从其分配工作以达共同目的。亦即自己之目的；个人生活当然因此得一部分的满足，同时亦当自求生活保证，求身心的强健：结团体本是为着各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安全亦是为着团体的工作。既有团体（或社会）便有各团员间之相当关系（或新的习俗），非此不能维系；决不应以为共产主义便真是"过激主义"——蔑视一切个人私德）。

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在这一时期，大家都当以上述的方针为标准去实行。至于材料，可以取之于C.P.、S.Y.之出版物。出版物及团体内的宣传教育方法亦另定暂时的办法，见教育宣传委员会的组织法。

B．教育方法

甲

一、各地方之政治讨论（每次大会由教育委员选择前锋或向导论文作材料）。

二、各小组之政治讲演（除现时政治问题外，最好每组以党纲草案为根据逐段讨论研究——此于新加入之同志有大益处）。

三、各小组之组织原理讲演（以章程为材料）。

乙

四、国内劳动运动及各地现实的劳动生活，每小组均当加以讨论（以《工人周刊》等为材料）。

以上各种材料及讲演员之分配当由各地方教育委员负责——每月报告中央教育委员会。

各地C.P.及S.Y.各推一教育委员合作——可以共同报告——（但S.Y.所用材料当注重青年方面，如中国青年，青年工人及S.Y.之章程纲领；C.P.党纲却亦为S.Y.所必须研究，此为两团体之政治的共同精神）。

丙

五、各地有可能时，设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任取何名，如哈尔滨之青年学院），大致可如下法组织：——（亦可利用其他学会，掺入自己材料）新青年，社会科学讲义，译著的关于主义之书籍为材料（党员的新译著随时报告中央）；每月召集会员几次，预指材料及问题，或请人讲演或共同问答；结果若有疑问，可寄到名义上的“社会科学会”（即中央教育委员会）令答复。再则可令会员从事实际调查各种中国现实问题如劳动状况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一、民族政党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国解放运动，目前正经历着建立组织和集聚力量的阶段。国民党曾酝酿和发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但没能把这个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党没有吸收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而把自己的计划寄托在能在军事上战胜那些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工具的国内反动势力上。

二、共产国际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以孙中山博士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已认识到必须接近劳动群众，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同时相信，从国民党建党起就奉为该党基础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将通过下述解释，表明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

三、民族主义，就是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对于上述每一个阶层来说，民族主义的含意是，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

如果对于工商业资产阶级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更好地发展国家的生产，那么，对于国内各劳动阶层来说，民族主义就不能不意味着消灭封建专制的压迫，就不能不意味着，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

对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在民族主义口号下进行斗争的全部含意是，既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不致遭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

国民党应当实际上表明，在那些由于进行民族斗争而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地方，群众能够立即顺利地发展和巩固自己的组织，以便进一步进行斗争。国民党只有通过增强、支持和组织国内各个劳动人民阶层来放手发动全国的力量，才可以向群众表明，这个民族主义体现的是健康的反帝运动的概念。只要国民党能深入地联系中国群众，就能保证取得国家的真正民族独立。

这个主义的另一方面应当是，中国民族运动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国民党在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时应当记住，由于中国官方的多年压迫，这些少数民族甚至对国民党的宣言也持怀疑态度。因此，国民党不要忙于同这些少数民族建立某种组织上的合作形式，而应暂时只限于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随着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再建立组织上的联系。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便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能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

四、国民党的第二个主义——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

这里必须考虑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民权主义可能蜕变为压迫劳动群众的制度和工具。因此，国民党在向群众灌输民权主义的原则和解释其含意时，应使其有利于中国劳

动群众，即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

五、民生主义，如果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那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才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反响。

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国有化原则在现在也可适用于它，因为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民生主义也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必须向缺乏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因为他们一部分人经营商业，一部分人担任国家官吏，他们以现金地租和实物税来盘剥农民。国家还应当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应当大力帮助农民解决灌溉、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少地区移民、开发荒地等问题。

六、当前，中国工人阶级是全国各地区（北起满洲，南至南方各省和帝国主义者盘踞的港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利益一致的唯一的阶级，因而必然会在统一国家和争取中国独立的反帝运动中，起到自己一份重大的作用。

共产国际相信，革命政党国民党将更多地考虑中国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为了加强全国的解放运动，将放手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支持它的经济组织及其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

七、就自己方面而论，共产国际曾经而且还将指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因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斗争，将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成长和壮大，因为它将在使用土地和管理国家方面，把农民从封建专制的条件下解放出来。

八、国民党应当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上，尽力利用侵华的帝国主义者的内部矛盾，使之有利于争取独立的斗争，同时还应当理解，必须同工农国家苏联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华势力，必须使中国的解放运动同日本工农革命运动和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发生接触、建立联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科拉罗夫）

莫斯科　1923年11月28日

载苏联《共产党人》1969年第4期第12—14页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附〕 加拉罕、齐切林给孙中山的信

向　青　译

译者按：加拉罕、齐切林给孙中山的信，包括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加拉罕给孙中山的信和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齐切林给孙中山的信。这两封信对于改组国民党和推动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起过重要的作用。这两封信均为路斯·费希尔所收藏的文件。路斯·费希尔（一八九五——一九六一年），德国人。她曾代表德共参加共产国际第四、五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委第五次全会，后被德共开除出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曾定居美国，后居住法国。一九六一年死于巴黎。上述两封信转译自艾伦·惠廷所著《苏联对华政策　一九一七——一九二四》一书第二四四——二四六页。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加拉罕给孙中山的信①

亲爱的孙博士：

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政府在广州缺少一个常驻的、负责的代表。随着鲍罗廷的被任命，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鲍罗廷同志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很多年的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个人的代表，您可以象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您可以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就象我亲自告诉您的一样。他熟悉整个形势，而且在他动身去南方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将向您转达我的想法、愿望和感受。

希望鲍罗廷同志到达广州之后，将会更快地推动形势的发展，将会使形势发展大大地超过到目前为止所能达到的速度，这一速度是我所深感遗憾的，衷心祝愿您的事业成功，我向您致以友好的问候。

您的

加拉罕（签字）

又及：我非常感谢您的电报，它鼓舞我对于我们在中国的共同事业具有巨大信心。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

齐切林给孙中山的信②

亲爱的同志：

我非常感谢你的友好来信和通过你们的代表团所转达的友好感情。③你们代表团的到达，这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确信他们的访问会取得有益的结果。……

我们认为国民党的根本目的在于开展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强有力的运动，所以国民党首先需要的是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我们的榜样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的军事活动是成功的，因为很多年过去了，在这些年代里，我们组织和领导了我们的群众，用这种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政党，一个能战胜一切敌人的政党。整个中华民族一定看到国民党——这个广泛而有组织的政党同中国各个地区军事专政之间的区别。国内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以及中国西部各民族，需要清楚地知道国民党是支持他们自决权的。所以，你们不许在这些地域使用武力。这就是我在这些问题上所考虑到的一些想法。我们一定要继续交换意见和进一步讨论问题。当我们达成圆满协议时，一切事情将会进行得更好。

---

① 加拉罕原为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1923年8月2日从莫斯科动身出使中国，在沈阳会见张作霖后，9月上旬到达北京。到北京后，加拉罕于9月23日写信给孙中山，这时鲍罗廷也到达北京，加拉罕通过这封信推荐了鲍罗廷。鲍罗廷持信于10月6日到达广州，将加拉罕信交给了孙中山。

② 齐切林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是在列宁领导下积极从事共产国际建立的重要人物。1923年12月正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因此，齐切林给孙中山的信对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有着重要影响。

③ 在齐切林写这封信给孙中山时，孙博士代表团正在苏联访问。孙博士代表团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其中有共产党人张太雷参加，代表团于1923年8月16日离开上海前往苏联。蒋介石在苏联研究了苏联的政治、军事制度，会见了齐切林、加里宁、马林、魏金斯基、罗佐夫斯基、越飞、季诺维也夫、托洛斯基、加米涅夫等。

（选自《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2期）

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

（一九二三年）①

世界经济状况已指示世界无产阶级在对于世界资产阶级共同作战之中，分出三种策略：(一)欧美资产阶级已于一世纪半以前完成了他们推倒封建阶级的使命，实现了他们阶级的政治，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之经济条件也发达到急切推倒资产阶级而自己取得政权之可能与需要；(二)日本资产阶级只发达到脱离了外国帝国主义者之羁绊而与本国之贵族军阀平分政权的程度，因此日本政治成了一种半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之现象，目前日本的无产阶级仍有推进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作战之需要，而且他们的势力已集中，已有与封建阶级作战之可能；（三）东方诸经济落后国如印度，中国等，都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及本国封建阶级的势力勾结支持之下，不但无产阶级没有壮大，即资产阶级亦尚未发达到势力集中。对于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有自己阶级的争斗之觉悟与可能，因此他们每每有依赖贵族军阀或帝国主义者而生存的倾向，此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以外，仍应采用各种政策，促进那涣散而懦弱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能够与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争斗范围以内的经济势力集中及发展，使他们的经济地位自然唤醒他们了解有与无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打倒两阶级的公敌——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客观的需要与可能；这种联合战线之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幼稚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此联合战线才能实行争斗，不仅仅是一个主张，亦只有在此联合战线之复杂的争斗过程中，才能够使自己阶级独立争斗的力量之发展增加速度。

共产国际第三次第四次大会，依据世界经济状况发达的程度，为东方的无产阶级指示出目前争斗所需要的两个策略，即民主的联合战线及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中国无产阶级的目前争斗，应该以这两个策略为不可离的根本原则，应用在各种实际问题，以消除为中国民族发展的两大障碍物——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

“政 治 问 题”

A、统一与分治问题：武人倚靠外力割据纷争的现状，为资产阶级势力及劳动运动得集中之大障碍，吾人应该反对军阀的分治主张，而赞成资产阶级的国民统一运动，并促进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互相结合，而极力反对其互相分裂或反与军阀合作；然在国民统一运动未能集中时，若有由一地方人民奋起反对一地方军阀统治的自治运动，及不压迫劳动运动不依赖帝国主义者之民主的省政府，则吾人亦宜赞助之，以消灭一部分军阀势力及减少一部分帝国主义者之侵略。

B、对于国民党问题：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争斗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

① 时间是编者判定的。

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总之：我们共产党在任何问题的争斗中及与任何党派联合运动中，总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

C、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以工人农人及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党派或分子为主力军，向一切帝国主义者加以攻击；同时亦可联合半民族运动的党派，向一派帝国主义者作战（例如资产阶级反对日本时）。

D、国会问题：现有国会已经过十年，无论民八民六均未能代表民意，吾人主张用普通选举法选举而不为军阀势力所支配的新国会，同时亦必须改组一新政府，而对于现有的国会及政府，亦仍要作劳工立法及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之运动。

E、对俄外交：俄国为现时世界上唯一抛弃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以中国对俄交涉如通商，中东铁路，松花江航权，庚子赔款，蒙古等问题，吾人应主张即速与俄罗斯直接开始谈判，绝对不容第三国之干涉或参加。

F、蒙古问题：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

“劳动运动”

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他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他的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上面。中国的工人运动，已有由地方的组织进到全国的组织之倾向，由经济的争斗进到政治的争斗之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劳动运动，除普通运动（如减时加薪，劳动立法等）外，应利导此倾向依次进行下列具体的计划，以增加其实际的战斗力：

A、有系统的巡回政治宣传，此项宣传务使工人阶级由被动的改良的单纯经济的运动，进到自动的革命的经济与政治不分离的运动。

B、工厂委员会之运动：单是工会运动，工人的势力终于站在生产机关的外面，其运动之基础恒不巩固；惟有实现工厂委员会之制度，廓清工头，包工及一切居间人之障碍，才能使工人的势力达到生产机关以内。

C、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及矿工总工会：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为三个有力的分子，海员已有全国的组织，铁路工人及矿工经数次大罢工，亦有全国的组织之可能。

D、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角同盟：在一个大规模的全国劳动总联合中，尤其在工人组织幼稚的国里，若是没有几个大的有力工会为中坚，是不容易团结及持久的，所以在未组织全国工会总联合以前，必须努力先成此三个产业联合的三角同盟。

E、为巩固及强大劳动阶级之战斗力计，应该提出“全国劳动运动统一”的口号，应该极力指斥无政府工团派以“独立”“自治”等名词使劳动阶级之组织及运动分裂的阴谋，因

此，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首先要提出“全国劳动运动统一”的议案及议定关系全国劳动阶级利害的各种共同工作，并组织全国工会总联合会之中央机关，筹划及指挥实施劳动阶级联合战线上各项统一的策略，以防欧美资本进攻之余波或及于中国。

“农民问题”

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

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农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

中国一般农民之痛苦如下诸端：

（一）外货输入之结果，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高率，因此自耕农民多卖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流为兵匪；此事实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贫农仇恨外国势力之侵入，一是兵匪充斥供给军阀不断的源泉。

（二）水旱灾荒使各种农民一律受苦。

（三）兵乱及灾荒使农民大力迁徙，其迁徙所至之地方遂至佃农雇工均供过于求，因同业间竞争，地主及雇主所要求的条件日加苛酷。

（四）因以上三种之结果，农民食用不足，遂不得不受高利盘剥之痛苦，此项痛苦以无地之佃农为最甚。

欲解除此等痛苦，应采用下列政策：

（A）限田运动，限制私人地权在若干亩以内，以此等大地主中等地主限外之地改归耕种该地之佃农所有。

（B）组织农民消费协社，中国农民间有合资向城市购物之习惯，应就此习惯扩大为消费协社。

（C）组织农民借贷机关，中国农村向有宗祠，神社，备荒等公款，应利用此等公款及富农合资组织利息极低的借贷机关。

（D）限制租额运动，应在各农村组织佃农协会，每年应缴纳地主之额租，由协会按收成丰歉议定之。

（E）开垦荒地，应要求政府在地税中支用款项，供给过剩之贫农开垦官荒。

（F）改良水利，应支用国币或地方经费修理或开挖河道，最急要者如黄河，淮河等。此等河道之开浚，不但与农民有迫切的利害关系，而且在工商业之运输上亦有绝大的影响。

〔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吾党组织，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由秘密的团体而为公开的政党，其历史上之经过，垂二十年，其奋斗之生涯，落落大者，见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汉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诸役，丙辰以往护法诸役，党之精英，以个人或团体为主义而捐生命者，不可胜算。当之者摧，摧之者折，其志行之坚，牺牲之大，国中无二。然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

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有如深山蔓草，烧而益生，黄河浊波，激而益涸。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 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此则目前情形无可为讳者也。窃以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使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否则民众蠕蠕，不知所向，惟有陷为军阀之牛马，外国经济的帝国主义之牺牲而已。国中政党，言之可羞，暮楚朝秦，宗旨靡定。权利是猎，臣妾可为。凡此派流，不足齿数。而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中间虽迭更称号，然宗旨主义，未尝或离。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吾党有见于此，本其自知之明，自决之勇，发为改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先由总理委任九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始其事，行将召集海内外全党代表会议，以资讨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吾党奋斗之成功，将系乎此。愿与同志共勉之！

（选自《向导》第48期，1923年10月25日出版）

〔附〕 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

吾党之目的，在于中国领域之内，构成一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使全体国民得于国际上政治上经济上遂其有价值之生存，本此目的，揭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主张，以奋斗之精神而图其实现。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倡之吾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故其内容解释，当以孙中山先生之说为断。今依次序而举其梗略：其一则“民族主义”也。民族主义，包涵至广，语其覈要，则凡民族结合而成国家，其意思行为，自由独立，不受他民族压抑干涉，反乎此者，则视为障碍，不能相容，排而除之，不俟终日。辛亥革命，满清覆亡，民族主义，于以发轫。然而境土以内，租界麕然，政制科条，莫能容睐，民邻牛马，盗憎主人，治权割裂，于兹为甚。外人之于中国，则洋轮番舶，江湖河海，无隙不穿，而吾民之往外国，则农工阶级，纤芥微疾，特干例禁。至于伤生之品，无益之货，吾民所欲谢绝者，外国则强迫以售之；内地之所产，农工之所资，吾民所欲保护者，外国则条约以阻之。吾民族于此，在政治上经济上久已沦于外国藩属之地位矣。满清鼎革，仅去一枷，而吾民族之独立自由，尚未除其束缚。解脱之责，有赖于吾党对于民族主义之励精猛进者，正未艾也。其次则“民权主义”也。民权主义，泛言之曰主权在民。然因主权行使之范围不同，民权遂有广狭之别。考诸近代，号称民治主义之立宪国家，其人民之参政机关则曰议会，其人民参政之行为则在选举代议士或官吏，所谓代议政体，其旨在斯。顾代议士所提议议决者，未必尽惬乎民心，官吏所施行者，未必尽符乎民意，其补救之道，舍政府解散议会施行改选或黜革官吏之外，惟有俟其任期终了，另选贤能而已。狡黠政客，利用此制度之不完，乃以欺骗人民，播弄政局，国蛊党弊，缘是而生，民权之归，有名无实。在欧美素行立宪代议制政治之先进国家，推重民权，谓非东方诸国所及，而理想与效果，制度与事实，相去若是。识者乃益以人民创制复决罢免三种权利，使人民不必藉议会之提议而可创制，不必听议会之议决而可复决，不必俟议员官

吏之任满改选或黜革而可由人民罢免，以济制度不完全之穷，民权之实，差以得保。今中华民国成立仅十有二年，举凡代议制度选举制度中，他国所短长互见者，我国几于无美不遗，无恶不备，军阀国贼，用能横行，民权之削，反较专制之开明时代为甚。民国之立，吾党实倡之，亦实成之，然而本质不存，躯壳徒具，则民权主义之促进，在吾党固责无旁贷者也。再次则"民生主义"也。民生主义，于人类各种组织之中，所以有国家社会之遗留者，原以图团体的生存，而遂其共同之生活；则凡社会组织，产业制度，有以资团体生存之巩固而益共同生活之繁荣者，在法当认为优良，反此则否。故善群事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国富之总量，欲求其增加，而生产之分子必期其充裕。否则偏枯为病，兼并勃兴，瓦解势成，崩坏立见。前此秉国钧究治术者，社会现象之观察不明，民生主义之条理未达，阶级斗争，熟视无觌，藩篱自溃，茫漠不知；以为自来社会中心，奠基于个人之资本主义，个人资本之积集愈厚，则社会之生产力愈增，民业化分，赖此而广，经济抒轴，本此而旋，政府无为，一依个人资本之自动以为之理。顾自机械发明以后，生产交通之器具，所以代人工而节经费者，日益精微，自人道上论之，劳力少而效果多，其造福民生，宁有涯涘？但其所显于经济社会之状况，乃适相反：劳力代去，而民福不增，效果虽多，而少数蒙利；掌母财者田连阡陌，事生产者贫无立锥。于是有咒机械为食人，怨大地以不育 国家政府之设，自由平等之称，有类画饼疗饥，无裨实际。于是社会问题，纷呶以起，社会革命，迫于燃眉。顾欧美政家之流，思患预防，一方则取所谓社会政策者行之。

五权宪法，吾党倡之，治法学者，罕娴其说，顾宪法既为国家组织之根本大法，则凡国宪之立，不能于固有历史上之背景，漠无所见，而以闭户造车之道行之，考诸各国宪法，大都三权画分，最高统治权之表现，而为立法司法行政之行为者，分隶于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各不相混。溯厥原流，谓本诸英国之习惯，顾英国政制，夙称为议会政治，以议会多数党中之议员组织政府，立法行政两部之人选，同出一源，故议会弹劾政府之事，在一党占议会优势时，绝对不能生效，准此而言，则三权之分，在英国则仅二权对峙耳，三权鼎立之宪法，实以美国为滥觞，近代成文宪法，亦以此为之祖，后之宪法，模仿前型，随波逐流，几若定例，能于成规之中，别开生面者，惟俄国苏维埃政府之宪法。其所规定，举凡经济制度社会民生诸端，于国家根本有大关系者，无不包括在内，可师之点，于彼为多。但就分权而言，则三权鼎立，所以免专制之流弊，其法未为不善。然在中国，吏治久疏，公德未彰，品流驳杂，法治之道，民未习成，则弥补缺憾，不得不于宪法预为之备，中国前此夙有谏议御史官，贪污滥劣者，用能知所儆戒，而取士之道，考官之权，虽帝皇不能干预。科举当废，为其取材不当，取法不良，顾其为制，外国行之而以收效。今为中国计，于斯二者之制，仍宜保留，必因咽废食。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应使弹劾权考试权各行独立，而为五权之分，弹劾部所有之事，在审查吏治之隆污，监督职官于职务上之行为，察其效果如何，处置当否，以免有枉法营私，怠于职掌，与夫上司庇下属之弊，其职权所在，与议会中之弹劾属于高等政治问题，本于政争之原因者为主，而人民行使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之制，专就下级之政治单位而设，不能扩于全国全省广大之区域而行也。考试权所司，在考取人材，以充官职，非经考试及格之人员，不能委用以掌公务，使凡在政府中供职者之学问知识，在一定之水平线上，而无程度低落之虞，必如是，中国始有吏治清明之望，大本在此，全国民众，盍兴乎来！

（选自《向导》第48期，1923年10月25日出版）

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

屈维它

一

中国的宗法社会遇着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侵入，而起崩溃，方开始有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发展”，（bourgcois dev elopment）亦可称“资本主义的发展”（capitalist development）。帝国主义开发剥削殖民地以拓展其资本主义，适以自种世界资本制度澈底崩坏的祸根；——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充分发展本非帝国主义所能容忍，然而他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就不得不破毁中国的宗法社会之束缚，不得不建立相当的资产阶级的关系。

帝国主义的侵略，割占领土攘夺富源投货投资，令中国农业破产，农民阶级流离失所变成兵匪；然而他即此就令农村之中起阶级的分化，并造成闲空的无产阶级“后备队”，——劳动力极低廉的工人，足以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手工业受外货的影响日就衰惨，更加增多失业的劳动者；而且亦因外货而国内渐渐形成“商业资本”，——商人渐能组织生产，发现“家产工业”(domostic industry)，如商铺散给小户女工以绒绳洋线而令织袜帽手套线袋等类的制度；更进而成就“工厂手工业”（manufacture），如组织手机的小工场等。至于工业之中，外国资本主义最初本当力阻其发达，却因欲行铁路投资且尤须采取煤铁，非有大规模之机器事业不可，于是借款官营，千方百计自取其管理权，成就中国特有的所谓“官僚资本”实际上是外国资产阶级的势力；然而机器既已输入，引起中国资本发展的自然要求却反因与之竞争，而不得不趋于更集中的倾向；甚至于一瞬而已入最新组合企业的方法，如华商纱厂联合会已具“新狄嘉”（syndicat）的雏形。外国资本主义投货时能豢养一种寄生的中国商人阶级，专消外货或代收原料；然而中国工厂手工业及工业既有片面的发达，市场之上发现所谓“国货”，亦就造成与外货对抗的形势，——与外国资本家对抗的商人阶级；尤其是侨居外国的商人，借外国市场完成他们“资本之初期积累”，能力更超过国内商人，更进而能与外国争投资。固然，外国巨大的财政资本与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之间，无所谓自由的竞争，列强单刀直入径借政治外交势力掠夺范围，对矿山铁路的投资无不带政治意味，欲使中国资本之发达迳成为帝国主义的发达，——至今汇丰银行已能掌握全中国的金融，新银行团更想操纵全国的财政交通；因此中国虽有自己资本发展的形势，造成稚弱的新式银行资本，———则大工业所须过多非其力所能支，二则政治投机获利常较生产事业为大，——于是也来争尝异味，以政治为营业，都因关盐大抵押品都在外国人之手，始终跳不过他的范围；然而国内经济生活为帝国主义所拓展，内地旧式的放款（信托）事业（Credit）始终日有发展。

既如此宗法社会的小农及小手工业经济日益崩坏，而资产阶级的新手工业工业商业信托事业日益发展。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顺此发展便能敌帝国主义吗？不能。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非由自力能渐展开及于“世界”，乃由外铄自“世界”侵渗而入中国；非但不能如英

国资本；首先开发，侵入其他各国，并不能如东欧资本之方出世即遇劲敌；乃实受此强敌之暴力开拓。一，对外商业受协定关税之限制；二，工业中所须之半制原料及机器，中国所无，为大工业国大农业国所垄断操纵；三，财政权操于列强，一切信托事业为所挟持；四，工业略有进步而农业反有退化之象（即为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之本性），原料食粮更受限制；五，农民手工业者破产甚多，而工厂所能容纳者甚少；——国内市场上外国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商品与中国资产阶级小生产的商品间之势力悬殊的竞争，还不算在内。有此数因转转相乘，政治的经济的紊乱更迭而起，帝国主义更得乘机攫取，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决无独立之可能，更决无充分之可能。

虽然，有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有无产阶级的形成。因物价昂贵工价低廉在帝国主义之下双方日益增盛，所以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实现；更因列强蛮横卑鄙的政策，军阀强暴残狠的手段，无产阶级的运动在极幼稚的状态中已经逼得直接行向民族斗争政治斗争。小资产阶级，（小农，小商人，小手工业者，智识界）破产异常之速且烈，除流入兵队转成反动势力的机械者外，普遍的不满于现状。（连土匪亦在内）。新生的"婴儿"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及商人之稍能自立的）亦无不本能的反对外国；至于所谓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最近新起的工业家等"亦迟早必觉着抵制帝国主义的必要。于是中国的民族运动，得最宜于组织最易有团结的无产阶级之猛进，当能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而行向民族革命；以至于与世界无产阶级携手，而促成伟大的长期的世界社会革命，彻底颠覆帝国主义。

二

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固然如上述之大致趋势，已可明瞭，然因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自然显露种种驳杂的色彩。要明白此中的意义，也就不能不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作更细些的研究。

大都社会间的变象，受纯粹经济原因的影响的，往往发原路得迟缓些；而受政治上近因的影响的，必更急遽。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受外铄的，其第一步，——应用近代的汽机技术，却始於军事；李鸿章与彼得大帝所行相同，而所得绝异，此中原因暂不能赘叙；唯军事技术的应用则同由防御外寇而来；在中国又恰与小农破产之过程相遇，於是上则造成军阀下则造成兵匪。——军事技术为武人附虎翼，小农破产为武人增"炮灰"。这是第一层。对於生产上绝无良果，而适得其反，——陡然大增社会之消费。西欧资本主义要发达到制造巡洋舰不知道得化多少年功夫，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却从巡洋舰开头！此外外交失败，屡次赔款借债，更是增加平民破产的近因。

因侵入的经济力太强，中国自己的经济力太弱，若要勉强应付，不得不乞灵於所谓"国家"，——这与西欧社会党在资产阶级发达已盛时要求"国有"的性质大异，——其结果且不能令资产阶级的政府集中资本及生产，（因为并无资产阶级国家），当然更不能以此口号而开社会革命之血路，（因为本非劳动者所要求）；——剩得一班士绅阶级，并无经济基础而胡乱借此官营业做无本钱生意；於是发生官僚资本之第一种；其实此种营业最初大半是路矿。矿则一半供军事，一半供给外国，对于中国自己的生产事业所益有限，而消费却当比拟于先进资本国，因汽机生产成本须大；路则最初亦含有"媚外的"军事性质，虽增加国家收入，而一时并不能十分有益于国民经济。欧西资本发达后方要求煤铁铁路，至于进而求其集中国有，

还不知道要经多少周折；而中国却为外人起见先开发路矿，再来勾通内地，并且逼得非官办不可，（辛亥革命虽闹“民有”铁路，至今中国私人资本家该得起几里铁路！）固然落后的资本国，简或也有这等办法，然实按其当地经济情形，始终比中国此种悬隔状态好几倍。次则，最初一期所谓兴办实业，实在非可怜的小商人阶级所能担任，因此私人公司也往往先归处于治者地位的士绅阶级，以官为业的官僚阶级，以及少数巨商，大半仍是官商合办等的把戏；处处惯于借政权作弊，绝不能发生资产阶级最初期所当有的纯粹商品经济，——就是不能全靠真正的经济力量来“自由竞争”。于是有官僚资本之第二种，当然流毒至于现在，不但不能十分组织生产，增加生产力，并且惯于与旧治者阶级妥协。——这是第二层。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既然是适应外国帝国主义而非适应中国经济生活，所以先有国内的新式交通事业的发达，以便外货输入原料输出；内地一切运输事业随之而兴，尤其是轮船火车兴旺；交通资本先工业资本而发展。——这是第三层。交通部在别国不过是国务机关之一；处于资产阶级国家之下，全国资本家的经济力宠罩得住这小小官署。在中国他却会变成所谓一“系”，——交通系；可是这不过举例而说，其实这系乃是官僚资本与交通资本的复合幻化，且其灵魂还是包办国债制度呢。

这三层是中国资本主义出世时的特异之处，大足以定他终身的运命。本来中国旧时的所谓“一统江山”，并非政治经济程度已到的集权政府。其时，各区（省）处处自为风气，因为各有各的经济生活，所以若有武人占据，便可随时互相隔离；然而苟有力量征服“海内”，统治全局亦岂容易，不用多养兵力，——这亦因为各地方经济力弱，并须削除地方的武力便告成功。因此凡一统皇帝勘平“群寇”之后，反当解甲兵“与民休息”。——否则全国生活经济必重行骚乱，“长久”治安反不能保。宋的府兵，清的绿营驻防，人数都非常之少，一则恐怕地方将官割据为叛，二则“天下”的财力也实不能担负许多。——既无必要又无可能。如今既有湘军淮军，在洪杨屠杀十数省之后，又要加以“新军”，要用西洋军事技术，如何得了！全国因此雇佣军队的增多徵调，各省游民已混流交汇，各省武官渐渐自立门户，其所凭藉之武器军队大非昔比——决不能再低头做“戈什哈”，各地土匪更是暗中滋长——他们的兵器也能精益求精，这可不言而喻。既如此，军阀割据的祸根早已伏下，——他们正在想乘机攫取地方政权。再则各地方士绅巨商藉购军械借外债办“洋务”而自肥，渐渐觉着自己的力量；不但此种畸形发展表面上增加地方“实力”，使能剜肉补疮支持新增的兵饷；而且巨商及官僚的“资产阶级”，也学会了借咨议局或新式督抚和清廷捣乱，欲自护“利权”，往往利用武人反而自缚。三则交通事业，过量的开发：——骤然勾通国内的茅塞毁坏对外的“长城”，真的资产阶级也未免更受外力的大触动而开始发展；国外的富商要求国家富强而资助革命党，国内的商人初步发展便很觉着外货的侵占；各省经济生活虽日在勾通，而畛域尚未能全泯，资产阶级受此交通先时开发的影响而偏向商业发展，组织生产的能力尚非常之小；于是因他们反对专制而久伏的动机骤发，既发而力又太小不足管理国家，——不得不随地“请”个武人“保护安宁秩序”。当时此种资产阶级发展的程度，本不能发生什么民主共和的运动。所以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对满清的动机，发于间接的恨帝国主义者多，而起于要求民权者少。辛亥革命为反抗满清及列强之双方的民族主义革命，当初是一部分失志的官僚资产阶级，利用此民族主义的国内平民及国外侨商，起而反抗在朝的官僚资产阶级；——其结果，平民受欺，侨商被摈；而袁世凯等更利用此自私的新官僚资产阶级，遂成军阀统治。当初是反对铁路“官”有，反对

大借款，反对帝国主义；其结果——铁路及借款运动仍旧失败，反而断送关盐管理权于外人，国债增加几十倍，帝国主义的势力反因此而大增。

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其为“辛亥革命”，中国之所以成其为“中华民国”，——真是历史的必要！

三

（此节各表，西南诸省五六七的三年都缺，当注意）

交通事业既徇帝国主义之私而先时开发，外国资本之影响所至，摇动宗法社会之经济基础，而于农业为尤甚。荒地之增加最足表其政治上（内乱）经济，经济上（投货）的恶果（表一）。再则因此种种而乡农荒于耕种，不能加肥，地力日低；向来中国最重要的食品之每

第 一 表

民国三年	荒地	358，235，867亩
四年	荒地	404，369，943
五年	荒地	•390，363，021
六年	荒地	•924，583，899
七年	荒地	•848，925，748

第 二 表

每亩收获量平均数

	米	麦	豆
	石	石	石
民国三年	3.692?	0.942	0.717
四年	5.158?	0.951	0.720
五年	2.180	0.883	0.563
六年	2.188	0.642	0.719
七年	1.664	0.648	0.753

亩收获量跌得非常之利害。豆虽然好些而又要输出（表二）。全国总共只有一·三一四·四七二·一九〇亩，荒者亦占八四八·九三五·七四八亩，本可逐渐开垦，而无如农民因食粮年益少收，物价反日益昂贵，往往弃田不种。自有十亩以上的农户无不逐年减少；而且自民国六年至七年一年之间农户总数减少二百九十余万户（尚当除去西南二三省；）农民的受兼并破产失地的景况真正可怕。帝国主义所当有好影响于农业的，当推棉田桑田茶田，因其为中国输出品之大宗，或为原料或与制造品有关的，——尚且因有其他殖民地，或农业国之竞争，也不能兴盛。再则官僚巨商剥削内地农民，都移资垦殖内蒙古，——农业中畸形的不相洽调的状态日益显露。一加以政治上的总原因，一总不能发达。中国为国际的殖民地，列强你牵我拉，弄成关税协定，门户开放的局面，战祸连年，无可用其保护奖励政策，——所以结果如此悲惨！

农产制造品如糖烟酒等，其制造户数逐渐减少为通则，制造人数减少亦是通则，手工业者

烟失业日多，由此可见。因有外货竞争，每年所制出品的总数量总价值，也都年年低落。唯的则价值略增加而已；但烟因加税且为奢侈品，故输入相竞尚能支持。油本为出口大宗，出口仍日增，而出产总额不见多（表三）。中国自己消费者的命运如何？

第三表

油类累年比较

	制造户数	职工数	数量	价额	输出数量	输出价额
民元	299,671	1,319,090	16,072,720,623斤	164,450,027元	1,836,929斤	28,011,223元
二	122,787	667,073	?	144,676,303	2,014,503	25,745,287
三	147,774	576,188	898,449,849	127,581,157	1,827,724	28,948,386
四	247,774	1,350,883	7,847,731,319	189,090,304	2,307,834	31,269,660
五	122,927	446,369	910,552,742	180,095,098	3,566,230	53,383,111
六	102,340	332,901	4,582,723,177	193,990,248	3,529,5725	3,142,6990
七	92,741,	357,184	905,483,265	132,283,319	4,085,782	72,565,196

此等实业，统计表皆注“户”数，系规模很小的工场。至于新式都市生活中所须货物，却与此旧有手工业的命运相异。然都市生活发展，农村却落后无力追及，亦是自然之现象。中国资产阶级幼稚，不但不能进而大有改革于农业，并批发定货等组织方法亦极不完备；农村如此落后也就难怪，都市生活所日常需用，或日益发推广途的货物，如纸，砖瓦，火柴等，有的能支持原状，仅见停滞，或遇竞争而时起时落；有的因需要甚多，暂时外货不能供给，遂得略略发展，（表四）。然大小悬殊，国货与外货竞争虽能里面偶胜，而一切稍精的材料又往

第四表

火柴累年比较

	制造户数	职工数	产品总额
民元	898	11，352	5，048，469
二	731	13，615	2，961，147
三	621	13，308	3，407，700
四	482	91，685	23，309，816
五	353	89，157	27，716，905
六	337	88，072	37，863，823
七	316	74，519	29，384，020

往须向外国采取，为所操纵。其实自己有原料，反待运出后制就熟货再输入，——此种现象是中国工业中的常态，火柴等类乃是新学“西洋式”的消费品，所以原料一半仰给外人而已。况此类工场之外，已有较大的工厂（未列入表）与之竞争，所以工人确有集中的趋势。

本来此种发展仅是最初期一小部分现象，若是经过帝国主义层层开辟，交通十分便利，再加以协定关税，中国手工业及小工业只有日就衰落。况且以全体而论，中国之小工业及手工业，自辛亥革命添了国外公债重税之后，——凡与宗法旧社会或小农关系较密切不能适应竞进者，无不一趋于衰落。中国资本主义之出世便受欧美大生产的拥推挤轧，——资本集中工力集中的趋势，当非常之速。若资本稍微薄的，就不能久持。较之西欧资本主义的途程大异。所以小工业若仅顾小地方，不与外货竞争的，——甚至仅及于乡村外县，于帝国主义因居民购买力尚低不用侵入之处，——去专卖劣下廉价的货物，反而容易维持。否则便要有规模很大工业。汽机生产，方足以试与外货竞争，农业中整理改良原料的企业亦是如此，——那半大不小的新式农场，敌不过外国人几万万元的大批发，可以收括两三省小农的原料；小规模的农场成本反贵，所获“不痛不痒”——又不够干大生意，又划不来干小生意！——然而始终比在工业之中与外国资本相斗，要容易些，——农业之中只有互竞，而且战广较广，外货必系工业品居多而农业品较少，止少于最初一期必是如此。况且此少数之农场在中国小农经济之大海中不过一粟而已。

第 五 表

	农业			工业			商业		
	公司数	资本金	公积金	公司数	资本金	公积金	公司数	资本金	公积金
民元	171	6,351,672	15,163	531	54,808,202	1,623,108	131	13,427,249	25,500
二	142	6,009,962	31,030	565	49,875,160	1,857,303	151	7,695,998	230,715
三	129	4,960,209	24,190	641	62,108,208	956,132	201	11,688,830	532,177
四	129	8,241,075	44,375	644	106,001,214	2,257,670	202	17,957,880	5,058,835
五	133	9,791,489	43,873	585	132,779,808	3,374,793	225	20,579,181	2,018,081
六	132	10,663,456	35,373	557	128,243,723	2,880,559	169	22,347,384	962,279
七	101	9,498,309	34,155	533	108,902,811	4,226,769	150	22,043,645	1,307,560

第六表

公司资本别累年比较

次年	一万元未满 公司数	已缴资本金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未满 公司数	已缴资本金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未满 公司数	已缴资本金	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未满 公司数	已缴资本金
民国元年	522	1,571,377	241	4,830,102	68	4,310,897	60	7,170,480
民国二年	500	1,537,785	294	5,697,936	68	3,954,890	55	6,960,481
民国三年	551	1,489,260	305	6,471,887	85	5,308,769	73	9,084,220
民国四年	476	1,433,361	359	7,547,703	86	5,358,764	90	11,173,661
民国五年	445	1,305,784	302	6,502,626	111	6,719,893	88	11,271,280
民国六年	387	1,190,584	305	6,753,755	112	6,995,909	79	9,854,550
民国七年	378	1,092,562	275	5,627,879	86	5,389,184	79	9,791,720

	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未满 公司数	已缴资本金	五十万元以上百万元未满 公司数	已缴资本金	一百万元以上 公司数	已缴资本金	计 公司数	已缴资本金
民国元年	49	15,192,200	12	8,614,022	25	69,201,655	977	110,890,781
民国二年	42	13,316,100	17	11,421,870	16	43,529,006	992	86,364,008
民国三年	55	16,085,110	19	12,149,798	22	39,933,128	1,110	90,522172
民国四年	67	19,617,283	23	14,498,276	26	101,856,153	1,127	161,490,263
民国五年	34	28,145,166	21	14,192,641	38	123,331,620	*1,090	*186,469,210
民国六年	76	51,528,017	29	19,036,707	36	126,236,071	*1,024	*191,595,593
民国七年	78	21,226,234	27	17,791,546	33	101,213,359	*956	*162,132,484

第 七 表

工厂职工 别累年比校

年次	七人以上卅人未满	三十人以上五十人未满	五十人以上百人未满	百人以上五百人未满	五百人以上千人未满	千人以上	计
民国元年	18212	990	798	514	181	54	20749
民国二年	18830	1145	833	726	145	33	21712
民国三年	17447	1187	869	543	191	47	20259
民国四年	17874	1172	866	618	176	40	20740
民国五年	14408	1090	768	607	160	45	•17087
民国六年	13076	1176	667	589	179	49	•15736
民国七年	11945	1047	720	491	122	49	•14374

观上列三表可见：一，企业中资本的集中程度已经很高，一民国七年三十三个一百万资本以上的公司总共有已缴资本金一万零一百万元余，占九百五十六个公司共有资本总数之百分之六十以上（表六）；二，一百工人以下的工厂逐年减少，——工力的集中很快（表七）；三，商业公司的公积金增加之速度远过于农工业，其公积金与资本金的比例数也远远于农工业（表五）；四，大企业的发展较小企业（上述的手工业小工业等）为稳定，资本集中之总过程非常明瞭。

列强资本主义先入中国市场，然后才发生中国的资本主义。真正大工业在中国可以说绝无；处于如此强大的世界资本之政治的经济的箝制之下，方当做世界资本的销货市场及原料之来源，工业如何能发展！然而资本集中律仍极准确的发露于国内经济界。正足以见其竭蹶争先的苦况，不足以言乐观。况且这还不是能抵御帝国主义的力量，仅仅能压倒国内小资本家而已。此中工业资本在帝国主义所占据的中国市场里，不过沧海一粟，对于国民经济中之生产，所能有的价值还很轻微。却是商业资本，数量上虽比工业资本小（亦仅在大企业中），而他的作用却比工业资本大。工业资本在中国要能起而与外国资本对抗不是轻容易的事。(民国七年之间据统计每年纺织工厂出品虽稍有增加，然始终不过五千几百万元；而外国棉织物的输入总在一万万之以上）。商业资本因无强大的国内工业，他所经营不是批发外货，就是趸买原料以供外国资本主义；他这种大商资本或者很要加入工业，但因外货占据市场，不得入手，况且中国商业，在帝国主义之下做中介人，利润高于工业。同时他又能结合联络全国小商小农，（比要实力组织大规模生产容易得多）；而且能牵动全国经济的脉络，令地方的小商业亦随之发展。然而大商接近帝国主义，依赖他的"提拔"，资本流通能周转得很裕余。每年海关输出输入总额的增加足见此商业资本的中介作用，——早已促起内地小商阶级搜抓全国，力谋自肥，实际上呢，每年输入超过的亏损只能落在小商阶级，而大商阶级资财较厚，周转较大，难得吃亏。小商受亏又即转嫁之于消费者。国内的商业资产阶级之外，还有国外的商业资产阶级，应当特别注意的。侨商的发展其经济力，比较的与西欧最初的商业资本相似，——所不同者，乃在于他出国"觅富"时，却已遇着世界先进的资本主义；再则国内市场已为帝国主义所开辟，轮不到他发财后再回来组织生产而渐进于工业资本。虽然如此，他没有染着内地资产阶级初发展时的官僚色彩，究竟经济实力较高一筹。民国七年统计，华侨商会会员总数二万一千余人，而商会收入总额有三十万余元。国内商会会员十六万二千余人，而

收入总额只有一百五十余万。可见侨商的富力强于国内商人。他们直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统辖，民族的觉悟也胜于国内商人。

第　八　表

	银行数(总行)	已缴资本金		钱业户数	资本金总额
民元	50	36,254,919	民元	4,611	75,098,313
二	44	27,301,526	二	4,761	86,628,664
三	59	19,726,716	三	4,491	53,110,635
四	48	24,136,426	四	4,274	64,463,021
五	48	37,803,690	五	3,424	246,229,262
六	58	46,072,611	六	3,186	171,457,373
七	60	34,685,195	七	3,053	169,329,736

虽然，国内小商阶级既有相当的发展，旧时的信托事业，亦必随之而益盛。他的收集国内资本，——既深入内地，供给小商业，各就其小范围内运用，——比新式银行之收集国内资本反而中信用反而好，且发行纸币额亦很多，是证国内市场之渐扩大；并且资本日增而钱庄日减，资本集中的现象亦明显。可见真正中国自己的资产阶级确在"资本之最初积累"过程中。新式银行的资本，应欧洲式都市生活之需要而起，然实不能周转于全国的大市场，更不能供给工业，只能利用分行经营商业投资，吸取官僚的存款；其中一部分，则专营投机事业，买空卖空；甚至于以政治官职为投机目标。在各省会等处，便造成地方的财阀，勾串军阀，在中央便包办政治性质的内债，作政治的投资。其实此种"财政资本"大半与以前的官僚资本及现时的军阀有关系。他们"部分的营业"常带有政治色彩，所以信用不振而仍在争相开张，——历年此等银行之资本总数并不增加而行数反日益加多。(表八)；然而总观起来银行业既不发达，而钱业规模尚甚小，零星散漫得不堪。

综观上述，可见：一，小农破产失地；特种农产原料稍有发展；大农经营已开始。二，旧式手工业衰落；新式手工业虽有集中发展的趋势，而艰苦于竭蹶争先。三，工业虽日趋集中而发达有限。四，小商业发展而渐受操纵于大商，失其独立；大商业发展最速，然亦更依赖于外国资本；国外侨商却较国内商人更发展。五，旧式信托事业集中发展，而新式银行事业富于投机性质。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是如此。此种发展之特性，乘最初一期之流毒，乃在于：一，商业偏畸的发达，工业进步速度的较缓；二，手工业中的兼并，农民的破产与工厂吸收工人的能量相差太远；三，生产事业如此之困厄，不生产事业如此之过度发展，弄得有"资本"而无生产；四，此三种不调谐的现象使"多余的"资本作政治投机，使"多余的"工力变成兵匪。于是不但军阀统治愈稳固，而且更促成内乱战争，——战争回转来又影响及于经济，转辗不已，而生产事业更衰落。再则帝国主义于此期中又更侧重于财政权的攫取，暗助内乱以遏中国的生机，——于经济竞争之外助以政治手段，——因此中国革命后之政治现象当然紊乱不堪。

虽然如此，上列各统计表中民国四五六七年工业及手工业部分的发达正在欧战期间，——元年至三年却仅见衰落，——这是一大关键。欧战起于殖民地问题，帝国主义因争殖民地而战，却令殖民地偷得发展之机会，所以中国虽处于如此窘迫扰乱之下，那几年仍见发展。

四

欧战既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创钜痛深，弄得欧洲经济糟不可言。战中得利的只有美国日本，其次就是英国。他们正要恢复其经济的威权于中国，——现时唯一可能的市场。中国工业既在欧战期间稍有发达，而战后不久就遇着更强的经济侵略。于是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之间渐起剧烈的斗争。

东南大学农科的王善佺说：

出口棉花			进口棉花		
年	担	关银	年	担	关银
1912	305,711	17,021,093	1912	279,193	6,179,852
1913	738,812	16,735,604	1913	134,735	3,017,318
1914	659,704	12,889,549	1914	126,488	2,872,118
1915	725,955	13,700,496	1915	364,300	6,651,841
1916	851,037	17,091,073	1916	407,644	8,068,790
1917	832,463	20,035,862	1917	360,128	6,406,224
1918	1,292,094	37,887,337	1918	190,110	6,070,517
1919	1,072,040	30,253,447	1919	239,003	6,499,073
1920	376,230	9,224,512	1920	678,297	17,993,170
1921	609,481	16,483,000	1921	1,982,526	35,867,000

"观上表而知(一)吾国棉花不敷本国纱厂之用。甚至有一百六十余万担由印度及美国输入。(二)进口棉花逐年增加。迄今超过出口棉花一百余万檐。约合二千万两。以今后之趋势观之。将来中外纱厂逐年增加锭数。则需给尤不止此。然目下各纺厂已感棉花缺乏昂贵之苦。而营业上大受妨害矣。

夫纱织事业为吾国唯一之实业。自民国六年至今。锭数由七十万突增至二百万。资产由二三千万突增至一万万两。欲抵塞每年棉货进口价值二万万两之漏卮。胥赖纺织斯业之发达。而今纱厂营业挫折。至于减工停工。棉荒实其最大原因。是诚实业最大之危机也。今者政府有禁棉出口之议。此举不过图补救目前。但有外交上条约之关系。或未必可以实行。……现时吾国纱厂，因人工及营业之关系，多纺粗纱。但将来必趋于纺细纱之一途。据纺织专家陆辅舟之推算。吾国今日欲言纱布自给问题，至少须增锭数至四百万枚。其中五十万包纱为细纱。须用改良棉一百七十五万担。惟细纱之原料吾国最为缺乏。现时仰给于美国。自民国九年以来，美国棉输入突增。由数万担一跃而至五十余万担。此亟宜设法补救者也。……"

于此可见纱厂挫拆一面由于外货重复增加引起中国幼稚工业的恐慌，——每年还有四百万锭以上的纱输入；一面因中国工业技术之低而逼得购外国原料，——粗纱的原料输出，而细纱的原料输入。同时还有外交上的压迫。中国工业独立充分的发展，那有可能！况且战后中国农工业中，都要遇着世界资本的"困兽之死斗"。美国移殖资本于中国的欲望最高。中国不生产的资本正须移入生产事业；却又遇帝国主义勾结官僚资本提倡中美合办，中英合办，中

日合办等把戏。

战后工业之中既起如此的变化，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遇见非常之大的障碍。于是中国经济之反抗外国资本，必不可免。中国经济的独立必须发达工业及大农经济，消灭商业偏畸发展之现象，得达此目的必须政治的独立。

五

中国实业要求发展而抗帝国主义，既必须有政治的独立；如今再一察能争此“独立”的社会力量。——此等力量亦正养成于资产阶级发展之中。

军阀财阀（官僚资本）勾结帝国主义，扰乱经济，为资产阶级的发展之直接障碍，当然不能为中国争独立解放。资产阶级之中，大商阶级依赖外国资本，每每易于妥协，或者想望一个军阀来统一太平，以应其经济需要，或者竟想利用外国势力驱逐军阀；海外侨商则受外国直接压迫，比较的革命些；至于小商人虽然能力太小，却因所谓“国货”的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很普遍；新兴的工业阶级亦必被逼而不得不反抗。劳动阶级之中，农民处于半自然经济的社会里，虽然日渐破产困苦颠连，而自己不见仇敌，始终有郁勃不平的倾向；无产阶级因商业交通偏颇的发展，运输工人居多，其中一部分仅是苦力搬运夫，没有受大工业的组织训练；手工业小工业居多，工业中的无产阶级很少很幼稚，大半不脱宗法社会思想的遗毒；然而始终有一部分：铁路工人，矿山工人，纺织工人，海员等，直接与官僚军阀冲突，感觉帝国主义压迫最甚，而亦最易组织。——此中凡能反抗帝国主义的势力，自然倾向于联合，起而颠覆帝国主义。

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导源于帝国主义的侵入，亦就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这些对抗力之中，劳动阶级固然因中国资产发展的种种特性而尚弱，现时只有民族主义的觉悟；然而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外国资本的侵略却正在日益加紧，自然而然促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劳动阶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步，在中国现时经济状况之下，只能表示于民族主义运动之中；然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更非有劳动阶级的革命行动不能成功。此“最后之市场”——中国，若能奋起，世界帝国主义必受非常之打击，而世界社会革命乃不得不爆发。

（选自《前锋》第1期）

中国农民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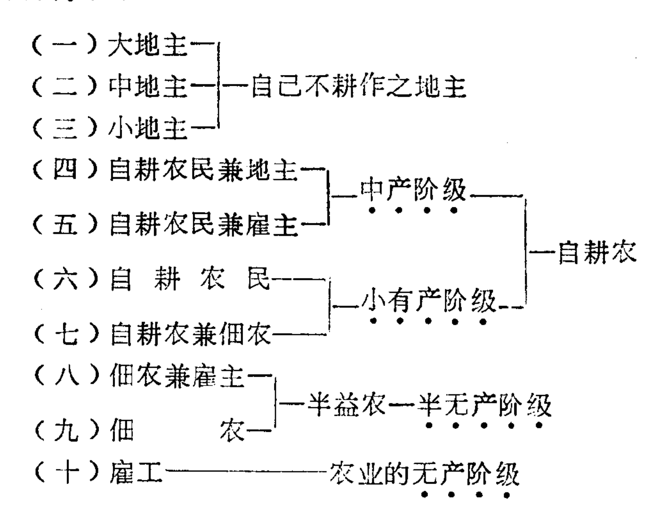
陈 独 秀

（一）

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在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有些自耕农居多数而且是小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象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利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然所受外货侵入生活困难及贪官劣绅军阀灾荒之痛苦，往往也能激起他们的群众运动；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倒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

（二）

中国人口约六千余万户，而农民有四千万户以上，是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俄国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日本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即此人数上看起来，我们应感其重要。此农民大群众，其经济生活程度虽非稍差甚远，而经济地位则有几多复杂之区别，兹将地主与农民略分为十等如左表：



有地过万亩之大地主，在全中国每省不过十人左右，此等大地主少数是前清贵族，大多数是旧官僚或新军阀，他们对于佃农有很大的威权；股分公司居极少数，因为旧法耕地之利润远不及工商业，故城市的资本家多不肯投资经营农业。

有地过千亩之中等地主，全国至少在二三万以上，他们半居乡村，半居城市，有的是在城市兼营小工商业者，有的是官僚后裔之无职者，专恃收取地租维持生活。其居乡村者，或为绅董把持乡村之政权，或为高利营业盘剥贫农。

有地过百亩之小地主，其数至少十倍于中等地主，他们大多数居住乡村，其职业或在乡镇经营小商业，或在乡村为绅董。

最大多数之农民，非自耕农即佃农，据民国七年农商部统计如左：

农户总数	四三，九三五，四七八·
自耕户数	二三，三八一，二〇〇·
佃农户数	一一，三〇七，四三二·
自耕兼佃	九，二四六，八四三·

依此统计，自耕农民之数多过佃农一倍，其中相差最甚者，为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则相差极微。

自耕农民中有兼为地主者，是一家族人少而地多，除自耕外尚有余地租给别人耕种，一方面是自耕的农民，一方面又是收租的地主，此种农民为数不多。自耕农民中有兼为雇主者，是一家族自耕自地而劳动力不足，雇用别人帮忙，此种农民为数甚多。此二种农民，不独占有地土权，无向地主缴纳地租之义务，而且得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掠夺他人之剩余劳动，其生产物不仅供给一家生活及农作上的需要，并且，至少在丰年时可以获得盈余，变成初步积累的资本，是以此种农民应属之中产阶级。

纯粹自耕自地之农民，为数亦不少，其所种之地则甚少。其自耕兼佃农，则因一家族人多而地少，除自地自耕外，又不得不向地主租地耕种，此种农民为数不多。此二种农民，无非半益农，得全收其劳动所得之利益，而无掠夺他人劳动力之机会，虽丰年亦难有多量之盈余以为积累；只以完全占有地土所有权，生产工具及生产物所有权，应属之小有产阶级。

佃农兼雇主，是向地主，租地耕种而劳动力不足，雇用别人帮忙者；纯粹佃农，乃由一家族任工作不雇用他人者。此二种农民人数略相等，其中又分二等：（一）纯粹无地权者，地主随时可向佃农收回其租出之耕地，（二）半有地权者，佃农曾出等于当时地价半值之金额向地主租得耕地，其后能以同等金额或较少之金额辗转租给别人耕种，原地主只能向现时耕地之佃农收取地租，除出资购回此半佃权外，不能自由收回耕地另给别人耕种。佃农们租地时，须向地主缴纳押租金（或名羁庄，退租时可以收回）每亩约一元左右；耕种时须自备生产工具（牛农具食粮等）；所得生产物须缴纳一部分与地主，缴纳之方法，或预约一定之额租（或名铁租），无论收成丰歉不得短少，或每年按收成丰歉临时议租；缴纳之数量，至少须在收获物三分之一以上。佃农住屋多随地租得，退租时须退还地主。地主对于佃农甚尊严，大地主尤甚，有"东佃如父子"之谚。此等农民既不能掠夺他人，又为地主所掠夺，不能全收劳其动所得之利益，丰年尚可勉强供给一家生活及农作上的需要，荒歉时则衣食且不足，又加以地主追缴租课，不胜其困苦，因此每年秋收时，各地佃农罢租讼案往往占各种讼案平均百分之三十以上。但此种半益农，虽不占有地权或只占有半地权，然仍占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之一部分生产物，故应属之半无产阶级。

雇工是各种农民出一定工资雇用他们做工者，此种雇工分成人及童工两类，和长工及短工两种办法；长工以年计，每年工资由二十元至四十元不等，短工以下种或收获时短期间计算，工资略高；童工专事牧牛及零碎轻工作，每年工资不过数元；惟各种雇工的火食均由雇主供给，且间有供给衣服者，长工多给以住所，短工则不然。此种雇工，倘不失业，其生活费反较佃农稳固；惟其不但无地权，而且没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生产物之权，纯粹是被雇者，各种农民中，只有他们是无产阶级。

以上七种农民中，后三种（佃农兼雇主，佃农，雇工，）都是无地的农民，在全国农民总数中约占百分之四十，人数当在九千万以上；因为自耕农民虽多过佃农一倍，而加上雇工，无地者人数纵不能与有地者相等，当亦不至相差甚远。

各种农民所占地均甚少，此时不但无集中的倾向，而且有分小的倾向，据农商部之统计，农民耕地多寡别，民国六年七年比较如左表：

	十亩未满者	十亩以上者	三十亩以上者	五十亩以上者	百亩以上者
民六	一七，八〇五，一二五·	一三，二四八，四七四·	一〇，一二二，二一四·	五，三四八，三一四·	二，八三五四六四·
民七	一七，九一四，二三一·	一一，三〇三，五七〇·	六，七一二，三六六·	四，一三七，一三六·	二，二七八，三五五·

（三）

中国农民之痛苦计如下诸端：

（一）一般农民之痛苦

a.外货输入之结果，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高率，因此自耕农民多卖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改业往城市为苦力，沿海者则移住海外，多数则流为兵匪，此为中国目前兵祸匪祸之一大原因。

b.政治不良之结果，军阀战争及水旱灾荒，也都是使农民困苦失业流为兵匪之一大原因。

合上列二个原因，农民失业者之日渐增多，可以农商部各项统计证明之：

其中增加最巨者，第一是黑龙江省，由民国三年一万六千六百余万亩，民国七年增至六万八千七百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二是广西省，由民三四百余万亩，民七增至一千四百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三是奉天省，由八百九十余万亩，增至一千七百余万亩，多属官有地；第四是湖北省，由四十八万余亩，增至三百八十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五是山西省，由二百二十余万增至四百五十余万亩，多属私有地。

1. 耕地减少亩数

民　三	一，五七八，三四七，九二五·
民　七	一，三一四，四七二，一九〇·

2. 被灾亩数

民　三	六五三，四七五，四四五·
民　七	六一，七一七，一一三·

以直隶山东江苏三省最甚。

3. 荒地增加亩数

民　三	三五八，二三五，八六七·
民　七	八四八，九三五，七四八·

4. 农户减少数

民　三	五九，四〇二，三一五·
民　七	四三，九三五·四七八·

据此表，民国三年至民国七年，四年之间，全国农民减少了一千五百万户以上，其中失业之农民必有可惊之数！其中减少最巨者为湖南陕西二省，此为战乱之影响；其次则为浙江山西江苏等省，苏浙为都市工业发达之结果，独山西省工业既未发达，又无战乱灾荒之影响，农户何以减小，岂是模范省缘故？

c.农民文化过低，又无组织之结果，地主绅董们，把持乡村政权，鱼肉贫农，两者时生冲突。

（二）自耕农之痛苦

官吏舞弊额外需索及预征钱粮使地税无形增加，荒歉时自耕农无力缴纳地税，极感痛苦，往往有聚众“抗粮”“哄堂”之举，农民暴动几全属此数。

（三）佃农及雇工之痛苦

a.兵匪扰乱及水旱灾荒使农民大为移动，所移住地外来农民之增加超过需要时，同业间发生竞争，遂使地主雇主们对于佃农雇工所要求之条件日益苛刻。

b.因城市物价及生活费日益增高，地主们对于佃农之需索随之日益加紧。

c.以上述种种压迫之结果，农民因衣食不足及农作上的需要，尤其是春夏间青黄不接时，不得不出于借贷，于是高利盘剥者或地主，乃乘机以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百的利息，吸取贫农之血汗，此项痛苦以无地之佃农为最普遍而且特甚。

（四）

欲解除此等痛苦，且引导其加入国民运动，应依各地情状采用下列方法：

（一）教育及宣传　教育以农暇时授以文字（应注意注音字母的传布）及世界大势。宣传以“排斥外力”打倒军阀“限田”“限租”“推翻贪官劣绅”口号（最好是携带影灯的巡回讲演）。

（二）组织及实际运动　组织有四种：

a.农会　小农中国之农民，他们各阶级间无显明的分化，此时全乡村各种农民(自耕农，佃农，雇工，)可就其共同利害之点，联合为一个组织。各地旧有农会虽有法律的地位，而组织之分子多非农民，今应鼓吹真正农民改造之，以反对横征暴敛之官吏，压迫佃农之大地主及鱼肉贫农包办选举之劣绅为对象；以“组织消费协社”“组织农民借贷机关”“组织谷价公议机关”等为实际运动。

b.乡自治公所　此亦系旧有的地方政治组织，南方各省尤正在进行，在此组织中应以组织乡团抵御兵匪，改良水利，要求“县长民选”为主要运动。

c.佃农协会　以向政府要求“限田”（限制私有地权在若干亩以内，即以此等大地主中地主等限外之地权分给耕种该地之佃农。）“限租”（每年应纳地主之租额，由各农村佃农协会按收成丰歉自定之。）为佃农特有之运动。

d.雇农协会　以协议工资及介绍工作为主要任务。

（选自《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出版）

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

孙　铎

十二年之前中国革命推翻满清创立共和。少数同盟会会员居然能把满清统治推倒，因当时中国社会的封建人物已和革命运动的领袖携手，而这班封建人物在南京和议之后实际上成为所谓中国"革命"的领袖。当袁世凯得到了政权的时候，实际上中国的状况不能有何改变，已是明明白白了，不过管理国政的权从封建的满清移转到封建的汉人而已。激进的智识阶级虽然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意志推进了革命，然而没有一点实在的势力；革命亦实在没有什么重要变更。革命运动一直是一种秘密阴谋的运动。有革命思想的政治家从未做有力的宣传，宣传他们的主义，他们只是秘密组织军事来帮助革命，做这事他们得着海外华侨中资产阶级份子的金钱援助。

经济上面这革命的结果是什么？农民状况没有激烈的变更，运输制度的进步反而停滞，在革命运动背后的中国富人没有集中他们的力量，来发展大规模的工业。只在近几年来受了大战的影响工业才有机会到中国来。资产阶级的华侨看得很明白，革命没有造成新的政治状况，使他们能在国内投资。他们从发财的地方回到中国，仍须到受外国管辖的地方，——租界商港，设立银行，安置产业，来开发实业如纺织业等。

政治上面说来，推翻满清，并未能造成一个强大的中国。袁世凯当权一日，他就可以用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来打破那破坏他的人。我们知道袁世凯虽然是封建中国的代表，但在中国资产阶级中很得到他们的信仰和敬重。因为袁世凯的专制在几年之中能打倒革命所造成的新机关，能平定各地叛乱，能剿灭土匪，使他们平安做商意。我们知道帮助袁世凯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完全不知道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已比在满清时代强大了多。辛亥没有能建设中华共和。革命甚至于没有影响到人民的大部分。中国辛亥革命真可和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比美。德国亦是革命后仍旧是以前的同一个阶级统治着。德国亦是革命不能造成一种新力量和外国帝国主义奋斗，大战之后外国帝国主义奴隶德国。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就和中国的革命相反！俄国革命把俄国造成一新俄罗斯，虽然因为内部的大改革受了许多苦，但是确已发展一种能力，足以抵抗列强的一切干涉。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我们的确可以看见有少数领袖和他们的同志的热忱和牺牲，但是我们不能看见群众的革命热忱，及其创造的伟力。

在封建制度之下，中国的普通状况更比满清时代要坏。专制魔王袁世凯死之后国内战争没有一时停过。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军阀同谋合作制造土匪；土匪骚扰，甚至于抢掳外人，于是帝国主义又借此扩张其管理中国的势力；然而土匪的破坏始终害及军阀及列强的自身。——却也很难说，这种列强奴隶中国人民日益厉害的状况之下，中国国民革命的精神就能增长。固然，我们有时也偶而看见国民爱国感情的爆发——例如凡尔赛和议时候，诱中国参战的协约国，一再欺骗中国，居然也引起了五四运动。然而这些暴发不能久持，甚至不能造成一个保护国家独立的团体。今年反对袁世凯时代的遗毒之日本二十一条的运动之中，就可以看出来并没有

完全的国民爱国精神。中国加入欧战就是外国教育奴隶中国智识阶级的结果。外国势力宰制中国的一种最坏的形式，就是外国人在中国教育上的影响。当在欧战之中，英美为自己的目的要中国加入反对德国，于是一班受英国教育的中国学者变成了英美帝国主义者的走狗，错过中国能在自己解放上可有极大进步的机会。中国反和那班对于我国最危险的帝国主义者携手。在反对日本的运动中，我们又看见英美帝国主义的魂，例如上海的大示威运动要通电列强请主持“公道”反对日本。就在排日运动中，北京发见精神上被外国教育所奴隶的教会学生反对中俄密切关系的要求，其实中俄密切关系，是抵御外国统治的唯一可能。

美国帝国主义企图英美日法对于掠夺远东各国订立协约，中国反对美国这种企图的运动在那里？上海包探虐待乐志华，这是英美式的文化，对于这件事中国人民有什么举动？对于这件事，宁波同乡会曾很活动，但是这能不能算中国民族精神的暴发？中国报纸对于临城案件的态度是如何可怜？中国新闻记者竟屈膝于外国侵掠者之前，其实外国侵掠者比北方军阀（他们的机械）对于临城案还要多负点责，——这种“舆论”对于中国是如何可耻呵？中国资产阶级的团体请求外国公使来解决中国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国耻？这是不是象引狼入羊群呢？上海的资产阶级开会请美国公使休门演说救济中国的方法，同时这位公使利用中国的“门户开放”以备美国军队的活动，试问中国资产阶级可怜不可怜？

中国的爱国精神的确是十分薄弱。我们还没有说到中国人民的真正群众，中国农民。我们只说了中国资产阶级，中国学生，中国政治家。如果中国人民群众没有受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中国民族决不能成一种势力。休门对上海商人说，商人应当做政治上活动。反对封建式的军阀的奋斗，中国资产阶级完全没有留意。资产阶级还完全是商业的和财政的资产阶级，只是近几年来才开始从事于实业。富翁式的中国资产阶级经济上思想上都和外国帝国主义结合。因为他们崇拜外国权力，他们牺牲他们的子弟，使他们完全受外国的影响，使他们做外国奴，外国帝国主义者决不要中国资产阶级有爱国的宣传。他们会说中国需要德谟克拉西，法律，秩序的统治。但是他们想管理中国愈久愈好。自然他们的统治决不能永久。然而阻止中国发达一种真正的民族精神可以成一种革命的力量，则有余。

国民运动和亚洲的觉悟

在反对满清的时期民族精神比现时要强。自然我们拿中国人民全体来看，并没有多大分别。但是我们只看智识阶级和资产阶级当然有分别。其理由据说是辛亥革命成功和满清推倒，老革命家的责任已完成，老革命家的勇气已消衰。还有理由是在辛亥革命后和军阀奋斗失掉许多好同志。老革命党常抱怨说今日的青年缺乏兴趣和活动。我们若把中国国民运动的现状来和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比，确是退步。现时有四种最重要的势力能使亚洲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现代资本主义在近四十年来无论何处都显出帝国主义的面目来。欧美工业所积有的资本想在全世界找开拓的地方。开拓一定须有资本主义政府的政治统治的保障。帝国主义增加了资本主义的权力，但是亦增加了资本主义国相互间的冲突。因此有一九一四年的大爆发，世界的大部分都牵入战涡。大战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各国的大家疲乏和得胜各国中间的新冲突。大战成就了俄国的革命，促进了亚洲征服国的国民运动。对于“亚洲觉悟”的行程上最重要的四种势力就是：回教各国，印度和中国的国民运动，以及俄国革命。俄国劳

农的勃兴，苏维埃共和的设立，对于亚洲有莫大的影响。劳农俄国存在一天，就做一天世界帝国主义的劲敌。俄国人民只是永久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侵掠者奋斗才能保存俄国革命的结果。俄国人民用武力抵抗帝国主义者长期的干涉内政，用外交抵抗外国资本家想用和平方法来扑灭革命。苏俄成为被征服民族的天然同盟和反对同一仇敌之民族运动的天然帮助者。所以有远大眼光的被征服民族的革命家不惜艰难跋涉到世界革命中心的莫斯科去。看见革命如何使民众觉悟，——这民众在俄皇时代和克伦斯基执政时代几成外国资本家的奴隶。他们看见了，狠称美俄国，他们狠受了此教训。对于新政府的性质亦了解了，红军的组织亦见着了，所以他们中最明瞭的就知道：要和苏俄携手，和俄国红党结密切的关系，这是巩固他们国内民族运动的唯一的道路。和苏俄结合的实际上的利益可以在土耳其方面看出，土耳其的领袖如泰喇脱，乾玛尔基玛尔能起一种强有力的运动，可以废除塞佛尔条约和造成今日的新土耳其。土耳其的运动自然不是这个领袖所单独能成功的。土耳其重兴的真正力量还在农民的反抗，靠了农民反抗才能成立革命军队，而土耳其的新资产阶级亦能证明他们懂得领导这革命运动的必要。自从大战以来他们所成功的实在伟大。他们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本身亦抵抗英国主义的雇用者。当他们开始运动的时候他们站的地位很坏，君士坦丁的正式政府是在外强掌握之中。旧国教的代表反对激进派而和帝国主义者友善。新的革命军队，是在离首都很远而和苏俄边境接近的地方成立的。土耳其的新资产阶级自然畏惧日益增长的俄国势力，而想和法国帝国主义携手；其实法国只因为要英国赞助他对德国政策，因此对于土耳其表示善意，以相迫逼而已，革命运动的领袖们虽然经过资产阶级份子的阻挠，仍旧种种方面接受苏俄的援助。革命的农民所组成而有极强的爱国精神的新军队，因此才能从恩戈拉打胜仗打到斯莫乃，打到海峡，恢复土耳其在欧洲的地位。在洛桑第一次会议上俄国代表极力赞助土耳其的要求，英国代表柯逊说俄国代争土耳其的地位比土耳其自己还利害。如若我们拿战后土耳其的民族运动和我国比起来，真是要叫我羞死。中国的外交界往往自骄，以为中国有人做国际联盟的主席，还有人被选为国际法院的推事，但是试问对于中国的重兴，有何意义？回教各国的国民运动在近几年来有了极大的进步，印度的革命党势力亦是日长一日。中国国民运动的情形却实在可怜，因此我们不得不找他的原因所在。只有我们自己批评自己，我们才能希望一个激烈的政变。

国民运动和国民党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上的国民运动没有一个好组织的，强有力的，国民党，算什么国民运动？当爱国精神表现的时候，当国民运动发达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辛亥革命的国民党。例如：民国八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很可以举许多例来指出国民党在学生会，商会，和别种团体对列强侮辱中国做示威运动时候，没有能在其中指导和促进。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名字多没有提起。国民党所以不能得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不是没有理由的。

老实说，国民党不能算一个政党。我曾经听见一位北方的著名军阀说：中国没有国民党，只有孙中山党。去年赶跑孙中山，现在做英国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走狗陈炯明亦是同样意见。辛亥革命后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党，但是这党工作的方法还是以前同盟会的办法。一起初

就各地各种人民都加入这革命党，但是这不能说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同盟会的方法就是捐了华侨的款用在军事活动上来推翻满清。说国民党一直是这样做法，并不算夸张。国民党确实有一个建设独立的民主国家的党纲，但是试问对于使人民相信党义，对于因有组织革命宣传去造成一种信奉主义的党员的强大势力，国民党做了什么功夫？

名符其实的革命一定要革命党员有主义的信仰才能发生。百年前的法国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都是这样。真正的革命的成功在先有充分的预备功夫做了把革命精神灌输与人民。国民党的方法一直是用军事行动占据一隅地方以与北方奋争，如此想保存辛亥革命的成功。因为华侨及国民党领袖都和广东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广东常被他们占据活动的地方。

自从国民党被袁世凯打败之后，国民党在本国已存无几。多少辛亥革命后进党的党员都脱离了党，并且许多还帮助北方反动派。他们自然本来就不是革命党，虽然他们做了国民党党员。这次失败的教训不能改变国民党领袖对于党的责务之观念。至于这些领袖是诚实忠心而百折不挠的革命党乃是无疑的。第一次失败之后党规里采取了对于领袖个人的服从，于是与国民党发展而成一近世政治团体的可能，距离愈远了。革命党没有纪律因此不能存在，但是这纪律决不是秘密社会或宗教团体中的纪律。国民党在国外改组了，方法仍是照旧；就是先占据一隅地方，以这地方做和北方军阀奋斗的基础，胜利后于是设立政府，乃时再谈到改良和群众的政治教育，发展军事计划常常要用外交的活动和北方南方的领袖成有一种结合，因此不得不依靠一班无聊的政客议员们。“如果我们没有政治自由和没有我们自己管辖的土地，我们如何能发展革命的宣传呢”？这种辩论常常听见，但是没有一点价值。俄国多数党在俄皇时代何尝有政治自由，他几时疏忽他的宣传工作的？他受了政府的种种虐待，在这种困难时代，他是否仍能组成一强有力的党以完成他的革命工作？因为要占据一隅地方不但把革命的宣传疏忽了，并且不得不用有损于革命党的各种方法。自从国民党回国常常受享外国租界的优待，受了优待自然就不得不付代价。代价就是不能表显国民革命党的真面目；他们势迫去和外国帝国主义者有各种的关系，因此国民党领袖难于宣传，无从发展。因为革命党现在没有自己的真正力量，军事力量完全依靠几个军人的拥护，这些军人比他们所攻击的仇敌不能更有革命性一点。在几多次绝望的军事行动中不知死掉多少好份子，这些人如果用在党的别种工作上面，对于革命事业一定能有更大的成就。有时国民党的领袖占据了一块地方，国民党的地位反比他时更坏。对于党反是一种损失。党里的有用份子都用在占据土地的行政上去了。例如建设杂志，是国民党的顶好宣传品，而因各地方行政的关系把一些编辑先生都叫去了，于是只好停版。国民党的本身亦变成地方性质，党的领袖不得不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关系特别小心，怕他们为难。为这目的所需要的财政常常用违背党义的方法去取得。在这种时候可以说是民党为地方势力牺牲了。记得去年年初预备北伐，陈炯明反对这种计划，主张建设广东模范省。孙中山是全中国的革命党人，当然反对这种主张，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而限于地方改良的工作。但是革命党的权力若只是依附于占据一隅地方，党的革命工作就避免为占据地方利益所牺牲。有许多实例，可以证明这话的不错。国民党在广东的经验使我们很容易找着这样例子。无庸多举，只举一例，当去年孙中山被陈炯明赶到上海，中山在那时中国政治地位上骤然重要起来，比在广东时增高了多。

因为国民党在回国改组之后，只是发展军事和外交活动，所以他不能领导国民运动。从没有开过大会来讨论组织，政治，政策等。在民党领袖的意见，中国革命是纯粹中国的事情，

可以由中国人自己采用封建式的北方军阀的方法来解决的。当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干预中国事情日甚一日，一方面俄国的大变化给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运动以新希望，这个时期中，如何这种观念居然能支配民党，令人难解。能在中国人民中间发展一种革命的主义的结合比借暂时拥戴民党的军阀占据一隅要重得多。十二年来的经验应足以使党的组织法和策略有根本的改革。中国人民决不只是军 人 政 客 而已，这班军人政客今天可以买来拥戴民党领袖，但是明天若有利可图又会把你们卖掉。

国民党的将来

中国的真正革命者的首要职务，就是实现国民革命。世界大战已造成可以完成这职务的情形。广大中国的大仇敌就是外国帝国主义，现在这帝国主义已在衰败的时期中。革命的政党借全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可以成一种绝大势力，这势力决不是封建式的军阀所能抵御。只有用这种宣传才能造成一种真正革命的军队，这种军队一定是远胜于北方军阀的雇佣军队。这种革命宣传同时能减低敌军力量，因为革命思想传到敌军中。我们只以为佣军和军官靠得住，是没有用的。党的职务是要于利用一切政治事情来做教育和宣传的材料。这种宣传尤其是在中国农民和新生的近代劳动阶级中要注意。应设分部支部布满全国，在不可公开的地方亦应秘密组织。地方分部和党的总部应有密切关系。我们应该照印度土耳其国民运动的榜样，应该学俄国革命的教训而在中俄人民中间发生一种强盛同情。苏俄的仇敌亦同是强盛自由的中国之仇敌。

我国的革命如若对于农民没有一点影响有何意义？大半农民的生活状况很坏；穷苦的农民势必当兵或进工厂，没有别种生活方法。我们要想法宣传引导农民来做国民运动，对于工人亦然。如果民党这样整顿，智识阶级中的对主义的热忱一定会重新发展，学生一定重新踊跃加入民党。革命党不能，而北京大学却能做革命思想的中心，这种事实实在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不能再对于一切国民活动和示威运动冷淡，终让别的团体去做，自己反不负责任。我们可以成功一个强大的国民党，他的本质就是领导国民运动，联合国内一切革命势力而在中国人民群众中发展一种强大的民族精神“亚洲觉悟”的进程，殖民地对于帝国主义的奋斗，没有那一种势力可以阻止的俄国革命是给帝国主义者的第一次打击。亚洲各国受尽了外国统治的苦，现在将做攻击世界帝国主义的重要人物，他们民族的重兴，就是推倒帝国主义的军器。中国亦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于三万万印度和一万万回教国人民之上再加四万万中国人。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中国人民很有伟大的质分，是重兴中国的奋斗中所需要的。中国尽有为他们主义牺牲的人，我们想着第一次革命死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想着朱执信，想着京汉路工林祥谦争自由集会权的勇敢，我们决计不至失望。国民党如果采纳新式组织法和新工作方法一定能引导中国人民到真正的独立，到极大的将来，到新的生产制度，这种生产制度可以增加人民的财富并使人民全享受。

（选自《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出版）

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

巨 缘

辛亥革命造成中华民国的，是国民党；历年以来任劳任怨为平民争权利，反对北洋军阀的，也只有国民党。然而人民往往只见国民党主战，以为是扰乱，——宁可就地恭请某某军阀，维持治安，——以致于有现在的局面。国民党的斗争方法或者一时因为人民不与援助，逼得不能不只偏于军事方面，不能不想运用无聊的政客，——结果吃力不讨好，反受人民的漠视。然而国民党的宗旨，国民党的苦衷，经过几十年的苦斗牺牲，至今日已大白于天下。人民的痛苦，人民的受压迫，内内外外不知道有几百重，到现在也应增长了不少见识和政治的经验。因此，为民权而奋斗的国民党已经觉悟，如今决计宣言大改组，号召全国平民来共同组织，共同奋斗：

> 国人急起——反抗英美帝国主义！
> 香港电：谢英伯电美参众两院，谓驻京美使赞助曹锟圆成总统梦；今西南政府收回关余，美使竟声言武力对待，数日间令战舰六艘集珠江，未知是否助曹迫南政府？
> 广州电：昨今两日均开国民大会，争回关税主权，群众赴沙面示威；中华海员公会已发通电；众愤美舰来粤最多，两日大会均提议美货与英货一律抵制。

"凡是爱国的人，都联合起来罢！"

列强侮欺我们——夺取关盐税的管理权，设立租界，割据军港，占领矿山，如今快要攫取全国铁路，置护路军及长江舰队、简直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把中国人变成他们的奴隶牛马。军阀压迫我们——篡窃大总统，伪造宪法，摧残教育，苛征重敛，勾结列强，实行卖国。各省的人民，各界的人民尽着受列强和军阀威逼欺罔，仿佛以为事不关已，绝无动作；等到亲身觉到了痛楚，——小军阀的就地虐杀苛敛，外国人的横暴淫掠，——如只能做漫无组织系统的反抗运动，随起随灭，丝毫没有效果，譬如衡山的农民，水口山的工人，安徽的学生何尝不能反抗；可惜没有全国的政治组织，共同的直接行动，相互间的助力，所以失败。全国的平民呵，大家感受同等的痛苦，大家有共同的敌人，为什么不联合起来？联合起来的第一步，应当赶紧组织国民党，集中我们的政治势力。要知道只有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取得真正的权利。——权利不是天赋的，更不是军阀列强所能赐与的。现在的国民党，便是我们集中势力，运用势力的中心。我们若要脱离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自己建设真正的平民共和国，真正的独立国家，真正能发展自己的经济，——我们必定第一步先要组织平民的政党——我们自己的国民党。

现在这次的国民党改组，恰好有重要的三点：

一，从此平民的政治运动与军事的革命行动并进。

二，从此组织群众的民主式的真正政党，肃清腐败份子。

三，从此实行严格的纪律，作全国有组织有系统的运动，处处时时代表平民而反对军阀和列强。

这正是我们平民自己的国民党；然而要使他能如此，必须我们自己参加。商人，农民，工人，学生，教育界，凡是平民都应当为我们的将来——真正独立自由的中国而奋斗。亲爱的同胞们，快加入国民党罢！以前的国民党，或者有些人怀疑他的组织及行动方法，如今国民党之明确的宗旨，界毅的决心，已经有改组宣言及党纲草案，党章草案表示出来。我们平民自己应当快快的参加，大家尽力来干——建立我们自己的党。否则我们只能做军阀的牛马，列强的奴隶：

"凡是平民都联合起来罢！"

若是我们平民能在这十几年的经验里觉悟到：不能再象从前那样一味的推诿在几个民权运动的领袖身上，自己反在傍边说风凉话，那末，我们便应当积极的加入国民党，共同的实行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才有复苏的希望。只有那时，此次国民党的改组才真是中国民权运动的新纪元。

（选自《向导》49期，1923年12月19日出版）

论 工 人 运 动

中　夏

工人的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在主力的地位，有法兰西俄罗斯两大革命可以证明，我们应毫无疑义了。中国工人的群众有革命的趋向与可能，而且是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有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两大罢工可以证明，我们亦应毫无疑义了。所以我们不欲革命则已，要革命非特别重视工人运动不可。

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因为工人实际生活之压迫，比任何阶级所受的要惨酷，要深刻，故工人决战的毫不逡巡踌躇的态度，亦比任何群众所做的要勇敢，要坚决些。

目前中国因为产业还未发达，新式工业下的工人可统计的只不过六十三万余名，连不可统计的，充其量亦不过一百万名，在数量上看：实在是四万万全人口中的少数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工人数量虽少，工人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实在比任何群众尤为重要。比方海员一罢工，可以使国内外的交通断绝；铁路一罢工，可以使南北的交通断绝；汉冶萍一罢工，可以使国内和日本多数大工厂停业；开滦一罢工，可以使铁路轮船及用户的煤炭蹶竭，洋船都要鳞次栉比的停在秦皇岛，开不出渤海口去，码头工人一罢工，可以使洋货不能登岸；市政工人一罢工，可以使全埠扰乱。这是何等伟大的势力呵，所以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轻视之。况且中国资产阶级虽无力发展实业，外国的资产阶级终会挟其金钱武力来作越俎代庖的事，新式工业下的工人只有日益增多，终归有长成壮大之一日呢。故我们这些真诚做实际活动的革命青年，除做别种群众运动外，尤应特别注重工人运动才是呵。

中国的工人运动，原是最近三年的事；可是在这三年之中，工人却做出不少惊天动地的光荣事业来。如罢工，从香港海员罢工起，到京汉路工罢工止，其间差不多没有那一处那一路那一矿那一厂不罢工，固然罢工之中不少失败，然而胜利的总占多数。如组织，除各业小规模的"工会""工人俱乐部"而外，关于总联合的大组织，海员有"中华海员联合总会"；铁路京汉津浦京奉京绥粤汉正太陇海都有总工会，而且共同企图"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组织了一个筹备委员会。汉冶萍三处联合组织了"汉冶萍总工会"；湖南湖北广东都有"全省工团联合会"。固然组织有些不免幼稚或涣散，然而在中国民族向来缺乏组织性的当中，总算比任何群众团结得结实而热烈，总算是矮子当中的长子。这是何等不可轻侮而可宝贵的革命势力呵！

不幸京汉路失败以后，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总而言之，不论革命的政策为了应付时局的必要而要如何变更，然而工人运动却是任何革命方式之下，应该特别重视而不可变更的。不然，如此革命的基本势力犹不注全力使之更强固，更发展，而漫然高唱什么样式的革命，终归是建屋于

沙土之上，恐怕墙壁未立，屋瓦未覆，已是歪歪斜斜的坍塌了。

固然工人运动为了当前的政治状况，有时进攻，有时保守；如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京汉罢工止，是进攻时期，从京汉罢工失败以后，是保守时期。但是保守是固守阵垒，仍不忘厉兵秣马，静以待时。若阵垒也不固守了，厉兵秣马的工作也抛却了，象这样，不是保守，乃是消灭。我所敬佩负中国革命唯一的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呵，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呵！如此基础已立，功亏一篑的工人运动，你们因稍稍受了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

我可敬畏的青年呵！中国革命的重担，只有由我们一肩挑着。我们固应分队到各种群众中去，特别是工人的群众我们不可轻忽了呵！

（《中国青年》第9期，1923年12月25日出版）

论农民运动

中　夏

我认定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是工人，农民，和兵士，我已把工人运动说过了，现在说农民运动。

中国的经济基础，大家都知道差不多完全是农业，那么，中国农民应该至少要占全国人三分之二，不须统计，我们可毫不犹豫的断定了。这样一个占全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农业群众，在革命运动中不是一个不可轻侮的伟大势力吗？是我们青年革命家所可忽视的吗？

固然农民的思想保守，不如工人之激进，农民的住处散漫，不如工人之集中，在理论上讲，农民革命似乎希望很少；但是我们如从实际上看，中国农民在这样军阀征徭，外资榨取，兵匪扰乱，天灾流行，痞绅鱼肉种种恶劣环境的当中，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离，何时何地不是逼迫他们去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们敢于断定中国农民有革命的可能。

俄国的革命，列宁等得农民的帮助不小；土耳其的革命，基玛尔等得农民的帮助不小。这些为我们眼面前的事实，都可以证明我们的相信和断定没有丝毫的错误。

就是中国向来带兵的，都愿意招募乡间的农民为兵。他们以为只有农民的心地纯洁，性质诚挚，耐劳不偷懒，勇敢不怕死，比口岸上的无业流氓，靠得住得多。曾国藩从练乡团到平洪杨止，和他同辈幕僚说起，必殷殷以募农为兵可靠为嘱。现在高明一点的军阀，如冯玉祥等，亦颇知此义，极其重视这一点。他们这利用农民为他们挣扎高官厚禄的工具，固然是惨无人道，违背公理，但是农民潜藏革命性和有种种特长，已是给他们证明无余了。我们为什么让农民给军阀召募去当炮灰？为什么不唤醒农民为国民自身利益的革命而奋斗？即此一端，可证我们要做农民运动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况且中国农民年来因为上文所述的种种环境中逼迫，发生了不少的抗税罢租的运动。如前年浙江萧山的农民，去年江西萍乡的农民，和最近江西马家村的农民，青岛盐田的农民，广东海丰的农民，湖南衡山的农民，都曾“揭竿而起，挺身而斗，痛快淋漓的把他们潜在的革命性倾泄出来。”他们不仅是敢于反抗，并且进一步而有农会的成立，把散漫的群众都集中在一个组织与指挥之下。这样的知能与勇气，恐怕进步的工人也不能“专美”罢。这些事实，都是在全国报纸上记载得明明白白；当然不是可以捏造得出来的。

由此可证明中国农民已到了要革命醒觉时期了，如果青年们象俄国“沙”时代的知识阶级一样，高呼“到民间去”，为之教育，为之组织，恐怕将来农民运动，比现在完全由农民自动的奋斗，还要来得“有声有色”些罢。

有人说，“中国农民不能和俄国农民相提并论，因为俄国有大地主，实行农奴制度，后来政府虽下令把农民解放了，实际上不过由大地主的锁链中，改套在政府的锁链里，仍然是得不到面包；所以‘彼得格勒’大罢工，农民便全国风动附和着，烧杀地主，捣乱官廨，无处不骚乱暴动了。若中国则不然，想要农民和俄国农民一样的愤激和奋斗，是不可能的，所以希望农民能革命是很难的”。是的，此话不差，但是我要问为什么土耳其亦无农奴制度，却

全国都跟着国民党首领“基玛尔”起来革命，把希腊军队驱渡“君士但丁”海峡，把英法势力排出本国领土以外，把土耳其恢复成整个儿民族独立的国家？所以农民运动对于革命的结果，其方式虽各国有不同，然而农民群众其有裨于革命事业之成功则一。况乎中国虽无农奴制度，然而农民所受经济上政治上的痛苦，既如上文所述的五端，已经够受了，并不比俄土农民所受苦痛的分量还轻呢。

我可敬畏的青年啊：“到民间去”是我们唯一的使命啊！至于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应取的方针，我下次再和诸君一谈罢。

（《中国青年》第11期，1923年12月29日出版）

一九一九——一九二三年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

1919年

3月2日—6日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亲自组织和领导了这次大会，向大会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就此问题作了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的提纲，完全接受列宁提出的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并且决定以此作为共产国际纲领的基本原则。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和《共产国际宣言》，宣告了共产国际成立。宣言明确规定共产国际的任务是："总结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从运动中清除机会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腐蚀性的渣滓，团结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量，从而促进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①

大会确定，会后的工作委托执行委员会办理，执行委员会由俄、德、德属奥地利、瑞士、瑞典及巴尔干联盟的党的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选出五人组成执行局，执行局成员是：列宁、季诺维也夫、普拉廷、托洛茨基、拉科夫斯基。季诺维也夫被选为主席。

会议邀请侨居俄国的旅俄华工联合会负责人刘绍周②、张永奎③作为中国代表列席会议。刘绍周在会上发言，他代表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誓同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共产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大会期间，列宁亲切会见了刘绍周。会后，刘绍周曾一度被吸收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5月4日 中国爆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

7月25日 苏俄政府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宣言提出：帝俄政府在中国东北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的特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建议正式恢复两国人民的友谊。宣言于1920年3月在国内发表后，受到中国广大人民的热烈赞扬。

夏 俄共（布）老党员、后来担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主席的

①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页。

② 刘绍周，后改名刘泽荣。1892年生，广东高要县人。早年在俄国读书，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事华工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俄国谋生的近六万名华工，在俄国备受压迫。二月革命后，刘绍周等旅俄华侨创办中华旅俄联合会（十月革命后改组为旅俄华工联合会）以保护华工，刘绍周被选为联合会会长。十月革命后，联合会受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会委托，创办旅俄华工《大同报》，发给中国工人、特别是参加苏维埃红军的中国工人阅读。刘绍周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底回国，在中东路任职。1933—1940年，先后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西南联大任俄语教授。1940年6月曾任驻苏参赞。1949年9月，支持陶峙岳将军起义，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解放后曾任外交部顾问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0年7月18日在北京病逝。

③ 张永奎，早年丧母，流落哈尔滨街头，后为一俄国医生收养，带回俄国。1918年任旅俄华工联合会莫斯科分会会长。二十年代初回到中国，1977年去世，去世前为甘肃师范大学教授。

布尔特曼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会见了李大钊。李大钊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工会方面的工作很感兴趣。

11月19日 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接见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绍周，同他谈论中国革命和华工联合会的工作。

1920年

4月6日 贝加尔地区劳动者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远东共和国。

随后，中国北京政府和远东共和国决定互派使团。

4月 共产国际同意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领导人之一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的建议，派维经斯基①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及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共党员）等人来华，他们的使命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北京，他们通过北京大学两个俄籍教授柏烈伟和伊凤阁（伊凡诺夫、伊文）的介绍，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多次会谈，曾讨论了建党问题。在此期间，另一代表萨赫扬诺娃也从海参崴来华，与维经斯基会合。维经斯基等人很快由北京去上海，经李大钊介绍找陈独秀商量建党问题。

在此期间，俄共党员斯托扬诺维奇（米涅尔）也从哈尔滨来到天津。

5月 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杂志负责人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和他们一起座谈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

6月 北京政府派陆军中将张斯麐使团到达远东共和国，并前往苏俄考察。远东共和国也派优林外交使团来中国，谈判建交问题，于10日到达买卖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阿勒坦布拉克）。

7月5日—7日 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领导人之一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北京主持召开在华工作的俄共党员会议，会上指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已具备客观条件。

6月—8月 在维经斯基帮助下，上海开始筹建共产党组织，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施存统、陈公培两人不久先后出国留学，于是又吸收了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人，选陈独秀任书记。他们与各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联系，在当地着手建立共产党小组。同时，他们还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和培养干部的工作：创办工人刊物《劳动界》；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外国语学社，为派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做准备；还设立了华俄通讯社。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并由他和库兹涅佐娃教授俄文。

7月19日—8月7日 共产国际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开幕式在彼得格勒举行，7月23日后各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会前，列宁发表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重要著作，为大会作了思想和理论准备。在大会的第一次会

---

① 格里高利·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Griторни Hачмо Bич Bоитнический，1893—1953），1893年4月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一个森林工场管理人员家庭。1907年在市立四年制学校毕业，当了三年排字工人。1910—1913年，在白斯托鲁克当会计。1913年，去美国谋生。1915年，在美国加入社会党。1918年春回苏俄，到海参崴，加入了共产党。苏俄国内战争期间，他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事地下工作，参加了反对高尔察克的斗争。1919年5月，在海参崴被白匪逮捕，流放到库页岛服苦役。他联合岛上的政治犯举行暴动，推翻了白匪在岛上的统治，获得自由。1920年1月，回到海参崴，不久即奉派来华。他在中国工作时曾用名“吴廷康”，在《向导》和《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时署名“魏琴”或“卫金”。1927年回苏后，任全俄农业合作社中央园艺部副主席。1929年后，从事教育工作，仍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他曾获经济学博士学衔。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

议上，列宁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提出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任务提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土地问题提纲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都被批准为代表大会的决议。其中，《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在提纲中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并指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①英属印度代表罗易为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写了补充提纲。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荷兰人马林和罗易在会上发言，都提请共产国际注意促进东方殖民地运动的发展。

列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是刘绍周和安恩学（音）②，他们代表俄国共产华员局。③刘绍周是民族殖民地委员会委员，在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作了发言。

8月26日 优林使团抵京。由于法、日等国的责难和阻挠，中国政府拖延会谈，直至1921年4月20日始以正式外交礼节接待优林。随即因中苏两国政府关系恶化，优林使团的谈判无所进展。

在这期间，维经斯基曾通过优林使团与共产国际联系。优林并在中国先进青年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了一些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青年去苏俄学习。

9月1日—8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有中国、印度、日本、朝鲜、土耳其等国家和苏俄东部各民族的代表共一千八百九十一名出席。大会发表了对东方人民的宣言，号召东方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展开反帝斗争。大会决定设立"东方民族行动和宣传委员会"，出版《东方民族》杂志。共产国际为这个刊物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9月5日 张斯麐使团到达莫斯科。

9月27日 苏俄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所有帝俄与中国缔结之条约皆属无效，放弃以前所侵占的一切领土，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建议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和缔结友好条约。宣言由北京政府派往苏俄考察的张斯麐于同年11月28日带回。④宣言使中国人民对苏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激发了中国先进分子研究苏俄革命、走俄国人之道路的热情。

10月9日 维经斯基和柏烈伟访问吴佩孚的属下白坚武，向他介绍了苏俄情况。

10月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柏烈伟和斯托扬诺维奇（米涅尔）曾参加北京小组的工作。

秋 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维经斯基派马马耶夫和柏烈伟到武汉了解党的工作，向他们介

---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275页。

② 安恩学（音），二十世纪初在我国东北铁路上工作。1904年8月，被指控为日本进行间谍活动，在哈尔滨被沙俄当局逮捕，发配到彼尔姆。他在那里积极参加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十月革命期间，他在西伯利亚逐渐成长为自觉的革命战士，1918年在秋明组织中国工人支队，后编入红军。在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干涉的年代里，他参加了战斗，并在华工和红军战士中进行了党的宣传工作。1920年6月被选入俄国共产华员局，后来担任华员局主席。详见李玉贞：《十月革命前后的旅俄华人组织及其活动》，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5期。

③ 1920年6月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旅俄华工联合会中的党组织提出成立一个中央机构以集中领导俄共中国党员的建议。6月25日，建立了俄国共产华员局。7月1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批准俄国共产华员局为侨居苏俄的中国党员组织的中央机构，并批准了该局拟定的党章。

④ 1920年6月，北京政府派遣张斯麐中将赴苏俄考察，张斯麐于9月上旬到达莫斯科，11月28日被北京政府召回。

绍了俄国革命后的情况。半月之内，马马耶夫偕夫人二度到武昌，商谈工作，董必武和包惠僧接待了他们。

秋 长沙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由新民学会骨干毛泽东、何叔衡等负责，并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0月31日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函孙中山，建议苏俄和中国间恢复贸易往来。此时，苏俄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同中国国内从事反帝运动、争取国家统一的社会力量建立紧密的联系。这封信，孙中山于1921年6月14日才收到。

11月28日 张斯麐使团回国。刘绍周随同回国。

11月中下旬 维经斯基接受陈独秀建议，在上海会见孙中山，谈了两个多小时。孙中山询问了苏俄十月革命情况，并详细询问是否可能在海参崴或东北某处建立大功率电台，以便互相联系。

冬 山东共产党小组成立。

12月16日 陈独秀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维经斯基这时也到广州。同年秋，斯托扬诺维奇(米涅尔)和别斯林① 由在北京的黄凌霜介绍来到广州，曾被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包围”。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到广州与米涅尔和别斯林联系后，召集他们开会。在会上陈独秀拿出党纲草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接受，便退出了该小组。1921年春，陈独秀又找了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原北大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很快建立了广东党组织。广东党组织成立后，曾创办俄语学校，由米涅尔及夫人讲授。

维经斯基在广州期间，曾和陈独秀一起访问过陈炯明。

1921年

1月 工会国际委员会② 驻赤塔远东书记处代表斯穆尔基斯派遣弗兰姆堡到中国。弗兰姆堡到上海后，同维经斯基有过联系。

1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采纳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建议，决定在伊尔库茨克以东方民族部为基础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③ 委派舒米亚茨基于2月底3月初组成。负责人是舒米亚茨基和明斯克尔。

1月 维经斯基自上海赴北京准备回国。在北京期间，曾和北京党组织全体成员座谈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共产党员的基本信念等问题，他希望各地共产党组织尽快联合起来，成立中国共产党。

春 维经斯基等人回国。维经斯基回国后即在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工作，担任秘书。远东书记处出版刊物《远东人民》，经常刊登反映日本、中国、朝鲜、荷属东印度等国工

---

①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说是别斯林(Песлин)，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提到和斯托扬诺维奇(米涅尔)一起工作的是佩尔林(Перлин)。当系同一人。米涅尔，在《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译作米诺尔。

② 工会国际委员会是1920年7月15日由苏、意、西班牙等国工会代表在莫斯科开会成立的。1921年7月3日，在莫斯科正式成立赤色职工国际，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苏联工会工作者罗佐夫斯基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在以后历次代表大会上，他均被选为总书记，直至1938年2月赤色职工国际宣布解散为止。

③ 在此之前，东方工作(包括中国)是由1920年7月在伊尔库茨克设立的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负责的。见卡图诺娃:《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援助(1920—1922年)》，载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73年第1期。

农生活状况及革命运动情况的文章。

春 张太雷到达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成立，张太雷任支部书记。张太雷提出了有关中国支部的任务和组织原则的三点说明：一、建立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以解决有关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系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二、由两个书记负责这个支部，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出任此工作的代表，另一个代表由远东书记处派出。三、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属下的支部，中国支部也隶属于共产国际组织。因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之间的关系也遵循同样的组织原则，即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全体成员，应由驻远东书记处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属各地区代表组成，这个支部本身隶属于远东书记处。

春 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派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彭述之、谢文晋、任作民、卜士奇等赴莫斯科，进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①

6月3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林②到达上海。任务是考察东方各国运动情况，设法与它们建立联系，并调查是否有希望和可能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几天后，远东书记处派遣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科尔斯基也到达上海。从这时起直到同年12月初尼科尔斯基被调回伊尔库茨克为止，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在工作上联系密切。同时，马林也经常和工会国际代表弗来姆堡商讨工作。

6月22日—7月12日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为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大会向各国共产党提出"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列宁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他领导了大会的全部工作。列宁就捍卫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在大会上发了言，并作了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列宁在大会上阐明共产国际的策略时指出，不把群众争取过来，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是张太雷和杨和德（音），正在莫斯科的瞿秋白，也以记者身份参加了大会。张太雷在大会发言中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说它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侵略严重危害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呼吁共产国际和西方各国共产党更加关切和支援远东和中国的革命运动。指出要把中国青年引导到共产主义方向，不让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他们；要使中国工人运动置于中国共产党影响之下，不受黄色工会的影响。中国社会党人江亢虎列席了大会。

大会结束后，张太雷参加了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并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托起草了要求亚洲各国党和民族革命组织选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出席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

7月3日 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成立。赤色职工国际决定与共产国际密切合作。

---

① 该校于1921年4月正式成立，专为苏俄国内及邻近的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干部。1927年后，这个学校的中国班合并到莫斯科中山大学。

② 马林（Maring，1883—1942），原名亨德立克·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生于荷兰鹿特丹。1920年7月，他作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前身）和伊斯兰教联盟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任秘书。马林曾在会上介绍了他在爪哇使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和伊斯兰教联盟合作的经验。1920年8月，列宁委派马林作为国际代表来中国。9月，他出席了巴库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在意大利和维也纳处理了一些工作之后，于1921年4月启程来华。在中国，以"孙铎"笔名在《向导》和《前锋》上发表过十八篇文章。1923年9月，马林离华回莫斯科。1924年4月回荷兰，参加荷兰共产党工作。后来，马林的观点日益趋向托派，于1927年脱离荷兰共产党。1929年，他建立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自193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代表这个党参加国会。但在1938年，又拒绝参加托洛茨基第四国际。当德国占领时，他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出版秘密报纸《斯巴达克》，被德国法西斯逮捕，1942年4月死于法西斯屠刀之下。

7月23日—月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最后一天在嘉兴南湖）举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有上海、北京、武汉、济南、广州、长沙和日本派出的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曾出席会议。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并规定要“联合第三国际”。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了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在必要时，应派遣特别全权代表一名到驻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去。此外，要派代表到其他远东各国去，以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①会议选举陈独秀为党的中央局书记。

8月 马林建议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上海担任中央局书记的工作。党中央派包惠僧去广东请陈独秀回上海。

8月 张太雷从莫斯科回国，担任马林的翻译。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指示从中国、朝鲜和日本选派代表出席远东劳动人民代表会议，中共中央开始组织代表团。张太雷受马林委托，作为共产国际使者前往日本传达上述指示，与德田球一等取得了联系，完成了使命。

8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它是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其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在上海创刊。上海《劳动周刊》和北京《工人周刊》的出版，都得到了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弗来姆堡的帮助。

8月28日 孙中山在广州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信，信中叙述了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历程并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出张作霖在一切重大事情上听命于东京，北京“政府”实际上是东京的工具。“只有在首都实行彻底清洗之后，……苏俄才可以期望与中国恢复友好的关系。”信中热情表示：“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的组织。”信在结束时说：“向您和我的朋友列宁以及所有为了人类自由事业而有许多成就的友人们致敬。”② 这封长信通过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驻伦敦贸易代表团转达。

8月底 陈独秀自广州回上海，做党的工作。

10月初 北京政府和优林使团商定准备在满洲里举行会议，并由苏俄派代表参加。10月6日，优林离华回国。

10月 陈独秀等五人在上海法租界被捕，马林和张太雷四出奔走，将他们营救出狱。

10月 马林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建议国民党选派代表参加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并表示希望与国民党建立联系。国民党邀请马林于12月去桂林访问孙中山。

12月9日 苏俄派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节帕依克斯到达北京，谈判建交问题。因北京政府慑于日本压力，消极拖延，谈判很不顺利。

12月10日 马林与张太雷离上海经湖南前往桂林。途经长沙时，马林出席了青年团体的集会，给他们讲了阶级斗争和俄国革命等问题。

12月23日—1922年1月初 马林和张太雷于23日到达桂林，停留九天。孙中山在桂林独秀峰山麓旧桂王府之北伐大本营和马林、张太雷会谈多次。马林谈到关于苏俄与国民党结成联

---

① 《“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14页。
② 《新华月报》1951年2月号。

盟的可能性问题时，孙中山表示国民党与苏联的联盟在北伐吴佩孚胜利后可以实行。目前，为避免招致列强干涉，只能与苏俄建立非正式联系。马林向孙中山讲述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以及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他向孙中山提出两点建议：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很赞同这些建议。马林还向军官们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孙中山同意派一个最能干的人作为使者去莫斯科。孙中山还和张太雷就发动青年积极参加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12月初 尼科尔斯基回国。

12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制定了统一战线提纲，指出反动派向工人的进攻日益加强，亟需团结所有工人的力量一致行动，以击退这种进攻。文件号召各国共产党立即为争取建立统一战线而斗争。

1922年

1月初 马林到达广州，住了十天。正在进行的海员罢工，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认为国民党与工人阶级有广泛的联系。在广州，马林与陈炯明作了三次长谈。

1月21日—2月2日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闭幕式在彼得格勒)召开。出席大会的有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及其他远东国家的代表。中国代表团有三十多人，团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国焘。瞿秋白、任弼时、俞秀松、王尽美、邓恩铭、高君宇、王乐平、王翔千、于树德、柯庆施、林育南、肖劲光等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分别以各地区、各团体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唐山铁路工会的代表是邓培，国民党的代表是张秋白，中国社会党人江亢虎和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也出席了大会。会议选举列宁、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片山潜为名誉主席。大会在列宁指导下召开。大会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远东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张国焘、邓培、张秋白，关切地询问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会上，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洛夫作了题为《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报告指出：对于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只要它是向帝国主义压迫作战的，共产党人就应支持和援助，而对于求助于帝国主义者或国际帝国主义外交的一切倾向和团体，则必须迎头痛击。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于1922年上半年先后回国，及时向中共中央和上海等地共产党员报告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内容，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1月26日 列宁在给契切林的便函中，询问了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给契切林的信，契切林证实收到了这封信。

2月7日 契切林致函孙中山，告诉他在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和国民党代表会晤，并就同孙中山保持经常联系的方式方法问题达成协议的情况。信的结尾说："列宁同志同样以最大的兴趣读了您的信，并且极其好感地注视着您的活动。"①

2月 共产国际决定撤销远东书记处，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革命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领导。

2月—4月 马林于2月3日离广州赴上海，3月19日从上海动身，四天后到达北京。在

①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五卷，莫斯科1961年版。

京期间，他与苏联驻京使节帕依克斯商谈了工作，并提交两份报告请他转莫斯科，一份是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情况，另一份是给苏俄外交事务人民委员会的，建议委派一位苏联使者到中国南方来。4月2日，马林回上海。此后，他与共产党和国民党人进行了几次会谈，国民党领导人告诉他，他们允许共产党人到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但马林和共产党人讨论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的问题时，多数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

3月 少共国际代表达林①到达上海。

4月 达林正在上海准备去广州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帕依克斯通知他去北京，向他下达任务：同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弄清孙中山的国内外政策、他对苏俄的态度、近期计划以及国民党在广州政府政策中的作用。达林被授以正式全权代表身份与孙中山会谈。

4月6日 陈独秀写信给正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说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但是党中央断然反对这一建议。他要求维经斯基代向共产国际陈述以下理由：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中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中山派甚烈，我党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之敌视，在广东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向来对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②

4月23日 马林离上海，途经新加坡、马赛、阿姆斯特丹、柏林和雷维尔，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革命问题。

4月下旬 达林和张太雷等在汕头起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章程草案，然后乘轮船取道香港到达广州。

4月底 党的领导干部为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到广州。党中央于此时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参加者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各地负责人和广州部分党员共二十余人。陈独秀、达林先后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酝酿和讨论，因认识尚不一致，未作决议。

4月27日 达林和张太雷在广州会见了孙中山，此后（直到6月3日）又晤谈多次。孙中山对苏俄形势表示关心，他询问苏俄能否帮助他建设一条铁路，经过苏联的土尔克斯坦连接莫斯科和广州。他说：我一打败吴佩孚，就要打张作霖，那时苏俄的帮助就特别重要。关于承认苏俄问题，孙中山说，因为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但是，待部队占领汉口后，定将正式承认苏俄。

5月上旬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相继在广州召开。

---

① 达林（С.А.Лапин），1902年生。1921年5月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随即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1922年、1924年、1926年三次来中国工作，1926年曾与国民政府成员一起从广州经江西到武汉，1927年初回国。其所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译本，1981年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② 赵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一），载《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

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出席了青年团的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章程，选出了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为团中央书记。大会作出了加入少共国际的决定。

6月15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认为"中国现有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表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6月16日 陈炯明公开叛变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登永丰舰讨逆。

6月30日 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信中表示："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①

7月11日 马林在莫斯科完成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并于17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这份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共产党人应与国民党联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以及把中央委员会地址迁往广州，在那里公开进行工作的政策性建议。

7月17日 帕依克斯正式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宣称苏俄政府"业经允准本代表回莫斯科，派越飞为全权代表，使与中国政府商议一切。"②

7月18日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正式决定在中国实行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本通知后，必须立即迁址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与菲力浦同志密切联系下进行。"③（"菲力浦"同志是马林在共产国际的化名之一）原件打印在马林衬衣上，秘密带来中国。

7月16日—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提出现阶段的任务是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大会还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选为委员长。会议决定出版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正式创刊。

7月27日 马林与越飞④一起启程来华。

8月9日 孙中山离永丰舰乘英国炮舰"摩轩号"离广州，10日抵香港，旋即乘轮赴沪，于8月14日到达上海。

8月12日 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越飞率随员二十四人抵京，与北京政府谈判中苏建交问题。马林即赴上海。

8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一、根据马林的报告，代表的所有活动必须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决议为基础。二、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坚持辛亥革命的使命，并渴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三、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在工会中组成从

① 转引自赵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一），《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八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页。

③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注（58）。

④ 越飞（Иоффе，A.A.1883—1927），十九世纪末，开始从事革命运动。1908年，他和托洛茨基一起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2年在基辅被捕，被放逐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后释放，再次和托洛茨基一起编辑《前进报》。1917年十月革命时，他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苏俄驻德国大使。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7年11月自杀。

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以及组织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主张。四、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由于国民党在南方政府中负实际责任，它暂时需要避免与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①

8月 达林、帕依克斯回苏。

8月23日 李大钊在上海会见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谈话时间长达数小时之久。

8月25日 马林作为苏俄使者越飞的代表在上海法租界与孙中山会谈，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他去莫斯科的情况和共产国际的决定，孙中山告诉马林他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马林劝孙中山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宣传运动。

8月29日—30日 根据马林提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全会，讨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还有张太雷和马林。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国际7月决议和8月指示，坚决主张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经两天讨论，多数人尊重共产国际意见，接受了加入国民党的主张。

会后，马林积极促成国共合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在上海很快加入了国民党。同时，马林与在北京的越飞进行频繁通信，积极促成苏俄和孙中山之间达成协议。李大钊向孙中山说明自己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成员时，孙中山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②

9月4日 孙中山召集在上海的各省国民党负责人五十三人讨论改组国民党问题，马林、陈独秀、张太雷均应邀参加。孙中山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马林也讲了话。大家一致赞成国民党改组计划。

9月6日 孙中山指定丁惟汾、张秋白、陈独秀等九人组成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7日起开始开会筹商。

10月 由于上海反动当局的迫害，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北京。

10月23日 开滦煤矿等五矿工人联合罢工，马林在此期间曾亲临天津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罗章龙商讨罢工问题。

11月14日 远东共和国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18日，越飞和远东委员团分别通知北京政府，远东委员团撤销，以后一切事宜均与越飞接洽。

11月5日—12月5日 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彼得格勒开幕，11月9日起改在莫斯科继续举行。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列宁向大会作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东方问题提纲》，指出“如果说在西方，在有组织地积蓄革命力量的过渡时期，曾经提出过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那么现在，在殖民地东方，就必须提出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一口号之所以适宜，是由于要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漫长而持久的斗争，而这种情势要求把一切革命因素动员起来。”③提纲要求东方各国共产党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努力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提纲还要求东方

①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65页。
② 《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各国革命党明确制定土地纲领，提出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及其残余的要求，坚决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基础，并迫使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尽可能接受这一革命的土地纲领。

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是陈独秀、刘仁静和王俊。瞿秋白作为大会工作人员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刘仁静就中国目前形势和国共合作等问题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说："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想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一边；第二，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力量同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打击帝国主义，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①

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之一拉狄克就东方各国党的情况和工作作了发言，他说："在广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要中国共产党员"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不仅到工人群众中去，不仅到苦力中去，而且也到被这一切事件激动起来的农民群众中去"。②

大会选举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蔡特金、库西宁、片山潜等人组成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于次年1月动身回国。

12月 孙中山派张继赴京会见越飞，商谈他要与越飞亲自会谈的问题。

12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1923年

1月 马林在沈阳和张作霖谈判中东路问题，然后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国共合作问题。2月初，马林返回中国。

1月12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这一任务"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是，"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召开代表大会确认国共合作方针，并要求马林和维经斯基都要出席这次代表大会。

1月16日 经过越飞和孙中山之间半年来的通信联系，经过马林等人的多方努力，苏联和孙中山国民党之间已达一定谅解。越飞以养病为名，由北京南下，17日晚到上海。22日，越飞赴莫利爱路孙中山寓所访问，倾谈良久。

1月26日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随后，孙中山派廖仲恺陪越飞前往日本，进一步商讨实现宣言的具体办法，他们在日本住了一个多月。

2月7日 京汉铁路工人政治大罢工，遭吴佩孚血腥镇压，酿成"二七"惨案，共产国际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62页。
② 同上书，第64—65页。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76—77页。

为此发出《为“二七”屠杀告中国铁路工人》电。这时马林正在北京，他派张国焘去莫斯科向萨法洛夫、维经斯基和罗佐夫斯基报告“二七”惨案经过。陈独秀这时也在北京，马林和陈独秀时常在一起商量问题。

“二七”惨案后，北京政府发布了对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于是，中共中央和马林迁回上海。不久，中共中央因上海反动当局迫害严重，同时也为了准备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又由上海迁往广州。

2月中旬 孙中山因陈炯明已被逐出广州，遂离沪返粤，于21日到达广州。

3月2日 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文章中论述了东方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关系问题。文章指出：“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①

4月25日 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宣扬“二次革命论”。

5月1日 马林在广州纪念“五一”节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

5月24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十三条，指示中强调：“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指示中提出“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②此指示几经辗转，中国共产党在“三大”结束后，于7月18日才收到。

6月12日—20日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③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1月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在讨论中，既批评了对国共合作持怀疑态度的“左”倾观点，也不同意“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认为必须坚持党的独立性。马林出席了这次大会，维经斯基则未及来华。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夏 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团由苏联驻华武官阿纳托里·伊里奇·格克尔带领来到中国，顾问团成员有波里亚克、格尔曼、捷列沙托夫、斯莫连采夫、切列潘诺夫。他们于6月21日到达北京，在短期学习汉语和英语后，除斯莫连采夫留京外，其余四人于9月底至1924年1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09—710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78—79页。

③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党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42页。

月期间先后到达广州。

8月5日 马林在上海会见蒋介石，商讨蒋介石奉孙中山派遣去苏联考察事宜。在马林建议下组成了包括蒋介石、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在内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8月16日 在马林协助下，蒋介石率代表团由上海启程赴苏，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洽商苏联援助问题。

9月2日 以加拉罕为团长的苏联外交使团到达北京。

9月4日 加拉罕对报界发表声明（即加拉罕第三次对华宣言），说明前两次宣言的原则和精神仍然是苏联对华关系的指导基础。

9月8日 加拉罕致电孙中山，对于孙中山在“俄国为争取独立和自由斗争中最困难的时刻所表现的友谊”表示感谢，同时还把使团在中国的目的和任务告诉了孙中山。

9月16日 孙中山回电加拉罕：“我确信，对您所捍卫的意识形态的任何批评，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妨碍我和您共同认为的我们两国根据真正利益制定的共同政策。”①

9月—12月 9月2日，蒋介石一行到达莫斯科，随即受到苏联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热情接待。9月7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受中央委员会委托，接见了代表团，详细介绍了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及他们发展工业和组织红军的措施。9月9日，代表团受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梁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的接见。9月25日，代表团应邀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蒋介石作了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状况和国民党内部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希望共产国际派人帮助中国革命。蒋介石于11月29日启程回国，12月15日回到上海。

张太雷在莫斯科出席少共国际“三大”（1923年10月）和“四大”（1924年6月）后于1924年8月回国。

9月上旬 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回上海。

9月 苏俄政府委派鲍罗廷②为常驻广州代表，鲍罗廷到达北京。马林结束在华使命，启程回莫斯科。

9月23日 加拉罕为鲍罗廷写了一份去见孙中山的介绍信，信中说：“……鲍罗廷为我党元老同志之一，曾长久致力俄国革命运动，请不仅视鲍同志为官方代表，也视伊为余私人代

---

① 齐赫文斯基：《论孙中山对苏俄的态度（1917—1925）》，载苏《历史问题》杂志1963年第12期，曾宪权译打印稿存近代史研究所。

② 鲍罗廷（МихаилМарковичБОРОЛинNH），又名格鲁森贝格（ГрузенБерг），1884年7月9日生于沙俄前威斯帖布斯克州。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到1906年初，党派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里加委员会工作。他作为里加的代表，参加了1905年12月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和1906年4月至5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会议记录上鲍罗廷的名字是“万育欣”（Vanyushia），他在党内的名字是基里尔（Kirill）。回国后不久被捕。释放后，党派他到英国伦敦宣传俄国革命，从那时起，他使用“鲍罗廷”的名字。1907年春，到美国波士顿，芝加哥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18年7月回国。不久，党又派他到美国，将列宁写的《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2日）送交美国工人。1919年8月，他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20年2月，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1921年，任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1921年8月至12月，参加共产国际会议。1922年3月，再次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此后，他化名乔治·布朗被派往英国，同年8月，在格拉斯哥被捕，判六个月苦役，期满后被驱逐出境。1923年6月，在回国途中，曾向英国红色工联中央理事会作过工人运动的报告。1923年9月，苏俄政府派他到中国，1927年7月下旬回苏。此后，长期从事外文出版工作，一度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主任，与路易斯·斯特朗在一起工作。1949年被捕，1951年5月29日去世。1969年苏联出版《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一书，内有米罗维茨卡娅撰写的“鲍罗廷”一文，可以认为这是苏联在鲍罗廷死后为他恢复名誉的表示。此书中译本书名为《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是根据日译本翻译的，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表，你对他谈话即如同我谈话一样，他说的话，亦如同我亲口向你说一样可靠。他对整个情况都很熟悉，在他去南前，我们曾经过一番长谈，他会将我的想法、希望与感触转达给你。”①

9月底 鲍罗廷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和其他中共党员。

10月6日 鲍罗廷到达广州。

10月9日 孙中山举行欢迎鲍罗廷的招待会。鲍罗廷在讲话中阐明了在群众中不断进行宣传鼓动的重要性和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指出国民党的重要任务是为中国的统一和独立而斗争。

10月9日、11日 鲍罗廷与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党员瞿秋白、谭平山、阮啸仙等人谈话，研究改组国民党的计划。

10月18日 觉悟社记者访问鲍罗廷，询问其对中国社会和政局的看法，鲍罗廷在讲话中指出：“将来引导中国国民运动以至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②

10月18日 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10月21日 孙中山、宋庆龄偕鲍罗廷赴虎门要塞巡视，次日回广州。

10月25日 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民党改组会议，讨论改组计划。鲍罗廷在会上就国民党改组和所制定的新的章程草案作了报告，指出全世界压迫和被压迫民族进行着长期斗争，而力量的联合成为生死存亡的问题。国民党应当改组，应该通过人民明白易懂的纲领，以通俗易懂的方法向广大群众介绍这个纲领。只有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党才能达到统一和独立的目标。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林直勉、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委员，负责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同时，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处理改组国民党事宜。

10月28日 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1924年1月召开代表大会，筹办国民党周报，起草党纲，组织临时委员会上海执行部。

11月初 维经斯基再度来华，接替马林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他途经北京到达上海，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12月底回苏。

11月12日 因获悉陈炯明军队占领石龙，政府军向广州退却，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鲍罗廷在会上发言，他强调有目的的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并提议要通过决议动员全体国民党员保卫城市，中央执行委员应立即乘汽车分赴各地区。鲍罗廷在讲话中还指出，前线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在农民中间工作薄弱，因而农民的态度是消极的，有的甚至去帮助敌人。

11月24日—25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一次执行委员会，参加者有中局委员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王荷波四人，驻京委员李大钊、驻鄂委员项英、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等共八人。毛泽东因事赴湘未到会。会议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决议规定：“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我们与国民党之关系：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一切政治的言论

① 艾伦·惠廷：《苏俄在中国的政策1917—1924》斯坦福大学1968年版，第244页。

② 《向导》第45期，1923年11月19日。

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国民党之力量必须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必须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组织。”①

11月25日 孙中山在大本营发表演说，指出国民党改组的用意，强调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②

11月26日 鲍罗廷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授权廖仲恺进行筹备工作。

11月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全文八条，决议指出国民党必须同劳动群众建立密切联系，以巩固和扩大革命运动的基础。决议对如何理解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三民主义的含义，作了阐述，民族主义，应当意味着“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民权主义，应使其有利于中国劳动群众，即“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民生主义，应当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土地则应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归劳动者所有。决议提醒国民党要重视工人阶级的力量，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必然会在统一国家和争取中国独立的反帝运动中，起到自己一份重大的作用”。共产国际表示相信国民党“将放手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支持它的经济组织及其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并再次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全力支持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将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成长和壮大，有助于把农民从封建专制的条件下解放出来。③

鲍罗廷于12月30日在上海接到这个决议。决议中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新解释，成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基本原则。

11月29日 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改组国民党，大肆污蔑共产党，孙中山阅后在书信上批示：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切不可疑神疑鬼。”“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常助反对我者，以扑灭我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④

12月9日 孙中山在大本营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说，指出国民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俄之成功，亦不全靠军力，实靠宣传。”俄国经验“殊可为我党师法”。⑤

12月 中苏建交，加拉罕任苏联首任驻华大使。

12月底 鲍罗廷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会议，在会上提出了国民党改组的纲领草案。参加讨论的有廖仲恺、瞿秋白、汪精卫、胡汉民等。

年底 李大钊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和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选自杨若云：《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

---

① 赵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二），《党史研究》1981年第8期。
②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2期。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81—83页。
④ 《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301—308页。
⑤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6期。

〔附〕 共产国际代表来华情况资料摘编

林 谷 良

共产国际是一九一九年三月由列宁首创的，一九四三年五月宣布解散，整整存在了二十四年。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曾得到共产国际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帮助，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二大”通过决议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现将共产国际代表来华情况的一部分资料摘编如下，试图提供共产国际驻华主要代表在华活动的粗线条的轮廓，不可能包括他们的全部活动和全部工作，也不可能对他们的工作作出评价。由于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引有关人物的资料繁简不同，很不平衡，亟需要加以补充；有的材料系转引或从外文资料翻译过来的，难免有讹误，引用时请查找原文。其中有些材料的观点是反动的，需要加以认真鉴别。

一

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建立不久，中国“五四”运动发生，共产国际即陆续派人来中国，其中有的是作为苏俄政府外交机构的代表，主要负有外交使命，同时与中国教育界、学界发生联系，了解中国情况，宣传十月革命，寻求帮助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途径。

〔巴克京春〕

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就派人到中国来了，起初是苏联华俄通讯社社长，以后有高丽人巴克京春到中国来组织党。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

〔马迈也夫〕

一九二〇年秋天，第三国际代表之一马迈也夫同志到武汉，当时我任共产党武汉支部书记，我同他作过两次长谈，知道俄国革命后的一些情况，他说他不久回莫斯科进陆军大学学习……。

（包惠僧：《共产党一大会议前后的回忆》。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

临时中央曾有信给我，要我们吸收恽代英及他领导的利群书社的分子入党。我和刘伯垂、陈潭秋都直接间接的同恽代英……等接触过，国际代表马迈耶夫同包立维来武昌时也到利群书店参观过……。

（包惠僧：《回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见《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9期）

一九二四年秋天，他们夫妇（即马迈也夫夫妇——编者）来到广州，马迈也夫在黄埔军校任顾问，北伐战役中任第七军李宗仁部顾问，在北伐战争中有过很大贡献。

（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见《新观察》1957年第13期）

〔优林〕

当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发表（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编者）以后，远东共和国便派全权代表优林由蒙古来到北京，向中国政府磋商关于中俄订立新约问题。但是此时中国政

府还是怕列强干涉，不敢和俄国开始交涉，于是优林只得向民间奔走，想在民间找到一些俄国朋友和苏维埃主义者，他力谋与议会人员及学界的有力者接近，他公表苏俄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作教育经费的意思，想以此为饵，以博得教育界的同情，并以几位教授的介绍，和许多学生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优林的来华成绩就此为止，于一九二一年夏便回国去了。

（何汉文：《中俄外交史》第321—322页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初版）

一九二〇年四月三日，苏联政府送来通谍……。

四月二十九日，北京政府通电否认苏俄通谍。

八月二十六日，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抵北京。

（何汉文：《中俄外交史》第453—454页）

〔**裴克思**〕

继优林之后而来北京的，还有一位裴克思，他的活动，也是仅限于民间，未能和中国政府正式开始交涉。这完全是由于两人资望太低，加以国际环境的关系，所以不能得到相当的结果。

（何汉文：《中俄外交史》第322页）

〔**亚列格塞夫**〕（Alegseev）

一九二一年春莫斯科便已派遣代表亚列格塞夫到广东，在广东设立罗斯脱通讯社及俄文学校。一九二一年夏亚列格塞夫去后，又有马林到广东。

（何汉文：《中俄外交史》第367页）

民国十年春，一个俄人亚列格塞夫(Alegseev)到达广州，会同陈独秀设立罗斯塔（Rusta即塔斯社前身）分社。同年五月，另一位莫斯科的秘密代表敏诺偕其译员玻尔西化装为商人，来到广州与陈独秀、区声白、陈公博等联络。陈公博说：他们同意这个俄国代表的提议，先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社会主义，然后再建立共产党……，在陈独秀、陈公博等人的大力活动下，以后著名的共党林祖涵、刘尔嵩、阮啸仙、杨匏安等都被吸收进来了。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5—66页）

二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等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维经斯基**〕（1893——1953）

（维经斯基又称：维丁司克、伟基斯克、威金斯基、伍廷康、维丁斯基、威经斯基、魏琴斯克、胡定斯基——编者）

一九二〇年四月，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维丁斯基（他的夫人同行）来到北京，据他说，东方局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派他到中国来看看（他曾在美国工作过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到了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过几次座谈会，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参加了。

（李达：《七一回忆》《七一》月刊1958年第1期）

伟基斯克第一次到中国决定联合吴佩孚发动民主运动，守常因孙丹林、白坚武的中介曾

4
姜

到洛阳与吴佩孚见面作过长谈。吴佩孚在一九二一年曾通电主张劳动立法，保护劳工，就是守常与吴佩孚会谈的结果。

（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1953年9月20日）

一九二〇年，约在五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以记者身份偕同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来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探得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一九二〇年春，共产国际派威经斯基和杨明斋（华侨，山东人）来华建立党。首先找到陈独秀，遂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当时首先加入组织的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俞秀松、李达、沈玄庐等人，接着张国焘、罗觉、彭述之等加入了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小组织的形式。

（《七一史料》见《文丛》1卷5期1947年7月10日）

民八……苏俄适派俄人维丁司克偕同杨明斋及韩人安某，携款到沪，为苏俄作宣传，并负组织共产党之责任。抵沪后住霞飞路七一六号，即现在道路协会原址。遂与陈独秀密商进行，时陈住渔阳里二号（即现铭德里）寓柏文蔚处……。

（仿鲁：《清算陈独秀》见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第66页北平东亚书局1933年8月出版）

胡定斯基到沪初与陈独秀会面时，据说是“一见如故”。由于陈独秀的关系，胡定斯基也结识了《星期评论》的主编人，也是马克思学说的提倡者戴季陶、沈定一（玄庐）与李汉俊，以及《时事新报》主持人张东荪。胡定斯基想撮合这些热心改革社会但思想路线并不相同的人联合“组党”，并试图与上海青年知识阶层接触，以传播其共产主义。他曾邀约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副评议长狄侃、程天放及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到其虹口寓所谈话，大做其宣传，但结果却是“谈了两三个小时，得不到结论”。

在胡定斯基的怂恿下，一九二〇年八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其原始团员仅有“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不久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处也有类似的名义出现，于是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0—61页）

（一九二〇年夏天，周佛海到了上海）“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现在似已改为铭德里）二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人吴庭斯基在座。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马林〕　（1883——1942）

（马林又称：斯尼夫莱特、H·斯尼弗里耶特、斯里弗烈、西门、菲利浦、马丁——编者）

马林，原名斯里佛烈（Hendricus Jonannes Franc · iscus Marie Snevliet）……。马林在中国的化名还有西门（Dr · Simon），菲利浦（Phillip）。马林原籍荷兰，在印尼长大。曾参加过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又在印尼组织过"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后来被当时的印尼荷兰当局驱逐。

（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一部第279页香港自联出版社1973年7月初版）

（马林）从一个不知名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委员会书记，从一九二〇年七月，他以一个印尼社会民主和伊斯兰联盟代表身份，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那时列宁第一次接见了他。

…………

由于列宁的推荐，斯尼夫莱特（即马林——引者）成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他的任务就是令人愉快地去建立一个共产国际的办事处。

（道夫·宾：《斯尼夫莱特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室译自英国伦敦1971年出版的《中国季刊》48号）

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我派往中国。那时，我是出席大会的爪哇党代表，一九一九年我被驱逐出爪哇，于是我接到从荷兰发出的邀请，要我参加一九二〇年初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我被指派在殖民地事务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列宁……，我是秘书……，一九二〇年八月任命，一九二一年四月前往中国。

（哈罗德·R·文萨克斯：《与H·斯尼弗里耶特谈话笔记，中国问题一九二〇——一九二三》。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室译）

（一九二一年）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

党的第一次会议……在上海望志路（贝勒路）树德里三号李汉俊的寓所举行的，代表十二人全体出席，第三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可洛夫也到了。……马林即席讲话，大意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的支部，苏俄布党添了一个东方的朋友，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他在演说中，强调着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的成立，并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努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

（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在上海，我会见了孙中山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张继。……

…………

与张继联系的结果是国民党邀请我去访问孙中山……

……我在他的总部（指在广西桂林——编者）同孙中山一起度了两周。我在那儿向他的军官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我同孙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的必要等等。我对他讲了爪哇民族主义性质的群众组织——泛伊斯兰教联盟的发展。他则向我讲述了国民党的策略、它的历史、袁世凯时期在海外的非法活动、同太平洋各国华侨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国

民党的帮助。他还利用这次机会同张太雷长时间地讨论了需要青年更加积极地参加民族主义运动……。

（《马林赴华回忆》）

马丁旅桂仅三日，与总理会谈约两次。总理在桂林驻节于旧桂王府（俗称皇城，位独秀峰麓），距广西银行不远。总理第一次与马丁谈话，余未参加。其第二次则参加者不独余一人，胡汉民、许崇智、陈少白、孙科、林震陔、曹亚伯、朱卓文，皆是夕会议之重要人物也。此会即在皇城举行。当时马丁宣布第三国际意旨，力促国民党与之联盟。……总理于是郑重答复马丁曰："苏俄革命甫四载，其事迹世罕能言者。吾侪革命党人也，讵不同情革命？……况吾师次桂林志在北伐。今吴佩孚屯军洞庭以逆我，吾夺洞庭，窥武汉，直取长江，实侵英国势力范围。英知我联俄，必先图遏我，吾北伐之师，从此殆矣。为安全计，今仅能与苏联作道义上之联络。一俟义师北指，直捣黄龙，再谋具体合作，未为晚也。"……

（邓加彦：《马丁谒总理实纪》）

一九二二年三月间，我由莫斯科回到上海……

马林在我到达上海之前约两个星期，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据陈独秀先生说，马林由他的老朋友张继的介绍，偕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底到达桂林与孙中山先生会谈，会谈后马林颇感满意。他由桂林回到广州适值香港海员罢工，他目击国民党支持罢工工人和一般工人拥护国民党等情况，更对国民党具有好感。因此，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可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国共两党也可以密切合作。他这次赶回莫斯科去，似为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办法……。

（张国焘：《我的回忆》〔一〕）

中共杭州会议在中山先生因陈炯明叛变，于（二二年）八月十四日抵沪之后。当时马林晋谒，请与中共"平行合作"被拒，马林即召开杭州会议，决议中共个别加入国民党，马林再以之请于中山先生，允之。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编）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在上海法租界，斯尼夫莱特和孙中山博士举行第二次会见。……这次会见之后，首批中国共产党员立即开始加入国民党。

（道夫·宾：《斯尼夫莱特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室译自《中国季刊》1971年10—12月号）

〔李克诺斯基〕

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

（亦愚回忆录：《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

〔达林〕

一九二二年，少共国际为一项任务派他到中国。他四月秘密到达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总部，那个月月底，他见到了孙中山，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五月一日他出席了中国劳动大会首届会议，五月五日，他还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向青、石志夫、孙岩：《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物传记选译》）

三

一九二二年八月，苏俄驻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大使越飞来华。在华期间，曾同孙中山先生会晤，对于促进国民党改组、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起了积极作用。

〔**越飞**〕（1883——1927）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苏俄代表越飞到北京

（何汉文：《中俄外交史》第457页）

民国十二年一月十六日，越飞以养病为名，由北京搭快车南下，十七日晚，抵达上海，寓汇中旅馆。越飞在沪行踪隐密，至二十二日始公开接见访客，……同日，越飞首次赴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中山先生寓所晋谒，“倾谈颇久”。二十六日有“孙越联合宣言”的公布。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45页）

一九二二年八月越飞来到中国以后，他的伟大的声名，便不免引起朝野上下的注意和恐怖，大家以为一九一九年他在德国试演赤化革命剧，又会到中国来重演了。……但是……却多少受到北京教育界和学生的欢迎。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一月，越飞因往日本养病，过上海时，与孙中山先生会晤，两人便于一月二十六日联合发表下述之宣言：

孙逸仙博士与苏俄派至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越飞授权发表下记宣言。在越飞君留上海时，与孙逸仙博士为数度之谈话，关于中俄间关系，披沥其许多意见，对以下各点尤为注意：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下略）

（何汉文：《中俄外交史》第366页）

莫斯科的真理报和消息报却迟至五日后，即二月一日始转载罗斯塔（Rusta）社的电讯，提及此项宣言，并将其首段最重要的字句，即“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完全删除。……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越飞亦终于自杀。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50页）

当越飞在上海与中山先生会晤发表联合宣言的时候就提出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及至鲍罗廷到了广东，就向中山先生说：“可以援助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除了苏俄以外，再没有第二个同盟者，但是要得苏俄援助，广东政府必须援助共产党。”

（何汉文：《中俄外交史》第368页）

四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以后，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鲍罗廷作为苏联政府派往广东革命政府的总顾问，同时又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及另一个国际代表罗易对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相当影响。

〔**鲍罗廷**〕（1884——1949）

一九二三年九月，他（鲍罗廷）既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密使又是派驻孙中山的苏联代表。在这里他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联盟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向青、石志夫、孙岩：《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物传记选译》）

一九二三年夏季孙中山派遣了一位青年军官——蒋介石——到苏联短期考察苏俄红军。不久之后，加拉罕抵达北京替代了越飞的职务，并曾致电孙中山致敬。孙氏除友谊答候外，并要求遣派第三国际代表一名赴广州参与顾问和组织任务。

结果一个名叫鲍罗廷（M·M·Borodin）的老练革命家，被选为最适当的人选。其实他才刚由格拉斯哥监狱坐满六个月徒刑被放出来。他生在俄国，可是在拉脱维亚受教育长大。在俄国曾有过短期逗留，因从事革命活动而遭沙皇秘密警察逮捕。其后移居美国，一九〇八年他在芝加哥城专为一些政治犯移民而成立了"前进预科学校"。七月回俄后参加党的工作，首先被派往墨西哥，再后到英伦。

在广州他首先是以塔斯社通讯代理人姿态出现。据罗益（M·M·ROY）所记，苏联政府在最初并没有以官方名义遣派鲍氏来华。罗益写道："……加拉罕已被派往北京任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是鲍氏的老朋友，知道鲍氏在莫斯科的职位很不得意，就建议让鲍氏到北京协助他处理有关第三国际的任务。直到鲍氏在一九二四年和孙中山接触后并赢得对国民党的影响，他才被正式解职"。

（罗勃C·诺斯：《莫斯科与中共》第63—64页）

约在一九二三年一月间鲍罗廷随加拉罕大使来北京，鲍罗廷约北京区负责同志会谈，地点在俄国大使馆，参加这次会谈的有李大钊、范鸿劼、张昆第、安体诚、何孟雄、刘仁静及我。鲍罗廷问了一些北京的工作情形后，即开始讲了一大篇民主统一战线的理论问题，最后归结到共产党员都需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除了李大钊当时没有表示意见外，我们都表示反对的意见。

（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回忆》（一）1953年9月20日）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苏俄更突命鲍罗廷来到广东。广东便正式聘请鲍氏为高等顾问。鲍氏以前曾任土耳其的顾问，参与土耳其的革命。现在他又要把在土耳其所得到的经验，运用到中国来了，他从莫斯科所带来的使命约有两大端：一为对广东革命军官学校创设的援助，一为完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工作。

（何汉文：《中俄外交史》第368页）

鲍罗廷抵达广州的日期，是在民国十二年十月六日。他先到上海，为避免经过香港，乃搭一艘小船由上海直驶广州，中途遇到台风，曾至台湾避难。他以Rusta新闻记者的身份在广州出现。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5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1日初版）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决议联俄容共，聘鲍罗廷为顾问。

（何汉文：《中俄外交史》第460页）

（民国）十五年一月……，鲍罗廷以奉召述职为名，突然回俄……。

………………

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廷自俄回粤……。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39—41页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年6月版）

南方三月二十事变……，当时鲍罗廷、陈延年都不在广州，延年是事前一天回到广州的，当时在广州主持的是卡山加与布不洛夫。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

（马日事变以后）在有一场政治局会议上，鲁易与老鲍（指鲍罗廷——编者）各自发表长篇的演说。老鲍的大意是：（一）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的过火，我们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二）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合作是中心的问题，假若现在我们与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完全的失败，我们将什么也没有；（三）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便是指与他的现在的中央合作。国民党的中央现在还是好的，离开他的中央，或推翻他的中央这不是决裂便是政变。现在党内有此危险的倾向，应攻击此倾向（暗指鲁易）；（四）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等，便是我们的胜利，便是土地革命；（五）C·P中央及一切工农会现在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所公布之一切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

老鲍在另一政治局会议，发表他对于土地革命的意见：他公然说明"土地革命不即是没收土地"。照他的解释，土地革命的意义和内容是：(一)减租减息；(二)乡村自治；（三）保护佃农；（四）武装自卫；（五）办农运讲习所，从新养成不幼稚不过火的农运人材。当时独秀说："老鲍这种办法好是好，但是修改了国际土地革命的意义"，秋白说："这不是修改国际土地革命的意义。按照中国目前的状况确定只能如此做"。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

（二七年）六月十七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免鲍罗廷及各俄顾问的职，由陈友仁通知请其出境。……鲍罗廷等……乃于七月二十七日全体离开武汉（加伦将军此时仍留武汉，后转赴上海，至十月六日，始由沪赴日回国）经河南、陕西转入蒙古于十月中始回莫斯科。

（何汉文：《中俄外交史》第381页）

〔罗易〕（1887——1954）

（罗易又称：鲁易、罗益——编者）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布哈林主持共产国际第七届全体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礼……。

…………

依照史达林的标准路线，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采取一个"双重战略"：一面强调"农民革命"，另方面却同时"支持国民党"，虽然后者有许多党员是很有势力的大地主。……

…………

为了保证这些决议的执行，史达林转派罗易（M·N·Roy）来华，……

（罗勃C·诺斯：《莫斯科与中共》第78—79页）

……夏斗寅叛变一起，进攻武昌，距武昌只四十里（抵纸坊）……鲁易当此紧张之时不仅未把政治局的中心问题置在镇压反革命上，反而把他建立在所谓与左派的关系上，这是与老鲍全然相同的。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

（马日事变之后）在有一场政治局会议上鲁易与老鲍各自发表长篇演说……

鲁易的大意是：（一)现在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已经不是左派而是土劣地主军阀的代表，我们应号召左派群众来推翻他们；（二）推翻国民党现在的中央，并不是根本决裂与政变；（三）我们现在应一直到工农民主独裁制（未多说理由）；（四）C·P中央应发宣言反 对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近日所公布之一切反动的法令，在这些法令中不仅反工农运动，并且保护封建制度。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

（二七年）六月国际来电要中共立刻实行土地革命，改造国民党、武装五万农民、二万党员，（清）洗叛将，鲁易把电给汪精卫看，不先给中央看，汪精卫翻了。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

（二七年）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扩大会"通过十一条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企图采取"退步政策"，维持两党合作。七月三日，又决议送罗易回俄。但是七月十五日武汉左派政府即实行分共。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51页）

（中国共产党）"五大"国际代表是鲁易（印度人），他之前在中国的国际代表是伍廷康（魏琴斯克）。他的妻子是妇女工作顾问，"四·一二"事变回国。后来的妇女工作顾问是农民运动顾问老祖母夫的妻子老祖母瓦，一直担任到一九二九年。

（《杨之华回忆》1971年7月。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

五

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作出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时止，先后派罗明纳兹、米夫、李德等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对中国党的政策影响很大。

〔纽曼〕

（纽曼又称：牛曼、罗埃曼——编者）

〔罗明纳兹〕

（罗明纳兹又称：罗明纳、罗米纳兹——编者）

（"七一五"武汉汪精卫叛变以后)史达林随即遣派了两名第三国际新代表罗明 纳（Besso Lominad）和牛曼（Heinz Neumann）来华，前者携有筹备南昌暴动的指训，后者负有召集一项中共领袖人物特别会议（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紧急会议）及对十二月广州暴动的指训。罗明纳因与史达林乃系同乡之亲而赢得宠信，时年二十九。牛曼则是柏林人，年仅二十六。

（罗勃C.诺斯：《莫斯科与中共》第95页）

当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期……，共×……认定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企图进攻长江中部的大城市。但是这种军事冒险主义究竟能否成功，俄共与中共内部屡起争执。



莫斯科派罗明纳兹再度来中国，视察×区。罗明纳兹回俄后的报告，认为中共的苏维埃路线必归失败，主张中共放弃瑞金，西走四川，作长期斗争打算。史达林对他的建议没有采纳。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65页）

十一月扩大会议，主要负责人是瞿秋白，国际代表是罗米纳兹、罗埃曼等，会在上海开，我和苏兆征在一起，工委书记是我，全总、海总是他和史文彬负责。这次会主要开一天，前后开了二、三天。

（1977年访问罗章龙教授记录。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

〔米夫〕

在一九三〇年年初，莫斯科曾委派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及史派中国问题专家——米夫，作为共产党运动第三国际驻华代表。和他一同来华的有一批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攻读，号称“留俄学生派”中共留学生，其中以王明（陈绍禹）为首，包括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张闻天。

（罗勃C·诺斯：《莫斯科与中共》第119页）

一九三一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地点在中央一个保密机关内。会议只开了一天，时间很匆忙。我是会前一、二十分钟才得到通知。会议完全是米夫一手包办，开得很不正常……。米夫讲，这是超越六大中央的方式召开的紧急会议。

（会议开始）米夫坐在主席位上。国际代表轮流发言，作了长篇讲话，历时二、三小时，综合他们的谈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当前中共中央全党右倾，迫切要求改组，特别提到中央苏区一贯右倾，严重右倾，……米夫重复说明国际指示王明等组织临时中央是改造中国党的必须手段。

2、3（略）

4．王明等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政治上很正确，中国革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

5．虽然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占党的绝对多数，但形式的多数不能算多数，赞成四中全会的虽占少数，但也不能算少数。

（罗章龙：《关于六届四中全会》。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

〔亚尔伯〕

（亚尔伯又称：李德——编者）

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间只有一个第三国际代理人——德国人亚尔伯（Aibert）留住瑞金。自长征开始，所有与莫斯科的联络终断了好几个月。

（罗勃C·诺斯：《莫斯科与中共》第140页）

列席（六届）五中全会的李德（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德共分子，又名Aibert）特别强调在堡垒主义下的新战术，即所谓“短促突击”。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70—471页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69年12月版）

（选自《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3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12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页数=642
SS号=10273514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